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9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九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片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 目 录

第九卷说明 .....	VII—X X VII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不列颠政局。—— 迪斯累里。 —— 流亡者。—— 马志尼在伦敦。—— 土耳其 .....	3—13
弗·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	14—19
卡·马克思。伦敦的报刊。—— 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 上的政策 .....	20—23
弗·恩格斯。土耳其问题 .....	24—30
卡·马克思。柏林密谋 .....	31—34
弗·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 .....	35—40
卡·马克思。柏林密谋。—— 伦敦警察局。—— 马志 尼。—— 拉德茨基 .....	41—43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 .....	44—48
卡·马克思。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 .....	49—55
卡·马克思。内阁的成就 .....	56—64
卡·马克思。菲格斯·奥康瑙尔。—— 内阁的失败。 —— 预算 .....	65—71
卡·马克思。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 预算对谁有利 .....	72—76

卡·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 —— 预算 .....	77—86
卡·马克思。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 联合内阁的预算 .....	87—9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火箭案件。—— 瑞士的暴动 ...	96—100
弗·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	101—108
卡·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	109—116
卡·马克思。荷兰情况。—— 丹麦。—— 不列颠国债 条款变更。—— 印度。—— 土耳其和俄国 .....	117—123
卡·马克思。马志尼。—— 瑞士和奥地利。—— 土耳 其问题 .....	124—128
卡·马克思。土耳其问题。—— “泰晤士报”。—— 俄 国的扩张 .....	129—131
卡·马克思。俄国的欺骗。—— 格莱斯顿的失败。—— 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 .....	132—142
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	143—150
卡·马克思。英国的繁荣。—— 罢工。—— 土耳其问 题。—— 印度 .....	151—159
卡·马克思。土耳其和俄国。—— 阿伯丁内阁对俄国 的纵容。—— 预算。—— 报纸附刊税。—— 议会的 舞弊 .....	160—166
卡·马克思。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 .....	167—176
卡·马克思。印度问题。—— 爱尔兰的租佃权 .....	177—183
卡·马克思。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 *英国的工 人运动 .....	184—196

---

卡·马克思。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 .....	197—209
卡·马克思。 <sup>*</sup> 累亚德的质询。——围绕着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 .....	210—217
卡·马克思。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 .....	218—227
卡·马克思。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官的有趣信件 .....	228—236
卡·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	237—245
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	246—252
卡·马克思。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 .....	253—263
卡·马克思。 <sup>*</sup> 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沙皇宣言。——丹麦 .....	264—270
卡·马克思。广告税。——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 .....	271—277
卡·马克思。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 .....	278—290
卡·马克思。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 .....	291—298
卡·马克思。土耳其问题在下院 .....	299—312
卡·马克思。大陆和英国的情况 .....	313—320
卡·马克思。米哈伊尔·巴枯宁 .....	321—323

---

<sup>\*</sup>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编者注

卡·马克思。粮价上涨。——霍乱。——罢工。—— 海员中的运动 .....	324—326
卡·马克思。致“人民报”编辑 .....	327—329
卡·马克思。 <sup>*</sup> 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 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 .....	330—340
卡·马克思。政治动态。——欧洲缺粮 .....	341—349
卡·马克思。 <sup>*</sup>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 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 .....	350—359
卡·马克思 <sup>*</sup>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 征兆 .....	360—371
卡·马克思。 <sup>*</sup> 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 .....	372—378
弗·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 .....	379—385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 .....	387—461
第一篇 .....	389
第二篇 .....	398
第三篇 .....	405
第四篇 .....	418
第五篇 .....	429
第六篇 .....	436
第七篇 .....	443
第八篇 .....	451
卡·马克思。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 .....	462—471
卡·马克思。 <sup>*</sup> 土耳其宣言。——法国经济状况 .....	472—476
卡·马克思。 <sup>*</sup> 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奥 地利。——“泰晤士报”谈对俄战争的前景 .....	477—479

---

弗·恩格斯。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 .....	480—485
弗·恩格斯。神圣的战争 .....	486—490
卡·马克思。战争。—— 罢工。—— 生活费用上涨 .....	491—500
卡·马克思。 <sup>*</sup> 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 丹麦。—— 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 威根的 矿工 .....	501—506
弗·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	507—514
弗·恩格斯。俄军的失败 .....	515—517
卡·马克思。工人问题 .....	518—521
卡·马克思。繁荣。—— 工人问题 .....	522—529
弗·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	530—536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 .....	537—571
卡·马克思。 <sup>*</sup> 曼托伊费尔尔的演说。—— 普鲁士的宗教 运动。—— 马志尼的宣言。—— 伦敦市政厅。—— 罗素的改革。—— 工人议会 .....	572—579
弗·恩格斯。多瑙河战争 .....	580—587
卡·马克思。土耳其战争。—— 工业的灾难 .....	588—591
卡·马克思。四国协定。—— 英国与战争 .....	592—601
卡·马克思。俄国的胜利。—— 英国和法国的地位 .....	602—608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辞职 .....	609—612
弗·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	613—619
注释 .....	623—69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	699—712
人名索引 .....	713—749
期刊索引 .....	750—753

---

地名索引 .....	754—764
------------	---------

---

### 插 图

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的一页,上面记有发送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文章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日期 .....	361
载有卡·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第一篇的“人 民报”原版的一部分 .....	388
卡·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第一版的扉页 .....	539

## 第九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3 年 3 月至 12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和通讯, 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曾发表在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这些文章的时期, 正是欧洲各国政治极端反动的时期。革命民主主义的报刊在 1848—1849 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全被禁止。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当时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之外, 再没有其他的机会同群众来往和影响舆论。马克思从 1851 年 8 月起为该报撰稿。从那时起, 在“论坛报”上写作政论的工作就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以私人关系托他写文章)的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 马克思除了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之外, 还为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写了一些文章, 该报从 1852 年 5 月起开始出版, 主编是厄·琼斯。此外, 马克思为“论坛报”写的文章, 也有个别篇章同时发表在“人民报”上, 还有几篇曾部分转载在德文报纸“改革报”上, 该报在约·魏德迈的积极参加下从 1853 年 3 月起在美国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的政论文章是同他们的理论工作和他们的全部党的政治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结合着报刊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研究世界历史, 其中包括各殖民

地国家的历史、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恩格斯则继续系统地研究军事科学，研究语言学问题、斯拉夫语言和东方语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给报纸写文章。同时，报刊工作也使他们密切注视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事件，为科学研究工作搜集事实和积累材料。例如，马克思为“论坛报”写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经济方面的材料，有相当一部分后来用在“资本论”中。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不仅自己特别注意理论研究，而且鼓励他们的拥护者利用革命战斗中已经到来的一个间歇时期，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反革命势力的胜利是暂时性的，并且努力向无产阶级战士的队伍灌输这种信心。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之后已经没有了任何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继续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保持着联系，努力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在反动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通过先前的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去影响美国的工人运动，通过厄·琼斯和革命的宪章运动的其他领袖去影响英国的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利用自己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写政论的机会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病态和恶迹，揭露欧洲各国的反动制度，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论证无产阶级在各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和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坛报”上宣传自己观点的严重障碍是该报编辑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文章要特别灵活，要善于在一定的時候不用直接的方式，而用隐

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始终如一地在文章中贯彻与该报编辑部的路线截然不同的路线。早在 1853 年的时候，该报编辑部不仅在观点上就已开始表现出和马克思根本不同，而且还对马克思采取了资产阶级报界常见的不礼貌态度以及报社主人和编辑部对撰稿人惯常采取的剥削者的态度。“论坛报”编辑部不经马克思的同意就把他寄来的文章抹去姓名作为社论发表，许多文章根本没有发表；有一些文章被编辑部任意分为几部分，遭到编辑的涂改，被编辑添上了他们自己的、往往和马克思的文章的内容和风格相矛盾的意见。编辑部的这种行为使马克思很恼怒，他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在工人的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刊物几乎连一个也没有的情况下，马克思不得不珍视自己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机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政论作品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多样化。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阐述了工人运动中一切比较重要的现象，阐述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各国的经济，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当前的各种事件作了全面的、深刻的科学分析，并且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理论概括和政治结论。

从本卷所发表的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注意的主要是以下三类问题：欧洲各国特加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连的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新高潮的前景；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国际关系——与欧洲各国在近东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备战以及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已经开始军事行动有关的国际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这个时期的科学工作和政论工作有一个新的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对亚洲的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首先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在刊物上系统地发表文章阐述这些国家的情况，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性的殖民主义政策。

马克思分析了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在收入本卷的“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说明了工业生产（首先是英国的工业生产）、农业、国内和国际贸易、市场价格、外汇行市等等方面的情况。马克思通过许多实例考察了当前工商业周期的各个阶段，并且把他早在四十年代的经济学著作中就已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周期性的原理具体化。马克思在文章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的谰言，这些人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能使所有阶级繁荣昌盛并且符合自然规律的制度。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见本卷第280页）。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缺陷在于，它的代表人物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同上）。

马克思在文章中尖锐地评述了以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由贸易论者用关于“自由”、“和谐”、

“繁荣”等伪善辞句来掩盖对雇佣工人的残酷剥削。马克思揭穿了作为资本主义辩护士和工人阶级敌人的自由贸易论者的真面目。他揭穿了自由贸易论者所散播的贸易自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的幻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1853年底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自由贸易论者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发生危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了。当时，工商业中的繁荣阶段被停滞阶段所代替，许多生产部门开始出现危机现象。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危机，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新的经济危机必然到来，资产阶级想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的一切企图都是白费气力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同马克思的经济评论有密切联系的，是他的有关财政问题的文章，如“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内阁的成就”、“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以及其他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些是为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写的。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向工人读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的阶级性质，揭示了英国政府的财政措施和税收措施的真正本质。马克思把格莱斯顿的预算看做“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指明了资产阶级的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复杂机构是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这些文章和阐述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都鲜明地描绘出英国劳动者的困苦处境、工人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表现为大规模阶级冲突的矛盾的日益尖锐。

马克思在文章中非常注意阐述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在这一斗争进程中不断发展的职业联合组织——工联的活动。在“英国

的繁荣。——罢工。——土耳其问题。——印度”、“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和其他文章中，马克思不厌其详地引用了关于英国各工业区发生的罢工的消息，同时着重指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新现象——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参加了这些罢工。他分析了罢工者的要求，揭露了工厂主和资产阶级当局对罢工工人所采取的蛮横行动，并且对罢工运动的性质和它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作了评价。

马克思认为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战争、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战争的鲜明表现。马克思证明，罢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是合乎规律的现象；罢工是制止工厂主的专横、保障工人的必要生存条件的手段。

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罢工的意义的结论，他认为罢工是激发劳动者的斗志，团结他们向剥削者作斗争的要素。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的关于工人联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学校这一原理的直接发展。马克思认为，罢工的主要意义在于罢工对工人所起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影响，罢工能培养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促使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

样。”（见本卷第191页）

马克思在阐述英国工人运动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提出了的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统一、关于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着重指出，尽管经济斗争对于团结和教育工人有很大作用，可是只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他着重指出了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群众性的政党并且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琼斯和宪章派的其他革命领袖，因为这些领袖要把英国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要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宪章运动，把争取宪章的斗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英国工人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人民宪章规定了在国内实现普选权。在英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统治阶级还没有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普选权能够成为确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前提——的杠杆。马克思在通讯稿中往往援引琼斯在工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从这些演说中可以看出科学共产主义对这位杰出的英国无产阶级活动家所起的良好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密切注视着欧洲大陆各国开始革命行动的迹象。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人民群众都怀着隐蔽的不满情绪。

在“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法国的政局怎样在经济困难、物价高涨等等的影 响下日益恶化。马克思着重指出，广大群众特别是相当多的农民对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各项措施深为不满，这证明第二帝国的反革命统治

是不巩固的。在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政治动态。——欧洲缺粮”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意大利的教皇国、腊万纳和其他地方发生了一系列的抢粮风潮。马克思在1853年的文章中谈到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时，继续对马志尼及其拥护者进行批评，因为他们不考虑客观条件，坚持奉行他们从前的密谋性的策略。

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也是为反对革命运动中的密谋性的策略、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中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和“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两篇文章相衔接。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继续揭露小资产阶级的假革命和夸夸其谈的作风，揭露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们醉心于在革命中玩弄煽惑性的把戏，醉心于密谋手段。这篇文章的特定目的是揭露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以前的宗派小集团的首脑之一、利用流亡者的民主主义刊物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进行诽谤和攻击的奥·维利希。马克思在这篇著作（其中还包括恩格斯的一封论维利希的信）中，以尖锐讽刺的笔法勾画了这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空谈家、冒险主义策略的卫士的面貌。马克思用维利希的十分可笑的“革命”计划做例子，严厉谴责了密谋性策略的拥护者的通病：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不善于冷静地估计形势，政治上极不坚定。这篇著作除了一些揭发性的材料外，还有许多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史的重要材料。

马克思反对马志尼、维利希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活动家不顾客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专在“革命的”冒险和密谋上打主意，他认为，在准备新的革命高潮方面，主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增长、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必然发生以及与此相关

的欧洲各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马克思写道：“煽动家的词藻和权谋家的废话决不能使局面发生危机；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见本卷第 349 页）

马克思在分析未来欧洲革命的前提和前景的时候，还估计到一个新的重要因素。他反复强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对象的亚洲大陆各国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欧洲各国的革命化的影响。在东方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宗法制的封建关系由于这些国家被拖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遭到破坏。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这种变革的革命后果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注视着这些国家中日益高涨的人民群众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1853 年马克思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专文，这些文章现在都已收入本卷。这些周密研究了各种材料而写成的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野蛮压迫和剥削而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光辉典范。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内容深刻的文章中，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殖民国家首先是英国的掠夺政策对这个亚洲的最大国家的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了英国的商品竞争对中国地方工业的破坏作用。他指出，英国人把鸦片输入中国，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完全枯竭的灾难；他指出，中国在第一次掠夺性的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被迫支付英国赔款而使捐税大大增加。所有这一切与中国国内的社会原因一起，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反对本国封建主和外国侵略者的农民革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军起义。

马克思写道：“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 10 年之久，现

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见本卷第 109—110 页）

马克思指出英国、法国和美国用武装力量直接支持反动的满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起义，揭露了摧残东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欧美资产阶级的刽子手行为。

马克思在深刻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国，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中国的事变缩小了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而商品市场的缩小将加速工业危机的到来。马克思在强调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见本卷第 114 页）。

马克思关于欧洲和东方的革命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殖民地革命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根据这个结论，弗·伊·列宁制定了关于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后备军的学说。

本卷中还有马克思论印度的一些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和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这些文章前后呼应，有深刻的科学分析，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作了有力的揭露，是马克思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极为出色的著作。

在论印度的文章中，马克思通过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和文明悠久的国家被英国统治的例子，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

落后的东方国家施行殖民主义统治制度的特征。他探讨了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起英国人对印度进行侵略和殖民主义奴役的各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揭露了东印度公司的作用，指出它是征服印度的工具，它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利用当地王公之间的封建内讧，煽动部落的和种姓的纠纷，以实现其对印度领土的侵占。马克思着重指出，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掠夺和侵略是英国本国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的寡头政治财富增加和势力加强的源泉。马克思有力地揭露了：西蒂的商人、大地主和东印度公司的官只这一伙强盗怎样靠剥削印度的人民群众而大发横财，人民群众怎样被殖民主义者弄得贫困不堪。在“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印度的管理”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英国寡头政治建立的官僚管理制度的寄生性，在这种制度下，印度人民群众陷于完全无权的地位，任凭英国殖民主义当局摆布。马克思严厉抨击了英国统治阶级根本不要印度人民代表参加而在印度管理方面进行的所谓改革。马克思揭露了这些改革的阶级目的，指出进行这些改革的原因是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想限制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直接进入印度市场，从印度的赋税中取得收入，以便在对印度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中增加自己的份额。

马克思描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进行盗匪式管理的惊人情景。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从东方统治者那里继承了财政部门 and 军事部门这样的管理部门并用它们来掠夺和压迫人民以后，就把第三个部门——甚至东方专制君主都予以注意的公共工程部门撇开不管了。因此，印度的农田水利极度衰落下去。英国工业品的竞争使当地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使手纺业和手织业破了产，使千百万印度居民束手待毙。田赋、盐税以及殖民主义者施行的一整

套横征暴敛的财政制度，沉重地压在居民身上。英国人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制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同时把印度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许多阻碍国家进步发展的封建残余保留下来。英国人在孟加拉管区实施了柴明达尔制度，在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实施了莱特瓦尔制度，这样就使印度土地制度中的各种奴役性租税以及地主、土地中介人、收税人对农民的各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保存下来，甚至加强了。马克思指出，在这两种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二分之十一的莱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贫化”（见本卷第 244 页）。马克思作出结论说：英国侵略者给印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见本卷第 144 页）。在这方面，马克思表述了一个深刻的思想：资本主义的剥削、掠夺的本质在殖民地表现得最为露骨。“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见本卷第 251 页）

马克思在无情地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时候又指出，他们纯粹为发横财和进行殖民主义掠夺的利益所驱而不得不促成印度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产生。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给印度人民群众带来了特别深重的苦难，因为这些关系是在殖民主义者统治的条件下出现的，殖民主义者阻碍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他们只容许对自己有利的工业部门产生。但是，马克思指出，英国侵略者既然容许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印度萌芽，并且用这种方式破坏了印度的宗法制的封建结构，就在无意中为这样一些力量的成长造成了前提，这些力量将来会打垮他们的统治，消灭他们对印度的

殖民压迫。

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性质和结果的问题，通过这个例子鲜明地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性和两重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应当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造成物质基础。造成这些物质前提的代价，是在资产阶级残酷剥削下的人民群众遭到种种难以置信的牺牲，全国的人民被资产阶级逼迫走着流血、污秽、贫困和屈辱的苦难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见本卷第 252 页）。

马克思着重指出：印度的生产力因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而得到发展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减轻印度人民群众的苦难，并不会改善他们的处境。要办到这一点，人民必须自己掌握生产力，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消灭外国殖民统治。马克思写道：“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枷锁之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见本卷第 250 页）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印度人民自己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解放斗争，才能使印度获得解放——这就是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状况的文章中所作出的革命结论。所有这些文章都充满着坚定的信心，相信将来印度总能摆脱殖民奴役，相信“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复兴的一天总会到来。

收入本卷的“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也是马克思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篇著作。马克思把爱尔兰看做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他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英国大地主对爱尔兰农民

的掠夺性的剥削方式。他着重指出，英国对爱尔兰的侵略和民族奴役使这个国家保留着半封建的关系，这种半封建的关系“使一个小小的**特殊等级**——贪婪的贵族得以对爱尔兰人民为所欲为，任意规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用土地和靠土地生活”（见本卷第 179 页）。

马克思论中国、印度、爱尔兰的文章，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文章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信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是弗·伊·列宁创造性地探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出发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联系着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无产阶级运动以及民族解放战争的前途问题考察了国际关系的问题。本卷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阐述这些问题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熟悉国际政治的秘密，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阴谋及其侵略计划和侵略行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工人阶级，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看做是能够积极抵制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力量。他们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在国际冲突中必须遵循自己的革命路线，这个路线就是要在欧洲全面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欧洲革命叫做“第六强国”，他们就是从这个“第六强国”的立场出发来对待任何国际问题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国际问题的论文中严厉抨击了欧洲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整个国际关系体系。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这个体系阻碍了欧洲的进步发展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阻碍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民族统一。他

们严厉谴责统治阶级在外交上使用挑唆某些民族反对另一些民族，恐吓和诈骗以及粗暴干涉小国内政的方法。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注意的是欧洲列强在近东的尖锐矛盾和它们之间为瓜分土耳其帝国的领地、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统治权、争取在巴尔干和前亚细亚各国占优势的斗争。这个所谓东方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很多篇文章中所研究的题目。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东方问题的看法，在恩格斯所写的“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这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头几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叙述。恩格斯分析了近东和巴尔干被土耳其征服后在历史上形成的状况，揭示了欧洲各大国在土耳其领地的命运问题上互相竞争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军事原因，论证了革命无产阶级和欧洲民主派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东方问题像对待其他国际问题一样，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与西欧的许多外交家和政论家相反，例如，英国政论家戴·乌尔卡尔特主张保存反动的封建的奥斯曼帝国，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被土耳其征服的各民族取得历史进步的最大障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支持让这些民族独立的要求，主张在巴尔干建立一个独立的斯拉夫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使巴尔干半岛的被压迫民族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出来，是欧洲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西欧各国政府有一种虚假的理论，即在巴尔干半岛也保持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现状，用这种虚伪的说法来掩盖它们反对巴尔干半岛民族解放的态度。恩格斯揭露了西欧各国政府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痛斥维护 status quo (现状) 的人主张“畏首畏尾和因循

守旧的外交”，痛斥他们反对用进步方法解决东方问题。“不，按老办法办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一个月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1789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见本卷第37—3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正如1848—1849年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沙皇专制制度是革命的死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也进行了斗争，因为这些反动势力利用沙皇政府做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竭力把它保存下来，继续作反动势力的堡垒。在收入本卷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的警察统治、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的外交阴谋以及西欧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对沙皇政府的姑息纵容态度。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揭穿了沙皇政府冒充巴尔干各民族的“朋友”和“保护人”的伪装。他们指出，沙皇政府力图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特别是南方斯拉夫人对俄国、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来达到侵略的和反革命的目的。俄国在历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客观上有助于这些民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但是沙皇的反动政策必然会引起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斯拉夫民族的反对。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政府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俄罗斯人民以及俄罗斯帝国其他各民族的压迫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政府势力的加强对欧洲的民主力量是一个很大的

危险。列宁在 1909 年写道：“半世纪以前，俄国就牢牢地享有了世界宪兵的荣誉。我国专制政府在上一世纪作了不少的事情，来支持欧洲任何的反动派，甚至公开用武力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只要回忆一下尼古拉一世出兵匈牙利和多次镇压波兰这些事件，就会懂得，为什么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从四十年代起一再对欧洲的工人和欧洲的民主派说，沙皇政府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从十九世纪后三十多年起，俄国的革命运动使这种情况渐渐有了变化。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涨的革命的打击下愈是不稳定，就愈没有力量去反对欧洲的自由。”（“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428 页）

本卷中有许多文章是专门分析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的。这些文章是：“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土耳其问题在下院”、“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以及其他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都无情地批判了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指出的，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贵族的寡头的狭隘私利。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英国内阁的对外政策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从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战的时候起在欧洲所起的那种反革命作用，这种作用在 1848—1849 年就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同沙皇和其他反动势力结成联盟，极力扼杀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英国的统治集团非常害怕在东方问题上与俄国冲突，因为他们耽心这种冲突会转变成欧洲整个大陆的革命，这样就很容易在大不列颠的人民群众中也引起反应。英国的全部外交都反映了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尖锐地揭发出英国统治阶级外交的传

统特点：两面三刀、借刀杀人、在欧洲的多次危机中恶意挑拨、对同盟国背信弃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力求用他们反对英国当权的政治寡头的言论来促进英国进步民主力量为打倒寡头统治和改变大不列颠的对内外政策而斗争。马克思的一组揭露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这些文章发表在“人民报”上，“纽约每日论坛报”也发表了一部分。这一组文章中有几篇还在英国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帕麦斯顿勋爵”是马克思仔细研究了許多外交文件、议会辩论纪录和报刊之后而写成的辉煌的抨击性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用十分准确和幽默机智的笔法，勾画了寡头政治的最著名的代表、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的最突出的国家活动家之一帕麦斯顿的肖像。在马克思对帕麦斯顿的评论中，包含着对英国的整个政府制度、对英国官方的整个政治路线的评价。马克思揭露了这一套制度的阶级根源，说明帕麦斯顿式的英国国家活动家最关心的是怎样使“土地和金融巨头的上空”一直晴朗无云。马克思以帕麦斯顿对爱尔兰问题以及对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民族运动的态度为例，彻底揭露了在笼络性的自由主义词句掩盖下，在对专制制度受害者的假惺惺的态度掩盖下的英国政策的反革命性质。帕麦斯顿在口头上拥护“宪制”，而在英国本国则首先倡议施行警察措施，反对任何进步改革，在欧洲——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则支持反动的君主政府，并且讨好法国波拿巴集团。帕麦斯顿政策的特点是：奸诈、圆滑、虚伪和无耻，正如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这种政策是极端反人民的。

马克思在这一抨击性著作以及“帕麦斯顿辞职”一文中说明，

帕麦斯顿和英国当权的政治寡头的其他代表人物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也是这种背信弃义和两面三刀的手法，他们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也有反革命的趋向。不过应该指出，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是英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典型代表这一评论虽然十分准确，但是却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这位英国大臣的活动的某些方面。马克思极力强调俄国沙皇政府和英国寡头政治共同的反革命意图，但是在他的这一抨击性著作中稍许夸大了帕麦斯顿看沙皇专制政府的眼色行事这一点。帕麦斯顿和英国寡头政治的其他代表人物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不仅仅取决于害怕革命，希望利用专制制度来对付革命，而且也取决于英国统治阶级对近东抱着侵略野心，他们想夺取高加索，他们计划削弱沙皇俄国来加强自己，这种计划在引起克里木战争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马克思抨击帕麦斯顿的文章利用了乌尔卡尔特的材料，当时的某些资产阶级报纸和后来的许多资产阶级文人曾利用这一点来胡说马克思和乌尔卡尔特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一样。但是，散见于本卷各篇文章中的马克思批判乌尔卡尔特立场的意见，就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同意乌尔卡尔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乌尔卡尔特的观点是反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利用乌尔卡尔特言论中所引的某些事实以及乌尔卡尔特派所办的反对党的报刊来揭露英国政府。

马克思在“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一文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揭示了波拿巴法国在东方危机时期所持立场的真正背景。马克思揭露了路易·波拿巴在导致了克里木战争的东方冲突中所追求的冒险家目的和皇帝瘾，马克思着重指出，对于路易·波拿巴来说，对外冒险是维持反动波拿巴专政

的手段，并且通过对外冒险使当时欧洲的各国统治者承认他这个法国王位篡夺者是“可敬的”君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着为了侵略目的而把人民拖入战争的统治阶级的政策，提出了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真正的革命战争在欧洲实现民主改革的思想，提出了解放波兰人、匈牙利人、南方斯拉夫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使德国和意大利通过革命民主道路取得民族统一的思想。他们着重指出，这样的战争会使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反革命统治崩溃，归根到底会促使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在俄国和土耳其军事行动开始后所写的一系列军事评论。在这些评论（见“多瑙河战争”、“神圣的战争”等文）中，恩格斯分析了高加索战场和巴尔干战场上军事行动的条件、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双方军队的最初几次战役。这里应该看到：恩格斯的文​​章是紧跟着事件写的，没有时间和可能去全面查对来自战场的消息。例如，在恩格斯的“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中，他对西诺普海战的估计就受了片面的、不客观的消息的影响。由于报道不确切，在恩格斯所写的“俄军在土耳其”、“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的文章中，关于多瑙河上的俄军人数就采用了夸大了的数字。恩格斯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在后几篇文章中（见本卷第530—532、585—587页）对这些数字作了重要的订正，改变了自己对军事行动的某些估计和预测。

在编入本卷以及第十卷和第十一卷的恩格斯论克里木战争的一系列文章中，包含着有关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很有价值的结论；这些文章很有意义，特别对于军事专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很有意义。恩格斯在论克里木战局的文章中进一步解决了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上概括当代战争的经验。

\* \* \*

本卷所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有 13 篇在全集第一版中没有收入，并且是用俄文第一次发表的。在全集第一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没有完整地刊载，而是把各个片段按问题性质归在一起，有时还漏掉几段，本版则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按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形式刊载出来。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一再指出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他们的文章的原文采取了任意处理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去掉署名作为社论发表出来的文章。本卷在编译过程中，发现了某些文章中有编辑部添加的文字。对于编辑部添加的这些文字，本版都附在有关的注释中。“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纸上显然印错了的引文、人名、地名、数字、日期等等，现在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过的原始材料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的材料——核对，并作了更正。各篇文章的篇名完全依照当时报纸上的标题。原稿中没有篇名的文章，则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标题前加一星花。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3年3月—12月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不列颠政局。—— 迪斯累里。  
—— 流亡者。—— 马志尼在  
伦敦。—— 土耳其<sup>1</sup>

1853年3月22日星期二于伦敦

迪斯累里辞去少数派“大保守党”的领袖职位，在现时的政党史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sup>2</sup>。据悉，迪斯累里还在托利党内阁任职八九个星期之前，曾打算抛弃自己的旧同盟者，只是由于得比勋爵再三要求才放弃了这种打算。可是现在，迪斯累里自己被排挤了，他的职位已正式由约翰·帕金顿爵士接替。帕金顿是一个稳健谨慎的人，有一些领导能力，但是，他又是一个阴暗的人物，是英国土地贵族的腐朽偏见和陈旧思想的真正化身。这次更换领导，意味着托利党彻底改组，可能还是最后的改组。迪斯累里可以庆幸自己摆脱开了那些惯于欺诈的土地占有者了。不管我们对这个据说是鄙视贵族、仇视资产阶级和不喜欢人民的人物的意见怎样，他毫无疑问是本届议会中最有才干的议员，而他的灵活性则使他能够很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要求。

至于流亡者的问题，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报道过：奥地利报纸在帕麦斯顿勋爵于下院发表演说后表示，要从被帕麦斯顿的有害

影响所腐蚀的内阁得到满足是徒劳无功的。但是，阿伯丁在上院的声明用电报一拍到维也纳，情况就变了<sup>3</sup>。这几家报纸现在又强调说，“奥地利相信英国内阁是高尚的”，而半官方的机关报“奥地利通讯”<sup>4</sup>则刊载了该报巴黎通讯员所写的下面一篇报道：

“考莱勋爵在返回巴黎后向法国皇帝宣称，英国驻北方各国宫廷使节都接到了正式指令，这个指令要他们尽一切努力阻挡北方列强向英国政府提出联合照会，并提出下面这种理由使它们不去采取这样的步骤，即英国政府在整个英国的心目中愈能保持它在这个问题上自主自愿的样子，那末它就愈能满足这些强国的要求……”

不列颠大使考莱勋爵极力向法国皇帝说明，他可以完全信赖不列颠内阁，而且，即使这种信赖被辜负了，皇帝还可以随时采取他认为需要的任何步骤…… 法国皇帝同意考验一下不列颠内阁的诚意，但同时保留了自己将来行动的完全自由；他现在正企图说服其他强国也照他这样做。”

诸君可以看到，从《ce cher A berdeen》（“这个可爱的阿伯丁”）（路易—菲力浦通常这样称呼他）那里所期待到的是什么，阿伯丁所许下的诺言的内容大致是些什么。继这种诺言之后，现在已开始了实际的行动。上星期，英国警察当局拟出了居住在伦敦的大陆流亡者的名单。几个暗探挨街区、街道、住宅到处追踪搜索，并且记下了流亡者的特征；他们大都在附近的小酒馆里转来转去，有时甚至借口搜捕罪犯闯入某些流亡者的住宅，乱翻他们的文件。

正当大陆上的警察在徒劳无功地追捕马志尼的时候，正当纽伦堡当局下令关住城门捉拿马志尼的时候（德国有句老话：“抓不住就绞不死”），最后，正当英国报刊大量报道马志尼可能的行踪的时候，马志尼却在伦敦安然无恙地住了几天了。

缅施科夫公爵在举行了驻多瑙河各公国俄军阅兵式并检阅了驻塞瓦斯托波尔的陆军和舰队之后（按照他的命令，塞瓦斯托波尔

在他莅临时曾举行军队上船和登陆演习),于2月28日以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姿态进入君士坦丁堡。他的随员共12人,包括俄国黑海分舰队司令海军上将<sup>①</sup>、一位师级将军<sup>②</sup>、几位参谋军官和使团秘书小涅谢尔罗迭先生。希腊居民和俄罗斯居民对缅施科夫的接待,就像接待亲临沙皇格勒恢复真教的正教沙皇本人那样。在伦敦这里和在巴黎,下面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缅施科夫公爵对傅阿德—埃芬蒂的辞职并不满足,他要求苏丹为了俄国皇帝的利益不但放弃对土耳其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而且放弃任命希腊总主教的权力;苏丹向英法求援;不列颠代办罗斯上校急忙派“黄蜂号”蒸汽舰往马尔他岛,以便立即调英国舰队去阿希佩拉哥群岛,而俄国舰船则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基利亚停泊。据巴黎的报纸“通报”<sup>⑤</sup>报道,在土伦的法国公舰队已接到命令开进希腊领水。不过,邓达斯海军上将仍然在马尔他岛上。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在欧洲,东方问题又提到 *ordre du jour* (日程)上来了,但这样的事对于熟悉历史的人们来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sup>⑥</sup>,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时,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的平静时机,把军队开往土耳其,向那些力求从内部摧毁这个行将灭亡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过了一些时候,西欧革命运动刚被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镇压下去<sup>⑦</sup>,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给了土耳其一个新的打击。以后,又经过若干年,当七月革

① 弗·阿·科尔尼洛夫。——编者注

② 阿·阿·涅波科伊契茨基。——编者注

命以及继之而起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各国的起义已经过去，成了 1831 年那个样子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动荡的时候，东方问题于 1840 年又几乎把各“大国”卷入了大战<sup>8</sup>。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自夸似乎已经幸运地使欧洲摆脱了混乱状态和革命危险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个无穷尽的困难之源：对土耳其怎么办？

土耳其是欧洲正统主义的一个痛处。从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起，正统主义君主体系的无力就表现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维持 *status quo*（现状）。这个共同的协议（顽固地维持自发或偶然形成的状况）是一个 *testimonium paupertatis*（贫穷证明书），是主要的强国承认自己毫无能力为进步或文明作出什么事情。拿破仑能够在刹那间决定整个大陆的命运，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决定中显示出英明果断。聚集在维也纳会议上的欧洲正统主义<sup>9</sup>的代表们，为了完成同一个任务，以他们全部的“集体智慧”还花了好几年的功夫；而且他们为此互相争吵，造成极大的混乱，并且都发现做这样的事是如此索然无味，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都意兴阑珊，不再打算重新划分欧洲了。平庸的米尔米东人（贝朗热这样称呼他们）<sup>10</sup>不通历史，不了解历史事实，没有主张和主动精神，他们膜拜 *status quo*——他们自己的集体创作，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的这件艺术作品是怎样的粗糙和平凡。

但是，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直不变的。恰好在反动派在文明欧洲恢复了它所认为的 *status quo ante*（一定时间以前的现状）的时候发现了，土耳其在这一个时期的 *status quo*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利益、新的关系。可怜的外交家们又要从 8—10 年前因普遍动荡而工作中断的地方开始做

自己的工作。一定要维持土耳其的 status quo! 这就像要把一匹死马的尸体的腐烂过程停在一定阶段上防止它完全腐烂一样。土耳其正在烂下去,而且,只要现行的“均势”和维持 status quo 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还会越烂越厉害。因此,它将不顾所有的会议、议定书和最后通牒,经常地每年在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像任何一种腐烂物体向周围大量放出沼气和其他“芬芳的”气体那样。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问题到底在哪里。土耳其由以下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非洲的藩属王国(埃及和突尼斯)、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非洲的领地暂时不谈,因为其中只有埃及可以算是真正从属于苏丹的国家。但是埃及要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英国人,在今后瓜分土耳其时它毫无疑问将成为英国人的属地。亚洲土耳其则是土耳其帝国现时还拥有的那些力量的真正中心。400年间,土耳其人大半都是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尔明尼亚,这两个地方是经常补充土耳其军队的充裕的来源,从围攻维也纳的土耳其的军队,一直到库列夫查战役中被吉比奇的并不高明的战术击溃的土耳其军队<sup>11</sup>都是这样。亚洲土耳其尽管人口少,但仍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属于土耳其族的狂热的伊斯兰教徒群,目前就休想去征服它。所以,实际上一讨论“东方问题”的时候,在亚洲各地区中受到注意的只是巴勒斯坦和基督徒聚居的黎巴嫩平原。

真正经常引起纠纷的,是沙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一个大的半岛,即欧洲土耳其。这个好地方却不幸成了各个不同种族<sup>12</sup>和民族杂居的地方,同时很难说它们当中谁最缺少走向进步和文明的条件。1200万斯拉夫人、希腊人、瓦拉几亚人、阿尔纳岛特人<sup>13</sup>处于100万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一直到不久以前还很难说,除了土耳其

人以外,在这些不同种族中哪一个最有能力实行统治,而在居民这样混杂的情况下,统治权不能不只属于其中的一个民族。但是,当我们看到,土耳其政府想走上文明道路的一切企图遭到了怎样可伶的失败,而以几个大城市中的土耳其平民为主要支柱的伊斯兰教狂热势力为了重掌政权和消灭任何进步倡议每一次都不惜向奥地利和俄国乞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即土耳其政府的权力是怎样由于基督徒省份的起义(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衰弱和邻邦的干涉,这些起义没有一次是完全不成功的)而一年年地削弱下去的时候;最后,当我们看到,希腊争取独立,俄国夺取部分阿尔明尼亚,而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相继归这一强国保护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土耳其人居留在欧洲严重阻碍了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所拥有的一切潜力的发挥。

很难称土耳其人是土耳其的**统治阶级**,因为那里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像各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一样复杂。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下,土耳其人中有工人、佃农、小土地所有者、商人、处于封建主义最低和最野蛮阶段的封建地主、官吏或军人;但是,不管一个土耳其人的社会地位如何,他却属于有特权的宗教和民族——只有土耳其人才有佩带武器的权利,而地位最高的基督徒在遇见社会下层的穆斯林时也必须让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拉夫族的贵族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人民群众仍然是“莱雅”,即基督徒。因此,在这一省份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吻合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他们的土耳其族教友的地位一般来说是同等的。

欧洲的土耳其居民(不算随时可以从亚洲吸引过来的后备)的

主体是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城市平民。他们主要是土耳其族，同时，尽管他们的雇主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资本家，但是他们仍然狂热地维护自己想像的优越性和胡作非为不受惩罚的实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因为他们信奉有特权的宗教即伊斯兰教而享有，用来对付基督徒的。谁都知道，在任何一次重要的 *coup d'état* (政变) 中，都必须用收买和恭维的手段把这些平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是这一些人形成了(某些殖民区除外)人数相当多同时又密集的欧洲土耳其居民。不言而喻，完全有必要把欧洲大陆上这个最好的地方从平民(罗马帝国时代的平民和他们比起来都成了贤人和英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必要性迟早总会出现的。

至于其他民族，这里首先谈一谈阿尔纳乌特人。阿尔纳乌特人是勇敢的山民，他们是位于亚得利亚海沿岸山坡上的国家的土著居民。他们有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大概属于大印欧语系。在阿尔纳乌特人中，部分人是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部分人是穆斯林；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来判断，他们好像还很少具备走上文明道路的条件。他们惯于打家劫舍，因此，在周围地区工业的进步没有保证他们能够像西班牙的加利埃哥人<sup>14</sup>和其他地方的山民那样从事采伐和运水的劳动之前，任何一个邻国政府都不得不用军事力量严格控制他们。

位于多瑙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瓦拉几亚人，或称达克—罗马尼亚人，这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民族。他们都属于正教教会，他们的语言源自拉丁语，在很大程度上与意大利语相似。在这个民族中，特兰西瓦尼亚和布柯维纳的居民是奥地利帝国的臣民，而贝萨拉比亚的居民则是俄罗斯帝国的臣民；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达克—罗马尼亚种族得到政治存在的唯一的

两个公国，这里的居民有自己的公爵，公爵名义上是土耳其政府的藩臣，而实际上则处于俄国统辖之下。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事，我们在匈牙利战争时期已听到很多了<sup>15</sup>。奥地利人用小恩小惠和各种诺言把这些陷于野蛮状态的瓦拉几亚人（他们迄今一直受着匈牙利大地主的封建压迫，而且这些大地主又适应着奥地利制度变成了政府进行各种勒索的工具）拉到自己这边来，如同1846年他们在加里西亚对处于农奴地位的卢西人所做的那样<sup>16</sup>，于是瓦拉几亚人便对匈牙利人进行了一场焦土战争，这场战争把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了荒漠地带。土耳其各公国的达克—罗马尼亚人至少还有自己的贵族和政治机关，在那里，俄国虽然极力防范，但革命精神仍然渗进去了，1848年的起义<sup>17</sup>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他们在俄国占领时期所身受的压迫和勒索，无疑地会使这种革命精神更为增长，尽管他们同俄国的共同宗教和他们对沙皇的宗教迷信使他们直到现在还把戴皇冠的正教教主当作天然的保护者。所以，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末瓦拉几亚民族在最后决定这些地区的问题方面，能够起重要的作用。

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大部分是斯拉夫族，虽然他们接受了新希腊语。实际上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除了几家名门望族以外，在君士坦丁堡和特拉比曾德，甚至在希腊本土，纯粹的希腊人都已经很少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一起，构成了各沿海口岸和内地许多城市中的商人的基本部分。在某些地区，他们也从事农业。但是，除了在特萨利亚（也许还有伊皮罗斯）以外，无论从人数、人口密度来看，或是从民族意识来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起作为一个民族所起的政治作用。少数几家希腊的名门望族的代表人物由于当通事（翻译官）在君士坦丁堡所享有的威望，在土耳其人到欧洲受教育

和欧洲各大使馆配备了通晓土耳其语的随员之后，也几乎丧失净尽了。

现在来谈谈构成居民基本部分和在每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其血统都占主要地位的那个种族。可以断言，这个种族构成了从摩里亚半岛到多瑙河，从黑海到阿尔纳乌特山脉这一地区内的基督教居民的主体。这个种族就是斯拉夫族，特别是其中名为伊利里亚 (Ilirski) 或南方斯拉夫 (Jugoslavenski) 的一个分支。继西方斯拉夫人 (波兰人和捷克人) 和东方斯拉夫人 (俄罗斯人) 之后，它构成了在 12 个世纪中定居在欧洲东部的人数众多的斯拉夫民族系统中的第三个分支。南方斯拉夫人不仅居住在土耳其大部分土地上，并且居住在达尔马威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南匈牙利。他们都讲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同西欧人听来无疑最富有音乐性的一种斯拉夫语言——俄语非常相近。克罗地亚人和部分达尔马威亚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其余的南方斯拉夫人都信奉正教。天主教徒使用拉丁字母，正教徒书写时则使用俄语、古斯拉夫语 (或称教会斯拉夫语) 所使用的基利尔文字。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信仰不同，就阻碍了他们的民族发展，使南方斯拉夫人居住的所有地区不能汇入一个民族的轨道。贝尔格莱德的居民不能阅读印成自己的语言但在阿格拉姆或贝奇<sup>①</sup>出版的书。他甚至还可能拒绝用手去拿，因为这本书是用“异教”字体和按“异教”正字法的规则印的。另一方面，他却毫不困难地阅读和了解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的书，因为两种语言非常相似，特别是在古斯拉夫语源学正字法方面非常相似；此外，这本书还是用“正统” (正教) 字体印的。大多数信正教的斯拉夫

<sup>①</sup> 塞尔维亚人对维也纳的叫法。——编者注

人甚至不愿意他们的圣经、祀神书和祈祷书在本国印，因为他们深信凡是在神圣的莫斯科或在圣彼得堡帝国印刷局印出来的东西都特别正确、正统和神圣。尽管阿格拉姆或布拉格的狂热分子<sup>18</sup>作了种种泛斯拉夫主义的努力，可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的“莱雅”、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斯拉夫族农民都对俄罗斯人抱有更大的民族同情；他们跟俄罗斯人的共同点，跟俄罗斯人在精神上的交往手段，要比讲同一种语言的信天主教的南方斯拉夫人更多。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们总注视着彼得堡，希望从那里来个救世主把他们从所有罪恶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把君士坦丁堡叫做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希望正教沙皇从北方降临本城复兴真教；另一方面是纪念在土耳其征服全国以前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个正教沙皇。

在土耳其大部分地区，斯拉夫人虽然自己选地方政权，但他们都处于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某些地方（在波斯尼亚），他们皈依了征服者的宗教。斯拉夫种族只在土耳其的两个地区里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或争得了政治独立。其中一个地区是位于摩拉瓦河谷的塞尔维亚，这个地区有着明显的天然边界，这条边界 600 年前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起过突出的作用。1806 年俄国的战争<sup>19</sup>使长期处于土耳其人压迫下的塞尔维亚人得以独立，虽然只不过是土耳其辖下的独立。从那个时候起，塞尔维亚就经常受俄国的直接保护。但是，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样，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尔维亚扩大自己和西欧的联系。文明开始生根，贸易增长了，产生了新的思想，于是，在受俄国影响最大的中心堡垒里，即在斯拉夫族和正教的塞尔维亚，就出现了反俄的进步党派；当然，这个党派在改革要求方面是非常温和的。领导这个党

派的是前财政大臣加腊沙宁<sup>20</sup>。

如果希腊—斯拉夫居民一旦成为自己居住的并占总人口四分之三(700万人)的那个国家的主人,那末毫无疑问,上述的需要逐渐会使他们中间出现反俄的进步党派;这样的党派的出现,一直都是这些居民的每一部分获得对土耳其的半独立地位之后不可避免的事情。

门的内哥罗不是拥有较大城市的肥沃平原,而是一个贫瘠的、交通极不便的山国。境内盗匪盘踞,他们到平原去抢劫,抢来东西就藏在自己的山寨里。这些浪漫而相当粗暴的先生们早就成了欧洲的负担,而俄国和奥地利则保护黑山(T sernogorci)<sup>①</sup>这个地方的人焚毁村庄、杀戮居民和抢掠牲畜的权利,因为这种情况和他们的政策是十分谐调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  
1853年3月12日和22日之间  
载于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3736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

① 即门的内哥罗。——译者注

## 弗·恩格斯 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很奇怪，在目前东方问题的争论中，英国报纸没有更坚决地强调英国的切身利益，而正是这些利益使它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扩张领土计划的死敌。英国是不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领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这一点，只要看看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关系就清楚了。

在没有开辟通往印度的捷径以前，君士坦丁堡是广泛贸易的中心。就是现在，尽管印度的产品由陆路经波斯、图兰<sup>①</sup>和土耳其运往欧洲，土耳其的港口仍然居中同欧洲和亚洲内陆地区进行着十分重要的、迅速增长的贸易。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这一点了。整个远离海洋的地区，从黑林山脉起，到大诺夫哥罗德的沙丘地带止，河流纵横，都汇入黑海或里海。多瑙河和伏尔加河这两条欧洲大河，德涅斯特河、德涅泊河和顿河，都是从远离海洋的地区把产品运往黑海的天然运河。我们说运往黑海，因为黑海也是通往里海的必由之路。三分之二的欧洲，即德国和波兰的部分地区、整个匈牙利、俄国最肥沃的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土耳其，在出口和商品交

---

<sup>①</sup> 土尔克斯坦(图兰)低地的旧称。——编者注

换方面都有天然的纽带同欧克辛海<sup>①</sup>联结起来,同时,这些国家主要是农业国,产品分量大,运输必然以水运为主。匈牙利、波兰和南俄的粮食、羊毛和皮革在我们西方市场上数量与年俱增,这些产品全部都是在加拉兹、敖德萨、塔干罗格和欧克辛海其他港口装船运来的。此外,在黑海上还有一种重要的贸易。君士坦丁堡,特别是在亚洲土耳其的特拉比曾德,是同亚洲内地,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同波斯和土尔克斯坦进行商队贸易的主要中心。这种贸易也在迅速增长着。希腊和阿尔明尼亚的商人从上述两个城市运进大量的英国工业品,这些工业品价格低廉,因此迅速地排挤着亚洲妇女的家庭手工业品。特拉比曾德由于地理关系,比其他地方更适于进行这种贸易。它的后方接连着阿尔明尼亚高地,这里较之叙利亚的沙漠好走多了,而且距巴格达、设刺子和德黑兰相当近;德黑兰则是来自希瓦和布哈拉的商队的贸易地点。这一种贸易和整个黑海贸易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可以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里耳闻目睹,在那里,皮肤黝黑的希腊商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那里,德语、英语和希腊语、南方斯拉夫语的讲话声交织在一起。

特拉比曾德的贸易也成为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它是俄国和英国在亚洲内地的利害冲突之源。在1840年以前,俄国人在这个地区几乎一手垄断了外国工业品的贸易。俄国的商品一直渗入印度河流域,有时甚至比英国的商品还流行。可以大胆断言,在阿富汗战争以及信德和旁遮普被征服<sup>21</sup>以前,英国同亚洲内地的贸易几乎等于零。现在情况不同了。迫切需要不断扩大贸易,这个

---

① 黑海的古称。——编者注

fatum (厄运) 像幽灵一样追逼着现代的英国, 如果不马上使这个厄运追逼得缓和一点, 那末它就会从纽约到广州、从圣彼得堡到悉尼引起可怕的震荡。这种无法缓和的需要, 逼着英国的贸易从印度河和黑海这两个方面同时向亚洲内地进攻。我们虽然对于俄国向这个地区的出口额知道得很少, 但仍然可以从英国向这些地区的输出增加这一事实中大胆断定, 俄国在那里的贸易恐怕是大大缩减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战场从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了特拉比曾德; 先前曾经直抵东方英帝国边界的俄国贸易, 现在已被压回到防御线上, 这条防御线也正是它本国的国界。这一情况的意义是很明显的, 它关系到东方问题将如何解决, 俄国和英国在这当中能起什么作用。这两个国家在东方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死对头。

现在让我们更具体地来看看黑海的贸易。据伦敦杂志“经济学家”<sup>22</sup>统计, 英国向土耳其地区, 包括埃及和多瑙河各公国的出口总值如下:

1840年 .....	1 440 592 英镑
1842年 .....	2 068 842 英镑
1844年 .....	32 713 33 英镑
1846年 .....	2 707 571 英镑
1848年 .....	3 626 241 英镑
1850年 .....	3 762 480 英镑
1851年 .....	3 548 959 英镑

在这些总额中, 黑海各港口, 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 至少要占三分之二。而整个不断迅速增长的贸易, 都决定于控制着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黑海咽喉的国家是否可靠。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 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这个遥远

角落的道路。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能否指望它会敞开这些大门，让英国像过去一样，闯入俄国的贸易范围呢？

土耳其，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就是如此。很明显，商货经过这些黑海的大门是否完全自由，不仅决定着十分广泛的贸易的命运，而且决定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基本联系的命运，从而也就决定着在这个广大地区恢复文明的基本手段的命运。

现在让我们从军事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达达尼尔海峡和波斯普鲁斯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同时也使它们成为头等的军事要地，在每次战争中都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要地同直布罗陀和松德海峡的赫尔辛格类似。但是达达尼尔海峡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甚至比后面这两个据点更为重要。直布罗陀或赫尔辛格的炮火不能控制自己海峡的全部地区；要完全封锁海峡，还要借助于舰队。而达达尼尔海峡和波斯普鲁斯海峡却很狭窄，只要在适当的地方构筑若干设备完善的堡垒（俄国一旦占领海峡，马上就会这样做），就可以筑成一道攻不破的屏障，就是全世界的联合舰队来犯也休想通过海峡。如果这样，黑海就会成为俄国的内湖，甚至位于俄国腹地的拉多加湖也比不上它；高加索人的反抗力量也马上就会耗完；特拉比曾德就成了俄国的港口，而多瑙河就成了俄国的河流。此外，土耳其帝国丧失君士坦丁堡之后就会被分成两部分：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这两部分将无法彼此通气或相互支援，而被迫退到亚洲的土耳其军队的主力将完全不起作用。征服者就可以毫不困难地征服马其顿、特萨利亚、阿尔巴尼亚，因为这些地区已被包围，与主力隔绝，它们除了求饶和请求派兵维持国内秩序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然而是否可以设想，这个如此庞大、扩张得这样厉害的国家，

为了实现它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已经走了这样远而会在半路止步呢?即使它愿意这样做,形势也是不允许的。吞并了土耳其和希腊以后,它就可以获得优良的海港,而且还可以从希腊人当中获得精锐的水兵。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它就在地中海的门前立定了脚跟;控制了都拉索和从安提瓦利到阿尔塔的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以后,它就可以进入亚得利亚海的腹地,窥伺着不列颠的伊奥尼亚群岛,并且只须 36 小时的航程即可到达马尔他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奥地利领地以后,它就完全可以像对待自己的藩属一样对待哈布斯堡王朝。还有其他一些结局也是可能的,甚至是一定的。这个帝国的西部边界弯弯曲曲,同自然边界不一致,这样就要修改边界,于是俄国的自然边界就是从但泽或者施特廷到的里雅斯特了。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吞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吞并,所以俄国征服土耳其只不过是吞并匈牙利、普鲁士、加里西亚和最终建立一个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100 年来就是这样,直到 1789 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现在,革命似乎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活着,人们还非常怕它,就像过去一直就非常怕它一样。不久前的米兰起义<sup>23</sup>使反动派惊慌万分就说明这一点。但是俄国如果控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对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在奥斯曼帝国可能崩溃的时候维

护土耳其的独立或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都。如果情况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3 月 23 日  
和 28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4 月 12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0 号

## 卡·马克思 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 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sup>24</sup>

1853年8月25日于伦敦

直至今晨尚未得到来自土耳其的任何新的可靠消息。“先驱晨报”<sup>25</sup> 驻巴黎通讯员在今天的报上报道，他从权威方面获悉，俄军已经进入布加勒斯特。在本月20日的“马赛信使报”上我们读到：

“我们可以向读者诸君报道莱宁根伯爵刚离开以后和缅施科夫公爵在御前会议上作出无礼举动以前奥捷罗夫先生向土耳其政府递交的照会的内容。这项外交照会涉及的主要之点归结如下：涅谢尔罗迭伯爵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坚决的要求，因为土耳其政府违背自己不侵犯门的内哥罗人的正式诺言，对他们发动了流血战争，这样就引起彼得堡当局极大的不满。因此，为了保证门的内哥罗人得到应有的保护并使他们免于新的灾难，俄国想建议土耳其政府承认门的内哥罗的独立。照会抗议封锁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最后还要求苏丹黜退那些做事一向引起两国政府误会的大臣。据称，土耳其接到这一照会后，虽然感到惋惜，但同意让步，不过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让步，即同意黜退几个大臣，其中包括苏丹的妹夫傅阿德—埃芬蒂，他的职务现已由亲俄的里法特—帕沙<sup>①</sup>接替。然而土耳其政府拒绝承认门的内哥罗的独立。于是缅施科夫公爵不管通常礼貌，不去拜会外交大臣，就违反一切外交惯例，亲赴御前

---

<sup>①</sup> 帕沙是苏丹土耳其军政大员的称号。——译者注

会议，并强硬要求御前会议接受他提出的要求。这种要求就使土耳其政府向英国和法国请求保护。”

在古希腊，如果一个演说家因为得了钱而不说话，人们就说他“舌头上有牛”。应当指出，这个牛就是埃及的银币<sup>26</sup>。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泰晤士报”<sup>27</sup>，自从重新提出东方问题以来，它的舌头上一直是有牛的，——这样说即使不是根据它保持缄默，至少也是根据它所作的报道。起初，这家善于发明的报纸借口问题涉及基督教而为奥地利干涉门的内哥罗事务的行为作辩护。但是后来俄国进行干涉时，这家报纸就抛弃了这个论据，硬说这只是正教和天主教教会之争，与英国国教教会“虔诚的教徒”毫不相干。此后，它就大谈土耳其的贸易对大不列颠的意义，这种意义很大，所以它作出结论说，如果以土耳其贸易自由去交换俄国的禁制关税和奥地利的保护关税，这对大不列颠只会有利。然后“泰晤士报”就极力证明，英国在粮食供应方面是依赖俄国的，因此英国应当默认沙皇的地理观点。为了减轻英国对俄国的依赖，黑海应当成为俄国的内湖，而多瑙河应当成为俄国的河流，——这样的说法对于“泰晤士报”所颂扬的贸易体系来说是多么入耳的话，是多么诱人的一个论据啊！当“泰晤士报”的这个一攻即破的立场被戳穿之后，它马上又抓住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即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是不可挽回的了，而这一点，在“泰晤士报”看来，就是俄国在目前应当成为这个帝国的受托者和继承人的决定性的论据。接着“泰晤士报”决定，应当使土耳其的居民受俄国和奥地利的“纯粹的统治”和文明的影响，并且引用智慧来自东方这句古代的格言，而忘记了它自己不久前说过的这些话：“奥地利在本国各省和各王国内维持的制度，是恣意横行的强制的制度，是不受任何法律节制的暴虐的制度。”最后，“泰晤

士报”竟然无耻之极地为自己发表了有关东方问题的“出色的”社论而自我祝贺了一番！

所有伦敦的报刊，晨报和晚报，日报和周报都纷纷起来齐声指责这家“主导报纸”。“晨邮报”<sup>28</sup>讥笑自己“泰晤士报”的同行，指责他们故意散布荒诞无稽的假消息。“先驱晨报”把“泰晤士报”叫做“我们这个时代的犹太—奥地利—俄罗斯人”，而“每日新闻”<sup>29</sup>则更简单地把它叫做“布隆诺夫的机关报”。“泰晤士报”的李生兄弟“纪事晨报”<sup>30</sup>则这样打击它：

“只图十来家希腊公司的生意兴隆而要把土耳其帝国出卖给俄国的报界人士，真不愧为制造绝妙的俏皮话的大王。”

“晨报”<sup>31</sup>写道：

“‘泰晤士报’说它在维护俄国的利益时是单枪匹马，这是说对了……的确，这家报纸是用英文刊印的，但是它只有这一点是英国的东西。只要问题涉及俄国，它就是彻头彻尾的俄国报纸了。”

毫无疑问，只要俄国能坚信英国和法国之间的《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sup>32</sup>是暂时的，他就不会缩回自己的爪子。在这方面值得耐人寻味的是，下列事件竟然令人惊异地凑合在一起。就在“泰晤士报”力图要阿伯丁勋爵和克拉伦登勋爵相信土耳其问题只不过是法俄之间的小小争吵的当天，《roi des drôles》（“丑角之王”）（基佐平常就是这样称呼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先生的）就在“立宪主义者报”<sup>33</sup>上作出了这样一个发现：整个这回事只不过帕麦斯顿勋爵和沙皇之间的争吵。读了这些报纸，你就能够真正认识狄摩西尼发表激烈的反菲力浦演说时代那些舌头上有马其顿“牛”的希腊演说家们的面貌了。

以联合内阁为代表的 不列颠贵族的态度是：一有必要他们就

会牺牲英国的民族利益来满足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让东方年轻的专制制度加强，以期为自己在西方的虚弱的寡头统治找到支持者。路易一拿破仑的态度则摇摆不定。他对那位专制君主十分同情，这个君主的政体他已经在法国实行了；他对英国十分反感，英国式的议会制度他已经在法国废除了。除此之外，他如果让沙皇在东方掠夺，沙皇也许会让他在西方掠夺。另一方面，他又不大相信神圣同盟对他这个“暴发的可汗”所抱的感情。因此，他采取的是模棱两可的政策，力图像他当年愚弄法国国民议会的各党派一样来愚弄欧洲列强。他一面同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表示亲热，做出这个样子给人看，一面又向俄国的利文公爵夫人大献殷勤，大许其愿，并把狂热拥护奥法同盟而反对英法同盟的戴拉库尔先生派到苏丹宫廷去。他命令土伦舰队开入希腊领水，而第二天却在“通报”上宣布这一举动事先并没有同英国有过任何协议。他一面指使自己的一家机关报“国家报”<sup>34</sup>大谈东方问题对于法国极为重要，一面又允许自己的另一家机关报“立宪主义者报”说，东方问题决定着俄国、奥国和英国的利益，至于法国的利益，则只是间接地沾一点边罢了，因此法国采取完全独立的立场。谁将给他更多好处？是俄国还是英国？这就是他所考虑的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3 月 25 日

载于 1853 年 4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39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 弗·恩格斯 土耳其问题

西欧和美国的公众只是最近才有可能多少正确地判断土耳其的事情。土耳其在希腊起义<sup>35</sup>以前,在各方面都是一个 terra incognita (不为人知的国土),因此,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些关于土耳其的陈腐观念,多半是根据“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不错,到过土耳其的官方使节吹嘘自己掌握了比较确切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也是很可怜的,因为这些官方人士谁也没有下功夫研究过土耳其、南方斯拉夫或现代希腊的语言,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以希腊通事和法兰克商人<sup>①</sup>的偏颇报道为凭。而且,这些无所事事的外交家们总是把时间花费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上面。他们当中只有德国的土耳其历史学家约瑟夫·冯·哈麦尔是一个可嘉的例外。这些先生们对该国的人民、机构和社会制度根本不感兴趣,只同宫廷、特别是同希腊的法纳尔人<sup>36</sup>往来,这些法纳尔人是双方狡猾的中介人,而双方则都同样不了解对方的力量和潜力的真实情况。西方外交对土耳其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依据,在很长的时期都是从十分可怜的情报中所得出的传统观念和判断,而且,尽管使人奇怪,甚至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这样。

① 西欧的商人(法兰克是近东对西欧居民的流行称呼)。——编者注

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奥地利)在黑暗中徘徊摸索,想确定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却更狡猾地超过了它们。这就是俄国。俄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有相当多的人了解土耳其的真实的情况和性质。欧洲土耳其的居民十分之九同俄国人信奉同一宗教;有 700 万土耳其臣民的语言差不多同俄语毫无差异;而大家也知道,俄国人学会说外国语是非常容易的,这就使报酬优厚的俄国的代理人甚至还没有完全通晓这些语言就能够毫不费难地完全通晓土耳其的事务。而俄国政府也老早就利用了自己在东南欧的极其有利的地位。数以百计的俄国的代理人周游土耳其,向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宣传:正教皇帝是被压迫的东正教教会的首领、天然的保护者和救星,负有最终解放它的使命;他们特别向南方斯拉夫人灌输沙皇全能的思想,说沙皇迟早要把伟大的斯拉夫种族的所有分支团结在一个王权之下,并且使它成为欧洲的统治种族。希腊教会的僧侣早就拟定了散布这种思想的大阴谋。俄国的金子和俄国的影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直接促成了 1804 年塞尔维亚的起义<sup>37</sup>和 1821 年的希腊起义。土耳其的帕沙无论在哪儿举起反对中央政权的反叛的旗帜,从来也少不了俄国人出主意和俄国人出金钱。因此,当土耳其的国内状况问题最终把那些对土耳其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并不比对月球上的人了解得更多的西方外交家们逼进死胡同的时候,战争就开始了,俄国军队向巴尔干挺进,于是一块一块的领土就同正在被瓜分的奥斯曼帝国脱离了关系。

不错,近 30 年来在向广大公众介绍土耳其状况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德国的语文学家 and 批评家向我们介绍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文

学；英国的代理人和英国的商人收集了许多有关这个帝国的社会制度的资料。但是，外交界的才子们看来对这一切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并且顽固透顶地死抱住传统不放，而这些传统是由于知道了东方神话才产生的，是经过世界上最容易被收买的一小撮希腊商人用同样使人惊奇的胡说加过工的。

自然的结果如何呢？结果，由于西欧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举棋不定和畏首畏尾，俄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一一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纳瓦林会战<sup>38</sup>起，到现在的东方危机止，西方各国的行动不是由于相互间的争吵（这些争吵大半是出于它们对东方情况都不了解，出于那种对东方人来说完全不可理解的小猜忌）而瓦解，就是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于是，不仅希腊人（住在希腊和住在土耳其的），而且斯拉夫人，也都认为俄国是自己的天然的保护者。而且，甚至君士坦丁堡政府也越来越不再希望那些以根本不能独立判断土耳其的情况为荣的西方列强的使节们终究会了解它的迫切需要和它的真实情况，因此这个土耳其政府每次都不得不向俄国求情，请这个强国保护，虽然这个强国公然宣称它决心要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波斯普鲁斯海峡，并把圣安德烈的十字架竖立在艾亚—索非亚清真寺的尖塔上。

俄国的这些一贯的和顺利的侵略行动，不管外交传统怎样，终于使西欧各国的内阁模模糊糊地预感到危险的迫近。这种预感就使它们提出了一项原则，作为一种伟大的外交上的专利药。根据这项原则，维持土耳其的 *status quo*（现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某些用词藻来掩饰自己无能的当代国家要人，其不学无术和束手无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在这个原理中暴露得这样明显。这个原理虽然一直是死的条文，但 20 年来却成了神圣的传

统,就像约翰王的 Magna Charta<sup>39</sup>那样不容忽视和不容争辩。维持 status quo!呵,当然!只是为了维持 status quo,俄国才挑起了塞尔维亚的起义,使希腊独立,攫取了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保护权并把阿尔明尼亚的一部分把持在自己手里。当这一切大功告成时,英国和法国连手指头也没有动一下。它们仅仅有一次作过自己还活着的表示,这是在 1849 年,但是当时它们不得不保护的并不是土耳其,而是匈牙利流亡者<sup>40</sup>。在欧洲外交界看来,甚至在欧洲的报刊看来,整个东方问题归根到底只能是:要么俄国人坐镇君士坦丁堡,要么维持 status quo。二者必择其一,他们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我们不妨拿伦敦的报刊来说明。我们看到,“泰晤士报”主张瓜分土耳其,并且宣布土耳其种族已无力继续统治欧洲这一块好地方了。“泰晤士报”运用它一贯的技巧,大胆抨击维持 status quo 的旧的外交传统,宣称继续维持 status quo 是不可能的。这家报纸使出了它的全部才能,从各方面证明这种不可能,并且为英国同情征讨萨拉森人的末代后裔的新十字军进军作证。谁也不会否认,“泰晤士报”对它两个月之前还奉之为神圣的陈词滥调进行这样无礼的攻击是一项功劳。但是了解这家报纸底细的人也都知道,这种异乎寻常的大胆行为是直接为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效劳的。“泰晤士报”提出的关于完全不可能维持土耳其现状的正确假设,只是为了事前作好酝酿,让英国公众和全世界老老实实迎接彼得大帝遗嘱<sup>41</sup>中最重要的一点——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完全成为事实的那一天到来。

自由派的机关报“每日新闻”则代表完全相反的观点。“泰晤士报”至少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新的一面,必然的一面,当然,这是为

了然后来歪曲它,以达到自私的目的。而自由派的机关报则相反,立场虽然非常明显,但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庸人精神的表现。事实上,“每日新闻”的眼光超不出自己家的大门。这家报纸知道得很清楚,在现在的情况下瓜分土耳其会使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这将是英国莫大的不幸,世界和平将受到威胁,黑海上的贸易将被破坏,地中海的英国基地和英国舰队势必进一步武装和加强起来。由于这个原因,“每日新闻”极力挑起英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难道瓜分土耳其的罪行不是同瓜分波兰一样吗?难道基督徒在土耳其不是享受到比在奥地利和俄国更多的宗教自由吗?难道土耳其政府不是温和的、慈父般的政府,允许各民族、各宗教和各地方自治机构自己治理自己的事务吗?难道土耳其比起奥地利和俄国来不是天堂吗?难道生命和财产在那里没有保障吗?英国同土耳其的贸易不是比英国同俄国和奥地利的贸易加在一起还多吗?难道这个贸易不是在逐年增长吗?往下就是一片赞美声(因为“每日新闻”向来就是善于唱赞美诗的),颂扬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一切,弄得这家报纸的大多数读者都莫名其妙。

对土耳其人为什么要表示这样出奇的热情,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特议员阁下的著作中找到答案。这位绅士是苏格兰人,深受他家乡广泛流行的中世纪的宗法思想的熏陶,但又受过一个文明的英国人所受的现代教育,他在希腊同土耳其人打过3年仗以后到了土耳其,就一变而为最狂热的土耳其人崇拜者。这位浪漫的苏格兰高地人住到了品都斯山脉和巴尔干的山谷里,感到好像重回家乡一样。他的有关土耳其的著作(虽然里面也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可以归纳成下面三点奇谈怪论,这三点奇谈怪论实际上就是:

- (1)如果乌尔卡尔特先生不是不列颠的臣民,他会毅然当个土耳其

人；(2)如果他不是长老会加尔文教教徒，他除了信伊斯兰教外什么别的宗教都不愿信；(3)只有英国和土耳其才是世界上享有自治、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国家。从此以后，这位乌尔卡尔特就被所有反对帕麦斯顿的英国自由派捧之为东方问题的大权威。“每日新闻”上的土耳其赞美诗就是他提供的材料。

对问题持这种态度的人的论据，只有一条值得注意一下，这个论据是：“有人断言，土耳其正在衰落。但衰落表现在哪里呢？难道在土耳其文明不是得到迅速传播，贸易不是得到迅速扩大吗？在你们只看到衰落，别的就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统计学家却证明那里只有进步。”但是，如果把黑海蒸蒸日上的贸易统统记在土耳其的功劳簿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而在上述情况下人们正是这样做的。这无异于我们想要判断荷兰这个通向德国大部分地区的孔道的国家的贸易和工业发展的能力，只是以过境运输占十分之九的巨大进出口额为根据。如果这样看荷兰，任何一个统计学家都会马上承认这是一个拙劣的骗局，而所有英国的自由派报刊，包括学术刊物“经济学家”在内，却企图硬要轻信的公众这样看土耳其。其次，谁在土耳其进行贸易呢？无论如何不是土耳其人。当他们还处于原始的游牧状态时，他们进行贸易的方法只是抢劫商队，现在，他们稍许文明一点的时候，是任意强征各种各样的捐税。居住在大海港的希腊人、阿尔明尼亚人、斯拉夫人和西欧人掌握了全部贸易，而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应当感谢土耳其的贝伊<sup>①</sup>和帕沙让他们有从事贸易的可能。如果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欧洲，贸易也决不会碰到什么灾难。至于谈到一般的文明进步，那末谁是欧洲土耳其

---

<sup>①</sup> 贝伊是土耳其旧时小藩臣的称号。——译者注

的所有地区的这种文明进步的体现者呢?无论如何不是土耳其人,因为他们为数不多,并且散居全国各地;除了君士坦丁堡和两三个不大的农业地区之外,恐怕说不出他们还有哪些定居地点。各城市和各贸易地点的斯拉夫的和希腊的资产阶级才是真正渗入这个国家的任何一种文明的真正支柱。这部分居民越来越富,影响越来越大,而土耳其人则越来越被挤到后面。假如土耳其人不是垄断了民政军政的官职,那末很快就会完全看不到土耳其人了。但是这种垄断在将来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将由强变弱,只能是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事实总是事实——应当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是,如果断言只有让俄国人或奥地利人取代土耳其人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仍然等于断言欧洲现在的政治状况将永恒地保持下去。可是谁敢坚持这种断言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3 月底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4 月 1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卡·马克思

# 柏林密谋

1853年4月1日星期五于伦敦

第五“大国”普鲁士终于得到了一个幸运的机会，为奥地利警察当局对革命者的“蛊惑阴谋”的大揭露<sup>42</sup>做出自己的贡献。

官方报纸告诉我们说：“政府在得到民主派领袖经常与革命宣传有关系的证明后，下令于3月29日在柏林进行住宅搜查，搜查时逮捕了40人，其中有施特雷克富斯和普鲁士国民议会前议员贝伦兹、瓦尔德克等人。搜查是在80个有参加密谋嫌疑的人的家里进行的。查获了武器和弹药。”

普鲁士政府不可以在自己的官方报纸上发表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为满足，它还认为应该用电报通知英国外交部。

为了揭穿警察当局的这个新的可笑的把戏的秘密，必须追溯一下前些时候的事情。在波拿巴 coup d'état (政变) 两个月之后，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先生和他的下属警务顾问施梯伯先生两人背后商定：前者做普鲁士的莫帕，后者做普鲁士的比埃特里。看来，法国警察当局的举世闻名的无上权力使他们艳羡不止。辛凯尔迪去找内政部长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向这位平庸而又狂热的反动分子(冯·威斯特华伦先生是我的内弟，我完全有机会充分了解过他的智力)做了个没有根据的报告，证明必须把普鲁士国家的全部警察权力集中在这位柏林警察总监的手里。他肯定说，为了使警察

当局的活动更灵活机动，应该使它不受内政部长的管辖而完全交给他辛凯尔迪负责掌握。内政部长冯·威斯特华伦代表普鲁士贵族中最保守的集团，而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则代表旧官僚。他们两人是政敌。尽管辛凯尔迪的建议显然会缩小内政部的活动范围，但冯·威斯特华伦先生认为这样做可以打击自己的政敌（因为他的政敌的兄弟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在内政部当司长，专门负责监督整个警察事务），因此就把辛凯尔迪的建议呈交由国王<sup>①</sup>亲自主持的国务会议审核。

争论异常激烈。得到普鲁士亲王支持的曼托伊费尔反对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的建议。国王则同意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建议。最后，国王提出了一个所罗门式的决定，说“如果事实向他证明采取这个步骤是必要的”，他就效法波拿巴成立一个警务部。于是，为了举出这样的事实，辛凯尔迪和施梯伯就选择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sup>43</sup>。他们在科伦案件中的英雄功绩，诸君都知道了。科伦案件结束后，普鲁士政府就决定把这位在科伦的街道上一露面就挨嘘的公然背誓者施梯伯提升为科伦警察厅长。但是，贝特曼—霍尔威克先生和莱茵普鲁士的其他好心的保守派议员进行了干涉，他们警告大臣们说，当波拿巴正在极力要求法国天然边界<sup>44</sup>的时候，这种公然触犯这个省的社会舆论的作法会产生极危险的后果。政府作了让步，任命施梯伯为柏林警察厅长，以奖励他在科伦的背誓行为和伦敦的盗窃勾当。事情到此就暂时搁置下来。科伦案件已不可能实现辛凯尔迪先生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的愿望了。辛凯尔迪和施梯伯等待好机会到来。正好碰上了米兰起义。施梯伯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马上在柏林逮捕了 20 个人。但是,这种把戏是太可笑了,无法开庭审判。然而接着又发生了李伯尼行刺事件,这样一来,国王就完全愿意作出决定了。胆战心惊的国王马上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独立的警务部,于是辛凯尔迪的宿愿实现了。国王一纸令下,使他成了普鲁士的莫帕,而冯·曼托伊费尔先生的兄弟也就提出了辞职。但是,这场滑稽剧的最可笑的一幕还在后头。辛凯尔迪先生刚升任新职,立即又揭露出一个“柏林大密谋”。可见,这个密谋是专为证明辛凯尔迪先生的必要而安排的。这是辛凯尔迪先生用以交换自己刚刚到手的生杀予夺的警察权力而献给昏庸的国王的谢礼。辛凯尔迪的助手,善于制造奇案的施梯伯过去在科伦发现,结尾凡是有“敬礼”和“兄弟友谊”字样的信,毫无疑问都是存在共产主义密谋的证据,现在又发现,在柏林从某个时候起出现了多得可怕的“卡拉布里亚帽”,这种帽子一定是革命者的“暗号”。根据这个重要的发现,施梯伯在 3 月 18 日逮捕了一些人,主要是工人和外国人,罪名是戴了卡拉布里亚帽。同月 23 日又搜查了马格德堡一个商人卡尔·德利乌斯(第二议院一个议员的兄弟)的住宅;这个人对卡拉布里亚帽也有一种倒霉的爱好。最后,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时所报道的,上月 29 日在柏林进行了反对卡拉布里亚帽的大 coup d'état (政变)。凡是多少知道瓦尔德克、贝伦兹等这些无足轻重的反对派的人,都会为在这些无害于任何人的布鲁土斯之流的家里查出“武器和弹药”而大笑一场。

但是,不管警察当局的这场滑稽剧(可以说,这场滑稽剧纯粹是由于辛凯尔迪和施梯伯两位先生的个人动机而排演的)多么无聊,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普鲁士政府由于处处碰到消极反抗而大伤脑筋。它在看来淡漠的气氛中感到了革命的气息。它由于捉摸

不到这个怪影而感到失望,因此每当警察当局给它找到这个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的敌人的化身时,它就感到好像摆脱了一场恶梦。政府正在进攻,它今后还要发动进攻;它的把人民消极反抗变为积极反抗的事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成功。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1 日

载于 1853 年 4 月 18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745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弗·恩格斯

### 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

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要人们由于顽固的不学无术、传统的因循守旧和世代相承的思想懒惰，都回避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打算回答。阿伯丁和帕麦斯顿，梅特涅和基佐都认为已经没有希望找到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至于 1848—1852 年时期他们的那些共和派和立宪派后继者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的名字后人永远不会提起。

然而与此同时，俄国慢慢地，但是一步不停地向君士坦丁堡进逼，全不把法国和英国的一切外交照会、一切计谋和手腕放在眼里。

欧洲各国所有党派虽然都承认俄国节节挺进的事实，但是没有官方要人能够解释这个事实。他们看到这个事实的影响，甚至看到它的后果，但是原因何在，他们仍然不知道，尽管一切因由都非常简单。

推动俄国去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强大动力，不是别的，正是原来想借以阻止它这样做的那个办法，即空幻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维持 status quo (现状) 的理论。

Status quo 是什么呢？对于土耳其政府管辖下的基督教臣民来说，这无非是意味着使他们永远受土耳其的压迫。而他们只要

仍然处在土耳其统治的压迫下，他们就要把希腊正教教会的首脑和 6000 万正教徒的君主（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怎样）看做自己的**天然的解放者和保护者**。这样一来，原先为了防止俄国侵略土耳其而发明的外交体系，却迫使欧洲土耳其的 1000 万正教徒向俄国求援。

我们且来看看大家都知的历史事实。早在叶卡特林娜二世即位以前，俄国就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取得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特惠。它终于在缔结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 年）<sup>45</sup>的时候取得了极为广泛的特权，以致上述公国目前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俄国，而不是受制于土耳其。当 1804 年爆发了塞尔维亚革命的时候，俄国马上出来保护起义的“莱雅”，在两次战争中支持他们，在两个条约中保障他们取得了本国的内政独立<sup>46</sup>。而在希腊起义期间又是谁决定了斗争的结局呢？不是亚尼纳的帕沙阿利和他的一切阴谋叛乱，不是纳瓦林会战，不是摩里亚的法国军队，不是伦敦会议和议定书，而是吉比奇率领越过巴尔干山脉进入马里乍河河谷的俄国军队<sup>47</sup>。于是，就在俄国无所顾忌地动手割裂土耳其的时候，西方的外交家们仍然把 status quo 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的不可侵犯当做某种圣物来保障和维持！

只要西方外交的指导原则仍然是传统的政策，即无论如何都要维持 status quo，维持土耳其目前这种状态的独立，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要把俄国看做自己唯一的靠山，自己的解放者，自己的救世主。

现在暂且假定，土耳其在希腊斯拉夫人的半岛上的统治结束，那里的政体比较符合人民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地位如何呢？大家知道，在土耳其境内每一个取得了完全或部分独立的国家

里，都组成了强大的反俄党派。如果说，在俄国的援助是挣脱土耳其压迫的唯一靠山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末一旦对这种压迫的恐惧消失，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可是，如果土耳其人的统治被排挤到波斯普鲁斯海峡以东，如果巴尔干半岛上的各个民族获得自由并享有信仰自由，如果欧洲列强的各种计划和阴谋，各种针锋相对的意图和利益都在那里畅行无阻，难道不会引起大战么？——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界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然，不能指望帕麦斯顿、阿伯丁、克拉伦登和大陆上形形色色的外交大臣们有能力做出任何这样的行动。他们即使想一下这件事也不能不发抖。但是，每一个人，只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驶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总之，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就是说，只要了解和重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在这个时代里，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每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仅仅由于这个问题的正当解决会引起欧洲战争而害怕提出这个历史性的问题。

不，按老办法办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一个乍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

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 1789 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

如果企图为欧洲土耳其领土的可能分割草拟详尽的蓝图，那就是无聊的幻想。可以想出至少 20 种草案，每一种看来都同其他 19 种一样合适。但是我们打算做的，并不是编造空幻的计划，而是要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作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探讨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首先，决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通常叫做欧洲土耳其的半岛是南方斯拉夫种族世代相传的当然财产。在 1200 万居民当中有 700 万属于这一种族。它占有本土已有 12 个世纪了。如果把极少数本属斯拉夫族而改说希腊语的居民除外，只有野蛮的土耳其人或阿尔纳乌特人是斯拉夫人的对头。这些土耳其人早已被斥责为仇视一切进步的死敌。相反，南方斯拉夫人是该国内部地区文明的唯一代表者。不错，他们还没有形成为民族，但是他们在塞尔维亚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和比较文明的民族核心。塞尔维亚人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文献。他们同数量大大超过他们的敌人进行了 11 年英勇的斗争，方才获得了今天的内政自主。近 20 年来，他们在文化和文明手段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保加利亚、色雷斯、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基督徒都把塞尔维亚看做他们将来为独立和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团结中心。的确，可以肯定地说，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民族的结合程度越大，俄国对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直接影响就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试看，塞尔维亚为了取得一个基督教国家应有的地位，就曾经不得不以西欧为借鉴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构、自己的

学校、自己的科学、自己的工业组织。因此才出现这样的反常现象：塞尔维亚尽管受俄国的保护，但本身却是君主立宪，而且从一解放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无论俄国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血缘如何相近，宗教如何相同，而一旦后者获得自由，他们的利益立刻就要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从两国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贸易需求来看就易于理解这一点。俄国是密封的大陆国家，主要是生产农产品，有朝一日工业生产也可能发展起来。希腊斯拉夫人的半岛的版图不大而海岸线极长，面临三海，其中有一个海归它自己控制；因此，它在目前主要是过境贸易国家，虽然它也具有发展自己的工业的雄厚潜力。俄国要垄断，而南方斯拉夫人则要扩大市场。此外，他们在中亚还是竞争对手，俄国的现实利益要求除自己的商品外不准任何其他商品渗入中亚，而南方斯拉夫人目前就已经迫切要求把西欧的商品运往东方市场。在这种条件下，两个民族怎么能互相一致呢？实际上，土耳其的南方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甚至现在就同西欧比同俄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当现在从奥斯坦德、哈佛尔和汉堡通到佩斯的铁路线延至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正如现在计划的那样）的时候，西方文明和西方贸易对东南欧的影响就要经常化了。

另一方面，土耳其境内的斯拉夫人深受要由他们供养的穆斯林军事占领者的压迫。这个军事占领者阶级独揽一切国家职权：军事的、民政的和司法的。但是，俄国的政治制度在它还没有同封建机构结合起来的所有地方，不也是按军事方式来组织等级制的民政和司法并且要人民担负全部费用的军事占领吗？谁要是认为这类制度会使南方斯拉夫人向往，那就请他看看 1804 年以来的塞尔维亚历史吧。塞尔维亚独立的缔造者卡拉—格奥尔基被人民唾弃

了,重新恢复了那个独立的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可耻地被逐出国,这两个人落得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企图推行俄国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必然带来贪污腐败、半军事的官僚制和敲诈勒索,像土耳其的帕沙们现在所做的那样。

总之,这个问题简单而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这样。历史和现代的事实同样指明,必须在欧洲伊斯兰教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即将到来的革命就极有可能使这样的事不可避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专制和欧洲的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恐怕非爆发不可。英国势必参加这个冲突,不管到那时是什么政府执政。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同意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它势必站在沙皇的敌人一方,在衰败虚弱的土耳其政府的原地上促成一个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府。<sup>48</sup>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4 月初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4 月 21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4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柏林密谋。——伦敦警察局。  
——马志尼。——拉德茨基

1853年4月8日星期五于伦敦

当我写上一篇关于施梯伯先生所揭发的大密谋的文章<sup>①</sup>时，我还不可能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将被柏林的两家保守派报纸或多或少地证实。贝特曼—霍尔威克先生所领导的保守派机关报“普鲁士周刊”<sup>49</sup>4月2日被没收了，因为它劝告自己的读者“不要太相信警察当局对最近的逮捕所说的瞎话”。但是，普鲁士政府中以冯·曼托伊费尔先生为首的集团办的半官方报纸“时代报”<sup>50</sup>发表的一篇文章，意义还要大得多。“时代报”被迫承认：

“凡是眼睛没有失明的人都不会不看到，欧洲整个局势中的无数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迟早会引起可怕的爆炸。欧洲大国的真诚努力可以暂时延缓这种爆炸，但它们决不能根本防止这种爆炸，即使是它们作尽人力所及的一切……我们认为我们的职责是不要继续掩盖不满情绪日益扩大的事实；而更其危险和更加值得严重注意的是，这种不满情绪不是流露在外面，而是越来越深深地扎根在人们心中，应该直言不讳地说，这种不满是由于要在普鲁士实现反革命的企图而引起的，这种企图最近竟非常 *étourderie* (轻率地) 表露出来了。”

① 见本卷第31—34页。——编者注

“时代报”只是在结尾时说错了。普鲁士的反革命决非始于今日，相反地，它已接近完成了。这不是一种新现象，这种现象早在1848年3月20日就开始了，而从那一天起就日益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目前普鲁士政府正在酝酿两个极端危险的方案。一个是限制不动产分配的自由，另一个是把国民教育置于教会的监护之下。很难再想出两个更能使政府脱离莱茵普鲁士的农民和整个王国的资产阶级的措施了。还有一个笑话，由于“大密谋的揭露”，柏林卫生协会（病人互助协会）竟被强迫解散了。这个协会约有1万名属于工人阶级成分的会员。看来政府认为，现行的普鲁士国家的宪法是同“卫生”不相容的。

至今没有对伦敦警察局的行为发生过怀疑的伦敦报界，看到维也纳“新闻报”<sup>51</sup>和比利时的主要反动报纸“解放”<sup>52</sup>刊载了一条消息，说伦敦警察局编制了一份所有住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的名单并附有他们的私人生活和举止行动的详细情况，它们都吃了一惊。

“晨报”叫道：“既然对外国人可以实行这种办法，那末只要政府或政府的任何一个成员认为必要，也就会采取这种办法来详细调查我国同胞的私人生活了……伦敦警察将要扮演他们大陆上的同事们所担任的可耻的角色，这岂不令人痛心？”

除了比利时报纸及其他报纸的上述报道外，伦敦的报纸上今天还登载了这样一条来自维也纳的电讯，电讯说：

“关于流亡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英国政府答应严密监视流亡者，一旦发现他们参加某种革命阴谋，必将依法予以严惩。”

“晨报”就此发表评论说：

“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卑贱，竟拜倒在奥地利的脚下。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卑贱的了。联合内阁弄到这种地步是必然的。”

我听到非常可靠的消息说，只要马志尼住在伦敦的消息一经证实，皇家法官们就打算对他进行追究。另一方面，我又听说下院要就大臣们同奥地利的可耻勾结和他们在流亡者问题上的一般意图提出质询。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写过，拉德茨基很想用米兰起义作口实“捏造一些借口来捞一笔钱”<sup>53</sup>。这种看法不久就得到了最肯定的证实。拉德茨基在最近的一个告示中宣布，已由国家管制的、自1847年起以伦巴第流亡者的财产为凭的一切债据和典契，均作无效。这种没收财产的做法，只证明奥地利国库 horror vacui（害怕真空）。崇尚温情的资产阶级过去到处拿革命当祭品供奉自己的上帝——私有制。现在反革命背弃了这个上帝。

今天从海底电线得到消息说，缅施科夫公爵同土耳其政府签订了协议，俄国军队得到命令撤离土耳其边境，东方问题这次又顺利结束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4月8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3年4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8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卡·马克思 希尔施的自供

希尔施的“自供”<sup>54</sup>在我看来仅仅在有旁证的条件多少有点价值，这是因为，这些供状是前后矛盾的。希尔施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从科伦回来后，曾在一次公开的工人集会上说，维利希是他的同谋。自然，要求把这个虚假的供状记录下来的建议被轻蔑地拒绝了。曾有各种人向我暗示（不知道他们是受了希尔施的委托还是自动这样做的），说是希尔施表示愿意向我彻底坦白。我拒绝了。后来，我就知道了，希尔施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所以我毫不怀疑，他的“最后的”供状是为了目前津贴他的那个党派的利益而写的。奇怪的是，竟然有人认为非藏在一个叫希尔施的人的背后不可。

现在我只谈几点意见。我们都握有其他一些密探如维多克、谢努、德拉奥德等人的自供<sup>55</sup>。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这些密探都不是普通的密探，而是高尚的密探，是“库伯密探”<sup>56</sup>的嫡系子孙。他们的自供必然只不过是自我辩护。

例如，希尔施企图暗示说，关于我的党内同志集会的日期，不是他而是班迪亚上校向格莱夫告密，而后者又通知了弗略里的。希尔施参加过的那几次我们的会议，都是星期四举行的。但是在希尔施被赶走以后，我们的会议便改为星期三举行了。在伪造的会议记

录<sup>57</sup>上,无论是在希尔施参加之前,还是在他被赶走之后,会议的日期都标明是星期四。除了希尔施之外,又有谁能搞出这样的“误会”呢?

从另一点看,希尔施就比较走运了。希尔施一口咬定,班迪亚曾多次提供了关于我和德国通信的情报。既然科伦案件中一切与此有关材料都是伪造的,那末,当然很难确定这些材料究竟是谁捏造的了。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班迪亚。

班迪亚是密探也罢,不是密探也罢,他对我或者对我的党内同志从来都不能有什么危害。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我的党内的事情,而且班迪亚本人也竭力避免谈到这些,正如他在自己的一封申辩书中向我表白的那样。因此,不管他是不是密探,他都不可能告发什么,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科伦案件的材料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材料证明,除了在德国制造的那些供词和在那里查获的文件以外,普鲁士警察当局对于我所属的那个党的事情便一无所知了。因此,它才不得不制造出最荒唐无稽的东西来。

可是,班迪亚不是把马克思的“关于流亡者”的小册子<sup>58</sup>出卖给警察当局了吗?

当着其他一些人的面,班迪亚曾经从我这儿打听到,恩斯特·德朗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我打算出一部关于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书,并分成几册出版。班迪亚满有把握地说,他能够在柏林找到出版人。我请他马上去打听。过了8—10天,他通知说,柏林有一个名叫艾泽曼的出版人,愿意出第一册,条件是作者不能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他怕书被没收。我同意了这个条件,但同时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稿费在手稿交出之后立即付清(我是想避免再发生我在“新莱茵报评论”<sup>59</sup>时期发生的事情),手稿送到之

后立即付印。我到曼彻斯特找恩格斯，在那里我们写了一本小册子。在此期间，班迪亚交给我的妻子一封柏林来信，在这封信中，艾泽曼接受了我的条件，但说明是否出第二册，要看第一册的销路如何。我回来以后，班迪亚收到手稿，而我则拿到稿费。

然而，出书的事情在种种堂皇的借口下一直拖延着，我就有点怀疑起来。倒不是疑心手稿被转交给了警察当局，由警察当局来出。即使是俄国皇帝，只要他同意明天就付印，我也情愿今天就把我的手稿交给他；相反地，我只是担心他们把手稿束之高阁。

在手稿中，我们攻击了时髦的空谈家，我们攻击这些人，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说来是危险的革命者，而是因为他们起着反革命败类的作用。

我的怀疑被证实了。格奥尔格·维尔特（我曾请他在柏林打听艾泽曼其人）写信告诉我说，他根本找不到什么艾泽曼。于是我便同德朗克一起到班迪亚那里去。这时才发现艾泽曼原来是雅科布·柯尔曼的一个经理。因为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得到班迪亚的一篇书面声明，所以我坚决要求班迪亚当着我的面写一封信给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把他向我说过的一切情况重述一遍，并且把柯尔曼的地址告诉他。与此同时，我写了一封短信给布鲁诺·鲍威尔，请他打听一下，在班迪亚对我说的那所柯尔曼的房子里住的是什么人。但是我没有收到回信。而那位冒牌的出版人对我一再写信询问的答复是：我没有经过任何合同来约定出版手稿的确切日期，最好能让他知道什么时候出版最为适宜。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就扮演起受委屈的角色来。最后，班迪亚向我声明，出版人拒绝出书，并把手稿退了回来。班迪亚本人则在巴黎躲起来了。

有关前后一切交涉的柏林来信和班迪亚的信件（其中还包括

班迪亚企图替自己申辩的信件),都在我的手中。

但是,为什么德国流亡者关于班迪亚的为人所散布的疑心没有使我不安呢?这是因为我知道产生这些疑心的“前因”。这种前因,就让它受到应有的待遇,暂且秘而不宣吧。

因为我知道,在匈牙利战争期间,班迪亚以革命军官的资格执行过类似的委托。因为他和我所尊敬的瑟美列有过通信关系,他和佩尔采尔将军的关系很好。因为我亲眼看见科苏特任命班迪亚为自己 *in partibus* (在国外的)<sup>①</sup>警察总监的证件,证件上还有科苏特的亲信、曾跟班迪亚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西尔莫伊伯爵的签字。班迪亚在科苏特那里所担任的这个职务同样也说明班迪亚和警察有必要的来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班迪亚现在也还是科苏特在巴黎的代理人。

匈牙利的领袖们知道,他们同谁打了交道。和他们比较起来,我算冒什么险呢?什么危险也没有,只是手稿的副本可能被弄去藏起来,但原稿还保存在我的手里。

以后,我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出版人利齐乌斯和德国的其他一些出版人探询了一下,问他们是否愿意出版上面提到的那部手稿。他们回答说,在目前条件下不可能。最近则有希望在德国国境以外出版。

我的这些说明自然不是讲给希尔施先生听的,而是讲给我在美国的同胞们听的。经过这番说明之后,关于普鲁士警察当局为什么要把抨击金克尔、维利希等等“流亡中的大人物”的小册子封锁起来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仍是“悬案”?

---

<sup>①</sup> 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天主教的主教被任命担负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职务时所附加的封号。——编者注

啊！埃林杜尔，告诉我，  
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sup>①</sup>

1853年4月9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4月9日  
载于1853年5月5日“美文学杂志  
和纽约刑法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美文学杂志  
和纽约刑法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sup>①</sup> 引自缪尔纳的悲剧“罪”第二幕第五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 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sup>60</sup>

读者诸君根据自身的痛苦经验知道,并且在感到自己钱袋空虚的时候体会到,由于过去玩弄种种财政把戏,人民已经负上 8 亿英镑的国债。这些债款主要是为了防止美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反对上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而发行的。国债的增加对国家支出的增加所起的影响,可以从下面的统计表中看出:

### 1. 国 债<sup>61</sup>

威廉逝世后女王王安即位时 (1701) .....	16394702 英镑
乔治一世即位时 (1714) .....	54145363 英镑
乔治二世在位初期 (1727) .....	52092235 英镑
乔治三世执政初期 (1760) .....	146682844 英镑
美洲战争之后 (1784) .....	257213043 英镑
反雅各宾战争末期 (1801) .....	579931447 英镑
1810 年 1 月 (拿破仑战争时期) .....	811898082 英镑
1815 年以后 .....	约 1000000000 英镑

## 2. 国家支出

包括国债利息在内的一切支出共计：

威廉逝世后女王安即位时 (1701) .....	5610987 英镑
乔治一世即位时 (1714) .....	6633581 英镑
乔治二世在位初期 (1727) .....	5441248 英镑
乔治三世执政初期 (1760) .....	24456940 英镑
反雅各宾战争末期 (1801) .....	61278018 英镑

## 3. 国 税

女王安时期 (1701) .....	4212358 英镑
乔治一世时期 (1714) .....	6762643 英镑
乔治二世时期 (1727) .....	6522540 英镑
乔治三世时期 (1760) .....	8744682 英镑
美洲战争之后 (1784) .....	13300921 英镑
反雅各宾战争之后 (1801) .....	36728971 英镑
1809 年 .....	70240226 英镑
1815 年后 .....	约 82000000 英镑

人民根据自己钱袋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因国债而来的税捐是怎样的一种负担。然而许多人还不知道国债在发行时期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以及国债在继续存在的现时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国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它向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借钱，而付给他们一纸凭据，并且规定每 100 英镑借款必须付给一定数量的利息。国家用课税的办法向工人阶级榨取金钱来支付这些款子。这样，人民便给自己的压迫者做了保人，使那些借钱给压迫者的人放心借钱给他们压迫人民。构成国债的借款名目繁多；有的按三厘付息，有的按三厘五或四厘付息不等。根据利率的不同以及其他条件，国家的有价证券就有不同的名称，如三厘证券以及其他等等。

这些利息的担负者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工厂主和大地主也不得不担负一部分，同时他们还力图尽量少担负一些，因此，每一任财政大臣，只要他不是辉格党人，都企图用某种方法来减轻这种负担。

4月6日，在本届内阁预算提出之前，格莱斯顿先生就向下院提出了几个关于国债的决议案。早在他发表这次演说之前，“纪事晨报”就曾报道，内阁将提出极其重要的决议案，“据传这些决议案有巨大意义，有特别大的吸引力”。由于这些谣传，国家有价证券的行市上涨了。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格莱斯顿打算清偿国债。总之，“嚷了这一阵是为了什么呢？”<sup>62</sup>

格莱斯顿先生的建议的最终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要把各种国家证券的利息降低到2.5%。在1822—1823年，1824—1825年，1830—1831年，1844—1845年，利息曾经依次分别从5%降低到4.5%，从4.5%降低到4%，从4%降低到3.5%，从3.5%降低到3%。那末现在为什么就不能把利息从3%降低到2.5%呢？

可是我们看一看，格莱斯顿先生建议采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第一**，他建议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把主要同过去那个空头的南海公司<sup>63</sup>有关、总额为950万英镑的各种证券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利息从3%强行降低到2.75%。这样，每年就能节省将近25000英镑。在每年支出3000万英镑的情况下为各种不同的证券发明一个新的共同的名称，节省25000英镑，这实在不值得怎样特别赞美。

**第二**，他建议发行一种新的名叫国库债券的有价证券，总额不超过3000万英镑。这些债券可以不收任何代售佣金来进行分配，

1864年9月1日以前按利率2.75%计息，自此以后到1894年9月1日则按2.5%计息。这样做无非是意味着建立一个对金融和商业阶级有利的新的财政机构。他说“不收代售佣金”的意思，就是说，西蒂的商人用不着任何支出。目前所有的是总额为1800万英镑按利率1.5%计息的国库期票。按照比国库期票大1%的利率来偿付国库债券的利息对国家说来不是要亏一笔钱吗？无论如何，这第二个建议丝毫也无助于减少国债。国库期票只能在大不列颠流通，而国库债券则可以当作普通期票来转让；因而，这一措施只对西蒂的商人有利，而人民则要为它付出昂贵的代价。

最后，现在让我们谈谈唯一重要的一点，即三厘统一公债券和“三厘跌息”证券，这两者总共构成将近5亿英镑的资本。由于议会会有一个决定，禁止不在12个月以前预先通知就强行降低这些证券的利息，所以格莱斯顿先生选择了自愿兑换的办法，并提出不同的折合方法供三厘证券的持有者选择，以便把三厘证券换成其他一些根据他的方案将要发行的证券。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有三种兑换方法，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任选一种：

1. 三厘证券的一部分换成国库债券：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可以换成同等价值的国库债券，后者的利息在1864年以前每年是2英镑15先令，1864年以后至1894年以前每年是2英镑10先令。如果年利二厘五的3000万英镑的国库债券换回来3000万英镑的三厘证券，那末在头10年内就可节省75000英镑，而在以后的时期内则可节省15万英镑，总共节省225000英镑。但是这样一来，在40年期满时政府就得把3000万英镑的债款全部偿清。因此，这个方案丝毫也不能取消或使国债减轻多少。当每年的支出达到3000万英镑的时候，节省225000英镑有什么意义呢？

2.第二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 82 英镑 10 先令新的三厘五证券，后者的利息在 1894 年 1 月 5 日以前每 100 英镑是 3 英镑 10 先令。这样做的结果是，同意接受三厘五证券的人，从现在的每 100 英镑中所得到的收入不是 3 英镑，而是 2 英镑 17 先令 9 辨士，也就是说减少了 2 先令 3 辨士。如果 5 亿英镑全都用这种办法来兑换的话，那末国家每年偿付的利息就只有 14437500 英镑，而不是现在的 1500 万英镑。这就是说，每年可节省 562500 英镑。但是为了节省这 562500 英镑，议会就要在整整半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在任何利率都极不可靠的不稳定时期保证利息超过 2.8%！然而，格莱斯顿也会赢得一点好处：到 40 年期满之前，存在的就不是目前受到 12 个月前预告的规定所保障的三厘证券，而是议会可以按名义价值收回的三厘五证券。格莱斯顿建议不要规定发行这种三厘五证券的限额。

3.第三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新的 110 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利息支付到 1894 年。当格莱斯顿先生在 4 月 6 日第一次向下院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他有限定发行这种将要发行的二厘五证券的数量。但是，迪斯累里先生指出，把这个办法和其他两个办法比较一下，每一个明白人都宁愿用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来兑换 110 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如果 5 亿英镑的三厘证券都换成这样的证券，那末，国家一方面固然每年可以节省 125 万英镑，然而另一方面，国债却会增加 5000 万英镑。在迪斯累里先生指出这点之后，格莱斯顿先生第二天就修改了自己的方案，建议把二厘五证券的发行量限定为 3000 万英镑。由于规定了这个限额，他的建议对这笔庞大的国债几乎失去了任

何影响；它只能使这笔债款增加 300 万英镑而已。

现在诸君知道，所谓“历来提出的最重要的和规模最大的财政方案之一”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所谓财政更带欺骗性了。玩弄这门“神秘科学”的术士们把有关预算和国债的最简单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普通的骗术：发行名目繁多的证券，旧证券换新证券，降低利息而增加基本金额，提高利息而减少基本金额，设立奖金、奖励和优惠存款，规定有偿年金和无偿年金的区别，把转让不同证券的利益人为地分成等级。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经和一大堆不胜其多的烦琐规定，把公众完全给弄糊涂了。但同时，每一次这种财政把戏都为高利贷者造成加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有利机会，对于这种机会，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不会放过的。没有疑问，格莱斯顿先生是玩弄这种财政炼金术的能手；而把他的建议的特点描绘得最清楚的，恐怕莫过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话了：

“在我看来，哪怕是最机灵的诡辩家的聪明才智，也不可能想出更复杂和更奥妙的安排来取得如此微不足道的结果了。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中，有一章研究了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安琪儿跳舞的问题。这是只有人类的天才能发出的最稀有的议论之一，我发现，在提出的决议案中就有某种和这个杰作共同的东西。”

大家都记得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格莱斯顿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行“标准的”二厘五的国家有价证券。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发行数量非常有限的这种二厘五证券和数量不限的三厘五证券。为了实现有限制地发行二厘五证券，他把利率降低 0.5%，并用奖励 10% 的办法来增加基本金额。为了摆脱三厘证券的立法保障（12 个月以前预告）所造成的困难，他宁愿用今后半个世纪的法

律明文来束缚住自己。简而言之,如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英国人民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将丧失任何摆脱财政压迫的机会。

任何人都同意这样的意见:如果说,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是确立宗教宽容的微小尝试,关于加拿大预备基金的法案是承认殖民地自治的微小尝试,而关于教育的决议案是回避国民教育问题的微小尝试,那末,格莱斯顿的财政方案便是企图对付名叫大不列颠国债的巨大怪物的最微小尝试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4 月 16 日“人民报”  
第 50 号

俄文译自“人民报”

署名:卡·马·

## 卡·马克思 内间的成就<sup>64</sup>

1853年4月12日星期二于伦敦

如果要为联合内阁说句最好的话，看来可以这样说：联合内阁表现了过渡时期的政权的软弱无能，在这个时期中，有存在可能的不是真正的政府，而仅仅是表面的政府；旧的政党正在退出舞台，而新的政党还没有结合起来。

“群贤政府”在它最初三个月的活动中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举行了二读，关于加拿大教会预备基金的法案举行了三读。后一法案将使加拿大立法机关能够掌握一部分出卖土地的收入。而这种收入原先是英国国教教会和长老会教会独占的。这个法案在约翰·罗素勋爵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时候，一共有三个条款。第三条要求废除这样一条法律：在出卖加拿大土地的进款不到 9285 英镑的年代中所产生的赤字，应当用国家统一基金来弥补。这一法案在二读时已经通过。但是在 3 月 18 日议会作为全院委员会<sup>65</sup>开会讨论这一法案的时候，约翰勋爵却突然要求撤销他提出的第三条。因而，如果加拿大立法机关收回教会预备基金的话，那末，英国人民就不得不每年从自己的口袋里付出将近 10000 英镑来维持数千英里以外的一个教派。反对给宗教界任何补助的激进派大臣威·摩耳斯沃思爵士，看来已经成为

约翰勋爵的这样一种理论的信徒，即“不列颠的殖民地只有靠宗主国英国人民田钱才能摆脱国教会这种负担”。

在内阁活动的头三个月中，激进派提出了三个决议案。柯立尔先生建议取消教会法庭，威廉斯先生建议使遗产税和遗嘱验认税也适用于不动产，而休谟先生则建议废除一切“纯粹保护性”关税。不言而喻，内阁对这些“激进的”改革表示了反对。不过，联合内阁反对改革的方式是另一种，与托利党人的做法完全不同。托利党人是断然宣称他们坚决反对“对民主的侵犯”。联合内阁实际上也是这样，只不过借口必须为改革作更周密的准备而已。它是靠改革为生的，就像过去历届内阁靠营私舞弊为生一样。它装出非常热心于改革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想出一套完整的办法来拖延改革：一会儿说，“最好等调查出结果以后再说”；一会儿说，“刚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在得到它的结论以前什么也不能做”；一会儿说，“政府恰巧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希望自己的紧张的脑力工作不被打断；一会儿又说，“问题值得议会注意，在适当的时候将提出讨论”，“适当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不要很久，就要采取某种措施”，局部性的措施应当暂缓执行，以便改组整个制度，或者是整个制度应当保存下来，以便实行局部性措施。在东方问题上所宣布的“节制政策”，同样也是内阁的对内政策。

当约翰·罗素勋爵第一次宣读了联合内阁的纲领并且这个纲领引起了普遍慌乱的时候，罗素的拥护者曾大叫大喊说：“我们应当有一种能够激发热情的东西。国民教育问题就应该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的罗素正在制定一个惊人的组织国民教育的计划。你们等着看吧。”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计划。4月4日罗素大体上说明了

他所拟定的教育改革计划。这个改革的基本要点是：授权市议会征收地方税来维持现有的必须讲授英国国教教义的学校。谈到各大学——国家教会的宠儿，任何改革的主要反对者，约翰勋爵希望，“各大学自行改革”。把兴办学校的慈善基金用来营私舞弊，这是尽人智知的。从以下材料可以了解到这些基金的数量：

“每年得到补充的慈善基金，从 2000 英镑到 3000 英镑的有 24 笔，从 3000 英镑到 4000 英镑的有 10 笔，从 4000 英镑到 5000 英镑的有 4 笔，从 5000 英镑到 6000 英镑的有 2 笔，从 8000 英镑到 9000 英镑的有 3 笔，10000 英镑、15000 英镑、20000 英镑、25000 英镑、30000 英镑和 35000 英镑的基金各 1 笔。”

不需要有特别敏锐的目光就可以猜想到，靠滥用这些基金为生的寡头们在处理这些基金时为什么极为小心谨慎了。罗素建议：

“关于每年进款不超过 30 英镑的慈善基金的案件由郡的法庭审理，如果超过了这个数目，则由大法官法庭的档案保管官审理。但是，如果没有为此目的而成立的枢密院委员会的许可，无论在哪一个法庭上，都不得提起诉讼。”

为了在皇家法庭上提出诉讼，要求赔偿被贪污的本来规定用于国民教育事业的慈善基金，就需要得到委员会的许可。许可！但是，罗素甚至在提出了这个附带条件之后，还没有完全放心。他补充说：

“如果发现某一学校的行政上有营私舞弊之罪，除了枢密院委员会而外任何人都不得干预。”

这是地道的英国老味道的改革，新事物一个不立，旧事物一个不破。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保存旧的制度，办法是使它具有新的、人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形式，即所谓教它学会采取新的姿态。这就是

英国的寡头立法的“传统智慧”的秘密。干脆点说，这实质上就是使营私舞弊的行为带有传统的性质，为此——不妨这样说——就不时给这些现象加一些新鲜血液使它们新鲜一下。

任何人都会同意这样的意见：如果说，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是确立宗教宽容的微小尝试，关于加拿大预备基金的法案是承认殖民地自治的微小尝试，而关于教育的法案是回避国民教育问题的微小尝试，那末，格莱斯顿的财政方案无疑就是企图对付名叫大不列颠国债的巨大怪物的最微小的尝试了。

4月6日，在预算公布之前，格莱斯顿先生就向下院提出了几个关于国债的决议案。还在这次演说发表以前，“纪事晨报”，就发表了一篇专门的报道，说内阁将提出极为重要的决议案，“据传这些决议案有巨大意义，有特别大的吸引力”。由于这些谣传，国家有价证券的行市上涨了。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格莱斯顿打算清偿国债。但是，当4月8日议会举行会议，以全院委员会的资格来审查这些决议案的时候，格莱斯顿突然作了修改，而且修改得这样多，以致完全失去了“意义”和“吸引力”。现在，我们要像迪斯累里先生一样发明：“嚷了这一阵是为了什么呢？”

格莱斯顿先生的建议的最终目的，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要把各种国家证券的利息降低到2.5%。在1822—1823年，1824—1825年，1830—1831年，1844—1845年，利息曾经依次分别从5%降低到4.5%，从4.5%降低到4%，从4%降低到3.5%，从3.5%降低到3%。那末现在为什么就不能把利息从3%降低到2.5%呢？格莱斯顿先生的建议如下：

第一，他建议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把主要同过去那个空头的南海公司有关、总额为950万英镑的各种证券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

利息从3%强行降低到2.75%。这样，每年就能节省将近25000英镑。在每年支出3000万英镑的情况下为各种不同的证券发明一个新的共同的名称，节省25000英镑，这并不能算是值得特别骄傲的事情。

第二，他建议发行一种新的名叫**国库债券**的有价证券，总额不超过3000万英镑。这些债券可以不收任何代售佣金来进行分配，1864年9月1日以前按利率2.75%计息，自此以后到1894年9月1日则按利率2.5%计息。这样做无非是意味着建立一个对金融和商业阶级有利的新的财政机构。但是，格莱斯顿如何能够在保持总额达1800万英镑，利息为1.5%的国库期票的流通的同时又发行利息为2.5%的国库债券呢？按照比国库期票大1%的利率来偿付国库债券的利息对国家说来不是要亏一笔钱吗？这第二个建议不管怎么样，它对减轻国债丝毫也没有帮助。

最后，第三，让我们谈格莱斯顿的决议案的最主要和唯一重要的一点，即三厘统一公债券和三厘跌息证券，这两者总共构成将近5亿英镑的资本。Hic Rhodus, hic salta!<sup>①</sup>由于议会会有一个决定，禁止不在12个月以前预先通知就强行降低这些证券的利息，所以格莱斯顿先生选择了自愿兑换的办法，并提出不同的折合方法供三厘证券的持有者选择，以便把三厘证券换成其他一些根据他的方案将要发行的证券。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有几种兑换方法，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任选其中一种：

1. 每100英镑的三厘证券可以换成同等价值的国库债券，后

---

①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这句话源出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这个人吹嘘自己曾经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人们就对他说了这句话。）——编者注

者的利息在 1864 年以前是 2.75%，自此以后至 1894 年是 2.5%。如果年利二厘五的 3000 万英镑的国库债券换回来 3000 万英镑的三厘证券，那末在头 10 年内就可节省 75000 英镑，而在以后的时期内则可节省 15000 英镑，总共节省 225000 英镑。但是这样一来，政府就得把 3000 万英镑的债款全部偿清。因此，这个方案丝毫也并不能使国债减轻多少。

2. 第二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 82 英镑 10 先令的新的三厘五证券，后者在 1894 年 1 月 5 日以前将按 3.5% 的利息计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同意接受三厘五证券的人，从现在的每 100 英镑中所得到的收入不是 3 英镑，而是 2 英镑 17 先令 9 辨士。在这种情况下，每年从每 100 英镑中所得到的收入将会减少 2 先令 3 辨士。如果 5 亿英镑全都用这种办法来兑换的话，那末国家每年偿付的利息就只有 14437500 英镑，而不是现在的 1500 万英镑。这就是说，每年可节省 562500 英镑。但是，为了节省这 562500 英镑，议会就要在整整半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在任何利率都极不可靠的不稳定时期保证利息超过 2.8%！然而，另一方面，格莱斯顿先生至少也会赢得一点好处：到 40 年期满之前，他再用不着替目前受到 12 个月前预告的规定所保障的三厘证券操心了。格莱斯顿将只同议会可以按名义价值收回的三厘五证券打交道。格莱斯顿建议不要规定发行这种三厘五证券的限额。

3. 第三个办法是：三厘证券的持有者可以把每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换成新的 110 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利息支付到 1894 年。当格莱斯顿先生在 4 月 6 日第一次向下院提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他没有限定这种将要发行的二厘五证券的数量。但是，迪斯累里先

生指出,把这个办法和前两个办法比较一下,每一个明白人都宁愿用 100 英镑的三厘证券来兑换 110 英镑的二厘五证券。如果 5 亿英镑的三厘证券都换成这样的证券,那末,国家一方面固然每年可以节省 125 万英镑,然而另一方面,国债的基本金额却会增加 5000 万英镑。在迪斯累里先生指出这点之后,格莱斯顿先生第二天就修改了自己的方案,建议把新的二厘五证券的发行量限定为 3000 万英镑。由于规定了这个限额,他的第三个办法从对国债的影响来看便失去了意义。这个办法只能使这笔国债的基本金额增加 300 万英镑而已。

现在诸君知道,所谓“历来提出的最重要的和规模最大的财政方案之一”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所谓财政更带欺骗性了。玩弄这门神秘科学的术士们把有关预算和国债的最简单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最普通不过的骗术:发行名目繁多的证券,旧证券换新证券,降低利息而增加基本金额,提高利息而减少基本金额,设立奖金、奖励和优惠存款,规定有偿年金和无偿年金的区别,把转让不同证券的利益人为地分成等级。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经和一大堆不胜其多的烦琐规定,把公众完全给弄糊涂了。但同时,每一次这种财政把戏都为高利贷者造成加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有利机会,对于这种机会,贫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不会放过的。另一方面,一个经济学家从这种乍一看来使人眼花缭乱的兑换、调配、折合当中所发现的东西,与其说是属于财政政策方面的东西,还不如说是属于简单算术或者纯粹词句方面的东西。

没有疑问,格莱斯顿先生是玩弄这种财政炼金术的能手;而把他的建议的特点描绘得最清楚的,恐怕莫过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话

了：

“在我看来，哪怕是最机灵的诡辩家的聪明才智，也不可能想出更复杂和更奥妙的安排来取得如此微不足道的结果了。在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中，有一章研究了在一个针尖上能有多少安琪儿跳舞的问题。这是只有人类的天才才能发出的最稀有的议论之一，我发现，在提出的决议案中就有某种和这个杰作共同的东西。”

大家都记得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格莱斯顿先生的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行“标准的”二厘五证券。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发行数量非常有限的这种二厘五证券和数量不限的三厘五证券。为了实现有限制地发行二厘五证券，他把利率降低了 0.5%，另一方面则规定 10% 的奖励，以求实现降低利率 0.5% 的目的。为了摆脱那种受到必须在 12 个月前预告的规定“保障”的棘手的三厘证券，他宁愿在今后 40 年内用法律明文来束缚住自己。简而言之，如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末有两代人将丧失任何改善自己财政状况的机会。

联合内阁在下院的处境，可以从关于表决的统计数字中看出来。在全院委员会会议上表决关于梅努特<sup>66</sup>问题时，内阁只获得了 30 票的微弱多数。在表决关于取消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的法案时（这个法案还没有举行三读），出席议会的议员共有 439 人，内阁获得了甚至还不到 30 票的多数。在讨论关于加拿大预备基金的法案时，在罗素收回他所提出的第三条建议之后，内阁是因托利党人投票赞成而得救的，而它的支持者则投票反对。获得多数几乎全是靠保守党人。

我不再谈内阁的内部分歧了，这些分歧表现在关于加拿大法案的辩论中，表现在各官方报纸关于所得税问题、首先是关于对外

政策问题的热烈争论中。没有一个问题联合内阁不能像盖札那样给以回答。盖札是匈牙利的国王，他加入了基督教，但仍然奉行他先前信仰的多神教的仪式，当人们问他，这两个教他究竟信奉哪一种时，盖札回答说：“我家东西多，可以有两种信仰。”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12 日

载于 1853 年 4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53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  
失败。——预算

1853年4月19日星期二于伦敦

上星期为确定诺定昂前任议会议员菲格斯·奥康瑙尔的精神状况而召开的委员会，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认为，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从1852年6月10日以来就患有精神病，并且没有任何恢复常态的迹象。”

奥康瑙尔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生涯已在1848年完结。他的力量已被摧毁，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无力去领导自己所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了，简直成了这个运动的障碍。如果说，对历史的公正态度要求我不要掩盖这种情况的话，那末，它也同样责成我对这位倒下的战士的功绩作出应有的评价，所以我特把厄内斯特·琼斯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对奥康瑙尔评论介绍给读者：

“当年的他，是一个放弃官职、财富和社会地位，抛弃有收入、有声望的事业的人；他耗费巨额资财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甘清苦的癖好，而是为了政治上的殉道。他使自己处于终身放逐的地位，去国离乡，而在故乡他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并且是一个最大的郡的代表。当年的他，是一个由于热爱人类而被亲属痛恨的人。他所作的一切那是为人民服务，他现在几乎沦于赤贫，正走在他那充满无比光辉劳动的生命道路的尽头……这就是他的一生。现在请看他的劳动成果。在力量极其衰退的时期，在纷乱、疑惑和贫困的时期，

他使我国的千百万人空前地团结在一起。奥康奈尔把爱尔兰人联合到自己周围，但这是在牧师们的协助下做到的。马志尼唤醒了意大利人，但站在他那方面的有贵族和商人。科苏特团结了匈牙利人，但站在他背后的有参议会和军队。而且无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胸中都燃烧着仇恨外国掠夺者的火焰。但是，奥康瑙尔独自——不要贵族、牧师和商人——集合和发动了被压迫的阶级反对上述所有人；为了把这个阶级联合起来，他甚至没有利用像民族感情这样的手段！跟着拉斐德走的是商人，跟着拉马丁走的是小店主，跟着奥康瑙尔走的是人民！但在十九世纪立宪制的英国，人民是最没有力量的。奥康瑙尔教会了他们如何成为最强大的力量。”<sup>67</sup>

上一周对联合内阁来说是失败的一周。它第一次碰到了一个联合反对派。在星期二，即 12 号，巴特先生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把基尔梅赫姆残废疗养院保留下来，作为爱尔兰士兵的收容所。军务大臣<sup>①</sup>反对这个建议。但是，尽管政府反对，这个建议仍然以 198 票对 131 票被通过了，政府的这次失败是由于爱尔兰旅<sup>68</sup>和保守反对派联合而造成的。此后在星期四，政府又由于保守派和曼彻斯特学派<sup>69</sup>信徒们联合而再遭失败。在米尔纳·基卜生先生提出了年年都提的关于废除“知识税”的建议之后，便废除了广告税<sup>70</sup>。尽管格莱斯顿、罗素和悉尼等人反对，但他们还是成了少数，只得 169 票，而赞成的有 200 票。布莱特、基卜生和麦克格莱哥尔在投票时同迪斯累里、帕金顿等人站到了一起，而科布顿先生则正式声明：“他衷心接受迪斯累里和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但是，使政府遭到大得多的失败的还不是议会里的表决，而是政府本身的行为。

关于轰动一时的科苏特火箭案<sup>②</sup>详情，大概“论坛报”的读者

① 悉·赫伯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96—98 页。——编者注

已经知道了。为了证明因此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事先在帕麦斯顿和外国列强之间就已达成协议，只要举出帕麦斯顿自己的官方机关报“晨邮报”就这件事情发表的意见就够了：

“政府所表现的敏捷和机警，取得了外国列强的信任，而这些国家原来是怀疑我国的法律是否能够制止那些好闹事的客人的恶意行动的。”

这个案件对联合内阁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它现在就已经（这一点有很大意义）迫使帕麦斯顿抛掉他那陈旧的爱穿革命时装的假面具了。甚至他的最盲目的，然而正直的崇拜者“晨报”也公开和他断绝关系了。从帕麦斯顿向十二月二日和萨托里广场的英雄献赠祝愿的时候起，他这颗明星就开始昏暗，而当他公开成为“奥地利大臣”的时候，这颗明星就完全西沉了<sup>71</sup>。至于联合内阁，恰好，它的使命正在于使现在的群贤和旧时寡头政治的干才一齐垮台。联合内阁正以惊人的顽强精神执行着这一任务。如果帕麦斯顿所参加的内阁竟能渡过这场灾难，那它肯定就能把弗朗斯瓦一世的话稍加改变，用玩笑的方式宣布：“除了名誉以外，什么都没有丢”<sup>72</sup>。

现在再来谈谈当前大家注意的问题，即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这个预算昨天他已经在长达 5 小时之久的演说中向下院提出了。这是一个根据百科全书的要求精心编制的联合内阁的预算，完全可以当作一大条目收到埃尔希和格鲁伯所编纂的卷帙浩繁的科艺全书<sup>73</sup>中去。大家知道，凡是百科全书编纂者的纪元到来的时候，总是事实大量积累而思想则相应落后的时候。

每一个预算的基本问题是预算收支部分之间的对比关系，是编制平衡表，或者为结余，或者为赤字，这是确定国家或者削减、或者增加税收的基本条件。迪斯累里先生曾估计 1852—1853 年度

的收入总额为 52325000 英镑，而支出总额为 51163000 英镑。现在格莱斯顿先生告诉我们说，本年度的实际收入为 53089000 英镑，而实际支出只有 50782000 英镑。这些数字表明，收入比支出实际超过 246 万英镑。因此，同迪斯累里相比，看起来好像格莱斯顿改善了财政状况。迪斯累里只结余 160 万英镑就可以夸耀，而格莱斯顿却节约了 246 万英镑。不幸的是，和迪斯累里的结余不同，格莱斯顿先生的结余经过进一步的考察就缩减到 70 万英镑的微薄数字。下院的各种决定以及其他各项特别支出已经从他的钱袋里拿出去成百万英镑了。此外，格莱斯顿先生颇有先见之明地又声明一句：

“应当记住，70 万英镑中有 215000 英镑属于临时进项，而不是固定进项。”

这样一来，格莱斯顿先生的活动余地就是这结余的 485000 英镑了。因而，任何关于减少旧的税收的建议如果超过这个数字，就要施行新的税收来加以平衡。

格莱斯顿是从所得税这个《question brûlante》（“紧急问题”）开始自己的演说的。他说，本来现在就可以放弃所得税了，但是，政府还没有准备就绪，不能建议立即废除它。格莱斯顿要求人们注意的第一件事是，“我们从这个税中得到 550 万英镑的收入”。其次，他企图从所得税的良好效果的角度来替它进行一次“精彩的”辩护，为此他花了不少心血来阐述所得税的历史。

他指出：“所得税在我国争生存时期已经尽职尽责。它使我们得以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弥补了用于战争和民政管理的支出……如果诸位不取消这种手段的效能，那末，一旦不幸重起战事，它就能使我们立即把陆军扩大到 30 万人，把海军扩大到 10 万人，并相应地扩大我们的其他一切机关。”

再其次，格莱斯顿先生指出，所得税不仅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有用，而且对于实施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有用。在发表了这样热心辩护的引论之后，他突然使我们大吃一惊地说：“所得税充满缺陷。”格莱斯顿先生实际上是承认了，要保存这种税，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造，以便消除它在目前所包含的不平等因素。但是，消除这种不平等就必须打破整个制度。于是他就陷入了惊人的自相矛盾之中，又来极力证明这种不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看来似乎存在而已。至于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的问题，他归结为“土地和商业”的问题，企图用相当笨拙的算法使公众相信，对土地征收的税实际上每镑是 9 辨士，而对商业征收的税每镑仅 7 辨士。然后他又补充说：

“对土地和房屋的征税不依它们的所有者每年收入多少而定，而在商业方面，收入的多少是由占有者自己呈报的，他们往往谎报。”

对于国家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格莱斯顿先生肯定地说：如果对他们收入中的那部分资本化的价值课税，就是一种粗暴的破坏社会信任的行为。简言之，格莱斯顿先生是断然拒绝迪斯累里先生的提议，不同意把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作任何区别。另一方面，他又要把所得税扩大到爱尔兰，此外还要向每年超过 100 英镑的收入征收所得税，而在此以前，被课税的最低收入是 150 英镑。但是，他违反自己刚刚宣布过的原则——“不可能在智力、劳力和财产的相应价值间定出差别，并用数字值来表达这些比例”，而建议把每年 100 英镑至 150 英镑的收入的征税限定为每英镑 5 辨士。最后，格莱斯顿先生为了调和一下他对所得税的赞扬态度和他公开承认必须废除所得税的论调，建议：

“从 1853 年 4 月起延期两年每英镑征税 7 辨士，从 1855 年 4 月起再延

期两年每英镑征税 6 辨士，从 1857 年 4 月起再延期 3 年每英镑征税 5 辨士。依照这个建议，从 1860 年 4 月 5 日起，所得税就将完全消失。”

格莱斯顿先生觉得，这样一来，由于他拒绝承认区别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的原则，他就给了土地贵族和持有价证券持有者好处；另一方面，他还考虑到给曼彻斯特学派一个同样的诱饵，即调整遗产税，使之适用于一切种类的财产，同时却拒绝考虑遗嘱验证税的问题。

他宣称：“我毫不怀疑，调整遗产税（如果议会通过这个建议的话），将使我们的固定资金在 1853—1854 年度增加 50 万英镑，在 1854—1855 年度增加 70 万英镑，在 1855—1856 年度增加 40 万英镑，在 1856—1857 年度增加 40 万英镑，总共将使国家的固定收入增加 200 万英镑。”

对于苏格兰，格莱斯顿先生建议把现在施行的 3 先令 8 辨士的酒精税附加 1 先令（这将提供 318000 英镑的附加收入）。此外，他建议增加茶商、啤酒酿造场主、制麦场主、烟厂厂主、烟草商和肥皂制造场主的特许税。

1853—1854 年度由增加税收而得的进项的总数将是：所得税	
.....	295000 英镑
遗产税 .....	500000 英镑
酒精税 .....	436000 英镑
特许税 .....	113000 英镑
	<hr/>
共 计 .....	1344000 英镑
加上进项超过支出的部分 .....	805000 英镑
	<hr/>
使我们用来减少税收的总数 .....	2149000 英镑

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削减旧税的建议怎样呢？对于这个迷宫，我当然不准备朝里面进得太远，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因此，我只指出以下一些基本要点：

(1) 废除肥皂税，这项税收目前的总收入是 1397000 英镑。

(2) 在大约 3 年内逐步降低茶税，最后使茶税从 2 先令  $2\frac{1}{4}$  辨士降低到 1 先令。

(3) 降低大量小商品的税。

(4) 缩减以统一公债的形式逐年偿还的相当于 400 万英镑的爱尔兰债务。

(5) 鉴于罗·格娄弗诺尔勋爵建议完全废除律师执照税，把这项税收降低一半。

(6) 根据基卜生先生的建议，把广告税降低到 6 辨士（但议院已经通过了关于完全废除这项税收的决定）。

最后：

(7) 废除报纸附刊的印花税（这是唯一的一家出附刊的报纸“泰晤士报”的天大的 *pièce de réjouissance*（喜事））。

简单说来，格莱斯顿先生在 4 个多月中苦心制定的预算的基本要点就是这样。下院预定在下星期一举行的辩论，将使我有可能就联合内阁的这一创作继续发表意见。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5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5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卡·马克思 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 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

格莱斯顿提出了自己的预算。我们都看到过两只公鸡在打谷场上声嘶力竭地比谁叫得更响亮的情形。前任财政大臣<sup>①</sup>和现任财政大臣两人在下院中的竞赛就和这种情形有点相似。区别仅仅在于，我们的辉格党斗鸡模仿了保守党火鸡的某些音调。在上个星期我们考察了格莱斯顿先生的财政计划中有关国债的那一部分，并指出，这一部分只是一种躲避所讨论的问题的可怜尝试，只是一种使高利贷者、证券交易人和商人满足，使他们减少开支和易于成交的简单手段<sup>②</sup>。今天，我们将看到，提出的这个预算是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首先，让我们简略地评述一下这一个出色的

1.关于支出和收入的方案。财政大臣确认，本年度的国家支出将比去年的支出超出 140 万英镑!!这对于作为财政改革的序幕的预算说来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开端!造成支出的这种增长的原因也同样令人安心。

这里包括：海军军费增加 617000 英镑，陆军和军需机关军费增加 9 万英镑，炮兵部队军费增加 616000 英镑，民军军费增加 23

① 迪斯累里。——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9—55 页。——编者注

万英镑。但同时，给作为教育工具和知识堡垒的学校事业追加的经费则只有 10 万英镑。国家本年度的支出总额规定为 52183000 英镑。收入总额为 5299 万英镑。收支相抵，收入超过 807 000 英镑。然而，其中有 10 万英镑已经消耗在海上邮件运输的费用上了。归根到底，实际结余总共只有 50 万英镑。

现在，再来谈谈

II .**财政方案。第一**，这位财政大臣注意到所得税，然而他不区别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他建议过两年后，把所得税从每英镑 7 辨士降低到 6 辨士，再过两年再降低一次，从 6 辨士降到 5 辨士，在爱尔兰也征收所得税 3 年，并把应课所得税的数目降低到年收入 100 英镑。他保证说，这“绝不会牵涉到工人”。年收入 100 英镑以上和 150 英镑以下的人，规定每英镑只缴 5 辨士的税。这样，由于把负担转嫁到不富裕阶层身上，富人的捐税负担就将减轻。富商将会付得少一些，然而，不太富裕的小店主在先前他可以不要交直接税的那些情况下也必须纳税了。这种公平真成问题！诚然，在 4 年内收入 100 英镑的人所缴纳的税将比收入 150 英镑或者 15 万英镑的人所缴纳的税每英镑要少两辨士。但是，过了这个期限之后，他们将按同样的税率交税；甚至两年之后富人就占便宜，因为那时的税额将靠着不富裕阶层的纳税而降低。在税收方面，比较符合我们的观点的，是施行累进所得税，就是说，税率随着收入总额的增加而增加。因为，一个年收入 1 万英镑的人拿出 5 万辨士，要比年收入 100 英镑的人拿出 500 辨士更容易些。但是辉格党人的财政政策却是这样：他们采取装门面的、毫无价值的治标办法，拐弯抹角地做事，并且逐渐地而不是不断地减轻富人们的捐税负担，而把全部重担转嫁到穷人身上。至于那种认为所得税似乎不触及工人

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在我们目前的这种企业主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在碰到加税的时候,总是用降低工资或提高价格的办法来求得补偿的。

**第二**,这位财政大臣谈到遗产税问题。他改善了未婚的女婿和媳妇们的境况,把他们的“亲属”税从10%减少到7%(真是微不足道的小恩小惠!),并把各种财产都包括在这种税收的范围以内。被课税的财产应当纳税多少,由它的所有者生前从财产中所得到的收入的多少来决定。依靠这个办法,格莱斯顿使国家的税收总额增加了200万英镑,并且自夸他支持手工业和工业的利益而反对土地占有制。这一条具有原则性的意义,这是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土地垄断集团那里夺来的一个重大的让步。我们再重复一遍:这是让步,但这是一种易于规避的让步,财政界中负责立法的土地占有者事先就把这种让步估算过了。

**第三**,取消单据印花税。今后不管数额有多大,只要在单据上贴1辨士的邮票就行了。这对富人们说来是非常有利的措施。采取这种措施,邮票消费量的增长,正如事先所预计的那样,将抵销印花税收入减少的损失;但是,这对工人阶级来说仍然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工人们的交易很少达到需要贴邮票的那个起码的数目(5英镑)。

**第四**,广告税从1先令6辨士降低到6辨士。这又是一个可怜的特办办法的典型。既然已经放弃了1先令,那就找不出任何一个合理的根据来说明有保存6辨士税的必要了,因为征收这6辨士税的机构臃肿,花钱很多,它本身就会把从这种税收中所得到的全部收入消耗干净!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取消所有那些与这种税收有关的职务和位置。只刊登广告的报纸附刊可以免税。所有

这两条都是对资产阶级的让步，但由于保留了报纸的印花税，今后仍然大大妨碍民主教育的推广。据此，这位财政大臣就说：“现有的报纸将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新的更便宜的报纸将不会产生。”

**第五**，人寿保险税从 2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6 辨士。这同样又是舍本逐末的精神的一个表现；无报酬的学徒合同税从 1 英镑降低到 2 先令 6 辨士；律师执照税从 12 英镑和 8 英镑降低到 9 英镑和 6 英镑；办事员训练合同税从 120 英镑降低到 80 英镑。第一条以及最后两条，又是对资产阶级的明显的宽待。而对于穷人，它们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好处；而 6 辨士的广告税、报纸的印花税和纸张税之所以保存下来，是为了能够降低仆役税、犬税和马税，为富人谋利益。

**第六**，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将追加酒精税，而酿酒者都得到补偿“流失”的特惠。

**第七**，商人的营业执照费将进一步使之均等（这是送给资产阶级的又一个礼物）。

**第八**，取消肥皂税和其他许多物品的捐税。茶税至 1854 年从 2 先令又  $2\frac{1}{4}$  辨士降低到 1 先令 10 辨士，至 1856 年降低到 1 先令 3 辨士，再往后降低到 1 先令。

这就是辉格党人的预算的基本特点。现在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读者，什么时候曾经从大臣席上提出过比这更加可怜的“廉价的立法”（用大臣自己的话来说）的范本吗？从表面上看来，预算好像非常堂皇可观，动人的条目很多；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它使英国工人阶级的赋税负担真正减轻了多少呢？唯一可以指出的是取消肥皂税和降低茶税。然而这种减轻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有一条界线到处被准确地遵守着，人们竭力避免超过它，因为超过它就

开始对工人有利,而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受到损害。轻信的人可能会受这个预算的骗。“广告税降低到 6 辨士,取消报纸附刊的印花税!”但是,这实际上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单据上只须贴 1 辨士的邮票!”但是,仅仅在领取自己的微薄工资时才“签署单据”的雇佣奴隶与这有什么关系呢?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人寿保险税从 2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6 辨士”。但是,对于那些被雇佣的,每周挣 6 先令、8 先令或 10 先令工资,在曼彻斯特的惨重奴役下不能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劳动者来说,这有什么好处呢?甚至对那些每周收入 1 英镑或 30 先令的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律师所交付的执照税将减少 3 英镑,办事员的训练合同税将由过去的 120 镑减为 80 镑,这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遗产税有一条将要减轻,而关于征收遗产税的一般规定又非常容易回避,这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这能否使工人的负担减轻一丝一毫呢?工人的工资是不可能同店主利用工人的贫困所榨取的利润均等的,那末店主的营业执照费进一步均等能使工人得到什么好处呢?“财政改革”,这是本届议会当选和本届内阁上台执政的两大口号之一。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财政改革了,这就是辉格党人、贵族和资本家所提出的改革。必须干一点什么事情,作出一些小让步;任务在于,要使这种让步变得根本微不足道和难于捉摸,而我们的理财能手巧妙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预算确实是——完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了工商业阶级的便利”而编制的,同时,也正是“廉价的立法”的典范。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20 日左右  
载于 1853 年 4 月 23 日“人民报”  
第 5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卡·马克思  
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  
招魂术。——预算<sup>74</sup>

1853年4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据电讯,本月12日在君士坦丁堡及其近郊发生了很大的乱子;有15个基督徒被一群狂热的土耳其人打死或打伤了。

“在武装力量的帮助下,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另一条来自哥本哈根的消息说,下院否决了关于新的丹麦王位继承制度的内阁咨文。我们应当把这一举动看做是俄国外交的严重挫折,因为咨文是根据伦敦议定书的精神维护俄国利益的,该议定书承认,俄国是丹麦王国的无可争辩的继承人<sup>75</sup>。

来自海牙的消息告诉我们,像两年前在英国由于“天主教的进攻”<sup>76</sup>而引起的那种激愤情绪,现在在尼德兰已经开始产生,并导致了极端新教派内阁的建立。关于德国(或者更确切些说,关于德国的先前名叫帝国的那一部分),应当说,在表明资产阶级有教养人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思潮方面,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法兰克福报”<sup>77</sup>编者4月20日的声明更精彩了。为了使贵报读者引以为训,现在我把这个声明的译文转录如下:

“每一班邮件都给我们送来关于招魂术(Tisch-Rücken)<sup>78</sup>的消息,消息

之多，是从尼古拉斯·贝克尔的不朽的‘莱茵河之歌’出现以来，以及从 1848 年 3 月革命的最初日子以来所未有的。这些消息比任何政治议论都更好地说明，我们重新生活在一个多么无风波和无恶念的时代。但是，不管这些消息多么令人欣慰，遗憾的是，我们今后不能给以应有的注意，因为我们担心，这些消息完全有可能使读者诸君以及我们自己负担过重，并且最终占满本报所有各栏的篇幅。”

“一个英国人”<sup>①</sup>就不久前发生的科苏特案件<sup>②</sup>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帕麦斯顿勋爵，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当联合内阁就要到它的父亲们，或叔伯们，或老祖宗们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要婉转地向勋爵阁下暗示一下最新版的约·密勒。当然，我们完全不是想再听到‘约’这个名字。‘帕麦斯顿’——这就是将要出现的名字。这个名字长了一点，这不好。然而，我们相信，按照盎格魯撒克逊的形式改称‘帕姆’[Pam]就比较合适了。它在散文和诗中可以同《sham》（“耻辱”）《flam》（“谎言”）《cram》（“欺骗”）等字押韵。”

我在星期二写的那篇文章<sup>③</sup>中，向诺君简略地评述了一下格莱斯顿的预算。现在在我面前已经有了一本共计 50 页的 in folio（对开）官方出版物，标题是：“财政大臣即将提出的决议案，和“决议案的说明”。但是，我只打算谈谈预算草案果真成为大不列颠的法律以后可能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的细目。

最重要的是有关关税的决议案。建议取消 123 种次要商品的关税，这些关税每年的收入约达 55000 英镑；这里包括各种（有 4 种除外）用来制造家具的木料以及梁柱、门窗和砖瓦。拟降低关税的项目有：第一，茶叶，1854 年 4 月 5 日以前从 2 先令  $2\frac{1}{4}$ ，辨

① 阿·理查兹。——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96—98 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65—71 页。——编者注

士降低到 1 先令 10 辨士。第二，12 种食品。现行的杏仁税拟降低到每公担 2 先令 2 辨士；干酪——从每公担 5 先令降低到 2 先令 6 辨士；可可——从每磅 2 辨士降低到 1 辨士；核桃——从每普式耳 2 先令降低到 1 先令；蛋类——从每百枚 10 辨士降低到 4 辨士；桔子和柠檬——每普式耳降低到 8 辨士；黄油——从每公担 10 先令降低到 5 先令；葡萄干——从每公担 15 先令 9 辨士降低到 10 先令；苹果——从每普式耳 2 先令降低到 3 辨士。所有这些商品的税收目前共计 262000 英镑。第三，预定还要降低 133 种食品的关税，这些食品的税收共计 7 万英镑。此外，简化了许多商品的课税方法，抽税将有一定的数量，而不是 ad valorem (抽从价税)。

在消费税方面，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要取消肥皂税，提高啤酒场主、茶商、咖啡商、烟草商和肥皂场主的特许税税率。

在印花税方面，除了降低律师执照税和广告税以外，还要降低人寿保险税、单据印花税、学徒合同税和出租马车税。

在直接税方面，要降低男仆税、私人马车税、马税、波尼马税和犬税，田赋赎金减付 17.5%。

根据邮政主管机关的意见，拟降低寄往各殖民地的邮件的印花税，办法是施行 6 辨士的单一税率。

预算值得注意的一个总的特点是下面这种情况，即它的大部分项目都是联合政府在议会的这次会议过程中进行绝望反抗没有效果而不得不接受的。

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建议把遗产税推广到不动产上；然而：就在 3 月 1 日他还反对威廉斯先生所提出的关于不动产也应当“像动产一样征收同样的遗产税和遗嘱验认税”的建议。格莱斯顿就

像托利党人的报纸目前所做的那样，声称这只是表面上的优惠，这种优惠已被纯粹由不动产担负的其他税收抵销了。就在3月1日那天（这也是无可争辩的），威廉斯先生威胁格莱斯顿先生说：“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让步的话，他将被迪斯累里先生取代。”

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建议取消或降低大约268种次要商品的保护关税。但是，3月3日他还反对过休谟先生所提出的“关于立即取消大约285种商品的纯粹保护关税”的建议。下面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即迪斯累里先生曾在当天声明：

“我们不能死抓住保护关税制度的片断和破烂不放。”

格莱斯顿先生现在建议把广告税削减一半，但是，仅仅在他提出自己的预算的四天之前，他就曾反对过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关于取消这种税的建议。诚然，下院表决的结果，他遭到了失败。

把联合内阁向曼彻斯特学派所作的让步一一列举下去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这些让步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些让步说明：工业资产阶级，无论它在议院中的力量怎样微弱，仍然是时局的真正主人。任何政府，辉格党政府也好，托利党政府或联合政府也好，只有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为资产阶级做好事先的工作，才能保持住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排挤在政权之外。只要追溯一下1825年以来的不列颠立法，大家就会发现，只是在财政方面以对资产阶级一贯让步为代价，才在政治方面抗住了资产阶级。寡头政治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当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帮助之下亲自颁布对手工工场主有利的法律的时候，他只是准备了1789年的革命，而回答他的

《l' état, c' est moi》（“朕即国家”）这句名言的，是西哀士的话：《le tiers état est tout》（“第三等级就是一切”）<sup>79</sup>。

预算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精确地抄袭了迪斯累里先生“这位轻举妄动的冒险家”的政策。迪斯累里在议会里大胆断言：自由贸易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是财政革命，也就是用直接税来逐步代替间接税。事实上，格莱斯顿先生所建议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加强和扩大直接税制度，以便削弱和缩小间接税制度。

一方面，他建议，在7年内保持所得税，不去触动它。他把这种税扩大到全国，即扩大到爱尔兰人身上。他仿照迪斯累里先生的做法，把这种税扩大到整个社会集团——收入为100至150英镑的人身上。他部分地采纳了迪斯累里先生所提议的增加房屋税的办法，以变相的许可证税的名义来增加房屋税，并且根据住宅面积的大小按比例地增加这些许可证税的税率。最后，他把直接税增加了200万英镑，办法是使遗产税也适用于不动产，这也是迪斯累里先生曾经允诺过的办法。

另一方面，他又对间接税的两种形式——关税和消费税进攻，在关税方面，他采纳了迪斯累里的降低茶叶税的建议，并取消、降低或简化268种商品的税收。在消费税方面，他完全取消了肥皂税。

格莱斯顿的预算和前任大臣的预算之间的唯一差别是，迪斯累里是作者，而格莱斯顿仅仅是抄袭者；迪斯累里取消消费税和其他的捐税是为了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land- interest]，而格莱斯顿取消这些税则是为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 [town- interest]，迪斯累里虽然宣布了原则，但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不得不在实践上歪曲这一原则。而格莱斯顿虽然反对这项原则，但由于他所参

加的那个内阁的联合性质，就有可能通过一系列的妥协办法，把这个原则的细节一一付诸实施。

联合内阁的预算可能会有怎样的前途呢？各有关党派会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般说来，至少会有 3 个问题可能引起剧烈的斗争，这就是所得税问题，遗产税问题和爱尔兰问题。

曼彻斯特学派曾经提出过庄严的诺言，表示要反对延长征税目前所得税的任何做法，因为这种所得税是“可怕的不平等”的化身。印刷所广场<sup>80</sup>的预言家，“泰晤士报”，10 年来就大声疾呼地反对过这种“荒谬绝伦的不公正现象”，大不列颠的舆论一般都反对不分收入的种类而划一抽税的制度，并坚决谴责这种制度。但是，正是在这唯一的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拒绝作任何妥协。由于迪斯累里先生在他自己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曾建议修改所得税，把非固定收入和固定收入区别开来，前者每英镑征 5 辨士的税，后者每英镑征 7 辨士的税，所以看起来所得税似乎成了一个把保守党人、曼彻斯特学派和“泰晤士报”所代表的“社会舆论”组成统一反对派的联系环节。

但是，曼彻斯特派是否履行了自己的庄严诺言呢？这是很有问题的。他们一向都遵循着把原则放在一边而大捞实际利益的商业习惯。而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所预示的实际利益也很不小。曼彻斯特派的机关刊物在所得税问题上的语调已经变得非常温和、非常折衷了。他们开始用格莱斯顿所表示的“7 年之后所得税将完全消失”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而在紧要关头就忘记了，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 1842 年施行这种税的时候就曾经答应在 1845 年把它取消；他们也忘记了，把某一种税扩大到更广大的阶层身

上，这对于将来取消这种税是一个大成问题的办法。

至于“泰晤士报”，它是从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取消报纸附刊印花税的建议中唯一获得好处的一家报纸。“泰晤士报”在一星期内每天都出两个附刊，这样每星期就要付4万辨士或大约166英镑3先令的附刊税。由于格莱斯顿先生放弃这种税收，所有4万辨士将全部装入“泰晤士报”的钱柜。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塞卜洛士将被驯服成为羔羊，尽管格莱斯顿先生不会变成海格立斯。在大不列颠的整个议会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格莱斯顿先生这种在预算中列入一条专门有利于报纸的项目来收买报纸支持的做法更不光彩的举动了。本来，取消知识税主要是为了粉碎报界的利维坦的垄断。“猷殷勤的”格莱斯顿先生从所建议的措施中抄袭来的东西，恰好使“泰晤士报”的垄断变本加厉。

当格莱斯顿先生否定各种收入来源之间有任何差别时，我们在原则上承认，这是对的。如果要区分各种收入之间的质的差别，那就一定要考虑它们之间的量的差别，因为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正是收入的量构成收入的质。如果要区分它们之间的量的差别，那末，就必然要采取累进税，由此更进一步，就要陷入某一种社会主义，它具有极尖锐的性质，无疑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反对者所憎恶的。按照曼彻斯特学派对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之间的差别所作的狭隘的和利己的解释，我们会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英国最富的阶级，即工商业阶级的收入，只是非固定收入。曼彻斯特派打着行善的幌子，不过是力图把一部分社会负担从自己的肩上转移到土地占有者和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肩上罢了。

至于说把遗产税扩大到不动产上，那末，毫无疑问，土地占有者的党将会坚决反对这一点。土地占有者当然希望像过去那样

不缴税而获得遗产。但是，当迪斯累里先生担任财政大臣的时候，他就已经承认，这种例外是不公平的，曼彻斯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将同政府一致。“晨报”在昨天已经警告土地占有者的党，如果它仍旧采取这样不明智的态度，在遗产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观点的话，那它将不得不失掉任何指靠自由派支持的希望。在英国未必还有什么其他的为不列颠资产阶级所更强烈反对的特权，也未必还有什么其他的更鲜明的寡头立法的例子。1796年皮特曾提出两个法案，其中的一个法案规定对动产征收遗产税和遗嘱验证税，另一个法案规定把这些税扩大到不动产上。这两个法案是分开来讨论的，因为皮特担心，对两院议员的领地征收这样一些税，会遭到他们的有效反抗。第一个法案在议会中几乎没有遇到反对派。表决总共进行了一次，只有16个议员投票反对；第二个法案经过了一切阶段，但是，在进行三读的时候，没有通过，30票赞成，30票反对。皮特知道，他没有任何可能使法案在两院中通过，所以不得不收回这个法案。如果从1796年起就开始对不动产征收遗产税和遗嘱验证税的话，国债的绝大部分就可能清偿了。土地占有者的党现在可能提出的唯一有力的反对意见，就是持有价证券的持有者还享受着这样的优待。但是，它当然不会用这样一些论据来巩固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会使特别爱好财政特权的持有价证券的持有者重新起来反对它。

这样，只剩下一个可能顺利地反对联合内阁的预算的机会了。这就是土地占有者的党和爱尔兰旅结成联盟。诚然，格莱斯顿先生力图使爱尔兰人同意在爱尔兰施行所得税制度，为此，他减少了他们应当清偿的450万统一公债，作为赠给他们的礼物。但是，照爱尔兰人的说法，这450万中有300万是由于1846—1847年间

的饥荒而产生的，爱尔兰人民从来没有把它看做是国债，而且也从来没有承认它是国债。

看来，内阁本身是没有获得胜利的充分信心的，因为它威胁说，如果预算不能全部通过，那就**提前解散**议院。这对大多数议员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因为“在最近一次竞选期间，由于合法的支出，他们的囊中快要空空如也了”。这对那些激进派也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因为他们是竭力遵守反对派的旧定义的：反对派在政府机构中执行着安全阀在蒸汽机中所执行的任务。安全阀并不停止机器的工作，而是保证机器的安全，把不放掉就可能使整个设备爆炸的那部分能量化为蒸汽放出去。激进派也是把人民的要求像把蒸汽放出去那样放掉。显然，他们提出建议仅仅是为了后来又把把这些建议收回去，或者是为了给自己过多的言词找出路。

议院的解散仅仅会表明旧政党的解体。从联合内阁成立时起，爱尔兰旅就分成了两派：政府派和独立派。土地占有者的党也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另一个阵营以约·帕金顿爵士为首。但是现在，在危急的时刻，两个阵营又重新团结在迪斯累里的周围。激进派本身也划分成两个集团：梅费尔派<sup>81</sup>和曼彻斯特派。旧政党中的内部团结的力量消失了，但同时也没有出现实际对抗的力量。新的大选不会改善而只会巩固现状。

由于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被揭穿，下院的威信已下降到极度。但同时，它也日益暴露了自己本身的基础的腐朽，暴露了选民中间贿赂成风。在这一切都揭露出来之后，内阁是否敢冒险向这些打上耻辱烙印的选民们呼吁呢？是否敢冒险向全国呼吁呢？内阁向全国提不出任何东西，因为它一只手拿着拒绝实行议会改革的

决定,另一只手则拿着奥地利提升它担任大陆警察局主要情报员之职的证书<sup>82</sup>。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22 日

载于 1853 年 5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61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  
得贿赂。<sup>①</sup>——联合内阁的预算

每一个人都知道，预算只不过是国家本年度预期收入和支出的一览表，它是以上一年度的财政经验即平衡表为根据的。

因此，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件作品就是 1852—1853 年度的预算平衡表。当迪斯累里先生任财政大臣的时候，他曾规定 1852—1853 年度的预期收入为 52325000 英镑，同一时期的预期支出为 51163000 英镑；这样，他预计结余 1162000 英镑。格莱斯顿先生根据账目确定实际平衡表时发现，上一年度的实际收入等于 53089000 英镑，而实际支出额则只有 50782000 英镑。实际结余有 2307000 英镑，或格莱斯顿先生计算的 246 万英镑（这个数目是用我们不能理解的什么方法计算的）。

已经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或者确切些说，议会已经习惯于把财政大臣看做是一个神秘的魔术师，能利用谁也不知道的神秘的魔术创造出国家的全年收入；所以毫不奇怪，不管这个重要人物是谁，他总是力求不戳穿这个对他说来是如此体面的假象。因此，如果国家由于扩大了生产而能够使税收进项超过规定的总额，那末

<sup>①</sup> 俏皮话：“肥皂”原文是《soap》：“贿赂”、“偿钱”原文是《sop》。——编者注

可以确信，那个因为这个缘故而能使结余超过他的前任所答应  
的结余一倍多的财政大臣，无疑要被称赞为一位十分杰出的理财能  
手。格莱斯顿先生的光辉的思想也就在这里，这种思想在议院的捍  
卫联合寡头政治的人当中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应有的评价。

### 结余二百四十六万英镑！

但是，这二百多万英镑的结余，议院一文钱也不允许给予人  
民。那末，这些钱要用在什么地方呢？格莱斯顿先生解释道：

“不管这个决算是多么令人感到满意，议院也不应当忘记，它已经表决把  
这笔结余的大部分用作本年度的各种紧急支出。”

议院曾经从迪斯累里先生那里知道，结余无论如何总要超过  
100万英镑。根据这种情况，议院筹款委员会 83 就大大方方地批  
准了以下预算之外的补充拨款：

海军，以及海军邮政机关 .....	617000 英镑
陆军和军需机关 .....	90000 英镑

此外，正如格莱斯顿先生宣布的，在这些支出中还应当加上：

同卡弗尔人打仗的战费〈不会和平吗？〉 .....	270000 英镑
炮兵部队增支 .....	616000 英镑
民军增支 .....	230000 英镑
公立(应读作私立)学校经费 .....	100000 英镑
共 计 .....	1923000 英镑

格莱斯顿先生仍然认为总数是 1654000 英镑(大概是没有把  
同卡弗尔人打仗的拨款计算在内，因为这一次支出还没有确定)。  
如果从最初估计的(只是名义上的)246 万英镑的结余中扣除这个  
数目，那末实际结余只有 806000 英镑，或格莱斯顿先生计算的

807000 英镑。尽管如此，议院还被警告说，甚至在这笔微小的款项中还要扣除 22 万英镑，因为这笔进款预计来自临时收入而不是来自固定收入。这样，起初大肆吹嘘的两百多万结余，最后终于缩减为 587000 英镑了，这个数目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可以赖以进行哪怕是最微小的税制改革的真正广泛的基础。但是，既然一再向国家保证，政府是实行改革的，那末，改革就一定要进行，因而，格莱斯顿先生也就立即着手草拟改革计划了。

一个像休谟先生那样平庸的自由贸易论者，或许会劝财政大臣把自己的结余用来做一件好事：取消外国商品的关税（根据海关统计材料，外国商品所纳的税收恰好也是 587000 英镑）。但是，对于像格莱斯顿先生这样博学多才和深谋远虑的财政炼金术士来说，这样的建议是陈腐的，平凡的和庸俗的！难道可以设想，对于一个打算不多也不少刚好消除全部国债的人来说，仅仅缩减 50 万英镑的税收就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吗？为了这个渺小的目的，当然值不得把那位桑科·庭伯尔<sup>①</sup>打发到印度的巴拉塔利亚去，以便把他的位子让给联合内阁财政上伟大的唐·吉河德。

格莱斯顿的税制改革就像牛津街上的店铺一样，傲视行人的招牌在闪闪发光：

**“大减价！”**

**“马上省下五百几十万英镑！”**

这倒是可以吸引人民的注意，甚至可以使最顽固的议会老太婆们着迷。

---

<sup>①</sup> 指查理·伍德，他从 1846 年起担任财政大臣，但在 1852 年联合内阁成立时被任命为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这里的名字是双关语：庭伯尔（timber）在英文中意为“木材”，“木料”，伍德（wood）意为“木头”。——编者注

让我们到这个店铺里去看看吧。“格莱斯顿先生,请把您的价目表拿出来看一下。先生,您所说的东西实际上究竟是什么?降低500万英镑吗?”格莱斯顿先生回答道:“当然,亲爱的先生,您想看一看数字吗?下面就是这些数字:

1.完全取消肥皂税 .....	1126000 英镑
2.人寿保险税从 2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6 辨士 .....	29000 英镑
3.降低单据印花税和确定 1 辨士的统一税率 .....	155000 英镑
4.学徒合同税从 20 先令降低到 2 先令 6 辨士.....	50000 英镑
5.降低律师执照税.....	
6.广告税从 1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6 辨士 .....	160000 英镑
7.出租马车税从每天 1 先令 5 辨士降低到每天 1 先令 .....	26000 英镑
8.年满 18 岁以上的男仆税降低到 1 英镑 1 先令, 不满 18 岁者降低到 10 先令 6 辨士 .....	87000 英镑
9.降低私人马车税 .....	95000 英镑
10.降低马税、波尼马税和犬税 .....	108000 英镑
11.降低邮政车马税,废除按距离收费,代之以特许证制度 .....	54000 英镑
12.降低寄往殖民地的邮件税(每封信降低到 6 辨士)...	40000 英镑
13.降低茶税,至 1854 年 4 月 5 日以前从 2 先令 $2\frac{1}{4}$ 辨士降低到 1 先令 10 辨士,1855 年降低到 1 先令 6 辨士,1856 年降低到 1 先令 3 辨士,此后降低到 1 先令 .....	3000000 英镑
14.降低苹果、干酪、可可、蛋类、黄油和各种水果税...	262000 英镑
15.降低 133 种次要商品税 .....	70000 英镑
16.取消 123 种次要商品税 .....	53000 英镑
共计.....	5315000 英镑”

当然,缩减 5315000 英镑的税收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个极端自由主义的预算是不是没有自己的缺点呢?无疑是有的。否则怎么可以把它叫做改革呢?要知道,宪制改革也像牛津街

上的店铺一样，不管它们的门面装点得多么好看，缺点必然是很可观的。

不管这个预算费了多少心机，人们的智慧最终会揭穿它的秘密。格莱斯顿先生的钱包里只有五十万英镑，但他却要送给公众五百五十万英镑的礼物。这些钱从哪里弄来呢？很明显，正是从那些现在被他的慷慨弄糊涂了的被愚弄的公众的口袋里弄来的。他送给公众一件礼物，同时却向公众提出了付出同等代价的要求。自然，不是以直接的挑衅形式提出来的，甚至不是向那些现在他想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人提出的。他立意要同各式各样的顾客打交道，于是魔术师罗素就教会了炼金术士格莱斯顿，应当用什么方法在明天来补偿他今天所作的慷慨牺牲。

格莱斯顿把旧的税收削减了 5315000 英镑。格莱斯顿增加了新的税收 3139000 英镑。这看起来仍然使人觉得，好像格莱斯顿使我们得到了 2176000 英镑的好处。但是要知道，格莱斯顿最多不过是只当一年的大臣，而今年他计划削减的税额只有 2568000 英镑，这将使收入减少 1656000 英镑，而这笔钱将由拟定在今年增加的 1344000 英镑的新税收来弥补。312000 英镑的差额仍然应当从预算规定的 807000 英镑的实际结余中得到补偿。扣出这一切之后，仍然还有 495000 英镑的顺差。

联合内阁的预算的基本特点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想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内阁预期会特别受到赞扬的条目，以及议会中各个反对党派最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最后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尽管格莱斯顿力图引起轰动，力图借助大大降低税收的办法来保证他的财政专家的光荣和在人民中的声望，但他感到还是有

必要利用一个漂亮的、乍看起来是合理的借口，来提出关于增加3139000英镑税收的建议。他懂得，如果不用议员和资产者的词句使他的谋划具有某些维护“原则”和“正义”的色彩，那别人就不会让他修改整个税收制度而不适宜地、绝非正当地专门满足个人的利益。因此，他很机灵地决定利用他摸得很清楚的立法界的柏克司尼弗们的弱点，说什么“要公正地扩大某些税收的范围，以便在这方面达到最终的和持久的平等”，用这样一些悦耳动听的话把他增加社会负担的计划巧妙地掩饰起来。为了这个目的，他选择了以下几种税：

- (1) 遗产税，
- (2) 酒精消费税，
- (3) 所得税。

格莱斯顿要求把遗产税同样地加到所有各种财产上。由于地产至今都没有征收这种税，所以估计这个建议应当使厂主和商人感到满意。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也应当征收酒精消费税，以便使那里的酿酒业和英格兰的酿酒业处于平等的地位。

最后，征收所得税的范围应当扩大到年收入为100至150英镑，以及扩大到爱尔兰。自然，格莱斯顿不能期待他的关于所得税的建议会引起特别的掌声。但是，这一点在我们谈到反对预算的意见时再谈。

除去关于遗产税和酒精税的建议之外，内阁无疑地认为根据自由贸易政策的精神降低大量进口商品税是最好的诱饵，而店主、家庭主妇以及一般小资产者，在还没有认识到消费者从降低关税中，至少是从降低茶税中只将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因为大部分利益有被公司老板和垄断生产的资本家的利润吞噬的趋势）以前，

也可能会纷纷赞成这样做。然而，肥皂税是完全取消了，像格莱斯顿所希望的，这一措施不仅应当帮助人民摆脱不整洁的、不卫生的寒伧相，使所有的面孔都变得清洁、潇洒和幸福，而且还应当彻底废除对黑人的奴役，结束无数“汤姆叔叔”的灾难，因为它将促进“非洲棕榈油的合法的贸易和生产”。格莱斯顿对于这一点深信不疑，他决心在吹嘘自己的手段方面赛过最世故的服饰商人和最会吹的江湖骗子。格莱斯顿还给这些诱人的前景添上数量相当可观的小贿赂，其中包括送给爱尔兰旅的几百万英镑的贿赂，即豁免由于饥荒而贷给爱尔兰的国债，还包括送给“泰晤士报”这个“善良的阿伯丁”及其联合内阁的同僚的可靠支柱的贿赂。这后一种贿赂就是取消只登广告的报纸附刊的印花税。大家知道，在所有的报纸中，只有“泰晤士报”发行大量这样的附刊。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反对派可能提出的对预算的反对意见。由于上星期一下院的辩论只不过是试探性的交锋，因此我们不得不根据定期刊物尽可能来了解各个党派的意图。然而，在定期刊物中我们得到的消息非常少。“泰晤士报”、“纪事报”和“邮报”实际上已成了联合政府的附属品，而“每日新闻”也未必能算作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此外，这个报纸的立场非常动摇，看来它已经完全被自由贸易性质的建议迷住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先驱报”——托利党保守派的机关报，我们就会发现，该报已经发表了明确的意见，而且是以真正异乎寻常的坦率态度发表的。

该报写道：“格莱斯顿先生的整个预算，不过是贿买和倒卖的不体面的混合物。”

因此，托利党人无疑将会反对格莱斯顿的草案，而迪斯累里也一定会要求恢复他在扩大遗产税和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和降低茶

税方面被窃走了的桂冠的所有权，以及要求承认他的被格莱斯顿如此无耻地攫为己有的其他功绩。土地贵族即使不得不忍心再一次丧失自己的特权，那末它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保持自愿放弃这些特权的功绩。但是，由于它不能把关于遗产税的问题作为自己的据点，所以迪斯累里将使它团结在要求区分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这个原则的周围。站在这个立场上，迪斯累里将能争取爱尔兰旅的很大一部分人成为自己在斗争中的同盟者。很明显，爱尔兰人永远不可能承认，而且也没有承认英格兰人预先使爱尔兰居民破产然后再强加于他们的国家的债务。姑且不谈这一点，从纯粹实际的观点来看，豁免想像中的 300 万英镑资本的利息，在他们看来是对实行所将税和酒精消费税的极其不等价的让步。至于曾经向自己的选民庄严地保证即使不废除至少也要修改所得税的曼彻斯特学派，所能期待于它的只是：它将像一个生意人一样，考虑的不是政治荣誉，而只是有没有好处。而从格莱斯顿的“整个”预算所得到的好处，曼彻斯特学派的先生们无论如何都不认为是很小的。

最后，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所最热烈希望的是内阁失败，因为这个内阁的对内政策反动而诡诈，同它的畏首畏尾的和阿谀逢迎的对外政策一样，都应该受到鄙视。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因为这样的事件无疑将符合人民的利益。有一点很清楚：在贵族的联合内阁还能按照厂主和商人阶级的要求办事的时候，厂主和商人本身就不会做出任何政治上的努力，也不会允许工人阶级展开自己的政治运动。但是，如果土地占有者的党再一次占了上风，资产阶级不改革腐朽的寡头议会就不能摆脱它的控制了。而到那时，资产阶级就不能只限于宣传局部改革

了；那时它就会被迫对人民群众的要求给予充分的活动余地。当然，人民只要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利益，是决不会附和资产阶级或者投靠资产阶级的，但是对资产阶级来说，不得不依靠人民的支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这种情况就会引起目前财政制度极其彻底的革命。现在就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也不能不要求用单一的直接所得税来代替传统的财政 olla podrida (大杂烩)。直接征税的原则早已为曼彻斯特学派所接受；这个原则也得到了迪斯累里的承认，甚至得到了寡头联合内阁的确认。一旦征收直接所得税的机构建立起来并且安排就绪，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就将充分使它动作起来，以便建立

### 工人阶级的预算。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4 月 25 日  
左右

载于 1853 年 4 月 30 日“人民报”  
第 5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sup>84</sup>

1853年4月29日星期五于伦敦

前几天，臭名昭著的警察厅长施梯伯在警尉戈德海姆和刑法参事纽尔纳的陪同下从柏林来到这里。他们到这里来的特殊使命是确定罗瑟海特“火药密谋”同柏林“卡拉布里亚帽”密谋<sup>①</sup>之间的联系。我从私人方面获悉，上面所说的这些人曾在肯辛顿聚会，地点是弗略里的家里。前商店职员希尔施也在场。第二天，这个希尔施又秘密会晤了俄国领事克列美尔先生。如果读者诸君还记得我写的科伦案件一文<sup>85</sup>，马上就会发现，这些人就是制造科伦案件的那些人，他们现在又开始活动了。

星期六（本月23日）审讯开始：弯街的治安法官亨利先生出庭审讯黑耳先生，即被政府查封的罗瑟海特火箭工厂的厂主。在这一天，法庭辩论只围绕着一个问题：被没收的爆炸物是不是火药。拖到昨天才作出决定的亨利先生不顾著名化学家尤尔先生的意见，当时宣布：这些东西正是火药。因此，他对黑耳先生处以罚款，超过法定额的每一磅火药罚2先令，而在他工厂中查出的超过法定额的火药数量是57磅。接着，威·黑耳和他的儿子罗·

---

<sup>①</sup> 见本卷第31—34页。——编者注

黑耳以及詹·博伊林又被控从 1852 年 9 月 13 日至 1853 年 4 月 13 日在不同时间内制造或接受几大宗火箭定货而受到法庭审讯。检察长博德金先生宣布，威·黑耳先生曾数次建议英国政府购买他的火箭而没有成功，他的工厂从 1852 年 10 月起雇用了大批工人，其中一部分是流亡者，全部生产过程严守秘密，海关的货运报告也驳斥了黑耳先生的火箭经海关运出的说法。博德金先生最后说：

“在黑耳先生那里查出的火箭估计值一两千英镑。他哪来的这些钱呢？要知道，黑耳先生就在不久以前还是个破产户，后来用每镑债款只还 3 先令的办法才不算破产户。”

侦缉警察约·桑德斯报告，他查获了“1543 枝装有火药的火箭、3629 颗火箭头、2482 个火箭壳、1955 枝没装火药的火箭、22 颗铁弹、2 副火箭爆炸工具”。随后被传的证人乌茨奈尔先生报告：他当过 15 年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在匈牙利战争期间是少校参谋；曾在罗瑟海特的黑耳先生工厂里生产火箭；进厂以前，因迫于贫困而盗窃在梅德斯顿监狱坐过五六个月的牢。下面就是他的证词的最重要部分的原话：

“我同黑耳父子认识是由科苏特先生介绍的。我因这件事同科苏特先生初次见面是在去年夏天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大约在 9 月中旬，我见到老黑耳先生在科苏特先生家里作客，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匈牙利人，是科苏特先生的副官。科苏特先生向黑耳先生介绍我说：‘这个人在匈牙利军队中服务过，当过普鲁士炮兵军官。我愿介绍他给您做工人，参加制造**我们的**火箭或**你们的**火箭’——我记不清他究竟说‘我们的’还是‘你们的’了。科苏特先生对我说，我每周工资 18 先令，并嘱咐我对这一切严守秘密；他说，黑耳先生会告诉我担任什么职务。科苏特先生有时说匈牙利语，有时说英语；黑耳先生大概不懂德语。‘严守秘密’这句话是用德语对我说的。不久以后，罗·黑耳派我到品

利科同科苏特先生见面，我就在皮克林广场会见了；威·黑耳和另外一个匈牙利人也在那里。我们当时是要试验火箭发射器。当我们大家都到齐了，发射器安装好了，我们就做了火箭试验。我们的谈话一部分是用英语，谈的主要是有关火箭质量等事。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当全部工作结束时，科苏特先生和黑耳先生要我们小心地、一个一个地走出去；黑耳先生在街道的一个角落同我们走到一起。科苏特先生在这次会面时再三嘱咐我们对同火箭的关系保守秘密。”

再往后是审问威·格斯拉赫先生，他也是德国人，口供通过翻译。他在黑耳先生的工厂里工作过，参加过制造火箭。除了他以外，还有 3 个匈牙利人那里工作过。他是科苏特先生介绍给黑耳先生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人在一起。

亨利先生当时可以有两种判决法：对被告处以 5 镑的罚款或者把案件转交陪审法庭。他选择了后一种，但是同意黑耳父子二人可以交保开释。威·黑耳先生说，他拒绝请任何一个朋友作他本人或他儿子的保人，因此他两人被押往马贩子街监狱。

很明显，上面所引用的证词显然同老黑耳先生的信（内容我已经向诸君报道过<sup>86</sup>）相矛盾，也同科苏特先生给梅恩·里德上尉和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的信相矛盾，科苏特先生在信里证明，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黑耳先生以及他的火箭的事情。不过，在科苏特先生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以前就从这里做出什么结论是不公正的。至于乌茨奈尔先生这样一个飘流异国的有才干的我国同胞、这样一个渴望劳动的人（他愿意每周拿 18 先令的工资当个普通雇工就证明了这一点），竟落到迫于极度贫困而偷窃的地步，而一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德国流亡者却胡乱挥霍贴补革命者的为数不多的金钱，作种种假借名义的传教旅行，进行种种可笑的密谋，举行各种酒馆 conciliabules（聚会），相形之下，难道不是

很可耻吗？

星期五（本月 22 日）在弗里布尔州（瑞士）又发生了暴动，这是自不久以前同宗得崩德<sup>87</sup>作战以来第五次暴动了。暴动本来要在整个州同时发起，但大多数暴动者在指定时刻都没有出动。三个答应参加暴动的“纵队”没有到行动地点。真正进了城的暴动者主要是法尔瓦尼区和奥提尼伊、普雷兹、多尔尼、米德等乡镇以及其他邻近地区的居民。早晨 4 点半，一个由 400 名农民组成的队伍（他们每个人都配戴了宗得崩德的标志，旗帜上绣着圣母像）沿着洛桑的大道向弗里布尔挺进。他们的首领是佩里埃上校和领导过 1851 年暴动、而后来得到议会特赦的著名农民卡拉德。5 点钟左右，暴动者从 Porte des Etangs（埃汤门）进入城市，占据了一所中学和一个军火库，在军火库夺取了 150 支枪。市议会接到警报后召集了会议，立即宣布紧急戒严。格伯克斯少校担任了召集起来的国民近卫军的指挥。他命令在中学背后的附近街道上架起大炮，同时指挥步兵队从正面进攻暴动者。步兵队攻克了通向中学的两层阶梯，迅速地击退了把守在窗口的农民。战斗继续了一小时左右，进攻者已经有 8 人阵亡，18 人受伤；在这个时候，暴动者由于想到建筑物后面的街道上隐蔽起来没有成功，他们在那里遭到了霰弹的射击，于是就派一个神甫打着白旗出来，表示愿意投降。

国民近卫军委员会立即组成了军事法庭，判处佩里埃上校 30 年徒刑。审判至今仍在进行。被捕者达 200 人，其中有乌伊勒、韦克和肯雷先生。有人在罗蒙门附近看到了波焦的某个委员会的主席沙尔先生，但是他没有被擒。除了来自多尔尼—勒—格朗的神甫以外，在被捕者当中还有两个神甫。至于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弗里

布尔州在这方面看来并不担心：因为没收贵族韦克先生财产的一半就足够补偿这些损失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3年4月26日和29日之间  
载于1853年5月14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3768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弗·恩格斯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sup>88</sup>

1853年5月1日于伦敦

从前的皇族通常都养有替挨打的孩子，这些孩子享有一种光荣的权利：每逢王孙公子违犯了某种规矩，他们就要拿出自己低贱的脊背来领取一定数量的鞭笞。欧洲现今的政治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它建立了一批小小的缓冲国，这些小国在发生任何细小纠纷，足以破坏和谐的“均势”的时候，都扮演着替罪羊的角色。为了使它们能够相当体面地担任这种不平常的角色，在“集聚一堂开会的”欧洲<sup>89</sup>的一致同意下，并通过十分隆重的仪式，宣布了这些小国为“中立”国家。希腊就是这样的替罪羊或替挨打的孩子；比利时和瑞士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些现代的政治替罪羊的特殊的地方，仅仅是它们由于生存条件不正常而很少受到完全不应该的鞭打罢了。

在这一类国家中，现在最典型的要数瑞士，

*Quidquid delirant reges, plectuntur……*

(不管暴戾的国王们做了什么事，遭殃的都是……)<sup>①</sup>

瑞士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民同统治者发生冲突，瑞士人都可

---

<sup>①</sup> 见贺雷西“书信集”第二册第二封信；这一行的终了是 *achivi*——亚该亚人。——编者注

以有把握地等着，他们那里也少不了麻烦，就这样一直弄到瑞士这个已经招来革命政党鄙视的国家在今年年初又被欧洲大陆的统治者视为异端而抛弃为止。瑞士在流亡者问题上同波拿巴皇帝发生冲突，一度几乎卷入战争；在纽沙特尔问题上同普鲁士发生冲突；在德森人和米兰起义问题上同奥地利发生冲突<sup>90</sup>；在什么人都不发生兴趣的问题上同一些德国小邦发生冲突；冲突简直四面八方都有。这些冲突，以及威胁性的照会、驱逐令、签发护照时阻挠、宣布封锁等等，就像冰雹一样落在不幸的瑞士的头上。但是，恐怕是人的天性吧，瑞士人仍然很幸福，很满意，仍然自有骄傲之处；他们感到处在这种被人嘲弄侮辱的冰雹之下，要比在政治地平线上万里无云的时候还要舒服。

对于瑞士的这种光荣的政治地位，欧洲舆论界有一句虽然有点含糊而粗鲁但是很能说明其特征的话：欧洲的统治者为了使共和政体丢脸，就制造出了一个瑞士。的确，梅特涅或基佐会一再这样叫嚷：如果没有瑞士，就应当造出一个来。对他们来说，瑞士这样的邻邦是一个真正的无意中的收获。

不要以为我们会重复真革命派或假革命派不久以前对瑞士和它的设施所提出的各种责难。早在1848年运动以前，德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就已经分析了这个问题，指明了为什么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瑞士会一直跟不上欧洲进步的脚步，为什么这个表面上一片共和主义气象的国家实质上总是反动的<sup>91</sup>。由于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共产主义政党的机关报当时甚至遭到各种民主空谈家和撰写华而不实的秘密作品的作者的猛烈攻击，他们把瑞士捧作他们的“模范共和国”，这样一直到他们亲自尝到瑞士的模范制度的滋味时为止。现在，这个道理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道理，

任何人都从来争论了，所以我们只要用几句话就可以把真实的情况说个清楚。

大部分瑞士居民非牧即农，在高山地区都经营畜牧业，在土壤适合耕种的地方都经营农业。牧民部落——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他们为部落——属于文明程度最低的欧洲人之列。即使他们在举行审判会时不像土耳其人和门的内哥罗人那样采取砍脑袋和割耳朵的办法，但行为野蛮的程度也并不逊色。在那不勒斯和其他地方的瑞士雇佣兵就充分证明了，瑞士人能干出怎样残暴凶狠的事情来。农民像牧民一样守旧，他们同美国西部地区的农民毫无共同之处；对于后者来说，只有变动，生活才有来源，这些农民每年都开垦出面积超过瑞士整个领土很多的耕地。瑞士农民耕种的还是从前他父亲和祖父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他们像祖辈父辈一样耕种得马马虎虎，收获的东西也差不了多少；他们的生活同祖辈父辈差不多，因此他们的想法也几乎完全一样。如果不是有封建义务，如果不是一部分由贵族世家、一部分由贵族的市镇公所向他们抽取捐税，他们在政治生活方面就会像他们的邻居——牧民那样守旧。瑞士人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工业居民，在文明道路上自然要比上述两个阶级前进得多；然而这一部分居民，由于他们生存的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不到现代工业体系对西欧所起的那种巨大的进步影响。在瑞士，人们几乎不知道利用蒸汽；大工厂仅仅在少数地方才有；人力便宜，人口稀少，适合修建磨坊的山地小河比比皆是，——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就促使瑞士建立与农业错综结合的小型分散的工业，这是对瑞士最适合的工业生活形式。例如，某些州的钟表工业和漆带工业以及稻草制品及刺绣品等等的生产很发达，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造成新的城市，甚至没有使现有

的城市有所发展。日内瓦和巴塞尔这两个最富裕、在工业方面最发达(还有苏黎世)的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扩展。因此,瑞士的工业如果还是几乎完全保持着蒸汽机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采用的那种形式,那末可以想见,在从事生产的居民的头脑中,除了适应这种水平的思想以外,就不会有其他任何思想。如果蒸汽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能够引起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改变吗?

匈牙利宪法和大不列颠宪法有某些相似之处,某些马扎尔政客曾经利用这种情况,企图以此为根据硬要我们匆忙做出匈牙利民族并不怎样落后于英吉利民族的结论。但是实际上,布达的小商人和郎卡郡的棉纺大王之间的距离,或匈牙利草原上的流浪镀锡工和英国工业中心的宪章派工人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千百哩,而且是千百年。同样,瑞士也很想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小美国。但是,如果撇开政治制度上表面的类似之处,恐怕再也找不到像美国和瑞士这样两个彼此极不相同的国家了。美国不断在发展,不断在变化,它是一个具有历史使命的国家,对于这个使命的规模,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到现在才开始窥见一些头尾;而瑞士却停滞着,如果不是邻邦的工业成就违反它的本意把它硬朝前推的话,那末,无休止的细小纷争归根到底会使它永远踏步不前。

对这一点还有怀疑的人,看一看瑞士铁路的历史就会相信了。如果没有从两侧纵贯瑞士南北的过境铁路,在这个国家里根本就不会修起一条铁路来。现有的铁路都是晚了20年才修建起来的。

1798年的法国入侵和1830年的法国革命,使瑞士农民得以摆脱封建义务,使工商业居民得以摆脱贵族和行会的中世纪的控制。有了这点进步,在州政方面的革命就算完成了。最先进的州都

取得了符合自己利益的宪法。州的革命又影响了中央机关——联邦议会和执行机关。在州里失败的政党在中央仍然很有势力，因而斗争又起。1840—1847年普遍的政治运动，在欧洲各地都引起了演习性的战斗，或者为决战准备了基础。由于大国竞争，这个运动在所有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里都使从性质上看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派得到了好处。当时瑞士的情况也是这样；英国从道义上支持，基佐迟疑不决，梅特涅的手脚又被意大利的困难局面拖住，所有这一切都帮助瑞士人顺利地渡过了同宗得崩德的战争。1830年在各个自由派的州里取得胜利的政党，这时就夺得了中央政权。1848年的革命使瑞士人得以改革他们的封建宪法，使宪法同大多数州的新的政治组织一致起来；所以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瑞士已经达到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一般所能取得的政治发展的顶点。瑞士联邦的新宪法是完全符合国家需要的；在币制和交通工具方面一直在进行的改革，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工业生活的立法措施，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可惜得很！换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要对这种改革感到羞愧，——传统的绊脚石是那样多，社会状态是那样原始，直到现在，一进行这些改革就暴露出来。

能够说明1848年瑞士宪法成就的，顶多不过是最文明的一部分瑞士人通过宪法的施行表达了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由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愿望。但是他们能不能摆脱有特权的商业公所、行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中世纪的宝贝呢？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国家的性质，只要一度看到过那些握有“既得权利”的尊贵人物是怎样死顽固地反对甚至最必要的改革，都会觉得很成问题。

因此，正当欧洲大陆以往的全部稳定局面都被1848年革命连

根摧毁的时候，自行其是的瑞士人仍然继续安静地生活在自家的小圈子里。巴黎、维也纳、柏林、米兰的革命，都成了他们进行州际摩擦的多种借口。欧洲发生大地震，甚至瑞士的激进派也只是觉得地震可以把他们的保守的邻居家的锅碗震碎，造成麻烦而已。在争取意大利独立的时候，撒丁曾经迫切要求同瑞士结盟，如果当时瑞士能出 2 万或 3 万人加入撒丁军队，那末毫无疑问，奥地利人很快就会被赶出意大利的。在那不勒斯有 15000 名瑞士人站在敌对意大利自由的一方作战，既然如此，瑞士为了维持它那大受称赞的“中立”，总该派出同样多的人去援助意大利人，但是关于结盟的建议被拒绝了，这样，在断送意大利的独立事业方面，瑞士人和奥地利的刺刀就起了同样的作用。此后，革命派连遭失败，意、法、德的流亡者全部涌向了中立的瑞士。但是这时中立已经完结，瑞士的激进派对于既得的成就已经心满意足，于是，那些使瑞士的监护人和天然统治者——大陆各国的专制政府——的力量受到牵制并使瑞士人得以顺利进行国内改革的起义者，现在在瑞士就遭到了种种欺侮，只要追捕者提出要求，就被驱逐出境。而在此以后，瑞士的邻国政府就一个接着一个向它施加了一系列的欺侮和凌辱；如果瑞士的民族性有点基础，如果瑞士的独立不仅是存在于传说和颂词中，那末每个瑞士人看到这种情况血液都会沸腾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民族遭到过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那些二流的德国小邦对瑞士的那种待遇。从来还没有一个国家面对着即使是减半的屈辱性的要求而不作决死抵抗。各邻邦政府竟敢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瑞士领土上行使警察权力，它们不仅对流亡者行使这种权力，而且对瑞士警察人员也行使这种权力。它们表示不满意瑞士的下级警务人员，要求把他们撤职；它们甚至暗示瑞士必须

修改某些州的宪法。而瑞士政府对任何无理要求都低声下气地作了回答。即使它在措词上有时带点抗议味道，那末也不必怀疑，它在实际上会用加倍的逢迎来弥补这一点。屈辱一个接着一个忍受，命令一个接着一个照办，直到欧洲对瑞士的普遍鄙视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直到瑞士所受的鄙视甚至超过了两个在“中立”方面同它不相上下的国家——比利时和希腊。而现在，在它的主要敌人奥地利向它提出的要求已经蛮横到甚至像德律埃先生这样脾气的政治活动家不稍作抗议都难以忍受的时候，瑞士在它给维也纳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决的照会中只不过是表演了一下它是如何卑屈而已。

瑞士在照会中痛骂争取意大利独立的战士们，其实这些人不仅根本没有表现过任何大逆不道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倾向，而且恐怕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希望意大利有甚至像瑞士现行的这种宪法；这些连马志尼的夸夸其谈都不敢学的人，瑞士在照会中竟然骂他们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和一切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当然，对马志尼使用的词句就更其凶狠了；然而大家知道，马志尼不管搞什么密谋和暴动，仍然和德律埃先生本人一样，是一个现代社会制度的维护者。因此，交换这些照会结果只弄明了一件事：在原则问题上，瑞士人已经向奥地利人让步。既然如此，又怎能指望瑞士人今后在实际事务中不向奥地利人让步呢？

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任何一个蛮横和强硬的政府都能从瑞士人那里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大多数瑞士人生活的孤立性，使他们根本感不到共同的民族利益。当然，同一个村庄、同一个河谷、同一个州的居民是同心合力的。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想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起来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共同目的而斗争。每一次外国入侵

时,情况只要一严重,例如在 1798 年,这个瑞士人就对那个瑞士人变脸,这个州就出卖那个州。奥地利人毫无理由地从伦巴第赶走了 18000 名德森人。瑞士人为这件事正在大吵大嚷,并且为自己受难的同联邦人发起募捐。但是,只要奥地利坚持自己的做法,不让那些德森人回去,那末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瑞士的社会舆论就要来个惊人的转变。他们对募捐将表示厌倦,并且会说德森人一向干涉意大利的政治,这是咎由自取;还会说德森人实际上不是瑞士联邦可靠的成员(Keine guten Eidgenossen)。别外还会说,被驱逐的德森人要散居到瑞士其他各州,会“夺去当地人的工作”。要知道,在瑞士的一个人不算是瑞士人,而算是这个州或那个州的当地人。当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这些威武的同联邦人会怎样发泄自己的愤恨,会怎样制造各种各样的倾轧来对付这些奥地利专制制度的受害者,这些德森州的瑞士人将怎样同逃到瑞士的流亡者一样,成为被仇视、被迫害和被诽谤的对象。这样,奥地利就将得到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还有很多额外的东西,奥地利一要就会到手。

到欧洲各民族能够自由而正常生活的时候,它们就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处置这几个在反革命得胜时期对反革命曲意逢迎,对任何革命运动都采取中立的甚至敌对的立场,同时还冒充为自由独立民族的小小的“中立”国家。不过恐怕不到那个时候,病体上的这些赘瘤就连影子都没有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4 月 26 日左右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5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7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卡·马克思

###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sup>①</sup>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 [contact of extremes] 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sup>92</sup>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 10 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

---

<sup>①</sup> 黑格尔。——编者注

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同时，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在 1830 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可是从 1833 年起，特别是 1840 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是这样多，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可是，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

中国过去输入的英国棉织品数量很小，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自 1833 年起，当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手中

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项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 1840 年起这项输入增加得更多，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痛苦，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

中国在 1840 年战争<sup>93</sup>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例如，1853 年 1 月 5 日皇帝<sup>①</sup>在北京颁发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南方各省、武昌、汉阳的总督和巡抚减轻税捐，允许缓交，首先是绝对不要额外再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sup>②</sup>

记得在 1848 年，在奥地利这个日耳曼式的中国，我们也听到过同样的话，看到过同样的让步。

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 1840 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

① 咸丰。——编者注

② 见北京图书馆藏“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原刻本卷一，第十一页。——译者注

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

我们时常提起读者注意不列颠的工业自 1850 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当时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sup>94</sup>，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末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末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在 1833 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是 60 万英镑，而 1836 年达到了 1326388 英镑，1845 年增加到 2394827 英镑，到 1852 年便超过了 300 万英镑。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 1793 年还不超过 16167331 磅，然而在 1845 年便达到了 50714657 磅，1846 年是 57584561 磅，现在已超过 6000 万磅。

目前这一季茶叶的收集量看来也不少。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它比去年增加 200 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 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加到了 1852 年的出口量上；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不列颠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现存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市场。可是讲到以后的茶叶收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可

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恐慌达到了极点。黄金价格上涨 25%，而且人们还加紧收进，贮藏起来。白银奇缺，甚至不列颠轮船向中国缴纳关税用的白银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作担保，说一俟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保证的有价证券，便缴纳这笔关税。从商业急需的角度来看，金银的缺乏是最不利的条件之一，因为金银恐慌恰恰是发生在急需它们的时候。茶丝收购商没有金银便不能到中国内地去采购，因为要采购就要预付大量现洋，以便使生产者能够完成自己的生产…… 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家不讲别的问题，只是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因而一切事务都陷于停顿…… 要是不采取措施在四五月间把茶叶收集起来，那末，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毁掉。”

当然，停泊在中国领水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哪一支都不能保证收集茶叶所需的资金，但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轻易地引起乱子，打断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事务联系。由此看来，要完成目前这一季的茶叶收集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敦投机生意已经开始了，——而要完成下一季的茶叶收集，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一定会产生巨额赤字。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现有的全部货物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各国的居民在担心发生大变动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丝和茶贮存起来，非现洋不卖。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最主要市场之一大大缩小。甚至“经济学家”这个一向以乐观面目出现，用咒语驱走一切足以使重商社会人心不定的东西的杂志，也不得不说出以下的话：

“我们不当自欺，以为我们可以在中国为自己的出口货找到以前那样

大的市场……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需要量要减少。”

不应当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缩小的时候，正是西欧发生歉收，从而使肉类、粮食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将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就要相应地减少。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不好。“经济学家”杂志说：

“在英国南部，不仅有许多田地的庄稼种不上去，以致最后想种什么都来不及，而且有许多已经播种的田地看来也将是满地杂草，或者是根本不适于庄稼生长。麦田的土壤阴湿贫瘠，显然预示着歉收。现在，播种饲用甜菜的时节可以说已经错过了，种上的很少；翻耕土地种植饲用芜菁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没有完成任何一项必要的准备工作来栽植这个主要的作物……雪和雨严重地阻碍了燕麦的播种。早播的燕麦种的不够，晚播的燕麦又很难有好收成……许多地方种畜大量死亡。”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 20%、30%、甚至 50%。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整整涨了 100%，小麦和其他谷物作物也跟着涨价。

既然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列颠的工商业又已经经历了通常的一个经济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场面：中国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动乱，但西方列强则借助于英法美等国的军舰在上海、南京和运河口建立“秩序”。这些往外输出“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

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这个国家<sup>95</sup>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欧洲各国从十七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也只限和行商进行交易；政府特许这些商人有做洋货生意的特权，用这种方法阻止其余的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接触。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的任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带有暴力的性质，并且延长商业的停滞时期。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在印度的不列颠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不列颠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不错，中国人不愿戒吸鸦片大概同德国人不愿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新皇帝颇有意在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立刻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有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终有一天，这种打击的影响会充分地显示出来，并且使普遍的财政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这种危机我们在前面已经预测过了。

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

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各国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正在一步步紧张,以致非动武不可,非诉诸国君的 *ultima ratio* (最后论据) 不可。在欧洲各国首都,现在每天传来的消息全是关于大战爆发的传闻,过一天又换一套,说和平可以保障一星期之久,或大约一星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相信,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界上空的乌云怎样浓重,无论某个国家的某个狂热家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一旦空气中散发出经济繁荣的气息,国君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欧洲,这种危机的到来总是由英国先发信号,因为它是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现在,英国工厂的数目空前增加,而它的官方的政党都正在完全腐烂下去,法国的全部国家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进行投机活动的交易所康采恩,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积聚得到处皆是不公平现象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将会怎样,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5 月 20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6 月 14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94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卡·马克思  
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  
国债条款变更。——印度。  
——土耳其和俄国<sup>96</sup>

1853年5月24日星期二于伦敦

荷兰由于不久以前国会解散而举行的大选，现在已经结束了。选举结果，极端新教派和保皇派的内阁以 12 票取得了多数。

丹麦现在反政府的小册子到处都是，其中最主要的是格隆德威格先生写的“向丹麦人民说明议会解散的原因”，以及一篇匿名作者写的抨击作品，标题为“关于丹麦王位继承问题的争论，或欧洲列强应当做些什么”。这两本小册子的目的都是要证明，如果实行内阁的主张，执行伦敦议定书的规定，废除先前的王位继承法，国家就会灭亡，先变成霍尔施坦公国的一个省份，然后，沦为俄国的藩属。

由此可见，丹麦人民大概终于认识到，他们盲目反对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 1848 年提出的独立要求，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丹麦人民曾经坚持要保持丹麦和霍尔施坦的永久联合，为此还对德国革命宣战；由于赢得了战争，就保住了霍尔施坦。但是现在，丹麦人民对这个战果却不得不付出祖国沦亡的代价了。在 1848—1849 年间，“新莱茵报”曾不断警告丹麦民主派注意

他们对德国革命抱敌对态度会招致什么后果<sup>97</sup>。“新莱茵报”曾一再毫不含糊地预言，丹麦帮助别人来解除外国革命的武装，就是把自己永远同这样一个王朝联在一起，这个王朝当它的王位继承制度合法化和被丹麦人自己批准的时候，就会把丹麦人的民族独立交给俄国沙皇 *bon plaisir* (随意处置)。丹麦民主派拒不听从这一劝告，他们的近视和轻率现在正招来波希米亚<sup>①</sup>的斯拉夫人所遭到的恶果，后者为了“保持自己对德国人的民族独立性”，曾经一拥而上地投入对维也纳革命派的杀伐，反对了唯一有可能使他们摆脱他们所仇视的德国专制制度的人，即维也纳革命派。这个事实，现在对这两个被反革命唆使而投入自杀性战争来反对革命事业的民族来说，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吗？

现在，当格莱斯顿提出的缩减国债的计划已在议会通过，正在受实践检验的时候，他的拥护者（恐怕伦敦的所有报刊都曾经极为欣赏这个出色的计划）却马上沉默了下来。格莱斯顿提出的5亿英镑三厘证券的三项自愿转换办法，结果都成了渺茫的愿望，接受其中任何一个办法的人都少得不值一提。至于南海公司证券的转换，截至5月19日晚为止，总数1000万英镑的证券换成新的有价证券的一共只有10万英镑。根据一般的规律，像这样的业务如果不在头几个星期内就完成，那末以后就越来越没有可能实现。此外，利率涨得虽然慢，但是却一直上涨。因此，认为总数1000万英镑的旧有价证券会在规定时期内兑成新的有价证券，恐怕估计得过高了一些。但是，即使情况是这样，格莱斯顿先生也得付给不愿意换新的有价证券的南海公司证券持有者800万英镑。格莱斯顿先生

---

<sup>①</sup> 即捷克。——编者注

所掌握的应付这种情况的唯一的一笔基金，是英格兰银行中的总数约八九百万英镑的国家预算资金。但是，这笔资金不是收入超过支出所产生的结余，而仅仅是在支出以前的几个月暂时存入银行里的一笔国家收入。因此，格莱斯顿先生将来早晚有一天会遭到很大的财政困难，这种困难同时会在银行金融业务中和整个金融市场上引起极为严重的混乱。除此以外，由于粮食收成可能很坏，还会促使相当多的黄金外流。

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到 1854 年就要满了。约翰·罗素勋爵在下院宣称，将在 6 月 3 日由查理·伍德爵士出面，宣布政府对此后印度管理问题的打算。某些内阁报纸正在暗示公众说，甚至这一个巨人般的印度问题，也已经被联合内阁几乎缩成了一个侏儒，——这样就证实了公众中流传的可靠传闻。“观察家报”<sup>98</sup>正在使英国人民对一次新的失望做思想准备。在这家不公开的阿伯丁的机关报上，我们读到：

“在我们的东方帝国的新的管理机构方面，要做的事远远少于人们通常的预料。”

罗素阁下和阿伯丁阁下要做的事甚至比预料的还要少得多。

在联合政府打算进行的改革当中，看来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两项无关重要的事情：第一，董事会将补充几名由国王直接任命的 new 董事，加以“革新”，但是，即使这一份鲜血，也将“在最初时期很节省地”添进去。这就是说，他们治疗旧董事制度的溃疮的办法，就是使现在“极其谨慎地”注入的那一份鲜血在完全停滞之后再注入第二份。第二，将取消法官和税务检查官的职务由一人兼任的做法，并且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许担任法官。大家听到这类主张的时候，是否感到回到了中世纪初期呢？在那封建男爵担任的审判官职

务刚开始由法官代替的时候,不也是要求这些法官至少要会读会写吗?

将要以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身分提出这样一个模范改革计划的“查理·伍德爵士”不是别人,他就是在上届辉格党政府时期表现出非凡的智力,以致联合内阁十分为难,不知道怎样安插他,幸而灵机一动,让他担任印度的领导的那位木头[timber]<sup>①</sup>先生。理查三世曾经要王国骑马走,而联合内阁却给王国找了一头驴子。的确,如果这种寡头政府的官式的愚昧无知说明了英国现在有什么能力,那就是说,英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曾不止一次看到,无论什么措施,即使是无关紧要的措施,联合内阁也总是要找各种便宜的借口拖延下去。现在,它的这种一贯的拖延作风在印度问题上得到了两个国家的社会舆论的支持。英国和印度的人民同时要求联合内阁在印度问题上延期采取任何立法步骤,要等印度居民的意见,要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要等业已开始的调查工作完成。印度的三个管区反对匆忙<sup>98</sup>颁布新法律的请愿书已经送到了唐宁街<sup>99</sup>。曼彻斯特学派成立了“印度协会”<sup>100</sup>,协会要立即在首都和全国各地组织群众集会,反对在本届议会会议期间颁布任何有关印度问题的法律。此外,议会中现在还有两个专门委员会正在准备关于印度管理情况的报告。但是联合内阁这一次却铁面无情,它不愿等到任何委员会发表意见的时候。它想立即直接地颁布用于 15000 万人的法律,并且这些法律一下子就管 20 年。查理·伍德爵士一心渴望享有现代摩挲的声誉。我

① 俏皮话:《wood》(伍德)意为“木”;《timber》意为“木料”。——编者注

们这些“谨慎的”政界老朽究竟为什么突然地这样匆忙起来，突然表现出这样的立法热情呢？

他们想要把旧特许状的有效期再延长 20 年。他们的做法是老说什么大家希望进行改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英国政治寡头预感到他们的光荣统治的末日即将到来，他们有一种很可以理解的愿望，即想同英国的立法机关订一项合同，有了这项合同，即使不久以后英国摆脱了他们的无力然而贪婪的手掌，他们和他们的同伙在印度的特权也可以再保持整 20 年。

上星期六从布鲁塞尔和巴黎拍来了几份报道君士坦丁堡 5 月 13 日消息的急电。接到急电后，在外交部立即举行了一个历时三个半钟头的内阁会议。当天，就向朴次茅斯海军司令部发去电报，命令派 90— 炮式“伦敦号”和 71— 炮式“圣帕赖号”两艘蒸汽巡航舰从斯比特海德开赴地中海。21— 炮式“海弗拉尔号”和 16— 1 炮式“奥登号”两艘蒸汽巡航舰也同时接到了开赴地中海的命令。

这些急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使大臣们这样突然地积极起来，并且打破了英国一向昏沉沉的安静状态呢？

大家知道，关于圣地问题已经做了有利于俄国的解决<sup>101</sup>；俄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大使都保证俄国并没有别的企图，它只是要求承认它在这些圣地的主要地位。俄国外交目的的狭义性质并不亚于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和狮心理查。至少“泰晤士报”是这样说的。

“辩论日报”<sup>102</sup>报道说：“5 月 5 日，俄国蒸汽巡航舰‘贝萨拉比亚号’从敖德萨开来，乘坐该舰的是一名上校，给缅施科夫公爵送来了急电；到 5 月 7 日星期六那天，公爵就向土耳其大臣们递交了一份协议或专门条约的草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企图。这一文件被称为最后通牒，因为它还附有一份很

简短的照会，照会指出土耳其御前会议接受或拒绝这一文件的最后期限是5月10日即星期二。照会最后几句话大致是这样：‘如果土耳其政府复照拒绝，皇帝将不得不认为这一行动是对他本人和对俄国完全缺乏尊敬的表示，并且将对这一消息深表遗憾’。”

这一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保证俄皇对土耳其政府治下的所有正教臣民的保护权。根据十八世纪末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sup>103</sup>，在君士坦丁堡应该建造一座正教教堂，而且俄国大使馆有权干预正教教堂的神甫同土耳其人的争端。阿德里安堡条约又重申了这项特权。但现在缅施科夫公爵却想把这项不平常的特权变成对土耳其整个希腊正教教会的普遍保护权，即对欧洲土耳其的大多数居民的普遍保护权。此外，缅施科夫还要求君士坦丁堡的、安提奥克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耶路撒冷的所有总主教和大主教享有常任权，只要他们没有被发现犯叛国罪（反对俄国人）；而且，即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免职，也要得到沙皇的同意。换句话说，缅施科夫是要苏丹<sup>①</sup>放弃自己的主权，使俄国得利。

星期六的电讯是这样：一、缅施科夫公爵同意把答复他的**最后通牒**的期限延长到5月14日；二、土耳其内阁成员有变动，俄国的对头列施德—帕沙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而傅阿德—埃芬蒂复任大臣之职；三、**俄国的最后通牒已被拒绝**。

就算是俄国已经获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它也不能向土耳其提出这样一些过分的要求。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俄国是如何顽固地坚持着它的已经根深蒂固的打算，证明了欧洲每一次反革命的王位虚悬时期都会给予它向奥斯曼帝国勒索让步的权利。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从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时候起，欧洲大陆上的倒退

<sup>①</sup> 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运动也总是意味着俄国向东方的扩张。但是现在俄国却弄错了，它把欧洲的现状同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以后的欧洲局势，甚至同提尔西特和约以后的欧洲局势混淆了起来。现在，俄国本身害怕革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大战都会引起革命）要比苏丹害怕沙皇的进攻厉害得多。如果其他大国抱坚定的态度，俄国就会后退，以保持面子。不管怎样，俄国最近所耍的手腕，至少对从内部瓦解土耳其的那些因素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唯一的问题是：俄国现在是按照自由的意志行动呢，还是不由自主地只是新天命——革命——的不自觉的奴隶？我相信后者。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5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6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9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马志尼。——瑞士和奥地利。  
——土耳其问题

1853年5月27日星期五于伦敦

马志尼先生正在英国居留这件事，现在终于被一家同他有联系的伦敦报纸发表的一个准官方消息所证实。

黑耳先生父子的“火药阴谋”案件，本届陪审法庭将不予审理，而被移到8月去了，这是因为联合政府渴望在它作了“揭发”以后，到举行法庭辩论判明这种“揭发”的价值之前，要过上一个时候，使这些“揭发”被人淡忘。

奥地利驻伯尔尼代办卡尔尼茨基伯爵于5月21日接到本国政府命令，要他向瑞士联邦主席宣布断绝奥瑞外交关系，然后立即离职回维也纳。但是5月23日的“联邦报”却说，奥地利的使节早就获准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离开瑞士。这家报纸把卡尔尼茨基伯爵的最后通牒说成是奥地利对联邦委员会5月4日照会的答复。实际上，最后通牒的内容要比普通的答复更多一些东西，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来，即联邦委员会近日曾要求弗里布州政府就它不久前对溃败的暴动分子采取的“非常”措施作出解释。英国各报都刊登了5月23日发自伯尔尼的这样一个消息：

“由于奥地利代办向瑞士联邦主席宣布了断绝奥瑞外交关系，联邦委员

会决定立即停止瑞士驻维也纳的使节的活动。”

但是，“瑞士报”发表的一篇写于5月23日的文章则把这个消息的内容作了更正：

“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大致和皮蒙特一样<sup>104</sup>。奥瑞两国的谈判中断了……奥地利外交使团仍然留在伯尔尼执行日常事务。‘联邦报’说，召回瑞士驻维也纳代办的做法是适宜的，因为他以进行国家事务为借口在那里安然地干自己的私人营生，专门作绸缎生意。施泰格尔先生是一个二等外交官，谁都知道，他对养蚕倒比他对委托给他的公事知道得多得多。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得到任何特殊权利而一向在维也纳独行其是的外交官，本来就毫无召回的必要。”

所以，希望谁也不要认为瑞士人记起了1789年路斯达洛用来装饰自己的报纸“巴黎革命”<sup>105</sup>的那句名言：

Les grands ne sont pas grands,  
Que parce que nous sommes à genoux,  
—— Levons nous!<sup>①</sup>

瑞士表现了勇敢精神的秘密，可以从热那亚公爵访问巴黎和比利时国王<sup>②</sup>访问维也纳这两件事情上，同时恐怕也可以在不小程度上从法国报纸“通报”5月25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说明。文章说：

“任何国家都不应当干涉法国同瑞士的关系，一切其他的想法在这种主要情况面前都应当退让。”

由此可见，普鲁士国王收回纽沙特尔的企图是得不到很大赞同的。而且，现在还盛传法国正在瑞士国境线上建立监视军。路

---

① 有些东西我们所以觉得伟大，  
只不过因为自己跪在地下。  
—— 让我们站起来吧！—— 编者注

② 列奥波特一世。—— 编者注

易—拿破仑如果有机会报复一下俄皇、奥皇、普鲁士国王和比利时国王最近几个月内对他的蔑视<sup>106</sup>，自然是非常乐意的。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报道的君士坦丁堡已拒绝俄国的最后通牒和组成反俄内阁的消息<sup>①</sup>，已经被完全证实。5月17日君士坦丁堡发来的最近消息说：

“列施德—帕沙上任后，要求缅施科夫公爵延期6天。缅施科夫声称外交关系已断，表示拒绝，接着又说，他在君士坦丁堡将再停留3天，以便做好一切必要的回国准备；他请土耳其政府好好考虑一下形势并且利用他暂停回国的这段不长的时间。”

根据5月19日君士坦丁堡发来的消息，我们进一步了解到：

“5月17日举行了御前会议，结果断然决定不能接受缅施科夫公爵所建议的条约。缅施科夫得悉此事后，仍然没有离开君士坦丁堡。相反地，他已着手和列施德—帕沙重开谈判。俄国使团没有再规定回国的日期。”

与这个消息相反，法国政府机关报——“祖国报”（晚报）<sup>107</sup>肯定地声称，政府已获悉缅施科夫公爵乘船去敖德萨，而且这一事件在君士坦丁堡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国家报”证实了这段话的正确性，但“新闻报”<sup>108</sup>却否定了它。不过，日拉丹又补充说，即使这些消息可靠，那也可以很容易地加以解释。

“如是缅施科夫公爵确实已乘船离比尤克德列<sup>109</sup>去敖德萨，那末问题就是，他由于没有达到完成自己使命的目的（manqué son effet），因此别无他着，只好做出访问一个港口以后再访问另一个港口的样子，溜之大吉。”

某些报纸断言，德拉修斯海军上将的舰队已经驶过达达尼尔海峡，现在正停泊在金角港。但是，这种说法却被“晨邮报”否定。“的里雅斯特报”极力要读者相信，土耳其政府在把答复递交缅施科夫公爵以前，曾询问过雷德克利夫勋爵和戴拉库尔先生，问

① 见本卷第122页。——编者注

他们土耳其政府最后是否可以指望他们的支持。“泰晤士报”则郑重地否认了这一点。

我现在特寄去巴黎“世纪报”<sup>110</sup>上的一段文章的直接译文，在这段文章中，有一些关于从5月5日到5月12日君士坦丁堡谈判的很有意思的细节。它如实地表明了缅施科夫公爵的行为是如何可笑，这位公爵在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出那种北方的野蛮作风和拜占庭的两面手法的极其可恶的结合，从而非常成功地使俄国成了欧洲的笑柄。这位《grec du Bas-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竟想只通过舞台效果去夺取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俄国除了从列强地位向可笑地位迈进一步别无他法——这是只有用血才能洗掉的耻辱。但现在是在进行交易所投机活动的金融寡头的时代，已不是骑士竞技的时代了。“世纪报”上的那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5月5日，星期四，法国邮船开走那天，土耳其政府把苏丹关于圣地问题的敕令副本分别送交戴拉库尔先生和缅施科夫公爵。这一天不见缅施科夫公爵有任何声明和举动就过去了；于是所有各国大使都推测问题已经解决，想趁法国轮船开走之便向本国政府发出关于事情已有转机的报告。可是，缅施科夫公爵接到关于圣地问题的敕令后，到半夜的时候派了一个普通卡瓦斯（宪兵）给外交大臣<sup>①</sup>送去一份最后通牒，要求签订解决圣地问题的条约，条约还要预先为希腊正教会的特权和不受侵犯作出保证；换句话说，就是要求确立俄国对正教教会的最广泛的保护权，这就等于要求在土耳其有两个皇帝，一个是穆斯林的苏丹，另一个是基督徒的沙皇。公爵给土耳其政府一共4天的期限来答复这一最后通牒，同时还要求由政府官员立即证明已经收到了最后通牒。外交大臣通过他的一个阿加（低级宪兵军官）给缅施科夫公爵送去了一份类似收据的东西。当天夜里，这位公爵把轮船派到了敖德萨去。

<sup>①</sup> 里法特—帕沙。——编者注

到5月6日，星期五，当苏丹知道了用这种奇怪方法递来最后通牒的事情以后，就召开了御前会议，并把这件事正式通知给雷德克利夫勋爵和戴拉库尔先生。两位大使立即约定共同行动，建议土耳其政府拒绝这一最后通牒，同时在措词上要保持最大的慎重。此外，正如人们所肯定的那样，戴拉库尔先生十分明确地声明，在圣地问题方面，法国将反对任何侵犯它根据1740年条约而得到的权利的协议。这时，缅施科夫公爵已跑回比尤克德列去了（像阿基里斯跑回自己的营幕那样）。5月9日，坎宁先生表示希望同公爵会晤，打算促使他采取比较温和一些的行动。公爵拒绝了。5月10日，陆军大臣<sup>①</sup>和外交大臣在总理大臣<sup>②</sup>那里，总理大臣邀请缅施科夫公爵到他那里去，共同筹划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的办法。公爵又拒绝了。然而，缅施科夫公爵仍向土耳其政府示意，他愿意再给它延长3天期限。但是苏丹和他的政府回答说，他们也已作出了决定，时间并不能改变这些决定。土耳其政府的这一否定回答于5月10日午夜送到比尤克德列；整个俄国使团人员都集合在那里，并在最近好几天中都做出准备离开的样子。土耳其政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几乎已准备让步，但是苏丹要它辞职，并且组织了新的政府。”

现在，我从“立宪主义者报”摘录一段文章来结束我关于土耳其情况的报道，这段文章描述了希腊正教教会在这类谈判期间的情况：

“对这个问题有那么大关系的希腊正教教会赞成 *status quo*，即赞成土耳其政府。他们 *en masse*（绝大多数）都表示反对俄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种保护权。正教居民一般都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即他们不受俄国的直接统治。他们甚至一想到源出东正教教会的俄国教会将来有一天居然会统辖东正教教会就极为不快，但是，彼得堡当局的方案如被接受，这种局面是必定要出现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5月27日  
载于1853年6月10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3791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① 穆罕默德-木特尔晋-帕沙。——编者注  
② 穆罕默德-阿利-帕沙。——编者注

卡·马克思  
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  
——俄国的扩张

1853年5月31日星期二于伦敦

在比斯开湾，发现科里海军上将的分舰队正开往马尔他，去那里加强邓达斯海军上将的分舰队。关于这件事，“先驱晨报”公正地指出：

“如果在几个星期以前能够让邓达斯海军上将到萨拉密斯附近和法国舰队会合，那末，现在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如果俄国企图以实际的军事行动来支援缅施科夫的可笑的示威行动（哪怕仅仅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那末，它的第一个行动很可能就是再一次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侵入阿尔明尼亚的卡尔斯省，侵入巴士姆港。这些地方，俄国远在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的时候，就曾千方百计地力图弄到自己手里。由于巴士姆港是黑海东部的唯一可靠的安全港口，所以，如果俄国占领了它，土耳其就会丧失自己在欧克辛海的最后一个海军基地，欧克辛海就要变成纯粹俄国的海。如果俄国占领卡尔斯——阿尔明尼亚的最富庶、农业最发达的地方，同时再占领巴士姆，那末，它能够切断英国和波斯之间通过特拉比曾德的贸易，并且还能为自己建立一个既能对付英国又能对付小亚细亚的作战基地。即使如此，如

果英国和法国能持强硬态度，尼古拉就很难在这一地区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就要碰到当年叶卡特林娜女皇在同阿加—穆罕默德斗争时碰到的命运，那时，阿加—穆罕默德曾经命令他的奴隶们用鞭子把俄国大使沃依诺维奇和他的随从赶出阿斯特拉巴德，迫使他们坐船逃走。

最近的一些消息在印刷所广场引起的慌乱，比任何地方都要大。“泰晤士报”在可怕的打击之后，为了恢复常态，首先就来拚命抨击电报，说它是一个“完全失效了”的机器。“泰晤士报”大叫：“从这些不真实的电讯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它用这种办法把自己做了不正确结论的责任都推给电报线以后，就用大臣们在议会里所用的辞句，企图和它自己先前的那些“正确”前提划清界限。“泰晤士报”声称：

“不管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命运怎样，更确切点说，不管统治了这个帝国已有四个世纪的伊斯兰教政权的最终命运怎样，英国和整个欧洲的所有政党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这就是：当地的基督教居民逐步向文明、向独立治理进展，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些民族沦于俄国的铁蹄之下，使俄国的巨大领土更加扩大。我们深切地希望，不仅土耳其，而且全欧洲都来抵抗俄国的这种野心；我们希望，只要俄国的这种兼并和扩张的意图真正表现出来，马上就引起普遍的反感和不可遏止的反抗，土耳其的希腊族和斯拉夫族的臣民也是决心积极参加这种反抗的。”

那末，可怜的“泰晤士报”那时怎么就相信了俄国对土耳其抱着“善良愿望”和它对一切扩张都抱“反感”呢？俄国对土耳其竟然抱着善良的愿望！彼得一世早就盘算过在土耳其的废墟上放上自己的宝座。叶卡特林娜也曾一再开导奥地利，劝说法国，一同来瓜分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以她孙子<sup>①</sup>为首的希腊帝国，而

<sup>①</sup> 康斯坦丁。——编者注

且还胸有成竹地让她的孙子受了相应的教育，甚至给他取了相应的名字。现在，比较稳健的尼古拉只是要求承认他是土耳其的**唯一的保护人**。但是所有的人都记得，俄国做过波兰的**保护人**、克里木的**保护人**、库尔兰的**保护人**、格鲁吉亚和明格列里亚的**保护人**、切尔克斯和高加索各部族的**保护人**。现在它又要当土耳其的保护人了！为了说明俄国对扩张所抱的“反感”，让我从俄国自彼得大帝那时起抢夺领土的许多事实当中举出几件材料罢。

俄国边界向外伸展的情况是：

往柏林、德勒斯顿和维也纳方向伸展 …… 约 700 哩  
往君士坦丁堡方向 …………… 约 500 哩  
往斯德哥尔摩方向 …………… 约 630 哩  
往德黑兰方向…………… 约 1000 哩

俄国从瑞典手里获得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获得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属地）；在亚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在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在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等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俄国最近 60 年来所获得的领土，从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5 月 3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6 月 14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794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  
——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sup>111</sup>

1853年6月7日星期二于伦敦

据伯尔尼消息，联邦委员会撤销了弗里布尔州军事法庭对不久前暴动参加者的判决，并且建议：如果州委员会不予赦免，就将该案移交普通法庭。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在“瑞奥关系决裂”时采取的第一个英勇行动。关于这次决裂的必然后果，我在前面一篇论述这个欧洲的“模范共和国”的文章中已谈过了<sup>①</sup>。

我在转述关于普鲁士政府命令在国外休假的一些炮兵军官速返职守的消息时，误写了他们在俄国军队中任教官，而我的本意是想说，他们在土耳其炮兵中任教官，指导野战训练<sup>112</sup>。

住在巴黎的所有俄国将军和其他俄国人，都接到了速返俄国的命令。俄国驻巴黎公使基谢廖夫先生说话很带威胁性，并且耀武扬威地出示彼得堡的信件，这些信件对土耳其问题的谈法 *assez — cavalièrement* (非常骄横)。从这里就产生一种传言：似乎俄国要求波斯让出里海东南岸顶端的领土和阿斯特拉巴德城。同时，俄国商人正向他们驻伦敦的代理人发出——或者，像消息所报道的，已

<sup>①</sup> 见本卷第124—125页。——编者注

经发出了—— 指示：“目前谷物不要急于求售，因为战争威胁迫在眉睫，谷价看涨。”最后，所有报纸都神秘莫测地暗示：俄国军队正开赴边境；雅西居民筹备欢迎；俄国驻加拉兹领事采购大批圆木，以备在多瑙河上架设桥梁之用；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由“奥格斯堡报”<sup>113</sup>和其他亲奥、亲俄的机关报煞费苦心编出来的谣言。

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大堆类似的新闻、报道等等，都不过是俄国代理人的可笑企图。他们想使西方世界产生一种能对俄国有利的恐惧心理，迫使西方世界继续执行拖延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掩护之下，俄国就可以像过去一样实现它在东方的计划了。这一幕骗局是怎样系统地演出的，从以下可以看到：

上星期，某些公开接受俄国津贴的法国报纸作出了这样一个发现：

“实质上，与其说是俄土之争，倒不如说是彼得堡和莫斯科即沙皇和旧俄派之争；对专制君主来说，宣战的危险性，比遭到坚决要求攻城略地的党派的报复，要小得多，这个党派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它会如何对待它所不乐意的君主。”

不言而喻，缅施科夫公爵就是“这一党派的首领”。“泰晤士报”和多数其他英国报纸马上就接着宣扬这一荒谬的论断，它们当中有一些完全了解这种说法的真意，有一些可能是无意受骗。但是从这个新发现中公众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或者是，尼古拉在众口嘲笑之下后退，放弃他对土耳其的好战的做法，那末，他就是战胜了本国好战的旧俄派；或者是，尼古拉真的开战，那末，他这样做只不过是由于必须向这个（故事中的）党派让步罢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只是莫斯科战胜彼得堡或彼得堡战胜莫斯科的问题”，因而不会是欧洲战胜俄国的问题。

至于著名的旧俄派，我曾偶然地从一些在巴黎与我常相往来的非常熟悉情况的俄国贵族出身的人那里听到，这个党派早就完全消失了，只是当沙皇要找一个恐吓西欧的稻草人迫使西欧容忍他的苛求时，才偶尔把这个党派的阴魂招来用一下。他们都说，现在所以把缅施科夫挖掘出来，给他穿上故事中的旧俄服装，就是为了这个。实际上，沙皇所担心的只是俄国贵族中的一个党派，即想按照英国的样式建立贵族立宪制度的党派。

为了欺骗英国和法国，俄国外交除了招来形形色色的阴魂之外，最近又采取了另一措施：出版了波蒙—瓦西子爵所写的一部著作，书名是“**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俄罗斯帝国**”<sup>114</sup>。要介绍这本 opusculum (小册子)，只从里面引这样一段就够了：

“大家知道，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地下室内存有硬币和金银锭的储备。截至1850年1月1日，这一**秘密金库**据官方估计为99763361银卢布。”

有谁想到过谈论英格兰银行的**秘密金库**吗？俄国的“秘密金库”不过是用来担保三倍于此数的**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此种纸币可**换取贵金属**，至于不能换取贵金属的、国库发行的有价证券构成的“秘密”准备金的存在，那就不用说了。不过，有可能这种金库确实可以称为“秘密的”，因为除沙皇政府每年任命几名彼得堡商人来检查他所存的钱袋之外，至今还没有人看见过。

但是，俄国按照上述精神而要的主要的花招，是在“**辩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由老奥尔良派贤人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署名的文章。现在我引证一段：

“我们认为，现在欧洲有两个大危险，一个是威胁它的独立的**俄国**，一个是威胁它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欧洲只有完全投入一个危险，才能避免另一个危险……如果欧洲认为，它的独立，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独立的关键在君士

坦丁堡，正是在君士坦丁堡要表现出勇敢大胆精神来解决问题，那末，这就意味着跟俄国开战。法国和英国在这个战争中就是为保障欧洲独立而战。德国将如何行动呢？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欧洲形势下，战争就意味着社会革命。”

不言而喻，圣马尔克—日拉丹先生是不惜任何代价要和平因而反对社会革命的。但是他忘了俄国皇帝对这种革命感到的“恐慌”，至少也同他本人及其东家贝坦先生一样。

尽管俄国外交给英国报界和英国人民送上了上述种种麻醉药，但“老顽固”阿伯丁仍然不得不向海军上将邓达斯发出了到土耳其沿海与法国舰队会合的命令。即使是最近几个月来只会用俄文写字的“泰晤士报”，看起来也充满了更多的英国感情。它现在也开始用极端骄横的口气说话了。

丹麦问题（过去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在英国开始引起极大的注意，因为英国报界终于了解到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同东方纠纷的根源一样，都是俄国的扩张意图。土耳其和东方制度的著名崇拜者，议员乌尔卡尔特先生出版了一个论述丹麦继承权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我将在今后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sup>①</sup>。这一著作的主要论据是指出：俄国的意图是想使松德海峡在北方所起的作用，正同达达尼尔海峡在南方一样，就是说，力求利用松德海峡来保障自己在波罗的海的统治，就像它力求占领达达尼尔海峡来巩固它在欧克辛海<sup>①</sup>的统治一样。

不久前我曾经说过，英国的利率要上升，这种情况对格莱斯顿的财政计划将起不良的影响<sup>②</sup>。果然，英格兰银行上星期就把最低

① 黑海的古称。——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18—119 页。——编者注

贴现率从3%提到3.5%。我曾预言格莱斯顿的国债条款变更计划必遭失败，现在这已是既成事实，这一点从下面的材料就可看出来：

### 英 格 兰 银 行

1853年6月2日星期四

截至今天为止已推销的新有价证券的价值：

	英镑	先令	辨士
三厘五证券 .....	138082	0	3
二厘五证券 .....	1537100	10	10
国库债券 .....	4200	0	0
共 计 .....	1679382	11	1

### 南 海 公 司

1853年6月2日星期四

截至今天为止已经转换为有年收入的债券的价值：

	英镑	先令	辨士
三厘五证券 .....	67504	12	8
二厘五证券 .....	986528	5	7
国库债券 .....	5270	18	4
共 计 .....	1059303	16	7

由此可见，在要转换的南海公司债券总额中，只换了八分之一，而在格莱斯顿先生所发行的为数2000万的新有价证券中，总共只推销了十二分之一。因此，格莱斯顿先生不得不在利率已经上升，看来还将继续上升的时候借债，而且这笔借款的数额不得少于8157811英镑。完全失败了！因而，预计通过国债条款变更而节省的并且已经记入预算收入部分的10万英镑，也只好付诸东流了。在国债的主要部分即5亿英镑的三厘五证券方面，格莱斯顿先生通

过自己的财政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只是：到 1853 年 10 月 10 日又是一年，在此期间他要实行任何转换都办不到。但更糟的是，最近就要付给国库期票持有者现金 3116000 英镑，因为这些人拒绝根据格莱斯顿先生所提出的条件更换国库期票。这就是“群贤”政府的财政成就。

在就爱尔兰教会收入问题进行辩论时（下院，5 月 31 日），约翰·罗素爵士声称：

“从天主教僧侣在英国的行为来看，从天主教会在其首脑——他本人是外国的君主——指使下的行动来看，近几年来已经很明显：天主教僧侣力图取得政治权力（喊声：“对！对！”），在我看来，这是与对英王的不二忠诚不相容的（喊声：“对！对！”），也是与对共同自由事业的不二忠诚，对国家的每一个臣民所肩负的义务的不二忠诚不相容的。我想同在我以前发言的那位受尊敬的绅士同样地直吐肺腑，所以希望议院不要对我误解。我决不否认，在议院内外，无论是在我们国家或是在爱尔兰，有不少天主教人士忠于王权，忠于我们国家的自由；我只是肯定，——而且我深信，——如果天主教僧侣的权利扩大，如果天主教神甫获得比现在更大的政治影响和控制，那末，他们就会不按照在我们国家中大放异彩的普遍自由来利用这种权力（雷鸣般的喊声），他们就会在政治权力问题上以及在其他问题上，作出无益于辩论的普遍自由，无益于人类智慧的积极而坚毅的活动，即无益于构成我们国家宪法的真正精神的事来。（掌声如雷）我不认为，在这方面可以把天主教徒同苏格兰长老会派（嘘声），同英国的威克利派<sup>116</sup>，同英国国教会相提并论（全场热烈赞许）……总之，我必须下结论，——虽然出于无奈，但却非常坚决，——如果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而不是由国家支持这个国家的新教教会，这是不可能得到我们国家议会的赞同和批准的。”

由于约翰勋爵在讲话中第一百次极力用狂热崇拜某些伪善的新教教派的态度来表示自己对“普遍自由”的热爱，所以在他讲话后两天，萨德勒先生、克奥先生和蒙塞耳先生向联合内阁递交了辞

呈，辞呈是以蒙塞耳先生致阿伯丁阁下的一封信的方式提出的。阿伯丁阁下在6月3日的答复中向这些绅士保证：

“我和我的许多同僚，对于约翰·罗素勋爵的那些使你们不满的意见和感情的流露并不以为然……约翰·罗素勋爵请求我转告你们，他并不是责备天主教徒不够忠诚。”

此后，萨德勒、克奥和蒙塞耳等先生收回了他们的辞呈。昨天晚上“约翰·罗素勋爵非常满意”议会采取了使大家言归于好的步骤。

1783年的印度法案曾经成为福克斯先生和诺思勋爵的联合内阁的致命伤。1853年的关于印度的新法案同样可能成为格莱斯顿先生和约翰·罗素勋爵的联合内阁的致命伤。前者的垮台是由于企图取缔董事会和股东会 [Courts of Directors and of Proprietors]，后者遭到同样命运的威胁却是由于恰好相反的原因。6月3日，查理·伍德爵士要求准许他宣布印度管理法案。查理爵士一开头先为他要发表特别长的演词作辩解，说是“问题的面很广”，“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亿五千万生灵”。查理爵士认为他必须在每三千万同胞身上至少牺牲他一生中的一小时。但是，为什么在为这个“巨大问题”立法时表现得如此仓促，而在处理“甚至是细小事务”采取措施时却经常拖拉呢？原来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有效期到1854年4月30日就满了。但是，为什么不暂且通过一个暂时延长特许状的法案，留些时间以备将来讨论较永久的法律呢？据说，因为不能期望将来会有“这么方便的机会来从容不迫地讨论这个广泛而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再没有把这个问题在议会里埋葬掉的机会了。此外，据说还已经掌握了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也认为必须在本届会议上为这个问题立法，而印

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也来了紧急信，要求政府无论如何要立即通过制定法律的决定。然而，查理爵士主张马上通过他的法律草案的一个最令人惊异的论据却是：尽管他以为他已经准备好要谈到许多“他所提出的法案中没有规定的”问题，但是，

“在法律草案所决定的程度上提交审查的措施并不超出相当狭窄的范围”。

查理爵士在这一番开场白之后，便开始为 20 年来的印度管理工作辩护。“我们应该用印度人的眼光来看印度”，这眼光有一种特性，看英国事事光明，看印度则事事黑暗。

“在印度我们所碰到的是这样一种民族，它很不乐意变动，它受着宗教偏见和古老风俗的束缚。那里实际存在着种种阻挠迅速进步的障碍”。（想必是在印度存在着辉格联合党。）

查理·伍德爵士说：

“受到最大重视的各项条目，都是同司法权的行使、公共工程的缺乏和土地占有制度有关的，这些条目也是提到委员会来的申诉书中的主要内容”。

关于公共工程的问题，政府打算举办“规模最大和意义最大的”工程。关于土地占有制度，查理爵士十分顺利地证明：印度现有的三种土地占有制度的形式——柴明达尔制度、莱特瓦尔制度和农村公社制度——只不过是公司用来经营财政的三种形式，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普遍推广，而且也不值得普遍推广。至于建立其他性质上截然相反的形式问题，查理爵士根本没有想到。

他继续说：“在司法权的行使方面，申诉所牵涉到的，主要是由于英国诉讼手续、由于据说英籍法官不称职以及土著官吏和法官贪污等等而产生的困难。”

于是，为了证明在印度要保证司法权的行使是多么困难，查理

爵士告诉我们，早在 1833 年那里就成立了专门的法律委员会。但是，根据查理·伍德爵士本人的证词，这个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呢？它的第一个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工作成果就是：在马考莱先生的主持下制定了一部**刑法典**。这部刑法典曾分发给印度各地方当局，各地方当局又送回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又寄往英国，然后，又从英国重返印度。在印度，比顿先生代替马考莱先生任法律顾问之后，把法典作了彻底修改。那时总督<sup>①</sup>并不认为“拖延就是弱点和危机的源泉”，他以修改为借口，再一次把它送到英国，再从英国寄回，并且授权总督用他本人认为是最好的方式来批准法典。但是比顿先生死了，总督认为最好是把法典交给第三个英国法学家——并且是对印度人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的法学家去裁夺，这样他就为自己保留了等这位完全不称职的官员拼凑好一部法典后再来否定的权利。这部至今尚未问世的法典的坎坷历史就是如此。关于印度诉讼程序荒谬的问题，查理爵士在这里所引证的是英国诉讼本身的同样荒谬的程序。他肯定英籍法官在印度是廉洁奉公的，但是他仍然甘愿牺牲他们，改变了任命办法。查理爵士把目前的德里状况同库利汗入侵时期的德里状况作了比较，用这种办法来证明印度已普遍进步。用来为盐税作辩护的，是从最有名的经济学家那里抄袭来的论据，这些经济学家曾经一致主张对任何生活必需品都要课税。但是，查理爵士没有补充说明这些经济学家在知道两年来情况以后会说些什么。两年来，从 1849—1850 年到 1851—1852 年，盐的消费量缩减了 6 万桶，这就使总数为 200 万英镑的盐税收入减少了 415000 英镑。

<sup>①</sup> 达尔豪西。——编者注

查理爵士提出的“不超出相当狭窄的范围的”措施是这样的：

(1) 董事会应由 24 人减至 18 人，其中 12 人由股东选出，6 人由国王任命；

(2) 董事的薪金由一年 300 英镑增至 500 英镑，主席领 1000 英镑；

(3) 民政机关的所有公职以及必须具备专门知识的所有军职，在印度都通过公开征求的办法补缺；董事只有任命集团军直属骑兵的低级军官的权利；

(4) 总督一职和孟加拉省督一职分开；授予最高权力机关在印度河区域成立新的管区的权利；

(5) 最后，在议会没有作出新规定之前，上述各措施一律有效。

查理·伍德爵士的演说和他所提出的措施，遭到布莱特先生的非常严厉而尖刻的批评；但是，布莱特所描绘的只是印度由于公司和政府的财政勒索而破产的情景，这里自然不包括曼彻斯特和自由贸易对印度的破坏情况。至于昨天晚上发言的那一位东印度老手，公司的董事或前任董事詹·霍格爵士的演说，老实说，我确实感到我在 1701、1730、1743、1769、1772、1781、1783、1784、1793、1813 和其他年份的报告中早就拜读过了。为了回答他对董事会的颂词，我只从据我记得是在他亲自监督下出版的关于印度的年度报告书中引用一些材料：

印度纯收入总额

1849—50.....	20275831 英镑	
1850—51.....	20249932 英镑	3 年来收入减少
1851—52.....	19927039 英镑	348792 英镑

## 支 出 总 额

1849—50·····	16687328 英镑	
1850—51·····	17170707 英镑	3 年来支出增加
1851—52·····	17901666 英镑	1214284 英镑

## 田 赋

过去 4 年中田赋总额:

孟加拉·····	摇摆于 3500000 英镑到 3560000 英镑之间
西北区·····	摇摆于 4870000 英镑到 4900000 英镑之间
马德拉斯·····	摇摆于 3640000 英镑到 3470000 英镑之间
孟买·····	摇摆于 2240000 英镑到 2300000 英镑之间

	1851—52 年的 总收入	1851—52 年的 公共工程支出
孟加拉·····	10000000 英镑	87800 英镑
马德拉斯·····	5000000 英镑	20000 英镑
孟买·····	4800000 英镑	58500 英镑

共 计··· 19800000 英镑      166300 英镑

由上可知,总收入 19800000 英镑中,用于修建道路、河渠、桥梁及其他必需的公共工程的支出总共只有 166300 英镑。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6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01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sup>117</sup>

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据维也纳电讯报道,那里对于土耳其问题、撒丁问题和瑞士问题的和平解决都很有信心。

昨晚上院继续辩论印度问题,辩论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布莱克特先生责备查理·伍德爵士和德·霍格爵士,说他们的发言有点假乐观主义。内阁和董事会的一世辩护士对这个责难极力加以反驳,而无所不在的休谟先生则在结论中要大臣们把法案收回去。辩论最后决定改期举行。

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拢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儿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但是从社会方面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这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在印度斯坦的宗教的

古老传统里早就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即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sup>118</sup>；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也不必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而搬出库利汗统治时期，像查理·伍德爵士所做的那样<sup>①</sup>。但是大家可以拿奥朗则布时期做例子；或者拿莫卧儿出现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现在南方的时期做例子；或者拿穆斯林入侵和南印度七国争雄<sup>119</sup>的时期做例子；或者，如果大家愿意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那就可以拿婆罗门自己的神话纪年看一看，它把印度灾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创始时期更远的时候。

但是，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sup>120</sup>里的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这种结合并不是英国殖民制度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制度的模仿，而且模仿得十分确切，所以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只要把**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谈到旧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待自己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人对待他们的奴隶，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还付过钱，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文钱都没有花过，它只运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构压榨居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40 页。——编者注

民，使他们把最后一点东西都交纳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都贡献出来。这样，它就加重了任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是把政治家的全部实际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垄断利己心肠结合在一起进行统治的。”

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

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 and 军事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原则<sup>21</sup>——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了。但是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因此，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末无论对农业的损害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不列颠侵略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印度社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的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贵金属去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则是印度社会里的必要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最低阶级中的那些几乎是裸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坠，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臂镯和脚镯，而金银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

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从 1818 年到 1836 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 1：5200。在 1824 年，输入印度的英国细棉布不过 100 万码，而到 1837 年就超过了 6400 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内，达卡的人口却从 15 万人减少到 2 万人。然而，曾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像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通常设有以下一些官员和职员：**帕特尔**或村社首脑一般是总管村社的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报，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比较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成。**边界守卫员**负责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水库水道管理员负责分配农业用水量。有专门的婆罗门主管村社的祭神事宜。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

上念书和写字，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并没有这么多，上述的各种职务有些由一人兼任；反之，另外也有些地方又超过上述人数。从很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着。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的。帕特尔仍然是村社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裁判官和税吏。”<sup>122</sup>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

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sup>①</sup>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践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Sollte diese Qual uns quälen

Da sie unsre Lust vermehrt,

---

① 哈努曼是印度传说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撒巴拉是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译者注

Hat nicht Myriaden Seelen  
Timur's Herrschaft aufgezehrt?》<sup>①</sup>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1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6 月 25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804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 卡尔·马克思

---

① ——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引自哥德“东西诗集”中“给祖莱卡”一诗)

卡·马克思  
英国的繁荣。——罢工。  
——土耳其问题。——印度

1853年6月17日星期五于伦敦

根据官方材料,英国的出口值如下:

1853年4月为 .....	7578910 英镑
而 1852年4月为 .....	5268915 英镑
1853年头4个月为 .....	27970633 英镑
而 1852年头4个月为 .....	21844663 英镑

这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增长额为 2309995 英镑,即增长 40%以上,在第二种情况下,增长额为 6125970 英镑,即增长 28%左右。如果今后继续这样增长,那末到 1853 年底,大不列颠的出口总值将超过 1 亿英镑。

“泰晤士报”在向自己的读者报道这些惊人数字时,大大唱了一阵赞歌,最后一句是:“我们举国幸福,和谐!”但是,该报刚刚大声报告了这个可喜的发现,在英国全国,特别是在它的北方工业区,几乎到处都爆发了一系列的罢工,成了“泰晤士报”歌颂和谐的赞歌的一个很怪的回声。这些罢工,是剩余劳动力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普遍上涨的同时相对减少的必然结果。利物浦罢工的有 5000 人,斯托克波尔特有 35000 人,等等。罢工热甚至把

警察也传染上了，在曼彻斯特就有 250 名巡警提出了辞呈。这种情况使资产阶级报纸（例如“地球报”<sup>123</sup>）完全失去了自制，抛掉了平时那种慈善家的腔调。它开始诬蔑、咒骂、威胁，甚至公开吁请市政当局只要能找到一点点法律借口就进行干涉（在利物浦实际上已经进行干涉了）。这些市政当局即使本身不是工商业主，像郎卡郡和约克郡两地通常的情况那样，它们至少也都同实业界有密切联系，并且奉命唯谨。它们让工厂主规避执行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规避禁止以实物作劳动报酬的法律<sup>124</sup>，让工厂主不受惩罚地违反其他一切为制止工厂主的“露骨的”贪欲而专门颁布的法律；而对结社法<sup>125</sup>它们总是作最偏颇和最不利于工人的解释。“富有骑士精神的”、以积极反对政府干涉而闻名的、宣扬私人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自由处理的资产阶级学说——laissez faire（听之任之）的自由贸易论者，只要工人的私人利益同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总是第一个起来要求政府干涉。一遇到这种冲突，他们就以公开艳羡的目光注视着大陆国家，这些国家里的专制政府尽管不让资产阶级执政，但是至少也不容许工人进行反抗。至于革命政党准备怎样利用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这场大冲突的问题，你们可以从宪章运动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写给我的下面这封信里清楚地了解到，这封信是他动身去郎卡郡的前夕发出的，那里正准备发起一个运动：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我去黑石山脊，那里将举行一个约克郡和郎卡郡两地宪章派的露天群众大会，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大会的准备工作在北方正以极大的规模进行。自从在这个具有宪章运动传统的地方举行真正人民的大会<sup>126</sup>以来，已经 7 年过去了。这次大会的目的如下。1848 年的叛变和分裂，当时的组织由

于它的 500 个领导人被关进监狱和流放而瓦解，宪章派的队伍由于流亡国外而渐渐减少，政治热情因受工商业的复苏的影响而低落，——所有这一切使得国内的宪章运动蜕化成孤立的行动，而宪章运动的组织恰恰在社会知识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却显得虚弱无力。但是，在社会知识领域内进行的初步尝试所造成的工人运动，在纯政治运动的废墟上成长了起来。这一工人运动起先采取的形式是分散地创办合作社，当发现这样做不成功时，就采取了积极的斗争形式：争取十小时工作法案，争取限制机器开动的的时间，反对经常迟发工资，争取对结社法作新的解释。工人阶级把全副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到了这些本身就有利处的措施上。争取立法保障来实行这些措施的尝试遭到失败以后，使不列颠工人产生了比较革命的情绪。这就为把群众团结在真正社会改革的旗帜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为大概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不管从满足目前的要求来看上述的措施怎样好，但是对未来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并且绝不体现社会权利的任何根本原则。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同工商业的复苏相比劳动力相对不足，人民的不满和人民力量的一定程度的增长结合起来，这种情况也促成了上面所说的对运动有利的条件，使运动有顺利发展的可能。现在到处发生罢工，并且很多罢工进行得都很顺利。但遗憾的是：本来可以用在根本改进上的力量却耗费在暂时性的治标办法上。因此我才同许多朋友一起来一次改造，利用这种非常有利的时机把零散的宪章运动队伍在社会革命这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下联合起来。为此我已经改组了无所作为和不堪战斗的地方小组，并训练他们在全英国范围内进行普遍的和大规模的示威，——我希望这个示威能够成功。新的运动将从黑石山脊的露天群众大会开始，接着就在所有工业地区举行群众大会；同时，我们的代表也正在农业地区进行活动，努力把农业劳动者同其余的劳动大军联合起来——对于这个任务，我们的运动在此以前一直是忽视的。我们第一步是要求接受这些人民群众大会所提出的宪章，并且打算迫使我们的卖身投靠的议会接受关于实行宪章的建议，公开明确地承认宪章是进行社会改革的唯一工具。从这个观点来看，关于宪章的问题还没有在议院提出。如果工人阶级支持这个运动（我的呼吁所得到的反映使我有根据指望这一点），后果就很可观。因为，如果议会拒绝，假自由派和托利党慈善家的空话将被揭穿，他们指望人民容易上当的最后一着也将失败。如果议会竟同意接受和讨论这些建议，奔腾的激流就将冲向广阔的地区，用临时的让步将阻止不住。您对英国政治生活很熟悉，应

该知道：我们的贵族和金融寡头没有什么雄心和力量来对人民运动进行任何严重的抵抗。统治集团只是各种蜕化党派的乱七八糟的混合物，它们匆匆集结在一起，就像需要拯救一只漏了水的航船时集结在抽水机旁争吵不休的船员一样。他们完全是没有力量的，即使他们能从底舱中向民主海洋里发出几滴水来，但丝毫也不能平息汹涌奔腾的浪潮。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在目前看到的有利机会，这就是我希望这些机会将得到利用所凭借的力量，这就是这些力量要追求的首要的最近目的。关于第一次示威的结果，我将专门写信告诉您。

忠于您的

厄内斯特·琼斯”

没有任何根据指望议会会考虑宪章派的请愿书，这一点恐怕用不着详细证明。无论过去在这方面有过怎样的幻想，现在面对以下这样的事实，这些幻想应该破灭了：议会刚刚以 60 票的多数否决了由贝克莱提出并得到菲利莫尔先生、科布顿先生、布莱特先生、罗伯特·皮尔爵士等支持的关于无记名投票的建议。做这样的事的，也就是那个用全力反对在本身的选举中出现的恫吓和贿赂现象的议会，它宁愿在整整好几个月中丢开正经事不问，整天调查选举舞弊情况来削减自己的人数。到目前为止，圣洁的琼妮<sup>①</sup>反对贿赂、恫吓和贪污的唯一手段一直是剥夺选举权，最常用的办法是缩小选区。毫无疑问，如果他能使这些选区缩到像他自己那样小，那末英国的政治寡头就可以不用操心费事，不用支出贿金而大得其选票了。贝克莱先生的决议案所以被托利党和辉格党联合投票否决，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利益——保持他们在地方上对不独立的租佃者、小店主和被保护的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受

<sup>①</sup> 对约翰·罗素的戏称。——编者注

到了严重威胁。“交租金者应当把选票同租金一块交来”——这就是光荣的英国宪法的一条古老的原则。

上星期六，“新闻报”<sup>127</sup>（以迪斯累里先生为后台的一家新周报）向英国公众揭发了一件很有意思的材料：

“春初，布隆诺夫男爵把俄皇准备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要求的内容通知了克拉伦登勋爵，同时声明他通知的目的是要弄清楚英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克拉伦登勋爵没有表示任何反对，也丝毫没有谴责所提出的方针。俄国外交官向俄皇报告：他对金角所怀的意图，在英国方面并无反感。”

为了回答迪斯累里先生提出的这个严重的罪名，昨天“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来自外交部的经过周密考虑的官方文章，但是依我看，这篇文章与其说是驳掉了这个罪名，不如说是加重了这个罪名。“泰晤士报”肯定：春初，在缅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之前，布隆诺夫男爵曾向约翰·罗素勋爵抱怨土耳其政府取消了希腊正教教会根据条约而得的特权，约翰·罗素勋爵由于认为这个问题仅仅牵涉到圣地，便同意了沙皇的计划。但是“泰晤士报”同时不得不承认：在缅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和克拉伦登勋爵接替约翰·罗素勋爵担任外交大臣以后，布隆诺夫男爵曾向克拉伦登勋爵提出一个新的通知，“其目的是说明他所得到的指示以及缅施科夫公爵代表俄皇向苏丹递交的国书中所用的某些说法的含意”。“泰晤士报”同时还承认：“克拉伦登勋爵同意了布隆诺夫男爵告诉他的要求”。显然这第二次通知的内容，要比对约翰·罗素勋爵的通知多一些东西。因此，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声明决没有使问题就此了结。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布隆诺夫男爵是个外交骗子，或者克拉伦登勋爵和阿伯丁勋爵是卖国贼，真相来自明，我们就走着瞧吧。

伦敦的一家报纸不久前发表了下面一项有关东方问题的文件，读者诸君对此或许感到兴趣。这就是现在住在伦敦的阿尔明尼亚大公发表的、在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居民中散发的一项文告：

“受命于天的阿尔明尼亚最高大公狮子座告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人：

亲爱的兄弟们和忠实的同胞们！我们谨表示意志和殷切的希望，愿你们保卫你们的国家和苏丹，反对北方暴君，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要记住，兄弟们，土耳其没有鞭子，土耳其人不割你们的鼻子，不鞭打你们的妻子，无论是私下还是当众。苏丹治下，人人安乐，北方暴君治下，只有野兽般的残暴。因此，你们要听从神的指示，勇敢地保卫你们的国家的自由和你们现在的国君而战。你们要拆除房屋来修筑街垒；如果没有武器，那就拆掉家具当做武器来自卫吧。愿主把你们引向光荣的道路。我唯一的幸福，就是在你们的队伍中为反对你们国家和你们的信仰的压迫者而战斗。神保佑使苏丹赞同我的号召，因为我们的宗教在他的治下保持着纯洁，而在北方暴君的统治下我们的宗教将被糟践。最后要记住，兄弟们，在写这个告示的人的血管中流着 20 个国王的血，流着我们的信仰的保卫者鲁西扬氏族英雄的血。因此我们号召你们：保卫我们的宗教的纯洁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本月 13 日斯坦利勋爵在下院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在印度法案二读时（本月 23 日），他将提出下列的决议案：

“议院认为，必需握有进一步的情报，议会才能采取有效的立法措施来建立对印度的长期管理制度。而在此议会会议结束阶段，不宜采取任何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只能打乱现状，而仍然不能认为是彻底解决问题。”

但是到 1854 年 4 月，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就要满了，因此，总得采取一些措施。政府原是想颁布一项长期性的法律，即把特许状再延长 20 年。曼彻斯特学派是想拖延下去，任何法律措施都不让采取，而使特许状的有效期最多延长 1 年。政府声明：为了印度的“福利”，必须颁布一项长期性的法律。曼彻斯特学派表示反对，说没有情报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印度的“福利”和没有

情报这两者都同样是虚假的借口。当权的寡头想在改革后的议院召开会议以前就能够使自己今后 20 年的“福利”从印度得到保证。曼彻斯特学派根本不愿意在改革现在的议会以前进行任何立法，因为他们在这个议会里没有机会贯彻自己的主张。于是，联合内阁就由查理·伍德爵士来出面，违反自己先前的种种声明（不过却同它通常回避困难的手法完全一致），提出了一种类似法律草案的东西。不过，它不敢建议更换特许状，不敢给特许状规定任何一个明确的期限，而是提出了一个“安排”，让议会去变动一下，如果议会愿意干这件事的话。政府的建议如被通过，那末，这就不是更换，而只不过是暂时延长东印度公司存在的时间罢了。在所有其他方面，政府的草案只是在表面上把管理印度的方式改变一下；它提出的唯一的重大改变就是增加几个新的省督，虽然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在东印度，干脆由特派专员 [commissioners] 管理的地区，比起那些对人民开恩，设立了省督及其参事会，豪华万状的地方，情况要好得多。辉格党人发明的改善破产国家的处境的办法（在这些国家里增设一些由破落贵族担任的优缺），使人想起了前届罗素政府时期的一件事，那时，辉格党突然对东方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精神贫困状态感到吃惊，于是决定派几个新的主教到印度去帮助他们，而托利党执政时一直认为派一个去就够了。这个决定刚通过，当时的督察委员会主席辉格党人约翰·霍布豪斯爵士马上就发现，他有一个亲戚，由他担任主教简直是太合适了。于是他的这位亲戚立刻就被任命充当了一个新的主教。一位英国作家指出：“在鞋子恰好合适的情况下，真是很难说，是鞋子为脚而设呢，还是脚为鞋子而设。”同样，对查理·伍德爵士的发明也很难说，是新的省督为印度各省而设呢，还是印

度各省为了新的省督而设。

不管怎样，联合内阁把提出的法律草案交给社会议会有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加以修改以后，就以为已经满足一切要求了。不幸的是，托利党人斯坦利勋爵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一宣布就得到“激进的”反对派大声赞同。但是，斯坦利勋爵的决议案却有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斯坦利拒绝政府的草案的理由是：下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情报才能颁布长期性的法律，另一方面，他的理由又是：这个草案所建议的不是长期性的法律，而只是改变一下现状，不想彻底解决问题。保守派当然是反对法案的，因为法案总归是规定要作一些改变。激进派反对它，是因为它实际上根本没有改变什么。斯坦利勋爵在目前的联合时期找到了一个公式，想在这个问题上把反对政府立场的两种正好相反的观点合在一起。联合内阁对这种策略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而它的机关报——“纪事报”就大叫：

“所提出的关于延期讨论的决议案，是党派性的意见，是极端分裂性的和可耻的…… 这个决议案之所以提出，只是因为政府的某些拥护者曾经答应过，在这个局部性问题上，他们要同那些经常携手的人分手。”

看来大臣们确实非常惊慌了。今天的“纪事报”又回到这个问题上：

“关于斯坦利勋爵的决议案问题的投票大概将决定印度法案的命运；因此，迫切需要那些意识到立即颁布法律的重要性的人竭尽全力来加强政府的立场。”

另一方面，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

“政府关于印度的法案的命运开始比较明朗起来了…… 政府所面临的危险在于：斯坦利勋爵的反对意见同社会舆论的结论完全吻合。这个决议案

---

的每一个字都是坚决反对内阁的。”

在后面的一篇文章<sup>①</sup>中，我将说明大不列颠各党派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不幸的印度人民从英国的贵族、金融寡头和工业巨头关于改善他们处境问题的争吵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1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7 月 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09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67—176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  
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  
附刊税。——议会的舞弊<sup>128</sup>

1853年6月21日星期二于伦敦

1828年，俄国曾得到机会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结果缔结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整个黑海东岸地区北起阿纳帕南至波提（切尔克西亚除外）都夺到了自己手里，并且占领了多瑙河河口诸岛屿，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也脱离了土耳其，被交给俄国统辖，当时大不列颠的外交大臣是阿伯丁勋爵。1853年，我们看到，同一位阿伯丁成了这个国家的“混合内阁”的首脑。只要指出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俄国目前在它同土耳其和欧洲的冲突中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泰晤士报”在星期四提出的那种强词夺理的、狡猾的和伪造的辩护理由，恐怕平息不了由于“新闻报”对阿伯丁、克拉伦登和布隆诺夫男爵之间的秘密协议的揭露所引起的风波<sup>①</sup>。甚至“泰晤士报”后来也不得不在一篇半官方的文章中承认，克拉伦登勋爵实际上同意了俄

① 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

国打算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但是，它又补充说，俄国人在伦敦所通知的要求同在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提出的要求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尽管布隆诺夫男爵介绍给英国大臣的文件就是从缅施科夫公爵得到的指示中“摘录下来的原文”。但是，“泰晤士报”在星期六（毫无疑问是由于俄国使团的抗议）又收回了自己的断语，并且为布隆诺夫男爵作证，说他是极其“诚实和正直的”。“先驱晨报”昨天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俄国向布隆诺夫男爵本人发了一个虚假的指示，为的是欺哄英国大臣呢？”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又知道了卖身为奴的报纸千方百计向公众隐瞒起来的一些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完全排除了上述的解释。这些揭发材料证明，全部责任都在“混合内阁”身上；而且根据这些材料足以控告阿伯丁勋爵和克拉伦登勋爵犯了国事罪，换上其他任何一个议会都会这样做，只有本届议会除外，它只不过是用心行贿和恫吓手段硬拉起来的选举僵尸生下的瘫痪产儿而已。

已经确定，克拉伦登勋爵曾收到通知，通知告诉他关于圣墓的问题不是俄国公爵<sup>①</sup>所关心的唯一问题。这个通知还谈到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关于土耳其的正教居民和俄皇根据条约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问题。所有这几点都经过了讨论，俄国准备采取的方针也被详加说明，这就是5月6日的条约草案<sup>129</sup>详尽阐述的那个方针。克拉伦登勋爵征得阿伯丁勋爵的同意，对这一方针并没有表示丝毫不赞同，没有表示丝毫的反对。正当伦敦这样办事的时候，波拿巴派出了舰队前往萨拉密斯，社会舆论对议会施加了压力，在两院中都向大臣们提出了质询，罗素郑重许诺要保护

<sup>①</sup> 缅施科夫。——编者注

土耳其的不可侵犯和独立，而缅施科夫公爵则在君士坦丁堡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阿伯丁和克拉伦登两位勋爵这时就不能不向其他大臣说明事件的全部经过了，于是联合内阁濒于瓦解，因为帕麦斯顿勋爵（他的过去使他不能不这样做）开始坚持完全相反的政策。为了防止内阁瓦解，阿伯丁勋爵终于向帕麦斯顿的主张作了让步，同意英法两国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共同行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阿伯丁勋爵为了履行自己对俄国所负的义务，用急电告诉圣彼得堡说，他将不把俄军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看做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而“泰晤士报”也接到了指示，要它促使舆论接受这一个对国际条约的新解释。这里不能不为这家报纸说句公道话：它为了把黑的说成白的，确实非常辛苦了一场。这家报纸过去一直断言，俄国对土耳其的正教居民的保护权根本不会有任何政治后果，而现在却突然证明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有两个宗主国，它们实际上已不是土耳其帝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因此“严格地说来”，占领它们并不是对土耳其帝国的侵犯，因为，按照布加勒斯特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沙皇对多瑙河各省的正教居民有保护权<sup>130</sup>。1849年5月1日签订的巴尔塔利曼尼条约<sup>131</sup>有这样一个十分清楚的规定：

“一、对这些省份的占领如属应当，也只能由俄国和土耳其的武装部队来联合执行；

二、进行占领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多瑙河各公国发生了严重的混乱。”

但是，这些公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混乱，而且俄国也绝不打算和土耳其一起去占领这些地方，恰恰相反，正好是为了反对土耳其才去占领这些地方，于是“泰晤士报”就说，土耳其首先应当对俄国单独占领这些公国的行为采取容忍态度，然后再同俄国

进行谈判。如果土耳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冷静态度，认为占领就是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那末，该报认为，英法两国也决不应该抱同样的态度。即使它们要抱同样的态度，“泰晤士报”建议，它们的行动也要有分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作为交战国的的一方来反对俄国，而只是以土耳其盟国的资格来保护土耳其。

我觉得，对“泰晤士报”的这种懦弱而滑头的行为加以痛斥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从“泰晤士报”今天的社论中引证下面一段话。这篇社论简直是集阿伯丁勋爵政策中的种种矛盾、诡辩、借口、顾虑和 *lâchetés* (卑鄙行为) 之大成。

“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土耳其政府可以（如果它认为需要这样做的话）对各公国被占领一事提出抗议，并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继续进行谈判。土耳其政府应当取得四大国大使的同意而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自己做出决定，特别是要确定，敌对行为已经超出界限多少，是否可以根据 1841 年公约<sup>132</sup>的规定把达达尼尔海峡向外国军舰开放。如果这个问题肯定了，并且舰队得到了开进海峡的命令，还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到那里去究竟是作为调解国还是作为交战国。因为，即使假定土耳其和俄国已处于交战状态，外国舰队根据 *casus foederis*<sup>①</sup> (!) 而被允许进入海峡，那还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它们一定要作为交战国的船只而不是作为调解国的船只进行活动，而这个问题是它们更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它们被派往那里去不是为了进行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这种措施不应当使我们一定要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

“泰晤士报”的所有的社论并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没有一家报纸跟在“泰晤士报”后面跑，也没有一家报纸上它的圈套，甚至“纪事晨报”、“晨邮报”、“地球报”、“观察家报”这些政府报纸也完全站在另一种立场上，响应拉芒什海峡对面的热烈反响，——

① 直译是：同盟的时机，即同盟国应当履行义务的时候。——编者注

在那里，也有一家正统主义报纸“国民议会报”<sup>133</sup>好像还没有把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一事看做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

这样一来，由于政府报刊以不同的腔调叫嚷起来，公众就知道了联合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帕麦斯顿已经说服了内阁把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事看做宣战行为，并且得到辉格党人和“混合内阁”的假激进派阁员的支持。阿伯丁勋爵（他仅仅由于指望俄国不在达达尼尔海峡而只在多瑙河各公国采取行动才同意英法两国舰队采取共同行动）现在就陷入了非常狼狈的境地了。于是政府的存在又成了问题。这样弄到最后，当帕麦斯顿向阿伯丁勋爵的顽固主张进行让步，并且准备迫不得已同意俄国强占两公国的行为的时候，突然从巴黎拍来急电，报告拿破仑打算承认这种行为就是 casus belli。混乱就达到极点了。

如果上面这种对事件的阐述是正确的话（根据阿伯丁勋爵的过去一切，我们有一切理由这样认为），那末几个月来吸引着欧洲注意的俄土悲喜剧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出来了。现在我们马上明白了，为什么阿伯丁勋爵不愿把英国舰队调离马尔他岛。我们开始懂得，为什么罗斯上校会由于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坚决行动而遭到训斥；我们也清楚了，为什么缅施科夫公爵的态度那样咄咄逼人，为什么沙皇表现得那样大胆强硬。沙皇了解到，英国的军事示威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所以，他如果能够通过这次毫无阻碍地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行动，使他不仅可以以主人的资格退场，而且还可以用苏丹臣民的钱粮进行年年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那他是非常乐意的。如果战争还是要爆发，那末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因为俄国太过分了，势必丢面子才能下台。而且，俄国之所以这样强硬，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它一直指

靠着英国的纵容。

在这方面，“一个英国人”最近的一篇文章有一段谈到联合内阁的话说得很中肯：

“每当达达尼尔海峡吹来一阵微风的时候，联合内阁都要发生动摇。善良的阿伯丁胆小怕事，克拉伦登无能得可怜，这就鼓励了俄国，引起了危机。”

最近从土耳其传来的消息是：土耳其驻巴黎大使收到了君士坦丁堡通过泽姆林发来的电报，电报通知他，土耳其政府已依据给列强的备忘录拒绝了俄国的最后通牒<sup>134</sup>。据马赛报纸“信号报”<sup>135</sup>报道，士麦那有消息说，俄国在黑海截走了两艘土耳其商船，但是高加索各部族对俄国人发动了总攻势，沙米尔取得了十分光辉的胜利，缴获大炮不下 23 门。

最近，格莱斯顿先生声明修改他所提出的关于广告税的建议。他先前为了取得“泰晤士报”的支持，曾建议取消只登广告的报纸附刊税。现在他被舆论吓住了，又建议免征所有第一次附刊的税，以后每出一份附刊则征税半辨士。可以想见，“泰晤士报”是多么愤怒了，因为这么一变，就使它每年不是得到 4 万英镑的好处，而只有 2 万英镑的好处，同时，市场的大门还将为它的竞争者敞开。这家一贯拚命保护知识税，其中包括广告税的报纸，现在对任何附刊税都反对。但是它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如果说，内阁在通过大部分预算后减到没有必要再来讨好“泰晤士报”的话，那末曼彻斯特派在预算中争得了自己的一份之后也将不再需要内阁。这一点也正是内阁所担心的：预算辩论为什么占了整个议会会议的时间，恰好可以从这种担心中找到说明。格莱斯顿先生在把报纸广告税从 1 先令 6 辨士降低到 1 先令 3 辨士的同时，又建议对刊印在很多书刊杂志后面的出版物的广告每份征收 6 辨士的

税，这件事最能说明他善于挖东补西，公公道道了。

今晚下院将要审查两起贿赂案件。在这次开会期间，为选举问题而召集的委员会有 47 个，其中有 4 个仍在继续开会，43 个委员会已经结束了审查工作，并作出了大部分被剥夺当选证书的议员都犯了贿赂罪的结论。为了说明社会舆论现在对本届议会——一个脱胎于舞弊而孕育出联合内阁的东西——抱着怎样尊敬的态度，可以从“先驱晨报”上摘引以下一段话：

“如果说，目的和意图都不明确而且常常动摇是低能的迹象，那末应当承认，这届议会，这个 6 个月的婴儿，已经成为一个老糊涂了，它现在就已经力竭才尽，并且正在瓦解为一些没有任何活力和目的的小集团。”

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21 日  
载于 1853 年 7 月 8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814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 卡·马克思 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

1853年6月24日星期五于伦敦

斯坦利勋爵关于暂缓为印度立法的提案，被延期到今天晚上开始讨论。印度问题成为英国政府的问题，从1783年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是什么原因呢？

东印度公司真正的创始不能说早于1702年，因为在这一年，争夺东印度贸易垄断权的各个公司才合并成一个独此一家的公司。在1702年以前，原有的东印度公司的生存曾经一再陷于危殆。在克伦威尔摄政时期，它的活动曾中断多年；在威廉三世统治时期，它又因议会干涉而几乎全部解散。但是，正是在这位荷兰亲王的统治时期，——那时，辉格党人成了不列颠帝国的包税者，英格兰银行创办了，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确立了，欧洲的均势最后稳定了，——仅仅是在这个时候，东印度公司的存在才由议会承认。这个表面上自由的时代，实际上是垄断企业的时代。这些垄断企业并不是根据国王的特许令建立起来，像伊丽莎白和查理一世时代那样，而是由议会核准，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且被宣布为国家的企业。英国历史上这个时代，实质上很像法国的路易—菲力浦时代，那时，旧的土地贵族遭到失败，而资产阶级只是在金融寡头或《haute finance》（“大金融家”）的旗帜下才占据了土地贵族的位置。

在下院排斥平民，不让他们有代表进入下院的同时，东印度公司也排斥平民，不让他们和印度通商。这种情况以及其他一些事情，都具体说明了，资产阶级初次获得对封建贵族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也就是对人民实行最露骨的反动的时候。这个现象，曾迫使不只一个科贝特那样的平民作家不向未来而向已往去寻找人民的自由。

君主立宪制度与享有垄断权的金融巨头结成了联盟，东印度公司与 1688 年的“光荣”革命结成了联盟，造成这种联盟的力量，也正是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促使自由派资本与自由派王朝联系起来并结成一体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贿赂的力量——君主立宪制度的主要动力，威廉三世的守护天使，路易—菲力浦的要命鬼。早在 1693 年，根据议会的调查，东印度公司在给权贵“送礼”项下的支出每年就达到了 9 万英镑，而在革命前每年还很少超过 1200 英镑。里子公爵曾被控受贿 5000 英镑，德高望重的国王本人也被揭发受贿 1 万英镑。除了这些直接的行贿外，东印度公司为了排挤同它竞争的公司，还给政府大批利率极低的贷款，或者收买这些公司的董事。

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一样，是靠着向政府行贿而获得权势的，它也不能不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继续用行贿来保持这种权势。每当它的垄断权期满时，它只有向政府贡献新的贷款，奉送新的礼物，才能更换特许状。

七年战争<sup>136</sup>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正是那个时候，才奠定了现时的这个东方不列颠帝国的基础。那时，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曾涨到 263 英镑，红利高达 12.5%。但这时就出现了东印度公司的新的敌人，不过这一次已不再是同它竞争的公司，而是同它竞争的大臣和同它竞争的国

家了。人们一再指出，公司的领土是在不列颠海军和不列颠陆军的协助下占领的，无论哪一个不列颠臣民都不能离开王室而拥有对某些领土的最高权力。在那时的大臣和国家看来，东印度公司获得“惊人的宝藏”是新近的侵略的结果，所以就要分享一份。只是由于1767年达成协议，公司答应每年献给国库40万英镑，它才得了救而存在下来。

但是，东印度公司遭到了财政困难，它不但无法履行这个协议，向英吉利国家纳贡，反而要求议会给予金钱上的援助。结果公司的特许状作了重大修改。公司在新的条件下仍然没有起色；与此同时，英吉利国家又失掉了北美殖民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英国必须在别处重新取得一个广大殖民帝国。因此，大名鼎鼎的福克斯才认为1783年是适当的时机，提出了他那轰动一时的印度法案，建议取消董事会和股东会，把管辖印度的全权交给议会任命的7位特派专员。由于低能的国王<sup>①</sup>在上院的个人势力，福克斯先生的这个法案遭到了否决，福克斯和诺思勋爵的联合政府因此被打倒，大名鼎鼎的皮特因此被任命为政府的首脑。皮特于1784年在上下两院通过了自己的法案，这个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由6位枢密院委员组成的督察委员会，它的职责是：

“检查、监督一切涉及东印度公司领土和属地的民政、军政或赋税的法令、业务和事务。”

历史学家穆勒对这个法案的评论是：

“实行这个法律所追求的是双重目的。为了不致被人责难想要实现福克斯先生法案中那种被称为可恶企图的东西，必须制造一种假象，似乎大部分

---

<sup>①</sup> 乔治三世。——编者注

权力仍归董事们掌握。但为了内阁的利益,又必须在实际上剥夺董事们的一切权力。皮特先生的法案同他的政敌的法案的表面上的区别,主要就是皮特的法案在形式上好像是原封不动保留了董事们的权力,而福克斯的法案则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权力。按照福克斯先生的法律,大臣们的权力必须得到公开的承认;而皮特先生的法律则通过欺骗的手段秘密地实现这些权力。福克斯先生的法案要把从公司手中夺取的权力移交给议会任命的特派专员;而皮特先生的法案则把这种权力移交给国王任命的特派专员。”<sup>137</sup>

所以,1783年和1784年这两个年头,是印度问题第一次而且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成为政府问题的时期。皮特先生的法案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更换了,印度问题被搁置到了20年以后。但是,1813年的反雅各宾战争,1833年刚刚通过的改革法案<sup>138</sup>,把其他一切政治问题都推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这就是印度问题在1784年以前和以后都未能成为重大政治问题的主要原因。在1784年以前,东印度公司首先是要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势力;在1784年以后,英国寡头政治把它能够攫取的公司的权利都攫为己有,同时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到1813年和1833年更换公司特许状的时期,英国人民所注意的主要是其他更迫切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东印度公司起初只是想为代理人建立海外商馆,为货物建立储运站。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商馆和堆栈,公司建造了若干堡垒。尽管从1689年起东印度公司就想在印度占据领地,使领地上的收入成为公司的一种财源,但是一直到1744年,它只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一带弄到几块不大的地区。随后就爆发了卡尔纳梯克的战争,经过一系列战斗,公司实际上就成了印度的这一地区的主宰。由于孟加拉战争和克莱夫的胜利,公司得到的好处就更大了,它已

实际上占有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随后,在十八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公司同提普·萨希布进行战争,结果是大大加强了侵略者的势力,并且广泛推行了军费补助金制度<sup>139</sup>。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终于第一次争到了一条合适的边界,即印度边境的沙漠地带。只是到这个时候,东方不列颠帝国才占有了作为印度历代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的那些亚洲地区。但对帝国最为险要的一个地点,每逢新的侵略者要赶走旧的侵略者时总是从那里入侵印度的那个地点,即屏障着内地的西部边陲,还没有落到不列颠人的手里。到1838—1849年时期,在同锡克教徒的战争和同阿富汗人的战争中,英国用武力并吞了旁遮普和信德<sup>140</sup>,这样,从人种边界、政治边界和军事边界上看,就在东印度大陆全境最终建立了不列颠的统治。占有了旁遮普和信德,就可以击退来自中亚细亚的任何侵犯,对抗正向波斯边境扩张的俄国了。在这10年之中,英属印度共并吞了拥有8572630人口的167000平方哩的领土。至于印度内部,那末所有的土邦现在都已被英属领地所包围,都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隶属于不列颠的宗主权,除了古扎拉特和信德以外,都同沿海地区割断了。至于印度的对外关系,从此以后已根本谈不到了。所以,只是从1849年起,才开始出现一个统一的庞大的英印帝国。

由此可见,不列颠政府用公司的名义进行战争有两百年之久,直到最后才达到印度的天然边界。现在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在这整个时期内英国的所有党派对这件事抱着默然纵容的态度,其中还有一些人决心要在统一的英属印度帝国 *arrondissement* (边界完整) 大功告成之后用假仁假义地号叫和平的喊声盖过所有的人。不言而喻,他们必须先把印度拿到手里,然后才使印度成为

他们那种令人讨厌的慈善事业的对象。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印度问题在今年，1853年，比以前历次更换公司特许状的时候都不同的原因了。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大不列颠和印度之间商业往来的各个阶段，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在给印度立法方面发生的危机的特点。

东印度公司起初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得到特许，每年可以运出总值3万英镑的白银、黄金和外国钱币，同印度进行有利的通商。这打破了很久以来的成见，所以托马斯·曼在他的“英印贸易论”<sup>141</sup>一书中，就不得不在阐述“重商主义制度”的原则，承认贵金属是任何国家唯一的真正的财富的同时又证明，只要**国际收支差额**对输出贵金属的国家有利，也可以安心地容许输出贵金属。因此他才断言，从东印度输入的货物，大部分都再输出到其他国家，从这些国家得到的金银大大超过在印度购买这些货物所需的金银。根据这样的精神，约瑟亚·柴尔德爵士就写了“论东印度贸易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对外贸易”一书<sup>142</sup>。逐渐地，东印度公司的拥护者就愈来愈大胆了。在英国首先鼓吹自由贸易原则的人居然是垄断印度贸易的人，这可以说是奇怪的印度史上一段有趣的插曲。

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要求议会干预东印度公司的事务的呼声又起，不过发出这种呼声的已不是商人阶级，而是厂主阶级。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大声疾呼，由东印度输入棉织品和丝织品会使不幸的不列颠厂主们倾家荡产。约翰·波累克斯芬在他的著作“英印工业生产不相容”（1697年伦敦版）<sup>143</sup>中表示了这个意见，这本专著的书名过了150年以后果然得到了可惊的应验，不过，这种应验却同原来的涵义正好相反。那时，议

会就进行了干涉。威廉三世在位的第十一年和第十二年颁布的法令中，第十节就规定禁止用印度、波斯和中国运来的丝织品和印花布做衣服穿，并且规定谁要是收藏或买卖这些物品，就课以 200 英镑罚金。后来，在乔治一世、二世和三世时期，在如此“开明的”不列颠厂主们继续要求之下，都曾颁布过类似的法律。这样，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印度的工业品凡是运到英国来的，一般来说仅仅是为了再运到大陆出售，英国市场本身对这些工业品始终是关着大门的。

除了贪婪的英国厂主们用纠缠不已的请求使议会对东印度的事务进行干涉以外，伦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等地的商人每逢解决更换公司特许状的时候也都要用出一切力量，以求打破公司的贸易垄断，参与这种被看做是一座真正金窖的贸易。在他们强求之下，1773 年的法令（这个法令把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延至 1814 年 3 月 1 日）就有了一条规定，允许不列颠臣民私人从英国办货去印度，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办货去英国，货物种类几乎没有限制。但是这个让步附上了种种条件，使私商办货去印度的规定变得毫无意义。到了 1813 年，公司对于广大商业界的压力已无力再抵抗下去，结果，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虽然保留下来，但是同印度的贸易却在一定条件下向私人竞争开放。到 1833 年更换特许状的时候，这最后的限制也被取消，公司什么生意都不许做了，它的商业性没有了，而且还被剥夺了禁止不列颠臣民在印度居留的特权。

同时，同东印度的贸易本身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英国各阶级对这种贸易的利害关系。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

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1813年取消贸易障碍以后，英印之间的贸易额在很短的时期内增加了两倍以上。不仅如此。这种贸易的整个性质也改变了。1813年前，印度大体上是一个出口国；然而这时它却成了一个进口国了。而且这种发展又是这样快，以致到1823年，原来的一个卢比换2先令6辨士的汇率就落到了一个卢比只换2先令。自古以来就是最大的棉织品工场，向全世界供应棉织品的印度，这时到处充斥着英国的毛织品和英国的棉织品。印度本国的制品在英国不能出售，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才允许输入英国，但英国工业品却充斥印度，关税负担很小，或者有名无实，这样就毁灭了一度十分闻名的印度棉织业。1780年，英国货包括成品在内，总值只有386152英镑，同一年输出的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为15041英镑，另外，1780年英国的全部输出总值相当于12648616英镑，这样，对印度的贸易额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只占 $\frac{1}{32}$ 。到1850年，由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向印度的输出总值增至8024000英镑，其中仅棉织品一项的输出即达522万英镑，占大不列颠出口总值的 $\frac{1}{8}$ 强，占棉织品对外输出总值的 $\frac{1}{4}$ 强。现在，大不列颠在棉纺织业中就业的人口已经达到 $\frac{1}{8}$ ，国民收入的 $\frac{1}{12}$ 来自棉纺织业。在每一次商业危机之后，英国棉纺织厂主们都更加感到同东印度的贸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东印度大陆实际上就成了英国最好的销货市场。棉纺织业愈来愈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制度的命脉，东印度也随之愈来愈成为大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了。

金融寡头把印度变成自己的世袭领地，寡头政治用武力征服印度，工业巨头使自己的商品充斥于印度，他们的利益在此以前

是一致的。但是，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们就愈是感到在他们摧残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销售某些产品，那是不行的。英国厂主们发现，他们的生意不是增加，而是正在衰退。到 1846 年为止的 4 年中，印度由大不列颠进口产品的总值是 26100 万卢比；而到 1850 年为止的 4 年中，只有 25300 万卢比。另一方面，印度出口的总值也由前一时期的 27400 万卢比减至后一时期的 25400 万卢比。厂主们发现，印度对他们的商品的购买力已降到最低水平；他们看到，在英属西印度群岛，每人每年对他们商品的消费量还是 14 先令左右；在智利是 9 先令 3 辨士；在巴西是 6 先令 5 辨士；在古巴是 6 先令 2 辨士；在秘鲁是 5 先令 7 辨士；在中美洲是 10 辨士，而在印度却只有 9 辨士左右。接着就是美国棉花歉收，使英国棉纺织厂主们在 1850 年损失了 1100 万英镑。他们恼恨自己依赖美国而不从东印度弄到足够数量的原棉。此外，他们还看到，他们对印度投资的一切企图都遭到印度当局的阻挠和暗中破坏。于是，印度就成了产业资本对金融寡头和寡头政治作斗争的场所了。厂主们意识到自己在英国的权势不断加强，现在正要求消灭在印度的这些敌对势力，铲除在印度的全部旧的管理机构，彻底消灭东印度公司。

最后，让我们再从第四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印度问题。从 1784 年起，印度的财政状况愈来愈恶化，目前国债已达 5000 万英镑，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少，而支出则相应地不断增加；鸦片税这一笔不可靠的收入已很难弥补赤字，因为中国人已经开始自种罂粟，鸦片税现在已面临完全枯竭的威胁。此外，还要为毫无意义的缅甸战争<sup>144</sup>而增加支出。

狄金逊先生说：“情况就是这样：失掉印度帝国会使英国破产，但要维持它又会使我国的财政紧张，以致引起破产。”<sup>145</sup>

这样，我便说明了，为什么 1783 年以来，印度问题第一次成为英国的问题和政府的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24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7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sup>146</sup>

1853年6月28日于伦敦

就斯坦利勋爵的关于印度的建议而进行的辩论是23日开始的，24日继续进行，后来又移到本月27日，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当这些辩论最后结束以后，我打算就印度问题归纳一下自己的看法。

因为联合内阁依靠爱尔兰派的支持，又因为下院的所有其他政党彼此力量是这样平衡，爱尔兰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天平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所以，现在对于爱尔兰租佃者准备作出某些让步了。上星期五下院通过的“租佃权法案”（在爱尔兰）有一条规定：租佃者在租佃期满时应当得到补偿金，以偿付他在土地上和在土地之外所进行的改良；新的租佃者在估价时自己决定是否接收这些改良；至于改良土壤本身的补偿，则应在地主和租佃者所立的合同中讲明。

在租佃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资本投入土地，因而改良了土壤以后（这种改良或者是直接的，如灌溉、排水、施肥，或者是间接的，如农用建筑），地主就插了进来，要租佃者出更高的租金。如果租佃者让步，结果就是他用他自己的钱，而给地主利息。如果他坚持不肯，那末他就会被人不客气地赶走，换上新的租佃者，新

的租佃者由于接收了前一个租佃者投入的费用，于是就能够付出更高的租金了；新的租佃者也改良土地，结果是照老样被另外的人代替，再不然就是处于更苛刻的条件之下。住在本国以外的地主阶级依靠这种简便的方法，不仅把一代又一代农民的劳动，而且还把他们的资本攫为己有；爱尔兰的每一代农民都为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而作了努力和牺牲，但他们反而直接为了这个缘故而在社会阶梯上下降一级。如果租佃者勤劳肯干，那末正是由于这种勤劳肯干而被加上一层苛捐；如果情况相反，租佃者无所作为，马马虎虎，则被责之为“赛尔特人传统的恶习”。总之，他们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只能沦于赤贫——由于自己勤劳或由于自己不好好干而穷下去。为了对爱尔兰的这种状况进行斗争，曾宣布了“租佃权”——不是租佃者对土地的权利，而只是对他自己出钱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的改良设施的权利。现在让我们看看“泰晤士报”在星期六的社论中是怎样企图驳倒这个爱尔兰“租佃权”的<sup>147</sup>。

“农场租佃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租佃者在一定的年限内租用土地，另一种是经过预告在任何时候停止他的租佃。在第一种情况下十分清楚：租佃者有可能好好安排自己的资金，使自己在任何条件下或者几乎在任何条件下于租佃期满以前得到利益。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很清楚：租佃者不会在没有正常的收入保证的情况下冒险投入自己的资本。”

当然，在地主同那些可以随自己的意把资本投入商业、工业或农业的大资本家阶级打交道的地方，长期租佃也好，没有一定的租佃期限也好，这种资本家租佃者都知道怎样用本钱取得“正常的”收入，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对爱尔兰的情况来说，这种假设是完全骗人的。爱尔兰的情况是：一方面是人数很少的土地垄断者阶级，另一方面是人数极多的贫苦租佃者阶级，他们没有可能去选择

运用自己那一点点资金的办法，只能把这点资金投入一个生产部门即投入农业。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做没有租期保障的租佃者 [tenants at will]。作为这样的租佃者，如果他不把这点可怜的资本投进去，那末自然有得不到收入的危险。但是，如果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收入而把这些资本投进去，那末他们就要冒连这笔资本都失掉的危险。

“泰晤士报”继续写道：“也许有人会反对我们说，租佃期满时地块上什么都没有留下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租佃者的某种形式的财产，因此，租佃者应当得到补偿。这个意见有点道理，但是，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关于这种要求的问题是可以由地主和租佃者很容易地加以解决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要求都可以在最初的合同中考虑到。我们主张，这些关系应当由社会条件来调节，在我们看来，任何议会法令都不能代替这种因素。”

的确，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议会来干涉爱尔兰的租佃关系了，正如同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用不着军队、警察和刽子手来干涉一样。立法、司法和武装力量——这一切完全是不正常的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条件阻碍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无需乎第三种最高势力的暴力干涉的关系。但是，这样说来，是不是“泰晤士报”变成了社会革命者呢？是不是它不要“议会法令”而要社会革命来改组“社会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制度”呢？英国曾经摧毁了爱尔兰的社会生活条件。它先是没收了土地，然后通过“议会法令”扼杀了工业，最后用武装力量摧残了爱尔兰人民的积极性和活力。这样一来，英国就建立了这样一种丑恶的“社会条件”，使一个小小的特殊等级——贪婪的贵族得以对爱尔兰人民为所欲为，任意规定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使用土地和靠土地生活。人民的力量还弱，不能对这种“社会条

件”进行革命，于是他们就诉诸议会，要求至少把这种条件减轻或调整一下。但是，“泰晤士报”宣称：“不能，如果你们不是生活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议会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如果爱尔兰人民要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马上自己起来改变这种社会条件，那末同一个“泰晤士报”就会第一个求救于刺刀，责骂“带着传统恶习的赛尔特人”，说他们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爱和平的进步、爱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改善，并且向他们发出一连串嗜血的威胁了。

“泰晤士报”写道：“如果地主有意使一个租佃者受到损失，那末他就不容易再找另外的租佃者；既然他的全部事业就是出租土地，他就会体会到，要把土地租出去是愈来愈难的。”

但是爱尔兰的情况恰恰相反。地主越是使一个租佃者受到损失，他就越容易去压迫另一个租佃者。租用土地的租佃者成为损害前一个被赶走的租佃者的工具，而后者又成为奴役新的租佃者的工具。至于说地主由于使租佃者受到损失而到一定时期后也使自己受到损失以致破产，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爱尔兰已经成为事实，不过，要说这个事实对破产的租佃者是一种安慰也是非常成问题的。

“泰晤士报”宣称：“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是两个商人之间的关系。”

这句话正是贯穿在“泰晤士报”整个社论中的 *petitio principii* (本身尚待证明的论据)。贫穷的爱尔兰租佃者全靠土地生活，而土地都属于英国的贵族。从上述的论据出发，大可以宣布两个商人之间的关系是掏出手枪的强盗和掏出自己钱包的过路人之间的关系。

“泰晤士报”说道：“但是，实际上爱尔兰的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不久就将被一种比立法更有力的因素所改造。土地所有权正在迅速易手，同时，如

果人口外流照现在这样的规模继续下去，那末，爱尔兰土地的耕种权也将转到其他人手里。”

在这里，“泰晤士报”最后说出了实话。不列颠的议会在旧的过时的制度行将使双方——富有的地主和贫穷的租佃者——都彻底破产的时候拒绝进行干涉。富有的地主是受到管理**抵押地产**的委员会的铁锤的打击，贫穷的租佃者是由于被迫外流而被赶走。这使我们想起了摩洛哥苏丹的老故事。这位摩洛哥苏丹不管发生什么争论，他都用双方杀头来解决争端，此外他就不知道其他更“有力的因素”了。

“泰晤士报”在结束自己的关于租佃权的文章时这样写道：“再没有比类似**共产主义的财产分配**更能造成混乱了。唯一对土地享有某种权利的人就是地主。”

看来，“泰晤士报”像埃披门尼底斯一样，在本世纪睡了整整上半个世纪，根本没有听见这一时期内就地主的无理要求而进行的热烈辩论；这种辩论不是社会改革派和共产党人进行的，而是经济学家——不列颠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人物进行的。李嘉图这位大不列颠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并没有批驳地主的“权利”，因为他深信地主的无理要求所根据的是事实而不是权利，而政治经济学是根本不研究法权问题的。李嘉图攻击土地垄断的办法更简单、更科学，因而也更危险。他证明，土地的私有制不同于农业工人及农场租佃者的相应的要求，它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现代生产的整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地租——这些关系的经济表现——如能由国家握有，则有很大利益；最后，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如果要把李嘉图学派从反对土地垄断的这些前提中所得出的所有结论一一列举出来恐怕令人不

耐烦。从我的目的上来说，只要引证政治经济学方面英国的三个最近的权威的话就够了。

伦敦的“经济学家”（它的主编詹·威尔逊先生不仅是自由贸易派的神灵，而且也是辉格党人的神灵，不仅是辉格党人的代表人物，而且是历届辉格党内阁或联合内阁的国库的忠实附庸）在不同的文章中都一直肯定地认为：确切地说，不可能允许任何个人或某些个人有要求独自占有国家土地的权利。

纽曼先生在“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他公开承认这本书的主旨是驳斥社会主义）中肯定：

“任何个人，只要不亲自经营土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天然的**土地权**。他的权利只涉及使用土地，此外再没有什么权利。任何其他的权利都是人为的法律（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就是议会法令）的产物……如果到某个时候，**土地不够用了**，那末私人占有者把土地据为己有的权利也就完结了。”<sup>148</sup>

爱尔兰的情况正是这样，纽曼先生也毫不含糊地证明了爱尔兰租佃者的要求是有根据的，虽然他的讲演是讲给有地位的不列颠贵族听的。

最后让我从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著作“社会静力学”一书（1851年伦敦版）中引用几段话，这本书也是妄想完全驳倒共产主义的，并且被认为对现代英国的自由贸易学说的最详尽的阐述。

“谁也不能因自己享用土地而阻挠其他人同样享用土地。因此，正义不允占有土地，否则其他人就只有得到占有者的同意才能生活在大地上。没有土地的人甚至被人家以权利为理由从土地上赶走……妄谈现有的这种财产权利合法，从来都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谁要这样想，那就不妨看一看历史。最初的文契是用剑写成，而不是用笔写成的。公证人不是律师而是兵士；捶楚就是付通用货币；印记用血而不是用蜡。以这些为根据而产生的要求是否有

效力呢？未必。如果没有效力，那末此后的占有人，占着用这种方式取得的地产的人，还有什么权利可言呢？难道在先前没有所谓权利的地方通过买卖和世代授受就能生出权利来吗？……既然一次授受不能造成权利，那末多次授受就能做到吗？……这种没有效力的无理要求根据什么标准每年都取得这种效力呢？……整个人类对地球表面都有权利，这个权利仍然有效，不管各种各样的文契、习惯和法律如何。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能使大地成为私有财产的方法……我们的立法每天都在否认大地主所有制。怎样才能开凿水道，铺设铁路或大道呢？我们并不拘泥，需要多少英亩土地就占多少英亩。我们并不等任何人同意后才这样做……现在需要进行的变革无非是变革土地的占有者……土地不应当是个别人的财产，而应当属于大团体——社会。务农的人不应当向个人占有者租佃地块，而应当向国家租用。不应当向约翰爵士或公爵的代理人交地租，而应当把地租交给社会的代理人或下级代理人。地产管理人应当从私人的职员变成社会的公仆，而租佃制度则应当成为单纯的使用土地……已经发展到极端程度的独占土地的无理要求，造成了土地占有者的专制。”<sup>149</sup>

由此可见，甚至从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来看，对本国的土地享有权利的也只有爱尔兰的租佃者和农业工人，决不是英国的地主—篡夺者；而“泰晤士报”反对爱尔兰人民的要求，也就同不列颠资产阶级的科学直接抵触起来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6 月 2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7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  
\* 英国的工人运动<sup>150</sup>

1853年7月1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1815年起，欧洲列强在世界上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status quo（现状）遭到破坏。但是列强中的任何两国发生任何战争都有打破 status quo 的危险。因此，西方列强才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俄国在东方进行的掠夺，而且从来不向它要求任何代价，只要求它找出某种借口，哪怕是荒谬绝伦的借口也好，好使它们能够继续中立，不致于非去阻挡俄国侵略不可。俄国一直受到夸奖，都说它的“神圣君王”宽宏大量，不仅仁慈地愿意来掩盖西方各国当局的那种不可掩盖的、可耻的卑屈行为，而且对土耳其很宽大，没有把它一口吞完，而是一块一块地吞吃。这样一来，俄国外交就有了西方的国家活动家们的胆怯心理作为依靠，而它的外交术也逐渐成了一种公式，以致于对照着过去的记录就可以几乎丝毫不差地察知当前谈判的经过。

俄国的新借口是毫无根据的，这一点，在苏丹<sup>①</sup>最近向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发出了一项敕令，凡有关宗教的一切都作了比沙皇所

---

① 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要求的还要多的让步以后，已经很清楚了。但是，“绥靖希腊”<sup>151</sup>是否就是进行干涉的重大借口呢？当年，德·维莱尔先生为了消除苏丹<sup>①</sup>的顾虑并证明列强的善意，曾提议“盟国首先签订一项条约，以保证奥斯曼帝国维持其现状”，这个提议遭到了俄国驻巴黎的大使<sup>②</sup>最坚决的反对。俄国大使声称：

“俄国对土耳其政府是宽宏大量的，对自己的盟国的愿望是无限尊重的，但是，它不得不保留它独有的解决自己与土耳其御前会议的分歧的权利；向奥斯曼帝国作出一般保证，就足以伤及圣上的感情，触犯俄国既得的权利和这些权利赖以产生的原则，更不用说这种行动非同一般和突如其来了。”<sup>152</sup>

现在，俄国要求允许它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并否认土耳其有权把这个步骤看做是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

1827年，俄国曾要求允许它“以三强的名义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1828年4月2日，俄皇在宣战书中声明：

“我的同盟者会看到我时刻准备和他们同心协力地履行伦敦条约<sup>153</sup>，会看到我非常想帮助他们完成我们的宗教和全人类的神圣感情使我们关怀的那项工作；他们会看到我时刻准备纯粹为了使7月6日的条约更快地得到履行而利用我的地位。”

1829年10月1日俄国的宣言宣称：

“俄国一向就没有任何侵略思想和任何扩张意图。”

同时，俄国驻巴黎大使却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写信说：

“当帝国当局讨论以武力对付土耳其政府的时机是否来到这一问题时，大概某些人曾对这一步骤的迫切必要性有所怀疑，这些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

①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② 波茨措-迪-博尔哥。——编者注

首脑不久前用那种可怕的暴力手段推行的血腥改革的后果是考虑不够的。

皇上研究了土耳其的制度，他发现这一制度显露出一种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体力组织和精神组织的萌芽。如果说苏丹在现在，在他刚刚为实现新的改革和改良计划打基础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向我们进行更坚决更有组织的反抗，那末，如果他有了时间来巩固这种基础，对我们就更可怕了。既然形势已成这样，那我们应当引以为幸的就是还来得及在危险性增大以前转入进攻。任何迟延都只能使我们的处境恶化，并给我们造成我们不会遇到的重大困难。”

现在，俄国是想先采取侵略步骤，然后才谈论它。1829年，利文公爵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写信说：

“我们将只限于一般的提法，因为任何关于这个如此微妙的问题的具体报道都可能造成实际的危险。如果我们要同我们的同盟国一道商讨同土耳其政府签订的条约的条文，那也只有在他们自以为使我们作出了无可挽回的牺牲的时候才能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和约只能在我们自己的阵营内签订，只有在和约缔结后才能让欧洲知道和约的条款。到那时要反对已经晚了，欧洲也只好忍一口气承认它已经无法阻挡的局面。”

我在，俄国有几个月一直用种种借口迟迟不采取断然行动，以保持一种俄国可以接受而对土耳其则有致命危险的非战非和的局面。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时期内，俄国也正是这样做的。波茨措—迪—博尔哥曾就这一点发表过这样的意见：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四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人们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五个月将是一个多事的月份。”

虽然沙皇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而且现在还以武力威逼它做出最屈辱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大肆宣扬他对“苏丹阿卜杜—麦吉德的友谊”，和他对“保存土耳其帝国”的关怀。沙皇把“责任”推到苏丹身上，说苏丹违抗他的“公正要求”，说苏丹不断“伤害他的友

谊和他的感情”，拒绝他的“照会”，拒绝他的“保护权”。

1828年，查理十世曾问过波茨措—迪—博尔哥是什么原因使俄军在那年的战役中失利，波茨措—迪—博尔哥回答说，是因为俄皇不愿意在不到非常必要的时候就进行al' outrance(决死)战争，俄皇希望苏丹能抓住他表示宽大的机会，但是这种试验未能成功。

在俄国同土耳其政府发生目前这场冲突以前不久，俄国曾试图在政治流亡者问题上组成大陆列强的大联合来反对英国；当这一试图不成功时，它便极力复活同英国的同盟来反对法国。同样，在1826—1828年期间，俄国曾经用普鲁士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威吓奥地利，同时又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普鲁士并助长其野心，以便使普鲁士起到抗衡奥地利的的作用。俄国在它现在的周知照会<sup>154</sup>中把波拿巴说成是贪图圣地而破坏和平的唯一祸首。在1826—1828年时期，俄国曾经由波茨措—迪—博尔哥出面证明：

“笼罩欧洲的惊惶不安应该归罪于梅特涅公爵的阴谋”，并且，俄国极力“向威灵顿公爵本人示意，说他对维也纳当局的关注可能损害他对所有其他各国当局的影响，并且会造成这样一个转折：谋求法国同大不列颠协议的就不是俄国，而是早先为了靠拢维也纳当局而拒绝同法国结盟的大不列颠自己了。”

现在，俄国如果让步，就会大大贬低自己。它在1828年第一次战役失败以后的处境也正是这样。当时俄国的主要目的何在呢？我们让它自己的外交官来说吧：

“为了取得顺利进行谈判所必需的那种优势，第二次战役是必要的。在进行这次谈判以前，我们必须做到能够迅速而有力地迫使对方接受我们的条件……陛下在掌握较大的行动可能性的时候，将只限于提出较小的要求。在我看来，达到这样的优势，应当成为我们的全部努力所追求的目的。这种优势现在已成为我们应当在全世界面前保存和保持的那种政治存在的条件。”

但是，难道俄国不怕英国和法国的联合行动吗？当然是怕的。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公布的有关俄国用以瓦解法英同盟的手段的秘密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

“如果爆发了法国和英国联合参加的战争，俄国就丝毫没有取胜的希望，除非使这个同盟瓦解，或者，至少使英国同意当大陆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持中立。”

问题是俄国是否相信英国和法国将联合行动？让我们再看一看波茨措—迪—博尔哥的报告吧：

“自从那种认为土耳其帝国要灭亡的想法不再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时候起，英国政府就不怎么敢冒大战的危险来使苏丹不同意作某些让步，特别是在下一个战役开始之前，一切尚不明确的那个时候。这些情由使我们有根据设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大不列会公开同我们决裂。它只会建议土耳其政府求和，并且在可能举行的谈判中尽力之所及帮土耳其政府的忙。如果苏丹拒绝，或者我们坚持己见，英国也不致采取更进一步的步骤。”

至于涅谢尔罗迭对那位曾在 1828 年当大臣和 1853 年当大臣的“善良的”阿伯丁的看法，可以从利文公爵如下一段报告中看出：

“阿伯丁勋爵在和我会晤时再一次向我担保说，英国从未打算同俄国发生争执。他担心圣彼得堡对英国内阁的立场并不完全了解。他本人的处境很微妙。舆论总想向俄国大肆进攻。而不列颠政府又不能经常向舆论挑战。而且在那些与民族偏见密切关联着的问题上挑动舆论是很危险的。但是，另一方面，俄国可以完全信任同这些偏见作斗争的英国内阁的友好态度。”

如果说涅谢尔罗迭先生的 6 月 11 日的照会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那末，值得惊奇的并不是“无耻之极地混合了为事实驳倒的声明和被词藻掩饰的威胁”，而是欧洲对俄国外交照会第一次采取这种态度：西方世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敬畏和颂扬，而是为过去感到羞愧，并且轻蔑地嘲笑了这种把狂妄的野心、狡猾的伎俩和十

足的野蛮无耻之极地堆在一起的东西。但涅谢尔罗迭的周知照会和6月16日的“紧急最后通牒”仍然丝毫不亚于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备受赞扬的杰作。而那时涅谢尔罗迭伯爵也和现在一样，是俄国外交的首领。

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位研究熊的波斯自然科学家，其中一位从未见过这种动物，就问道：这种动物是下崽呢还是产蛋呢？另一位比较熟悉些的回答说：“这种动物什么事都能做”。俄国熊无疑也是什么事都能做，特别是当它知道它要与之打交道的另一些野兽什么事也不能做的时候。

我想 en passant (顺便) 提一提俄国最近在丹麦国王咨文以119票对28票的多数获得通过这件事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请看下面一段话：

“联合议会根据1849年6月5日宪法第四条，同意按照国王1853年6月13日再次提出的1853年10月4日的王位继承咨文，在整个丹麦王国执行国王关于王位继承制度的诏令。”

工人的罢工和联合正以飞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发生和扩展着。我现在有以下各地工人罢工的报告书：斯托克波特各行各业工厂工人的罢工；曼彻斯特铁工、纺工、织工等等的罢工；基台尔明斯特织毯工人的罢工；布里斯托尔附近林格伍德各煤矿矿工的罢工；布莱克本和达尔温织工的罢工；波士顿红木细工工人的罢工；波尔顿及其近郊的漂白工、研光工、染色工和机械织布工的罢工；班斯里织工的罢工；斯比脱菲尔兹丝织业工人的罢工；诺定昂花边编织业工人的罢工；北明翰区及许多其他地方各行各业工人的罢工。每班邮递都会带来罢工的新闻。停工带有传染性。每一次大罢工，如斯托克波特和利物浦等地的罢工，都必然产生一连串较

小的罢工,因为大部分工人若不向王国其他各地的工人伙伴请求支援,就不能胜利地反抗厂主,而其他各地的工人为了援助自己的同行,就要求提高工资。此外,对于每一个地区来说,不同意恶劣条件,以免自己的工人伙伴在斗争中孤立,已成为有关荣誉的事情和共同的利益。所以,一个地方的罢工就会得到最远地区的罢工的响应。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提高工资只不过是意味着要求处理厂主的旧有欠债问题而已。在斯托克波尔特大罢工时就是这样。

1848年1月,斯托克波尔特的工厂主把各种工人的工资普遍降低10%。工人们同意了这种降低,条件是一当情况好转就恢复这10%。因此,1853年3月初工人们向厂主们提起他们所答应的10%的增加额。他们同企业主们没有达成协议,于是宣布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有3万多人。在大多数场合下,工厂工人都明确地声明说:国家,特别是他们的厂主在繁荣时获得的收入,他们有权享有一份。

现在罢工的特点是:罢工先在下层不熟练(非工厂)工人,即现在直接受人口外流影响的工人中开始,换言之,是在各种普通工匠中开始,然后才把大不列颠各大工业中心的工厂无产阶级卷进来。以前的罢工正相反,总是先在工厂工人上层,即在机械工人、纺纱工人等等之中开始,然后再扩大到这个巨大的工人群的下层,最后才把工场工人卷进来。这个特点完全是由于人口外流的影响而产生的。

有这样一种慈善家,甚至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罢工对“工人本身”的利益是极其有害的,并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找到一种能保证固定平均工资额的方法。由于具有各种不同阶段的工业周期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任何这类平均额——这一点且不去说它。我反

对这种观点,我确信,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谁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须坚决参加战斗。为了正确估价工人的罢工和联合的意义,我们不能让那种表面上看来它们的经济成果不大这样一种情况所迷惑,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它们精神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我们不应该忘记,农奴的罢工和联合曾是中世纪市镇的来源,而中世纪的市镇又是现在当权的资产阶级的摇篮。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目前工人的斗争对英国宪章运动可能具有的意义<sup>①</sup>。我的预测业已被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再度掀起的运动于头两个星期获得的成果所证实。大家知道,第一次露天群众大会原定在黑石山脊举行。在上月19日,郎卡郡和约克郡宪章派的地方小组的代表到了那里,并成立了代表会议。厄

<sup>①</sup> 见本卷第151—154页。——编者注

内斯特·琼斯提出的要求实行宪章的请愿书,以及以这两个郡召开的会议的名义提出的请愿书,都得到一致的赞同。会议决定委托那位同意转达宪章派的一切请愿书的南威克的议员阿普斯利·佩拉特先生呈递郎卡郡和约克郡的这份请愿书。至于群众大会,当时就连最乐观的人都认为开不成了,因为天气太坏,雷声越来越大,倾盆大雨下个不停。起初只有少数一些人爬上山丘,但很快就有更多的人群出现,从高处向周围的溪谷望去,在透过密密层层的两帘所能看到的地方,可以看见一条条蜿蜒如带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沿着附近村落的大小道路伸展过来。到原定的开会时刻到来的时候,已经有 3000 多人集合在这座离开村镇很远的山丘上,而且在发言人长时间的讲话过程中,尽管大雨如注,与会者仍然一直在原地坚持到最后。

爱德华·胡桑先生提出的决议案指出:“压在英国工人阶级身上的社会重担是阶级立法的产物,接受人民宪章是对付这种阶级立法的唯一办法”。这个决议案得到宪章派执行委员会<sup>155</sup>委员盖米季先生和厄内斯特·琼斯先生的支持。现在让我从这两位发言人的讲话中摘录几段。

盖米季先生说:

“决议案认为人民身荷重担的原因在于阶级立法。我想任何一个注意事件进程的人都不会反驳这种意见。所谓众议院,对于群众的一切申诉一直充耳不闻;而当人民大声申述自己的灾难时,从那些冒充国民代表的人们那里得到的无非是嘲笑和愚弄;即使人民的呼声偶尔例外地在议院得到反应,也势必被我们那些占多数的强盗般的阶级立法者的起哄声所湮没。(热烈鼓掌)下院不但拒绝满足人民群众的公正要求,而且甚至还拒绝调查他们的社会状况。诸位一定还记得,前不久斯雷尼先生曾向议院提议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调查人民的生活情况并拟定救济办法,但是议院竟坚决回避讨论这一问题,

当上述提案提出时，仅有 26 名议员在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议院会议改期。（高喊声：“真可耻，真可耻！”）当这一提案再次提出时，斯雷尼先生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且，据发言人（盖米季先生）的记忆，656 名可尊敬的绅士中仅有 19 名在场的议员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如果我给你们谈一谈人民的实际状况，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意见：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的理由是再充分不过的了。经济学家们确定，我国每年的产值估计为 82000 万英镑。假定联合王国的工人家庭有 500 万户，每户的平均收入每周为 15 先令，其实这个数目我觉得比实际收入高得多（呼喊声：“太高了！”），但我们还是把平均数定为 15 先令，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工人们从他们的巨额年产值中仅取得很少的一部分，即 19500 万英镑（呼喊声：“真可耻！”），而其余的全部装入寄生的大地主、高利贷者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腰包……还用得着证明这些人就是掠夺者吗？最可恶的盗贼并不是那些囚禁在我们监狱里的人；最大最狡猾的盗贼是那些借助于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掠夺人民的人，这种大掠夺就是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小掠夺的真正原因……”<sup>156</sup>

盖米季先生接着分析了下院的成分，他指出，如果注意到这个议院的议员们是属于哪些阶级和代表哪些阶级，就决不会想到在他們和千百万劳动者中间还会有某种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谅解。发言人最后说，人民应热认清自己的社会权利。

厄内斯特·琼斯先生说道：

“今天我们的要求是使我们的宪章成为法律。（热烈鼓掌）我号召你们回到伟大运动的行列中来，因为我深信，时机已经成熟，胜利现在就靠你们，所以我热烈地希望你们不要放过这个大好时机。现在，工商业复苏和人口外流使你们暂时有了力量，但你们将来如何却要看你们怎样利用这种力量。如果你们利用这种力量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目前的需要，那末，现在的情况一旦改变，你们就会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你们利用自己的力量不仅仅是为了巩固现在的地位，而且也为了保证将来，那你们就会战胜所有的敌人。工商业复苏和人口外流固然是你们力量的源泉，但这种力量必然会随着商业复苏和居民外迁的中止而消失的，所以你们现在如果不为自己作打算的话，那就会陷入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糟糕的奴隶地位。（呼喊声：“对，对！”）而且，现在使你们力量

增强的那些因素，很快就会变成使你们力量削弱的原因。使劳动力数量减少的那种人口外流现象很快就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量……

停滞局面会到来的，请问，你们应付这个局面的准备怎么样？你们参加了工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的光荣运动，并且实际上在这方面取得了某些成果。但是请注意：这些成果你们并不是通过议会得到的！请注意企业主们的这样一种阴谋：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叫他们高兴高兴，但法律却一条也不能给他们！不能让议会通过工资法，但可以在工厂里实行议会的某些要求。（呼喊声：“注意！”）于是雇佣奴隶会说：我们用不着靠什么政治组织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或调整工资的法律。我们用不着通过议会，而是依靠自己达到自己的要求。是的，但你们能否不通过议会把争得的东西保持下来呢？是什么原因使你们得到胜利呢？是工商业复苏。是什么原因会使你们失掉胜利的果实呢？是工商业停滞。你们的厂主们晓得这一点。所以他们才缩短你们的工作日，增加你们的工资，或者把他们扣留的那部分工资发还你们，他们所以这样做，是想叫你们不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来实行这些措施。（鼓掌）他们缩短工作日，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减少他们工厂的生产；他们增加你们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很快就要根本不给你们当中成千的人发任何工资。与此同时，他们，特别是中央各郡的工厂主们，还对你们说：即使那些于他们不利的法律能够通过，也只不过是迫使你们寻找其他掠夺你们的手段而已，——这就是他们的真意。这么说，第一，你们不可能获得你们所需要的法律，因为你们没有人民议会；第二，即使这些法律能够通过，工厂主们也会像他们自己断言的那样，还是要回避实行这些法律。（高喊声：“对！”）那末我就要问，你们对将来怎么办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呢？你们对自己现有的巨大力量利用得怎样呢？因为，如果你们不在现在就做好准备，那就会变得毫无力量，就会失去所争得的一切。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就是要向你们说明如何才能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成果。有些人认为宪章派的组织会妨碍工人运动。天晓得！只有宪章派的组织才能把工人运动引向胜利……一个工人如果不能自己为自己谋得工作，那他就不能离开企业主。但工人如果不掌握土地、信贷和机器等劳动资料，那他就不能自己为自己谋得工作。工人如果不消灭土地、货币、商业等等的垄断，是决不可能掌握这些劳动资料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不掌握国家政权是不行的。为什么你们要力争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呢？如果不需要用政权来保证工人的自由那又何必进入议会呢？为什

么不把自己的活动立即转向工厂呢？这是因为，你们知道，感觉到，并以自己的全部行动默默地证实：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取得社会解放。（热烈鼓掌）所以，我现在请你们重视政权的基础，即重视普选权，重视宪章。（掌声如雷）……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等危机到来，千百万人自动同我们联合起来呢？’——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运动不是危急感和一时的激动所产生的运动，而是建筑在稳固的信念和精神力量上面的运动。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指望感情的冲动，而是遵循理智的呼声。所以我们号召你们把我们的组织恢复起来，以便使你们不受自发势力的支配，不受这种自发势力的任意摆布。商业停滞会再一次引起大陆上的革命，所以必须矗起宪章运动的牢靠灯塔，让它在暴风雨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中给我们照亮道路。总之，我们今天宣布恢复我们的运动；同时，为了获得正式的承认，我们选择向议会请愿的方式——这倒不是我们指望议会会接受我们的请愿书，而是因为我们要用这种方式作最适当的传声筒，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死而复活了。那些在不久以前曾宣布我们已死的人们，现在将不得不接受宣布我们复活的荣幸了，我们的请愿书就是宣告我们再生的证明书。”（掌声如雷）<sup>157</sup>

胡桑的决议案和提交议会的请愿书，在这次集会以及在这个星期内举行的后几次集会上，都一致而且热烈地通过了。

在黑石山脊的集会上，厄内斯特·琼斯还宣布了7年前在这个地方召开的宪章派大会<sup>158</sup>的主席——工人本杰明·腊斯顿的逝世。琼斯提议把腊斯顿的葬仪变成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把这次葬仪同西莱丁的宪章派大会结合起来，以利于宪章被接受。他说，这样做是安葬已故的老战士的最好的方法。必须指出，在英国的民主运动史上还从未有一次游行示威像上个星期日在西莱丁举行的恢复宪章运动大会和本杰明·腊斯顿的葬仪那样声势浩大；在哈里法克斯集会的人有20万以上，——这种情况甚至在运动的最盛期也是没有过的。我奉劝那些仅仅根据英国社会的那种死气沉沉的易患中风的外表来判断这个社会的人们，到这样的工人集会上去

深入地看一看那种负有摧毁这个社会的使命的力量。

联合内阁在印度问题的初步交锋中取得了胜利：斯坦利勋爵关于延期采取立法措施的提案被 184 票的多数所否决。紧急事务使我不得不把我对这次投票的评述先放一放。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8 年 7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19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土耳其战争问题。——“纽约论坛报”  
在下院。——印度的管理<sup>159</sup>

1853年7月5日星期二于伦敦

6月24日，信使把列施德—帕沙拒绝俄国的紧急最后通牒的通知送达彼得堡，三天以后，哥尔查科夫公爵接到了特派信使送来的命令：强渡普鲁特河，并占领多瑙河各公国。

奥地利当局特派居莱伯爵去谒见沙皇；他无疑是要警告沙皇，要他注意任何全欧洲性的战争都孕育着革命的危险。至于俄国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能作怎样的答复，可以根据它在1829年对同一个国家的类似说法所作的答复作出判断。下面就是这个答复的内容：

“据此，奥地利当局再一次列举了各种理由来说明骚动十分可虑，根据它的看法和它所掌握的情报，这种骚动决不是仅仅在一个国家里蔓延着；同时，它还列举了革命密谋近来取得的成就。这些担心在弗兰茨国王的信中（给尼古拉的）反映得特别明显。我们决不想否认奥地利向我们指出的危险。由于土耳其政府在外国的影响下所作的抗拒带有执拗的性质，致使目前的危机迟迟不能结束（这违反我们的意图和愿望），甚至迫使我们作出加倍的努力并且准备去作新的牺牲，因此，俄国不得不比任何时候都要关心直接关系到它的荣誉和它的臣民的福利的一切利益。这样一来，俄国本来可以用来对付欧洲其他部分的革命暴乱的手段，现时迫于必要将受到牵制。因此，奥地利在这种情

况下比其他强国更关心缔结和约,但是未来的和约对我皇必须崇敬,对我皇之帝国必须有利。如果要我们签字的条约不具备这种性质,那末俄国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将受到致命打击;俄国将丧失它作为强国的威信,而且,它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应对友好同盟国家所作的道义支持也可能变得没有力量,收不到效果。”(涅谢尔罗迭伯爵于1829年2月12日从圣彼得堡寄给塔提舍夫先生的秘密信。)<sup>160</sup>

据上星期六的“新闻报”报道,沙皇对英国,特别是对阿伯丁勋爵的行为异常恼怒,特指示布隆诺夫先生不要再同这个“善良的”老头子保持任何关系,只同外交大臣作官方的交往。

奥地利银行巨头的机关报——维也纳的“劳埃德氏报”<sup>161</sup>极力鼓吹奥地利联合英法来对付俄国的侵略政策。

诸君大概还记得,联合内阁在4月14日表决废除广告税的建议时曾遭到失败<sup>①</sup>。7月1日,联合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又遭到了两次失败,就在这一天,格莱斯顿先生建议把广告税由1先令6辨士降为6辨士,并扩大范围,使广告税适用于所有书刊和其他出版物上刊登的广告。建议取消现有一切广告税的米尔纳·基卜生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以109票对99票被否决。在这以后,当格莱斯顿先生的拥护者认为已经取得胜利,纷纷离开议院去出席宴会或宫廷舞会的时候,布莱特先生起来发了言,他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力的演说,反对征收知识税,特别是反对征收印花税和广告税。我从他的发言中引用几段诸君可能感到兴趣的话。

“他(布莱特先生)说,他手里现在拿着一份篇幅大小同伦敦的任何一家没有附刊的日报相同的报纸,他认为,这份报纸一点也不比在伦敦出版的任何报纸差。这份报纸的铅字比任何伦敦的日报都要讲究。纸张是上好的,完全

<sup>①</sup> 见本卷第66、80页。——编者注

符合报纸的一切要求。就印刷来说,未必有比它更好的了。它的材料比伦敦任何一家同样开本的日报都充实。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登满了广告。在这一号上登载的有:一篇关于美国美术协会的研究成果的长篇文章,一篇综合论述欧洲各种最近事件的社论,一篇关于渔场问题的辩论的社论,另外还有一篇他完全赞同的社论,这篇社论证明,社交宴会是社会的灾难。(座上喊声:“对,对!”笑声)他过去也曾看到过一些从风格的角度来看写得较好的文章,但是语调比这更贴切更有益的文章他是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此外,该报还载有以下一些文章:‘欧洲归来三日记’、‘“亚洲号”轮船的到来’以及一篇欧洲新闻简述。从大不列颠收到的是一篇详细分析高贵的绅士<sup>①</sup>提出的预算的文章。这个预算的某些部分得到赞同,其他的部分没有得到赞同,而牵涉到曼彻斯特学派的论点的一部分则完全没有得到赞同<sup>162</sup>。(笑声)此外,还有关于斯托女士访问爱丁堡的报道,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关于裁缝的困难处境的长文,几篇来自希腊、西班牙和其他大陆国家的通讯,还有一篇文章专谈阿思隆的选举和女王陛下的法律顾问官被整整 189 票选入议会的事情——这件事对美国读者来说是非常有趣的!然后还有几栏简讯和一些非常周详的说明贸易和市场情况的表格。该报不断地反对酗酒和奴隶制度,他[布莱特]敢说:目前在伦敦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报纸了。这个报纸的名称就是‘纽约论坛报’;每天早上,它准时地出现在每一个愿意花费 1 辨士买它的纽约工人的饭桌上。(座上喊声:“注意,注意!”)发言人要向政府提出下列的问题:为什么,为了什么有益的目的和为了什么财政的理由要使伦敦的工人付 5 辨士才能买一份晨报,而他在纽约的直接竞赛者只要 1 辨士就能买一份报呢?我们正在全世界的面前同美国公开进行竞赛;但是,如果我国工人被迫根本不看报,要看就得花 5 辨士买一份,再不就是上小酒馆里去看,而美国的每一个工人只花 1 辨士就能买一份报,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谈得上两国工人在平等原则上的竞赛吗?同样也很难说,根本不看价目表的英国商人能够像每天都能利用这种好处的商人那样顺利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座上喊声:“对,对!”)……如果财政大臣要反对的话,那末发言人就要直截了当和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提出反对是因为自己内心里害怕出版自由;高贵的绅士曾说有财政困难,发

① 格莱斯顿。——编者注

言人说，这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唯恐人民有出版自由和比较广泛的政治情报来源。（座上喊声：“对！”）而死死抓住6辨士的广告税不放，硬说这一项税收为补充印花税所必需，只不过是害怕出版自由而已。”

接着克罗弗德先生建议用0辨士这个数字代替6辨士的数字。科布顿先生支持这个建议；并且针对格莱斯顿先生所说的广告税不会严重地影响报纸以低廉价格发行的话，提醒格莱斯顿先生注意霍拉斯·格里利对1851年讨论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所说的话。

“格里利先生当时是大展览会的特派员之一，是他的尊敬的朋友布莱特先生刚才引用的那份报纸的所有人。格里利在回答如果在美国实行广告税将会产生什么后果的问题时曾说：这项税收将置美国的新报纸于死地。”

于是约翰·罗素勋爵起来发言，他用相当生气的语调说，在这么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企图取消已经通过的决定，这未必是诚实的做法。显然，约翰勋爵忘记了：正是在这个关于广告税的问题上，他的同僚们曾经被总共只有40票的多数击败，而现在也只得10票的多数。尽管约翰勋爵就“宪制”严格性说了一番训词，格莱斯顿关于每个广告征税6辨士的建议仍然以68票对63票被否决，克罗弗德先生的修正案则以70票对61票被通过。迪斯累里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表决时是同曼彻斯特学派站在一起的。

看来下院好像是特别强调问题重要和内容丰富似的，它所进行的关于印度的辩论拖得特别长，扯得特别广泛，虽然这些辩论说不上有什么深刻性和重大意义。表决情况（这次表决使内阁以322票对142票得到了多数）同辩论情况形成了一个对照。辩论给内阁带来的只是满路荆棘，查理·伍德爵士就扮演了被官方放出来吞食掉这些荆棘的驴子的角色。而表决的结果却是一束玫瑰，同

一位查理·伍德爵士则被宣布为摩 第二。正是那些根据自己的理由驳斥过内阁的草案的人，投了赞成票使它通过了。在法案的支持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敢于从实质上为这个法案辩护；相反，他们都为自己支持这个法案作辩护：一部分人的理由是，这个法案毕竟是方向正确的措施中的小小的一部分，另一些人的理由是，这个法案根本不是措施。前者说，他们将在全院委员会里对法案作修改，而后者说：他们将去掉它的所有假改革的装饰。

内阁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托利党反对派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散了，而其余的相当一部分托利党人则在赫里斯和英格利斯的率领下投到了阿伯丁营垒里去；至于反对法案的 142 票，其中有 100 票属于迪斯累里派，42 票属于得到某些抱不满情绪的爱尔兰人和某些“野人”支持的曼彻斯特学派。反对派内的反对派又一次挽救了内阁。

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之一哈利戴先生，在回答调查委员会的问题时说：

“在印度居民看来，特许状赋予东印度公司 20 年租借权这个事实，就等于把他们自己租出去了。”

至少，这一次特许状的效力没有恢复到一定时期，因此可以根据议会的愿望随时予以废除。这样一来，一直处在世袭租借人这个稳固地位的东印度公司，势必下降到没有租期保障的租借人 [tenant at will] 这个不稳定的地位。印度的居民从这里只能得到好处。关于印度的管理问题，同所有其他问题一样，终于被联合内阁搁置了起来。而下院则又一次地暴露了自己的可怜相：它在同一次表决中既表明了自己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项法律，又表示出自己不愿意把制定法律的事情拖延下去。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候起，世界上就充满了大量有些是出色的，有些是胡说八道的学术著作，一齐来研究这个题目：谁应当被赋予政府的权力？但是，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一个统治民族（它统治着另一个拥有 15600 万人口和 1368113 平方英里的民族）的贤明立法者的议会，在它的庄严和公开的会议上想来解决这样一个不平常的问题：在这些贤明的立法者中间是谁执掌管理 15000 万人口的异民族的实际权力？在不列颠的贤人议会中，并没有出现能解决这一难题的奥狄浦斯。所有的辩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但是，进行了表决之后，关于印度的管理问题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印度的财政连年亏空；它的军费负担过重，而公共工程方面的支出却等于零；在那里实行着可恶的苛捐杂税制度，司法和法律也同样可恶。以上这五点可以说就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上的五个主要章节。所有这一切，在 1853 年的辩论中都被肯定了，完全没有争论，同 1833 年的辩论、1813 年的辩论、甚至所有过去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的情况一样。唯一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就是哪一个政党应当对这一切负责。

不错，在印度设有掌握最高权力的总督。但是这个总督也是由设在英国的管理机关 [home-government] 来管理的。那末，又是谁代表着这个管理机关呢？是督察委员会主席这个普通头衔掩盖下的印度事务大臣呢，还是东印度公司的 24 位董事？在印度教的庙宇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而在管理印度的庙宇的门口，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东西，只不过不是神罢了。

如果暂且不谈总督，那末我们提出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

**双重管理制度**的问题——这是英国人惯用的形式。内阁和议院一个用法案一个用表决表明了，它们是非常坚持这种二元论的。

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公司征服了印度来搜刮钱财，当这个公司开始把自己的海外商馆网扩大到整个帝国范围的时候，当它同荷兰和法国的私商之间的竞争开始具有国家与国家竞争的性质的时候，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事务当然就开始干涉起来，于是，管理印度的双重制度，即使没有经过正式的手续，但实际上已经产生了。1784年的皮特法令规定同东印度公司妥协，使它受督察委员会监督，同时又使督察委员会成为英国政府的附属物，这个法案从手续上和事实上批准、确认并且整顿了这个自发产生的双重管理制度。

1833年的法令加强了督察委员会，把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变成了纯粹的债权人——东印度进项抵押券的持有者，并且命令东印度公司卖光自己的商品储备，停止了公司的商业活动，另外，鉴于公司仍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继续存在，就把它改组为纯粹的王室代办，总之，这个法令对东印度公司采取了东印度公司自己对东印度王公惯用的手法：取代以后，暂时仍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管理。自1833年到现在，东印度公司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存在。由此可见，一方面，完全摆脱这个公司看来并不困难，而另一方面，无论英国是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义统治印度，还是用传统的挂名公司的招牌统治印度，完全是一样的。这样看起来，全部问题似乎只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形式问题。但实际上问题完全不是这么简单。

首先必须看到：设在坎楠路的政府机关即督察委员会，像一般人认为设在莱登霍尔街的东印度公司本身一样，也是一个虚设的

机构。督察委员会的委员们虚有其名，最高权力属于委员会主席。主席本身虽然是帝国内阁的独立成员，但仍然不过是二等角色。据说在印度一般人有这样的看法：派不了用场的人最好是让他当法官，用这种办法把他打发走。在大不列颠，如果一个政党在执政以后不知道该怎样来安插它的某一个第十等“国家活动家”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当督察委员会的主席、大莫卧儿的继承人——teste Carolo Wood (查理·伍德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

从法律字面上来看，督察委员会，事实上也就是该委员会的主席，

“有全权来领导、监督和检查东印度公司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印度领地的管理及领地收入的一切法令、业务和事务”。

#### 公司董事不准

“在没有得到督察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出任何命令、指示、报告、公函以及任何涉及印度或印度的管理的通讯”。

#### 公司董事必须

“在督察委员会发出指令之日起的两星期内，拟好一切有关问题的指示和命令，或者是根据委员会的委任，转发委员会的有关印度事务的命令”。

督察委员会有全权检查股东会 and 董事会的一切信件和所有发往印度和来自印度的报告，并检查它们的公文处理情况。最后，董事会任命一个机密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副主席和一名最有资格的董事组成，他们必须宣誓保密，督察委员会主席可以通过他们把他个人关于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指令发往印度；这个委员会所起的只是普通联络站的作用。关于同阿富汗和缅甸作战和侵占信德的命令，就是通过这个机密委员会转发出去的，而董事会对这些

命令所知道的并不比广大公众和议会多。因此，督察委员会的主席看起来一直就好像是一个真正的大莫卧儿，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为非作恶的无限权力，例如，策动耗费极大的战争，而且每一次都是用毫无责任的董事会的招牌做掩护。但是另一方面，董事会也并不是没有实际权力。由于在行政措施方面通常是由董事会负责，由于它是一个比督察委员会更固定和稳定的机构，有传统的活动方式，了解具体情况，因此，一切日常的内部行政事务自然都归它处理。它经过国王批准任命印度的最高当局——总督及其参事，此外，它还拥有罢免高级官员，甚至罢免总督的无限权力，例如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时期，董事会就曾经这样对付过埃伦伯勒勋爵。然而这还不是董事们的最主要的特权。他们的年薪一共只有 300 英镑，但是实际上他们是靠卖官鬻爵得到收入，他们可以保荐所有的文职和军职人员，印度总督和各管区的省督都必须从这些被保荐的人中间挑选担任各种官职的人，因为印度居民是禁止担任这些官职的。在确定一年的出缺数字后，这一数字就被分成 28 等份，其中有两份给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两份给督察委员会的主席，其余每个董事各得一份。每份卖缺所得的收入，每年不下 14000 英镑。

坎伯尔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任命似乎都成了个人的私有财产，因为这些任命都是在董事之间进行分配的，董事可以自由地处理自己所得的那一分。”<sup>163</sup>

因此，十分清楚，整个印度的高级行政机关都要按照董事会的精神行事，它的代表都是阿迪斯康和海利贝里学校的学生，都是靠着董事的提携而被任命的。同样十分清楚，这个年年把总值达 40 万英镑的职位在大不列颠上等阶级中进行分配的董事会，不会受

到这些阶级所操纵的舆论的严重攻击，甚至根本不会受到攻击。至于董事会的精神是什么样的，我将在下一篇关于印度现状的文章中说明。现在只谈一点，即在这次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时，马考莱先生曾经用一种特别的方法为董事会辩护，说什么董事会即使有心作恶也没有力量去做；例如，所有的改进办法都是自己做事自己担的省督们不顾它的反对并且同它作斗争之后实施的。通过这样的途径，禁止了撒提<sup>164</sup>的风俗，废除了可恶的过境税，准许了东印度的出版自由。

所以，督察委员会主席是以董事会为掩护把印度拖入耗费巨大的战争，而董事会则以督察委员会为掩护败坏印度的行政机关。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这个畸形管理机关的结构，就会发现在它的基础中还有一种比督察委员会和董事会再强大的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更没有责任，更不容易看出，更不容易受到舆论的监督。可以更换的督察委员会主席靠这个位于坎楠路的机关中的固定的官员们办事，而在这些官员们看来，印度并不在印度，而是在莱登霍尔街。那末谁是莱登霍尔街的主宰呢？

2000 位上年纪的女士和有气无力的绅士（他们掌握着印度的股票，他们关心印度仅仅是因为可以按期从印度的收入中得到红利）选出 24 名董事，这些董事唯一的美德就是他们是 1000 英镑股票的持有者。商人、银行家和各种公司的董事都千方百计想钻进董事会，以便更好地安排私人的事业。

布莱特先生说：“伦敦西蒂区有一个银行家在东印度公司拥有 300 票，在选举董事时，他的话几乎是绝对的法律。”

因此，董事会不过是英国金融巨头的**从属机关**。用这种方法选出来的董事会，除了上面说到的机密委员会外，还建立了三个委员

会，这就是：(1)政治和军事问题委员会；(2)财政和内政委员会；(3)收入、司法和立法问题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每年都互相轮换，这样，某个金融家今年如果参加司法委员会，下年就参加军事委员会，任何人都可能一直在一个部门里管事。选举董事的办法本身就已经使担负这些职务的都是根本不懂如何办事的人了，而轮换制度又彻底毁灭了某个人可能偶然表现出来的最后一点点办事能力。那末究竟是谁以董事会的名义从事实际的管理呢？这就是印度大厦<sup>165</sup>里的一大堆不负责任的秘书、视察员和官员，在这些人当中，正如坎伯尔先生在他的“印度管理方案”<sup>166</sup>中所指出的那样，也许仅仅只有一个人曾经到过印度，并且还是偶然去的。因此，如果把卖官鬻爵的交易撇开不谈，也就谈不上董事会活动的政治方向、原则或任何制度了。真正的董事会，英国管理印度的真正的机关等等，就是那个位于莱登霍尔街的常设的、不负责任的**官僚机关**——“办公桌和裙带风的养儿”。这就是说，管理着一个庞大帝国的，还不如过去在威尼斯那样，是著名的贵族所组成的自治公所，而是一群昏庸老朽的办事员和一些同样的夤缘幸进的人。

因此，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印度政府这样写得多而做得少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当东印度公司还只是一个商业性的团体时，它当然像所有的贸易公司一样，要求印度商馆的经理人员对每个问题都做出最详细的报告。但是，当商馆变成了一个大帝国，而商业报告变成了一大堆信件和公函时，莱登霍尔街的官员们就占了这样的优势，以致董事们和督察委员会都从属于他们了；他们终于把印度政府变成了一架巨大的打字机。布罗顿勋爵在向公职人员薪俸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曾经透露，有一次发出的报告竟长达45000页。

为了使诸君多少能够想像出印度大厦办公室在办事时是如何消耗时间的,我现在来引证一段狄金逊先生的著作。

“当印度来了一份报告的时候,首先就把它交给有关的视察员办公室 [Examiners' Department]; 然后主席们<sup>①</sup>就同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一起进行讨论,商量好回信的内容;他们再把回信草案送交印度事务大臣<sup>167</sup>;所有这一切用行话来说就叫做初报——初步报告 [previous communication]。在这个所谓初报的初步阶段中,主席们完全依赖着官员。这种依赖性如此之大,甚至在主席作了开场白之后股东会进行讨论时,还可以看到这样可怜的情景:主席经常向秘书请教,秘书坐在他的旁边,帮助他主持会议,不时向他耳语,作提示,打断他的发言,他完全像是一个傀儡;处在这个制度的相反的一端的印度事务大臣的处境也同样困难。如果在初报阶段对草案发生了意见分歧,那就要进行讨论,而问题几乎始终都是通过大臣和主席友好地交换意见而得到解决。最后,大臣批下回信草案,或者赞成,或者做些修改之后,就连同一切有关文件送给董事会中负责监督有关办公室的委员会审查和讨论;经过该委员会通过或修改后,再送交董事会全体会议履行同样的手续。只是在这一过程之后,它才第一次作为正式公文送给大臣,然后重新经过同样的一道道层次发回来。”<sup>168</sup>

坎伯尔证明:

“当印度讨论关于某项措施的问题的时候,如果听说问题已经提交董事会,大家就认为问题的解决已遥遥无期了。”<sup>169</sup>

这种官僚机关所造成的腐臭恶劣的气氛,受到伯克的下面一段著名的话的痛斥是应当的:

“这一群卑劣的小政客不折不扣是人类的渣滓。政府工作在他们手中变成了一种最卑鄙、机械的行业。他们根本不作好事。一切仅仅根据良心和人格而做的事都会使他们发火。他们把开阔的、自由主义的和有远见的对国家利益的看法都看做浪漫主义精神,把与这些看法相适应的原则看做精神不正常

---

<sup>①</sup> 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主席和副主席。——编者注

的呓语。做买卖赚钱的算计使他们失去了思维能力。丑角的谄笑使他们把一切伟大和崇高的事物都当作耻辱。目的和手段的贫乏在他们看来就是思想健全和头脑清醒。”<sup>170</sup>

莱登霍尔街和坎楠路的办公机关使印度人民付出的东西极为有限——每年 16 万英镑。政治寡头为了使自己的小儿子有事可做，连年把印度拖入战争；金融寡头像拍卖一样地出卖印度，地位较低的官僚则瘫痪它的管理制度，使营私舞弊永远存在下去，把这当作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

查理·伍德爵士的法案一点也没有改变现存的制度。这个法案扩大了内阁的权力，但丝毫没有加重它的责任。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5 日  
载于 1853 年 7 月 20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824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 累亚德的质询。——围绕着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斗争

1853年7月8日星期五于伦敦

多瑙河各公国实际上的被占领以及早在意料中的危机日益逼近，迫使英国报界显然放低了好战的调子。因此，“泰晤士报”在两篇社论中连续发表的意见才没有引起什么重大的异议，它的意见是：“既然俄国人不能克制自己在野蛮国家里进行文明活动的意图，那末对英国来说，最好是让他们自由行动，不要由于无益的固执而破坏和平。”

关于当前议事日程上的土耳其问题，政府一心一意不愿提供任何情报，因此在上下两院中同时演出了一场可笑的滑稽剧。在下院中，著名的古尼尼微修复家<sup>171</sup>累亚德先生发表一项声明，说他要在今晚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内阁向下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和俄国的详细情报。这项声明提出以后，在下院就出现了如下的一个场面。

累亚德先生。——已经宣布我在明天质询。昨天下午我接到一份通知，要求我把质询延到本月11日（星期一）提出，当时我不可能作出答复，事实上在今天早晨以前作答复也办不到。使我惊奇的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昨天我到下院来过，因为我在同投票结果一块印发的提案简报中看到，说累亚德先

生已经把他的发言从本月 8 日(星期五)延至本月 11 日(星期一)!用这种态度对待独立的议员,我认为未必公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不知道是谁下指示和授权在下院的公报上刊登延期发言的声明。我只能向敬爱的议员先生保证一点:已经做的一切,都是出自绝对的 *bona fide* (善意)

**累亚德**先生。——我想知道是谁把延期发言的声明弄到公报上去的;是什么原因使你们把我的发言推迟到星期一?

**格莱斯顿**先生。——是约翰·罗素勋爵的身体不舒服。

于是**累亚德**先生同意推迟到星期一提出自己的议案。

**迪斯累里**先生——我认为,这件事需要政府作出解释,尤其是在简报中也不顾协议把印度法案的讨论弄到明天去了。

休息以后,**查·伍德**爵士很谦逊地承认,这两个小岔子都是他的过错。但是他利用格莱斯顿的暗示,马上又说,他对**累亚德**先生是完全出自善意。

在上院却揭开了相反的一面。可怜的罗素身体不舒服,无论如何与**克兰里卡德**侯爵的提案没有任何关系。侯爵的提案与**累亚德**先生的提案类似,也是在大臣们要求之下一再延期后定在星期五提出。

**布鲁姆**勋爵提出保证说,他没有同任何一个阁员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他认为,把**克兰里卡德**侯爵的提案定在明天提出,在当前情况下是非常不恰当的。他要找外交大臣谈这个问题。

**克拉伦登**勋爵声明说,显然,他不能下断语,在目前详细讨论问题不会产生危害,不会造成困难。谈判还在继续。但在多次延期之后,他感到自己已经没有权利再请求他的高贵的朋友收回自己的提案。但是,他保留他有权在自己的答复中提出不超出他的社会职责范围的意见。尽管如此,他还是想问一问他的高贵的朋友,是否同意把自己的提案最早延至下星期一提出,因为在上下两院同时辩论这个问题方便些,何况**约翰·罗素**勋爵现在身体很不好。

**埃伦伯勒**伯爵。——坐在对面的侯爵阁下如果能够把他原定明天提出

的提案不仅延至星期一以前，而且讨论的日期一般也不指明，那就是十分明智了。

得比勋爵对于高贵的侯爵提出这个问题表示惊奇，并且说，他完全同意伯爵阁下（埃伦伯勒）的意见。

格雷伯爵。——在克拉伦登勋爵声明之后，关于必须延期讨论的问题，想必每个人都清楚了。

在此以后，克兰里卡德侯爵便收回了自己的质询。

菲茨威廉伯爵询问，6月26日俄国关于对土耳其进行神圣战争的宣言是否与原文无异。

克拉伦登伯爵回答说，这个文件他是从女王陛下驻圣彼得堡大使那儿收到的。

马姆兹伯里伯爵。——为了上院议员们的尊严，政府应该向他们保证，政府不让下院在星期一举行这样的辩论，这是政府能够办到的。

阿伯丁伯爵说，他和他的同僚正运用他们的全部影响，不让举行这些辩论。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先用欺骗的方法使下院延期辩论；然后借口下院已延期辩论，使上院也照办，于是“高贵的”上院议员们就决定把提案的提出推迟到 *ad infinitum*（不定期）；最后，为了“世界上最高贵的会议”的尊严，要求下院也把提案的提出推迟到 *ad infinitum*。

在回答利德耳先生的质询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的同一次会议上说了下面一段话：

“多瑙河口的苏利纳支流不久前所以停止通航，是由于河水上涨，溢出河岸，结果水流量减少，浅水处淤泥增多。我必须指出，虽然多瑙河三角洲的占有者俄国政府始终都承认，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它有责任保持苏利纳支流能够顺利通航，但是多少年以来，我国政府却不得不再向它提出意见，责备它不负责任。当多瑙河口是土耳其领土的一部分的时候，在水浅的地方都保持着 16 呎的深度，而现在，由于俄国当局的疏忽，已减至 11 呎；而且这 11 呎的深度只保持在一条很狭小的航道内，这条航道所以这样狭小，是由河岸冲

下来的冲积土、浅滩的形成以及遇险沉没至今尚未捞出的船只造成的。由于这一切，船舶在此通航，如遇天气不好或缺乏熟练的领港员，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上述这种情况，都表明了敖德萨的竞争，敖德萨方面是想阻止沿多瑙河运出商品，而使商品都尽量通过敖德萨本港运出。”

看来，英国内阁是希望等到多瑙河各公国成为俄国领土的时候重新开放多瑙河口，因为到那个时候，敖德萨就不会竞争了。

几个月以前，我曾经有机会指出，在各工厂区，关于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取得了成绩<sup>172</sup>。从那时以来，运动就没有停止，最后，终于得到立法人士的反应。本月5日，代表奥尔丹的议员科贝特先生，请求允许他提出一项关于限制工厂劳动日的法案，规定每星期前5天限为10小时，星期六限为7小时半。他得到允许提出这项法案。在预先辩论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突然心血来潮，竟然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找不到别的方法保护从事工厂劳动的女工和童工，他就要提议限制机器转动的的时间。他的这句话刚一脱口，就掀起了一阵反对这位轻率的国家活动家的风暴，反对他的不仅仅是工业巨头的直接代表，主要的还是他们和帕麦斯顿勋爵本人的朋友辉格党人，如乔治·格雷爵士、拉布谢尔先生等。约翰·罗素勋爵把帕麦斯顿拉到一旁，同他作了半小时的私人 *pourparle* (商谈) 以后，便来全力平息这场风暴。他向议员先生们极力解释，说“他认为这完全是没有正确理解他的可敬的朋友的意思，他的朋友主张限制机器转动的的时间，实际上所指的是反对这种限制”。这种愚蠢的通融，是联合内阁的活命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联合内阁的代表人物都有权说的是这回事，指的是另一回事。至于说到帕麦斯顿本人，我们不要忘记，这位老牌的爱穿自由主义时装的人物在几年以前曾经用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对待爱尔兰氏族的成员那样的方

法<sup>173</sup>，从自己的“领地”上驱逐了几百家爱尔兰人。

提出上述法案的科贝特先生，是有名的威廉·科贝特的儿子，是他父亲当年当过代表的那个城市推举出来的议员。他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当选证书，也继承了政治信念。因此，尽管这些信念带有独立的性质，但仍然同现代各党派的立场很不合拍。威廉·科贝特当年是英国旧激进主义的最有才干的代表，更确切点说，是它的创始人。他曾经第一个揭露了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传统的党派斗争的秘密，撕下了寄生性的辉格党寡头政治虚有其表的自由主义的伪装，进行过反对各种形式的大地主统治的斗争，嘲笑过英国国教教会的伪善贪婪，攻击过两个机构，金融寡头政治的两个最鲜明的化身——“针线街的老太太”（英格兰银行）和“马克沃姆先生之流”（国家债权人）<sup>174</sup>。他曾经建议废除国债，没收教会领地，取消各种纸币。他探究了政治集权怎样一步步地侵犯地方自治的权利，并且谴责这种侵犯，认为它破坏了英国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不懂得这就是工业集中的必然结果。他提出的所有政治要求后来都写在人民宪章里，但是他的这些要求，实际上并不是工业无产者而是工业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宪章。他有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感受，但是在理性认识上却很少超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范围。一直到1834年，他去世以前不久，在颁布了新的济贫法<sup>175</sup>之后，他才开始猜测到，现在的工业巨头如同大地主、银行家、国家债权人以及英国国教教会的僧侣一样，都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果说，威廉·科贝特是现代宪章运动者的先驱，那末在另一方面，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他又是个顽固的约翰牛。他是大不列颠的最保守又最激进的人物；他是古老的英国最纯真的化身，同时又是年青的英国最勇敢的预告者。他认为英国从宗教改革时期起开始衰落，英国人民的意气从1688年

所谓光荣革命的时候起开始消沉。因此，在他的心目中，革命不是向新天地过渡，而是回到古老的世界，不是新纪元的开端，而是“美好的古老时光”的复还。他恰好没有看到，他所想像的英国人民衰退的时期，正好是资产阶级地位开始提高、现代商业和工业发展的时期，并且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恶化，地方自治消亡，让位于政治集权。从十八世纪起随着古老英国社会的解体而发生的重大变化打破了他的幻想，使他心里充满苦闷。他看到了事物的后果，却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不理解正在开创自己事业的那些新的社会力量。他没有看到现代资产阶级，只看到一部分贵族世代代垄断着国家的官职，通过立法手续来批准资产阶级的新需要、新野心所要求的一切变化。他看到了机器，但没有看到使机器开动的那种背后的力量。所以，在他的心目中，1688年以来的的一切变化应该完全由辉格党人负责，他们是使英国衰落，使英国人民退化的祸首。因此他才对辉格党抱着刻骨的仇恨，不断地揭露辉格党的寡头政治。因此才出现这样一个使人惊奇的事实：威廉·科贝特是一位本能地保卫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侵犯的卫士，但所有的人都认为，而且他本人也认为，他是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反对世袭贵族的战士。作为一位作家来说，他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如今的科贝特先生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继续他父亲的政治生涯，于是便不由自主地滚到自由派的托利党人队伍里去了。

“泰晤士报”力图用加倍横蛮地对待英国工人的办法来奖赏自己对俄国沙皇的顺从，因此便针对科贝特先生的提案，发表了一篇自以为会一鸣惊人，但实际上却成了纯粹胡说的社论。“泰晤士报”无法否认，限制机器转动的时间是迫使大工厂主服从现有的关于工厂工作时间的法律的唯一方法，但是它不能理解，一个头脑健

全的人,要达到某种目的,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唯一适用的办法来。现有的十小时半工作日的法律<sup>176</sup>,同所有其他工厂法一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对工人虚假的让步而已,工人们不满足这种表面上的让步,敢于要求把这种让步变成现实。“泰晤士报”从来就没有听到过有比这更可笑或更古怪的事。如果议会禁止老板让工人每天工作 12、16 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那末,“泰晤士报”说,“英国将不再是一个自由人的国家了”。这就像南卡罗来纳的某绅士一样,这位绅士由于当众鞭打他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黑人而被伦敦法官判罪,就极为愤怒地大叫:“这里不许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难道能说自由的国家吗?”如果一个人到工厂当工人,同厂主签订合同,每昼夜出卖自己 16 或 18 小时,没有办法像普通人在较好的条件下那样睡觉,那末,“泰晤士报”断言,这是由于:

“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供与求两方面不断协调,并且使它们去选择对他们最愉快最适当的职业。”

自然,法律不应该干涉 travail attrayant(诱人的劳动)。如果你们要把机器转动的时间限定在一昼夜的某个时间内,比方说,限定从早上 6 时起至晚上 6 时止,那末,“泰晤士报”说,你们就会以同样的理由完全禁止使用机器;如果你们在日出之后把街灯熄掉,那末你们到夜里也应当熄掉街灯。“泰晤士报”不允许法律干涉私人事业;大概是为了这个缘故,它才坚持保留纸张税、广告税和报纸印花税,好使它的竞争者的私人事业遭受损失,而另一方面它又设法要议会废除报纸附刊税来减轻本身的事业的负担。“泰晤士报”对议会干涉厂主老爷们的神圣利益表示深恶痛绝,而不管这种利益危及整整几代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同时,它又不择手段地设法使马车夫和小车主的事务受到最无耻的干涉,虽然在这里除了西

蒂那些大腹便便的生意人,可能还有印刷所广场<sup>177</sup>的绅士们的舒适受些影响以外,威胁不到任何东西。迄今为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直在对我们说,机器的主要好处是它能代替和减少体力劳动,减轻体力劳动的负担。如今“泰晤士报”承认,在现存的阶级制度下,机器并不会缩短工作日,而是延长工作日;机器先剥夺个体劳动的质量,然后强迫工人用数量来补偿质量上的损失。这样,工作日就越来越长,白天工作又加上夜间工作。只有工业危机才使这个过程中断,那时候就根本不让工人再做工了,工厂向工人紧闭大门,工人要么充分休息,要么上吊,那只好随他的便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8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7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2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  
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  
的照会。——东印度问题

1853年7月12日星期二于伦敦

上星期四开演的议会闹剧，在星期五即本月8日的下院会议上继续演出，最后作了结束。帕麦斯顿勋爵要求累亚德先生不仅把自己的提案推迟到星期一再提出，而且还想叫人们根本不再提起这个提案。“星期一应当遭到同星期五一样的命运”。布莱特先生趁这个机会祝贺阿伯丁勋爵采取了谨慎的政策，同时还表示自己对他的一切完全信任。

“晨报”指出：“即使内阁是一个和平协会<sup>178</sup>，它也不可能比最善良的阿伯丁更多地去鼓励俄国，挫折法国的锐气，使土耳其处于危险的境地，破坏英国的威信。布莱特先生说的话就等于是曼彻斯特派支持胆小怕事的阁员的一个宣言。”

大臣们极力阻挠累亚德提出预定的质询，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内部分歧就不可能再向公众隐瞒了。土耳其应当分崩离析，因为这样才可以防止联合内阁分崩离析。俄国的阴谋不仅得到阿伯丁勋爵的最大宽容，而且也得到阿盖尔公爵、克拉伦登勋爵、格兰维耳勋爵、悉尼·赫伯特先生、卡德威尔先

生和“激进的”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等大臣的最大宽容。据说，阿伯丁勋爵一度曾以提出辞职相威胁。显然，帕麦斯顿的“精力饱满”派(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sup>179</sup>派)正需要这么一个借口以便后退。于是就决定，向君士坦丁堡宫廷和圣彼得堡宫廷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建议“由列强会同订立一项保障条约，把沙皇为正教徒要求的特权也赋予居住在土耳其属地上的所有其他的基督徒”。可是同样的建议在缅施科夫公爵动身离开君士坦丁堡的前夕，已经向缅施科夫公爵提出了，而大家都知道，这个建议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此，指望重提这种建议能得到什么结果，真是太可笑了，何况，正是俄国坚决力求同列强也就是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缔结条约(现在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而这件事也不再遇到阻挠。奥地利首相布奥尔伯爵是俄国公使美延多尔夫男爵的内弟，他的步调和俄国是完全一致的。就在联合内阁中的两派(昏昏欲睡派和“精力饱满”派)通过上述决定的同一天里，“祖国报”上刊登了下面的一段话：

“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的新任使臣冯·布鲁克先生一上任就要求土耳其政府支付500万披亚斯特赔款，并要它答应交出克列克和苏托林两个港口。这个要求被看做是对俄国的一种支持。”

这并不是奥地利对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利益的唯一的一次支持。必须提醒的是，在1848年，当国王们需要向本国人民开枪的时候，他们曾不断制造“误会”。现在这种手法又被用来对付土耳其了。士麦那的奥地利领事用武力把一个匈牙利人<sup>①</sup>从一家英国的咖啡馆绑架到奥地利的军舰上；为了报复这种行动，流亡者打死和

<sup>①</sup> 科斯塔(他是根据韦克贝克尔领事的命令被捕的)。——编者注

打伤了奥地利军官各一名，事后冯·布鲁克先生要求土耳其政府在 24 小时内雪耻<sup>180</sup>。星期六的“晨邮报”在报道这件事情的同时，还援引了奥地利人进入波斯尼亚的传闻。不言而喻，当联合内阁的代表们昨天在两院的会议上被问到这项传闻是否属实的时候，结果是“还没有接到情报”。只有罗素一人大胆地推测说，隐藏在这种传闻后面的恐怕不会是什么别的事情，只会是奥地利人在彼得瓦尔登集结自己的部队这个事实。塔提舍夫先生在 1828 年曾经说，到将来问题要彻底解决的时候，奥地利一定会贪婪地抓住自己的一份战利品，这个预言就这样正在应验着。

上月 26 日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急电说：

“鉴于目前谣传整个俄国舰队已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开往波斯普鲁斯海峡，苏丹询问法国大使和英国大使：如果俄国人在波斯普鲁斯海峡示威，联合舰队是否准备开进达达尼尔海峡？两位大使做了肯定的答复。现在，一艘载有英法军官的土耳其蒸汽舰刚刚从波斯普鲁斯海峡出发到黑海进行侦察。”

俄国人占领了两个公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公布苏丹确认一切教派的基督徒的特权的敕令，并封闭了一家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德文报纸，因为这家报纸竟敢刊登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同时，俄国人还要求土耳其政府支付他们前次（1848—1849 年）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规定的年贡的第一批贡款。从 1828 年以来，俄国的保护制度使这两个公国花费了 15000 万披亚斯特，而抢劫和破坏造成的巨大损失还不算在内。英国为俄国支付了它对法作战的费用，法国为它支付了对波斯作战的费用，波斯为它支付了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土耳其和英国为它支付了对波兰作战的费用；现在匈牙利和多瑙河各公国要为它支付它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了。

目前的一个最大的事件就是涅谢尔罗迭伯爵于 1853 年 6 月 20 日发自圣彼得堡的一个新的周知照会。照会宣称,在苏丹没有同意沙皇的全部要求、英法舰队没有离开土耳其海面之前,俄国军队决不从多瑙河各公国撤走。这个照会听起来简直就是对英法两国的侮辱。照会中说:

“两个海上强国采取的立场是海上占领,因此我们有权利占领一定的军事阵地,以恢复双方地位上的均势。”

请大家注意一下,贝捷克湾离君士坦丁堡有 150 哩。沙皇坚持它有占领土耳其领土的权利,同时却否认英国和法国有不经沙皇特许而占据中立水域的权利。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沙皇允许土耳其政府在选择放弃主权的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允许土耳其政府“通过协定或其他双方承担义务的条约,甚至通过签署一个普通照会的方法”来做这件事。他确信,“公正的欧洲”一定会理解,凯纳吉条约虽然只给予俄国保护伊斯坦布尔的一座东正教堂的权利<sup>181</sup>,但 eo ipso (这样一来)就宣布了俄国是东罗马。他对于西方不了解俄国在外国的宗教保护制度根本无害于人表示遗憾。他用历史事实,即用“他在 1829 年利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时所表现的那种真正的温和”来证明自己关心保持土耳其的不可侵犯性。实际上,他当时没法表现不温和,因为当时他的军队处境很困难,而英国海军上将又扬言不管有没有本国政府的允许都将轰击黑海沿岸的每个居民点;他当时所得到的一切好处之所以能得到,完全是西方各国的当局“宽宏大量”,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附近被背信弃义击溃的结果。

“在 1833 年他是欧洲唯一使土耳其免遭不可避免的瓜分的人。”

1833 年沙皇通过签订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同土

耳其订立了**防御同盟**，根据这个条约，外国舰队禁止驶近君士坦丁堡<sup>182</sup>。由此可见，土耳其不被瓜分，完全是为了让俄国全部独吞。

“在 1839 年，他同其他列强一起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由于共同努力实行这些建议，才使苏丹的王位免除了被新的阿拉伯帝国所取代的危险。”

换句话说，在 1839 年，他使列强担任主动消灭了埃及的舰队，并使那个唯一能够使土耳其变成对俄国的最大威胁、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sup>①</sup>丧失了一切力量。

“圣上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向来就是力图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东方的 *status quo* (现状)。”

说得对。沙皇一贯处心积虑地想使土耳其的腐烂过程完全在俄国的保护下进行。

应当承认，东方还从来没有敢于直接向西方提出过更有侮辱性的照会。照会的作者真不愧是涅谢尔罗迭，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兼有荨麻和鞭笞<sup>②</sup>的意思。的确，这个照会证明欧洲如何在反革命的鞭笞下退化了。革命者只能向沙皇祝贺他有这样的杰作。如果说这是欧洲的退却，那末这还不单是在一般的失败之后的退却，而是通过卡夫丁峡谷<sup>183</sup>。

正当英国女王隆重接待俄国的公爵夫人，有教养的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向野蛮的专制君主伏地求恩的时候，只有英国的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退化。7月7日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在哈里法克斯的共济会堂举行了一个赞成和平的群众大会。哈里法克斯的议员罗斯利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所有其他“大人物”从

① 穆罕默德—阿利。——编者注

② 俏皮话：《Nessel:》(涅谢尔)意为“荨麻”(德文)；《rod》(罗迭)意为“鞭笞”(英文)。——编者注

“城里”<sup>①</sup>专程前来参加大会。大厅里坐无虚席，好几千人还呆在门外。厄内斯特·琼斯（他在各工厂区进行的鼓动很受欢迎，这可从向议会提出的大量的要求实行大宪章的请愿书和地方资产阶级报刊对他的攻击中看出。）这时正在德勒穆。哈里法克斯（琼斯在这里曾两度被选为下院议员候选人，并两次在举手表决<sup>184</sup>中当选）的宪章派打电报叫他回来，刚好在大会开始前他赶回来了。曼彻斯特派的先生们这时完全相信他们的决议将被通过，他们向自己善良的阿伯丁表示了工业区对他的支持后，准备回家了，正在这时，厄内斯特·琼斯突然登上了讲台，并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它号召人民进行战争，并且宣布，在自由没有确立以前，和平就是犯罪。于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琼斯的修正案仍然被多数通过。

印度法案的条文正在逐条通过，除了所谓“印度改革派”的根本站不住脚的论据外，辩论中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例如，乔斯林阁下，这是一个依靠定期地揭露印度现有的弊端和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罪恶统治来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之类的议员。诸君以为他的修正案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把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有效期再延长10年。幸好他的主张只是以自己的难堪而告终。此外，还有一个职业“改革家”约瑟夫·休谟先生，他在自己的长期议会生活中甚至能够把反对内阁变成一种支持内阁的特殊方法。他提议不要把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数目由24人减少到18人。唯一明智的、现在已被通过的修正案是由布莱特先生提出的，他提议，关于政府任命的董事必须是东印度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持有者这个要求应该取消，这个要求本来是股东会选出的董事必须具备的条件。

---

<sup>①</sup> 伦敦。——编者注

请看一看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sup>185</sup>出版的那些小册子,诸君就会感到好像是在读正统主义者、奥尔良派、蓝色和红色共和派,甚至还有最失望的波拿巴主义者所共同起草的反波拿巴的长篇檄文。这些小册子的唯一功劳在目前来说只是在于,它们一般地引起了公众对印度问题的注意,此外再也不能期待什么,因为在这些小册子所反映的反对派观点中现在有着折衷主义的性质。例如,它们一方面批评英国贵族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但同时又反对消灭印度的贵族,即印度的王公。

自从英国掠夺者一到印度,并坚决决定要抓住印度不放之后,他们除了用武力或阴谋来消灭当地王公的权力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他们在对待当地王公方面处在古罗马人对待自己的同盟者那样的地位,于是他们就用了罗马政治家的办法。一个英国作者说:“这是一种喂肥同盟者的制度,正如同我们在吃牛肉之前,要把牛喂肥一样。”东印度公司用古罗马的方法把自己的同盟者诱入自己的罗网之后,就像在交易所街<sup>186</sup>所做的那样,用现代的方法来惩治他们了。当地的王公为了履行自己对东印度公司所承担的义务,曾经不得不向英国人借贷大笔重利贷款。当他们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债权人就板起面孔,“拧紧螺丝”,这时王公只好或者签订“友好的协约”把自己的领土让给东印度公司,或者开战。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变成了靠自己的篡夺者的赡养费过活的人,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就要被当作叛逆削去王位。现在,各土邦所占的面积为 699961 平方哩,人口为 52941263 人,但是,现在它们已经不是英国政府的同盟者了,而是被各种奴役条件、一整套军费补助条约和形式繁多的保护制度束缚起来的英国政府的藩臣了。这些条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各土邦放弃自卫的权利,放弃外交独立

的权利，放弃不受总督干涉而解决它们相互之间的争端的权利。它们全都必须纳贡，或者是现金，或者是供养英国军官指挥下的武装部队。关于彻底并吞或兼并这些土邦的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改革派声称实行兼并是一种犯罪行为，而商人则认为兼并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完全是错误的。各土邦作为国家，自从它们同东印度公司签订军费补助条约，或者受它保护时起，实际上就不再存在了。一个国家的收入如果在两个政府中间进行分配，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损于其中一国的资源和两国的管理制度。在现行制度之下，各土邦被双重负担即自己原有的行政机构和东印度公司对它们所课的赋税以及军需特捐压得喘不过气来。允许他们在表面上保持独立的条件，同时也就是使他们不断衰落和根本不可能改善处境的条件。机体虚弱，——这是各土邦存在的基本规律，正像任何一种仅仅在被容许的范围内存在的有机体一样。因此，这里指的不是保存作为国家的土邦，而是保存当地的王公和他们的宫廷。那些厉声指责“英国王室和贵族穷奢极侈”的人，今天却因印度的纳瓦布、拉甲和札吉达尔<sup>187</sup>（它们大多数甚至还没有资格夸说自己世系远古，因为它们是靠英国的阴谋而飞黄腾达的根底很浅的篡夺者）的破产而痛哭流涕，这岂不怪哉！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些“一千零一夜”中的沙宰曼和山鲁亚尔的专制更可笑、更荒谬和更幼稚的专制了。威灵顿公爵、约翰·马尔科姆爵士、亨利·罗素爵士、埃伦伯勒勋爵、布里格斯将军和其他的权威人士都赞成保存 *status quo*（现状）。但是，他们的见解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必须驯养英国人指挥下的印度军队去同他们自己的同胞进行小型战争，以便阻止他们调转枪口反对他们的欧洲老爷们；独

立国家的存在可以使英国军队有时得到一些事做；世袭的王公是英国专制制度最驯服的工具，他们是阻止勇敢的军事冒险家（这种冒险家无论过去或将来在印度是很多的）露头高升的障碍；独立地区是庇护印度居民中一切不满足的和有雄心的分子的安全地带。所有这些理由都太嗦，它们的实质是：当地的王公是当前丑恶的英国统治制度的支柱，是印度进步的最大障碍。现在撇开这些理由不谈，让我来谈谈托马斯·曼罗和埃耳芬斯顿勋爵，这两个人有一副至少是不平凡的头脑，并且满心同情印度人民。他们认为，没有当地的贵族阶级，任何一个社会阶级都将没有充分的生命力，消灭这个贵族阶级并不会抬高全体人民，相反地，只会压低全体人民。如果注意到在英国人直接统治的地区本地人一向不许担任任何要职（军事的和民政的）这一情况，那末他们的话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凡是人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不可能成为大人物的地方，就应当有一类依靠出身而成为大人物的人，以便使被征服的人民保持哪怕是一点点的伟大。但是这种不让本地人在英国地区担任要职的做法，只有由于在所谓独立地区保存了世袭王公才有可能。于是这两种恩典中的一种不得不给了印度军队，这支军队的军事实力是英国在印度的整个统治的支柱。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坎伯尔先生说过的话：印度的本地贵族最没有能力担任要职，为了满足新的需要，必须造成新的阶级，“由于下层阶级具有机灵和易于接受知识的特点，这在印度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更容易做到”<sup>188</sup>。

当地的王公由于他们的王朝人丁衰微，几乎已经退出了舞台。但是从本世纪起，英国政府开始允许他们用收养子的办法来任命自己的继承者，或者用英国人的亲信作为傀儡来填补他们的空位。著名的总督达尔豪西勋爵第一个公开反对这种制度。如果不是用

人为的办法抑制了事态的自然进程，那末消灭当地的王公既无须用战争，也无须花钱。

至于靠赡养费过活的王公，英国政府从来自印度的收入中拨给他们当作薪俸的 2468969 英镑，对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人民的全部食物只是大米，没有别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说这些王公还有些用处的话，那末他们的用处仅仅是展示已经完全腐烂和十分可笑的君主政权。例如，拿帖木儿的后裔<sup>189</sup>大莫卧儿<sup>①</sup>来说，他的年薪是 12 万英镑，他的权力超不出宫墙的范围，成了白痴的王族子孙在宫里像家兔一样听其自然地繁殖着。甚至德里的警察也被英国人从他的监督下弄走了。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色焦黄，老态龙钟，穿着一身绣金的同印度舞女的服饰一样的戏剧服装。在国家庆典的日子里，这个镀金的傀儡便走出来使忠心的臣子高兴一下。外国人要想见他，必须付出几个基尼，就像是看某个 saltimbanque (丑角) 的公演要买门票一样，而他也回敬客人们头巾、钻石等。皇家的这些钻石就近一看就看出原来是一些胡乱涂了些油漆的、仿造宝石仿造得非常粗糙的小块玻璃，做的是这样粗劣，放在手里就像是块姜汁饼干一样碎裂了。

英国的高利贷者和英国的贵族对于剥夺王权这一套艺术是很内行的，他们在国内使王朝变成立宪制下的废物，在外国则使王朝变成一套空洞的礼仪。现在，激进派看到这种情景正在大为不平哩！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1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7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2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①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编者洋

卡·马克思  
缅甸战争。——俄国问题。  
——外交官的有趣信件<sup>190</sup>

1853年7月15日星期五于伦敦

最近来自印度的一批陆邮传来消息说，缅甸的全权代表拒绝了葛德文将军提出的和约，葛德文将军给他们24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再考虑一下，但10小时以后，这些缅甸人却开路了。没有尽头的缅甸战争的第三次爆发，看来有不可避免之势<sup>191</sup>。

英国在东方进行的历次征伐，哪一次也比不上征伐缅甸这样师出无名。这里的情况和印度西北边界的情况不同。在孟加拉和缅甸之间，隔着一条军队不能越过的山脉，缅甸根本不可能入侵印度。为了向缅甸开战，印度统治者不得不从海路到缅甸去。认为缅甸人会从海上进攻印度的设想，和那种认为缅甸的浅水帆船能够对抗东印度公司的军舰的荒谬说法一样可笑。也没有任何事实能说明，美国佬有并吞勃固省的强烈意图。因此，除了要给破落贵族找些营生，像一个英国作家所说的那样，要“在东方修建一座固定的贵族收容所或东方的汉普敦宫<sup>192</sup>”以外，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在安赫斯特勋爵的唐·吉诃德式统治年代发动的第一次缅甸战争（1824—1826），虽然只有两年多一点，但却使印度国债增加1300万英镑。英国在东方的租借地上——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

所花的费用,不算兵饷,每年支出还超出收入 10 万多英镑。1826 年从缅甸夺来的领土的代价则大得多。勃固这块领土的开支更是负担不起了。英国究竟为什么在欧洲要避免最必要的战争,即对俄国的战争,而在亚洲却年复一年地投入最没有道理的战争呢?英国在欧洲所以在采取胆怯的立场,是因为有国债逼着,而它在亚洲的战费却可以让印度居民来负担。但是我们会看到,孟加拉的鸦片带来的收入即将停止,再加上又一次的缅甸战争的花费,必然会使印度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结果导致印度帝国的激烈的改革,其激烈程度,将超过英国议会里的改革家在演说里、在文章里所高唱的一切改革。

昨天,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质询大臣们,问他们在收到俄国当局最近的周知照会之后,是否认为现在正是累亚德先生提出自己提案的合适时机。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在他看来,现在最好是不听取累亚德先生的发言,因为在照会公布以后,谈判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这位可敬的议员认为现在谈判已陷入僵局的意见是错误的”。约翰勋爵实际信奉的是阿伯丁的 *credo* (信条),同时他又想用下面一段话来挽救 *civis romanus sum* (我是罗马公民) 派 193 的面子:

“我当然不会料到,像涅谢尔罗迭伯爵这样有经验有远见的人会签署这样一个公然声称俄国政府要在联合舰队撤走的条件下才撤离多瑙河各公国的文件。”

接着就进行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布莱特先生提议修改一下第九条,把“6 名非国王任命的公司董事应由以王国职员或公司职员的身分在印度居满 10 年的人来担任”里的“以王国职员或公司职员的身分”这些字删去。这个修正案被通过了。这里值得注意的

是,在历次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中,没有一个修正案曾经得到内阁的支持从而被议会通过,只有布莱特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例外。和平内阁现在正尽一切努力同和平派即曼彻斯特学派保持, *entente cordiale* (诚意协商), 这个和平派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 它只赞成用棉花包和行情表进行的战争。

法国外交大臣、基佐时期在外交部做高级办事员、被上司认为办外交条件不够的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 如今正在尽量和涅谢尔罗迭伯爵互换照会和周知照会来过瘾。昨天的“通报”刊登了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对俄国大臣的最近一次(第二次)周知照会性的函件的复信<sup>194</sup>, 复信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法国的温和态度, 使它卸掉了一切责任, 并且使它有权利希望: 法国为保持东方的安宁所付出的一切牺牲将不徒劳, 俄国政府终将找到办法把自己的企求同苏丹的主权所产生的最高权利调和起来, 对于那么多人都想得到解决的争端将定出不使用武力而得到解决的原则。”

我在前面有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 维莱尔先生当年曾向俄国建议, 由各强国签订保障条约来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sup>①</sup>。当时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对这项建议的答复是这样的:

“向奥斯曼帝国作出一般保证, 就足以……触犯俄国既得的权利和这些权利赖以产生的原则, 更不必用这种行动非同一般和突如其来了。”

虽然如此, 在 1841 年, 俄国却同意参加这种不平常的条约<sup>195</sup>, 而且涅谢尔罗迭本人还曾经在 6 月 20 日(7 月 2 日)的照会中引用过这个条约。为什么俄国会一反自己的传统政策而同意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条约并不是“对奥斯曼帝国的一种保障”, 可以说, 它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84—185 页。——编者注

是对付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穆罕默德—阿利统治的埃及——的工具；这个条约至少从俄国的最初意图来看相当于一个反法同盟。

我刚才收到今天的巴黎“新闻报”，上面刊登了已故的法国驻伦敦大使塞巴斯提昂尼将军和路易—菲利浦之妹阿黛拉伊德女士两人未曾公布的信件。这些信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外交关系。它们确凿地证明，1841年的条约最初绝对不是由俄国设计的，像涅谢尔罗迭在他的照会中所说的那样，而恰好相反，它是法国和英国针对俄国而设计的，只是到后来它才被俄国变成了对付法国的工具。我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从这些重要信件中译出了下面几段：

## I

“今天我和帕麦斯顿勋爵会谈了两小时。这次谈话使我非常满意。我曾向您保证这位勋爵是列奥波特国王的朋友，而且首先是英法结盟的有力的拥护者，在这方面我总算没有弄错。帕麦斯顿勋爵关于东方问题和我谈了许多事情。他推测埃及帕沙已经决定要采取一定的行动。他希望英法两国以出动海军为凭借，提出新的条件来威胁穆罕默德—阿利，希望我们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同时通知苏丹，说他们已收到本国宫廷的命令，让他们向苏丹保证：在苏丹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下，英法将援助苏丹来抵御埃及帕沙。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方针，英法两国都应当按这个方针办事。我们必须支持土耳其政府，不让埃及、叙利亚和克列西利亚这些省份脱离土耳其。俄国现在一心等待有利时机来向苏丹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却是奥斯曼帝国的末日。”

1835年6月12日于伦敦

## II

“现在英国各党派一致认为必须好好注意俄国的行动。我觉得托利党在

这方面比辉格党坚决一些，至少是看起来比较坚决，它迫于形势，不能抱比较克制的态度。”

1836年4月21日于伦敦

### III

“英国人相信关于东方问题能够达成一个全欧协议。他们正渴望巴黎的答复。我不认为，我在某一问题上会违背国王同我数次谈话当中所指出的那种行动方针。只要在原则上一达成协议，就可以根据情况来解决每个强国的行动方式和阵地问题。俄国如果参加，它的行动自然应在海上，同法英两国一样；同时，为了防止由于舰队在黑海行动而可能产生的任何危险，必须使俄国同意从波罗的海调来分舰队加入联合舰队。”

1838年7月6日于伦敦

### IV

“英国并没有采纳俄国的建议<sup>196</sup>，而且帕麦斯顿勋爵以政府的名义通知我，说英国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英国要忠于英法同盟。由于同样的感情，英国还同意让穆罕默德—阿利世袭埃及和部分叙利亚的领地，叙利亚这部分领土定出明确的边界，即从圣让得阿克到提韦里阿德湖。我们取得英国对这些建议的同意不是很容易的。我想法国和穆罕默德—阿利不会拒绝这样的协议。东方问题简单化了，它将在列强的协助下，在保障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的基础上得到解决。所有原则都被遵守了。欧洲的国际法规会推广到土耳其政府。**俄国的唯一保护权要取消。**我不明白法国的共和派为什么对穆罕默德—阿利那样有好感，为什么那样热烈地维护他的利益。我只能找到一个理由，那就是革命原则，——支持和鼓励一切能够导致推翻各国现存政府的行动。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上这种圈套。”

1839年10月3日于伦敦

### V

“我从可靠处获悉，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内阁会议上做关于东方情况和英法政策分歧的报告，使用的语气非常温和，对两国同盟非常爱护，值得我们感谢。他甚至还建议他的所有同僚注意一种与我所指出的体系相类似

的体系。在报告最后，他在形式问题上作了让步，并且对于采取坚决行动和必然引起纠纷的政策表示反对。”

1839年11月30日于伦敦

## VI

“我拜会了帕麦斯顿勋爵，因为我想要从他那里听到一点不久前他告诉我的那个问题的消息。他把涅谢尔罗迭先生给俄国代办的信念给我听了，信的内容和他告诉我的话完全相符。布隆诺夫先生的到来将向我们揭开圣彼得堡当局的阴谋。帕麦斯顿勋爵在外表上和实质上都做得极出色。他对法英两国内阁恢复友好关系和继续结盟非常高兴。请您相信，我丝毫没有夸大。我十分信任地告诉他，新情况完全符合法国一贯的希望。他自己也应该承认这点。埃斯特哈济公爵给他的代办写信说，他对元帅<sup>①</sup>非常满意，又说，他现在正试图使法国内阁回到与奥地利和解的道路上来，但他发现国王不肯让步。我认为这一点完全可能。这些不现实的、有害无利的方案是不会使国王着迷的。这一点我只是对您一个人谈。我完全同意殿下您的看法，俄国正陷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1839年12月12日于伦敦

## VII

“今天早晨，我接到元帅发来的一封异乎寻常的急电。这是对我的信的答复，在那封信中，我向他报告了我已经把布隆诺夫先生的新使命及其使命的消息在巴黎引起的印象告诉了帕麦斯顿勋爵。我把元帅急电的有关章节念给帕麦斯顿勋爵听时，是 *textuellement*（逐字逐句）念的。但是，我在向帕麦斯顿勋爵就这个问题作声明时，用了几个表达同样的思想但和元帅的原话不一样的词句。现在，元帅一方面相当客气地向我保证我的话和他的原话并没有任何分歧，同时又劝告我要加倍小心，努力在会谈时复述他的电文的原话。从我这方面来看，我只能认为这件事不过是 *querelle allemande*（字面的意思是：德国人的口角；转义是：鸡毛蒜皮之争），不过是 *grec du Bas*

<sup>①</sup> 法国总理大臣（1839—1840）苏尔特。——编者注

— Empire (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拜占庭人) 的精细, 否则我就错了……

在外交上, 元帅还是一位新手, 因此我很担心他是否认为外交艺术放在于灵巧。事实上外交艺术仅在于真诚和直爽, 他可能会相信这一点的。”

1839年12月18日于伦敦

## VIII

“昨天帕麦斯顿勋爵和整个 Corps Diplomatique (外交使团) 出席了我的午宴…… 他对我说, 英国政府打算请求议会增加海军拨款, 但他补充说: 他将建议自己的同僚, 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要用法国已加强海军作为理由, 因为即使用一点点暗示牵涉到盟邦都不是我们的目的。霍兰德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为维持同盟所尽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1840年1月3日于伦敦

## IX

“帕麦斯顿勋爵把预定提交各强国和土耳其政府的协定草案通知了我…… 这不是五强国彼此之间的协定, 而是这些国家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协定…… 布隆诺夫先生反对这种形式 (请看一下涅谢尔罗迭7月2日的照会中关于俄国倡议的那段话吧!) …… 这个协定包括一个序言和八项条文。序言说得十分明确, 原文大致是这样: 奥斯曼帝国的不受侵犯为维持欧洲和平所必需, 因此五强国准备向它提供所要求的援助, 并把它包括到欧洲国际合作的范围中。在条文中安排了援助问题……

附言: 我刚才获知, 布隆诺夫和奈依曼对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协定极为不满。”

1840年1月20日于伦敦

## X

“我想, 帕麦斯顿勋爵所拟的协定草案, 将被俄奥两国代表拒绝。奈依曼先生的妄求特别激烈, 我敢说, 也是特别愚蠢。他泄漏了本国宫廷政策的机密。力图掌握住均势的梅特涅公爵公开地承认他痛恨俄国。他主观上希望布隆诺夫的建议将被无保留地接受, 但他和布隆诺夫都失望了, 因为他们碰

到帕麦斯顿勋爵这样的真诚希望同法国结盟并努力同法国一致行动的大臣。”

1840年1月21日于伦敦

## XI

“今天我和一位坚决主张同我国国王结盟的墨尔本勋爵会谈很久。他再三请求我给他指出一种能使英法两国的建议配合起来的办法。

他对俄国意图的看法和我们一样，而在一个会议上他还对我说，对维也纳当局是不能相信的，因为它到最后总是成为俄国的忠诚的拥护者。”

1840年1月24日于伦敦

## XII

“东方情况最近出现的转折使我很担心……毫无疑问，俄国正使局势演变为战争，奥地利利用尽一切办法支持俄国……它们用‘法国在地中海上的计划’把英国吓住了。阿尔及尔和穆罕默德—阿利——这是它们现在使用的两个工具……我尽一切努力使布隆诺夫的建议遭到拒绝，但刚要达到目的，却被它们发觉了，现在奥地利把布隆诺夫的建议当作自己的建议拿了出来。这显然是一个骗局。虽然如此，这里仍然召开了内阁会议来讨论奥地利建议。会上的主张有分歧。一方面是墨尔本勋爵，霍兰德勋爵和拉布谢尔先生；另一方面是帕麦斯顿勋爵，约翰·罗素勋爵和敏托勋爵。其余的内阁成员在这两种观点间摇摆不定。”

1840年1月27日于伦敦

## XIII

“内阁暂时只讨论了帕麦斯顿勋爵草案的一项。它决定，本协定应该是六强协定，而不应该是五（强）协定，像布隆诺夫先生所建议的那样，这位先生对于保证本国的私利可以说不遗余力（这是所谓关心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政府不会同意它没有参加拟定的协定。如果它同五强签订了条约，它就置身于欧洲国际法的保护之下了。”

1840年1月28日于伦敦

## XIV

“难道国王的政策和利益都做了梯也尔先生和他的报纸的任性妄为的牺牲品了吗？费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冒一切困难持续十余年的体系注定要灭亡了。”

1840年1月28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15日  
载于1853年7月30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3833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 卡·马克思 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1853年7月19日星期二于伦敦

沙皇不仅开始了战争，而且已经结束了第一个战局。作战线不仅越过了普鲁特河，而且推到了多瑙河沿岸。可是西方列强采取了什么对策呢？他们劝苏丹，就是说，他们强迫苏丹把战争看做和平。他们不是用大炮而是用照会来回答专制君主的行动。他们用来向俄皇进攻的不是两支舰队的力量，而是不少于四个的谈判方案。一个是英国内阁提出的，第二个是法国提出的，第三个是奥地利提出的，第四个是由波茨坦的那位“内弟”<sup>①</sup>匆忙间草拟的。他们希望沙皇开恩，从这些 *embarras de richesses*（财宝多得难以挑选的宝库）中选择一个最符合他的目的的方案。德鲁安·德·路易斯在对涅谢包罗迭伯爵的照会（第二个照会）的答复（第二次答复）<sup>197</sup>中，极力证明“首先采取示威行动的不是英国也不是法国”。像人们把骨头扔给狗一样，俄国向西方外交家发出了许多照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作无害的消遣，而保证自己进一步赢得时间。自然，英国和法国都踊跃上钩。他们受了屈辱还嫌不够，因为接受这种照会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屈辱，而且还为这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些照会加上最爱好和平的评语，例如，“帝国报”<sup>198</sup>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这篇文章虽然由德·拉·格隆尼埃尔先生署名，然而却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写的，并且是经过他仔细校阅的。这篇文章认为俄国有权提出“不在普鲁特河的东岸而在西岸进行谈判”的不客气的要求。文章几乎把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第二个照会看做“谋求和解的企图”。文章关于这一点的表述如下：

“涅谢尔罗迭伯爵现在谈的只是道义保证，并且宣布道义保证只应暂时地由物质保证来代替；由此可见，他是直接要求举行谈判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外交途径已经无能为力了。”

“国民议会报”（这是巴黎的“俄国日报”）以开玩笑的口气祝贺“帝国报”作了这种为时太晚的发现，它自己只不过对于这样无故吵嚷表示遗憾。

英国报纸则完全失去了自制。

“沙皇根本不能理解西方列强对他表示的礼貌……他在同其他列强进行谈判的时候在态度上做不到有礼貌。”

上面是“晨报”所说的话。“晨报”也因沙皇很少考虑对方的内部 *embarras*（困难）而大发脾气。

“仅仅由于狂妄任性而提出没有什么迫切性的要求，并且在这样做时又丝毫不考虑随时都有可能燃烧起来的欧洲的状况，那就是犯了几乎难以置信的轻率的毛病。”

“经济学家”杂志上论述金融市场问题的文章的作者认为：

“现在人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看到：由于世界的（即交易所的）最深处的利益为一个人的古怪脾气所左右，结果产生了多么大的困难啊。”

但是，在 1848 年和 1849 年，俄皇的半身塑像同 *veau d'or*（金牛犊）本身却是紧挨在一起的。

然而苏丹<sup>①</sup>的处境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困难和更复杂了。它的财政困难所以不断增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承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而从战争中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人民的热情没有被用来反对沙皇，而是转过来反对苏丹自己。穆斯林的宗教狂热使他受到发生宫廷政变的威胁，而正教徒的宗教狂热则有引起人民起义的危险。今天的报纸上登载了关于密谋杀害苏丹的消息，策划这个密谋的是企图扶植阿卜杜—阿吉兹即位的老年土耳其党的穆斯林大学生<sup>199</sup>。

昨天波门特勋爵和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上院要求克拉伦登勋爵报告自己的意图，理由是法皇已经毫不犹豫地宣布了自己的意图。但是克拉伦登勋爵只是简短地报告说，英国赞同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照会，他以在最短期间一定向议院报告全部消息的诺言为掩护，回避作进一步的说明。当有人问到俄国人也攫取了处在他们的军事占领制度下的多瑙河各公国的民政机关和邮政机关一事是否属实时，克拉伦登勋爵当然也是“避不作答”。“由于他是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告示<sup>200</sup>为根据的，所以他不能相信这一点”。对此，波门特勋爵宣称，他觉得克拉伦登的确是一个大乐观主义者。

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乔·华姆斯莱爵士在下院提出的关于最近在士麦那发生的乱子<sup>②</sup>的问题时说，他确实听到过关于奥地利领事<sup>③</sup>绑架一个匈牙利流亡者<sup>④</sup>的事，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关

① 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19页。——编者注

③ 韦克贝克尔。——编者注

④ 科斯塔。——编者注

于奥地利要求引渡所有匈牙利流亡者和意大利流亡者的消息。约翰勋爵总是用开玩笑的口吻随自己的意来回答质问。到头来总是他没有得到官方消息，也没有在报纸上读到诸君看来他可能或一定读到的东西。

“科伦日报”<sup>201</sup>在一封7月11日的维也纳来信中援引了下面一段关于士麦那事件的报告。

“舍基布—埃芬蒂已被派往士麦那去调查这个乱子的祸首，在这个乱子发生时哈克贝尔格先生遭到杀害。舍基布也得到了把奥地利籍或托斯卡纳籍的流亡者引渡给奥地利的命令。美国代办布朗先生就这个问题同列施德—帕沙进行了谈判，结果如何现在还不知道。我刚刚得知，杀死哈克贝尔格男爵的凶手已从驻士麦那的美国领事那里获得了一张护照，使他可以不受土耳其当局制裁。这一事实说明：美国打算干涉欧洲事务。另外还有一件不用怀疑的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舰队中有三艘美国军舰，有一艘美国的‘坎伯兰号’巡航舰为土耳其政府带来了8000万披亚斯特。”

不管这一消息或其他类似的消息的真实程度如何，但是它们都证明了一点，这就是到处都估计美国会进行干涉，而一部分英国的公众甚至还把这看成好事。美国舰长<sup>①</sup>和领事的行為在公众集会上得到了大声的赞同，“一个英国人”<sup>②</sup>在昨天的“晨报”上还要求在地中海上升起美国国旗，让“肮脏的旧的英国国旗”丢一下丑，以促使英国采取行动。

现在我们就东方问题的实质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沙皇的这样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国人进攻的海上，这种情况使沙皇感到不满和恼火，因此，他极力想实现他的先人的计划——开

① 英格拉哈姆。——编者注

② 阿·理查兹。——编者注

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他正在把奥斯曼帝国的最边远的地区一个一个地从奥斯曼帝国身上割下来，而且要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这个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停止跳动为止。每当他看到土耳其政府似乎加强，或者看到一个更大的危险，即斯拉夫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谋求解放，从而威胁到他对土耳其的计划时，他就会侵入这个国家。他利用西方列强的胆小怕事，吓唬欧洲，过分地提高自己的要求，以便到后来得到了自己本来想要的东西就止步，使人觉得他宽宏大量。

另一方面，不坚定的、畏缩而又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结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由于他们太软弱，太胆小，不敢用建立希腊帝国或建立斯拉夫国家的联邦共和国的办法来改造奥斯曼帝国，所以就把自己的全部努力只放在保持 *status quo*（现状）上，即保持那种使苏丹不能摆脱沙皇，而斯拉夫人又不能摆脱苏丹的腐烂状态。

对于这种情况，革命政党只能为自己庆幸。西方各国反动政府的卑躬屈膝，它们在保卫欧洲文明的利益不受俄国侵犯方面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无能，不能不使 1849 年以来一直处在反革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产生强烈的愤慨。这些半东方的纠纷也同在中国发生的纯粹的东方纠纷一样，将使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更加尖锐化和更快地到来。随着粮价的上涨和营业的普遍停滞，外汇行市正在变得不利于英国，黄金开始流向大陆。从 6 月 9 日到 7 月 14 日，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已减少了 220 万英镑，这个数目超过最近 3 个月的增长总和。

印度法案是否在议会全院委员会里通过，人们并不太关心。值

得注意的是，联合内阁的代表们现在正在设法否决一切修正案，并且同托利党人一起投票反对自己在曼彻斯特学派中的同盟者。

印度的现状可以用以下几个事实来说明。设在英国的管理印度的机关要吞掉整个印度纯收入的3%，每年支付的内债利息和支付给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的红利占14%，这两项一共占17%。除了这些每年由印度转到英国的款项之外，在印度的支出中约有2/3即它的收入的66%作为**军事费用**，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则不超过总收入的2.75%，或者说，在孟加拉地方收入中占1%，在阿格拉占7.75%，在旁遮普占0.125%，在马德拉斯占0.5%，在孟买占1%。这是东印度公司自己公布的官方数字。

另一方面，整个纯收入中将近 $\frac{3}{5}$ 来自**土地**， $\frac{1}{7}$ 左右来自**鸦片**， $\frac{1}{9}$ 多来自**盐**。这些收入来源一共占全部进项的85%。

至于一些次要的收入和支出项目，只要谈谈在马德拉斯管区还保留着的**莫士尔法税**就够了，这是一种向小店铺，织机、羊、牛、各种行业等等征收的税，每年有5万英镑左右，即约等于东印度大厦每年花在宴会上的费用。

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土地。由于近来关于印度土地占有制的各种类型问题大家已经写得很多，并且也都通俗易懂，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只就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谈几点一般的意见。

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是英国人用命令实现的两个性质相反的土地革命。一个是贵族性质的，另一个是民主性质的，一个是对英国大地主占有制的拙劣摹仿，另一个是对法国的农民占有制的拙劣摹仿。但是，这两种制度都是贻害无穷的，都包含着极大的内在矛盾，都不是为了耕种土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占有土地的掌管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土地上征税的政府

的利益。

由于实行柴明达尔制度，孟加拉管区的居民立即被剥夺了自己对土地的世代相承的权利，让地方的包税人即所谓柴明达尔得了这些权利。由于在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实行了莱特瓦尔制度，本来有权利占有土地的地方贵族即米拉达尔和札吉达尔等等，都同老百姓一起，下降到小块土地掌管人的地位，为东印度公司的收税官<sup>202</sup>耕种小块土地。说这些柴明达尔同英国的大地主相似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只能得到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都要交给政府。而印度的莱特又是一种多么笨拙可笑的对法国农民的摹仿啊，他们被剥夺了任何对土地的永久性权利，他们必须根据收成情况每年缴纳不同数量的捐税。最初的柴明达尔阶级尽管曾经残酷地和不受监督地掠夺过无权的、曾经是世代相承的土地掌管人群众，但是现在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的压迫下也很快地退出了舞台，由商业投机者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现在，除了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土地以外，孟加拉的所有土地都由这些商业投机者掌握。这些投机者造成了一种柴明达尔制度的变种，叫做帕特尼 [patnee]。他们充当英国政府的中介人的角色并不满足，他们还造成了一种叫做帕特尼达尔的“世袭”中介人阶级，帕特尼达尔又设立了副帕特尼达尔等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完善的中介人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不幸的农民身上。至于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在他们中间实行的制度很快就变成了强迫耕种制度，土地失去了任何价值。

坎伯尔先生说：“在这里，土地本来可以像在孟加拉一样，因欠租而由收税官卖掉，但是他们通常都不这样做，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谁也不愿意买地”<sup>203</sup>

这样，在孟加拉我们看到的，就是英国的大地主占有制、爱尔兰的中介人制度、奥地利的使地主变成包税人的制度和亚洲的制度（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的混合物。在马德拉斯和孟买我们看到的，是法国式的农民私有者，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农奴和国家的分成制佃农 [métayer]。印度农民的肩上压着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制度的缺陷，但是却享受不到这些制度的任何一项好处。莱特和法国农民一样，是私人高利贷者敲诈勒索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不如法国农民，他们对土地没有任何世代相承的权利，没有任何永久性权利。他们和农奴一样被强迫耕种土地，但是他们又不如农奴，他们在极端困苦时得不到保证。他们和分成制农民一样必须把自己的产品分给国家，但是国家对待他们却不像对待分成制农民那样，担负供给资金和农具的责任。无论是在孟加拉的柴明达尔制度下，或者是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的莱特瓦尔制度下，占印度居民十二分之十一的莱特农民都遭到了可怕的赤贫化。如果说他们事实上还没有下降到爱尔兰的贫佃农 [cottiers] 那样低的水平，那应该归功于印度的气候，因为南方国家的居民比北方国家居民的需要少些，而空想多些。

除了田赋以外，还应当看到盐税。大家知道，东印度公司掌握了盐业垄断权，它的盐的售价高于市场价格两倍。而这种事情却是发生在一个海洋、湖泊、山岳、甚至普通的土地都能大量提供这种产品的国家里。请看看阿耳比马尔伯爵关于盐业垄断权实际实行情况的描写：

“大批发商以每蒙特<sup>①</sup>不到 4 卢比的价格向东印度公司买进国内需要的

---

① 这是印度量颗粒体的单位，大小在各地区不一样，平均为 12 公斤左右。——编者注

大部分食盐；然后从达卡河西南数哩的地方弄来一些沙子掺在盐里，再以 5 至 6 卢比的价格把这种混合物卖给第二个（如果政府算第一个，那就是第三个）专卖商。后者再在盐里掺上土或灰。经过许多道这样的手续，盐从大城市运到乡村时，价格就提高到了 8 至 10 卢比，而杂质增加到 25—40%。结果，居民买一蒙特食盐要支付 21 英镑 17 先令 2 辨士到 27 英镑 6 先令 2 辨士，换句话说，要比富裕一些的大不列颠居民付的价钱高 29—35 倍。”<sup>204</sup>

我要指出，坎伯尔先生以鸦片垄断权可以妨碍中国人过多地服用这种药品为理由而维护鸦片垄断权，同时又以酒类垄断权可以大大增加印度的酒类消费量为理由而维护酒类垄断权（印度的酒精专卖证），这种行为是英国资产阶级道德的典型。

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到一起，就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这真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8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3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卡·马克思

#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7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这篇文章里，我打算归纳一下我对印度问题的意见。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提人<sup>205</sup>打倒，马拉提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 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即使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难道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即英国甚至现在仍然用印度出钱豢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个事实，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

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们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不过，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总算已经开始做了。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 *sine qua non* (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

学的新的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成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一向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一点兴趣。贵族只是想降服它，财阀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产品的工具，所以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自然物产是丰富的，但由于缺乏交换的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英国下院的委员会曾经证明：

“在坎迪什，每夸特小麦售价是6—8先令，而在普纳却高达64—70先令，那里的居民正饿死在大街上，无法从坎迪什运粮食来，因为泥路根本不能通行。”

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筑路基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的地方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 *sine qua non*（必需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地方饥荒的现象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

山脉的山区，只要是灌溉的土地，就比面积相同而不灌溉的土地多纳两倍的税，多用 9—11 倍的人，多得 11—14 倍的利益。

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人员和开支。威廉堡司令沃伦上校曾在下院的特别委员会中作过如下的说明：

“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要用好些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从国内遥远地区收到情报，而是用几小时就能收到，如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命令连同军队和给养一同送到目的地，那末，这种重要情况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驻军也可以驻扎在彼此的距离比现在更远和更合卫生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因病而死的损失。仓库里的给养也用不着储存得像现在这样多，因而就能避免由于腐烂和天气不好而造成的损失。军队的人数也将因效率提高而相应地减少。”

大家都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的组织和它们的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一直残留着。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现在，既然不列颠人已经把农村公社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铁路就会使互相交际和交换的新要求得到满足。此外，

“铁路系统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将把其他国家的各种改进办法和实际设备的知识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使这些地方能够仿效，这样就将使印度世代相传的、领取工薪的村社的手工业者既能够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又能够弥补自己的缺陷。”（查普曼著“印度的棉花和贸易”<sup>206</sup>）

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

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所以，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印度人民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在加尔各答造币厂看管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的本领和技巧，在哈尔德伐尔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劳动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实例，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受了东印度公司的偏见影响很深的坎伯尔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毅力，很善于积累资本，有清晰的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确科学的非凡才能。”他还说，“他们的智慧是卓越的”<sup>207</sup>。

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

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文雅,用萨尔梯柯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低阶级里的人民《sont plus fins et plus adroits que les italiens》(“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sup>208</sup>);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抵消了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性;他们看来好像天生疲沓,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的军官们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札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sup>209</sup>。

要结束印度这个题目,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的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sup>①</sup>所应得的股息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基

---

<sup>①</sup> 参看本卷注 187。——译者注

督教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札格纳特庙<sup>210</sup>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

印度是一个大小和欧洲相仿、幅员 15000 万英亩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的。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2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8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4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  
马车夫。——爱尔兰。——  
俄国问题<sup>211</sup>

1853年7月29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昨天举行的下院会议上，格莱斯顿先生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规定采取建立国家统一基金的措施，以支付未按格莱斯顿的财政计划换回的南海公司证券。格莱斯顿先生提出这个决议案，就承认了自己的变更公债条款的计划完全破产。除了这个不大的失败外，在印度法案方面，内阁也遭到了颇为惨重的失败。约翰·帕金顿爵士提出一项补充案，规定取消盐业垄断权，盐的产销在印度应该完全自由，只征收消费税或别的某种税即可。补充案以 117 票对 107 票通过，尽管查理·伍德爵士、约翰·罗素勋爵、詹·霍格爵士、赫·马多克爵士和娄先生（代表“泰晤士报”）拚命反对。政治寡头在把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薪俸增加到 5000 英镑的问题上得胜以后，现在打算把东印度公司的完美无瑕的董事们的薪俸从 300 英镑增加到 1000 英镑，而把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的新俸增加到 1500 英镑。显然，政治寡头以为，印度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同印度斯坦传说中生长在喜马拉雅山顶峰上的那棵神树上的树叶一样，凡是碰到这树叶的东西都会变成黄金；差别只在于，轻信

的印度人希望从树叶的浆液中取得黄金，而文明的英国人则希望从印度居民的血液中榨取黄金。

在“一千零一夜”中，描写了一个中国皇帝，一天早晨起床以后，他走到窗旁欣赏阿拉丁的宫殿，但是除了一块空场子以外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大吃一惊，便把宰相叫来问他是不是看到了宫殿。宰相举目四望，什么也看不出来，而且他比皇帝更吃惊。皇帝于是大怒，便命令卫士把阿拉丁抓起来。伦敦的公众在星期三早晨睡醒以后，也碰上了和传说中的中国皇帝的情况非常相似的情况。伦敦仿佛不再是一个城市了。在我们已经习惯地看到有什么东西的那些地方，竟然是而且继续是一块空场子。广场上的荒凉景象使你的眼睛很不习惯，而死一般的沉寂使你的耳朵很不习惯。伦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马车夫闹革命了！**马车夫和他的车辆好像奇迹一样，从街上、从自己的停车站上、从火车站的广场上不见了。出租马车主和马车夫都起来反对关于马车夫的新法律，反对“群贤内阁”的这项伟大的、差不多是“稀世之珍”的法令。他们罢工了。

人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不列颠公众的道德感有时容易冲动，而且每隔六七年，他们的德性就由于想同坏事大干一场而变得难以抑制。现在，这种道德心和爱国心冲动的对象是**贫穷的马车夫**。据说，他们对西蒂的无人保护的太太们和大腹便便的商贾们的勒索应该结束了，车费应该从一英里1先令降低到6辨士。6辨士道德已经风靡一时。以菲茨罗伊先生为代表的内阁，制定了一个对付马车夫的残酷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了他们对公众应尽的义务，同时把他们的车费、他们的“马车”、他们的马和他们的道德都置于议会的立法控制之下。看来这是要强迫把马车夫变成不列颠高尚品

德的标本。现在的一代人至少要造就一批品德高尚、舍己为群的公民，否则就活不下去，为此就选中了马车夫。“群贤内阁”是如此热烈地希望实现自己的立法杰作，以致马车夫管理法刚刚在议会一通过，而实施法律的必要条件连一部分都不具备的时候就生效了。谁也不关心让伦敦的法官们的手头有一份距离和定价的新规定和一览表的确切的副本；治安法官只是得到了解决马车夫和公众之间发生的一切纠纷的最一般的指示。于是，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亲眼看到了在法官面前不断发生的六辨士汉普敦派大军<sup>212</sup>和“凶恶的”马车夫之间激烈斗争的种种大场面；前者是为德性而战，后者是为金钱而战。马车夫们天天受到训诫，受到判决，被关进监牢。最后，他们确信，按照新的价目表，他们是无法向自己的主人缴纳原来的租金的。马车主和马车夫齐集于 *mons sacer*<sup>213</sup>—— 霍耳博恩的国民大厅，在这里作出了一项很厉害的决定，结果使伦敦大街上3天不见马车夫的影子。他们已经得到了两个东西：第一，以菲茨罗伊先生为代表的内阁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几乎等于废除；第二，东方问题、丹麦的 *coup d'état* (政变)、歉收和日益迫近的霍乱流行病，—— 所有这一切都在坚持一英里6辨士的公德和坚持一英里12辨士的私利之间的大斗争面前消失了。

现在日程表上是“罢工”两个字。这个星期罢工的有：北部煤区的5000名采煤工人，400—500名伦敦的软木塞切割短工，约2000名为太晤士河上的各商业码头主扛活的工人；赫尔的警察也罢工了，西蒂的警察和首都的全体警察也作过这样的尝试，最后，在议会旁边，在圣斯蒂凡小教堂里做工的泥水工人也罢工了。

“泰晤士报”惊叹说：“世界成了劳动者的真正天堂，人值钱了！”在1849、1850、1851和1852这些年份里，商业不断发展，工业

高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利润不断增加，但工资大体上没有变动，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保持在 1847 年危机时规定的更低的水平上。自从居民外流使人口减少，生活必需品涨价使人民的生活要求更迫切之后，罢工就爆发了，工资因此才有所增加。于是在“泰晤士报”看来，世界就成了工人的真正天堂。郎卡郡的工业大王们为了把天堂的条件降低到尘世的条件，便成立了一个协会，以便互相支持，共同反对人民群众的要求。但是，资产阶级用自己的联合来对抗工人的联合还嫌不够，他们还要请法律干涉，而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这一点将怎样实现，可以从自由主义的、讨人喜爱的帕麦斯顿的机关报“晨邮报”的下面一段恶狠狠的话里得出结论。

“如果说在种种无道德的表现中有特别值得用铁腕加以严惩的东西，那末这就是罢工的办法……必须迅速严惩这些联盟的领导人 and 首脑。即使这些人受到赤身抽打的惩罚，也不是破坏出卖劳动的自由……硬说这是侵犯了出卖劳动的自由，那是胡说。只要供应劳动市场的人拒绝采取危害国家利益的行动，那就可以允许他们自行与雇主谈判受雇的条件。”

在以环境为转移的一定范围内，可以让劳动者认为自己是生产上的自由缔约人，认为自己与老板的合同是依照双方的协议签订的。但是，只要他们一越出这些范围，那就要公开强迫他们在议会这个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常设联合委员会所规定的条件下工作。帕麦斯顿的机关报思想的深刻和它的智慧在它昨天的发现中暴露得很有趣。根据它的这个发现，“在这个国家的所有阶级中，生活最困难的是上流社会中的穷人”，即那些乘雇佣马车而不是乘自己的“轿式马车”出行的穷贵族。

有人要我们相信，整个世界，特别是爱尔兰，由于饥荒和居民的大量出境，成了劳动者的真正天堂。如果说爱尔兰的工资真的那

么高,为什么爱尔兰的劳动者成批地搬到英国,定居在“池塘”<sup>214</sup>这一边呢?而他们从前在田间工作完了之后每次都是要回去的。既然爱尔兰人民生活的社会条件已大大改善,那末从 1847 年起,特别是从 1851 年起,在爱尔兰人民中间精神病发展得这样厉害又当作何解释呢?请看下摘自“爱尔兰地方刑事犯疯人病院和民办疯人病院第六次报告”的统计数字:

	收容病人	其	中
	总	男	女
	数		
1851 年 .....	2584	1301	1283
1852 年 .....	2662	1276	1386
1853 年 3 月 .....	2870	1447	1423

这就是有名的绥夫特在爱尔兰办第一所疯人院<sup>215</sup>时还怀疑过能否找到 90 个疯人的那个国家!

由厄内斯特·琼斯恢复起来的宪章派的宣传鼓动正在大力开展;本月 30 日将在肯宁顿广场露天举行伦敦宪章派的大规模集会,这恰好就是 1848 年 4 月 10 日举行的那次著名的大会<sup>216</sup>的地方。

科贝特先生收回了自己的关于工厂工作日的法案,同时暗示他打算在下届议会开始时再把它提出来。

至于英国财政和整个英国的前景,本月 27 日“曼彻斯特卫报”在社论中充分证实了我所作的预测,社论写道:

“我国商业界充满足以引起不安的丧失信心的因素,这可以说是历来少有的现象。我们有意使用这个缓和的字眼。如果在谷物法废除以前和一般采取贸易自由政策以前的任何时期,我们就会使用比较强烈的说法——严重的惊慌失措。这些因素是:第一、预料中的歉收,第二、银行地下室中的黄金外流,第三、战争很有可能发生。”

1848 年宪法中的最后一个宪法,现在由于丹麦国王完成了

coup d'état (政变) 而被废除了。国家得到的是一个具有俄国精神的宪法, 并且由于废除了 Lex Regia (王位法), 丹麦便沦为俄国的一省<sup>217</sup>。我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评述这个国家的现状<sup>①</sup>。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 4 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 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为, 一般说来, 人们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 5 个月将是一个多事的月份。”

这是 1828 年 11 月 28 日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在给涅谢尔罗迭伯爵的信中所说的话, 而涅谢尔罗迭伯爵现在正是按照这条规则办事。俄国继军事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以后进而攫取了这些国家的民政管理机构, 派遣一支又一支的军队到贝萨拉比亚和克里木去, 同时又向奥地利暗示, 可能接受它的调停, 而对波拿巴则表示, 他的建议可能得到沙皇良好的反应。对于巴黎和伦敦的大臣们, 则描绘了这样一幅可喜的前景: 尼古拉终究会慈悲为怀地接受他们的歉意。欧洲各国的宫廷正像苏丹王后一样, 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着, 不知那位全体伊斯兰教徒的宽宏大量的主宰要把他的手帕抛给她们当中的哪一个。尼古拉就这样使他们如此紧张地期待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以后突然声明, 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奥地利也好, 普鲁士也好, 都不应该干涉他和土耳其的冲突, 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和土耳其进行谈判。显然, 正是为了同土耳其顺利进行这些谈判, 他才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了他的大使。但是在他声明列强不应该干涉俄国事务的时候, 在另一方面,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法、英、奥、普的代表们却在维也纳会议上消磨时间, 细细斟酌解决东方问题的方案, 而且, 在这种滑稽的会谈中, 既没有土耳其

<sup>①</sup> 见本卷第: 269—270 页。——编者注

大使参加,也没有俄国大使参加。7月8日,苏丹指定主战派组织政府,以便摆脱军事停战状态,但是,雷德克利夫勋爵却迫使他在当天晚上让这个内阁辞职。这使苏丹发了慌,以致打算派一位奥地利信使到圣彼得堡询问沙皇是否想恢复直接谈判。要等这位信使回来以后,再根据他带回的答复决定列施德—帕沙本人是否作圣彼得堡之行。列施德—帕沙应该把新照会草案从圣彼得堡寄到君士坦丁堡;然后,这些新照会再寄回圣彼得堡,而且在最后的答复从圣彼得堡转回君士坦丁堡以前,将不作任何决定。那时,就是第5个月了,任何舰队都将不能进入黑海。沙皇就可以优游自在地在多瑙河各公国过冬,在那里,他的开支可以用债券来支付,这些债券从1820年他几度占领这些国家时起一直流通到今天。

大家知道,根据俄国的坚决要求,塞尔维亚大臣加腊沙宁被解职。俄国由于这第一次的胜利而增加了勇气,现在又要求免除全体反俄军官的职务。而且还打算用这个办法来对待在位的亚历山大公爵,以便用米哈伊尔·奥布廉诺维奇公爵这个俄国和俄国利益的驯服工具来替换他。亚历山大公爵为了竭力避免这一灾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奥地利的影 响),于是就反对苏丹,并且宣布他愿意严守中立。巴黎的“新闻报”用下面的话描写了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

“大家都知道,俄国领事馆所在地沃尔肖伐是一个衰败的村庄,这里没有一个俄国的臣民,它位于塞尔维亚居民最稠密的地方,这里的俄国领事馆过着非常可怜的生活,但仍然不失为目前俄国宣传的中心。法院的侦察断定,俄国既参与了1840年布来洛夫案件,也参与了1850年约安·卢特措案件以及不久前逮捕14名俄国军官的案件(这个案件成了加腊沙宁政府辞职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缅施科夫公爵在他任职君士坦丁堡期间,曾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布鲁萨和士麦那进行了阴谋活动,在萨罗尼加、阿尔巴尼亚和希腊

也进行了这样的活动。”

俄国政策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不仅在目的方面，而且在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的传统的守恒性。在现在的东方问题上，没有一次纠纷，没有一次谈判，没有一个官方照会，不带有重复历史上某些事件的印记。

俄国目前向苏丹提出要求，只能以凯纳吉条约为依据，虽然这项条约并没有规定沙皇对他的教友实行保护，而仅仅是给予他在伊斯坦布尔建筑教堂和呼吁苏丹仁慈对待他的基督教臣民的权利。列施德—帕沙在他 14 日的照会中反驳沙皇的时候，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早在 1774 年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俄国就有心早晚要曲解这个条约，就像在 1853 年这个条约被它曲解的这样。当时奥地利驻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使臣图古特男爵于 1774 年向本国宫廷上书说：

“今后无论何时，俄国只要认为时机有利，事先不作特别准备就能从自己的港口派出登陆队到黑海去对付君士坦丁堡。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就会实行同正教会的首脑们事先共同策划的阴谋，而苏丹除了在一获悉俄国人逼近的消息就离开自己的宫廷，逃到亚洲复地，把欧洲土耳其王位交给比较有经验的统治者以外，别无其他办法。首都一旦被占领，俄国的统治在恐怖手段和正教徒的狂热支持下，无疑会很容易地扩展到整个阿希佩拉哥群岛、小亚细亚和直到亚得利亚海岸的整个希腊的沿海地区。俄国占有这些举世无双的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国家将使俄国强大到这种程度，使历史上古代君主的丰功伟业的一切奇迹都为之逊色。”

同现在一样，早在 1774 年俄国就企图以合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前景来刺激奥地利的贪欲。关于这一点，这位图古特男爵写道：

“奥地利这种扩张疆界的行动是不会引起俄国方面的妒忌的。其原因在

于：只要奥斯曼帝国的其余部分落入俄国之手，那末奥地利合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等地（这在其他的情况下对俄国来说非同小可），对俄国来说是无所谓的。须知这些省份中的居民几乎都是穆斯林和正教徒：前者是不会被容许在这里定居的，而后者考虑到邻近东方俄罗斯帝国，会毫不迟延地搬到那里去；如果他们仍留在原处，那末他们对于奥地利的不信任将成为长时期混乱的原因。因此，扩张领土而不加强内部，不仅不会巩固奥皇的权力，反而会使它削弱下去。”

政治家们要揭示俄国的整个传统政策，特别是要揭示它对君士坦丁堡的意图的时候，通常援引彼得一世遗嘱<sup>218</sup>。但是他们还可以追溯更远的历史。远在八百多年以前，当时还是多神教的俄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召集群臣宣布说，“由俄罗斯来统治的不仅应该有保加利亚，而且还应该有欧洲的希腊帝国，以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斯维亚托斯拉夫于公元 968 年占领了锡利斯特里亚并且进窥君士坦丁堡，像尼古拉在 1828 年所做的那样。在俄罗斯帝国建立后不久，柳里克王朝便把自己的王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以便更靠近拜占庭。在十一世纪，基辅在各方面都仿效君士坦丁堡，因此，人们称它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堡**；这个称呼反映了俄国几世纪的愿望。俄国的宗教和文明是起源于拜占庭，因此，俄国那时想使像现在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处于没落状态的拜占庭帝国从属于自己，比起德皇想占领罗马和意大利要自然得多。所以，俄国的政策在目的方面的单一性，是由它的历史的过去、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是由于它必需在阿希佩拉哥群岛（像在波罗的海一样）有四通八达的港湾，以便在欧洲保持领导地位这种情况决定的。但是，俄国用来追求自己的目的的那些传统手法，远远值得欧洲的政治家们那样赞扬。这一传统政策的成功证明了西方列强的软弱，而它的单一性和公式化则证明了俄国本身的野蛮。如果法国想把自己

的政策建立在黎塞留遗教或查理大帝敕令<sup>219</sup>的基础上,那谁会不觉得可笑呢?只要研究一下俄国外交的最著名的一些文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俄国的外交善于细致地、巧妙地、熟练地和灵活地找到欧洲的君主、大臣和宫廷的弱点,尽管它非常高明,但是,由于它不了解西欧各国人民自己的历史运动,所以它总是走进死胡同。利文公爵指望善良的阿伯丁对沙皇让步,显示出他对阿伯丁性格的了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在1831年展开的议会改革运动的前夕预言托利党将继续执政,这样他对英国人民的判断就根本错误了。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曾经对查理十世作出过完全正确的判断,但是他怂恿自己的“神圣君王”同这位国王在他被赶出法国的前夕举行瓜分欧洲的谈判,这样他对法国人民的估计就完全错误了。俄国的政策以其传统的诡计、奸诈、狡猾可以把欧洲的宫廷(它们自己也只不过是过去的传统罢了)捉进自己的圈套,但是,它在对付革命人民的时候却是完全无力的。

在贝鲁特,美国人从奥地利的鹰爪里又抢走了一个匈牙利人。美国干涉欧洲事务正是从东方问题开始,这是令人高兴的。除了君士坦丁堡因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贸易和军事意义外,还存在着一系列其他的历史原因,使占有这个城市的问题成了东西方之间经常激烈争执的主题。而美国就是西方最年轻最有力的代表。

君士坦丁堡是永恒的城市,是东方的罗马。在古代希腊皇帝统治时代,西方的文明和东方的野蛮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土耳其人统治时代,东方的野蛮和西方的文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致使这个神权帝国的中心成了欧洲进步的严重障碍。当希腊的皇帝们被伊康尼苏丹<sup>220</sup>排挤出去的时候,古老的拜占庭帝国的精神却不管这种改朝换代的变化而继续存在,而苏丹如果被沙皇所取代,

Bas-Empire (东罗马帝国) 也将再生。到那个时候, 它会产生比在古代皇帝统治下更坏的影响, 会成为比在苏丹时代更富有侵略性的力量。沙皇将为拜占庭文明提供支持, 正像组成东罗马帝国皇帝们的武装力量的 *corps de garde* (近卫军) 的俄国冒险家们在几世纪中为这些皇帝们提供了支持一样。西欧和俄国争夺君士坦丁堡的斗争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 是拜占庭主义在西方文明面前衰落下去呢, 还是它们之间的对抗将采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厉害、更带有暴力性质的形式而再度尖锐化起来。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 西方文明好比太阳, 不经过这道桥就不能绕过世界; 而不同俄国进行斗争也就不能通过这道桥。君士坦丁堡在苏丹的手里只不过是暂时归他占有留待革命来取的抵押品, 而西欧现在的这些统治者—— 他们认为自己的“秩序”的最后一个支柱在涅瓦河畔—— 也只能使问题悬而不决, 一直到俄国面对着他的真正的敌人—— 革命为止。推翻西罗马的革命也将战胜东罗马的邪恶势力。

读过我在大约两年前为“论坛报”写的关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sup>221</sup>并且想对革命有一个具体的认识的读者们, 不妨看一看现在陈列在纽约水晶宫的哈森克莱维尔先生的绘画; 这幅画描绘了 1848 年工人向杜塞尔多夫市政当局递交请愿书的情景。作家只能加以剖析的东西, 杰出的艺术家以丰富的戏剧性和生命力再现实出来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7 月 29 日

载于 1853 年 8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8844 号

署名: 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 在下院中。——报刊论东方问题。  
——沙皇宣言。——丹麦

1858年8月2日星期二于伦敦

伦敦街头又出现了马车夫。在上星期六，马车夫放弃了他们的消极反抗方式。同时，议会正在继续设法废除本届会议的伟大法令，逐步取消马车夫和下院之间的一切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sup>①</sup>。

在内阁提出的关于提高董事会董事、主席和副主席薪金的提案被否决以后，在把董事们的薪金减低到 900 英镑、而把主席和副主席的薪金减低到 1000 英镑以后，在星期五，印度法案在最后一读中通过了。上星期五举行的东印度公司股东会特别会议，气氛非常低沉。无精打彩的叫喊和演说，明显地暴露了可敬的所有主—股东们的忧虑心情，原来他们已经感觉到：印度帝国曾经是他们的财产的那种美好时代，看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有一位可敬的绅士谈到他打算把一项决议案提交下院审查，该决议案否认目前的法案，并以股东和董事们的名义宣布他们要拒绝充当内阁的这一措施给他们指定的那种角色。可敬的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和

① 见本卷第 254—255 页。——编者注

董事们罢工了！可不是吗，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场面呵！英国下院在取消了公司盐业垄断权以后，就实现了对印度财政进行直接管理的第一步。

昨天，在议会全院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执行岸防勤务的海军志愿兵的法案。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建立一支有 1 万人的兵团，他们每年要受 4 个星期防卫不列颠海岸的军事训练。正像在民军里服役一样，这些志愿兵将领到为数 6 英镑的特别津贴。他们的服役期限将有一定的限制，和平时期为 5 年，战争危险时期为 6 年。在服役期间，他们将按一等水兵的待遇领取军饷，而在最后一年当中，每天还能领到两个辨士的补助金。在和平时期，不得使他们远离海岸 50 里<sup>①</sup>，在战争危险时期，不得使他们远离 100 里。

昨天晚上，关于爱尔兰地主和租佃者的法案也在三读中通过。增加了一项有利于租佃者的重要修正条款，即禁止地主强占和出卖租佃者的青苗。

科布顿先生发表了一个论缅甸战争的起因的小册子<sup>222</sup>。

在法国，害怕歉收的情绪非常强烈，以致路易·波拿巴政府同巴黎面包店主公会已经商定：在 8 月上半月把面包价格稍微降低一些，尽管 Halle aux blée, (粮食市场(巴黎))上的面粉价格在不断提高。面包店主以后必然会提高价格而得到补偿。

“经济学家”周刊写道：“这是法国政府的阴谋，其目的是想用欺骗手段使人民相信，收成并不像实际情况那么坏。”

在报刊的各栏上，天天都有大量矛盾百出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消息，这些消息来自维也纳和柏林，其中一部分是俄国的代理人制

<sup>①</sup> 1 里等于 5.56 公里。——编者注

造出来的，其目的是迷惑法国和英国的公众，使他们对俄国的行动发生错觉；还有一部分是按照巴黎的特别定单制造出来的，其目的是有利于交易所的投机。可是，“晨邮报”上发表的一段话却值得注意——这里要假设这家帕麦斯顿的机关报并不是常常滥用这类威胁，并不是今天采取，第二天就收回。

“不是 8 月 10 日以前通过和平方式完全解决问题，就是联合舰队奉命开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也可能开往黑海。有力的行动将代替耐心的谈判，对危险的恐惧将不再有助于采取可能成为维护安全所必需的有效手段。如果沙皇接受现在向他提出的建议，那末从多瑙河各公国立即撤兵将成为首要的条件。”

接着，“晨邮报”断言：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表<sup>①</sup>已在 7 月 24 日就**最后通牒**的各点达成协议，并且已经立即送往圣彼得堡<sup>223</sup>。可是，这种说法是同克拉伦登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最近发表的声明相矛盾的，他们所提到的只是法国和英国的联合照会；同时，这种说法根本不为法国报刊所重视。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说法至少意味着：在内阁中，帕麦斯顿派已向善良的阿伯丁提出了最后通牒，他必须在 8 月 10 日提出答复。

看来，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会议已被认为是足够了，因为我们从“国民报”<sup>224</sup>获悉，现在又要在柏林举行会议，为了保证这一会议有必要的讨论“材料”，俄皇就开恩作了一项声明：他虽然非常愿意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占领——这种占领是确保他的教友们的利益的物质保障，但是，他现在仍然不得不把这些公国把持在手里——这是补偿目前占领这些公国的支出所需的保障。哥尔查科夫公爵在他的告示中曾宣布，俄国决不干涉各公国的合法当局的特

<sup>①</sup> 威斯特摩兰、布尔克奈、布奥尔—绍恩施坦和阿尔宁。——编者注

权,但沙皇却颁布命令禁止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向土耳其政府缴纳任何贡品或同它保持任何关系。瓦拉几亚的国君接到这一指令后,就告诉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说,他已给苏丹送去了贡款,领事回答说:c'est de l'argent perdu(这是丢掉了的钱);这就是说:国君需要再给俄国送去这一笔钱。

昨天的“祖国报”报道:莫尔达维亚大臣中间最有权势的三个大臣,已由国君特别许可,从雅西启程到彼得堡,向沙皇报告俄国士兵的行为,诉说他们违背对土耳其政府许下的庄严诺言,在多瑙河流域各个省份里胡作非为,就像在被征服的国家中一样,并且在那里干出了一系列敲诈勒索的勾当。当然,对俄国人来说,说他们要通过在各公国赢得声誉的办法而在那里追求某种宣传目的,这样的罪名是加不上的。

俄国在继续武装自己,同时像过去一样公开地宣传这一点。“汉堡消息报”<sup>225</sup>登载了俄皇于7月23日在彼得堡颁布的下列宣言。

“受命于天尼古拉一世,兹根据我在1834年8月1日(13日)颁布的规定每年在国家部分地区招募新兵的宣言,命令如下:

1.为了补充陆军和海军,应在帝国东部地区各个省份实行第十次招募,招募人数应与1852年在西部地区各个省份里曾经招募的人数相等,即从每1000人中间招募7名新兵。

2.除此以外,还应在东部地区各个省份从每1000人中间招募3名新兵,补入这一地区在过去的招募中比西部地区少招募的6个名额中。

3.根据1845年10月31日和1846年9月26日发表的宣言,普斯科夫省、维切布斯克省和莫吉廖夫省曾经因为歉收而免于提供新兵,而1853年,应在这三个省份从每1000人中间招募3名新兵。从维切布斯克省和莫吉廖夫省的犹太人中间,同其他各个省份的犹太人一样,应从每1000人中招募10名新兵。

4.新兵的招募工作,从11月1日开始,到12月1日结束。

尼古拉一世公布于圣彼得堡”

除宣言外,还发布两项命令,规定了进行这一新的非常的新兵招募工作的细则。根据第二项命令的规定,除了在上述各个省份里招募新兵以外,也将在基辅省、波多尔斯克省、沃伦省、明斯克省、格罗德诺省、维尔纳省和柯夫诺省的独户农<sup>226</sup>和城市居民中间进行招募。

“汉堡消息报”的通讯员报道:

“帝国内部在继续不断地进行武装。第四步兵军的各个后备营集中在土伦附近。我们从给一支部队的命令中获悉:近卫军和掷弹兵仍然驻扎在离加契纳不远的红村一带和普多斯齐附近。这两个数达10万人的军的野外演习在继续进行。”

斯德哥尔摩的“邮报”在7月16日的一号中报道:俄皇已颁布了一项命令,要装备由20艘战列舰和15艘巡航舰组成的波罗的海舰队并供给它储备物资。7月29日的“科伦日报”写道:

“丹麦—瑞典舰队在结束演习以前就提前返航的原因是:司令官接到了一项立即把军舰开到波罗的海修理的命令。”

今天,法国各家报纸和“纪事晨报”都登载了维也纳7月3日的电讯,该电讯报道:美国表示愿意给土耳其政府以金钱帮助和有效支持。

俄国的威胁性立场再加上由于预计到歉收而引起的不安在大陆公众的思想中所产生的影响,在“经济学家”周刊的下面一段话中反映得最为明显:

“沙皇又在欧洲惹起了革命的倾向和希望;我们读到在奥地利、意大利以及法国发生密谋事件的消息。在这些国家里,人们害怕新的革命混乱更甚于害怕政府的宣战。”

目前,霍乱病在哥本哈根闹得很厉害,已有 4000 人传染上了,至少有 15000 人要求发给离开丹麦首都的护照;一位消息灵通的因害怕得霍乱病而刚刚到达伦敦的丹麦人士告诉我:关于王位继承制度的国王诏书之所以被通过,主要是由于埃德尔党<sup>227</sup>的大部分人在表决时弃权,因为这些人希望用自己的消极态度来防止发生危机。可是,他们所害怕的危机还是以钦定宪法的形式搞到了他们头上,该宪法的矛头首先是针对着“农民之友”<sup>228</sup>——一个过去曾经支持丹麦国王而使他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取得成就的政党。因为我打算另写专文<sup>①</sup>来谈这个问题,在这里就只指出一点:丹麦政府已把同列强就它的建议而交换的照会提交联席会议(上院会同下院)审查。

英国和俄国的照会是这些文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别在目前更是如此。“沉默寡言的”克拉伦登不仅赞同国王诏书,而且明显地向丹麦政府暗示:如果保存原来的、有普选权而没有上院的民主宪法,那末丹麦政府现在就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了。因此,沉默寡言的克拉伦登才积极主动地鼓励和煽动在丹麦——为了俄国的利益——实行 *coup d'état* (政变)。涅谢尔罗迭伯爵致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的俄国照会,在简述了 1852 年 5 月 8 日签订的伦敦条约<sup>229</sup>的条文以后,用下面的话作了结束:

“5 月 8 日的条约并没有正式规定废除 *Lex Regia* (王位法);这样的条文在各个独立国家缔结的条约中恐怕是不可能有的。它将违反外交惯例,尤其是不尊重丹麦国王应有的主权和尊严。可是,当客观情况要求各个强国同意把领土归还丹麦国王而不拒绝王位法所提出的条件时,当它们答应予以支持时,自然不得不让国王陛下选择最适当的手段来通过立法的办法实现这

① 见本卷第: 273—274 页。——编者注

一目的。陛下利用国王特权,表示打算为一切归他管辖的领土建立一种王位继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如果弗雷德里克三世的父系后裔断绝了,那末,从王位法第二十七条和第四十条中产生的要求将被认为一律无效,并应召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亲王即位。丹麦国王将由他和他同路易莎·黑森公主结婚所生的男性后裔担任。这就是1852年10月4日的国王诏书中所阐明的条件。这些条件所反映的观点,至少对帝国政府来说,已成了目前谈判中的基础。从帝国当局的观点出发,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分割开来,因为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废除王位法第二十七条和第四十条,不仅是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亲王及其继承者得以被召即位的那种规定的自然结果和 *sine qua non* (必需条件),而且是条约的序言中所规定的原则的自然结果和必需的条件,这项原则就是:保护丹麦君主政体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可靠的手段,是在一切目前归丹麦管辖的领土上实行只有父系的代表才能继承王位的规定……在条约的II条中,各强国宣布:它们永远承认丹麦君主政体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它们明确地宣布:它们打算用共同的努力阻止去年已不幸发生过的那种纠纷的重演……停止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亲王的父系继承王位,无疑就会恢复皇帝陛下在当时为了亲王而拒绝了的那种可能的权利。可是,在这方面有意赋予丹麦国王的主动性,以及三大强国在上述情况下的合作(如果这种合作可能实现),会保护丹麦爱国者,防止任何人实现目前只是在他们的想像中存在的那种虚荣心和野心。”

由此可见,俄国是这样示意的:5月8日的条约所规定的对王位法的暂时废除,应当解释为永久废除,而俄皇对自己权利的永久放弃只不过是暂时放弃,但丹麦的爱国者今后可以指望欧洲列强来保卫本国的神圣不可侵犯。他们难道没有看见过,在缔结了1841年的条约以后,土耳其的神圣不可侵犯究竟是怎样受到保护的么?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8月2日

载于1853年8月1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7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广告税。——俄国的行动。——  
丹麦。——合众国在欧洲<sup>230</sup>

1853年8月5日星期五于伦敦

废除广告税的法令昨晚获国王批准，今日生效。许多晨报已公布降低了的各类广告价目。

伦敦船坞的工人宣布罢工。公司正努力招收新工人。人们估计老工人和新雇的工人之间会发生冲突。

俄皇找到了把持多瑙河各公国的新借口。他今后需要这两个公国已经不是由于它们是他的精神要求的物质保障，也不是为了补偿占领它们的费用，——不，他现在要把持它们是由于“内部混乱”，是根据巴尔塔利曼尼条约<sup>231</sup>的条款。由于俄国人确实在各公国闹得天翻地复，因此内部混乱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在8月2日上院会议上，克拉伦登勋爵证实了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写的事，即俄国人禁止公国的国君向君士坦丁堡进献他们应缴纳的贡品，根本禁止他们与土耳其继续保持关系<sup>①</sup>。克拉伦登勋爵特别庄严并且郑重其事地声明，他

“将通过今晚离开伦敦的信使，命令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要求俄国当

<sup>①</sup> 见本卷第267页。——编者注

局做出解释，英国是有权这样要求的。”

当克拉伦登派遣急使到圣彼得堡要求**解释**时，“祖国报”在今天这一号上登载了上月20日从雅西发出的消息：俄国人正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构筑工事；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已置于由三人组成的俄国监督机关的监视之下；正向居民征收实物军税；某些倔强的大臣被抓到俄国军队里去了。这就是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告示所作的“解释”，这项告示说，

“神圣君王无意改变该国的政权机构，他的军队的驻扎不会使居民承担任何新的捐税和负担”。

在同一天举行的下院会议上，约翰·罗素勋爵在回答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的问题时声称，四大强国已经在维也纳商定共同向沙皇提出一项俄国和土耳其都“可以接受的”建议，这一建议已送往圣彼得堡。约·罗素勋爵在回答迪斯累里先生时说：

“虽然这个建议最初出自法国政府，但实际上是**奥地利的**。”

这个出身法国但又入了奥地利籍的建议看来是很成问题的，“新普鲁士报”<sup>232</sup>在一封维也纳来信中对此作了如下说明：

“俄奥两国当局已暗中约定不允许英国影响在东方占优势。”

“一个英国人”<sup>①</sup>就联合内阁的**解释**指出：这个内阁是“在屈辱中表示伟大，在无力中表示威武，在沉默中表示雄辩”。

一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俄国化，加里西亚、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都会成为俄国的《enclaves》（“嵌入别国领土的属地”）

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谈过彼得堡银行的“秘密金库”，——

---

① 阿·理查兹。——编者注

即用来保证为数 3 倍的纸币流通的金属储备<sup>①</sup>。现在俄国陆军大臣<sup>②</sup>申请将该储备的一部分拨归陆军部金库。由于财政大臣<sup>③</sup>反对，皇帝便亲自出马，向正教行政总署——教会财产的维护者商借 6000 万卢布的贷款。沙皇遭到了钱财困难，而他的士兵的健康也遭受着威胁。据可靠消息：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士兵在进军期间饱受酷热之苦，病者极多，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许多民房都成了病院。

昨天“泰晤士报”反对俄国对土耳其的野心计划，但同时又企图掩盖俄国在丹麦的阴谋。“泰晤士报”甚至在假装同它的神圣君王反目时，也为他效劳。

“泰晤士报”说：“我们不相信俄国当局已使哥本哈根宫廷屈服于自己的影响的说法，我们认为，丹麦政府在俄国的影响下正采取废除或删削，1849 年宪法的步骤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诚然，丹麦政府公布了关于**略事修改**现行宪法的法案或法案初稿，但这一法案将在两院重新开会时提交给它们讨论和表决；它决不会通过国王的权力付诸实施。”

把立法会议分割为 4 个独立的封建的省议会，废除立法会议的自行决定课税问题的权利，废除普选权，取消出版自由，恢复闭塞的行会用以代替自由竞争，剥夺所有官员即丹麦唯一有教养阶级不经国王特许而可以被选入代议机关的权利，——所有这一切都叫做“对宪法的**略事修改**”！如此说来，也可以把奴役叫做对自由的**略事修改**了。不错，丹麦国王没有敢把这一新的“根本法”作为法律颁布。他只是效法东方的苏丹，把丝绳和勒令自缢的命令交给两

① 见本卷第 134 页。——编者注

② 多尔哥鲁科夫。——编者注

③ 勃罗克。——编者注

院。这种建议已包含着这样的威胁：不自愿服从，就强行贯彻。“对宪法的略事修改”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在谈谈“俄国的影响”。

丹麦国王和丹麦两院之间的冲突是怎样产生的呢？国王建议取消 Lex Regia，即丹麦的现行的王位继承法。谁促使他采取了这一步骤？是俄国。这一点从我上一篇文章引用的 1853 年 5 月 11 日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照会中就可看到。废除 Lex Regia 对谁有好处 233？除俄国之外，没有别人。Lex Regia 允许王朝女系的代表继承王位。随着 Lex Regia 的废除，男系亲属就可以拒绝至今仍然堵在他们道路上的所有女系亲属继承主位的要求。大家知道，丹麦王国除丹麦本土即一些岛屿和日德兰之外，还包括两个公国——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丹麦本土和什列斯维希的王位继承按 Lex Regia 的规定，而霍尔施坦公国是德国的封地，根据 Lex Salica（舍拉法）234，它仅由男系继承。随着 Lex Regia 的废除，丹麦和什列斯维希的王位继承制度和德国的公国霍尔施坦一样了。俄国皇帝作为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王室的代表拥有对霍尔施坦的直接权利 235，于是，他作为男系的年龄最大的亲属也就有权直接要求继承丹麦王位了。1848—1850 年，在俄国照会和俄国舰队的支持下，丹麦为维护不许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联合、不许公国脱离丹麦的 Lex Regia 而与德国进行了斗争。沙皇在维护 Lex Regia 的借口下取得对德国革命的胜利之后，便用废除这一法律的办法来并吞民主的丹麦。因此，斯基的那维亚人和德国人根据经验就知道了，他们都不应当把自己的民族要求建立在封建的王位继承法的基础上。经验更清楚地向他们表明，德国人和斯塔的那维亚人——同一个伟大种族的代表——彼此争吵而不结成同盟，这只会为自己的世世代代的敌人——斯拉夫人铺平道路。

目前最大事件是美国政策在欧洲地平线上的出现。对于这一事实，虽然一部分人额手称庆，一部分人切齿痛恨，但它已为大家公认了。

“奥地利会力求瓜分土耳其帝国，以弥补它可能遭到的丧失意大利属地的损失，——这个前景，在它很愚蠢地与山姆大叔发生纠纷以后更有可能了。美国的分舰队驻扎在亚得利亚海，在意大利起义时会使情况特别复杂化，而我们将来完全可能看到这种意外事件，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在西方还没有死去。”

这是英国贵族的老机关报“先驱晨报”的话。

巴黎的“新闻报”说：“科斯塔事件离结束还远得很。我们听说，维也纳当局已向华盛顿当局要求雪耻，当然，这是不会得到的。目前科斯塔仍处于法国领事的保护之下。”

维也纳的“新闻报”嘟哝说：

“我们应当避免跟美国佬接触，因为他们半是海上强盗，半是绿林英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绅士。”

德国的报纸怨声不绝，据说合众国和土耳其似乎在如下条件下签订了秘密条约：土耳其获得金钱和海军援助，而合众国则取得鲁美利亚的埃内兹港，这就会使北美共和国在地中海得到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商业和军事基地。

布鲁塞尔的报纸“解放”说：“因流亡者科斯塔被逮捕而引起的美奥两国政府之间的土麦那冲突，将来会被看做 1853 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多瑙河各公国的被占领，西方外交在君士坦丁堡的手腕和联合舰队的演习，与这件事相比，只能算是次要的。土麦那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而君士坦丁堡的事件只不过是解决已接近尾声的老问题而已。”

在意大利的报纸“议会报”<sup>236</sup>上刊载了一篇标题为“美国政策

在欧洲”的社论。我从这篇文章中逐字逐句地摘译了下面一段：

“议会报”说：“大家清楚地知道，合众国早就想在地中海和意大利获得海军基地，特别是当东方发生纠葛的时候。例如，在1840年，严重的埃及问题提上日程，圣让得阿克遭到攻击，这时，合众国政府曾请求双西西里王国国王<sup>①</sup>把巨大的塞拉库斯港暂时割让给它而来获结果。目前，美国政策干涉欧洲事务的趋势必然会加强起来，而且会越来越顽强。毫无疑问：现在的合众国民主政府正在大声地对意大利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牺牲者表示同情，同奥地利外交关系的决裂丝毫也不会使它惊慌，它已经在士麦那用大炮的威胁去支持自己的政策。如果要对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国家的这些意图表示愤慨，或说它们不合理和很可笑，这是不公正的。不言而喻，美国人并不想夺取东方和发动同俄国的陆战。但是，既然英国和法国动用自己最强的海军力量，那末，美国人为什么不照样行动呢，特别是当他们要在地中海获得海军基地——掩蔽和‘补充储备品’的地点的时候？对于美国人来说，既然是共和分子与哥萨克分子直接敌对的问题，所以就决定着—项重大的利益。商业和航运已经大大地发展了世界各民族之间合法的交往和联系，以至目前在任何冲洗着旧大陆或新大陆的海洋上没有—个民族会认为自己是异乡人，或者在任何类似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这样的大问题上认为自己是局外人。美国的商业和在我们海岸上从事商业的侨民都要求美国旗的保护，而为了使这种保护经常化和常年有效，他们就需要—个港口去停泊他们的已经—在世界海军强国舰队中居第三位的舰队。如果英国和法国直接干预有关巴拿马地峡—切事务，如果这两个强国中的第—个强国已经这样胡作非为，甚至捏造—个蚊子国王，以便拿领土权来对付合众国的行动，如果这两个强国最终商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孔道应该对所有各国开放并由—个中立国家掌管，——那末，显而易见，合众国就要要求苏伊土地峡的自由和中立化得到同样周密的保护，而且力求实现这种保护，同时它也要密切注视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因为这种瓦解会导致埃及和叙利亚全部或部分地转归某个头等强国统治。苏伊士和巴拿马是通向东方的两条大道；它们至今仍然封闭着，将来它们会相互竞争。保障自己在横越大西洋问题上的优势的—好办法，就是参与解决地中海问题。我们相信，

<sup>①</sup>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正在离达达尼尔海峡不远的海面上行驶的美国军舰，将不会放弃在它方便的时候驶入该处的要求，因为它们并不受 184 年公约签订国所同意的限制性条款的束缚，也就是说，它们有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即美国政府不是这一公约的参加国。欧洲为这种大胆行为所震惊，因为它从 1783 年和约时起就已习惯于把合众国看做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以后的瑞士各州，也就是把合众国看做这样的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它的存在，但决不允许它进入老牌强国的贵族圈子，决不让它在一般政策问题上有发言权。但是大洋彼岸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已经高度地富强起来，有了高度的文明，它不可能继续安于过去给它规定的卑微地位。北美合众国对至今仍裁夺着地球命运的五强最高评议会的压力，是一种新的力量，它必走要促使维也纳条约所建立的闭塞体系趋于崩溃。只要合众国还没有取得在决定一般政治问题的会议上的现实权利和正式地位，它就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特别的尊严实施天然权利和 *jus gentium*（国际法）的最人道的准则。它的旗帜不分党派地保护着各国内战的受害者，并且在 1848—1849 年大火烛天的时候，美国舰队的好客态度从来也没有被任何有伤尊严或耻辱的让步动摇过。”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5 日

载于 1853 年 8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50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  
报告书。——议会动态<sup>237</sup>

1853年8月12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今天的“通报”得知：波拿巴为水兵们降低烟价，作为法国舰队在贝捷克湾陷入屈辱地位的赔偿。波拿巴用腊肠争得了王位<sup>238</sup>。他为什么不能试用烟草来维持他的王位呢？不管怎样，东方的纠纷都将导致路易·波拿巴的威信在军队和法国农民的心目中的 *démonétisation*（下降）。他们已经懂得，在国内丧失的自由是不能用在国外获得的荣誉来补偿的。“常胜帝国”堕落得甚至不如“群贤内阁”了。

我们从刚刚收到的君士坦丁堡的报纸获悉：苏丹告臣民书是在8月1日发表的；俄国驻阿德里安堡领事从圣彼得堡接到了离开土耳其的命令；其他俄国领事正等待类似的命令；君士坦丁堡的报纸在多瑙河各公国被禁止。在士麦那出版的“公道报”8月1日登载了下面一则关于波斯的消息：

“波斯沙赫读了根据他的命令转交给他的土耳其政府和俄国当局之间有关当前冲突的来往信件之后正式声明，他认为土耳其政府完全有理，一旦发生战争，他将公开站在土耳其政府这一边。这一消息给俄国驻德黑兰大使以强烈的印象，现在人们都说，他正打算申请护照。”

欧洲整个报界都根据从彼得堡发来的密电纷纷猜测对俄国提出并被沙皇接受的建议的内容。帕麦斯顿的“晨邮报”断言：

“7月25日美延多尔夫先生转给本国皇帝的纵然不是正式的建议（维也纳会议通过的），无论如何也是关于24日会议情况的报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问题会根据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这样的精神解决，这样说未必会弄错。处理的方式将是这样的：列施德—帕沙给涅谢尔罗迭伯爵一份照会，照会中附有给予苏丹的正教臣民以特权的敕令，这些特权甚至比俄国为他们所要求的更为广泛。将对沙皇讲许多恭维话，并向他保证，苏丹将以最好的感情对待他的臣民，并且——列举苏丹已经赐予他们的某些权利。这份照会将由土耳其大使递交，于是问题就解决了……到9月10日，最后的一个俄国兵士将渡过普鲁特河！”

另一方面，来自维也纳的私人信件指出，俄国军舰出现在普鲁特河和多瑙河汇合处上游，这证实了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发表的意见：在送往圣彼得堡的建议中根本没有关于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要求；这个建议来自奥地利当局，因为在沙皇拒绝法国和英国的建议后，英国驻维也纳大使<sup>①</sup>这位“真正主张和解的人”曾吁请奥地利当局进行调停；奥地利的这个建议正中俄国之意，让它有可能使结束谈判 *in infinitum*（遥遥无期）。据半官方的法兰克福“总邮报”<sup>239</sup>的消息，俄国允许奥地利只能向土耳其报道自己本身的利害关系。

不久前公布的关于人口的官方材料证明，大不列颠的人口正在缓慢地但却是不不断地缩减。1853年第二季度

各调查区人口死亡数 .....	107861 人
同期出生数 .....	158718 人
人口自然增长数 .....	50857 人

<sup>①</sup> 威斯特摩兰。——编者注

## 整个联合王国

出生数超过死亡数 .....	79800 人
同期迁往国外的人数 .....	115959 人
迁往国外人数超过人口的自然增长数 .....	36159 人

最近的一个报告表明迁往国外的人数只超过人口自然增长数 3 万人。

在人口外流而使人口缩减的同时,生产力和资本却空前增长。马尔萨斯神甫曾否认人口外流会发生这种影响,并且以为自己已通过精细的核算证明了:即使动用世界上所有的船只运送外流的居民,也丝毫不能影响人口的极度增长。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末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贸易部公布的关于 1853 年上半年到 7 月 5 日止的贸易和航运的材料,与 1852 年同期的出口、进口和航运的材料相比,总的说来有了很大的增长。犍牛、公牛、母牛、牛犊、绵羊和羊羔的进口额大大增加。

1852 年上半年(至 1852 年 7 月 5 日止)谷物	
总进口额 .....	2604201 夸特
而 1853 年同期的总进口额 .....	3984374 夸特
1852 年上半年细磨面粉和粗磨面粉总进口额 .....	1931368 夸特

而 1853 年同期的总进口额 .....	2577340 夸特
1852 年咖啡总进口额 .....	19397185 磅
1853 年 " " " " " " .....	21908954 磅
152 年酒类总进口额 .....	2850862 加仑
1853 年 " " " " " " .....	4581300 加仑
1852 年蛋类总进口额 .....	64418591 个
1853 年 " " " " " " .....	67631380 个
1852 年马铃薯总进口额 .....	189410 公担
1853 年 " " " " " " .....	713941 公担
1852 年亚麻总进口额 .....	410876 公担
1853 年 " " " " " " .....	627173 公担
1852 年生丝总进口额 .....	2354690 磅
1853 年 " " " " " " .....	2909733 磅
1852 年棉花总进口额 .....	4935317 公担
1853 年 " " " " " " .....	5134680 公担
1852 年毛类(羊毛和羊羔毛)总进口额 .....	26916002 磅
1853 年 " " " " " " " " " " .....	40189398 磅
1852 年皮革(熟皮)总进口额 .....	1075207 磅
1853 年 " " " " " " " " .....	3604769 磅

可可、海鸟粪、原糖、茶叶等的进口量减少了。至于出口,有下述材料表明:

1852 年上半年棉织品出口值 .....	11386491 英镑
1853 年同期的出口值 .....	13155679 英镑

至于棉纱——这里包括亚麻纱和毛纱——出口额在数量方面是减少了,但根据公布的价值,出口额却大大增加,出口价值如下:

1852 年上半年亚麻织品的出口值 .....	2006951 英镑
1853 年同期的出口值 .....	2251260 英镑
1852 年丝织品的出口值 .....	467838 英镑
1853 年 " " " " " " .....	806419 英镑



收成看来不坏，因为水分足，有利于这些作物；但马铃薯是全国歉收。约·斯特治先生和查·斯特治先生的公司在他们最近的一个关于小麦收成的通报里指出：

“小麦总收成大概是从 1816 年起所有年份中最低的，如果 1854 年的收获不早，我们就一定要输入甚至比 1847 年还要多的各种谷物和面粉，——可能不少于 1500 万夸特。但是，只要法国不在产粮国市场上和我们竞争，我们现在的价格之高足以刺激如此规模的进口。”

指望 1854 年的收获很早，看来没有什么特殊根据，因为经验表明：歉收年份正如丰年一样，通常都是连续的，而从 1848 年起，好几个丰年已经连续得很久了。英国将向其他国家订购足够的粮食，这一点没有丝毫疑问；但是自由贸易派所期望的英国工业品的输出与谷物的输入相平却是没有指望的。此外，在输入可能超过输出的同时，国内工业品消费量也将缩减。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现在已经在逐周减少，并且已降低到 17739107 英镑了。

上院在上星期五的会议上否决了下院通过的工人结社法案。这一法案不过是 1825 年旧结社法<sup>240</sup>的新解释，其目的是通过取消结社法中一些难懂的和意义含糊的词句的方法，使工人与企业主在他们结社的合法性被承认方面处于比较平等的地位。每当工人这帮愚民要求权利而不是要求慰问时，多愁善感的贵族们就要大发雷霆，因为他们喜欢把工人当作自己的忠顺奴仆来看待。所谓激进派报纸当然就拚命抓住这个大好机会痛斥贵族是无产阶级的“一贯仇敌”。我决不否认这一点。不过，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激进派本身，看一看工人的这些“天然的朋友”吧。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曾向诸君报道，曼彻斯特的纺纱工场的场主和工厂主组织了一

个抵制工人要求的协会<sup>①</sup>。这个组织叫做“制止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骚动厂方合作协会”。建立这个协会是要追求以下的目的：

“1. 根据其他棉纺织工业区的工资额，确定纺纱业和织布业各部门的工资额；

2. 在实施这些工资额时，如遇到某一会员企业内工人的反抗，全体会员相互支持；

3. 为了有利于工人，保证全城及郊区实行划一的工资额。”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决定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其办法是成立地方的纺纱工场场主和工厂主协会，由中央委员会领导。

“这些协会的会员将抵制工厂工人的有组织的集团的一切要求，因为对它们的任何让步有损企业主、工人和一般工业的利益。”

他们不愿让他们的工人建立同类的组织与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这种组织分庭抗礼。他们想用组织集团的垄断权来巩固资本的垄断。他们将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工人只能作为单个的人与他们争论。他们想成群结队地进攻，但希望别人单枪匹马地反抗。用曼彻斯特的激进派和典型的自由贸易派的语言来说，这叫做“诚实的竞争”。

上院 8 月 9 日会议本来是要决定下院经过 10 个月讨论后通过的 3 个爱尔兰法案的命运。地主和租佃者法案废除了有关不动产典契的法律。这在目前就给合法出卖小地产造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在典地产法令不适用于小地产。租佃权法案修改并概括了 60 个以上的禁止签订为期 21 年的租佃契约的议会法令，处理了租佃者根据相应的合同作了改良设施的补偿费问题，并且不

<sup>①</sup> 见本卷第 256 页。——编者注

许采用转租制。最后，**租佃者改良设施补偿费法案**规定，租佃者在没有与地主签订任何合同的情况下所作的改良设施应予补偿，还有一条规定这一法律具有回溯效力。当然，上院是不可能反对议会干涉地主和租佃者之间的关系的，因为从爱德华四世时起到现在，上院从未中止把处理这些关系的立法法令大量载入法律汇编，而且上院本身的存在也是以有关地产的法律为基础的，**继承法**就是一例。但是，在自己事务中一向以公断人身份出现的各位上院议员，这一次却暴跳如雷，这在这个养老院中是很难遇到的。

克兰里卡德伯爵叫道：“据我所知，像租佃者补偿费法案这样的法律草案，这样完全违反和轻视所有合同的事，还从来没有提交议会批准过；至于这一法律有回溯效力，至今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政府敢于提出类似这条规定的措施。”

贵族们竟然以拒绝封建的效忠誓<sup>241</sup>来威胁王室，并且暗示有可能发生爱尔兰地主的叛乱。

上面这位勋爵阁下声称：“事情几乎牵涉到关于爱尔兰土地占有者对英国政府**保持忠诚**和信任的**全部问题**。如果他们看到如此处理爱尔兰地产，那末，我倒想知道，什么东西能**保证他们忠于王室和服从王室的最高权力**？”

阁下，请平静一些，平静一些！什么东西能保证他们服从王室的最高权力呢？——一名治安法官，两名警察。大不列颠地主叛乱！谁听说过比这更希奇的古董！不过，寒酸的贵族们早已只靠古董生活了。他们为了反抗下院和舆论，当然要自我振作一番。

圣莱昂纳兹老勋爵煞有介事地说：“希望诸位勋爵阁下不要因为避免发生与另一院的所谓‘**冲突**’，或是因为取得名声，或是由于外来压力，而通过这样一些极不完善的措施。”

罗登伯爵叫道：

“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我极其关心爱尔兰的幸福。”

换言之，勋爵阁下是认为爱尔兰极其关心罗登伯爵的幸福。“这不是党派的问题，而是所有贵族的问题”——这就是上院的一致呼声，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两党之间，在辉格党贵族和托利党贵族之间，在属于联合内阁的贵族和属于在野派的贵族之间，一开始就暗中商妥不让上述法案通过，而整个激烈的争论不过是一幕为报界采访员上演的闹剧而已。

如果回想起：成为激烈争论对象的这些法案的原作者不是联合内阁，而是得比内阁中的爱尔兰首席检察官纳皮尔先生；再回想起：在爱尔兰最近一次选举时，托利党人曾引用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法案，那末，就会十分清楚这个内幕了。下院在托利党政府草案中所作的唯一的重要改变，就是禁止因欠租而夺取租佃者的青苗。马姆兹伯里伯爵大叫：“这不是那些法案”，并问纽卡斯尔公爵能否在这方面相信他。公爵回答说：“当然，不。”“那您相信谁的话呢？”——公爵的回答是：“相信纳皮尔先生的话”。伯爵说：“这就是纳皮尔先生的信，它确证这不是那些法案。”公爵反驳道：“这是纳皮尔先生的另一封信，它确证这就是那些法案。”

如果托利党人仍然执政，那末现在属于联合内阁的贵族们就会投票反对爱尔兰法案。但是，既然是联合内阁执政，那末，反对自己的提案的任务就落在托利党人肩上了。联合内阁从托利党那里继承了这些法案，并使爱尔兰派的代表参加了自己的内阁，当然不能在下院投票反对这些法案。但是，它相信上院不会让它们通过。纽卡斯尔公爵的反抗本来就很怯弱，但阿伯丁勋爵声明，他同意法案通过二读的正式程序，即事实上在本届会议仍然不予通过。结果正是这样。前内阁的首脑得比勋爵，本届内阁的挂名大

臣兰斯唐勋爵以及爱尔兰的一个大土地占有者都很聪明地推说身体不适而没有出席。

在同一天，下院在三读中通过了**出租马车税法案**，恢复了十四世纪的马车官价，并通过了弗·斯卡利先生提出的出租马车主组织罢工应予法办的条款。我们现在不能细述国家干涉私人事务的问题。只想指出，这一切都是在自由贸易派的议院中实现的。不错，议院断言，在运载业领域中存在着垄断，而不是自由竞争。奇怪的逻辑！起先向私人行业课以所谓的特许税，并为它制定特别的警察条例，然后又声明，这一行业正是由于税重，所以失去了自由的性质，变成了国家垄断。

**流放苦役移民区法案**也在全院委员会通过。除为数不多的已被判服苦役的罪犯仍将流放西澳大利亚之外，流放到苦役移民区的刑罚被这一法案取消。罪犯先服一定时期的监禁，然后可获得假释（但可能取消）和在大不列颠的居住权；他们将被用于公共工程并得到政府规定的工资。最后这一条的慈善目的，是通过强迫劳动和自由劳动的竞争，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为地造成剩余；同时，这些慈善家们又禁止习艺所的贫民参加生产劳动，因为他们害怕造成对私人资本的竞争。

迪斯累里先生所指导的最熟悉内阁的一切秘密的伦敦周报“新闻报”，在上星期六——可见是在彼得堡急电到达之前——刊登了下面一则有趣的报道。

“我们得知，大臣们在得到他们信任的私人中声称，现在不仅没有任何战争威胁，而且任何危险（如果说这种危险曾经一度存在过）也早就消除了。看来，正式送往圣彼得堡的建议是预先征得俄皇同意的；英国政府在其公开言论中唱着对国家经济生活极为有害的调子，而在私下里却把混乱状态说成是

疑神疑鬼的结果，嘲笑关于某某强国一度认真想要进行战争的任何想法，并且要人相信一时的误会‘已在最近三周内彻底澄清’。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整个这种做法的秘密何在？……现在已在圣彼得堡的并在发出之前就得到俄皇同意的建议的主旨就是要土耳其完完全全接受俄国的要求，因为现在两国之间的战争是由于拒绝这些要求而引起的。土耳其政府拒绝这些要求是根据英法的劝告和直接恫恻。它现在又要根据英法的劝告和直接恫恻按上述建议同意这些要求。这里在形式上稍有更改，而在本质上一仍其旧。事实上已经对欧洲土耳其基本居民群众确立了保护制度的俄皇，只要声明一下他这样做并不是侵犯苏丹的最高权利就好了。多么宽宏大量的恩赐呵！”

君主权力在大不列颠被认为是徒有空名的，——正因如此，所有党派才不和它计较。如果你们问英国的激进派，为什么他们的党放弃反对王室特权的斗争，他们会回答你们：这种特权不过是装装门面，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会告诉你们，维多利亚女王只有一次大胆表现了自己的意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为御前女官而起的冲突，这次冲突使她遭到戏剧性的失败。当时，她想把辉格党的御前女官留在身边做 *entourage* (近臣) 但后来不得不向罗伯特·皮尔爵士让步，辞退了她们。但是，与东方问题有关的许多情况，——内阁的政策不可理解，外国报界提出责难，俄国大公和大夫人在英国似乎处于和俄国专制君主开战前夕的时刻接踵访问，——证实了下述传闻：在整个东方危机继续期间，英国宫廷都是同俄国串通的，所以它使善良的老阿伯丁留任首相，使摆出来给人看的与法国的同盟瘫痪，并抵制正式采取的反对俄国侵犯的措施。人们暗示说，英国舰队完全是为了科堡王室的利益而支持葡萄牙的反革命<sup>242</sup>。盛传帕麦斯顿勋爵也是由于宫廷的阴谋而被解除了外交部的职务。又说，维多利亚女王和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友谊是尽人皆知的。人们还记起，女王的丈夫是一位科堡

王室的人<sup>①</sup>，她的叔父也是一位科堡王室的人<sup>②</sup>，后者作为比利时国王和路易—菲利浦的女婿，非常希望波拿巴垮台，并且在他的儿子和奥地利公主结婚后已被正式接纳入神圣同盟。最后，人们还把英国对俄国客人的接待同俄国最近对英国旅行者的逮捕和挑剔作比较。

几个星期之前，巴黎的“世纪报”写文章反对英国宫廷。一家德国报纸也发表了一篇详细论述科堡—奥尔良派的密谋者的文章，说这些密谋者为了王朝的利益，通过列奥波特国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迫使英国内阁实行危害西方各国、鼓励俄国阴谋的方针。布鲁塞尔的“民族报”<sup>243</sup>刊登关于在伦敦举行的内阁会议的长篇报告，说女王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声明：妄图圣地的波拿巴是当前纠纷的唯一罪人；俄国皇帝想加在土耳其身上的屈辱，要比他的法国敌人所想的少；她决不为了某某波拿巴的利益而发出同意对俄国进行任何战争的王令。

关于这些传闻，“晨报”说得非常委婉。这些传闻在公众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在每周报刊上引起了相当审慎的评论。

“先驱”<sup>244</sup>写道：“我们不想作过于广泛的推测，只要看一看事实。奥里珈女公爵携同她的丈夫和姐姐，俄皇的最善于外交的女儿之一洛伊希顿堡公爵夫人来到英国。她受到布隆诺夫男爵的欢迎，并马上受到宫廷内的亲切接待，她被英国上等社会的代表人物所包围，其中也有阿伯丁勋爵。”

甚至在第一流伦敦周报中首屈一指的“观察家”<sup>245</sup>，也用简洁的标题“又是俄国人”发表了关于俄国客人光临的报道。在这家报纸的一篇社论中有如下的话：

① 阿尔伯特亲王。——编者注

② 列奥波特一世。——编者注

“目前根本没有什么原因阻碍和平协会在阿尔伯特亲王殿下下的庇护下以最有望的姿态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像“观察家”这样的报纸也不能提出更明显的暗示。我上面引证的那篇文章在结束时把英吉利君主国同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作了如下的比较：

“如果美国人力图在欧洲占有我们一度占有过的地位，那末，这与我们无关。目前，他们巩固国际法并作为扶弱除强者而赢得尊敬，就让他们从中博得荣誉，归根到底从中获得好处吧！英国将只关心统一公债按票面价值计算和保护本国海岸以防外国军队直接进攻。”

关于本年度（截至 1854 年 3 月 31 日止）拨款，5820 英镑用来抵偿英国驻巴黎大使官邸的建筑工程费、修理费、家具费等等的问题，魏兹先生在表决时问道：最近 30 年来按规定每年拨出的 1100 英镑的英国驻巴黎大使官邸的维修费到哪里去了？威廉·摩尔斯沃思爵士不得不承认，公款滥用掉了；还承认，根据政府派往巴黎的建筑师阿耳巴诺的报告，英国大使的官邸破败不堪。房子周围的游廊坍了；墙也倒了；房子好几年没有粉刷；楼梯不稳；污水并发出恶臭；房间里满是寄生虫，并且在桌上乱爬；家具和窗帘上幼虫密布，而地毯被狗屎猫屎弄得污七八糟。

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关于**消除煤烟措施**的法案通过了二读。如果这一提案能实行，英国的首都将焕然一新，市内除上院和下院外，将不再有一所肮脏房子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12 日

载于 1853 年 8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54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乌尔卡尔特。——贝姆。——  
土耳其问题在上院

1853年8月16日星期二于伦敦

戴维·乌尔卡尔特就东方问题发表了四篇文章<sup>246</sup>，目的是消除下述四种误解：第一，是认为东正教教会和俄国教会是一回事，第二，是认为英俄之间存在着外交冲突，第三，是认为英俄可能发生战争，第四，是认为英法之间似乎存在着同盟。这几篇文章，我打算将来再比较详细地谈谈<sup>247</sup>，因此现在只向诸君报道一下贝姆给列施德—帕沙的信。这封信先是由乌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

“阁下！因为我倘未得到去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我认为有责任把一些意见报告给阁下，我觉得这些意见是非常要紧的。我首先要说的是，我所看到的土耳其军队——骑兵队、步兵和野战炮兵是非常优良的。军容、军训和士气很再好没有了。骑兵要胜过欧洲任何一支骑兵。意义最大的是，全体官兵都要求同俄国人作战。带着这样的军队，我敢去进攻数量一倍于我的俄国军队，并且有十分把握取得胜利。奥斯曼帝国既然能够出动超过俄国所能抵挡的数量的部队，那末很明显，苏丹会满意地看到，被莫斯科的沙皇们背信弃义地从他的祖上手里夺走的所有省份将收复回来归他管辖……贝姆”

奥地利外交大臣<sup>①</sup>就美国巡航舰“圣路易号”在科斯塔事件中

① 布奥尔·绍恩斯坦。——编者注

的行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照会。在照会中，他谴责美国的整个政策。奥地利坚持自己有权用武力逮捕在中立国居住的外国人，否认美国有权采取军事性质的措施去保护他们。

马姆兹伯里伯爵星期五在上院提出质询，但他所关心的根本不是维也纳会议的秘密和这个会议向沙皇提出的建议的内容，整个目前谈判的情况他也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大可以说是古董鉴赏式的兴趣。他所希望的只不过是“翻译一下”俄皇在5月和6月给本国外交使节的两个通知（公布在“圣彼得堡消息报”<sup>248</sup>上）；他还想鉴赏一下“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应已作出的”答复。马姆兹伯里伯爵不是古罗马人，当着 *patres conscripti*（元老，古罗马议员的尊号）的面公开听外国使节陈词的罗马风俗是最使他反感的。同时，他自己也指出：

“俄国的两个通知已由俄皇用本国文字向全欧公开发表，在英文文的报刊上也已披露。”

把这两个文件从新闻记者的语言译成外交部官员的语言究竟会有什么好处呢？

“法国政府对这两个通告立即十分巧妙地作了答复……据报道，继法国之后英国随即也作了答复。”

马姆兹伯里伯爵显然是急于知道，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平淡文字译成克拉伦登伯爵的优雅文字是个什么样子。

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向“坐在对面的高贵朋友”指出，约翰牛经过了30年的和平、经商、工业活动以后，对战争已经“有点神经过敏”；这种神经过敏从去年3月“由于政府长期一直对自己的行动和谈判情况严守秘密而更加厉害了”。因此，马姆兹伯里伯爵为了和平的利益而提出质询，但政府同样是为了和平的利益而保

持沉默。

俄国对欧洲土耳其实行侵略的最初迹象使伯爵阁下比谁都伤心。他从来没有猜疑过俄国对土耳其有什么阴谋。他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俄皇的荣誉”。但是，难道俄皇的荣誉曾经因扩大帝国版图而受损吗？其次，在他的心目中，“沙皇在1848年革命时曾经坚决奉行保守政策”。的确，专制君主同这些败坏人心的革命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特别是在1852年，当伯爵阁下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

“没有一个国君这样一再保证遵守约束着欧洲的各项条约和维护这么多年来为欧洲造福的各项领土协定，没有一个国君对此表示过更多的诚意。”

毫无疑问，布隆诺夫男爵在怂恿马姆兹伯里伯爵签订1852年5月8日丹麦王位继承条约的时候，是用再三保证他的神圣君王非常喜欢现有一切条约的说法把伯爵诱进了圈套的。而在布隆诺夫劝说刚刚热烈祝贺了波拿巴篡夺王位成功的伯爵同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建立一个反对同一个波拿巴的秘密同盟的时候，就是最好不过地证明自己维护现行领土协定的诚意。

为了解释俄皇的突如其来的转变，马姆兹伯里伯爵于是就进行心理分析，来研究“影响了俄皇思想方式的情绪”。他肯定地说，“法国政府在圣地问题上的行为伤害了俄皇的感情”。诚然，波拿巴为了安慰俄皇被伤害的感情，曾经派了一个“性格非常温顺的人”戴拉库尔先生到君士坦丁堡去。“但是”，伯爵接着说，“已经发生的事情，看来并没有从俄皇的脑海中消除”，所以俄皇对法国犹有余怒。应该承认，戴拉库尔先生在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前就非常彻底地和令人满意地把问题解决了。“但是，尽管这样，俄皇的想法并没有改变”。这些情绪和由此产生的错误想法

是这样强烈，以致“俄皇仍然怀疑土耳其政府想向俄国提出它根本无权提出的条件”。马姆兹伯里伯爵承认，“无论是什么人”，甚至连英国的勋爵也都包括在内，“都没有本事看见人的思想”，但是“他不能不认为，自己能够解释这些影响了俄皇思想活动的惊人情绪”。他说，俄国人世代代习以为常地认为“注定要他们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恢复拜占庭帝国”的一天现在已经到来了。他还认为，“现在的俄皇”也有“这种感情”。明智的伯爵起初想用俄皇老是猜疑土耳其政府企图侵犯他的权利的说法来解释问题，现在伯爵则说，俄皇猜疑土耳其只是因为他认为吞并土耳其的适当时刻已经到来。伯爵阁下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改变他的逻辑议论的路线了。现在他不说有什么新情绪影响了俄皇的思想活动，使原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援引某些情况，由于这些情况，沙皇野心勃勃的想法和旧的传统感情曾经被抑制一个时期，并且压制了“使他受到诱惑的事物的产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是这么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即马姆兹伯里伯爵当时“任职”，而后来“不任职”。

当他“任职”时，他不仅第一个承认了布斯特拉巴<sup>249</sup>，甚至第一个为他的背誓、屠杀和暴政辩护。但在此以后，

“当时的报纸却开始不断攻击它们所说的对法皇采取的屈膝献媚的政策”。

联合内阁上台了，詹·格莱安爵士和查理·伍德爵士也跟着出来了，

“这些人在公开的会议上抨击法皇的政策和法皇个人，同时也抨击法国人民选出了这个王子做国君”。

随后就发生了门的内哥罗事件<sup>250</sup>，联合内阁

“允许奥地利坚决要求苏丹不要对起义的门的内哥罗人再采取武力措

施，甚至没有保障土耳其军队平平安安地撤退，结果使土耳其折兵 1500—2000 人。”

再后，就是罗斯上校从君士坦丁堡被召回，同时，英国政府又表示不愿和法国同时把自己的舰队派往贝捷克湾或士麦那。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就使俄皇产生了一种明确的想法，肯定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敌视法皇，英法两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同盟。

马姆兹伯里伯爵细腻地（任何小说家如果这样细腻地描写自己的女主人公变化无常的情感，一定会获得声誉）描写了影响着俄皇敏感的头脑并使他离开正道的原因之后，就自吹自擂地说，由于他同法国人民的暴君建立了密切的同盟，似乎就摧毁了数世纪来使法国人民同英国人民隔绝的成见和反感的壁垒。他庆贺现政府继承了他同西方沙皇建立的这个友好同盟，庆贺它收获了托利党人播种所得的果实。他却忘记补充说，正是在这个友好同盟的庇护下，法皇支持联合内阁的时候，苏丹才被献给俄国做牺牲品，因为这个法国的苏路克急于希望能够踩着穆斯林的肩膀爬上什么维也纳会议，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伯爵一方面祝贺内阁同波拿巴结成紧密同盟，同时马上就开始斥责这个 *mésalliance*<sup>①</sup>所产生的政策。

我们不打算继续把伯爵的所有宏论再介绍下去了，总之，他大谈土耳其领土不受侵犯的重要性，否认土耳其的衰落，不承认俄国的宗教保护权；他还责难政府不把侵犯多瑙河各国事件看做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没有用出动舰队的行动来回答俄国人渡过普鲁特河的事件，这些责难我们也不重复了。他所举出的新东西，只是下面这一封缅施科夫公爵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前写给

① 俏皮话：《close alliance》——“紧密同盟，联姻”；《mésalliance》——“不平等的婚姻”。——编者注

列施德—帕沙的“闻所未闻的蛮横的”信。

“本大使即将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得知，土耳其政府宣布打算保障东正教会的僧侣实现属于他们的宗教权利，这实际上是表示无意保障这个教会所享有的其他特权。不管采取这一决定的动机如何，本大使认为不得不通知外交大臣阁下，任何宣言之类，即使保障了东正教教会的单纯宗教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也是会被用来剥夺自古以来就公认属于这个教会及其僧侣并且现在仍属于他们的其他权利、特权和豁免权，因此帝国当局将认为这种宣言是对俄国及其宗教的敌对行为。

顺致敬意等等

缅施科夫

5月9日（21日）于比尤克德列”

马姆兹伯里伯爵“很难相信俄皇赞同缅施科夫公爵的行为或做法”。涅谢尔罗迭在缅施科夫离开之后发出的照会，以及涅谢尔罗迭照会发出后俄国军队的出动，证明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

“沉默寡言”的克拉伦登，仍然不得不“总是作同样的答复”，也就是说，不作任何答复，“虽然这使他感到十分惋惜”。他认为“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是不说”早先没有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和宣布“他不能提供任何消息和不能提出任何特别报告”。因此，这位伯爵阁下除了说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外不能多说一个字。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肯定，在奥俄两国当局奉行自己的进攻政策的整个时期，他一直同它们保持着“经常接触”。例如，当奥地利政府把莱宁根公爵派到君士坦丁堡<sup>251</sup>，并且陈兵边界，“以防边疆地区的本国臣民骚动”时，他同奥地利政府保持着经常接触。至少这就是“所援引的理由”，——清白无辜的克拉伦登这样告诉我们。苏丹向奥地利作了让步并撤回自己的军队以后，精力饱满的克拉伦登“重新同奥地利建立了接触，以便保证条约的认真履行”。

“我认为——勋爵接着说道——条约是履行了的，因为奥地利政府负责地告诉我们，情况就是这样。”

好极了，勋爵大人！至于同法国的 *entente cordiale* (诚意协商)，那是从 1815 年就存在的。在英法政府决定“派遣舰队”方面，也“没有丝毫分歧”。波拿巴已命令自己的舰队开往萨拉密斯岛，

“认为危险很大”，因此，“虽然他（克拉伦登）说危险不那么大，法国舰队没有必要在那时离开法国码头”，波拿巴“仍然命令法国舰队开航；但这个情况并没引起丝毫分歧，因为一个舰队在萨拉密斯，一个在马尔他，比一个在马尔他，一个在土伦有利和方便得多”。

克拉伦登勋爵接着说，当缅施科夫对土耳其政府采取蛮横措施施加压力时，

“应当满意地指出，舰队没有得到出海命令，这是为了让谁都不能说土耳其政府的行动是受我们指使的”。

在发生了种种事件之后，实际上完全有可能估计：如果舰队当时得到出海命令，苏丹一定会后退的。克拉伦登认为缅施科夫的“告别信”是“适当的，不过他觉得，在同各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时，这样的措词幸而是少有的，并且，如他所希望的，今后很长时期也会是少有的。”最后，关于入侵多瑙河各公国的事件，据克拉伦登称，法国和英国政府

“曾劝苏丹暂时放弃自己的一项毫无疑问的权利，即不把这些公国被占领看做是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

关于现在仍在进行的谈判，他只能说一点：

“今晨从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那里得到正式报告说：圣彼得堡将接受各国大使在维也纳协商好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稍加修改的话”。

不过克拉伦登宁死也不愿透露一点协议的条件。

波门特勋爵、哈德威克伯爵、克兰里卡德侯爵和埃伦伯勒伯爵回答了勋爵阁下。没有一个人表示庆贺女王陛下政府在这次谈判中所采取的方针。人们纷纷表示极大的忧虑：内阁的政策是不是错误的呢？内阁是不是做了帮助俄国而对土耳其不加保护的调停人呢？如果法国和英国老早就采取强硬政策，内阁的处境是不是会比现在好呢？顽固的老阿伯丁回答了他们：“如果事过之后再推测当时可能发生什么，如果只是议论不那么做又会怎样，那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最令人震惊和意味深长的是他下面的声明：

“各位勋爵阁下应当记得，自己是没有受任何条约约束的；我否认英国受什么条约约束而必须参与任何支持土耳其帝国的军事性行动”。

当英法第一次表示要干涉当前的土耳其问题时，俄皇曾断然否认 1841 年条约对他同土耳其政府的关系的约束力和由这个条约产生的西方列强进行干涉的权利。但同时他却依据同一个 1841 年条约坚持其他强国的军舰不得驶入达达尼尔海峡。现在阿伯丁勋爵在公开的隆重的议会会议上竟然同意了对这个条约的这种粗暴的解释；而这个条约是俄国专制君主只有在把大不列颠赶出欧克辛海<sup>①</sup>时才会同意承认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9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6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① 黑海的称。——编者注

## 卡·马克思 土耳其问题在下院

1853年8月19日星期五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一再拖延他对土耳其问题的解释，终于很幸运地拖到了议会会议的最后一周。上星期一，他突然宣布，他将在星期二作出拖延已久的报告。原来是勋爵阁下确知迪斯累里先生在星期一早晨已离开伦敦。查理·伍德爵士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他在获悉约翰·帕金顿及其支持者不出席议院的消息后，突然提出了自己的印度法案和上院的修正案，利用出席的议员人数不多，达到了一致同意恢复盐业垄断权的目的。这类卑劣的骗术，就是辉格党的议会策略的枢纽。

下院对东方问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罗素勋爵用一种十分适合他所要扮演的角色的声调开始了演出。这个被看做曾经盛极一时的辉格党家族的最后代表人物的小矮子说得很枯燥，他压低了嗓门，语调平淡呆滞，不像一个大臣说话，倒像一个刑事新闻采访员，用一套陈辞滥调和官场用语，冲淡人们对他所描述的惨象的印象。他所说的话不是“辩护词”，而像是忏悔。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使这样的演说得到原谅，那就是它的直率了，好像小矮子力图这样来平抑某种内心的痛苦似的。甚至“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不可侵犯”这些不可避免的词句，听起来也好像是在这个帝国墓

前致悼词时偶一不慎而夹杂进去的往事回忆。这篇以宣布东方纠纷已经解决为目的的演说的影响如何,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来判断:一当这个演说电报发到巴黎,巴黎的有价证券就下跌了。

约翰勋爵说得对,他说,政府不需要他来辩护,因为谁也没有攻击它;相反,议院明白表示完全由执行机关去进行谈判。的确,没有一个议员曾经提出要求大臣们参加辩论的提案,议院外也没有举行过一次集会要求议员们提出这类提案。如果说内阁的政策充满了神秘,那是得到了议会和公众默许的。至于在谈判结束之前不公布文件,照约翰勋爵的说法,这是议会的传统所形成的永久的法律。约翰勋爵列举了一些人所共知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他的叙述里并不是更有味道,因为他不是讲述什么,而是开清单;如果把他所讲的话介绍下去,会令人厌倦的。但是,仍然有几个重要之点,在约翰勋爵讲出之前还没有人正式讲过。

还在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俄国大使就通知约翰勋爵,说沙皇打算派一个特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去,它的使命只限于就圣十字架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希腊正教教会的特权问题提出建议。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和英国政府并没有猜疑俄国方面还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在3月初,土耳其大臣通知斯特腊特弗德勋爵说,缅施科夫公爵提议签订一项同土耳其独立绝不相容的秘密条约<sup>252</sup>(据累亚德先生说,罗斯上校和其他许多在君士坦丁堡的人物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并且声称,如果让法国和英国知道了这个建议,俄国将认为这是一种直接敌视俄国的行为。同时也知道了(不仅根据传言,而且根据可靠的报告),俄国正在向土耳其边界和敖德萨大量集结军队。

至于维也纳会议致沙皇并被沙皇接受的照会,这是德鲁安·

德·路易斯先生在巴黎根据列施德—帕沙对俄国最近一次照会的复照 253 的内容写出的。过了一些时候，奥地利接受了这个照会，修改了一下，在 7 月 24 日作为它自己的建议提出，而照会的定本是在 7 月 31 日完成的。奥地利大臣在此之前就把照会转交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大使则在 7 月 24 日，即照会还没有最后定稿之前就寄到圣彼得堡了。只是在 8 月 2 日，即沙皇同意这个照会之后，照会才发往君士坦丁堡。可见，这个照会实质上是俄国通过四大强国给苏丹的照会，而不是四大强国给俄国和土耳其的照会。约翰·罗素勋爵肯定说，这个照会“在形式上不是同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完全吻合的”，从而承认这个照会在内容上同它是完全吻合的。为了使人在这方面不再有任何疑问，他又加了一句：

“俄皇认为，他的目的将要达到。”

照会草案对撤出多瑙河各公国问题连提也没有提。

约翰勋爵说：“即使土耳其和俄国终于在这个照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从各公国撤兵这个重要问题仍是悬案。”

同时他补充说，英国政府“认为这种撤兵是非常重要的”，但又请允许他不谈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他仍然相当明白地示意，英国和法国的舰队也许在哥萨克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之前就离开贝捷克湾。

“我们不应同意这样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舰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驶近达达尼尔海峡，都可以被看做无异于实际入侵土耳其领土的行动。但是不言而喻，当问题得到解决，和平得到保证时，贝捷克湾对英国和法国将不再是具有任何价值的基地了。”

任何一个明智的人，绝对不会认为，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应当

永远留在贝捷克湾，或者英国和法国应当签订一个正式条约，来禁止自己的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公海。因此，这些模棱两可而费解的话的意思（如果确实有点意思的话）只能是：苏丹一接受照会和哥萨克一答应撤出各公国，舰队即行撤离。

约翰勋爵说道：“当俄国政府占领了各公国时，奥地利声明，根据 1841 年条约的精神，绝对有必要召集各强国代表举行会议，努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已经形成的困难局面，否则，它将危及欧洲和平。”

阿伯丁勋爵则与此意见相反，他几天以前在上院说过，——从其他方面获悉，他在 6 月间给君士坦丁堡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的正式照会中也说过：

“1841 年的条约根本没有规定各签字国有切实援助土耳其政府的义务（但是却有暂时拒绝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义务！），所以英国女王政府完全有权根据自己本身的利益自行决定，是采取行动或者是放弃行动。”

阿伯丁勋爵否认对土耳其有任何义务，无非是不愿有反对俄国的权利而已。

约翰·罗素勋爵最后指出了谈判接近完美成功的“美好前景”。但是，在目前，在维也纳写成的俄国照会（应由土耳其转交沙皇）还没得到苏丹赞同，西欧列强提出的 *sine qua non*（必需条件），即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还根本没有向沙皇坚决提出的时候，这种看法是太乐观了。

累亚德先生第一个发言回答约翰勋爵，他的讲演毫无疑问是最好和最有力的，这篇讲演大胆，紧凑，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它表明，这位著名学者十分熟悉尼古拉，正如他熟悉萨尔达尼拔一样；十分了解东方现代的勾心斗角，正如他了解东方过去的神秘

传说一样。

累亚德先生对阿伯丁“无论何时何地都宣称他的政策的实质是和平”表示遗憾。英国如果回避用武力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就是鼓励俄国这个肆无忌惮的国家的野心，它的这种野心迟早必然导致战争。俄国现在的行为不应当看作偶然的一时的现象，而应当看作广泛的政治计划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至于对法国的“让步”和拉瓦累特先生的“诡计”，俄国甚至不能拿它们作借口，因为

“土耳其政府在颁布作出引起俄国不满的让步的敕令之前好些天，甚至几星期，就将这个敕令草案递交提托夫先生了，当时敕令本文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对”。

要说猜不透俄国对塞尔维亚、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以及土耳其基督教居民的存心，那是很难说得过去的。缅施科夫公爵到君士坦丁堡作正式访问，刚刚到达就要求免去加腊沙宁的塞尔维亚大臣职务。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尽管塞尔维亚正教最高会议提出抗议。加腊沙宁先生是在1842年的起义中涌现出来的活动家之一，这次反俄的民族运动赶走了当时在塞尔维亚执政的米哈伊尔公爵（他和他的家族都只不过是俄国的工具）。1843年，俄国要求有干预塞尔维亚内政的权利。绝对没有任何条约使俄国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它从当时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那里得到了这种全权，阿伯丁勋爵当时宣布，“俄国有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自己的各项条约的权利”。

累亚德先生说道：“俄国在这方面的成功表明，它是塞尔维亚的主人，它可以阻挠任何民族争取独立。”

至于多瑙河各公国，俄国首先利用了1848年这些省份的民族

运动，促使土耳其政府把一切有自由主义主张和独立主张的人从这里驱逐出去。随后它又迫使苏丹签订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约；这个条约确定了俄国干预各公国一切内政的权利，“各公国现在被占领也证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实际上是俄国的省份”。

现在剩下的还有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

“在希腊人当中流行起一种批判的和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再加上他们同欧洲自由国家的贸易联系，引起俄国政府极大的不安。俄国的不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新教在东方基督教徒中的传播。在土耳其恐怕找不出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没有新教的核心，这应当说主要是美国传教士的影响和传教的结果（这又是美国进行干涉的一个根据）。得到俄国传教士撑腰的正教僧侣竭尽全力阻挠这个运动，但一切迫害都无济于事，于是缅施科夫公爵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对于俄国来说，特别要紧的就是根除近年来在土耳其政府治下的基督教臣民中开始表现出来的宗教独立和政治独立的精神。”

累亚德先生谈到建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所谓希腊帝国的计划，他指出，希腊人（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正教徒，而是指有别于斯拉夫人的民族）总共不过 175 万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多年来千方百计加紧抛掉同他们的任何联系，不许希腊族僧侣到自己那里去担任神甫和主教；塞尔维亚人建立了自己的总主教教堂，来代替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教堂；如果让希腊人盘踞在君士坦丁堡，就是把整个土耳其出卖给俄国。

有些下院议员宣称，君士坦丁堡是否将落入俄国手中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累亚德先生反驳他们说：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土耳其版图内的所有大省份，如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都将陷于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掌握了这些省份的强国还会建立对印度的统治。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的强国，东方通常视之为

世界的霸主。

不过俄国深信，目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让它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是，

“它力图使这个国家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民族存在，力图慢慢地，而又是实实在在地剥蚀土耳其人的权力，并向所有反抗它的计划的人表明，这种反抗不仅无用，而且会遭到它的报复。一句话，它要使土耳其不能有其他政府，而只能有俄国的政府。这一次，它的这类阴谋已经完全成功了”。

累亚德先生声称，在缅施科夫公爵要求签订秘密条约之后，在俄国在边界和敖德萨进行大规模备战活动之后，政府竟然还满足于圣彼得堡对它的解释和保证，而错过了机会，没有声明英国和法国将认为越过普鲁特河是 *casus belli* (宣战的理由)，没有声明它决不许俄国在没有英国参加的情况下同土耳其缔结任何条约或协议。

“如果我们当时采取这个步骤，俄国绝对不敢越过普鲁特河。”

随后，累亚德先生说明，多瑙河各公国如果成为独立国，同贝萨拉比亚联合起来，并以匈牙利为后盾，最终会成为捍卫君士坦丁堡以免被俄国人侵占并把大斯拉夫种族分为两部分的唯一手段。他认为俄国**终将撤出**各公国。

“俄国明白，为了实际上已经属于它的省份而同欧洲列强打仗是不值得的。俄国本来就已经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只有用流血牺牲和高昂代价才能取得的东西；它已经加强了自己在东方的实力；使土耳其受到屈辱；迫使土耳其负担全部军费，耗尽了土耳其的资源；此外，也是重要得多的一点，它已经贬低了英国和法国在它们本国臣民和东方各民族心目中的威信。”

累亚德认为，维也纳会议拟定的照会有下列结果：

“如果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它，俄国就会把矛头转向我们，要我们当它的

盟国，一起反对土耳其，迫使它接受这个不公正的建议。如果土耳其政府接受它，那就意味着英国直接批准俄国有干预土耳其政府 1200 万基督教臣民的事务的权利……我们对这个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态度，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占的是二等国的地位，而起头等国作用的只是俄国……我们错过了适当解决这个东方大问题的也许是不可复得的机会……

相反，却让俄国把土耳其打击得再也恢复不了元气……但这不是我国政策唯一的结果。瑞典、丹麦以及迄今一直指望能够得到我国支持的一切欧洲弱国会认为，从今以后，再反抗俄国侵犯是毫无用处的。”

累亚德讲完之后，约翰·帕金顿爵士提出几点重要的意见，其所以重要，因为这些意见代表托利党反对派的观点。他对约翰·罗素勋爵不能向议会和全国提供比较令人满意的消息表示遗憾。他向政府保证说，如果政府决定把撤出各公国当作 *sine qua non*（必需条件），这“不仅会得到下院的支持，而且还会得到英国人民差不多完全一致的支持”。在文件没有公布之前，他对于劝土耳其不要把占领各公国看作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的政策，对于在早期阶段上不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而使谈判长达 6 个月之久，造成没有信心的气氛，从而使土耳其和大不列颠的利益和贸易遭到损失的政策，将不作评论。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又发了一通他常发的、温情脉脉的民主派宏论，这种宏论通常是讲的人比听的人更过瘾。如果把这些轻气球似的虚夸词句抓在手里挤一下，那就会一无所有，甚至原来使它们膨胀起来像个什么东西的空气也没有。达德利·斯图亚特再一次重复他经常重复的论调，说土耳其正在实行改革，说苏丹的统治不论在宗教方面或是在贸易方面都比俄国沙皇的统治有多得多的自由主义特色。他公正地指出，当多瑙河各公国的不幸居民实际上正遭受着战争灾难的时候，大谈其和平是没有用处的。

他要求欧洲保护这些省份的居民免受他们现在遭受到的残酷压迫。他从议会史中引用一些事实，证明议员甚至在谈判尚未结束时也有权发表言论。总之，“每日新闻”的每一位细心的长期读者所熟知的事情他恐怕一件也没有忽略。在他的演说中有两点“精华”：

“勋爵阁下（约·罗素）的解释虽然不很充分（因为他告诉议院的事情恐怕只是议院以前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遗憾的是，从他所闭口不谈的东西中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勋爵阁下干出了他应引以为耻的事情。”

至于阿伯丁伯爵，

“他虽然也曾告诉我们，和平已有 30 年的保证，这对欧洲的自由和繁荣大有好处，但是我（达德利·斯图亚特）否认和平对欧洲的自由产生了什么好处。我要问，波兰、意大利、匈牙利、还有德国现在处在什么状况？”

这位民主派勋爵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这是这种第三流演说家的致命的喜好），从大陆的暴君一直扯到“本国臣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女王方才罢休。

蒙·米耳恩斯先生，内阁的信徒之一，在他的额头上写着：

“他只是一件工具罢了。”<sup>①</sup>

他不敢完全按照政府的精神说话。他的话是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凑成的。他一方面认为，大臣们没有把文件告诉议院是“做得非常聪明谨慎”的；另一方面又向大臣们示意，如果他们采取别的做法，他们的行动会更有力和坚定。他一方面认为政府屈从俄国的要求是对的，另一方面又表示怀疑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等于英国政府叫土耳其采取某种政策而又不准备支持它，

<sup>①</sup> 莎士比亚“裘力斯·该撒”第四幕第一场。——编者注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最后他说，“这个问题他越想越感到非常难办”，而他越是不大明白，就越觉得政府的观望政策有道理。

听了蒙克顿·米耳恩斯先生这番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思想混乱的话以后，门茨先生的有点粗鲁的直率使我们有一种真正清新的感觉。门茨先生是北明翰的议员，1831年实行议会改革的头脑之一。

“有一次荷兰大使向查理二世提出一个不体面的建议，查理叫道：‘呵，上帝！您从来没有向奥利弗·克伦威尔提出过这类建议’。大使答道：‘当然不会向他提出的，但是您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如果我国现在有一个像克伦威尔的人，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些大臣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政府，俄国就绝不会侵入多瑙河各省了。俄皇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促使英国进行战争，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就证明这一点。英国现在不过是收获它对这些国家的行为的果实而已。既然谈到英国的对外政策，我认为，英国的地位是极其薄弱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我还认为，英国人民感觉到，国家的威信降低了，政府丧失了一切荣誉感，只注意几个英镑，几个先令和几个辨士。政府目前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开支多少，战争对本国各种商人是否有利可图。”

北明翰是军火生产和枪炮贸易的中心，因此，这个城市的代表对于曼彻斯特派的爱好和平的棉织业团体自然要抱讥笑态度了。

太恩河上的新堡的议员布莱克特先生不相信俄国人会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他警告政府，“不要陷在任何从王朝观点出发的爱和憎中”。

大臣们受到各派代表四面围攻，神色阴沉，满脸颓丧，灰溜溜地低头坐着。正在这个时候，突然，理查·科布顿走上了讲台，他像狂信者一样异想天开而信仰坚定，像思想家那样矛盾百出，像小店主那样胆怯而精明，用这种态度对大臣们大加赞扬，说他们接受了

他的和平学说，并且在目前情况下加以运用。他宣扬内阁公开实施的、议会默许的东西，宣扬统治阶级允许政府实行和议会通过的东西。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使他第一次产生了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他暴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的秘密，因此被当做叛徒抛弃。他使英国资产阶级好像在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这镜子里的容貌看起来很不雅观，于是他便耻辱不堪地被人嘘了一阵。他反复无常，但是他的这种反复无常本身则是常常的。从过去的贵族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的好战词令，同现在的交易所经纪人的胆小怕事的事实是不相和谐的，但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

他一开始就宣称，从这个问题的实质上看，各种意见是没有分歧的。

“但是，很明显，土耳其问题仍然引起了极大的不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近 20 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土耳其人是侵入欧洲的外来民族，他们没有成为欧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祖国是亚洲；在文明国家里不能有伊斯兰教；我们不能捍卫不能自卫的任何国家的独立，此外，像现在人所周知的，在欧洲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的人数是 1 对 3。

“我们应当奉行的政策就是：只有在绝大多数居民都同我们一样希望阻止任何其他国家占领土耳其的情况下，才能保障欧洲土耳其对俄国的独立地位……毫无疑问，我们是可以派遣我们的舰队到贝捷克湾和迫使俄国人有所节制的，因为俄国不想同一个海上强国冲突；但是我们这样做只会增加巨大的军备，而仍然解决不了东方问题……问题在于，土耳其和它的基督教居民前途如何？伊斯兰教不可能保存，而我国若是充当维护欧洲伊斯兰教的斗士，我们是会感到十分遗憾的。”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说，为了贸易的利益，土耳其应当得到

支援。他(科布顿)则绝不会为了税率而进行战争。他太坚信贸易自由的原则了,以致认为这些原则的实施无须用战争的方法。对土耳其的出口额许多人都估计得过高。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各国所消费的只不过是最小的一部分。

“我们在黑海进行的全部贸易,都要归功于俄国推进到了土耳其的沿海地区。我们现在得到的粮食和亚麻,不是来自土耳其,而是来自俄国。即使俄国将来还要继续进攻土耳其,难道俄国就不像以往一样,乐于给我们送来自己的大麻,自己的粮食,自己的咸肉了吗?我们在波罗的海也在同俄国进行贸易……而同土耳其的贸易的前景又如何呢?这是一个没有道路的国家。而俄国人是经商条件好得多的人:不妨看看圣彼得堡,看看它的停泊码头、货物码头和货栈……我们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能有什么国家联盟呢?……人们也谈到力量的均势。这是问题的政治方面……关于俄国的实力,关于一旦俄国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对英国产生的危险,人们谈得很多。但是认为俄国会进攻英国是非常荒谬的!俄国不向西欧借债,就不能派遣自己的军队走出国门一步……这个国家如此贫穷,同英国相比,老实说,只不过是个大乡村而已。既缺资本,又无资源,永远不可能损害我国或美国、法国这样的国家……英国现在比以往强10倍,有多得多的力量来对抗像俄国这样的国家的进攻。”

接着,科布顿证明,目前,战争对英国来说,危险比以往要大得多。英国工业人口增加了很多。英国人对商品的输出和原料的输入的依赖性大大增加。他们已不再拥有工业垄断权。自废除航运法<sup>254</sup>以来,英国就不仅要在海运方面,而且要在其他一切部门,经得起世界竞争。

“我恳请布莱克特先生想一想,受苦最大的恐怕是他现在在这里所代表的港口。政府不理睬不明事理的人们的大声要求,是英明的……我不想谴责政府维护土耳其帝国的完整的言行,因为这是政府继承下来的传统政策……现政府应当受到信任,因为它在人民允许的范围以内表现了爱好和平。”

理查·科布顿是一个真正的戏剧式的英雄，作为戏剧式的英雄，他同一切真正的英雄一样，其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而接着走上讲台的，是一个假英雄，一切骗局的庇护者，制造精美的谎言和恭顺的诺言的大师，任何往往在溜之乎也的时候说出来的大话他都能说。这就是帕麦斯顿勋爵。这个老奸巨滑、饱经世故的辩士第一眼就看出，被告如果背弃自己的辩护律师，就可以逃避判决。他明白，现在四面受敌的内阁，如果激烈抨击敢于替自己辩护的唯一的人，如果放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替自己政策辩护的唯一的理由，就能够根本扭转局面。再没有比在科布顿先生那里找出一系列矛盾更容易的事情了。帕麦斯顿指出：科布顿先生开始时表示完全同意上面发言者的意见，而结束时却每一点都同他们的意见背道而驰；他主张维护土耳其的完整，后来却竭力证明，土耳其不应受到任何保护；他，和平的圣徒，替俄国的侵略行动辩护起来了；他肯定说，俄国是弱国，但他认为同俄国打仗必然使英国破产。的确，俄国只不过是个大乡村，但圣彼得堡既然是一个比君士坦丁堡美的城市，因此俄国就应当有权利统治这两个城市。科布顿先生虽然是一个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但他却不喜欢土耳其的自由贸易而喜欢俄国的保护关税制度。不管土耳其自身是否消费运到它那里去的商品，或者它只是一条把这些商品运往亚洲其他地方的过道，——难道这些商品能否自由过境对英国是无所谓的吗？科布顿先生是不干涉原则的热烈拥护者，现在却想用议会的决定来确定穆斯林、希腊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居住在土耳其帝国内的民族的命运。说到这里，帕麦斯顿勋爵大谈起土耳其取得的进步和它现在拥有的实力。“的确，土耳其没有波兰和切尔克西亚”。但是土耳其相当强大，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当然可以迫使土耳其同意俄国占领若干省份。强

大的帝国能够经受得住一切。帕麦斯顿勋爵向理查·科布顿证明了，根本没有一个合理的根据能适用于帕麦斯顿勋爵及其同僚所奉行的政策。这位老喜剧演员的每一句话都被狂喜的掌声所打断，当他最后要回到自己的席位坐下的时候，却说了这么几句厚颜无耻的同全篇讲话相矛盾的话：

“土耳其本身存在着生命的和繁荣的因素，使我感到满意，因此我认为，女王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健全的政策，应当受到全国信任；遵循这一政策，在今后也应当是每一届英国政府的职责。”（掌声）

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帕麦斯顿在“虚声夺人”<sup>①</sup>方面是伟大的。用悉尼的话来说，他表现了“一种怯弱的勇气，只敢做明明知道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的事情”。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19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9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6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① 莎士比亚“裘力斯·该撒”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 卡·马克思 大陆和英国的情况<sup>255</sup>

1853年8月23日星期二于伦敦

德国和比利时的报纸根据本月13日君士坦丁堡电讯，断言土耳其政府已同意维也纳会议的建议。法国报纸也收到了当天发自君士坦丁堡的电报，可是它们只报道说，御前会议表现出接受这些建议的倾向。维也纳收到最后答复大概不会早于8月20日。所以，土耳其政府在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以前或以后派专使到圣彼得堡去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据黑海地区的最近报道，已经刮起的东北风开始破坏正常的航行。停泊在平德列克利和沿海地区其他地点的有些船只，为了不被刮到岸上搁浅，都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停泊地。

诸君都已知道，由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发生的事件，苏丹<sup>①</sup>已命令这两位国君<sup>②</sup>离开公国，前往君士坦丁堡，但是两位国君拒绝执行他们的宗主国君主的要求。此后，苏丹便以瓦拉几亚国君接待并支援了俄国军队为口实把他革职了。革职敕令于8月9日在贵族会议上宣读，会议决定要求瓦拉几亚国君在现在这个紧急关头不要放弃政权。公爵就这样做了。外交大臣曼努和内务

① 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② 吉卡（莫尔达维亚）和施梯尔贝（瓦拉几亚）。——编者注

部司长伊万迪斯也被召赴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也托词说他们离开可能引起混乱而拒绝执行命令。因此法国和不列颠的领事都立即断绝了与叛乱政府的一切联系。

塞尔维亚的事态转趋复杂化。巴黎“立宪主义者报”在上星期五登载了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消息说，奥地利利用苏丹的困难处境向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不久前视察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奥地利总领事向塞尔维亚公爵亚历山大声称，奥地利准备出兵占领塞尔维亚，镇压居民中的一切危险活动。公爵拒绝了总领事的建议，并且立即派出专门信使把关于奥地利这一建议的消息通知了君士坦丁堡。列施德—帕沙请求德·布鲁克男爵解释这件事情。后者回答说，总领事曾经与公爵预先商议过关于奥地利附近发生的令人不安的情况，居住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边境上的奥地利臣民有可能被诱参加将在这个省爆发的暴乱。列施德—帕沙回答说，奥地利军队对塞尔维亚的任何占领都将被土耳其政府认为是一种敌对行动，因为土耳其政府自己负责保卫这个省的安宁；此外，列施德—帕沙答应马上派专人赴塞尔维亚考察当地现状并提出报告。

一天以后，在几家伦敦报纸上发表了奥国军队进入塞尔维亚的消息。可是这些消息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昨天，也是这些报纸报道，塞尔维亚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可是这些消息也并不更可靠，因为它们根据的是德文 *Auflauf*（集会、暴乱、骚动）一词的错误译法；实际上只不过发生了小规模骚动。德国报纸今天发表了8月9日君士坦丁堡的报道，据称，御前会议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塞尔维亚局势。亚历山大公爵采取的行动获得了完全的赞同并且通过了下述决定：如果奥地利军队企图占领塞尔维亚，那末

在必要时将用武力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一个师已被派往波斯尼亚边境。从8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收到的私人来信中已经获悉，亚历山大公爵由于与奥地利领事发生冲突，已要求法国和英国领事表示意见，并暂时离开了贝尔格莱德。据说他是前往尼萨等待土耳其政府的命令的。

乌尔卡尔特先生在他今天发表于“晨报”上的文章中谈到塞尔维亚的复杂情况时写道：

“俄国目前不想同土耳其作战，因为它如果与奥地利一致行动，便会失去自己的正教盟友；可是它却正在把奥地利拖入一场正在爆发的冲突中去，冲突的结果将使塞尔维亚陷入与多瑙河各公国相似的境地。这将是天主教徒与正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的序幕……俄国可以利用背景的突然变化使它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占领为土耳其所接受，让土耳其把这看做是保卫土耳其人、使塞尔维亚免遭奥地利占领的措施，这样一来，它就可以把奥地利或土耳其都拖进瓜分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计划，并且在这方面支持它们。”

为了支付各公国被占后的特别费用，莫尔达维亚国君正打算向俄国的银行家借债。

保加利亚各要塞粮食奇缺，因此正在厉行节约，各卫戍部队的生活也极困苦。

“君士坦丁堡报”<sup>256</sup>援引了来自阿勒颇的下面一段报道：

“不久以前破获了一个由图谋不轨的土耳其人组成的匪帮，这个匪帮准备像1850年那样，袭击城市的基督教居民。可是，由于省长帕沙和阿勒颇驻军司令阿利·阿斯米—帕沙并未放松警惕，这一企图被镇压下去了，社会秩序也维持住了。因此希腊派总主教德美特里和阿尔明尼亚派总主教瓦西里代表自己的教区联名写信给列施德—帕沙，感谢苏丹政府对基督徒的保护。”

德文的“圣彼得堡报”<sup>257</sup>在关于东方问题的社论中写道：

“如果说，和平之友在7月初只能抱着一种希望的话，那末近来他们已产生了信心。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调停现在已完全转入奥地利手中。维也纳将要拟定解决东方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最近引起了从黑海至大西洋整个地区的不安，它也是妨碍欧洲外交家们欢度例假的唯一原因。”

应当注意，这里极力强调调停者不是四大强国而只是奥地利一国，并且用真正的俄国风格把各国人民的不安同外交官们停止休假相提并论。

柏林“国民报”发表了一封7月15日的格鲁吉亚来信，信中说俄国打算在月底对高加索人发动一次新战役，阿速夫海上的舰队已进入备战状态，以便支援陆军的行动。

1853年的议会会议已于上星期六结束（议会休会到10月27日）。委员会宣读了一篇极其平庸而且内容贫乏的演说词，这就是女王的诏书。在回答米耳恩斯先生时，帕麦斯顿勋爵向议会担保说，议会对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的问题不用耽心，但是除了说“他信任俄皇的诚实和个人品质”，据说个人品质会使俄国皇帝自愿地把军队撤离各公国以外，在这方面他没有做任何别的保证。这样一来，由于帕麦斯顿发表演说反对科布顿先生<sup>①</sup>，联合内阁便自作自受，不得不迫使帕麦斯顿郑重声明他“信任”沙皇的“诚实和个人品质”了。同一个帕麦斯顿在同一天接见了流亡巴黎的波兰贵族团体及其伦敦分支的代表团<sup>258</sup>，代表团向勋爵阁下赠送了贺信和有亚当·查尔托雷斯基肖像的金质、银质、铜质纪念章，大概是为了表示感激1846年勋爵同意把克拉科夫没收<sup>259</sup>以及他在其他场合对波兰的事业所表示的同情吧。这个巴黎团体的伦敦分

<sup>①</sup> 见本卷第311—312页。——编者注

支的保护人、无所不在的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当然是扮演着典礼官的角色。帕麦斯顿勋爵告诉晋见他的傻子们说，“他对波兰的历史极表关切，这真正是充满苦难的历史”。同时，勋爵阁下也没有忘记特意指出他不是以一个阁员的身分说话，而只是以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私人的身分接见他们的。

现在的这次被拖得很长的议会会议的前半期，是被得比内阁的最后挣扎、联合内阁的成立和取得最后胜利以及议会的复活节假期占满了的。至于谈到会议的实际内容，那它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所有旧政党的腐化、议员们的行贿以及所有享有选举特权的人们的完全麻木。这一切都暴露在政府的非常有趣的活动中，这个政府收容了各种各样的派别，收容了官场的所有贤人；它把拖延宣布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它企图用各种治标办法来回避困难；它许下种种诺言；它宣称，“所谓执行，就等于某种遗嘱或遗言，表明留遗言的人曾经十分经率”；它在提出了自己的法律草案后又马上把它收回、更改、推翻，它靠着曾经被它严加斥责过的前任的遗产过日子；它把实行自己的各种措施的主动权交给应受它领导的议院；不多的几个无疑是由它拟定的法案也遭到了必然的失败。例如，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和法权方面的改革（不算个别的细节）都拖延下去了。流放苦役移民区法案、航运法案等等，是从得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而加拿大预备基金法案提出几天以后便被政府自己改得面目全非。至于预算，那末，关于遗产税的法律在财政大臣提出以前，他本人就曾经投票反对过这种税。广告税法案也只是在议院两次推翻了财政大臣的提案以后才被财政大臣设法通过的。许可证制度的新条例经过各种各样的修改以后最后被束之高阁。格莱斯顿先生雄心勃勃地作为一个庞大计划提

出来的、与整个预算的气魄相适应的这个条例，被议院通过时已成为一块可怜的补丁，成了各种不相干的、毫无联系的、彼此矛盾的琐碎条款的简单混合物了。印度法案唯一重要的特征——不更换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只是在内阁预先宣布特许状延期20年以后才由内阁提出来的。两项的确完全是由“群贤内阁”一手拟就的法律，即关于马车夫的法律和关于国债条款变更的法律，还没有来得及出议院的门坎就被公众嗤之以鼻了，这证明两项法律已经破产。“英国历史上最有力的政府”的对外政策，连这种政策的拥护者都承认是 *nec plus ultra*（极端）没有办法、不稳定和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国外的事件具有了威胁性、国内暴露出更加可怕的人民不满征象的形势下（这种不满的表现就是空前剧烈和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以及宪章派鼓动的复活），皮尔派官僚、辉格党政治寡头以及假激进主义者在切舍姆街缔结的同盟<sup>260</sup>更加巩固了。在估计统治阶级和内阁的对外政策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一点，即同俄国的战争会酿成大陆上普遍的革命大火，现时这大火很容易会在大不列颠的人民群众中得到避免不了的响应。

至于上院，它的活动可以很简单地加以总结。它否决了解放犹太人法案，暴露了它的伪善；它埋葬了工人结社法案，暴露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把爱尔兰土地法案打入了冷宫，暴露了它对爱尔兰人民的利己仇恨心；最后，它恢复了盐业垄断，暴露了它袒护印度的贪赃枉法风气的顽固立场。上院始终同政府暗中勾结，它们商量好如果有过什么进步措施要在下院通过，那末就由开明的上院议员们把它否决掉。

在议会休会前提交议会的文件中，有一批英俄政府之间关于多瑙河苏利纳支流航行遭到破坏问题的连篇累牍的来往函件。这

批函件是从 1849 年 2 月 9 日开始的，到 1853 年 7 月止，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结果。事情曾发展到这种地步，甚至奥地利政府也被迫宣布，多瑙河口已不能通航，它寄往君士坦丁堡的邮件今后将取道的里雅斯特。所有这一切困难，都是英国人对俄国人的侵略采取纵容姑息态度的结果。1836 年英国政府默认了俄国无理强占多瑙河口的行为，虽然在承认以前它还指示一个商行抵抗俄国政府官员的干涉。

同缅甸签订的所谓和约（这个和约 1853 年 6 月 30 日由印度总督的文告宣布，女王还就这个和约向议会祝贺），实际上只是一种休战。阿瓦国王<sup>①</sup>为饥饿所迫只好屈服，表示愿意停止军事行动，他释放了英国俘虏，请求解除河道封锁，并且禁止他的军队进攻英国政府卫戍部队占领的密卡岱和东吁这两个地区，正像土耳其政府禁止它的军队进攻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国军队一样。可是阿瓦国王拒绝承认英国想得到勃固或缅甸帝国的任何别的地区的无理要求。英国在与缅甸作战中所获得的唯一的東西，就是建立了一条危机四伏并且存在着争论的边界，而不是可靠的和得到承认的边界。英国极力冲破自己的印度领地的人种边界、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现在，天朝帝国也已经不是英国侵略力量的天然障碍了。英国在亚洲失去了重心，它要进行无止境的侵略。它再也无法控制自身的运动，只有到陆地尽头面临大海的地方它才会止步。因此，英国大概要打开东方最远的国家使它们同西方交往，但它是不能占有这些国家，把它们保持在掌握之中的。

南威尔士煤矿工人大罢工不仅尚在继续进行，而且引起了

---

① 门登。——编者注

铁矿工人们的新罢工。预料在商务航运法案生效之际不列颠的海员也将实行总罢工，因为这一法案允许招收外国水手，正如海员们所说，这纯粹是为了降低他们的工资。我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读者诸君注意正在发生的罢工的意义，现在，连伦敦的资产阶级刊物也开始了解这种意义了。例如，“泰晤士周报”<sup>261</sup>上星期六曾指出：

“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尖锐起来了。劳动正在全国各地大胆地反对资本，并且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由此引起的斗争还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工人阶级已坚决要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目前运动暂时还只限于一系列分散的小战斗，可是，从某些迹象来看，这些分散的战斗行动转变成有步骤地、普遍地、联合一致地进攻资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8 月 23 日

载于 1853 年 9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64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 卡·马克思 米哈伊尔·巴枯宁

致“晨报”编辑

阁下！

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想把我在 1848 和 1849 年编辑的“新莱茵报”卷入他们和“弗·马·”<sup>①</sup>之间关于巴枯宁的论战<sup>262</sup>。他们向英国公众宣称，对巴枯宁的诬蔑发端于我们的报纸，说什么这家报纸甚至敢于声言有乔治·桑作证。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的诋毁丝毫没有触动我。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助于解决有关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争论，所以，请允许我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

1848 年 7 月 5 日，“新莱茵报”收到了两封巴黎的来信：一封是哈瓦斯通讯社的通讯原稿，另一封是与这个通讯社完全没有联系的一位波兰流亡者的私人通讯。在这两篇报道中都肯定地说，乔治·桑掌握有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地的信件，这些信件揭发巴枯宁在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

7 月 6 日，“新莱茵报”发表了驻巴黎通讯员<sup>②</sup>的信。

巴枯宁本人则在“新奥得报”<sup>263</sup>（布勒斯劳出版的报纸）上声明，早在“新莱茵报”发表这篇巴黎通讯之前，类似的谣传就在布勒

① 弗兰西斯·马尔克斯。——编者注

② 艾韦贝克。——编者注

斯劳秘密地散布；这些谣传来自俄国大使馆，他将写信给乔治·桑，这是他对这些谣传的最好回答。巴枯宁给乔治·桑的信与他的声明同时发表了。声明和信都马上在“新莱茵报”上转载了（见1848年7月16日“新莱茵报”）。1848年8月8日，“新莱茵报”接到巴枯宁通过科斯策尔斯基先生转来的乔治·桑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并加有下面的按语：

“本报第36号曾报道巴黎谣传乔治·桑掌握有一些信件，信件把俄国流亡者巴枯宁说成皇帝尼古拉的间谍。我们所以报道了这件事，是因为两位完全没有联系的通讯员同时向我们送来了这个消息。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公众报刊的义务，一个公众报刊对社会活动家应该是表现出高度警觉的。在这同时，我们也给了巴枯宁先生机会，让他来消除某些巴黎人士对他提出的怀疑。我们甚至没有等到巴枯宁先生提出要求，就从‘新奥得报’转载了他的声明和他给乔治·桑的信。现在我们发表乔治·桑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信的直接译文，这封信彻底澄清了这一偶发事件。”（见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

1848年8月末我路过柏林时，会见了巴枯宁，恢复了我们二月革命以前建立起来的亲密友谊。

1848年10月13日，“新莱茵报”谴责了普鲁士内阁驱逐巴枯宁出境，谴责了它所发出的如果巴枯宁敢于回到普鲁士就把他交给俄国的威胁。

1849年2月15日，“新莱茵报”就巴枯宁的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发表了社论，开头两句话就是：“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小册子”<sup>264</sup>。

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题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中，我也尽我所知，在德国著作家中第一个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特别是参加德勒斯顿起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sup>265</sup>，

同时也指责了德国报刊和德国人，指责他们极度怯懦，竟然对于把巴枯宁交给他们共同敌人一事表示容忍。

至于说到“弗·马·”，既然他顽固地认为大陆的革命有利于俄国的秘密阴谋，那末，如果他想立论严整的话，他就不仅应该谴责巴枯宁，而且也应该把任何大陆革命者一概都当作俄国间谍加以谴责。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就是给俄国作间谍，巴枯宁又怎能不是呢？

**卡尔·马克思**

1853年8月30日于伦敦

载于1853年9月2日“晨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晨报”

卡·马克思  
粮价上涨。——霍乱。——  
罢工。——海员中的运动<sup>266</sup>

1853年8月30日星期二于伦敦

据“布勒斯劳报”<sup>267</sup>报道，瓦拉几亚的粮食出口已被完全禁止。

现在，一个在一定意义上比东方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即粮食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在科尼斯堡、施特庭、但泽、罗斯托克、科伦、汉堡、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粮价都已上涨；不言而喻，在所有较大的市场上情况都是这样。在英国内地的主要市场上，小麦价格由每夸特4先令涨到6先令。比利时和法国小麦和黑麦价格不断上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面包价格腾贵，已引起严重不安。法国政府正在英国、敖德萨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购粮食。关于英国收获量的最后材料最早要到下星期才能得到。在英国各地，马铃薯所遭的病害比爱尔兰更加普遍。意大利各地政府，其中包括伦巴第当局，都禁止粮食出口。

上星期在伦敦发现了肯定是亚洲霍乱的病例。我们还听说，霍乱已蔓延到柏林。

劳动与资本之间，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战斗尚在继续。在伦敦的运煤工人、理发师、裁缝、女鞋鞋工、雨伞工、衬衣女工以及

所有衬衣工人中间，另外，在服装商店和出口批发公司的工人中间，都又发生罢工。昨天，许多砖瓦工人以及用驳船把停在太晤士河的大船的货物搬运到码头上的工人也宣布罢工。南威尔士煤矿工人和冶金工人的罢工尚在继续。除上述一系列的罢工之外，还有雷佐温煤矿工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新罢工。

我每个星期都得到各种罢工的消息，如果我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那会令人感到厌烦。因此我今后只是不时地报道其中一些具有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的罢工。从这方面来看，值得提出的是警察和他们的长官理查·梅恩爵士之间持续已久的冲突，虽然这还不是罢工。理查·梅恩爵士在给首都各警察分局的指令中禁止警察举行大会和结社，同时宣布他准备亲自审理每一项个人的申诉。警察回答他说，他们认为集会的权利是英国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梅恩爵士要他们注意他们的薪水是在食品比现在贵得多的时候确定的。他们回答说，“他们提出要求的根据不仅是食品价格，而且是他们确信现在的活人已不像先前那样不值钱了”。

在这所有各次罢工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海员联谊会”印发并被他们称为英国海员权利法案的宣言。宣言牵涉到商务航运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废除了航运法中的一条关于不列颠船主必须使本船海员至少有四分之三是不列颠臣民的规定。新法案使外国海员甚至在那些不允许外国船只通行的地方都能参加近海航运。宣言的作者们宣布，这不是海员权利法案，而是船主权利法案。在通过这一法案时除了船主以外同任何人都没有商量过。关于招收船员的那一条规定曾经对船主起了约束作用，使船主不得不对船员好些，不得不关心他们的给养。新法律把船员交给任何一个坏

船长全权支配。这个法律所根据的一个原则是：“17000个船主全是品德高尚、宽宏大量、慈善为怀的人，而海员全是蛮不讲理、行为乖戾、天生凶恶的人。”海员们又说，船主可以把他的船开往任何他们愿意去的地方，而海员的劳动却只能在本国范围内使用，因为政府废除了航运法，但是政府并没有事先设法也使他们取得受雇于外国船只的权利。

“由于议会使海员作了船主的牺牲品，我们作为一个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并采取自卫的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是海员们打算捍卫**招收船员的条款**中与他们有关的那一部分。同时他们又宣布：

“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员应当被看做不列颠人，我们将吁请他们支持我们的联盟。鉴于在10月1日上述法律生效后以英国臣民的身分航行不再有任何优待，而以外国人的身分于平时期在不列颠船上服务反而可以保证在战争时期不应征到女王陛下的海军中服役，并且没有这种义务，又鉴于在平时期享有美国的自由有更多的保障，海员们将在到达这个共和国的任何港口以后设法取得合众国的公民证书。”<sup>268</sup>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8月30日

载于1853年9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73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卡·马克思 致“人民报”编辑<sup>269</sup>

阁下！

本月3日“晨报”发表了附在本信之后的“应该怎样写历史（一个外国通讯员作）”一文，同时却拒绝刊登我对这位“外国通讯员”的答复。阁下如能把这两篇文章——俄国人的文章和我对它的答复一并刊登在“人民报”上，我将不胜感激。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9月7日于伦敦

### “应该怎样写历史（一个外国通讯员作）”

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巴枯宁不是俄国间谍。巴枯宁在什吕谢尔堡要塞备受虐待，已经死在那里了，——巴枯宁没有死，他还活着。巴枯宁已被充军，流放到高加索去了，——不，他没有被充军，他仍然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这就是轮流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相互矛盾的消息。

在一切那可以被广泛宣扬的今日，我们只有确定了假的东西才能得到真的东西。然而巴枯宁没有领俄国军事部门的津贴是否被最后证实了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人道使人们处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中；他们不知道，我们使德国摆脱俄国现时对它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反过去影响俄国，把俄国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直到它容易被革命攻破为止。对于这些人，

要使他们相信巴枯宁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洁而慷慨的代表之一，那是白费气力的。

法国有句谚语：‘诽谤，诽谤，总会留点影响。’巴枯宁的一位朋友在1848年所支持的对他的诽谤，在1853年又被一位姓氏不明的人散布着。

还有一句谚语：‘只有自己人才出卖自己人，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不是那些保守派报纸散布对巴枯宁的诽谤，而是一家朋友的报纸表示了这种关切。

谁能够哪怕是在一刹那间忘记——就像马克思先生那样忘记——巴枯宁并不是生就的一副警察局密探的骨头，这样的人的革命感情显然是非常淡薄的。为什么他不至少是像英国报纸通常所做的那样，不发表一位波兰流亡者告发巴枯宁的信呢？他的名字已与诬告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一点，他不必有什么遗憾了。”

## 关于在星期六“晨报”上发表文章的一个外国通讯员

“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完全正确。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知道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因而把这当作一种发现而表示大惊小怪。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认为在1853年有必要对1848年巴枯宁本人已表示满意的解释吹毛求疵；正是“愚蠢的朋友”，才“重新把俄国推向”它从未摆脱过的“专制制度的怀抱”，另外还把一个日常惯用的拉丁谚语叫做法国谚语。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要别人相信，似乎一家报纸刊登了它的外国通讯员写的一篇报道而编辑未作任何评价，就是“支持”他

的报道。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把“保守派报纸”抬作“革命感情”的典范，这种感情曾经在最紧张的关头发明了 *lois des suspects* (嫌疑犯处治法)，甚至怀疑丹东、卡米尔·德穆兰、阿那卡雪斯·克罗茨这样的人生就一副卖国贼的“骨头”；正是“愚蠢的朋友”，才敢用巴枯宁的名义去攻击第三者，而不敢用自己本人的名义为巴枯宁辩护。

最后请让我对陈腐谚语的爱好者声明，我同他以及巴枯宁的诸如此类的朋友的争论就到此为止。

卡尔·马克思

1853年9月4日于伦敦

载于1853年9月10日  
“人民报”第7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 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  
——苏姆拉来信。——  
皮尔的银行法令

1853年9月9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在8月30日的文章中曾向诸君报道<sup>270</sup>，土耳其政府实质上已拒绝了维也纳照会，因为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和立即先行撤退的要求<sup>271</sup>无异是拒绝满足俄国的贪欲。当时我的这个看法与所有的报刊都有分歧，它们都断言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问题不大，根本不值一提，并且说总的说来可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没有过上几天，“纪事晨报”就使轻信的交易所经纪人大吃一惊，它报道，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十分严重，要使问题解决还很简单。现在只有一种意见了，即认为整个东方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虽然昨天各报都全文发表了列施德—帕沙1853年8月19日致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和普鲁士代表的正式照会，这种印象也丝毫没有减弱。

俄皇一定会拒绝土耳其的“修正意见”，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俄皇在巴黎的《Moniteur》<sup>①</sup>“国民议会报”就已经向我们报道：

---

① 官方机关报。——编者注

“据今天巴黎收到的消息称，彼得堡当局的第一个印象是完全不利于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的。不管彼得堡当局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应该准备以冷静态度对待之，并且不要表现出不安。我们应当注意到，即使俄国当局不同意接受土耳其政府对维也纳照会提出的修正意见，那也还有一条在君士坦丁堡重开谈判的出路。”

这里暗示俄国将企图再一次拖延解决争端，柏林报纸“石印通讯”也证实了这一点：

“奥地利政府向尼古拉皇帝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对修正意见一事有新的建议，它现在正采取步骤，试图用完全不同于前此一切尝试的办法来消除危机。”

维也纳报纸“漫游者”<sup>272</sup>刊登了一封8月26日敖德萨的来信，信中说，“东方问题的解决还不像某些人所料想的那样快”。喀琅施塔得的“卫星报”则断然肯定，俄国军队在多瑙河各公国将驻扎到冬季营地中去。

贵报编辑部关于英格拉哈姆舰长的评论<sup>273</sup>，甚至比华盛顿发来的照会还要轰动欧洲。伦敦几乎每一家周报、法国的许多报纸、布鲁塞尔的“民族报”、都灵的“议会报”、“巴塞尔日报”和德国所有的自由主义报纸都加以转载，有的加了评论，有的未加评论。由于一系列的德国报纸同时也转载了贵报关于瑞(士)美(国)同盟的文章，所以诸位会看出，柏林“石印通讯”报上一篇文章中的下面一段话部分地也是针对贵报而发的：

“曾经有一个时候，报界借各种理由表示了自己对美国的干涉论的看法。最近，由于土麦那的科斯塔事件，争论又起。这一事件还没有了结，而外国报纸和地方报纸已经在研究瑞士一旦遭到侵略威胁合众国站在瑞士方面进行干涉的可能性了。今天我们得到消息说，某几个强国打算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抗议合众国提出的国际法理论；还说，这些国家的内阁会取得完全一致的意

见。美国的干涉论如果不最坚决地予以否定,在欧洲根绝革命精神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除这项报道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法国是准备签署这一抗议声明的强国之一。”

星期二的“立宪主义者报”不辞辛苦地使最后这段话变得明白白白:

“必须毫不含糊地把一切谈清楚。美利坚共和国的代表们不是把科斯塔当作合众国的公民,而是把他当作革命者来保护,不许奥地利逮捕的。但是没有欧洲强国会把合众国政府有权用武力保护欧洲革命的说法当作国际法的一个原则来接受。当某个国家的政府行使它的司法权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容许用罪犯已改变国籍这个可笑的借口(而真正的原因是这个罪犯是反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加以阻挠。美洲联邦的舰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如此轻易地取得胜利的;像‘圣路易号’轮船船长那样的横蛮行为,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造成极为可悲的后果。”

在我们今天收到的士麦那出版的“公道报”上,有几封很有意思的苏姆拉来信:

“总司令奥美尔—帕沙把军队配置得很好,一有必要他就能在24小时内把65000名步兵和骑兵及180门火炮集中到多瑙河的任何地点来。据我收到的瓦拉比亚来信说,伤塞正在使俄国军队大量减员,战局开始以来已损失不下13000人。死尸都尽量在夜间埋葬。马匹也大批倒毙。而我们的军队什么病都没有。在多瑙河的对岸,时时出现穿着莫尔达维亚制服的俄国兵,30人至60人一群。他们的一切行动我们的将军都知道。昨天来了1000名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徒。他们是一支13000人队伍的先头部队,这支队伍将在日内开到。他们全是优秀射手。昨天还来了3000名骑兵,全是久经战场的,武器和装备都好得很。我们军队的人数正在一天天增加。阿罕默特—帕沙昨天动身到瓦尔那去了,他将在那里等候埃及军队的到来,以便把他们派到预定的地点去。

1853年8月8日寄自苏姆拉

8月9日,苏丹近卫军的两个步兵团和一个轻炮兵连已开向腊兹格腊

特。8月10日我们得到消息说,5600名俄军已在多瑙河岸土特腊坎港附近扎营,这样一来双方军队的前哨彼此相距仅在步枪射程之内。英勇的团长伊斯甘德—贝伊已带军官数人去此处。奥美尔—帕沙已安排好电讯联系,多瑙河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无论在白天和黑夜随时都能报告给司令部。

最近几个星期不停地下雨。虽然如此,筑城工程仍大力进行。每天两次在黎明和黄昏鸣放礼炮。对岸完全没有这种声势。

埃及军队在君士坦丁堡经过防疫检查以后,就将乘船前往瓦尔那,从那里再开挂巴巴达格山。准将伊塞特—帕沙在那里等着他们。在多布鲁甲—奥瓦西地区已集结两万名鞑靼人,准备参加对俄战争。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俄国占领克里木时从克里木出走的流亡者。由于陆续开来新军(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奥斯曼军队的人数正一天天增加,他们倦于无仗可打,渴望战役开始。恐近日不待上级下令就会强渡多瑙河,现在这种可能性特别大,因为俄军不时在对岸出现使我军更为激怒。几天前有一批医生,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前往普勒夫那、腊兹格腊特、维丁和锡利斯特里亚等地去建立欧式军医院。11日从瓦尔那来了两位英国高级军官。他们与奥美尔—帕沙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在几个土耳其军官的陪同下,他们参观了工事,并且认为构筑得很好,有足够数量的火药库、面包房和清水库等等。所有防御工事修筑得极为牢固。我军纪律执行得十分严格。

1853年8月12日星期五寄自苏姆拉

英国将军奥富奈尔于13日从君士坦丁堡来此。他与奥美尔—帕沙作了两小时的谈话,第二天在总司令副官陪同下参观了工事。昨天从瓦尔那开到三个炮兵连,另外还有大量军需品。明天有一个炮兵连、两营步兵和1000名骑兵去增援拉索瓦港。在拉索瓦,工兵部队正大力修复1828年被俄军破坏的工事。土耳其可以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了。

1853年8月15日星期一寄自苏姆拉”

上星期四,菲茨威廉伯爵曾写信给设菲尔德的钳工大会,他在这封信中表示反对勇敢的帕麦斯顿在议会会议闭幕时所提出的“应该依靠俄皇的诚实和个人品德”的荒诞主张。

迪斯累里先生决定在9月14日会见他的艾尔斯贝里选民。昨

天的“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长而无味的文章，这篇文章企图驳斥该报预测中的迪斯累里先生要向他的选民所说的话。我以为，“每日新闻”如果能让它的老前辈伦敦“笨拙”杂志<sup>274</sup>去完成这桩大事业，恐怕合适得多。

现在，英格兰银行第四次（从1月份算起）提高了贴现率。9月4日规定贴现率为4%。伦敦的“太阳报”<sup>275</sup>对此大嚷：

“这是又一次**缩减国家流通资金**的尝试，又一个阻碍人民福利发展的设施。”

另一方面，这家报纸又用这样一种设想来安慰自己，即认为英格兰银行在皮尔立下了1844年法令之后已丧失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有害的实力。

“太阳报”害怕也怕错了，希望也寄托错了。英格兰银行像其他任何银行一样，没有多大的能力表增加或减少国家的货币流通量。1844年的皮尔法令不仅没有削弱这个银行所拥有的实际的有害的实力，而且相反地加强了它的这种实力。

由于一般人对1844年的银行法令理解得不正确，同时这个法令的影响在危机日益逼近的情况下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整个商业世界都将十分严重，所以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个法令的实质。

1844年皮尔银行法令的出发点是这样几种假定：金属的货币流通是唯一正常的货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能调节价格；在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如果外汇行市有利，金块内流，货币量就要扩大，如果外汇行市不利，金块外流，货币量就要减少；银行券的流通应当与金属货币的流通完全一样；因此，英格兰银行地下室里的黄金数量的变动和在居民中流通的它的银行券数量的变动一定要相符合；在外汇行市有利时，银行券的发行量应该增加，外汇行

市不利时则减少；最后，英格兰银行对流通中的它的银行券数量实行监督。

所有这些前提，没有一个不是完全错误和违背事实的。即使假定存在着纯粹金属货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也不能决定价格，正像它不能决定纯粹商业交易和工业交易的数量一样；相反地，价格将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外汇行市不利和黄金流失也不会造成甚至纯粹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影响的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储备的，即作为银行存款或者以私人储藏的形式存在的货币量。另一方面，外汇行市有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黄金内流所增加的也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银行里储存的和私人储藏的货币量。因此，以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错误观念为出发点的皮尔法令，很自然地就导致在纸币流通中也不正确地套用这种法令。要发行银行对它所发行的银行券数量实行监督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银行发行可兑成黄金的银行券，或者，一般凭商业担保预付的银行券，但是它无法使自然流通额增加或减少哪怕是一张银行券。当然，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只要它的顾主接受，但是，如果流通不需要，这些银行券也只能或者以存入银行的方式，或者以偿付债务及兑成金属货币等方式回到银行里来。另一方面，如果银行要强制减少发行数量，那末就将有了为了填补流通中形成的真空所必需的数量存款被提回去。所以，不论银行有怎样的可能去滥用别人的资本，它对流通中的货币量都没有任何支配权力。例如在苏格兰，虽然银行业的发展在 1845 年以前实际上并没有受到限制，而且从 1825 年起银行增设了很多，但那里的货币流通量却减少了，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有 1 英镑（纸币），而英格兰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是 2 英

镑，同时英格兰 5 英镑以下的货币单位基本上还是用金属货币流通，而苏格兰则用纸币。

认为流通中的货币量应该与黄金储备相符合，这种想法是十分虚妄的。如果银行地下室里的黄金储备增加，不言而喻，这个银行就将竭尽全力扩大它的银行券的流通，但是，经验教导我们，这是没有用处的。英格兰银行在 1841 年至 1843 年这一时期内的黄金储备从 3965000 英镑增加到 11054000 英镑，可是它的流通券总额却从 3566 万英镑减少到 34094000 英镑。法兰西银行截至 1845 年 3 月 25 日发行的银行券在流通中的共有 25600 万法郎，黄金储备是 23400 万法郎，而到了 1846 年 3 月 25 日，它的银行券在流通中的共有 249404000 法郎，但黄金储备只相当于 9535000 法郎。

认为在黄金外流时国内货币流通量就要减少的假定也同样是错误的。例如现在黄金继续外流，但造币厂又到了 300 万美元，加入国家的货币流通。

但是，最主要的错误是这样一种假定，即认为如果需要贷款即需要借贷资本，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货币的流通资金，而不知道用期票、支票、信用证券、清算和其他一些同货币流通完全无关的信用形式可以做成多得多的商业交易。衡量银行偿付能力的最好尺度是市场贴现率，而确定实际由银行进行的业务量的最准确的指标是贴现期票的周转额。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双重衡量方法。在 1845 年 3 月至 9 月的时期中，虚拟资本随着投机热曾经增长到最高峰，各种各样的大宗成交的业务简直淹没了全国，那时，贴现率约为 2.5%，而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但是稍后在 1847 年时期中，当贴现率达到了 4.5%，股票价格极度下跌，到处

都拒绝贷款的时候，银行券的流通量却达到了最大的数字。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流通量截至 1847 年 4 月 17 日共计 21152853 英镑，1847 年 5 月 15 日是 19998227 英镑，1847 年 8 月 21 日是 18943079 英镑。但是，在流通量这样减少的同时，市场贴现率却从 7% 和 8% 下降到 5%。从 1847 年 8 月 21 日起至 10 月 23 日止，银行券的流通量从 18943079 英镑增加到 211265188 英镑，而在同一时期市场贴现率从 5% 提高到 8%。10 月 30 日，银行券的流通量共计 21764085 英镑，而在伦巴特街支付的利息却上升到 10%。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例子。

#### 英 格 兰 银 行

	贴现期票	流通中的银行券
1846 年 9 月 18 日	…… 12 323 816 英镑	20 922 232 英镑
1847 年 4 月 5 日	…… 18 627 116 英镑	20 815 234 英镑

可见，1847 年 4 月的银行贷款比 1846 年 9 月多 600 万英镑，但是这些借贷业务所用的流通中的银行券是极少的。

说明了皮尔的银行法令的基本原则以后，现在让我来谈谈它实际方面的细节。这个法令预定，货币流通量的最低必要数字是 1400 万英镑银行券。英格兰银行所发行的超过这个数字的全部银行券，都应该有相应的黄金储备作保证。罗伯特·皮尔爵士自以为他发现了一个自动起作用的发行银行券的原则，能够以机械的准确性确定流通中的货币量，使货币量的增减完全与黄金储备的增减成比例。为了实际推行这个原则，银行就分成两个部门——发行部和银行部。第一个部门纯粹是银行券制造厂，第二个部门才是真正的银行，它接受国家和公众的存款，付股息，贴现期票，发放贷款并根据共同的原则办理对其他任何银行机构的一切业

务。发行部把它所发行的、总数等于 1400 万英镑加银行地下室现有黄金储备总值的银行券移交给银行部。银行部便把这些银行券向公众散发。为抵销已发行的超过 1400 万英镑的银行券所必需的黄金储备留在发行部，多余部分则归银行部。如果黄金储备减少到不够抵销流通中的超过 1400 万英镑的银行券的程度，那末作为偿还贷款或作为存款回到银行部的银行券便不再发行和转换，而是予以注销。假如流通中的银行券有 2000 万英镑，而黄金储备只有 700 万英镑，那末，只要再外流 100 万英镑的黄金，全部现存的黄金储备就只够发行部用的，银行部就会连一个金币也没有。

从这里每个人都会明白，这一整套算计，一方面带有虚妄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带有极为有害的性质。

可以拿英格兰银行在上星期五的通报上发表的报告作一个例子。在报告的“发行部”一栏中，你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统计数字：流通中的银行券共计 30531650 英镑，或者是 1400 万英镑加 16962918 英镑——后一个数字是与上星期的黄金储备相符合的数字。但是再看“银行部”一栏的数字，你们便可以在这一栏的资产项下发现有 7755345 英镑的银行券。这是总数 30531650 英镑中没有被公众接受的部分。可见，自动起作用的原则所管的只限于发行部把 30531650 英镑的银行券移交给银行部这一件事。即使移交了，这些银行券也没有流动。而银行部只要一与公众接触，那时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便不是皮尔法令，而是实业生活的需求了。因此，自动起作用的原则的影响不能超出银行地下室的范围。

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由于它据有特殊的地位，所以不仅对英国贸易，而且往往对世界贸易也发生实际的影响。在普遍感到贷款不

足的时期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时期中，如果根据皮尔法令，随着黄金外流相应地提高最低的贴现率并拒绝贷款，银行就会使国家证券贬值，使一切商品的价格降低，并在极大程度上加重商业危机的破坏性。为了阻止黄金外流并改变汇率，银行就会使任何商业停滞变为对货币流通的威胁。英格兰银行在 1847 年就曾这样做过，而这是被皮尔法令逼迫着做的。

可是这还不算完结。在任何银行机构中，最沉重的负担并不牵涉到一定数量的流通中的银行券，而是牵涉到一定数量的作为存款的银行券和金属货币。例如荷兰的银行，据安德森先生在下院委员会上说，在 1845 年以前有存款 3000 万英镑，而在流通中的只有 300 万英镑。

亚·贝林先生说：“在历次商业危机时期，例如在 1825 年危机时期，最可怕的要求不是银行券持有者的要求，而是存款人的要求。”

现在，由于皮尔法令规定要把黄金储备储存起来作为保证银行券兑成黄金的后备，银行经理们便有充分的可能随心所欲地处置存款了。而且，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正是这个法令所立下的制度，才会使银行部停止发给存款和股息，同时某种数量的黄金却存放在发行部的地下室里。在 1847 年就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当时银行部危急万分，只是由于政府的参预，负责于 1847 年 10 月 25 日使皮尔法令暂停生效，银行部才免遭破产，而在这样的時候，发行部却拥有 6100 万英镑的黄金储备。

所以，实行皮尔法令的一个后果，就是英格兰银行在 1847 年危机期间改变了 13 次贴现率，而在 1825 年危机时期却只改变了两次；其次，就是这个法令在危机最深的时候引起了一系列的财政混乱（在 1847 年 4 月和 10 月）；最后就是：如果不是使法令本身停

---

止生效，银行部就得被迫停业。因此，皮尔法令将加深日益逼近的危机的恶变性和尖锐性，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9 月 9 日  
载于 1853 年 9 月 24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881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卡·马克思 政治动态。——欧洲缺粮

1853年9月13日星期二于伦敦

最近一号的“星期日时报”<sup>276</sup>公布了克拉伦登勋爵给汉·西摩尔爵士的一封电报，作为对涅谢尔罗迭伯爵7月2日的照会的答复。发电日期注明是7月16日。这封电报只不过是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的答复的《doublière》（“复制本”）。在上星期六“先驱”上有一篇通讯，作者以无所顾忌的方式对阿伯丁和帕麦斯顿两位勋爵之间的“对抗性”发表了以下的言论。

“阿伯丁勋爵从来都不能理解帕麦斯顿勋爵的假惺惺姿态；他看不到，多亏采取了这种假惺惺的姿态，帕麦斯顿勋爵才能够毫无痛苦地执行了亲俄政策，甚至比阿伯丁勋爵本人执行得更好……帕麦斯顿勋爵用倾向于和解的假面具掩盖着自己的厚颜无耻……阿伯丁勋爵则和帕麦斯顿勋爵相反，他公开地表示自己的信念……帕麦斯顿勋爵懂得大谈干涉而实际上不干涉的好处，而阿伯丁勋爵则不懂得这种好处……阿伯丁勋爵由于和统治阶级极为亲近，所以知道如何谋取席位，如何买到选票，因此他才不把英国宪制看做人类的种种法规中最完善的法规；阿伯丁勋爵认为，欧洲大陆的居民并不比大不列颠的居民更和善、更正派，所以他在大陆各国政府面前不坚持废除家长式专制制度以实行统治阶级的自治……阿伯丁勋爵知道，大不列颠的实力是以征服其他民族为基础的，所以他鄙视那种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正在战斗的民族的对政策。阿伯丁勋爵看不出，曾经占领和掠夺印度、而且现在正以印度本身的福利为名压迫着印度的英国，有什么理由应当痛恨沙皇尼古拉

——后者对俄国去说是一个善良的专制君主，而且正以波兰的福利为名压迫着波兰。阿伯丁勋爵不了解，曾经扼杀了爱尔兰多次起义的英国有什么理由应当极端痛恨奥地利镇压匈牙利；同时，由于他知道英国强迫爱尔兰接受异教，所以他很能理解教皇想把红衣主教魏兹曼安置在韦斯明斯特的热烈愿望。他知道我们同卡弗尔人打过仗，所以他不把那位不断和高加索人打仗而断送自己军队的尼古拉看做一个恶棍；他知道我们经常把造反的密契尔和奥勃莱恩这一类人发配到凡迪门岛去，所以他对于路易—拿破仑在凯恩建立了苦役区并不感到震惊。当他迫于必要给那不勒斯政府写信谈到西西里岛事务的时候，他也不会陷入起狂的自由主义，因为他没有忘记大不列颠在科尔富岛上也有总督……在这个联合政府中，这一切都安排得极为妥贴，既有采取亲俄行动的阿伯丁勋爵，又有以百蒙得锡政策的精神来讲话的帕麦斯顿勋爵。”

为了证明我并没有过分低估瑞士的勇敢精神<sup>①</sup>，我可以引证瑞士联邦委员会给德森州当局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写道：

“卡普勒教士的问题<sup>277</sup>纯粹是州的问题，因而德森州应当自己决定怎样做对自己最好：是进行反抗并继续受奥地利的严厉措施的打击，还是向政府提出重开谈判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瑞士联邦委员会企图把它和奥地利的争端归结到单纯一州的范围中去。联邦委员会最近还颁布了一项把意大利人克莱门蒂、卡索拉和格里伦佐尼驱逐出境的命令，虽然库尔的陪审官们已经承认了他们无罪，承认他们并没有穿越德森州的边境运送武器去帮助米兰起义<sup>278</sup>。

英国人给予札格纳特庙的援助，看来还没有完全停止。董事会在1852年5月5日曾经给印度总督发出下面一封电报：

“我们仍然认为，应当使英国政府完全摆脱与神庙的任何关系，所以，我

<sup>①</sup> 见本卷第124—125页。——编者注

们全权委托您采取相应的措施,用不容许给神庙以任何定期的金钱援助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另一方面,应当结算补偿费,凡是根据过去的约定或协定在加以相当广泛的解释的情况下有此权利的人,都应得到补偿费。”

但是,直到 1853 年 4 月 11 日,印度当局在这方面还什么都没有做,问题到目前仍然悬而未决。

政府已经花了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来调查北明翰监狱中的犯人遭到残酷虐待的事情——这种虐待已经达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自杀而另一些人也企图自尽的程度。被发现的暴行不亚于在奥地利或那不勒斯的任何一个 *carcere duro* (刑讯室) 里所干出来的事情,确实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另一方面,视察监狱的官员们对当事方面的口供百说百信态度和对受害者极其冷淡的态度也不能不使人大为惊异。他们对野蛮的狱吏的关怀已经达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在视察之前总是先通知狱吏。暴行的主犯奥斯丁中尉,就是卡莱尔在他所写的“模范监狱”<sup>279</sup>一书中叫做流浪汉和罪犯的真正指挥官的那号人。

关于**铁路公司的道德**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约克郡—郎卡郡铁路管理局在它们的火车票上特别印着这样一个告白:

“本管理局对于它未能预防或因职员疏忽而发生的一切不幸事件或损失概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同时,北明翰—希鲁兹布里铁路管理局在星期六以欺骗股东罪在副大法官法庭受审。西方大铁路和西北铁路都想吞上述的北明翰—希鲁兹布里铁路。这条铁路的大多数股东主张同西北铁路合并,而管理局的委员们则主张加入西方大铁路,于是他们就决定利用委托给他们结算的一部分股票来取得虚假的票数。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股票分发到许多名义上的股票持有者的名下(有些

人并不知道这件事,他们的名字是被拿来顶替的;有一个竟然是9岁的小孩),这些股票持有者既然不偿付股票价值,于是以后就把股票还给管理局委员们,同时以名义股东的资格给这些委员们一定数量的票来保证他们取得多数,好与西方大铁路合并。博学的法官已经看出,“很难设想有比这更可恨更无耻的欺骗,而达到预定目标的方法尤为可耻”。他做了这样一番说教以后,就释放了被告,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如果罪犯是资产阶级就释放,而贫穷的无产者如果偷了5英镑以上的钱而被拿获,那就非判处苦役不可。

看一看英国的公众怎样时而对工厂巨头、时而对煤矿主、时而对贩卖假麻醉药的小商人、时而又对代替了已经吃不开的拦路大盗的铁路主的道德,总之就是对资本家的道德表示愤慨,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从整个阶级来说,资本显然有它自己的、如同根据 *raison d'état* (国家利益) 而制定的最高法律那样的道德,至于普通的道德,那仅仅适用于穷人而已。

曼彻斯特学派队伍中的议会改革者看来已经陷入很有意思的境地。在最近一届议会会议期间揭发出来的选举舞弊行为所牵涉的几乎都是城市选区,而且是赫尔、利物浦、剑桥和坎特布里这样的大城市。自由派的选举事务经纪人柯波克先生一时坦率,竟承认了“圣阿尔班怎样,其余所有的城市选区也就怎样”。现在,政治寡头打算利用这些被揭发的事件来实行一种削弱城市选区而加强各郡的改革。而曼彻斯特学派的改革者并不是要普遍扩大选举权利,他们只不过要在城市选区中扩大选举权利,如今面对着这样一个主张,他们当然有苦难言了。他们的机关报“每日新闻”正极力企图摆脱这种困境,看样子怪可怜的。

1846年1月14日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曾提高到3.5%,1846

年1月21日提高到4%，只是到1847年4月才达到5%。但是，大家知道，在1847年4月的最后三周中，几乎一切信贷业务都停顿了。1853年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的提高更快得多。贴现率从1852年4月24日2%到1853年1月8日就已提高到2.5%，同月22日达到了3%，到6月4日达到了3.5%，9月1日达到了4%，而现在已经四处谣传很快就要到5%。1846年11月，小麦平均价格是每夸特56先令9辨士；1853年8月后期已涨到65—66先令。大约在去年这个时候，英格兰银行地下室中的黄金储备是：

去年 .....	21852000 英镑
而现在 .....	16500068 英镑
差额 .....	<u>5351932 英镑</u>

前个星期黄金储备又减少208875英镑，而上星期则减少462852英镑。这种情况马上对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影响，有价证券的牌价一直在下跌。在上星期三“泰晤士报”的金融评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尽管不景气，在有价证券的市场上国库期票仍然继续以2厘的贴现率外加1厘附加利息兑现，但现在有一种印象是：财政大臣为了保持国库期票的价格，已命令由政府出钱加以收购，同时抛售由储金局担负损失的三厘证券，因为现在手边已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实现上述目的的其他有价证券。”

这真不愧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杰作！按低价抛售统一公债，按高价收购国库期票，宁愿失掉三厘证券带来的一半收入，把它们换成利息只略高于一厘五的期票。

外汇行市不利，黄金储备减少，但是不列颠的出口却空前增加，到年底甚至要超过1852年的出口1600万英镑，这两方面的情况怎么能调和起来呢？

“既然我国在出口商品时是给全世界信贷，进口时支付现金，所以单纯扩大我国的贸易有一天是必然给我国的国际收支差额造成相当不利的情况的，但是，当偿付我国出口商品的信贷期满，货币汇给我们的时候，所有这些开支都会回来的。”

这是“经济学家”杂志的话。按照这种理论，如果 1854 年的出口再超过 1853 年，那末外汇行市一定要和过去一样对英国不利，于是商业危机就将成为唯一的调节手段了。“经济学家”认为谈不上会发生 1847 年那样的破产，因为目前很大一部分资本并没有像那时候那样投入铁路等部门。它忘记资本正在投入制造厂、机器设备、轮船等部门。另一方面，“观察家报”则埋怨“不该毫无意义地投资于外国铁路和其他很成问题和不能令人相信的企业”。“经济学家”认为，业已扩大的贸易活动，在欧洲范围内，由于粮价很高，会出现有利的停滞，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是非常可靠的。与此同时，“泰晤士报”则肯定地说，纽约货币市场上的紧张将导致美国贸易活动的有利的停滞。“先驱”则大嚷：

“我们不应该指望能从美国得到以前那么多的订货。”

现在只剩下澳大利亚了。“观察家报”写道：

“出口已经达到了违反常识的极限。关于目前已运到伦敦准备发往南方殖民地的 74000 吨海运货物，我们从阿得雷德、墨尔本以及其他地方得到的不利的消息正在不断证实。不能否认，现时的前景并不令人鼓舞。”

至于中国市场，所有的报告书都一致指出，那里很急于出售，不愿买进，因为金银都已被收藏起来；而且，在这个巨大帝国的革命运动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前，这种状况绝不会有任何改变。

那末国内市场怎样呢？

“在曼彻斯特及其近郊，使用机床的大批织工仿效斯托克波尔特的榜样

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10%……工厂的头目们大概到冬末就会发现,问题将不是同意和不同意增加 10%,而是工厂主是否同意在保持现在的工资水平的条件下重新开工的问题。”

“纪事晨报”就这样毫不含糊地预告国内市场即将缩小。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报道过关于大规模扩建工厂和空前迅速地兴建新工厂的情况。我也曾向诸君报道过某些新建成的企业,这些企业现在可以说已经形成一个个工业城市了。我曾指出,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在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游资直接投入了工业生产<sup>280</sup>。现在,一方面,诸位可以把这些事实同国内外市场上货物过剩的征兆对照一下看,另一方面,请不要忘记,不利的外汇行市是使国外市场上的出口商品过剩过多的可靠手段。

但是,推动巨大的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这种危机的因素早就在积累)爆发的力量首先将是歉收。对于其他各种产品来说,随涨价而来的是需求下降;但是,粮价上涨只能使对粮食的需求更大,并且使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下跌。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普遍歉收本身就会导致内外市场普遍缩小。而欧洲南部、意大利、比利时、莱茵普鲁士今年的收成往好处说也像 1846—1847 年那样不好;在欧洲西北部和东北部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好收成。至于英国的情况,上星期的“粮食交易所快报”<sup>281</sup>——伦敦粮食交易所的官方机关报有这么一段话:

“没有疑问,今年联合国的小麦收获量将是许多年来最少的。王国几乎所有地区的收成都将大大低于中等收成;此外还要看到,今年的播种面积由于播种期间天气不好而比往年至少要少 $\frac{1}{4}$ 。”

对于这种情况,幻想无济于事。有人认为**贸易自由**就能一举而消除商业衰落、工业生产过剩和歉收,这是一种幻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上述那家“粮食交易所快报”指出,“农场主仍然不能够接受在自由贸易的制度下会缺粮食的看法。因此只有不多的人想到要大量储备。如果困难迫使我们大量运进粮食,我们恐怕要付出**很高的价钱**”。

昨天的“粮食交易所快报”又补充说:

“国外还有这么多的庄稼尚未收割,所以下几周的天气情况会对贸易发生巨大影响。没有收割的庄稼的质量已经受到近日雨水的损害,如果潮湿的天气再继续一个时候,就可能带来大祸事…… 最后的收获量可能比一两周前所能想像的还糟…… 我们最近几天得到的关于**马铃薯**情况的消息,比前些日子更不好…… 尽管上星期从国外得到大量供应(88833夸特),但粮食价格受的影响很小,每夸特粮价与最高点相比降低不到1—2先令…… 波罗的海各国的收成估计也普遍不好…… 根据最近的材料,小麦的船上交货价格在但泽是60先令,在科尼斯堡是56先令9辨士,在施特廷是54先令,在罗斯托克是58先令。”

物价腾贵的后果也像1847年那样,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治方面。在那不勒斯,市当局没有经费雇用工人为公共工程做工,国库里没有钱支付官吏的薪俸。在教皇国的托伦蒂诺、特尔尼、腊万纳和特拉斯特韦尔,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抢粮风潮,这些风潮绝不是用前此不久的逮捕办法,或利用奥地利人的入侵和棒打的威胁所能平息的。在伦巴第,斯特拉索尔多伯爵虽然实行了加税办法,要所有的直接税纳税人到今年9月20日至10月10日每一弗洛林金币多缴6个半克劳泽铜币(包括所得税和薪俸税),但是他也防止不了物价腾贵和工业停滞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在奥地利,这次发行新公债时照例说了一番仅仅是因为裁减军队花费多了国家之需钱

用的老调，而现在却暂停发行，这种情况就说明了奥地利普遍贫困。法国政府则伪造关于收成的报告，在巴黎实行人为的粮食定价，在各个市场上大量收购粮食，从这里可以看出它是如何焦急。外省不满意波拿巴拿它们的粮食来养活巴黎；资产阶级不满意波拿巴假借无产者的名义来干预实业；无产者不满意波拿巴在工农行将断炊的时候给士兵白面包而不是黑面包吃；最后，士兵们也对法国在东方问题采取卑躬屈膝的反民族立场表示不满。在比利时，已经爆发了一系列抢粮风潮，来回答科堡王室为奥地利公主举行的豪华而荒唐的庆祝会。在普鲁士，政府是那么恐慌，表面上不得不逮捕了几个粮商，另一些粮商则被警察总监传去“要求”他们按“公道”价格卖粮食。

最后，我还要重申一下我的看法：煽动家的词藻和权谋家的废话决不能使局面发生危机；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从1849年起，商业和工业的繁荣曾经是反革命高枕无忧的卧床。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9月13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3年9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86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  
—— 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 ——  
印度的铁路建设<sup>282</sup>

1853年9月20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在7月19日的那篇文章中写过：

“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结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sup>①</sup>

现在有人正打算利用联合舰队的力量来为俄国对付土耳其。英法舰队即使开进达达尼尔海峡，那也不是为了要炮轰塞瓦斯托波尔，而是为了要制服那些能够阻止苏丹无条件接受维也纳照会的穆斯林。

戴·乌尔卡尔特说：“9月13日，四位外交大臣<sup>②</sup>平心静气地在唐宁街开了会，决定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要求，要土耳其政府放弃欧洲会议在先前条件下所通过的修改意见。这还不够，他们还命令舰队开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准备在苏丹不能抵抗本国人民的愤怒的时候支援苏丹对付本国的臣民。这仍然不够，他们还向奥美尔—帕沙发出书面指示，不准他在本国国君的领地上从一个省份向另一个省份走动。因而他们也预料到，由于他们提出这些要求将

① 见本卷第241页。——编者注

②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以及以前担任过这个职务的阿伯丁、帕麦斯顿和罗素。——编者注

会爆发起义,所以他们就考虑到镇压起义所必需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联军舰队。”<sup>283</sup>

英国公众是从星期日的“辩论日报”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据这家报纸报道,里夫先生于本月13日带着一份给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急电从伦敦动身,14日早晨到了巴黎,他把所携带的指示的内容告诉法国政府之后,当天晚上就离开了那里。根据这项指示,英国大使应当要求土耳其政府完全同意维也纳建议并且放弃8月19日所提的修改意见。英国大使应当向土耳其政府发出威胁,说如果由于它拒绝让步而发生战争,它就会得不到四大强国的支持;此外,英国大使应当表示愿意用英法舰队来帮助土耳其政府镇压君士坦丁堡因土耳其政府接受维也纳照会而可能爆发的起义,以及用来对付奥美尔—帕沙,假若他敢于违背土耳其政府的命令的话。在接到星期日的“辩论日报”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维也纳会议在得知俄皇的否定答复以后,便建议苏丹收回自己的话,签署他从前拒绝签署的照会,并且满足于下面的保证:会议将对照会作出苏丹本人所能接受的解释。“泰晤士报”避而不谈“辩论日报”揭发出来的这些丢脸的事情。“纪事晨报”、“晨报”和所有伦敦的政府报纸也都是这样。与此同时,“晨报”却斥责君士坦丁堡平民的狂热。“纪事晨报”用浪漫的笔调描绘在欧洲土耳其怎样到处都是凶暴残忍和毫无纪律的亚洲土匪,奥美尔—帕沙的军队怎样正在靠这些土匪大量补充,以此来煽动它的愚蠢的读者;英勇的“地球报”逐日地从投和平之机的曼彻斯特学派的报纸上精心摘录一些文章来发表。这样一来,到必要的时候,英国的各高尚阶级就要下定决心“铲除异教”,并且同哥尔查科夫公爵一起高呼“沙皇万岁!正教徒的神万岁!”了。

今天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发现：“土耳其问题已成为纯粹的词句问题”。从这个前提中应得出的结论就是，为了一些空话而甘愿冒打破普遍和平的危险的苏丹，应该由头脑比较健全的帕麦斯顿之流利阿伯丁之流用暴力来开导开导。“泰晤士报”告诉我们，沙皇向苏丹提出了不公正的要求，苏丹拒绝了；于是沙皇就侵占了多瑙河各公国；英国和法国就把自己的舰队派到贝捷克湾去，这两大国的代表在维也纳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表举行了会晤。

他们在维也纳会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土耳其的利益，——“泰晤士报”回答说。

“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想要强迫奥斯曼政府的愿望，而且也没有如此行事的任何理由。”

可见，如果说四大强国现在有了强迫奥斯曼政府的愿望，那仅仅是由于“现在有了”理由“如此行事”。如果说维也纳会议以及帕麦斯顿和阿伯丁的干涉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一种理由，好使他们对俄国仅仅虚张声势地反抗一下，以便有借口强迫土耳其服从俄国的要求，这种假设想必不算是错误吧？

“泰晤士报”继续写道：“俄国的要求被其他的强国认为是不公正的，是和苏丹的主权不相容的”，因此，四大强国才拟定了一个照会，苏丹应当把这个照会送交沙皇，这个照会答应沙皇的一切要求，甚至还有些超过。

“泰晤士报”写道：“这份文件的措词，可能使不正确的解释有所借口，但有两点是写得十分清楚的：第一、四大国愿意支持土耳其政府的领土权和行政权；第二、一旦发生冲突它们将认为自己是受这种愿望约束的。”

既然苏丹可以相信，他将得到四大强国的善良“愿望”的支持，四大强国在一旦发生冲突时将认为自己受这种神秘的“善良愿望”

的约束，那末有什么理由不签署这份侵犯他的主权并把对他的1200万臣民的保护权送给俄国专制君主的照会呢？苏丹已经有可能体会到，四大强国是不认为自己是受国际法约束的，它们也不受那些明文规定一旦同俄国冲突它们就应当受各种保卫苏丹的条约的约束；那末，在这个赋予俄国明确权利而赋予土耳其“神秘愿望”的照会造成了冲突的时候，苏丹有什么理由不依靠四大强国的无畏精神呢？

“泰晤士报”说：“我们就举个万一的情况来说吧。假定在 *pur et simple* (无条件地) 接受了最初的维也纳照会之后，沙皇利用了一般人所设想的这份照会给他的那些机会。”

这时会怎样呢？

“苏丹就会提出抗议，于是冲突就是因执行 1853 年的协定而起的了。”

似乎因执行 1840、1841 年协定和巴尔塔利曼尼条约<sup>284</sup>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似的！似乎那种被克拉伦登勋爵本人称为“海盗行为”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也未曾造成任何冲突似的！

“泰晤士报”说：“含糊只会使俄皇产生误解。”

完全像 1841 年的条约使他“产生误解”那样，他援引这项条约，不许联合舰队开进达达尼尔海峡，同时自己却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

但是，苏丹的态度十分强硬。他拒绝同意照会，因为照会的起草人只是以出卖土耳其给俄国的行为来表达他们对土耳其的善良愿望。苏丹建议对这项照会作某些修改，同时，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四大强国接受土耳其提出的这些修改意见，这就表明它们认为这些修改是和它们的建议一致的”。但是，由于俄皇坚持反对

的意见,由于“泰晤士报”已完全确定“沙皇在这次冲突中的行为不可能有任何根据”,所以“泰晤士报”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俄国不愿意同意土耳其提出的合理的条件,那末,土耳其就应该同意俄国提出的不合理的条件,而且

“一个由于本身无力而每逢外侵或内乱就不得不寻求欧洲保护的国家,就应当为自己的贫弱付出代价,这种代价至少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援助,要在保护国负担最轻的条件下提供”。

因为土耳其显然需要四大强国帮助它来反对俄国,所以四大强国自然要站在俄国一边反对土耳其;既然土耳其根据现有的各项条约的规定向四大强国请求援助,那它就应当“为自己的贫弱付出代价”。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惩办四个卖国贼(阿伯丁、克拉伦登、帕麦斯顿和罗素),或者是让俄国沙皇统治全世界。”

这是戴·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发表的言论,这一类独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当由谁来审判四个卖国贼呢?议会。这个议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是由交易所商人、工业巨头和贵族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所主张的对外政策是什么政策呢?是 *paix-partout et toujours* (无论如何要保持和平)的政策。而谁来贯彻他们的对外政策的纲领呢?也就是天真的“晨报”认为必须当作卖国贼来加以审讯的那四个人。不过至少有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即政治寡头在政府中所代表的交易所商人和投和平之机的资产阶级正在把欧洲出卖给俄国,因此,为了击退沙皇的挑衅,首先必须推翻这些卑鄙无耻、奴颜婢膝的 *veau d'or* (金牛犊)崇拜者的可耻的统治。

土耳其政府在维也纳照会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马上就征集

了 8 万名列季弗<sup>285</sup>入伍。根据 9 月 5 日从君士坦丁堡发来的电讯，土耳其政府在总理大臣<sup>①</sup>官邸召开了会议之后，决定不顾战争危险，坚持自己最近的照会。穆斯林居民的热情达到了极点。苏丹在检阅埃及部队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呼，而在检阅完毕以后，人群把他扶下马来，隆重地举着他走过了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他重新给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发出了命令，要他们维持公国的安定。列施德—帕沙就君士坦丁堡的几名俄侨被揭发进行反对土耳其政府的阴谋活动一事，向俄国领事提出了警告。据君士坦丁堡的一家报纸报道，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犹太人团体献给苏丹 100 万披亚斯特，以补帝国的备战开支。据报道，士麦那的犹太人也作了类似的决定。从登载在维也纳“新闻报”的通讯中我们知道，在加拉兹逮捕了几名俄国贵族，因为他们与奥美尔—帕沙秘密通信，极其群尽地把俄国部队在多瑙河各公国的情况告诉了奥美尔—帕沙。还发现了奥美尔—帕沙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建议这些俄国贵族尽量多招些外国人来担任军职。

9 月 13 日，缅施科夫公爵在他的秘书陪同下来到维也纳，向欧洲列强递交尼古拉皇帝的一项新的声明，这项声明为他拒绝土耳其的修改意见作了解释。俄皇本人也将在本月 21 日由涅谢尔罗迭伯爵和美延多尔夫男爵陪同到奥里缪茨来。他通过利文男爵邀请普鲁士皇帝到奥里缪茨开会，但普鲁士皇帝拒绝了，理由是在目前局势下他这样做会引起太多的 *éclat* (喧嚷)。俄国的一个约有 3 万人的兵团目前已在保加利亚边境上的克拉约瓦驻扎下来。在此以前，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 8 个军需站。现在在布加勒斯特建立了

<sup>①</sup> 穆斯塔法—帕沙。——编者注

第九个常设的军需站,这个迹象说明,俄国人根本不打算撤出多瑙河各公国。

9月15日,英格兰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4.5%。“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同样写于9月15日的关于金融问题的文章说,“这项措施博得了普遍的满意”。但是这篇文章又说:

“下午2时左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实际上几乎完全停止了,而不久就得到了贴现率已提高到4.5%的消息,这时有价证券的行市兑成现金跌到95%,兑成10月13日还本付息的证券则跌到95.125—95.25%。普遍的意见是,如果贴现率不是提高到4.5%,而是提高到5%,那末,市场大概还不会受到这样不好的影响,因为这时公众将认为类似的措施今后已不可能再有了……铁路公司的股票买卖在银行董事会会议结束后跌得最厉害,而其他各种股票的行市截至当天为止也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

“泰晤士报”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向银行的经理们祝贺,说他们在自己的政策中遵循了皮尔法令。

“经理们根据黄金外流而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的情况,要求提高剩余黄金的卖价,这样一来就保证了自由实行罗·皮尔爵士的关于英格兰银行特许状的法令,只有通过自由实行,才能证明这项法令的正确性,而在1847年,由于受到经理们不明智的行为的阻挠,这一点就没有能够做到。”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说明,经理们在1847年的不明智行为恰巧正是他们过分奉行了皮尔法令,以致政府为了挽救银行部不致停止支付,不得不停止了这项法令的“自由实行”<sup>①</sup>。在“地球报”上我们看到:

“造成我国现时繁荣局面的那些原因,很有可能不会继续这样起作用了。消极的后果在曼彻斯特已经表现出来;那里的某些大公司不得不缩减自己的

<sup>①</sup> 见本卷第339页。——编者注

生产总额…… 证券交易所的所有部门都陷于十分萧条的境地。在铁路股票的交易中笼罩着惊惶不安气氛…… 黄金继续向大陆外流，最近一两天内差不多有 50 万的黄金将要由海上运往圣彼得堡…… 它（银行）节约自己的金属货币储备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它想给财政大臣为数七八百万的援助，因为财政大臣要同南海公司的债券持有者以及其他不满意的人进行结算，需要这一笔钱。”

9 月 13 日“晨邮报”从曼彻斯特报道：

“布匹和棉纱的交易很不景气，各种工厂制品的价格都很难保持住先前的水平。由于各个国外市场上差不多都没有需求，由于国内面临财政困难，由于这两个主要原因，结果就造成了目前的局面，如果把它和到处传播的繁荣消息对比一下，那末，应该承认它是极不正常的。”

同一家报纸在 9 月 15 日用下面的一段话结束了它的一篇论述日益迫近的危机的因素越积越多的社论：

“我们要警告商界人士：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无论创建企业和经营企业都一定要经常仔细小心的阶段。此外，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财政状况充满着比我们的商业状况更为严重和更难于克服的困难。”

从上面举出的“地球报”和“晨邮报”的互为补充的言论中应该得出一个结论：一方面，需求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供应却有剩余。工厂主势必要通过加强他们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退却。一位工商业问题采访员从曼彻斯特写来一篇通讯，发表在昨天的“纪事晨报”上，通讯说：

“工厂主已开始对达成协议一事抱着十分冷淡的态度，因为他们确信，很大一部分工厂，甚至所有的工厂，在工资问题可能得到调整以前，都将不得不停工。最近几日来，在各个工厂区的不同地方，都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企业主会议。很明显，工人们提出的过分要求以及他们激烈地硬要对方接受自己的强制性条款的企图，正迫使工厂主想办法建立共同的团体，以求自卫。”

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金融问题的文章中我们看到：

“企业主正在各个工厂区组织自卫同盟：仅仅在最近 5 天内，在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海德和格洛索普，差不多就有 100 个公司在建立这种同盟的协定上签了字。在普雷斯顿，工厂主已经承担起一项很严重的义务：以关闭工厂 3 个月的办法对工人进行反抗。”

根据从马赛发来的电讯，小麦价格每百升又提高到 2 法郎 25 生丁。在“通报”宣布了提高国库债券的利息以后，交易所的反应非常不好；到处都把这项措施看做是政府正缺钱用的迹象。人们已开始谈论政府将不得不借款的问题。财政大臣<sup>①</sup>已向许多土地占有者发出了通知，建议他们提前半年缴税，以表示感谢现政府曾经施与他们的大恩德，另外还感谢政府提高了他们的地产价格。“观察家报”指出：“这说明完结已经开始。”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谈过铁路对于印度有极为重大的意义<sup>②</sup>。现在我认为有必要报道一些各报发表的有关铁路网和建设情况和发展前景的最新消息。印度第一条铁路是现在已经通车的孟买—塔纳线。另一条铁路线将从加尔各答铺到恒河上的拉吉马哈尔，全长 180 哩，然后沿着恒河右岸通到巴特那、贝拿勒斯和阿拉哈巴德，再从阿拉哈巴德经过达普到阿格拉，从这里再通到德里。这样一来，这条铁路线将穿过 1100 哩长的空间。预定要在生河和图诺拿河上设立轮渡，以便最后把加尔各答这条线从德里通到拉合尔。最近几天就要开始建筑从马德拉斯向西直伸 70 哩的铁路线，然后再分两条支线，一条沿着高止山脉，以卡利摩特为终点

<sup>①</sup> 比诺。——编者注

<sup>②</sup> 见本卷第 248—250 页。——编者注

站,另一条经过贝拉里和普纳到孟买。未来铁路网的这个骨架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孟买—巴罗达—印度中部的铁路,为了建筑这条铁路,现在已经由董事会批准进行初步的地质勘测。这条铁路将从孟买经过巴罗达到阿格拉,在这里同加尔各答—德里铁路干线联接起来,这样一来,印度西部的首府和全印度斯坦同欧洲交往的最好港口孟买,一方面就同加尔各答联起来,另一方面又同旁遮普和西北各省联起来。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还想铺设一些支线通到内地的各个大产棉区去。与此同时,还正在采取措施建立整个印度斯坦半岛的电报网。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9 月 20 日

载于 1853 年 10 月 4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889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 西方列强和土耳其。——  
经济危机的征兆

1853年9月23日星期五于伦敦

9月20日的“地球报”否认“辩论日报”上关于里夫先生的使命的报道，说它是不确实的，“泰晤士报”则在星期三以《Gobemou—cherie》（“傻子才相信”）为标题转载了“地球报”的文章，指责法国报纸散布谣言。但是，我在上次写的那篇文章<sup>①</sup>里所分析的“泰晤士报”社会不是完全证实了“辩论日报”的报道吗？难道巴黎的“通报”上刊出了什么辟谣吗？在“地球报”说“辩论日报”造谣的同一天，“国民议会报”不是又一次这样说过吗？——

“雷德克利夫勋爵应当告诉苏丹，如果不收回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英国舰队就要开进达达尼尔海峡，法国舰队也会紧跟着英国舰队开来。”

“泰晤士报”在转载“地球报”的辟谣文章的同一天，不是直截了当地讲过这样的话吗？——

“英国和法国只能根据四大盟国提出的并且已经被俄国接受的条件来干涉俄土冲突，不管这些条件高傲的土耳其是否接受得了。”

“晨邮报”不是在伦敦能看到“辩论日报”以前就向我们作了如

---

<sup>①</sup> 见本卷第352—354页。——编者注

Name Given

- 16 August  
1811  
1st Sunday .. House of Commons  
2 Sunday .. 19th August  
General Pitt  
(Palmerston and  
Cobden)  
3 Sunday .. 23 August  
Bleby  
4 Sunday .. 30 August  
5 Sunday .. 6 September  
Anti-Slavery Society  
etc. Thackeray  
6 Sunday .. 13 September  
F. J. P. ...  
7 Sunday .. 20 September  
Coercion Turkey  
rain ...  
8 Sunday .. 27 September  
Vice Alexandre  
9 Sunday .. 24 October  
10 Sunday .. 31 October  
Militaria  
11 Sunday .. 7 November  
12 Sunday .. 14 November  
13 Sunday .. 21 November  
Palmerston

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的一页,上面记有发送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文章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日期  
(部分日期为卡·马克思所记)

下的报道吗？——

“列强代表在接到俄皇对维也纳照会的修改意见的答复以后，立即举行了会议，并在本月4日派信使去君士坦丁堡，给御前会议带去了**某种通知**，看来，土耳其政府将**不能**接受维也纳照会。”

最后，我们还从今天的一份晨报上看到：

“里夫先生已被派去君士坦丁堡了；他将把克拉伦登勋爵的几封急电送给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里夫与外交部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他是唐宁街和印刷所广场之间的联络者。”

不过，自从法国报纸最近揭露了一些事情以来，东方问题又一次来了一个完全新的转折，情况的变化可能违背英国内阁的一切打算和愿望，推翻它的那些可耻的决定。

奥地利已经拒绝了和它的假同盟国共同行动。维也纳会议至少在最近一个时候是开不起来了。俄国感到假面具已没有用处，因此把它撕了下来，于是英国内阁就从它的最后一个防御工事里被赶出来了。

“利物浦信使报”公正地指出：“阿伯丁勋爵的劝告是：苏丹采取露骨而无耻的欺骗手段；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在照会里面做一个**沉默的保留**；苏丹**歪曲地**理解这个照会（因为照会的条文是清楚而明确的）；列强要准备在俄皇坚决拒绝同意苏丹提出的修改意见时，**权当他已经同意那样去办事**。”

**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建议维也纳会议给土耳其政府送去一份同样虚伪的解释性照会，但是布奥尔伯爵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这个建议“对土耳其政府友好得过分了”；又说，“共同行动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现在每个强国可以各行其是”。这样一来，英国内阁就失去利用**欧洲**最高裁判所的**共同**决定来作掩护的可能了——这个最高裁判所是一个股份公司，它是由奥地利大臣一阵咒语念活的，所以现在他说一句话就又不见了。当初，俄国军队越过普鲁

特河以前，奥地利就根本不需要开什么会议。在俄国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以后，奥地利就更不需要开什么会议了，至少不需要在先前的基础上召开会议。另一方面，涅谢尔罗迭伯爵也发表了两个通知，由于这两个通知，再想用那种神秘的“善良愿望”为最初的维也纳照会作辩护，或者不按照照会的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照会，就根本不可能了。

所有的政府报纸都会大叫大嚷地说：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意见使全部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词句问题”。

涅谢尔罗迭声明：说的完全不对。沙皇对最初的照会原文的解释和苏丹是一样的；最初的照会并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想有别的意思，它就是缅施科夫照会的再版，所以我们坚持原文，坚持全文，而且仅仅是这个原文。政府机关报“地球报”当然感到吃惊：原来沙皇和苏丹都同样认为最初的照会的意思就是“完全承认俄国提出的、被土耳其拒绝的、而四大国也不打算(?)支持的那些要求”；原来“俄国是坚持要无条件地满足它一开头就提出来的要求”。为什么俄国不坚持呢？既然它在四个月以前就有勇气提出这些要求，那末为什么要在现在，在已经赢了第一个战局以后，放弃这些要求呢？

同一家“地球报”在几天以前还说土耳其提出的修改意见是烦琐式的吹毛求疵和添加用不着的细节，现在却不得不承认，“俄国的解释证明这些修改是必要的”。

涅谢尔罗迭的第一份急电还没有公布，但是“晨邮报”就肯定地告诉我们，在这份急电里宣布“维也纳照会和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有同等价值”。“地球报”(晚报)又补充说，这份急电的意思是：

“俄皇认为，维也纳照会向他保证了承认他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承认他对土耳其政府的影响，这是土耳其政府在四大国支持下一直都拒绝的，而且是为了抗拒这些，它才去请求四大国仲裁；我们还获悉，俄皇从来不想放弃他不要仲裁国而直接同土耳其打交道的权利，他只不过表面上承认仲裁国而已。”

俄皇即使表面上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四大国是仲裁国。他只允许其中的三个国家跟着奥地利跑，而让奥地利以一个温顺的求情者的身分求上门来。

在第二份急电里（9月7日从圣彼得堡发出，9月18日公布在柏林的“时代报”上，是寄给维也纳的美延多尔夫男爵的），涅谢尔罗迭完全正确地告诉俄国公使，最初的照会是由奥地利公使作为“最后通牒”交给了他的，在土耳其政府不加任何修改地接受照会这个必要条件下俄国不能不表示同意。“还有谁能够不把这一点看做是皇帝体谅别人的表现呢？”诚然，他对多瑙河各公国有过一点点“海盜行为”：他侵入了多瑙河各公国，占领了它们，在那里抽税，统治、掠夺、霸占了它们，可以说，吞并了它们，不管哥尔查科夫出了什么告示。但是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难道他另一方面不是“在刚刚接到照会的第一个草案的时候，不等得到伦敦或巴黎是否予以批准的消息，马上就通电表示完全同意了吗？”他已经通电表示，由俄国大臣在维也纳口授的照会决不会被圣彼得堡的俄国大臣拒绝，难道还能要求他做得比这更多吗？他甚至不等巴黎和伦敦批准就同意这项照会，难道还能要求他为巴黎和伦敦做得比这更多吗？然而他仍然做了更多的事情。他宽宏大量通电表示接受的照会草案，在巴黎和伦敦被“修改”了。即使如此，“他收回了自己的同意吗？他制造过哪怕是一点点障碍

吗？”不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项照会从它“最后的模样”看来完全和“**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有同等价值**”；但是具有同等价值的这一份照会毕竟与原本“**有所不同**”。难道他“没有提出过不作任何修改地接受**缅施科夫的照会**这个条件”吗？难道他本来不是可以“仅仅根据这一个理由就拒绝考虑新的照会”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不是表现了最大的爱好和平的精神吗”？维也纳会议的**最后通牒**同他毫不相干，这是维也纳会议本身的事情。“**他的事情是考虑**”由于苏丹拒绝接受最后通牒“而造成的**拖延**”。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他一点也不准备反对把多瑙河各公国再占上几个月，他的军队在那里不花钱就得到军装和军粮。

敖德萨并没有因为多瑙河口被封锁而蒙受损失；如果由于多瑙河各公国被占领而使伦敦马克街<sup>286</sup>的小麦涨价，那末这只会促使不洁的帝俄金币更快地回到神圣的俄罗斯去。因此奥地利和其他强国应当

“直截了当地并且强硬地向土耳其政府声明，它们已经尽力为土耳其政府开辟了能够使它立即恢复和我们的关系的唯一通路，但是白费了气力，以后他们就**洗手不管这件事了**”。

列强为苏丹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它们为沙皇开辟了进入多瑙河的道路，挡住了联军舰队进入黑海的道路。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神圣君王”接着就痛斥“那些**好战意图**，这种意图看起来目前正影响着苏丹和他的大多数大臣”。从他这方面来说，他当然希望苏丹不要急躁，希望苏丹用和平建议来对付炮舰，用温文有礼的谈话来对付哥萨克。“他已经做了一切可能的让步，但是土耳其政府还没有作一点让步。沙皇陛下不能再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了。”毫无疑问，如果不越过多瑙河，沙皇是**不能往前走的**。涅谢

尔罗迭把他的全部论据总括为以下的巧妙的二者择一的说法，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个范围，或者是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是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这些修改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土耳其政府还要坚持这些意见？如果这些修改具有某种意义，那末“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接受”。

克拉伦登勋爵宣称：“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是订立任何协定的先决的 *sine qua non*（必需条件）。”涅谢尔罗迭反驳道，恰恰相反。“订立协定”，就是说，让土耳其大使前来递交没有作任何修改的奥地利照会，“是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先决的 *sine qua non*”。

总而言之，宽宏大量的沙皇不准备再和维也纳会议白费时间了，因为维也纳会议对他结束第一个战局已经再没有用处；但是他将更紧地把多瑙河各公国抓在自己手里，因为这是他开始第二个战局所必需的。

我们今天接到一个消息，说要恢复维也纳会议，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末列强将把下面一首巴黎庸众曾用来颂扬亚历山大的歌送给尼古拉：

Vive Alexandre,  
Vive le roi des rois,  
Sans rien prétendre  
Il nous donne des lois.<sup>①</sup>

可是，沙皇对于东方纠纷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全权处理了。苏丹已经被迫去唤起旧时的宗教狂热，鼓动粗野好战的亚洲部落

---

① 万岁！亚历山大王，  
万岁！王中之王，  
你恩赐我们法律，  
却不要一点补偿。——编者注

重新向欧洲进军，这些部落不是外交照会或老一套的谎言所能安抚的；甚至俄国人在他们的蛮不讲理的照会中也透露出，他们对于弥漫在伊斯坦布尔的“好战精神”也有点儿担心。苏丹已经向他的穆斯林发布诏书，宣布对俄国将不再作任何让步。据报道，乌列玛 287 代表团谒见苏丹，要求苏丹要末退位，要末毫不迟疑地宣战。御前会议里的意见分歧已经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而希望御前会议去讲和的列施德—帕沙和穆斯塔法—帕沙这派势力已经开始向陆军大臣穆罕默德—阿利这派势力让步。

伦敦的一家所谓**激进派**的报纸表现出简直难以相信的轻率。“晨报”在几天以前还声称“应当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惩办四个卖国贼**”（阿伯丁、克拉伦登、帕麦斯顿和罗素），而在昨天的一篇社论里最后却说了这么一段话：

“阿伯丁勋爵因此应当让位于他的继任者。谁是继任者还要提吗？现在全国都认为在这个严重关头只有一个人配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帕麦斯顿勋爵**。”

如果“晨报”的编辑们没有能力观察事件和事实的话，那末他们至少也应当注意他们自己的报上天天刊登的乌包卡尔特先生的文章。

星期二晚上，根据设菲尔德居民向市长提出的请求，召开了一个设菲尔德居民大会，“讨论目前得不到解决和令人不满的东方问题的状况，并考虑就这个问题向政府递交请愿书的问题”。在斯泰福也要举行这样的大会。此外，还在进行许多准备来组织反对俄国和“群贤”内阁的公众示威。但是社会上的注意力目前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贴现率、粮价、罢工和商业前景不妙等问题上，而更使人关心的是**霍乱**，这种疫病在新堡已经开始流行；现在正在

伦敦保健委员会出的解释性指示的帮助下对付霍乱。女王和枢密院已发布命令，指示今后6个月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防疫法的各项规定；伦敦和其他大城市正急忙准备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对付即将来临的灾难。如果我同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看法的话，我就要说，霍乱是被沙皇派到英国来执行一项消灭最后一点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秘密使命”的。

最近4个星期里，工业区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7月和8月初，在地平线上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晴空——繁荣，只不过是远远的有一小块乌云——东方问题，除此之外，恐怕更使人担心的还是深恐缺少劳动力会妨碍我们的棉纺大王们充分挖掘他们所计划的好生意的无穷财源。东方冲突似乎已经解决；收成当然可能不够好，但是另一方面却有贸易自由，可以靠美国的、黑海的和波罗的海的取之不尽的粮食储备来把价格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对工业品的需求一天天增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用大量黄金滋养着不列颠的工业。这时“泰晤士报”就把马尔萨斯忘了，把它自己前不久大谈人口过剩的话也忘了，很认真地讨论起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从大陆上不来工人移民，那末，劳动力不够以及由此而来的工资提高是否会使得英国工业家的生产费用按一定比例增加，工商业的繁荣是否会因此而停顿。按照企业主的说法，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好得太过分了，好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他们提要求没有任何限度，他们的“厚脸皮”已经越来越令人厌恶。但是这样的事本身就说明国家正经历着空前的大繁荣；而除了贸易自由以外，还有什么可以成为这种繁荣的原因呢？但是最可宝贵的还是人们的信心，相信这种巨大的工商业活动整个都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基础上的，不容许有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肆行无忌的投机。英

国工业家都异口同声这样说，并且也根据这种看法办事：他们兴建成百个工厂，订购成千匹马力的蒸汽机，订购成千架织布机和几十万支纱锭。机器和机床制造生产部门在 1853 年比任何一年都有利可图。那些由于 1851 年的大罢工<sup>288</sup>而在各方面都遭到重大损失的企业，这时也恢复了起来，甚至情况更好了。如果没有这一笔空前茂盛的生意，有些头等的、名声很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就永远也恢复不了机器制造工人在上述大罢工期间使它们遭到的损失，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不止一个。

但是，不能不指明，在繁荣的晴空中目前已出现了浓重的乌云。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由东方冲突的转折造成的，但是这种转折对国内的、美国的和殖民地的贸易的影响仍然是很小的。贴税率的提高不是“丹麦王国里出了坏事”<sup>①</sup>的原因，而是它的征兆。至于歉收和粮食涨价，那末毫无疑问，在受到歉收和粮食涨价影响的市场上，首先是在作为不列颠工业支柱的国内市场上，是使工业品需求量减少而且还将大大减少的原因。然而，食品价格的提高目前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大多数地区暂时还由于工资增加而全部得到补偿，或者几乎全部得到补偿，因此恐怕还不能说消费者的购买力已经大为降低。工资的增加使那些以手工劳动为主的部门的生产费用增加了；但是由于需求量很大，所以到 8 月份为止，几乎所有工业品价格的增长额都大大超过了生产费用的增长额。上述种种原因对于生意的清谈当然起了作用，但是，光是这些原因，毕竟还不足以解释各工业区实业界中普遍存在的那种惶惶不安的心理。

事实是，自由贸易的幻想的魔力开始消失，勇敢的工业冒险

---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家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经济震荡、商业危机和新的生产过剩现象，还不是像他们所梦想的那样，绝不可能在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发生。至于说生产过剩，那末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因为“商品储备”——这是“曼彻斯特卫报”用来吓唬人的东西——继续存在，而且有增无已。对商品的需求量正在明显地下降，而供应量却一天天增加。在新建的工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工人最多的企业只是现在才逐渐开工。由于劳动力不足、建筑工人举行罢工以及大量定购的机器设备没有可能得到满足，所以这些企业的开工遭到了先前未能料到的耽搁，早就应该出现的工业产品过剩的征兆因此而推迟了一个时期。例如，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布莱得弗德附近的泰·索耳特先生的工厂一直到这个星期才能开工，还要过不少时候该厂的生产能力才能市场上充分显露出来。在郎卡群的新的企业中，有许多到冬季才能开工，而生产力的这种新的巨大增长的后果，只能在春天，甚至更迟一些才能市场上充分显示出来。据墨尔本和悉尼的最近消息，进口贸易正在显著减少，许多货物的送货被无限期推迟。至于不可遏止的投机（over-speculation），到发表决算报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还会常常听到。近来投机行为已经扩大到那么多项目的商品，因此尽管十分猖獗，但是不如过去那样引人注意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9 月 23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10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9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 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sup>289</sup>

1853年9月27日星期二于伦敦

联合舰队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的消息，同政府的人事变动和商业遭到困难的传闻合在一起，星期六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引起了一场真正的恐慌。

“要描写英国有价证券现在的情况或刻划那些在证券交易所里照例演出的场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紧张的情景是罕见的，所以这种情况不常有是值得庆幸的……如果说**压低行市的活动**现在差不多达到了法国革命时期发生过的那种规模，大概也不是过甚其词……本周**有价证券的行市**是91.5%；自从1849年以来，**有价证券**还不曾下降到这样低的水平……**铁路股票**一直在下跌。”

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就是这样写的。最靠得住的所有**铁路股票**的售价比上周便宜68—80先令。股票突然充斥市场，本身并不说明任何了不起的问题，因为只是**投机者**可以按照目前行市随时在交易所制造惊慌，恫吓 bona fide（老实的）股票持有人而已。但是，**有价证券行市**的剧烈波动，即使带有纯粹投机的性质，可是却同商业危机的一般征兆同时发生，这就要造成非常有害的后果了。至少，**金融市场上的这种恐慌**一定会使一切预定要发行的**国家公债**失败，特别是使**奥地利的国家公债**失败。而且，资本

家们都还记得，1811年奥地利对每一英镑的债券仅仅付1先令 $7\frac{1}{4}$ 辨士的股息；他们还记得，尽管奥地利在1849年以后，通过大大加重匈牙利和伦巴第的税负的办法，人为地增加了收入，从1200万英镑增加到1800万英镑，但是它每年的平均赤字仍然大于它的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此外，从1846年起，奥地利的国债增加了5000万英镑，只是由于以色列子孙们从私利出发采取了宽大态度，才使奥地利免于面临的破产，而他们现在仍然希望把自己装满了大堆奥地利钞票的箱子腾出来。

“观察家报”写道：“商业在某种程度上越出了自己的可能性的范围；我们的商业债务部分地超过了我们的资金。”

“晨邮报”惊呼：

“现在用不着再回避这个问题了，因为即使面临的危机将具有1847年所不曾有过的某些有利特点，但是每个注意事件进程的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一定会看到，现在问题至少是转向了极为不利的一面。”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又减少338954英镑，而它的银行券准备金，即预定用于贴现业务的有价证券，总共才700万英镑，换句话说，只够财政大臣用来支付那些执拗的南海公司债券持有人。关于粮食市场的状况，我们从“粮食交易所快报”最近一期了解到下面的情况：

“多年来在中等收成的情况下，我们每年都消费几百万夸特的进口小麦。那末我们在目前情况下要消费多少进口小麦呢？今年小麦的收获量至多也超过中等收成的四分之三，而且其他任何一种作物都提供不出余额。马铃薯遭到了严重的病害；由于它不适于长期储藏，所以吃得很多，这样很快就会感到这种食品不足。我们的小麦消费量是这样大，尽管截至9月5日为止的8个月内已进口3304025夸特的小麦和3337206公担的面粉，但是小麦储备

仍很有限……当然，我们丝毫也不打算夸大我国可能遭到的困难，但是，否认这些困难的存在，是愚蠢的……各地的报告都说明小麦收成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许多已经打了场的地方收获量都不到估产的一半。”

在工商业繁荣的晴空中出现了预告暴风雨的阴霾了，而罢工仍然是，而且将在一个相当久的时期中仍然是我们工业发展的重要特点；固然，罢工的性质已开始随着国家现在总的局势的变化而变化。

柏立的纺纱工人又要求每一千纱锭增加 2 辨士的工资。由于老板们拒绝了他们的这一要求，他们便停工了；织布工人一俟织完他们手上现有的棉纱，也会仿效他们的榜样。普雷斯顿的织布工人，在临近地区的工人的支持下，继续要求增加 10% 的工资，现在有 6 家企业主已经关闭了自己的工厂，其余的大概也要仿效他们的榜样。这样一来，2000 工人就失业了。在布莱克本，狄金逊先生的铸铁厂的机械工人仍在罢工。在威根的一家工厂里，缫丝工人罢工，要求每 20 码增加 1 辨士的工资；在另外一家工厂里，纺纱工人决定在工资增加以前拒绝上工。这两家工厂都关闭了。在同一个地方，约有 5000 名采煤工人举行罢工。星期三晚上，克罗弗德伯爵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大矿主解雇了自己的全部工人。此后，采煤工人在斯凯尔斯—奥尔查德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在曼彻斯特，5000 台织布机仍然停着不动，染布工、染纱工、毡帽制造工等等举行的一些小罢工就不用说了。波尔顿的棉纺纱工开大会要求提高工资。在特林泰姆和布黎纪瓦特以及其他城市有制鞋工人罢工，在格拉斯哥有马车工人罢工，在基耳马尔诺克有泥水工人罢工，在奥尔丹警察声言要罢工等等。北明翰的制钉工人要求增加 10% 的工资；乌尔未汉普顿的木工要求每天增加 6 辨士

的工资；伦敦的木工也同样要求增加这样多的工资，等等。同时，郎卡郡、柴郡、得比郡和其他各郡的主要工业中心的工人们，都纷纷公开集会，并且作出有关援助他们的饥饿兄弟的措施的决定。老板们坚决要把自己的企业关闭一个时期，以使用饥饿迫使自己的工人们屈服。

“星期日时报”写道：“我们看到，一般说来，工人要求的工资增加额，不超过每天6辨士；如果算算现在的食品价格，那就很难说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了。我们知道，有人认为，好像现在的罢工者所抱定的目的之一，是想从企业主的实际利润或预期利润中取得某种**共产主义份额**，但是**所要求的工资提高和日用必需品的涨价**，这两者之间的比较完全驳倒了这种指责。”

当工人们的要求比“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多一点的时候，当他们希望从他们用劳动创造出来的利润中得到“份额”的时候，他们就被斥为有**共产主义意图**。食品的价格与“永恒的和至高无上的供求规律”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在1839、1840、1841和1842年，即在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年份，工资不断下降，一直下降到挨饿的水平。当时那些工厂主们说：“工资不取决于食品的价格，而取决于永恒的供求规律”。“星期日时报”说：

“工人们的要求只有用**恭敬**的方式提出的时候，方能得到满足。”

**恭敬**与“永恒的供求规律”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有谁听说过，明辛街<sup>290</sup>的咖啡价格是由于“用**恭敬**的方式提出了”这类要求才上涨的呢？买卖人的血和肉的方法，也同买卖其他任何商品的方法一样，就是说，至少也要根据同样的条件来做这种买卖。

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已经持续6个月了。我们且来用企业主们自己所承认的标准——“永恒的供求规律”衡量一下这个运动。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的规律大概不应当像俄国同土耳其签订的永恒

的和约那样解释吧？

6个月以前，工人们（即使他们那时还没有认识到：由于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增长，由于人口向金矿和美洲不断外流，他们的地位加强了）仅仅根据百般颂扬贸易自由的实惠的资产阶级报刊普遍宣扬繁荣这种现象，就已经可以看到，工厂主们的利润是增加了。很自然，工人们要求从这种被鼓吹得如此响亮的繁荣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但是老板们给予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反击。于是工人们便结成团体，声言罢工，用比较和气的口吻坚持自己的要求。凡是发生罢工的地方，企业主和他们的走狗们，在教会的讲坛上、会议讲台上和报刊上，一齐破口大骂那些“用这种方式企图迫使别人接受条件”的人“厚颜无耻和无理取闹”。但是罢工证明了什么呢？不是仅仅证明了工人们宁愿用自己的方法来检验供求关系，不愿轻信雇主们的偏私的担保吗？在某种情况下，对工人说来，唯一能验证他是否真正取得了他的劳动的市场价值<sup>291</sup>的方法，就是举行罢工或声言要举行罢工。1852年原料价格与成品价格之间的差额——例如，原棉价格与棉纱价格之间的差额，棉纱价格与棉布价格之间的差额——平均大于1853年的差额，可见，纱厂主和工业企业主的利润一般要高于1853年的利润，无论棉纱价格或成品价格直到不久以前还没有赶上棉花价格的上涨。那末为什么企业主在1852年不马上提高工资呢？他们硬说，供求关系没有证明1852年有必要提高工资。是这样吗？一年前没有工作做的工人的确比现在多，但是这个差距同企业主们从那时起由于供求规律（它的意义已经由罢工向他们阐明了）发生作用而被迫进行的突然的、不止一次的提高工资是完全不相当的。当然，现在开工的工厂比去年的多，并且有许多有专门技能的工人在过去一年内外流

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工业蜂房”还从来没有像最近 12 个月来这样，由于早先在农业或其他部门就业的人纷至沓来而补上了这样多的工厂工人。

问题在于，“干活的”像往常一样，迟至很久才发现他们的劳动价值在好多月以前就已经增加了 30%，只是在那时——不早于去年夏季——他们才开始罢工，先要求增加 10% 的工资，后来又要求增加 10%，一次又一次提出要求，当然，他们的要求是在他们能够得到的范围以内。这些罢工总是成功的，这一方面促使罢工遍及全国，另一方面再好不过地证明了罢工是符合规律的；而在同一个工业部门里一再罢工，同一些“干活的”一次又一次要求再增加工资充分说明，按照供求规律，工人们早已有权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更高的工资，只是由于企业主们钻了工人们不熟悉劳动市场状况的空子罢了。一旦工人们终于弄清了这种状况，一直宣扬着“永恒的供求规律”的企业主们就回到了“开明专制”论，并且要求有随便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用恶狠狠的**最后通牒**的形式宣称，工人们自己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什么对他们坏。

总的经济前景的改变，也要引起工人和雇主互相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突然到来，正是许多罢工已经开始的时候，又是更多的罢工正在酝酿的时候。即使是萧条时期，这些罢工无疑也将继续下去，并且同样还要在提高工资的口号下进行，因为工人们将以物价上涨为凭据来回答企业主不能增加工资的声明；而这两个理由具有同样的效力。但是，如果像我所推测的那样，萧条持久地拖延下去，那末工人们将因此而受到最大的痛苦，那时他们就不得不为反对**降低**工资而斗争了，虽然斗争没有成功的希望。但

是，那时他们的活动将迅速转到政治领域，而在罢工过程中争得的新的组织——工联，对他们将有重大的意义。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9 月 27 日

载于 1853 年 10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0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弗·恩格斯 俄军在土耳其

因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来自欧洲的每艘轮船都能带来一些有关军队调动和交战结果的消息,所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仔细地了解敌对双方的态势、兵力对比以及决定战争进程的其他各种情况。这种需要促使我们对双方的攻防能力以及可能影响交战双方统帅部决心的主要战略问题,作一简略分析。

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军,最初有 2 个步兵军和通常数量的预备队骑兵和炮兵。俄国步兵军有 3 个步兵师,即 6 个旅,几个轻骑兵团和一个炮兵旅,一共约有 55000 人和将近 100 门火炮。每 2 个步兵军有“一个预备队骑兵军”和一定数量的预备队炮兵,包括重攻城炮兵。因此,按编制定额,占领军最初约有 125000 人。现在第 3 个步兵军已开始渡越普鲁特河。所以,除去一切必要的削减,可以确定,俄军集中在多瑙河上的兵力为 14—15 万人。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需要时能投入战斗,这决定于当地的卫生状况、俄军军需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其他一些不在当地就无法估计的类似情况。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在多瑙河上与俄军对峙的土军,最多不超过 11—12 万人。在埃及部队未开到以前,土军的总数据一般估计不超过 9 万人。因此,就我们所能判断的,土军在数量上

显然弱于俄军。至于双方军队的真正的素质和战斗力，那末应当承认，就是在这方面，优势也同样在俄军方面。诚然，由优秀的法国和普鲁士军官建立的土耳其炮兵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俄国炮手则以射击不大准确而闻名。但是，土耳其的步兵，尽管近来有了各种改进，却仍不能与俄军的掷弹兵相比；同时，土耳其的骑兵还缺乏在第一次冲锋受挫后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冲锋所必须具备的那种严守纪律和顽强战斗的精神。

双方的将领都是比较新的人物。关于俄军司令官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军事才能以及俄皇任命他担任这一要职的原因，我们已经和读者谈过<sup>292</sup>。他为人忠实，热心维护俄国的“特殊使命”。然而，他是否善于进行像现在所开始的这种规模的战争，还有待事实证明。土军总司令奥美尔—帕沙是一位比较有名的人物。关于他的情况，据我们所知，一般都是好的。他向库尔迪斯坦的出征，尽管条件困难，仍然获得了胜利；而向门的内哥罗的出征，也计划得非常周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外交上的干涉，大可以不战而胜<sup>293</sup>。因此，土军的主要王牌，可能在于军事指挥的优越。在其他一切方面，几乎都是俄军占优势。

尽管战争是土耳其人宣布的，而且他们可能比俄军更加狂热地渴望首先发起进攻，但是对较弱一方的土军来说，采取防御的行动显然更为有利，而俄军则以进攻更为有利。当然，这里没有把由于一方司令官犯严重错误而可能出现的获胜机会估计在内。假如土军有力量采取进攻，那末他们的战术就会明显地看出来。土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多瑙河上游以佯动迷惑俄军，在锡利斯特里亚和希尔索瓦之间迅速集中兵力，在多瑙河下游强渡，并在敌人阵地最薄弱的地方，即在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交界的狭窄地带采

取进攻；然后，把这两个公国的俄军分割成两部分，以集中的攻击驱逐在莫尔达维亚的一个军，歼灭在瓦拉几亚陷于孤立和被分割的另一个军。但是，由于土军在进攻中毫无获胜的希望，所以他们只有在俄军司令官严重失策的情况下，才可采取这种行动。

如果俄军想要利用进攻的机会，那末在他们深入土耳其帝国的核心以前，必须克服两个天然的障碍：首先是多瑙河，尔后是巴尔干山脉。强渡大河，甚至在敌前强渡，这是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常建的战功，以致现在任何一个尉官都能说出，应当如何强渡大河。采取几次佯动，备有齐全的舟桥纵列，拥有几个掩护桥梁的炮队，缜密计划保障退却的措施，并派出勇敢的前卫，——大概这就是强渡大河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但是要越过高山，尤其是要越过山口有限、能通行的道路也不多的巴尔干山脉，却是艰巨得多的行动。而当山脉又与河流平行，其间隔不超过40—60英里——这正是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的距离——时，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在山地遭到失败的军队，可能由于敌人的坚决追击而被切断通往自己的桥梁的道路，并在援军开到以前就被赶下河去。在大规模会战中遭到这样失败的军队，不可避免地要全军复没。土耳其的天然的军事力量，就在于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相距这样近，而且又是平行的。从马其顿—塞尔维亚边界到黑海的巴尔干山脉，即巴尔干山主脉（《V eliki Balkan》），有五个山口，其中有两个位于大路（在土耳其叫驿道）上。这就是伊赫吉曼山口和多勃拉尔山口。伊赫吉曼山口位于由贝尔格莱德经索非亚、菲力浦堡、阿德里安堡到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而多勃拉尔山口则位于锡利斯特里亚到苏姆拉的道路上。至于其他的三个山口，有两个位于上述两个山口之间，有一个靠近黑海。这三个山口，大的部队和辎重队都不

能通行,只有较小的部队,顶多还有轻野炮队可以通行,因而不能作为入侵军主力的作战线相交通线。

俄军于 1828 和 1829 年曾在锡利斯特里亚—多勃拉尔山口—阿德里安堡—艾纳德什克这一方向上作战。这是从俄国边境到土耳其首都最近最直的一条道路,所以它实际上是来自北方、有绝对控制黑海的舰队作支援并且是以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而迅速结束战争为目的的任何一支俄国军队所必经的道路。要通过这条道路,俄军强渡多瑙河后,应攻占有两个要塞(苏姆拉和瓦尔那)从翼侧掩护的坚固阵地,封锁或攻占这两个要塞,尔后再越过巴尔干山脉。土军于 1828 年曾以主力在这一阵地上冒险,结果在库列夫查附近被击溃;瓦尔那和苏姆拉均告陷落,巴尔干山脉的防御力量薄弱,因而俄军到达了阿德里安堡。尽管俄军已疲惫不堪,但并未遇到更多的抵抗,因为土军已完全瓦解,他们甚至没有一个旅的兵力来防守君士坦丁堡。土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犯了极大的错误。每个军官都应当清楚地知道:防守山脉时,不应当把防御阵地设在山脉的前面,也不应当分兵封锁所有的山口。恰恰相反,应当在山脉的后面占住中央阵地,对各山口进行监视,等到看清敌人的意图后,就在他们的先头纵队从隔断山脉的狭谷中走出时,向他们进行集中攻击。土军本应集中更多的兵力,在敌人必然因疾病和某些部队掉队而削弱的情况下,只在阿德里安堡平原进行决定性的防御战,而他们却由于在瓦尔那和苏姆拉之间的地区有一道横断俄军作战线的坚固阵地,便决定在那个地区进行这一决战。

因此可以看出,在锡利斯特里亚—阿德里安堡方向进行防御时,应防守多瑙河渡口,而不应冒险决战。在这以后,应在苏姆拉和瓦尔那的后面进行抵抗,而不应在苏姆拉和瓦尔那之间进行抵抗,

而且只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性非常大时,才可进行决战。尔后,则应退到巴尔干山脉以南,同时必须留下一些部队防守山口,留下的部队必须尽可能只抵抗而不决战。这样,俄军将把自己的兵力消耗在围攻要塞上,而且,如果他们还像以前那样行动的话,他们还要以强攻夺取要塞,也就是说,将在那里遭受重大的损失,因为可以说明俄军特点的,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俄军迄今从未在无外援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过正规的围攻。缺乏有经验的工程师和炮手,在野蛮的国家里不可能筹备大量军用物资和必需的围攻器材,甚至现有的物资也因路途遥远而不可能运来,——所有这一切都经常使俄军不得不在进行短时间的、猛烈的、但是很少充分产生效果的炮击后,用强攻夺取据点。苏沃洛夫曾采用这种方法攻占伊兹马伊尔和奥查科夫<sup>294</sup>, 1828和1829年俄军又用同样方法强攻过土耳其在欧洲和亚洲的要塞,1831年攻占华沙时也是用这种方法。不管怎样,俄军到达巴尔干山口时兵力总要受到削弱,而土耳其则有足够的时间从各方面调集自己的军队。如果土军用全力还未能击退企图越过巴尔干山脉的入侵军队,那末就可能在阿德里安堡城下进行决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土军仍遭失败,那末至少可以肯定,他们已尽其所能了。

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俄军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不可能具有任何决定的意义。英国和法国的舰队正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在这样的兵力面前,任何一个俄国的司令官都将无法向这个首都进军。在阿德里安堡受阻并失去舰队(舰队本身也可能受到威胁)支援的俄军,很快就会遭受重大牺牲,会因疾病而损失成千的人员,并被迫退到巴尔干山脉以北。因此,俄军即使获胜,也不可能达到其战争的主要目的。但是还有一条作战线可供俄军选择,而且可能对他

们更为有利。这条作战线就是从维丁和尼科波尔经索非亚到阿德里安堡的道路。如果不考虑政治原因,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俄国将军也不会想起走这条路。但是,只要俄国还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奥地利身上,只要俄军在塞尔维亚边境附近的出现加上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活动能够在这个国家,在门的内哥罗,在占波斯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人口大多数的希腊—斯拉夫人中激起暴动,只要由于君士坦丁堡停泊有欧洲舰队,俄国还谈不上进行最后的单纯军事行动,还谈不上夺取君士坦丁堡,那末这个计划就是俄军可能采取的、有很大可能获得成功的唯一的计划;采取这一计划,他们就可以避免英法因俄军过于公开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而采取坚决的军事行动。

从俄军目前的部署的确可以看出,是有类似这样的计划的。俄军的右翼一直延伸到瓦拉几亚西部边境附近的克拉约瓦,而且俄军的战斗队形全都是沿多瑙河向上游地区展开的。因为这样的机动使人完全不能设想作战线将通过锡利斯特里亚和苏姆拉,所以这种机动的目的可能只是企图与塞尔维亚——土耳其的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正教的中心建立联系。如果奥地利给予支持,如果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能与此同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那末在多瑙河下游扼守防御阵地,配合渡过多瑙河上游向索非亚进攻,就是完全有把握的事;而俄军向土耳其斯拉夫地区的中心进军,是必然会引起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沙皇采取这种方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比较温和地实现他在整个冲突中所企求的目的——把土耳其所有的斯拉夫人都组成如现在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那样的单独的公国。如果苏丹在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仅有名义上的主权,而实际上这些地方受沙皇的保

护，那末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就会局限于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而且可能失去其兵源地——阿尔巴尼亚。这对俄国来说是最大的成功，比在阿德里安堡取得决定性胜利要强得多，因为在那个胜利之后它的军队就可能无法前进了。根据这一切情况来看，俄国就是企图取得这种结果。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可能都起来反对土耳其，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但是俄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否犯错误，就很难说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9 月 29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0 月 1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

帕麦斯顿勋爵<sup>295</sup>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0月—12月初  
载于1853年10月22和29日,11月  
5、12和19日,12月10、17和24日  
“人民报”第77、78、79、80、81、84、85  
和86号,署名:马克思博士;一部分  
作为社论发表于1853年10月19日、  
11月4和21日及1854年1月11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2、3916、  
3930和3973号,并以单行本形式于  
1853—1854年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原文  
曾与“纽约每日论坛报”  
和单行本核对

THE PEOPLE'S PAPER.

LORD PALMERSTON.

Written for the "New York Tribune," by Dr. MARK, and transmitted by him to us.

FRANK ARFIELD.

Knowledge is again and again fascinated by the false charms of Alecto, which he knows to disengage to old witch—

Time loath, new eyes, new name, new covering and the laughable man without feeling is less with her show whom he knows to have transmuted all her former infernal into acids and other acids. The English public as another Ruggles, and Palmetto in another Adam. Although a septuagenarian, and since 1847 occupying the public stage almost without interruption, he continues to remain a novelty, and to excite all the hopes that refer to energy on an untired and promising youth. With one foot in the grave, he is expected not yet to have begun his true career. If he were, in the hemisphere, all England would be surprised at learning that he had been a Secretary of State half this century.

If not a good specimen of all such, he is at least a good one of all such. He succeeds in the conduct of the business pathos as in familiarity with the tragedy as in confidence; although the latter may be more congenial to his feelings. He is the first class orator, but he is an unflinching debater. Possessed of a remarkable talent, of a never-failing presence, a rapid, of a gentlemanly versatility, of the most minute knowledge of parliamentary trials, language, parties, and men; he handles difficult cases in an admirable manner and with a pleasant volubility, picking up the prejudices and stereotypes of his public, covered from any reproach by his acute impudence, from running into a position by his profound feeling, his perfect indifference, and his unobtrusive wit. Although a seemingly happy joker, he ingratiates himself with everybody. Never losing his temper, he depends on an impetuous temper. When unable to answer a subject, he knows how to play with it. If wanting of general views, he is at once ready to those elegant generalities.

Endowed with a quiet and indelible spirit, he abhors inactivity, and gives for agitation, if not for action. A country like England shows him, of course, to busy himself in every corner of the north. What he aims at is not the substance, but the mere appearance of action.

If he can do nothing, he will discontentedly. Where he does not believe, he intermeddles. Not able to vie with a strong enemy, he improves a weak one.

Being no man of deep design, proceeding on no combinations of long standing, pursuing no great object, he embarks in anything with a view to distinguish himself in a showy manner. He wants compensation to feel the necessity, and when he finds them not ready, he will create them. He seeks in other conflicts, cheap battles, showy scenes, diplomatical manœuvres, and schemes to be ordered to sail, the whole intention

the act of glory, while admitting that Denmark had admitted no neutrality whatever towards Great Britain, he contended that they were right in bombarding the capital and closing its ports, because they had to prevent Danish neutrality from being, perhaps, exercised in favour of the complainant of France. He was the author of a motion, introduced by Sir John Lubbock.

When again specializing, we find that English soldiers peremptorily engaged in the defence of British troops, called over from the continent to England, with the express mission of maintaining strictly the stipulated plan, to establish which William had, in 1806, sent over from Holland, with his Dutch troops. Palmerston answered in the well-founded "apprehensions for the liberties of the country," originating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in a very eloquent manner. Why would we not have 15,000 of these foreigners at home; while you have, that we employ "a far larger proportion of foreigners abroad." (House of Commons, March 10, 1815.)

When similar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stitution were from the large standing army, established since 1815, he found "a sufficient provision" of the committee in the very constitution of our army, "a large proportion of its officers being 'men of property and education.'" (House of Commons, March 8, 1816.)

When the large standing army was stated from a financial point of view, he made the curious discovery that "much of our financial embarrassments had been caused by our former too great establishment." (House of Commons, March 8, 1816.)

While the "burde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misery of the people" were contrasted with the very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he reminded parliament that those burdens and that misery "were the price which we (i.e., the English subjects) agreed to pay for ou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House of Commons, May 18, 1822.)

In his eyes, military despotism was not to be apprehended from the exercises of "those soldiers, but misled soldiers, who demand that men of letters in the country, which, according to every first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must rest, if it were possible, on a military despotism." (House of Commons, June 14, 1820.)

While large standing armies were thus his means for maintain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untry, he defended it in the debate on Mr. Mackay's bill, on the 5th of March, 1824, he declared it to be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 on March 11, 1823, he recommended to agree on March 15, 1823, he stood by it in the debate of April, 1823, and he proved on a matter of fact, on every subsequent occasion.

There existed no objection in the army, he did not feel "pleas'd to remove her, if it happened to enter the interests of aristocratical power. This, I understand, in the debate on the Sale of Commission." (House of Commons, March 15, 1824.)

载有卡·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  
第一篇的“人民报”原版的一部分

## 第一篇<sup>①</sup>

鲁杰罗一次又一次地被阿耳契娜的假风姿迷住，其实他也知道在这种假风姿掩盖之下是一个老巫婆——

“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味觉，没有一切。”<sup>②</sup>

这位游侠骑士虽然明明知道这个老巫婆把追求过她的人都变成了驴子和其他动物，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英国公众是第二个鲁杰罗，帕麦斯顿是第二个阿耳契娜。帕麦斯顿虽已年近七十，并且自 1807 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望，像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可是人们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生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死了的话，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他

<sup>①</sup> 在 1853 年 10 月 19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开头有两段话是“人民报”上没有的。这两段话是这样的：“东方的纠纷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变动，即使各党派的情况没有改变，至少各党派的首脑人物的处境有了很大的不同。帕麦斯顿勋爵又变成了公众的红人。人人都谈论他，说他是唯一能够拯救英国的人；大家都默认，一旦内阁改组，无疑将由他出任首相，而托利党人、辉格党人、自封的爱国人士、报界以及整个社会舆论，无不大声疾呼要求改组内阁。”

帕麦斯顿狂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以致时时有人推测这也许是一种纯粹的虚构，这种虚构的用途不在国内，而是像出口货一样向国外销售的。然而，这种推测毕竟是错误的。”——编者注

<sup>②</sup> 引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编者注

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大臣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样样精通的国家活动家,但他至少是一个任何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员。喜剧人物和英雄人物、高歌和私语、悲剧和闹剧,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但是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闹剧。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辩论家。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和无比的精细,他永远保持着 *présenced' esprit* (镇静和机警),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那种圆活,熟谙议会里的一切阴谋诡计、党派和人物;所以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他能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迎合听众的偏见,利用他们的感情。厚颜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肠和圆滑的手腕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极端的轻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贵族的傲慢态度,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善于说十分巧妙的俏皮话,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欢心。他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能戏弄暴跳如雷的敌手。他即使没有本领搞通某个问题,但是知道怎样东拉西扯;即使缺少总的看法,也随时都可以用一般的词句编出一套漂亮话来。

他天生好动而不知疲倦,所以不耐清闲,即使不是渴求采取行动,至少也是渴求造成轰动。当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会使他自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事可干。他追求的并不是成功的本身,而只是成功的假象。

如果他不能做出什么事情,他就故意制造些事情。当他不敢出来干涉的时候,他就居间调停。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较量,他就找一个弱的来做对手。

他不是一个有深远打算的人,他不作任何长远的图谋,没有任何伟大的奋斗目标,所以他投身于困难只是为了以后炫耀一下他

能摆脱困难。他需要纠纷，因为纠纷使他可以维持自己的活动；如果没有纠纷，他就制造纠纷。他非常喜爱虚假的冲突，同虚假的敌人进行虚假的战斗，交换外交照会，调遣军舰，忙来忙去，直到在议会中引起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辩论一定能使他获得暂时的成功为止，这就是他一贯追求的唯一目标。他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国际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限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紧张。在他看来，历史进程本身不过是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的个人享受而发明的消遣品而已。<sup>①</sup>

他屈服于外国势力，但在言词上却反对外国势力。他从坎宁那里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因此他一向不愁找不到借口来激起民族偏见和反对其他国家里的革命，而与此同时他又使其他强国对他抱疑忌态度。既然他这样容易地成为大陆各国宫廷心目中的 *bête noire* (可憎恶的东西)<sup>②</sup>，自然在本国也就毫不费力地博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他虽然出身于托利党，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辉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虚伪和矛盾。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资产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会在纵容别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别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他知道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讨好，怎样使假盟友吃苦头；他会在争执的适当时机站到强者那边去欺压弱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

① 在 1853 年 10 月 19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还有下面一句话：“他就是托马斯·卡莱尔笔下那种冒牌的世界领袖人物最好的标本”。——编者注

② 字面的意思是：“黑色动物”。——编者注

有人骂他拿俄国的津贴,但也有人疑心他是烧炭党。1848年,他曾经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以免因被控像是沙皇尼古拉的大臣而遭法办;使他深感满意的是,1850年,他遭到了外国大使们的阴谋反对,这个阴谋在上院获得了成功而在下院遭到了失败<sup>296</sup>。他出卖别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有礼貌,因为礼貌是魔鬼用来换取受骗的傻瓜的鲜血的小钱。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压迫者从他那里则从来不会得不到大量慷慨的词令。每当波兰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德国人遭到镇压的时候,帕麦斯顿总是在执政,但是屠杀他们的暴君却老是怀疑帕麦斯顿和受害者有秘密的联系,其实暴君的屠杀还是经过帕麦斯顿首肯的。到现在为止情形一向是这样:谁要是把他当做敌人,大概不会得到坏处,谁要是把他当做朋友,那事情就必定糟糕。他的这种外交手腕虽然没有使他和外国的谈判获得怎样辉煌的结果,可是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相信他对谈判结果所做的一套解释,使他们把空话当作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龌龊的动机。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他的封号来源于爱尔兰贵族),1807年波特兰公爵组阁时被任命为海军部部务委员。1809年任军务大臣,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828年5月。1830年他非常机灵地转到辉格党人方面去,于是他们就让他做辉格党永久的外交大臣。除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和1841年到1846年这两段托利党执政的时期外,从1830年革命到1851年12月英国的全部对外政策都是由他负责的。

在派西沃先生、利物浦伯爵、坎宁先生、葛德里奇勋爵、威灵顿公爵等托利党人领导内阁的时期,曾经进行了反雅各宾战争,大举

国债，颁布谷物法<sup>297</sup>，外国雇佣军队驻扎在英国的土地上<sup>298</sup>，人民——用帕麦斯顿的同僚西德默思勋爵的话来说——常常“出血”，新闻被封锁，集会被禁止，人民大众被剥夺了反抗的武器，人身自由和正常的诉讼程序被抛在一边，全国简直可以说处于戒严状态，——总而言之，这个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丑恶、最反动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个长时期内，这位热心保护“自由体制”的唐·吉诃德，这位歌颂“光荣宪制”的品得，却一直是这些托利党内阁的重要成员，这乍看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帕麦斯顿议会生活的处女作就很典型。1808年2月3日，他作了发言。他替什么辩护呢？他替办外交要保密辩护，替一国对另一国的空前无耻的暴力行为辩护，这次暴力行为，就是英国正当它宣称和丹麦非常和睦的时候炮轰哥本哈根并劫夺丹麦的船只<sup>299</sup>。关于办外交要保密的问题，他说：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国王陛下的大臣们有责任（谁给了他们责任？）保守秘密。”

他进一步又说：

“而且一般地说，我也反对把外交活动的情况公开，因为泄露这方面的秘密就会断绝今后情报的来源。”

维多克也会使用同样的词句为这样的事辩护。至于对丹麦所进行的海盗式的侵犯，帕麦斯顿承认丹麦对大不列颠并没有表现任何敌意，可是他还是硬说英国炮轰丹麦首都并劫夺丹麦船只做得对，因为英国要预防丹麦的中立可能在法国的压力下变为公开的敌对。这就是帕麦斯顿阁下公布的新国际法。

在后来的一次宏论中，这位 *par excellence*（道地的）英国大臣又极力替外国军队留驻英国这件事进行辩护。把这些外国军队

从大陆弄到英国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以强力维护 1688 年威廉带着他的荷兰军队从荷兰来到英国而建立的寡头统治。皇家德籍军团的存在使人们完全有根据地“为国家的自由担心”,而帕麦斯顿却以极不郑重的口吻告诉这些人:既然你们知道,我们“在国外雇用的外国军队比 16000 人多得多”,那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国内雇用这 16000 人的外国军队呢?(下院,1812 年 3 月 10 日)

当人们由于 1815 年以后仍然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而同样为宪制担心的时候,帕麦斯顿则认为“我们的军队的结构本身就是宪制的足够的保障”,因为军队中的军官大部分是“有财产和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下院,1816 年 3 月 8 日)

当人们从财政的观点抨击保持庞大的常备军时,帕麦斯顿作出了一个奇异的发现:“我们的许多财政困难都是由于过去我们的军队平时编制太小造成的。”(下院,1816 年 4 月 25 日)

当有人向他指出“全国人民的赋税重担”、“人民大众的贫困”同耗费无度的军事开支之间的尖锐对比时,他提醒议会:这种赋税重担和贫困是“我们(即英国的政治寡头)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甘愿付出的代价”。(下院,1820 年 5 月 16 日)

据他看来,军事专制的危险之存在只能归罪于

“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迷路者;从国家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来看,他们要求的那种改革一旦实现必定会导致军事专制”。(下院,1820 年 6 月 14 日)

如果说他把庞大的常备军当作维持国内秩序的万应灵丹,那末体罚就被他当作维持军队秩序的百宝仙方。在 1824 年 3 月 5 日关于惩治叛乱法案<sup>300</sup>的辩论中他为实团体罚进行辩护;1825 年 3 月 11 日,他宣称体罚是“绝对必要的”;1828 年 3 月 10 日,他再度建议采用体罚;在 1833 年 4 月的辩论中,他支持实团体罚的办法,

并且以后每一次他都表现了对这种惩罚制度的热烈爱好。

军队里的任何流弊，只要是对贵族寄生虫们有利，他就不会找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之辩护。关于出卖军官官衔证书的辩论就是一个例子。（下院，1828年3月12日）

帕麦斯顿勋爵喜欢装扮成一个为宗教信仰自由而奋斗不息的战士；可是他却投票反对罗素勋爵所提出的废除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sup>301</sup>的议案。为什么他要反对呢？原来因为他“作为一个热诚的支持信仰自由的人”，不能容许人们“在天主教徒遭受着真正苦难的时候”却来替非国教徒<sup>302</sup>“解除莫须有的压迫”。（下院，1828年2月26日）

为了证明他对信仰自由的热忱，他告诉我们，他“为非国教徒人数的不断增加而忧虑，希望国教在英国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他还希望“国教由异教徒出钱维持”。这位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指责有钱的非国教徒替没有钱的非国教徒办教堂，而

“英国国教方面独有穷人缺少做礼拜的地方…… 如果认为穷人应该从自己的微薄的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是荒谬的”。（下院，1824年4月9日）

当然，如果认为英国国教的有钱的教徒应该从自己的巨额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就更荒谬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是怎样为天主教徒的解放<sup>303</sup>而奋斗的，这是他认为爱尔兰人民特别“应该”感谢他的好事之一。他在坎宁内阁任职时自称为天主教徒解放的拥护者，而后来却又参加了公然敌视天主教徒解放的威灵顿内阁，这我不去谈它。或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信仰自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管的一种权利吧？且听他自己是怎样讲的：

“虽然我也希望对天主教徒的要求加以考虑，但是我决不容许这些要求以权利为根据…… 如果我认为天主教徒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那我个人就会拒绝走进全院委员会”（下院，1813年3月1日）

可是为什么他要反对天主教徒要求自己的权利呢？

“因为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剥夺社会任何一部分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如果它认为为了全社会的安全和利益必须这样做的话…… 这是文明政治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下院，1813年3月1日）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最无耻的供状，原来人民群众根本不配有任何权利，他们只有在立法机关——换句话说，也就是统治阶级——认为适当的限度内才能享有一点自由。于是帕麦斯顿直截了当地宣称：“解放天主教徒是出于恩典和眷顾。”（下院，1829年2月10日）

因此，他所以俯允解除对天主教徒的权利的限制，只是一时的权宜。而在这种权宜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爱尔兰的大地主，所以他想使人保持一种错觉，好像除了解放天主教徒就别无他法来消除爱尔兰的灾难，好像解放天主教徒能医治爱尔兰不住在本地的大地主所造成的苦难，并且能代替济贫法。（下院，1829年3月18日）

这位后来把爱尔兰本地人从自己领地上“清扫”出去的大慈善家，一刻也不能准许爱尔兰人贫困的乌云遮蔽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晴朗的天空<sup>①</sup>。

他说：“固然爱尔兰的农民没有享受到所有英国农民所享受到的全部幸福。（请想一想，每星期只有7个先令收入的家庭能享受什么幸福吧！）然

<sup>①</sup> 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晴朗的天空”作“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的议会上的晴朗的天空”。——编者注

而，——他接着说，——爱尔兰农民也有他们的幸福……他们有足够的燃料，没有吃的也只是偶然的事（6天中只有4天！）。”

多么幸福啊！可是爱尔兰农民的幸福还不止这些。“他们有一种比他们的英格兰患难弟兄更为乐天的性格。”（下院，1829年5月7日）

像谈论爱尔兰农民所享受的幸福时一样，他在谈到爱尔兰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勒索时，也是那样嘻皮笑脸：

“有人说，爱尔兰地主尽可能地向农民榨取最高的地租。可是阁下，我想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英国的地主无疑也是一模一样。”（下院，1829年3月7日）

所以，一个这样迷恋“光荣的英国宪制”的奥秘和“英国自由体制的好处”的人，力图在整个大陆上推行这些事物，这还有什么奇怪呢？

## 第二篇

当改革运动<sup>304</sup>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摆脱了托利党，投到辉格党方面去。虽然他认为军事专制的危险并不是由于英国本土驻扎着皇家德籍军团，也不是由于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而是完全来自“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但他在1828年仍然很大方地赞成把选举权扩大到北明翰、里子、曼彻斯特等工业大城市，这是什么缘故呢？

“并不是因为我在原则上拥护改革，而是因为 I 坚决反对改革。”

他确信，及时对蓬勃发展的工业资本所做的某些让步，可以成为防止“普遍改革”的最可靠的手段（下院，1828年6月27日）。他一成为辉格党的同盟者，便马上不再装模作样地让人觉得辉格党提出的改革法案目的似乎在于打破威尼斯式宪法的狭小圈子了；正相反，改革会使宪法有力和牢靠，使资产阶级背离人民的反对立场。

“资产阶级将改变态度，他们将由不满宪法一变而为拥护宪法，因而宪法也就能大大加强和巩固。”

他安慰大贵族们，叫他们相信实现改革法案实际上并不会削弱“上院的势力”及其“对选举的影响”。他对土地贵族们说，宪法并不会失去它的封建性质，因为“土地占有制乃是社会结构及国家体制所凭借的伟大基础”。他还用以下一些无意中道出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暗示来解除他们的恐惧，他说道：“有人还责难我们，说我们

没有诚意让人民有真正的代表权”；有时又说：“有人还断言我们不过是想用另一种形式来保持贵族和地主的势力”。他甚至承认：在势必向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的同时，“改革法案的主要的、指导的原则”就是“取消选举特权”，即取消托利党人旧有的“腐朽的市镇”的选举特权，以利于辉格党人的新选区。（下院，1831年3月24日及1832年3月14日）

现在我们还是来谈谈勋爵阁下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吧。

1823年，法国军队根据维罗那会议的决定进入西班牙，要取消西班牙的宪法，把人民交给波旁昏君<sup>①</sup>及其周围的伪善僧侣进行残酷报复，当时，帕麦斯顿勋爵坚决拒绝任何“为了抽象原则而进行唐·吉珂德式的十字军征讨”的主张，拒绝采取任何“有利于人民”的行动，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民当年曾英勇抵抗拿破仑而拯救了英国。他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当时的对手辉格党人所说的话，生动而正确地反映了自从他当上了他当年的政敌的永久外交大臣之后一直奉行的对外政策。他说道：

“有人想叫我们在谈判中就进行威胁，而不管谈判一旦失败我们并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这一点。如果我们老谈战争而实际上想的却是中立，如果我们拿军队来威胁一下就在某种官方文件后面躲藏起来，如果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只是挑逗式地挥动宝剑，而到要打起来的时候却抓起笔来大写特写抗议书，那我们就成了爱吹牛的胆小鬼，就会遭到整个欧洲的鄙视，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下院，1823年4月30日）

最后，我们来谈谈关于希土问题的辩论，因为这次辩论使帕麦斯顿勋爵第一次有机会表现了他无论在内阁或下院都孜孜不倦坚

<sup>①</sup> 斐迪南七世。——编者注

定不移地维护俄国利益的无比才能。他像应声虫似的，一句接一句地重复着俄国惯用的什么土耳其人的野蛮、希腊正教的文明、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等等词句。但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他以外交大臣的身分极力反对任何谴责“海军上将科德林顿的可嘉行动”的企图（由于这种行动，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被击溃），同时他又承认：“这是同一个与我们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进行的战役”，这是“令人痛心的事件”。（下院，1828年1月31日）

他后来辞职后，便大肆攻击阿伯丁勋爵，说他执行俄国命令太慢。

“在履行我们对希腊的义务时，我们的速度和毅力表现在哪里呢？已经快要到1829年7月了，却还没有履行1827年7月签订的条约……不错，土耳其人是被赶出了摩里亚……但是为什么法国人在科林斯海峡的军事行动中中止了呢？……由于英国及其狭隘政策的干预，他们的继续挺进被阻止了……为什么联军没有对海峡北部地区采取像对南部地区一样的行动，没有立即占领应归希腊所有的全部领土呢？我认为，联军同土耳其就希腊问题谈判得太多了。”（下院，1829年6月1日）

大家知道，梅特涅公爵当时是反对俄国的侵略行为的，因此俄国外交官受命——请回忆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急电——把奥地利描绘成反对希腊解放和欧洲文明的死敌，而俄国外交的唯一目的据说就是解放希腊和拯救欧洲文明。勋爵阁下自然也依此行事：

“奥地利由于目光短浅及倒霉的偏见支配着它的政策，所以快降到二流国家的水平了。”

由于阿伯丁政策的摇摆不定，英国看来已成了

“米格尔、西班牙、奥地利和马茂德组成的那个链条上的主要一环……”

人民认为，所以迟迟不履行七月条约，与其说是由于畏惧土耳其反抗，不如说是由于刻骨敌视希腊的自由。”（下院，1829年6月1日）

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阿伯丁外交的反俄性质<sup>①</sup>：

“就自己来说，我对英国政府的某些急电是不满的；尽管这些急电，无疑地，读起来很动听，措词很优美，大体上还具有同俄国保持和睦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仍不免过分强烈地表示了英国对土耳其的感情，使有关方面看起来很容易觉得这些急电比原作者实际上想说的要意味深长得多……我希望英国做出坚定不移的决定，也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方针，即在这一战争中无论如何绝对不站到土耳其方面，并且要向土耳其开诚布公地声明达一点……世上有3件最无情的东西，这就是：时间、火和苏丹。”（下院，1830年2月16日）

为了使读者对勋爵阁下的亲希腊感情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这里我应该提请读者回忆一下某些历史事实。

俄国占据了塞凡湖边的哥克查地带（这无疑是波斯的领土），并且要波斯放弃它另一部分领土卡潘，作为俄国撤兵的交换条件。波斯拒绝了，于是俄国便发动反波斯的战争，并获得胜利，迫使波斯在1828年2月签订土库曼彻条约。按照这个条约，波斯应付给俄国200万英镑的赔款，并割让包括埃里温及阿巴萨巴德的要塞在内的埃里温省和纳希切万省。照尼古拉的说法，签订这个条约的唯一目的是划定双方沿阿腊克斯河的边界，硬说这是消除两国将来任何纠纷的唯一方法。但是他又拒绝把阿腊克斯河北岸的塔雷

---

<sup>①</sup> 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阿伯丁外交的反俄性质”作“半世纪以来，给俄国向君士坦丁堡的推进设下的唯一障碍，就是这样一句话：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为保持均势所必需。而帕麦斯顿在1830年2月5日声称：‘有一种政策把保持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完整推崇为维护基督教的和文明的欧洲的利益所绝对必需的原则，我反对这种政策。’他一次又一次地抨击了阿伯丁”。——编者注

什和莫甘两地归还波斯。最后，波斯还不得不在里海驻留舰队。这就是俄波战争的起因和结果。

至于希腊的宗教和自由，则俄国当时对这两件事关心之少，正像正教徒的神现在对于“圣墓”或著名的“圆顶”所在的寺院的钥匙由谁掌握的事情<sup>305</sup>很少关心一样。俄国的传统政策一向就是先煽动希腊人起义，然后则弃之不顾，让苏丹去对他们实行报复。俄国对爱拉多<sup>①</sup>的复兴实在太同情了，以致在维罗那会议上把希腊人看做叛乱分子，并且承认苏丹有权拒绝任何外国来干涉他与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沙皇还提出要“帮助土耳其政府镇压叛乱分子”——这样的提议自然是被否决了。这一试图失败之后，沙皇就向其他大国提出截然相反的建议：“出兵土耳其，在宫墙之下迫使它接受和约”。为了拿“共同行动”之类的东西束缚住沙皇的手脚，其他大国于1827年7月6日在伦敦同他缔结了条约<sup>306</sup>，条约规定彼此承担在必要时用武力来调解苏丹同希腊人之间的争端的义务。在该条约签订前几个月，俄国曾同土耳其缔结一个阿克尔曼条约<sup>307</sup>，按照这个条约，俄国应放弃它对希腊问题的任何干预。在阿克尔曼条约缔结前，俄国曾唆使波斯皇太子进犯奥斯曼帝国，并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企图使它对俄国翻脸。在此种种事件之后，英国大使就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的条款，他这一次的活动仍然是代表俄国及其他强国进行的。俄国利用这种种谎言与欺骗给土耳其所造成的困难，终于找到了发动1828—1829年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以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而结束，条约的内容在麦克尼耳的名著“俄国在东方的进展”中

---

① 希腊。1833年后它是希腊国家的正式名称。——译者注

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沙皇取得了阿纳帕、波提和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取得了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阿哈尔卡拉基和阿哈尔齐赫的要塞，另外还取得了多瑙河口诸岛；条约中还规定了这样一条：毁掉土耳其的茹尔日沃要塞并把多瑙河南岸数英里地区以内的土耳其人统统赶走……成千上万的阿尔明尼亚人的家庭从土耳其亚洲各省迁往沙皇境内，部分是强迫的，部分是受了僧侣的影响……沙皇为他在土耳其境内的臣民解除了对当地政府应负的一切义务，并以偿还军事开支和赔偿商业损失为名把巨额赔款加在土耳其政府身上，最后，还抓住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锡利斯特里亚不放，作为支付达笔赔款的抵押……俄国通过这项条约，使土耳其承认了3月22日的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苏丹对希腊只有宗主主权并从希腊取得年贡），同时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来促使希腊独立。希腊成了独立国，被任命为总统的是前俄国大臣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sup>308</sup>

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描绘这些事实的：

“俄土战争是由于土耳其侵犯了俄国的贸易及权利并违反了条约所致，这是千真万确的。”（下院，1830年2月16日）

帕麦斯顿成为辉格主义在外交部的体现者之后，又把这一观点完善化了：

“可敬的、勇敢的议员（伊文思上校）认为俄国从1815年到现在的行为一直是侵略别的国家。他着重指出俄国同波斯及土耳其的战争。但无论是对波斯还是对土耳其，俄国都不是进攻的一方；如果说俄国的势力由于波斯战争而增强，这并不是因为俄国本去就要这样……在同土耳其的战争中，俄国也不是进攻的一方。我不想一一列举土耳其对俄国的挑衅行为去使议院厌倦；但是土耳其把俄国臣民驱逐出境，扣留俄国船只，违反阿克尔曼条约的全部条款，并且在得到多次通知之后拒绝赔偿损失——这种种事实，我认为是决不能否认的。因此，如果一般来说进行战争有它正当理由的话，那末俄国就

有这样的理由对土耳其作战。尽管如此，俄国并没有获得任何新的领土，——至少是在欧洲。有几个地点曾在一个长时期被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只是地点，而多瑙河口根本不值一提！），亚洲黑海沿岸也有某些地方被占，但俄国同其他欧洲列强订有协定，根据协定，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不得导致它在欧洲的领土的任何扩张。”（下院，1832年8月7日）

读者现在该明白，为什么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的公开会议上要对勋爵阁下说“他不知道帕麦斯顿是代表谁”了吧。<sup>309</sup>

### 第三篇<sup>①</sup>

远近皆知子爵阁下是仗义保护波兰人的。每年当“亲爱的、十分乏味的”达德利·斯图亚特<sup>②</sup>引着代表团前来见他时，他从未放过一次机会向他们表示他对波兰命运的哀伤，而斯图亚特也是一位

“值得尊敬的人，他发表演说，执行决议，表决议呼书，陪伴代表团，随时随地都对相当的人抱着相当的信任，必要时还会三呼女王陛下‘万岁’”。

帕麦斯顿勋爵于1830年11月开始到外交部视事的时候，波兰人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武装斗争。而到1831年8月8日，汉特先生就代表韦斯明斯特联合会向下院提出为波兰人呼吁的请愿书，要求“撤销帕麦斯顿勋爵在王国内阁中的官职”。休谟先生

---

① 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在伦敦最近举行的一次抗议英国内阁在当前俄土冲突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大会上，一位先生竟敢专门发言批评帕麦斯顿勋爵，因而遭到极为愤怒的听众的呵叱，不得不默不作声。显然，与会者认为，要说内阁里有俄国的朋友，则这个朋友决不是子爵阁下；这要是有人当众宣布勋爵阁下已就任首相，人们一定会热烈欢呼的。对这样一个不老实的虚伪的人如此信赖，再一次说明公众多么容易为他的假相所迷惑，同时再一次证明必须揭去这个极力阻挠人类自由事业的狡猾敌人的假面具。为此我们打算以近25年来的历史和一些议会辩论为依据，继续阐述这个老练演员在欧洲时代剧中扮演的真实角色。”——编者注

② 俏皮话：《dear, dully deadly》意思是“亲爱的、十分乏味的”，“乏味的”一词与达德利（Dudley）这个名字同音。——编者注

在同一天也断定，勋爵阁下的沉默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根本不想为波兰人做什么事情，它想把波兰人的命运交给俄国处理”。帕麦斯顿勋爵反对这种说法，他说，“现存条约赋予我们的一切义务，政府永远不会忽略”。那末，在他看来，现存条约赋予英国的义务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他本人回答说：

“俄国领有波兰的权利有维也纳条约作了规定”（下院，1833年7月9日）

但该条约规定领有波兰要以沙皇遵守波兰宪法为条件。可是，

“仅英国参加维也纳条约这一事实，并不说明我们必须保证俄国不违反这个条约”。（下院，1834年3月25日）

总之，保证条约决不是说保证条约被遵守。米兰人正是这样回答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我们确实向您宣过誓，但请回忆一下，我们可并没有宣誓遵守誓言。”<sup>310</sup>

不过，维也纳条约有一点是很好的。它使缔约一方的不列颠政府

“有权对任何违反条约的行为持有自己的意见并表示这种意见……维也纳条约各缔约国有权要求波兰宪法不受侵犯，而我个人的意见也是这样，这一点我并未向俄国政府隐瞒过。早在华沙被占领和军事行动的结果明朗化以前，我就预先把这个意见通知了俄国政府。华沙陷落后，我再次作了通知。但是俄国政府在这方面仍然抱着另一种看法”。（下院，1833年7月9日）

总之，他事先就冷静地估计到波兰要被攻陷，并且等待这一个适当时机来表示和发挥他对维也纳条约某些条款的意见，因为他已经确信，宽宏大量的沙皇力图以武力剿灭波兰人民只不过是给波兰的宪法作一个应有的安排，尽管这个宪法在波兰人民

还拥有许多反抗手段的时候就被他践踏过。与此同时，勋爵阁下还谴责了波兰人，说他们不该“采取不恰当的、在他看来无法为之辩解的步骤，即推翻了皇帝”。（下院，1833年7月9日）

“我甚至还可以说，波兰人是进攻的一方，因为斗争是他们先开始的。”（下院，1832年8月7日）

当人们对波兰会被彻底消灭这件事由耽心变为惊恐时，他声称：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要消灭波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对于这种试图的任何耽心都是多余的。”（下院，1832年6月28日）

后来有人向他提起他用这种方式发表的这些与众不同的设想，但他却硬说人们误解了他，实际上他说这些话并不是从政治上说的，而是从人们的生活上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俄国皇帝

“无论名义上不是实际上都不可能消灭居住在被瓜分的波兰王国里的几百万人”。（下院，1836年4月20日）

当议院在援波运动期间打算进行干预时，帕麦斯顿就说他应该负起他的大臣职责。可是当人们耽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时，他却冷冷地说，

“议院的任何表决丝毫打动不了俄国，使之取消决定”。（下院，1833年7月9日）

当华沙陷落后俄国人的残暴行为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帕麦斯顿却建议议院要对俄国皇帝尽量温和。他说，

“他对辩论时使用的某些词句比任何人都感到遗憾”（下院，1832年6月28日），“当今俄国皇帝是一位思想高尚的人”，“如果说在某些场合，俄国政府对波兰人曾经过于残暴，那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俄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遭

到忽视的证明，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那种场合，这位皇帝不过是经不起他人的影响，而不是受自己自发情感的支配”。（下院，1833年7月9日）

当波兰命运业已决定，而土耳其帝国由于穆罕默德—阿利的叛乱而势将崩溃的时候，帕麦斯顿却要议院相信，“局势的发展一般令人非常满意”。（下院，1832年1月26日）

当有人提议接济波兰流亡者时，

“他极为不愉快地表示反对给这些人金钱补助；因为，尽管自然的、自发的感情会使每个慷慨的人都同意这样做，但给这些不幸的人任何金钱补助都是和他的职责不相容的”。（下院，1834年3月25日）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位如此心慈的人却让不列颠人民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镇压波兰的开支。

勋爵阁下竭力要向议会隐瞒有关波兰惨剧的全部官方文件。但尽管如此，仍有人在下院作了声明，这些声明充分说明了他在那严重关头所起的作用，而他对这些声明却从未试图加以反驳。

波兰革命爆发后，奥地利领事并没有离开华沙，而奥地利政府甚至决定派波兰代理人瓦列夫斯基先生前往巴黎，授命他同英法两国政府就波兰王国的复兴问题进行商谈。土伊勒里宫<sup>①</sup>宣称，“如果英国同意这个计划，它愿同英国共同行动”。帕麦斯顿勋爵拒绝了这项建议。1831年法国驻圣詹姆斯宫的大使达尔朗先生正式提出英法共同行动的计划，但遭到勋爵阁下十分明确的拒绝，并接到勋爵阁下的照会，照会中说，

“在波兰问题上进行友好调停会遭到俄国拒绝。各大国不久以前就拒绝了法国的这项建议。在调停遭到俄国拒绝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宫廷的干涉只

---

<sup>①</sup> 即法国宫廷。——译者注

能带有强制性性质，但圣詹姆斯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之间的亲切友善关系不容许大不列颠国王陛下进行这样的干涉。采取这样的行动来对付一位有**不容争辩的权利的君主**并指望获得成功，这样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这还不算。1848年2月23日，安斯提先生在下院作了如下声明：

“瑞典动员了它的舰队，要想采取于波兰有利的牵制行动，并收回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被夺去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我驻斯德哥尔摩宫廷的大使接到勋爵阁下反对这一计划的指示，于是瑞典停止了它的军事准备。波斯宫廷也为着同样目的调派了军队，由波斯皇太子率领，已向俄国国境进军了三日。驻德黑兰宫廷的大使馆秘书约翰·麦克尼耳爵士马上去追赶皇太子，尽管他同大本营有三天路程的距离，到底还是被他赶上了；他按照勋爵阁下的指示并以英国名义威胁波斯说，只要皇太子再向俄国边界进一步，英国便立即参战。在阻挠土耳其恢复战争一事上，勋爵阁下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

伊文思上校曾要求把有关普鲁士抛弃它那在俄波战争中中立伪装的材料提供出来，帕麦斯顿勋爵在反驳这个要求时说，

“大不列颠大臣们对这一斗争不能不深感遗憾，这一斗争如能结束，他们将极为满意。”（下院，1831年8月16日）

当然，他想看到这一斗争尽快地结束，而普鲁士和他也有同感。

后来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亨利·加利·奈特先生曾把勋爵阁下对波兰起义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概述：

“只要问题一涉及俄国，勋爵阁下的行动就表现出**奇异的不彻底性**……在波兰问题上，勋爵阁下总是让我们失望。不妨回忆一下：当人们坚决要求他运用个人的影响做些于波兰有益的事情时，他满口承认波兰的事业和我们的不平的正义性，但却对我们说：诸位现在千万要沉住气，我们马上就要派一位以自由主义思想闻名的大使去，诸位可以相信我们会妥善安排一切；要是诸位激怒了我国大使将与之办交涉的那个强国，只会妨碍进行谈判，所以

我请诸位听我劝告，现在要保持镇静；请诸位相信，这样做会大有好处的。我们相信了这些保证；自由主义大使也去了；至于他是否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谈判，我们就再也知道了。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勋爵阁下的漂亮话而已。”（下院，1840年7月13日）

所谓的波兰王国从欧洲地图上消逝之后，波兰的民族独立性还剩下一个幻影，这就是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在法兰西帝国崩溃后的一片混乱时期，沙皇亚历山大不仅是想征服华沙大公国，而是干脆把它没收；自然，他当时是力图把它连同被波拿巴划归大公国的克拉科夫一起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曾一度领有克拉科夫的奥地利很想把它收回。沙皇一看，他不能把克拉科夫弄到手，但他又不甘把它让与奥地利，所以就提议把克拉科夫变成一个自由城市。为此维也纳条约第六款曾规定：

“克拉科夫市及其所属地区永远为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护下的自由、独立和完全中立的城市。”

维也纳条约第九款规定，

“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宫廷都应尊重，并要求别国永远尊重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及其所属地区的中立。任何军队任何时候不得以任何借口开进这一地区”。

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刚刚结束，俄国军队马上出乎意外地开进克拉科夫，占倾该城达两月之久。然而这种行为当时被看做因战争关系而采取的临时必要步骤，而且在那种动乱时期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1836年，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以所谓必须强迫克拉科夫当局交出五年前波兰革命的参加者为借口再次占领克拉科夫。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废除了，最高权力为三国驻当地的领事所掌握，警察局被奥地利密探控制，参议会被封，法院被解散，大

学由于附近各省学生不许前来而陷于停顿，自由城市同周围各国的贸易也中断了<sup>①</sup>。

1836年3月18日有人就克拉科夫被占领一事向子爵阁下提出质问，他说，这种占领不过是暂时的。他对他的北方三盟国的行动的解释是这样宽容和偏袒，以致连他自己也感到必须适可而止，必须截断自己流畅的讲话，来作如下庄重的声明：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袒护那些我应当予以批评和谴责的步骤。我所以要提这些事实，只是因为这些事实即使不能证明强占克拉科夫是对的，那末也许可以使之得到一些谅解……”

他承认维也纳条约规定上述三国事先未经英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但是，

“可以有充分理由说，它们已经不然而然地对我国的公正与坦率作了应有的估价，因为它们预计到我们永远不会赞同这种行为”。

但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认为，有一个比“不提抗议”更好的办法使克拉科夫保全，于是他在1836年4月20日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政府派一个代表到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去做领事，因为那里已经有北方三强国的领事。英法两国领事同时到达克拉科夫将是一件大事<sup>②</sup>。子爵阁下看到下院大多数都赞同这一建议，

① 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废除了……”这几句话作“勋爵阁下仍以他在1836年及1840年所断言的‘很难使我们的抗议具有实效’为依据拒绝对此提出任何抗议。但是，当奥地利把克拉科夫完全侵吞时，他却认为抗议是‘唯一有效的办法’”。——编者注

② 狂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一件大事”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至少会使勋爵阁下不会到后来声称他根本没有想到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会在克拉科夫进行的阴谋”。——编者注

就向议院郑重担保说，政府有“想派一个领事级的代表去克拉科夫的意图”，从而迫使帕特里克·斯图亚特收回自己的建议。1837年3月22日，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向他提起他的这个诺言，勋爵阁下却回答说，他“改变了自己的意图，没有派领事级的代表到克拉科夫去，现在也没有这种意图”。于是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声明，他要提出建议，要求对这种奇怪的声明作一个书面解释；但是子爵阁干脆就用下面的办法使这项提案无法通过：他不出席议会会议，使会议不得不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sup>①</sup>。

1840年，“暂时”占领状态仍然存在，因此克拉科夫的居民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请愿书，就中提到：

“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及其居民的灾难深重，因此下面署名者和他们的同市居民现在只有指望英法两国政府能给以强有力的、文明的保护。他们现在的处境使他们有权呼吁维也纳条约的每个缔约国进行干涉。”

1840年7月13日有人就克拉科夫的这一请愿书向子爵阁下提出质问，他声称：

“在奥地利和不列颠政府看来，克拉科夫的撤兵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谈到维也纳条约遭到破坏的问题，他的话是：

“即使英国打算动武，也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勋爵阁下说了这话以后的第三天就同俄、奥、普三国签订了使英国军舰不能进入黑海的条约<sup>311</sup>，——大概是为

---

<sup>①</sup> 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的话：“他就这样始终没有作出解释，说明他为什么或根据什么理由不履行他的诺言，并且顺利地挡回了每一个想从他那里弄到有关的书面材料的尝试”。——编者注

了使英国在这一地区也无法实现任何行动吧。这恰好是在勋爵阁下恢复了英国同上述列强的反法神圣同盟的时候。谈到英国贸易因克拉科夫被占领而受到的损失时，勋爵阁下推诿说“向德国输出的总额并未减少”。这个论据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公正指出的那样，同克拉科夫毫无关系。关于他在这一问题以及派领事级的代表去克拉科夫一事上的真实意图，他说，

“可敬的反对派代表们利用了他打算派英国领事去克拉科夫这一个不成功的声明（声明是勋爵阁下为了避免对他抱敌对情绪的议院的斥责而于1836年作的），这种手段使他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因而他有权坚决拒绝对这类问题作任何回答，以免再次遭到这类不公正的抨击。”

1846年8月17日他说，

“欧洲各大国是否遵守并履行维也纳条约，根本不取决于有没有一个领事级的代表驻在克拉科夫。”

1847年1月28日人们再次要求他提出书面材料来说明他拒不委派不列颠领事去克拉科夫的原因，他声称，

“这个问题同克拉科夫被吞并问题的辩论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他看不出就这个只有暂时意义的事端重新展开激烈争论有什么好处。”

可见，他是一直坚持着他早在1837年3月17日对于向议会提出官方文件一事所发表的看法的：

“如果这些文件涉及的是目前尚在研究的问题，那末提供出来是危险的；如果涉及的是过去的问题，那末显然不会有什么用处。”

克拉科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贸易上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不列颠政府是非常清楚的。驻华沙的领事杜普拉上校曾向政府报告说：

“克拉科夫升为独立国之后，一直是英国通过黑海、莫尔达维亚、加里西亚以至的里雅斯特运来的大宗商品贮藏所，这些商品是运到克拉科夫之后

再分运到周围各国去的。铁路线将逐渐把它同波希米亚、普鲁士、奥地利……的重要铁路干线连接起来。它还是亚得利亚海和波罗的海之间重要铁路线的中心点。它还要敷设一条直通华沙的铁路……可以有把握地预期，列万特<sup>①</sup>以至印度和中国的每个重要地点都将同亚得利亚海连接起来，因此决不能否认克拉科夫这个连接东西两大陆的大铁路网的中心对于英国贸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不得不在下院承认 1846 年的克拉科夫起义<sup>312</sup>是三强国故意挑拨起来的。

“我认为，奥地利军队起先是应克拉科夫政府的请求开进克拉科夫领土的。但后来这些奥地利军队撤走了。撤离的原因至今尚未加以解释。克拉科夫政府和权力机关随同他们一齐撤离；撤离所造成的直接的后果，至少是最近的后果，就是克拉科夫临时政府的成立。”（下院，1846 年 8 月 17 日）

1846 年 2 月 22 日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也随之侵入。同月 26 日泰尔诺夫的地方长官贴出告示，号召农民打杀地主，并答应给他们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报酬”。紧接着这个告示就发生了加里西亚人的大破坏，杀死了近 2000 名地主。3 月 12 日出现了奥地利的告示，号召“忠君的加里西亚人起来维持秩序和保护法律，消灭秩序的敌人”。在 4 月 28 日官方的“日报”<sup>313</sup>上，弗里德里希·冯·施瓦尔岑堡公爵声明“所发生的事件曾得到奥地利政府的批准”，而奥地利政府无疑是同俄国和沙皇的候从普鲁士按照共同的计划行动的。在所有这些丑事做出之后，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该是在下院作如下声明的时候了：

“我过于相信奥、俄、普三国政府会根据公正的原则办事并尊重权利，实在没有料到它们会有意对克拉科夫采取这种做法，这不是克拉科夫根据条约载明的义务有权指望的做法。”（下院，1846 年 8 月 17 日）

<sup>①</sup> 从前西欧对地中海东岸各地的总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近东”。——译者注

勋爵阁下当时心中记挂的只是怎样才能把即将结束会议的议会敷衍过去。他硬要下院相信“不列颠政府方面将尽一切努力保证维也纳条约各项条款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当休谟先生对于“帕麦斯顿勋爵是否打算叫奥、俄军队撤离克拉科夫”这点表示怀疑时，勋爵阁下要求议会不必重视休谟先生的意见，因为最可靠的情报掌握在他手里，他相信克拉科夫被占领是“暂时的”。1846年的议会就和后来1853年的议会一样，被他敷衍过去了，但奥地利1846年11月11日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版图的宣言很快也就发表了出来。1847年1月19日议会重新召集，这时议会从国王敕语中知道，克拉科夫已经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了英勇的帕麦斯顿的抗议书。但为了使这种抗议不起任何作用，勋爵阁下这时想出一条妙计，使英国在西班牙的婚姻问题<sup>314</sup>上卷入同法国争执的漩涡，——这场争执几乎酿成两国的冲突。这一政策遭到斯密斯·奥勃莱恩先生的严厉批评。法国政府曾建议帕麦斯顿共同抗议克拉科夫的被侵占。对此，诺曼比勋爵按照子爵阁下的指示回答说，奥地利干的非法行为，即吞并克拉科夫，并不比法国为蒙潘西埃公爵与西班牙公主联姻一事更为严重，因为前者违犯的是维也纳条约，后者违犯的则是乌特烈赫特条约<sup>315</sup>。可是，乌特烈赫特条约虽于1782年一度恢复，但在反雅各宾战争中被彻底废除，从1792年起就完全失效。这一点在议会里谁也不比勋爵阁下知道得更清楚，在辩论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封锁的问题时他本人就曾向议会宣称<sup>316</sup>：

“乌特烈赫特条约的条款早就由于战争的动荡而失效，只是有关巴西和法属圭亚那之间的境界一节例外，因为该节已直接列入维也纳条约。”

勋爵阁下为反对俄国侵犯波兰所做的努力，还不止于此。

英、荷、俄三国订有一个奇妙的协定，即所谓**俄荷贷款协定**。反雅各宾战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曾向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借过款。波拿巴失败以后，尼德兰国王<sup>①</sup>“想给同盟国以适当报酬，答谢它们使他的国家获得了解放”和使他兼并了他对之没有任何权利的比利时，于是建议同俄国——其他列强都照顾俄国而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因为俄国当时在财政上遭到严重困难——签订条约；条约规定他分期代俄国偿还欠霍普公司的2500万盾的债款。英国为了补偿对荷兰的掠夺——侵占了荷兰在好望角附近的殖民地、以及迭麦拉拉、埃塞基博及贝尔比斯等地，于是也加入这一协定，并承担一部分对俄国的补助。这项协定列入维也纳条约，但附有一个**特定条件**：“在所有债务未偿清以前，一旦荷兰和比利时的联合遭到破坏，则贷款立即停止支付”。当比利时由于革命<sup>317</sup>而脱离荷兰的时候，荷兰当然也就不再向俄国支付自己那一份<sup>②</sup>。另一方面，正如赫里斯先生证实的那样，俄国也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可以提出要英国方面继续代为偿还债务的任何要求”。（下院，1832年1月26日）

然而，帕麦斯顿勋爵却认为下述情况是很自然的：

“俄国那时由于支持比利时同荷兰的联合得到酬报，这时是由于支持这两个国家的分裂而得到酬报。”（下院，1832年7月16日）

他悲伤地呼叫要忠实于条约，首先是维也纳条约。他极力设

---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自己那一份”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的话：“因为贷款协定规定比利时各省是荷兰不可分割的领土，但现在荷兰已经不再享有这些省份的主权了”。——编者注

法同俄国签订了 1831 年 11 月 16 日的新协定，在协定的序言中直截了当地说，该协定是“根据维也纳会议通过的现在仍然完全有效的一般性决议”签订的。

当俄荷贷款协定列入维也纳条约时，威灵顿公爵曾大加赞扬：“这是卡斯尔里勋爵在外交上的杰作，因为债务迫使俄国遵守维也纳条约”。之后，当俄国拒绝遵守维也纳条约，占领了克拉科夫的时候，休谟先生建议不再从不列颠国库中拨款给俄国。但是子爵阁下认为，尽管俄国可以对波兰违反维也纳条约，而英国对俄国仍旧应该继续遵守条约。

但这还不是勋爵阁下行为中最令人惊奇的事实。比利时革命爆发以后和议会批准给俄国新的贷款以前，帕麦斯顿就已经以偿还英国在 1815 年欠的旧债务为名，承担了俄国在对波战争中的开支。尽管从英国最著名的法学家、现在的圣莱昂纳兹勋爵爱·萨格登爵士的权威声明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疑问，政府没有任何权利支付哪怕一个先令”（下院，1832 年 1 月 26 日），但他仍然这样做了。我们还可以援引权威人士罗伯特·皮尔爵士如下的一句话：“勋爵阁下没有法定权力支付这笔款项。”（下院，1832 年 7 月 12 日）

总之，我们我在明白了勋爵阁下为什么不论在什么场合总要重复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波兰问题的辩论更使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头疼了”<sup>①</sup>。

---

① 在 1853 年 11 月 4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 1853 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本篇是以下面这样的话结尾的：“他目前对于他始终不渝地维护其利益的那个国家的侵略意图所要进行的反对究竟有几分真实，诸位读者现在可以作一公正评价”。——编者注

## 第四篇<sup>①</sup>

子爵阁下有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自我吹嘘的话题，那就是他对整个大陆的立宪自由有贡献。的确，多亏了他的发明创造，世界上才有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3个“立宪”王国——3个只能同“浮士德”中瓦格纳博士的何蒙古鲁士<sup>②</sup>相比的政治幻影。一位科堡氏<sup>③</sup>操纵的胖女人唐娜·玛丽亚·达·格洛丽亚压迫下的葡萄牙

“应被看做是欧洲的独立国之一”。（下院，1837年3月10日）

就在子爵阁下说这话的同时，有6艘英国战列舰在里斯本海

① 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许多人期待着英国政府在现已开始的俄土战争期间最终会放弃那种敷衍办法和毫无结果的谈判，而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迫使俄国掠夺者放弃他们的掠夺物以及他们幻想统治世界的野心。如果从抽象的可能性和抽象的政策来看，这种期待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但是，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下述的种种事实，就会发现这种期望是很少有现实根据的，而这些事实，正是那位被看做最坚决反对俄国专制政府对欧洲进攻的英国大臣过去干出来的。的确，英国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满政府在俄土冲突中采取的政策，但他们却深信事情一旦由帕麦斯顿勋爵去做，就会完全两样。希望这些人注意子爵阁下的生平，让我们有可能比较详细地谈一谈1832—1847年这一充满事件的阶段，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训”。——编者注

② 何蒙古鲁士是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纳用中世纪的炼金术制造出来的“人造矮人”，但只是一个在曲颈玻璃瓶里面的能发光的胎儿形，从玻璃瓶里蜕化不出来，也不能发育。——译者注

③ 斐迪南—奥古斯特。——编者注

港抛下了锚，奉命前来保卫唐·彼得鲁的“独立”女儿免受葡萄牙人民的伤害，并帮助她废除她曾经宣誓要保护的宪法。被委托给另一个玛丽亚<sup>①</sup>（她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永远也成不了抹大拉的马利亚）所统治的西班牙，

“正以欧洲王国中一个美好的、繁荣的、甚至可畏的国家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帕麦斯顿勋爵 1837 年 3 月 10 日在下院的演说）

当然，对西班牙有价证券持有者来说是可畏的国家。甚至把伯利克里和索福克勒斯的祖国交给巴伐利亚的一个白痴小孩来挂名统治，勋爵阁下也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国王奥托系来自施行自由宪法的国家。”（下院，1832 年 8 月 8 日）

巴伐利亚这个德国巴士底狱居然有自由宪法！这话甚至超出其他一些铺张的修辞，例如西班牙使人产生“合理的期望”、葡萄牙是个“独立国家”等等词句的 *licentia poetica*（诗的特权）。至于比利时，帕麦斯顿勋爵为它所做的事到头来无非就是让它负担了一部分荷兰的债款，割走了它的卢森堡省并把科堡王朝强加在它头上。谈到同法国的 *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可以说，这种诚意协商从 1834 年帕麦斯顿想使它具有完备形式而建立了四国同盟 318 的时候起就开始不起作用了。我们已经看到勋爵阁下在波兰问题上曾经多么有成效地利用了这种协商关系，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种关系在他手中会变成什么东西。

有一些事实虽然不大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但却成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清晰标志，1833 年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占领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实。

<sup>①</sup>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编者注

俄国的宿愿终于实现了。来自冰冷的涅瓦河畔的野蛮人把繁华的拜占庭和阳光煦丽的波斯普鲁斯海岸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自封的希腊皇帝后裔——虽然是暂时地——占领了东罗马。

“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决定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土耳其的命运。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虽然是为了保卫它(?)，但这件事本身却是对土耳其的独立地位的决定性的一击，即使俄国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塞拉尔宫<sup>①</sup>的上空也不过如此。”(罗伯特·皮尔爵士 1834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

土耳其政府在 1828—1829 年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因而在它的臣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于是，正像东方的各个帝国中通常在最高权力削弱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帕沙们就成功地造起反来。1831 年 10 月，苏丹<sup>②</sup>和在希腊起义时曾支持过土耳其政府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之间就已开始冲突。1832 年春，穆罕默德—阿利的儿子伊布拉希姆—帕沙带领军队开进了叙利亚，经过霍姆斯会战占领了该省，然后越过托罗斯山，在科尼亚会战中消灭了土耳其最后一支军队后，就直扑伊斯坦布尔。1833 年 2 月 2 日苏丹被迫向圣彼得堡求援。2 月 17 日，法国海军上将鲁散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之后，他致函土耳其政府，答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其中包括土耳其政府拒绝俄国援助的条件，采取措施使帕沙撤兵。但是因为鲁散没有人支持，当然他也就无力对付俄国了。“是你叫我来，我就来了。”<sup>③</sup> 2 月 20 日，俄国舰队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运送一大批俄军在波斯普鲁斯海岸登陆，包围了首都。俄国对保卫土耳其是这样热心，以致同时还派了一名俄国军官去通知特拉比

① 土耳其皇宫。——译者注

②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③ 莫札特的歌剧“唐璜”中骑士团长的雕像所说的话。——编者注

曾德和埃尔斯伦的帕沙说，一旦伊布拉希姆的军队要向埃尔斯伦进发，这两个地方就必须立即交由俄国军队保卫。1833年5月末，奥尔洛夫伯爵由圣彼得堡来到，对苏丹说他随身带来一个小纸片请苏丹签署，苏丹不必同他的大臣们商议，也无需让任何一个驻土耳其政府的外国使节知道。于是就产生了有效期为8年的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条约规定，土耳其政府同俄国建立攻守同盟，未经俄国同意不得与其他国家签订任何新的条约，并确认以前的各项俄土条约，特别是阿德里安堡条约。附在条约中的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政府必须

“为了俄帝国朝廷的利益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即不让任何外国军舰以任何借口开进海峡。”

沙皇得以用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且由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签订而把奥斯曼帝国的宝座从君士坦丁堡搬到圣彼得堡来，他究竟应该感谢谁呢？不是别人，而是爱尔兰贵族、皇帝陛下枢密院委员、巴尼大十字荣誉勋章荣膺者、议会议员、陛下首席外交大臣、坦普尔男爵亨利·约翰·帕麦斯顿子爵阁下。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1833年7月8日签订的。1833年7月11日，亨利·利顿·布尔韦尔先生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向议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叙利亚问题的文件。勋爵阁下对这一提案表示反对，

“因为这类文件所涉及的问题尚未结束，而这一问题的性质如何完全要看结局如何而定。既然结果还不知道，提案也就为时过早”。（下院，1833年7月11日）

布尔韦尔先生责备勋爵阁下不该不去保卫苏丹反对穆罕默德—阿利，让俄国军队无阻拦地向前推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勋

勋爵下就第一次运用了他后来又有所发展的辩解与自供交织在一起的独特体系。现在我要把这个体系的 *membra disjecta* (断片) 收集到一块来。

“我不能否认，苏丹在去年下半年曾向英国请求过援助。”(下院，1833年7月11日)“8月间土耳其政府正式请求援助。”(下院，1833年8月24日)不，不是8月间。

“土耳其政府请求给予海军援助是在1832年10月间。”(下院，1833年8月28日)

不，不是10月间。

“土耳其政府请求援助是在1832年11月间。”(下院，1834年3月17日)

勋爵下如此轻易地更改土耳其政府向他求援的日期，就好像福斯泰夫把他背后袭击他的忽而穿着漆布衣裳忽而穿着肯德尔草缘衣裳的家伙们的人数改来改去<sup>①</sup>一样。是的，他不能否认土耳其政府曾拒绝俄国的武装援助并来求助于他的事实。他拒绝了土耳其政府的请求。于是土耳其政府再度求助于勋爵下。土耳其政府先是派马夫罗格尼先生去伦敦，后来又派纳梅克-帕沙请求派一支海军分舰队援助，并且答应苏丹将负担这支分舰队的全部费用，将来还要给予不列颠臣民以新的贸易特权和优先权来报答这种援助。当时俄国对勋爵下会表示拒绝这一点拿得这样准，竟至附和了向勋爵下求援的土耳其全权代表的请求。这是勋爵下本人对我们说的，他说：

“公正心使我不能不说，俄国对英国政府给予这种援助根本没有表现任何嫉妒和猜疑；当请求书尚在审查的时候，俄国大使就正式来见我，说他已经

<sup>①</sup>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

知道了土耳其的这一请求，并且说，俄国也愿意看到土耳其帝国得到支持，保存下来，因此诸位大臣如有意使这一请求得到实现，做出决定，俄国将深感满意。”（下院，1833年8月28日）

但是，尽管土耳其找到俄国这样一个毫无私心代它求情的人，勋爵阁下对土耳其政府三番五次的请求仍无动于衷。这时土耳其政府当然也就恍然大悟要它走哪条路了。它知道，它已法定非要请狼来看守羊不可。但它还是犹豫不决，一直过了3个月，它才决定接受俄国的援助。勋爵阁下说道：

“大不列颠对于俄国给予这种援助从未表示过不满；相反，它对于土耳其不管从哪里终于得到了实际援助而感到高兴。”（下院，1834年3月17日）

但是不管土耳其政府向帕麦斯顿勋爵求援是在哪一天，他都不能不做如下的自供：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认为可以进行干涉，则入侵军队的前进就会被阻止，而俄军也就不会应邀开进土耳其。”（下院，1833年7月11日）

他究竟为什么不“认为可以”进行干涉，挡住俄国人呢？

首先他借口**时间不够**。但是，据他本人的话，土耳其政府与穆罕默德—阿利之间的冲突早在1831年10月间就已经开始，而决定性的科尼亚会战到1832年12月21日才打起来。难道他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就没有时间吗？伊布拉希姆—帕沙在1832年7月的大会战<sup>319</sup>中赢得了胜利，从7月到12月帕麦斯顿仍旧没有时间。他在整个这一阶段一直是在等待土耳其政府的**正式**请求，而正式请求照他的最后一种说法是在11月3日才提出来。我们要同罗伯特·皮尔爵士一起来问：

“难道他对列万特发生的事件毫无所知，非要等正式请求来到不可吗？”（下院，1834年3月17日）

而且,从提出正式请求的 11 月起到 2 月底——俄国出兵最早不过 2 月 20 日——为止一共也有 4 个月之久。那末究竟是为为什么他在这一时期毫无作为呢?

他还有更好的借口。

埃及帕沙不过是叛臣,而苏丹是享有主权的君主。

“因为这是臣子反对他的君主的战争,而且这个君主又是英国国王的同盟者,所以同帕沙有任何来往都是不合体统的”(下院,1833 年 8 月 28 日)

总之,是礼仪不让勋爵阁下去阻止伊布拉希姆的军队。也是礼仪不许他指示驻亚历山大里亚的领事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影响穆罕默德—阿利。勋爵阁下像西班牙大贵族一样,宁愿让女王被烧成灰烬,也不愿触犯礼仪碰一碰她的裙子。但是可惜得很,勋爵阁下在 1832 年就曾未经苏丹同意向苏丹的“臣子”派去了领事和外交代表,并且同穆罕默德—阿利签订条约,修改了现存的贸易和关税规章及协定,并且做了新的规定。他做这些事情既没有考虑要预先征得土耳其政府的同意,也没考虑事后土耳其政府是否批准。(下院,1848 年 2 月 23 日)

关于这一点,子爵阁下当时的上司格雷伯爵告诉我们说,

“英国在这一时期同穆罕默德—阿利有广泛的商业来往,破坏这种关系于英国不利”。(上院,1834 年 2 月 4 日)

怎么,竟同“叛臣”有商业来往!

但是大家要知道,勋爵阁下的舰队当时正在杜罗河和塔霍河上忙着,他的舰队要封锁些耳德河,要起催生婆的作用,来减轻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这些立宪王国诞生时的痛苦。所以他当时连一艘军舰也派不出去。(下院,1833 年 7 月 11 日和 1834 年 3 月 17 日)

而苏丹始终坚持的正是要求给予海军援助。我们姑且就承认勋爵阁下的论据吧，假定他确实连一艘军舰也没有。但是一些很有权威的人士都肯定地对我们说，勋爵阁下一艘军舰也不用派，只要他说一句话<sup>①</sup>。这些权威人士中有那位曾经在纳瓦林消灭了土耳其舰队的海军上将科德林顿。他证实：

“当年，在土耳其面对着撤出摩里亚半岛的问题的时候，穆罕默德—阿利就曾体会到我们出面说话的分量。当时土耳其政府命令他抗拒一切撤出摩里亚半岛的要求，并要他以人头来作担保。他虽然也作了适当的抗拒，但毕竟明智地作了让步，撤出了摩里亚半岛。”（下院，1836年4月20日）

其次，威灵顿公爵声言，

“如果在1832年1833年议会开会期间就明确地告诉穆罕默德—阿利，不许他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行斗争，战争就会结束，我们也不会冒险让俄皇获得派海陆军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机会了。”（上院，1834年2月4日）

但是还有一位更可靠的权威人士，这就是勋爵阁下本人。他断言：

“陛下的政府虽然没有满足苏丹关于给予海军援助的请求，但是英国毕竟给了他道义支持。不列颠政府向埃及帕沙和统率小亚细亚埃及军队的伊布拉希姆—帕沙所作的声明，对于苏丹同埃及帕沙达成协议（在居塔希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结束了战争。”（下院，1834年3月17日）

最后，得比勋爵——当时还被称为斯坦利勋爵，帕麦斯顿的内阁同僚——声言他可以

---

① 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只要他说一句话”这句话后面是：“以便约束穆罕默德—阿利的野心，阻止伊布拉希姆—帕沙的军队的推进。这是海军上将马洪说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他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期间在外交部任职的时候”。——编者注

“大胆断言，穆罕默德—阿利的继续推进所以停了下来，完全是由于英法两国发表了明确的声明，不许他的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下院，1834年3月17日）

总之，照得比勋爵和帕麦斯顿勋爵本人的说法，并不是俄国的分舰队，也不是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军队，而是不列颠驻亚历山大里亚的领事的**明确声明**，迫使伊布拉希姆停止他向君士坦丁堡的胜利进军，促成了居塔希亚的协议，协议的结果是穆罕默德—阿利除埃及外还获得了叙利亚帕沙辖区阿达纳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勋爵阁下认为可以准许他的驻亚历山大里亚领事作这一明确声明，只是在土耳其军队被消灭之后，当时君士坦丁堡已经到处都是哥萨克，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已为苏丹所签署并被沙皇放进口袋里去了。

如果说时间不够和军舰缺乏使勋爵阁下不能给苏丹以援助，而过分的拘礼又妨碍他去阻止帕沙的行动，那末他至少可以给他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指示，要他反对俄国势力过分加强，并竭力把俄国势力限制在更狭小的范围内。他是否这样做了呢？没有！恰好相反，为了不妨碍俄国的行动自由，勋爵阁下竟然要在最危急的时期根本不在君士坦丁堡留驻大使。

“在到7月8日为止的6个月过程中，驻土耳其大使的地位和权威比驻任何一国的使节的地位和权威都更为重要，比在任何时期都更能有效地利用。”（马洪勋爵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告诉我们说，不列颠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离开君士坦丁堡是在1832年9月间，当时驻那不勒斯的公使庞森比勋爵在11月间受命接替他的职位；“在做赴任之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的时候产生了困难”，然而接他赴任的军舰是在等着他

的：“由于天气恶劣，他到达君士坦丁堡没有能早于 1833 年 5 月底”。（下院，1834 年 3 月 17 日）

由于俄军还没有到，所以庞森比勋爵就受命用 7 个月的时间从那不勒斯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sup>①</sup>

况且，勋爵阁下又何必要阻碍俄国人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呢？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非常怀疑，在俄国政府的政策中一般说来会有任何想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下院，1833 年 7 月 11 日）

是啊，当然没有！俄国并不想瓜分帝国，它倒是想整个独占。帕麦斯顿勋爵从这个怀疑中获得了信心，此外，由于他“怀疑俄国的政策是否会在现时就要立刻达到这一目的”，就使他产生了第二个信心，而第三个“信心”是他从第三个“怀疑”中得来的，即：

“俄罗斯民族（试想一下吧！俄罗斯民族！）把它的势力、居住中心及政府机关移到南方各省，乃是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必然结果，但是俄罗斯民族对这种迁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很值得怀疑。”（下院，1833 年 7 月 11 日）

除这些反面论据外，勋爵阁下还有一个正面论据：

“陛下政府的成员之所以能够平心静气地看着土耳其首都都被俄国武装力量占领，那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 俄国政府援助苏丹的时候是以它的名誉作保证的，对于这种保证我是无限信任的。”<sup>②</sup>（下院，

① 在 1853 年 11 月 21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由于俄军还没有到……”这一段话作“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被召回是在 9 月间，而庞森比勋爵接到委任状是在 11 月间。但是，既然伊布拉希姆—帕沙还没有越过托罗斯山，还没有揭开科尼亚会战，俄国人还没有占领沙皇格勒，所以庞森比勋爵就受命用 7 个月的时间从那不勒斯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编者注

② 在 1853 年 11 月 21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段引文之后还有这样一段话：“他怀着这种对俄国的信任，信赖俄国不会消灭波兰的宪法和民族生存。但是沙皇颁布了 1832 年的组织法，把波兰宪法和民族生存都消灭了。虽然如此，勋爵阁下所抱的无限信任仍然丝毫没有动摇”。——编者注

1833年7月11日)

勋爵阁下所怀抱的信任是那样玄妙和坚定,是那样充分、固定、牢不可破、难以名状、无与伦比和难以医治,是那样无限、无畏和无先例,以致他在1834年3月17日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已经成为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 时仍然确信无疑地说,“大臣们并没有信任错”。的确,如果天性使他的信任之心大得反常,那又怎么能怪他呢?

## 第五篇

1833年8月21日,“先驱晨报”发表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内容。8月24日,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在下院询问帕麦斯顿勋爵:

“俄土之间是否果真缔结了攻守同盟条约?我希望勋爵阁下能在议会本届会议闭会前不仅把所缔结的条约的本文,而且把有关土俄之间缔结这些条约的全部情报提交议院。”

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

“不列颠政府一旦肯定所提到的条约确实存在,一旦获得这一条约的本文,那时它就会决定它应当采取什么政治方针……新闻界有时先于政府获得消息,决不能因此责难政府。”(下院,1833年8月24日)

过了7个月,他要议会相信,对他来说

“要在8月间获得9月间未能在君士坦丁堡最后批准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正式报道,是绝对不可能的”。(下院,1834年3月17日)

诚然,条约他是知道的,但只不过是正式而已。

“不列颠政府得知俄军是带着这项条约撤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消息之后,感到很惊奇。”(帕麦斯顿勋爵1848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

不仅如此,勋爵阁下早在条约签字以前就已经获得了它。

“土耳其政府刚一收到它(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草案),就把它交到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馆,并请求英国保护它对伊布拉希姆—帕沙和尼古拉这两方面的逼迫。请求遭到了拒绝。但事情并不是到此为止。这件事还被极端背信弃义地通知了俄国大使。于是第二天俄国大使就把土耳其政府交给英国大使馆的那一份条约副本递交土耳其政府,并且讽刺地建议下次要

挑选一个比较可靠的受托人。”(下院, 1848年2月8日)<sup>320</sup>

但是子爵阁下毕竟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全部目的。他在下院被质询到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事是1833年8月24日,那时他对这一条约是否存在还不能肯定。8月29日,议会就宣布休会,这时议会从国王敕语中得到这样一个令人快慰的担保:

“破坏土耳其和平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议员们可经相信,国王对于有可能使土耳其帝国的现状或它将来的独立受到损害的任何事件,都是极密切地注视着的。”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解决俄国有名的七月条约之谜的钥匙。条约是在7月间签订的,到8月间,公众通过报纸得知了有关条约的某些消息。在下院有人就质询帕麦斯顿勋爵这件事情;当然,他是一无所知的;议会也闭会了,等到议会复会时,条约已成往事,或者像1841年那样已经不管舆论的反对而生效了。

议会于1833年8月29日闭会,1834年2月5日复会。在这闭会和复会之间发生了两件互相有密切联系的事情。第一件事是英法联合舰队开到了达达尼尔海峡,在那里显示了一下三色旗和联合王国的国旗之后就开到士麦那,然后又回到了马尔他。第二件事是1834年1月29日俄土两国在圣彼得堡缔结了一个新条约<sup>321</sup>。这一条约刚一签字,联合舰队就返航了。

这一联合行动的用意在于愚弄英国人民和欧洲,要他们相信,在土耳其领海及土耳其沿岸举行敌意示威是针对着土耳其政府的,因为它缔结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而且由于这个行动,俄国才被迫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上述的那项新条约。这个新条约显然为土耳其政府解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强加给它的某些义务,因为俄国在条约中答应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并把土耳其应付的赔

款缩减为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一。其他各项条款无非是确认阿德里安堡条约，根本没提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并且一个字也没有提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相反地，条约为土耳其减轻的负担，还成了俄国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所规定的达达尼尔海峡对欧洲封锁付出的代价。

“在〈不列颠舰队〉举行示威的当天，勋爵阁下向俄国驻英大使担保说，舰队的这种联合行动对俄国决无任何敌意，不当把这种行动看做是对俄国的敌对示威，其实这种行动根本没有什么用意。我这样说是根据勋爵阁下的同僚、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庞森比勋爵的权威性证词。”（安斯提先生 1848 年 2 月 23 日在下院的演说）

圣彼得堡条约最后批准之后，勋爵阁下对于俄国所坚持的条件的不过分表示满意。

议会复会之后，在外交部的机关报“地球报”上登出一则简讯，断言圣彼得堡条约

“不是证明了俄国考虑问题时稳健和明智，就是证明了英法同盟以及两强国使用的强硬而一致的言词对圣彼得堡最高当局产生了影响”。（1834 年 2 月 24 日“地球报”）

这样一来，舆论界就会不去注意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了，该条约在欧洲所引起的对俄国的敌意也就会削弱了。<sup>①</sup>

但是这种诡计不管多么巧妙，却仍然没有成功。1834 年 3 月 17 日希尔先生提议

---

① 在 1854 年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这段话作“这样一来，一方面，阿伯丁勋爵和威灵顿公爵抗议过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就从英国方面得到了帕麦斯顿勋爵的事后承认，因为勋爵阁下对圣彼得堡条约正式表示满意，而圣彼得堡条约只不过是最后批准阿德里安堡条约；另一方面，舆论界就会不去注意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了，该条约在欧洲所引起的对俄国的敌意也就会削弱了”。——编者注

“把俄土两国缔结的一切条约以及英、土、俄三国政府间有关这些条约的一切往来文件的副本提交议院。”

勋爵阁下拚命地反对这一提案，硬要议院相信“只有议院完全信任政府”并拒绝这项提案，“和平才能得到保证”，结果这项提案被否决了。但是他拒绝提交文件的理由是这样荒谬和笨拙，以致罗伯特·皮尔爵士用自己的议会语言把他叫做“使用完全不合逻辑的论据的演说家”，而他的崇拜者伊文思上校也止不住这样叫了起来：

“勋爵阁下的这次演说是他曾经听到过的历次演说中最不能令他满意的一次。”

帕麦斯顿勋爵竭力说服议院，要它根据俄国的**保证**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看做是“建立在相互原则上的条约”。据说这种相互原则就表现在，一旦战争爆发，达达尼尔海峡不仅对英国封锁，而且也对俄国封锁。这种断言本身就不对；即令是这样，那末这种相互原则也无非是英国—爱尔兰式的，即一切好处都被一方独占。因为达达尼尔海峡并不是俄国到黑海去的入口，相反地，而是从黑海出来的出口。

希尔先生断言“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后果必定就像土耳其政府把达达尼尔海峡让给了俄国一样”，帕麦斯顿勋爵无法驳倒这种说法，他承认条约对不列颠军舰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并且承认一旦英俄之间发生战争，则“根据该条约的条款，事实上很可能甚至对**商船**也封锁进入黑海的入口”。但是，如果政府能保持“镇静”，如果政府“不表示不必要的不信任”，即默默地赞同俄国今后的一切掠夺行为，那末他

“可以认为，甚至这一条约生效的事情也有可能不发生，因此，条约实际

上将等于一纸空文”。（下院，1834年3月17日）

此外他还断言，不列颠政府从缔约双方得到的“保证和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政府拒绝反对这个条约。可见，在帕麦斯顿看来，应当注意的不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条款，而是俄国在条约这件事情上所作的保证，不是俄国的行动，而是它的言词。但是就在当天，有人提起他注意法国代办拉格兰奈先生对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抗议以及涅谢尔罗迭伯爵在“圣彼得堡报”<sup>322</sup>上作答时所说的“俄皇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只当拉格兰奈先生的照会中的声明不存在”这种傲慢无耻的话，这时勋爵阁下就否认了自己说过的话，转而发挥相反的道理来了，他声称，

“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首先必须重视外国的行动，而不是它们在个别场合下对某一件事情所使用的言词”。

这样，他忽而又叫人注意俄国的言词，不管它的行动，忽而又叫人注意它的行动，不管它的言词。

1837年他仍然对议院肯定地说，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条约”。（下院，1837年12月14日）

而10年以后，当条约早已不存在，勋爵阁下刚刚准备好要扮演真正的英国大臣和《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sup>323</sup>的角色时，他才老老实实对议会说，

“无疑，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某种程度上是俄国全权代表奥尔洛夫伯爵在那种使土耳其难于拒绝的情况（正是勋爵阁下所造成的）下强加于土耳其的……实际上，条约使得俄国政府可以干涉土耳其的事务并迫使它接受条件，这是和这个国家的独立不相容的”。（下院，1848年3月1日）

在议会关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整个辩论过程中，勋

爵阁下像喜剧里的小丑一样，有一个能够满足任何要求和回答任何问题的无所不包的现成答话，随时可以使用。这就是：英法同盟。当人们对他纵容俄国大加嘲笑的时候，他很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如果这些嘲笑针对的是目前英法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那末我要说，我对于我能参与促成这种诚意协商感到非常自豪和满意。”（下院，1833年7月11日）

当有人要求他提交有关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文件时，他回答说：

“英法两国现在巩固了它们之间更加亲密的友好关系。”（下院，1834年3月17日）

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发言时大声叫道：

“我只想指出一点：勋爵阁下只要由于我们欧洲政策的其一问题而陷入窘境，马上便使用一个现成的脱身之法，即向议院祝贺英法之间的亲密同盟。”

但是同时勋爵阁下也使他的反对者托利党人越来越有理由猜想，“英国是不得已才纵容对土耳其的侵犯行为的，这种侵犯行为的直接鼓励者是法国”。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拿出同法国的同盟给人看是要掩盖暗中听命于俄国的事实，与此相仿，1840年大嚷大叫同法国决裂是要掩盖同俄国的正式同盟。

勋爵阁下大量提供已经发表的就比利时立宪王国问题谈判情况的文件，大量提供关于“独立国”葡萄牙情况的许多口头上的和文字上的解释，数量之多，已使人为之厌倦，可是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能使他拿出任何一份有关第一次叙土战争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文件来。1833年7月11日人们第一次要求他把有关这一问题的文件提交出来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提案提得过

早，事情尚未结束，结果还不知道”。1833年8月24日他说，“条约尚未正式签字，他尚未弄到条约的全文”。1834年3月17日他断言，“谈判尚在进行……，争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尚未结束”。甚至在1848年，当安斯提先生告诉他，要他提交文件是因为确信这些文件可以证明勋爵阁下同沙皇进行秘密勾结的时候，我们这位英勇的大臣却宁肯用5个小时的演说来消磨时间，也不愿用那些一目了然的文件来消除怀疑。这些还不算，1837年12月14日他还厚颜无耻地对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断言<sup>①</sup>，“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有关文件早在3年前”，即1834年当他声言只有不把这些文件转交议院“和平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议院了”。同一天他还对阿特伍德先生说，

“这个条约现在已经成了往事；条约的签订是有期限的，这个期限已经满了。可尊敬的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是完全不适当的”。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有效期限按照原来的规定应该到1841年7月8日满期。1837年12月14日帕麦斯顿勋爵就对阿特伍德先生说，这个期限已经满了。

“现在你还能想出什么诡计，什么花招，什么藏身的窟窿，可以用来掩盖你这场公开的众目所见的耻辱吗？杰克，你现在还能想出什么诡计？”<sup>②</sup>

① 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句话是这样：“1837年12月14日他在反驳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关于提交文件的决议案时，他的那一套谎言、托词、矛盾、诡计和谬论已经达到了顶点，竟说……”。——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对福斯泰夫说的话）。

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的结尾不是莎士比亚剧作的这段台词，而是下面这样一段话：“这就是那一位为俄军敞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使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舰队封锁、帮助沙皇占领君士坦丁堡数月、帮助他建立了对土耳其的多年控制的英国大臣用来给自己筑成最后一个藏身之所的一套卑劣的骗术。如果设想他现在会来个180度的转变，挺身而出反对他长久为之效忠的朋友，那就非常荒唐了”。——编者注

## 第六篇

在俄国辞汇里找不到“荣誉”这个词。这个概念被看做法国人的幻想。俄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是 honneur? 这是法国人的 chimère<sup>①</sup>。俄国的荣誉这一发现完全应该归功于帕麦斯顿阁下，因为他在四分之一世纪过程中每到紧急关头总是最坚决地替沙皇的“荣誉”作保。1853年的议会闭会时他这样做了，1833年的会议闭会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勋爵阁下恰巧正在公开表示自己“无限信赖沙皇会知荣誉和守信用”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曾经对西方保密，看了它们之后，对于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是怎么回事就会没有任何疑问，——如果这种疑问曾经有过的话。这时，勋爵阁下甚至用不着把俄国人刮一下就可以发现鞑靼人的原形。一个奇丑而不加任何掩盖的鞑靼人被他弄到了手<sup>②</sup>。他收到的是当权的俄国大臣们和外交官的自供状，这些俄国的大臣和外交官撕去了自己的假面具，暴露出自己的最不可告人的阴谋，十分坦白地商量实行侵略的计划，轻蔑地嘲弄欧洲各国宫廷和大臣们的愚蠢的轻信，恣意嘲笑所有这些维莱尔、梅特涅、阿伯丁、坎宁和威灵顿之流。他们抱

---

① 《honneur》——“荣誉”，《chimère》——“幻想”；“什么是”和“这是法国人的”这几个字在原文中用的是拉丁字母拼成的俄文。——编者注

② 双关语：《to catch a Tartar》（弄到一个鞑靼人）转义是“娶了一个泼妇”、“弄到一个烫手的東西”。——编者注

着野蛮人的蛮横无耻态度，混杂着廷臣的尖酸刻薄，一同策划着怎样使巴黎不信任英国，使伦敦不信任奥地利，使维也纳不信任伦敦；怎样唆使他们互相倾轧，把他们全都变成单纯的俄国的工具。

原来，在华沙起义时期，总督的档案落到了得胜的波兰人手里。这些档案是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宫邸中保存着的，其中有俄国大臣们和大使们从本世纪初到 1830 年的密信。最初，波兰流亡者把这些文件带到法国，后来，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外甥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帕麦斯顿勋爵，而他就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把它们忘记了。子爵阁下一方面口袋里装着这些文件，一方面却对不列颠议会和全世界特别狂热地宣布他“无限信赖俄国皇帝的知荣誉和守信用”。

这些轰动一时的文件于 1835 年末在有名的“文件集”上发表了出来，这并不是勋爵阁下的过失。不管国王威廉在其他方面如何，但他毕竟是俄国的死对头。他的私人秘书赫伯特·泰勒爵士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很熟，他把这位先生推荐给国王。从此国王陛下就同这两位朋友密谋反对“真正英国的”大臣的政策。

“威廉四世诏谕勋爵阁下交出上述文件；这些文件交出后，在温莎城堡立即对它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最好是把这些文件印出发表。尽管勋爵阁下强烈地反对，国王还是强迫他以外交部的名义批准了发表，因此，负责编印这些文件的发行人所发表的东西，没有一句话不是经勋爵签署或简签的。我本人就曾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上看到过勋爵阁下的简签，但勋爵阁下却否认这些事实。帕麦斯顿勋爵是被迫把这些文件交给乌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后者正是‘文件集’的实际发行人。”（安斯提先生 1848 年 2 月 23 日在下院的演说）

国王死后，帕麦斯顿勋爵拒绝向印刷所主人支付印刷“文件集”的费用；他公开地、郑重地发表声明，否认外交部与发表文件这件事有任何关系，而且，不晓得他用了什么方法，竟使他的副大臣

巴克豪斯先生在这份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1839年1月26日的“泰晤士报”曾刊登了下面一段文字：

“昨天的‘泰晤士报’公布了被帕麦斯顿勋爵撤职的乌尔卡尔特先生同奉子爵阁下之命来取代这个职务的巴克豪斯先生的通信，我们虽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对此感觉如何，但我们对于被看做绅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其他任何人会有怎样的感觉**却是完全清楚的。可以肯定地说，公开出来的这种通信最有力不过地证实了这样一件事实，即‘文件集’所发表的所有这些文件，都是得到帕麦斯顿勋爵许可以后才印行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对国内外政界负责的国家活动家，或者是作为一个对印刷者和发行者的负有债务的主顾，勋爵阁下对于发表这些文件都是负责的。”

土耳其在1828—1829年的那次失败的战争中弄得财源涸竭，阿德里安堡条约又使它**对俄国负着债务**，因此它曾不得不更加扩大了那种令人厌恶的专卖制，只允许那些向政府购买了许可证的人卖东西，几乎所有商品的发卖都是这样。这样一来，国内的商业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少数几个高利贷者的手里。乌尔卡尔特先生建议国王威廉四世同苏丹缔结一项通商条约，这项条约要能保证不列颠贸易的最大利益，同时也能促进土耳其的生产力的发展，整顿它的财政，从而使它摆脱俄国的羁绊。这个条约的有趣的经历，在安斯提先生的下面一段话里讲得最清楚：

“帕麦斯顿勋爵和乌尔卡尔特先生之间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个通商条约进行的。1835年10月3日乌尔卡尔特先生被委任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秘书；把这个职务交给他的唯一目的是叫他在当地确保土耳其接受这个通商条约。但是他一直拖到1836年6月，甚至到7月还不动身。帕麦斯顿勋爵催促他快去。但他对多次要求他出发的建议总是这样回答：只有当这个通商条约完全取得贸易部和外交部的同意时，我才动身，我将亲自把它带到土耳其，设法使土耳其政府接受……最后，帕麦斯顿勋爵认可了这个条约，条约随即送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庞森比勋爵（同时帕麦斯顿勋爵指示他绝对不

要叫乌尔卡尔特先生插手谈判,把谈判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这完全连背了同乌尔卡尔特先生谈妥的协议)。但是,一旦乌尔卡尔特由于勋爵阁下的阴谋而被调离君士坦丁堡,条约立即就被调置到一边去了。两年以后,勋爵阁下又提起这个条约,这时他在议会里把乌尔卡尔特先生大大恭维了一番,称他为条约的拟制者,并且否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功劳。但是勋爵阁下歪曲了这个条约,各项条款都来了个伪造,把这个条约变成了一个毁灭我国贸易的条约。乌尔卡尔特先生的原条约是把住在土耳其的大不列颠的臣民置于同最惠国的国民(即俄国人)平等的地位。被帕麦斯顿勋爵篡改了的条约却把大不列颠的臣民和身负重重税捐、备受压迫的土耳其臣民放到了一起。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除条约本身规定的一切捐税外,废除了各种过境税、专卖制、捐税及其他一切关税。帕麦斯顿勋爵所伪造的条约却专立一款,承认土耳其政府有颁布它认为适当的任何贸易规章或限制法令的绝对权利。在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中,进口税率仍照旧为3%;在勋爵阁下的条约中,进口税率却从3%提高到5%。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调整 *ad valorem* (从价税)如下:如果纯属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按照通常在专卖制度下所规定的价格很容易就能在外国港口销售的话,则土英两国的全权代表所规定的出口税率可以充分提高,以便在保持利润的同时还增加国库收入;如果是非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在外国的售价不足以抵偿高额税率,则出口税率可以适当降低。帕麦斯顿勋爵的条约却为各种商品定出了一个20%的固定的从价税,不管商品受得住这样的税率与否。原条约也赋予土耳其商船和商品以贸易自由的特权,伪造的条约却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抗议勋爵阁下的这种伪造,我抗议他把这件事掩盖起来,最后,我还要抗议他欺骗议院,硬说什么这就是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拟的那个条约。”(安斯提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被勋爵阁下篡改了的条约对俄国是这样有利,而对大不列颠却是这样有害,以致列万特各国的某些英国商人决定从此以后要在俄国商号的保护下进行贸易,而另一些商人,正如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报道的,只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才没有这样做。

关于勋爵阁下和国王威廉四世之间的秘密关系,安斯提先生

向下院讲了下面一段话：

“国王要勋爵阁下重视俄国日益加紧进逼土耳其的问题……我可以证明，勋爵阁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不得已才接受已故国王的私人秘书的指示的，当时他是否对君王的意志让步决定着他的去留问题……勋爵阁下有时也斗胆找个机会试图进行反抗，但是事后总是要**低声下气地**表示悔悟，或者**迎合奉承**一番。我且不来断定勋爵阁下是否果真被解除过一天或几天的职务，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勋爵阁下是有被毫不客气地赶下台的危险的。我所指的就是已故国王发现了勋爵阁下在任命英国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时竟同俄国政府一个鼻孔出气，把原来被委任了这个职务的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撤职了，而让已故的德勒穆伯爵这位更合沙皇口味的人去做这个大使。”（下院，1848年2月23日）

最令人惊奇的一个事实就是：正当国王对勋爵阁下的亲俄政策作徒劳无功的斗争时，勋爵阁下却同他的辉格党的同僚一起，在公众中煽起一种对国王的猜疑心理，使人们认为是国王——大家都知道他是托利党的信徒——破坏了“真正英国的”大臣所作的反俄努力。托利党人是倾向于俄国宫廷的专制原则的，现在把这种倾向加在国王身上，帕麦斯顿的政策自然就可以得到唯一的一个解释了。辉格党的寡头们有一次在议会里曾神秘地微笑，因为这时亨利·利顿·布尔韦尔正对议院说，

“就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阿波尼伯爵在谈到东方问题时说，英国宫廷惧怕法国的原则比惧怕俄国的野心还要厉害。”（下院，1833年7月11日）

他们又一次微笑了，这一次是在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向勋爵阁下提出如下质问的时候：

“当奥尔洛夫伯爵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签订后来到英国时，朝廷是怎样接待他的？”（下院，1833年8月28日）

国王临终之前，曾会同他的秘书——已故的赫伯特·泰勒爵士，把一些文件托付给了乌尔卡尔特先生，“以便在适当的时刻为威廉四世恢复名声”。这些文件一旦公布，就会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勋爵阁下和辉格党的一切当权人物的以往活动，——对于这些活动，公众照例只能从这个寡头集团过去所作的夸口、空话以及它所提出的所谓原则方面来了解，总之，只能从它的故意做作和虚假姿势方面，从它的伪装方面来了解。

在这里应该对那位 20 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反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给以应有的估价。他的表现说明了他 是帕麦斯顿的唯一的 一个死对头，他从没有因恫吓而沉默，因收买而让步，因利诱而屈膝。可是阿耳契娜——帕麦斯顿的其他敌人却都被帕麦斯顿用时而恭维时而诱惑的手法愚弄了。我们在上面引用了安斯提先生激烈谴责勋爵阁下的一段话，而乌尔卡尔特告诉我们：

“很耐人寻味的是，被谴责的大臣正在设法同一位议员（安斯提先生）亲近，表示要同他合作并建立私人的交情，根本不要他正式收回自己的话或道歉。现政府不久前对安斯提先生的正式任命就足以说明一切。”（戴·乌尔卡尔特“俄国的进展”<sup>324</sup>）

而 1848 年 2 月 8 日这位安斯提先生则把子爵阁下比喻了一下，说他像

“沙皇彼得一世在访问英国宫廷期间用不列颠商人的黄金收买了的威廉三世的大臣——**无耻的卡马登侯爵**”。（下院，1848 年 2 月 8 日）

在这种情况下，起来保护帕麦斯顿勋爵而反对安斯提先生的谴责的有谁呢？这里有希尔先生，也就是那位在 1833 年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时曾经像 1848 年安斯提先生那样谴责勋爵

阁下的希尔先生。有罗巴克先生，他一度曾经是勋爵阁下的死对头，而在 1850 年却出力为勋爵赢得了议院的信任投票。有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他曾经整整 10 年一直在揭发勋爵阁下纵容沙皇，而当给他调了一个工作，把他派到君士坦丁堡去做大使之后，就心满意足了。甚至还有达德利·斯图亚特，他是勋爵阁下十分心爱的人，只因他冒昧地站在勋爵阁下的反对派方面，曾经被勋爵略施小计一连好几年进不到议会里来，而当他再度进入议会时，就成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 *âme damnée* (忠实的伙伴) 了。还有科苏特，他本来是可以从蓝皮书上知道出卖匈牙利的是子爵阁下，然而在到达南安普顿时却称勋爵为“亲爱的、知心的朋友”。

## 第七篇<sup>325</sup>

只要打开欧洲地图约略看一下，就会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这条发源于欧洲中心的河，才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一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在正对着河口的黑海东岸，自库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脉从黑海东南伸向里海，绵延 700 英里，把欧亚两洲分开。

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控制了多瑙河这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主要是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这个强国再占有了高加索，那末黑海就是它的了；而要想把这个海的入口封锁起来，只要把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拿过来就行了。占有了高加索山脉使它可以直接控制特拉比曾德；而在里海的统治地位则使它可以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

俄国的贪婪的眼光注视到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山脉这两个地方。它在多瑙河口是要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在高加索山脉是要保住这种统治。高加索山脉把南俄同俄国人从穆斯林那里夺得的格鲁吉亚、明格列里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等最富饶的省份隔开。这样，庞大帝国的脚就同身子分开了。只有一条可以称为军用的道路，从莫兹多克蜿蜒通过达尔雅尔峡谷的关口，通往梯弗里斯；这条道路上虽然一个接一个地布满了工事，但仍不断从两旁遭到高加索各部族的袭击。这些高加索部族如果有个军事首领把它们联合起来，甚至可能威胁邻近的哥萨克地区。“一想到含有敌意的切尔

克斯人由一个首领联合而可能给俄国南部带来的可怕后果，就不寒而栗”，——德国人库普费尔先生于1829年率领一个学术考察团随同艾曼努埃尔将军考察厄尔布鲁士山时曾这样感叹地说过<sup>326</sup>。

现在，多瑙河和高加索这两个地方都同样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在多瑙河岸，俄国占领了欧洲的两大谷仓；在高加索，它面临着失掉格鲁吉亚的危险。俄国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由阿德里安堡条约为它做好准备的，它占有高加索的权利也是从这个条约中得到承认的。

该条约第四款规定：

“两个帝国（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沿格鲁吉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的军事分界线以北和以东各地，以及从库班河口到圣尼古拉码头的黑海沿岸地区，包括圣尼古拉码头在内，统属俄国。”

关于多瑙河，条约有如下的规定：

“沿多瑙河直到圣乔治支流河口划为国界，依此，多瑙河诸支流所形成的各个岛屿统属俄国。南岸仍归土耳其政府。但南岸从圣乔居住区，不得修造任何建筑物。仍属俄国宫廷所有的诸岛也依此规定。在这些岛屿上除设立检疫所外，不得修造任何设施或工事。”

这两项条款确保了俄国“扩张领土和获得贸易特权”，因而公开破坏了威灵顿公爵在圣彼得堡签订的1826年4月4日的议定书，以及俄国同其他大国在伦敦缔结的1827年7月6日的条约<sup>327</sup>。因此，英国政府当时拒绝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威灵顿公爵曾发表声明对这个条约提出抗议。（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据马洪勋爵说，阿伯丁勋爵也曾对这个条约提出过抗议。

“他在1829年10月31日致海茨贝里勋爵的电中，对阿德里安堡条约

的许多章节都大为不满，并且特别注意有关多瑙河诸岛屿的规定。他否认这个和约（阿德里安堡条约）是在尊重土耳其政府的领土主权、尊重地中海的海上各大国的地位和利益的基础上签订的。”（马洪勋爵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

格雷伯爵肯定阿伯丁勋爵曾经说过，

“如果这个条约被批准，那末土耳其政府的独立就会丧失，欧洲的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格雷伯爵 1834 年 2 月 4 日在上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告诉我们说：

“俄国在多瑙河口、南高加索以及黑海沿岸等地区扩张疆界，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开始前对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绝对不符合的。”（下院，1837 年 3 月 17 日）

俄国对高加索西北各地区的统治暂时还是名义上的。它要想实现这种统治，只有当它封锁住黑海东岸，并且切断向这些地区运送武器弹药的道路时才有可能。但是，黑海沿岸以及多瑙河口却决不是克拉科夫这样的被勋爵抱怨为“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究竟是用什么诡计得以封锁了多瑙河及黑海沿岸，并且迫使大不列颠不仅同意阿德里安堡条约，而且同意俄国自己违反这个条约呢？

这些问题在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里提到了勋爵阁下的面前，这时下院已经收到伦敦、格拉斯哥及其他商业城市的商人的许许多多的请愿书，纷纷反对俄国在黑海上采取的财政措施，以及它所实行的旨在阻挠英国在多瑙河上进行贸易的规章和限制。俄国在 1836 年 2 月 7 日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下令在多瑙河口的一个沙洲上设立了一个检疫所。它借口在这里实行检疫条例，说它有权对溯多瑙河而上的船只登船检查，强迫它们纳税，并且有权扣留那些敢于违抗的船只，把它们解往敖德萨。早在检疫所建

立以前，更确切些说，早在以建立检疫所为名而设立海关和筑起炮台以前，俄国政府就曾摸了一摸底，以便确定它对英国政府耀武扬威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德勒穆勋爵按照从英国得到的指示办事，就英国贸易受到阻挠一事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他奉命去见涅谢尔罗迭伯爵。涅谢尔罗迭伯爵叫他去见新俄罗斯的省长；新俄罗斯的省长又让他去见驻加拉兹的领事；后者同不列颠驻布来洛夫的领事作了接触，建议不列颠领事把那些被征税的船长叫到多瑙河口来，即叫到他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现场去，以便进行调查；当然，当时是已经知道那些船长都在英国，才这样做的。”（下院，1836年4月20日）<sup>328</sup>

俄国 1836 年 2 月 7 日的法令引起了不列颠商界的普遍注意。

“当许多船只已经出海或正要启航时，船长们接到严厉的命令，不许承认俄国所强求的登船检查的权利。显而易见，如果议院不毅然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那末这些船只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议院如果不这样做，那末总排水量至少有 5000 吨的不列颠船只就会被扣留并解往敖德萨，不依从俄国的无理要求就走不掉。”（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中的一项条款，提出要求领有多瑙河口附近多沼泽的沙洲，这个条款本身就是违反俄、英及其他列强于 1827 年缔结的条约的。而在多瑙河入口处修筑工事和设置炮台，则违反了明确规定不许在离河 6 英里以内的地区修筑任何工事的阿德里安堡条约本身。征收税款和阻碍多瑙河上的通航，则违反了维也纳条约，因为该条约曾宣布：从多瑙河可以航行的地点起到河口止的各个河流，航行应完全自由；“税额无论如何不得超过现行的税额”，即 1815 年的税额；“在未征得沿岸各国的普遍同意以前，不得有丝毫增加”。这样，俄国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唯一论据就是：违反 1827 年的条约的是阿德里安堡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又被俄国自己违反，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维也纳条约被人违反所致。

要想叫帕麦斯顿勋爵作一个他承认或不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声明，成了完全没有可能办到的事。至于维也纳条约是否被人违反的问题，则勋爵阁下

“还不曾得到关于发生过任何违反这个条约的事情的正式情报。要是缔约国肯定发生这一类事情了，那时就会采取皇家法律顾问根据英国臣民的权利所认为必须采取的步骤”。（帕麦斯顿勋爵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第五款上规定由它来保证多瑙河各公国的“繁荣”和充分的“贸易自由”。这时，斯图亚特先生证明，俄国是十分嫉妒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的，因为它们的贸易从 1834 年起就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在俄国一向据有的几个生产部门中与俄国竞争，而加拉兹则成了多瑙河上进行谷物贸易的最大的堆栈，在谷物贸易方面排挤着敖德萨。勋爵阁下对此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我极可尊敬的朋友能够证明，我们几年以前同土耳其进行过巨额的、意义重大的贸易，而后来由于别国的侵略或我国政府的漠不关心而缩减为很小的数额的话，那他的确有理由向议会申诉”。但是恰恰相反，“我极可尊敬的朋友所证明的只是，我们近几年来同土耳其的贸易有很大发展，而以前几乎没有什么贸易。”

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俄国阻挠了多瑙河上的航行，因为多瑙河各公国的贸易日益扩大。帕麦斯顿勋爵反驳的是，俄国在几乎没有这种贸易的时候却没有这样做。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阁下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回击俄国最近在多瑙河上进行的侵犯。帕麦斯顿勋爵回答的是，就是在俄国还没有实行这些侵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说实在的，哪里谈得上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像政府要不是议院的直接干预便不会对这些情况采取

预防措施”呢？帕麦斯顿终于得以阻止下院通过决议，因为他向下院保证

“王国政府丝毫不想容忍任何一国的侵略行为，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管它的力量多么强大”。

同时他还叫议院

“不要无事惊慌，以致使别的国家说我们是有意挑衅，或给它们这种说法以口实”。

下院进行的这场辩论过去了一星期以后，有一个不列颠商人写了一封信给外交部，控诉上面所说的那项俄国的法令。大臣助理给了他以下的一个答复：

“帕麦斯顿子爵命我通知阁下，他已请皇家法律顾问就俄国在 1836 年 2 月 7 日的法令中所宣布的条例发表意见。同时帕麦斯顿勋爵还命我通知阁下，关于阁下来信中的后一部分，王国政府认为，俄国当局没有权利在多瑙河口征收任何税款；阁下吩咐自己的代理人拒绝缴纳任何这类税款，这样做是对的。”

商人按照这样的指示去做了。但勋爵阁下却是把他完全出卖给了俄国：据乌尔卡尔特先生说，驻伦敦和利物浦的俄国领事现在对每艘开往多瑙河上的土耳其港口的英国船只都要抽税，而且“在莱蒂岛上仍设有检疫所”。

俄国侵入多瑙河的行动并不以设立检疫所、修筑工事和征收捐税为限。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多瑙河口的唯一的一条尚可航行的苏利纳支流划归俄国所有。在这条支流过去属于土耳其人的时候，河床的深度为 14—16 英尺，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深度；自从转属俄国以来，河床的深度降到了 8 英尺，即降到运粮船只完全不能通航的程度。尽人皆知，俄国是维也纳条约的参加

国，该条约第一一三款规定：

“每个国家都应出资维修线路和进行一些必要工作，以便使航行通畅无阻。”

然而俄国却发现，维持苏利纳支流通航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一些破碎的船只堆积到河底，把水浅的地方变成沙泥滩，这样来逐渐降低河水的深度。除了这种在长时期中一步步地违背维也纳条约的行为以外，俄国还违背那个除检疫所和灯塔以外不许在苏利纳支流修造任何建筑物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它竟然下令在那里筑起了一个俄国小型炮台，靠着向商船强征捐税来维持；这些商船，由于河床堵塞而不得不停下来花钱雇用平底船装卸，这就成为俄国强征捐税的借口。

“Cum principia negante non est disputandum (同否认原则的人不必辩论)。对于人所共知是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则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帕麦斯顿勋爵 1832 年 4 月 30 日的演说)

于是，子爵阁下就完全依照他自己的主义，满足于对俄国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则了。但他到这里还不停步。1840 年 7 月 6 日，他肯定地告诉议院，多瑙河的航行自由有“维也纳条约作保证”；1840 年 7 月 13 日，他向议院诉苦说，虽然俄国占领克拉科夫是违背维也纳条约，但是“英国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然而，在说了这些话两天以后，他就同俄国签订了“在同土耳其和平期间”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sup>①</sup>封锁的条约。这样一来，英国也就失去

<sup>①</sup> 在 1854 年 1 月 11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英国”作“对英国军舰”。——编者注

了“以强力维护”维也纳条约的唯一可能，欧克辛海<sup>①</sup>也就的确变成了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了。

这件事办妥之后，勋爵阁下就假装出向舆论让步的样子，一连串发射了许多纸上声明的空炮，用规劝的和多情的语调提醒那个“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是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政府”说，

“俄国既已迫使土耳其把作为许多国家贸易往来的主要道路的欧洲一条大河的河口割让给它，那它也就对其他国家担负了责任和义务，它应该把遵循这些责任和义务看做是有关自己名誉的事情。”

涅谢尔罗迭伯爵对这样顽强地强调抽象原则所作的答复是这样一句老话：“问题将仔细加以研究”。此外，他还不时地表示“帝国政府对于人们如此不信任它的意图感到遗憾”。

这样，由于勋爵阁下的关照，1853年多瑙河就宣布不能航行了，粮食都烂在苏利纳支流上，而法国、英国和南欧则受着饥饿的威胁。另一方面，用“泰晤士报”的话说，俄国“在得到其他一些重要属地之后，又占有了多瑙河和欧克辛海之间的铁门”。俄国掌握了多瑙河的钥匙，掌握了打开谷仓的百宝钥匙；西欧的政策什么时候应当受到惩罚，它什么时候就会把这把钥匙运用起来。<sup>②</sup>

① 黑海的古称。——编者注

② 在1854年1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是以下面两段话结尾的：“然而，帕麦斯顿同俄国之间在俄国的多瑙河计划的问题上所进行的秘密勾结，仍然直到关于切尔克西亚的辩论时才被揭发出来。就在那时，1848年2月23日，安斯提先生才说明：‘子爵阁下就任（外交大臣）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即承认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所抗议的那个条约。

至于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尽可能地做了这些事和怎样把切尔克西亚出卖给俄国的，准备用专文来写”<sup>329</sup>。——编者注

## 第八篇

1836年4月20日下院收到的请愿书，以及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根据这些请愿书而提出的议案，不仅有多瑙河问题，而且有切尔克西亚问题，因为商业界盛传俄国政府借口切尔克西亚沿岸被封锁有意不让英国船舶在黑海东岸的许多港口卸货。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庄重声明说：

“如果议会信任我们，如果它把外交仍交给我们去办，我们一定会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同时还可以免动干戈。”（下院，1836年4月20日）

数月以后，即1836年10月29日，乔治·贝尔先生的一艘运盐商船“雌狐号”从伦敦开往切尔克西亚。11月25日该船在切尔克西亚的苏茹克—卡列湾被俄国军舰截去，理由是“该船被用来同被封锁的海岸联系”（俄国海军上将拉札列夫1836年12月24日给英国船长却尔茨的信）。商船、它的货物和人员被押解到塞瓦斯托波尔港，1837年1月27日被俄国人判了罪。这时已经不谈什么“封锁”了，而是干脆宣布商船“雌狐号”为依法捕获的贼船，理由是“它犯了走私罪”，因为输入盐是被禁止的，同时在苏茹克—卡列湾，即在俄国的港湾，又没有设立海关。判决被执行了，而且执行得非常无礼和带有侮辱性。对截夺该船的俄国人都公开授予奖赏。英国国旗先被升起而后降下，换上了俄国国旗。船长和船上人员被当做俘虏押上了实行截夺的“哀杰克斯号”，然后从塞瓦斯托波尔解到敖德萨，又从敖德萨解到君士坦丁堡，才允许他

们从那里返回英国。关于这艘船本身，一位在这件事发生数年后到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旅行家曾在“奥格斯堡报”上写道：

“在我所参观的俄国战列舰中，最能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苏茹克-卡列号’，即以前的‘雌狐号’，现在插着俄国国旗。该船的外貌完全变了。这只小小的舰艇现在是在所有俄国船只中最好的一只帆船，它现在主要是用来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切尔克西亚沿岸之间进行运输”。

“雌狐号”被劫夺，毫无疑问是帕麦斯顿勋爵履行他“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这种诺言的最好机会。但是，除了英国国旗的荣誉和英国的贸易利益以外，这里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即**切尔克西亚的独立问题**。俄国在扣留“雌狐号”时说它违犯了俄国宣布的封锁令，但是在给它判罪时却用了完全另一种借口，说它违犯了俄国的关税规章。俄国既然宣布封锁，也就是宣布了切尔克西亚为敌对的外国，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这种封锁。反之，俄国既然在切尔克西亚施行关税规章，也就是把切尔克西亚看做是它的藩属，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权利？

在继续往下说以前，这里不妨提一下：俄国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完成它在塞瓦斯托波尔修筑要塞的工程。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谈过的那样，俄国占据切尔克西亚的任何权利，只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但是1827年7月6日的条约已规定，俄国不得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做任何扩张领土的试图和取得任何贸易特权。因此，俄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而扩张领土的任何举动都是对1827年条约的公开违背，并且，正如威灵顿和阿伯丁所抗议的那样，决不能得到大不列颠的承认。可见，俄国并没有权利要土耳其把切尔克西亚割让给它。另一方面，土

耳其也不能把不属于它的东西让给俄国。切尔克西亚对土耳其政府始终是独立的，所以还在阿纳帕驻有土耳其帕沙的时候，俄国就曾经同切尔克西亚的首领数次签订沿海贸易的协定，因为当时正式规定土耳其的贸易只限于阿纳帕港口。既然切尔克西亚是个独立国家，那末俄国人认为自己有权要它实施的地方管理法、卫生条例和关税法令等等，它是否应当遵守，就像坦比哥是否应当遵守俄国的法律一样了。

另一方面，如果切尔克西亚是一个同俄国处于敌对状态的外国，那末俄国只能在它能够实际实行封锁，而不是纸上谈兵的时候，即在俄国拥有能够强行封锁的海军舰队，并且真正控制了海岸的时候，它才能向切尔克西亚宣布这种封锁。但是，在全长 200 英里的海岸线上，俄国只有 3 个孤立的炮台，其余的切尔克西亚领土完全掌握在切尔克西亚人的手中。在苏茹克—卡列湾，连一座俄国炮台也没有。封锁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并没有实行封锁的海军力量。两艘英国船——“雌狐号”和另一艘于 1834 年曾到过这个海湾的船的船只们曾经要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海岸根本没有被俄国人占领，而且这一点也为两个于 1837 年和 1838 年到过这个港湾的英国旅行家公开声明所证实。（“文件集”1844 年 3 月 1 日第 8 号）

当“雌狐号”开进苏茹克—卡列湾时，

“无论从船上还是从岸上都看不到有一艘俄国军舰……‘雌狐号’抛锚以后又过了 36 小时，正当船主和几个高级职员上岸同切尔克西亚当局就货值税率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俄国军舰才驶进港湾……这艘军舰并不是沿岸行驶的，而是从公海上开来的”。（安斯提先生 1848 年 2 月 23 日在下院的演说）

既然借口违犯封锁令而下令扣留“雌狐号”的圣彼得堡当局又借口违犯关税规章而把“雌狐号”没收了，那就没有必要再举出新的证明了。

这一事件对切尔克西亚人来说看来是特别有利的，因为他们的独立问题同黑海航行自由问题、英国贸易的保护问题以及俄国对英国商船的粗暴的海盗行为问题合到了一起。他们得到海上霸主保护的机会看来也更加没有疑问，因为

“在此以前不久，经过成熟的考虑，并且同政府各部进行了许多个星期的书信往来，在一个同外交部有关系的定期刊物（“文件集”）上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并且在帕麦斯顿勋爵亲自审查过的地图上标明切尔克西亚是一个独立国”。（斯坦利勋爵 1838 年 6 月 2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谁能想到高尚而侠义的子爵竟如此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把俄国的这种劫夺英国财产的海盗行为变成了正式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和致命地打击切尔克西亚独立地位的良机呢？

1837 年 3 月 17 日，罗巴克先生根据“雌狐号”被没收的问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向议院提供

“英国政府同俄国及土耳其政府之间有关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全部往来文件的副本，以及与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缔结后占领黑海沿岸诸港口及地方有关的协商和谈判的报告书”。

罗巴克先生惟恐别人怀疑他有人道的心肠和从抽象原则出发来保护切尔克西亚，所以就坦率地声明：

“俄国可以企图去霸占整个世界，这种企图对我是无所谓的；但是在它侵犯了我们的贸易的这个时刻，我要请求我国（显然，这个国家是在“整个世界”以外的某个地方！）政府给侵略者以惩罚。”

因此他想知道“英国政府是否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

勋爵阁下虽然被逼到墙角了，但仍然保持着足够的镇静发表了长篇演说，并且，用休谟先生的话来说，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始终没有告诉议院：目前究竟是谁实际上占有切尔克西亚沿岸，这个地方是否确实属于俄国，俄国劫夺了‘雌狐号’是由于它违犯了财政当局所规定的关税规章，还是因为确实存在着封锁，以及他是否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休谟先生 1837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

罗巴克先生说，贝尔先生在许可“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以前，曾经同勋爵阁下联系，以便弄清楚让货船去切尔克西亚的一个地点会不会有危险或者有什么不妥之处，结果从外交部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就不得不向议院宣读他同贝尔先生的往来书信。听着他宣读这些书信，就觉得他好像是在读西班牙“斗篷和短剑”式的喜剧，而不是在读一位大臣和一个商人之间的正式信件。丹尼尔·奥康奈尔在听完了勋爵阁下宣读的关于“雌狐号”被劫夺一事的信件的内容之后，禁不住大喊：“我不能不回想起达来朗的名言：言语是掩盖思想的！”

例如，贝尔先生问道：“在所提到的海上进行贸易，是否存在为王国政府所承认的某些限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限制，他想派一艘装盐的船到那里去”。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阁下问我做盐的生意是否对阁下有利益，”还告诉他，“商号自己应该知道做某种生意是否值得”。贝尔先生说：“我根本不是问阁下这个问题；我所要知道的只是王国政府是否承认俄国对库班河以南的黑海海岸的封锁”。勋爵阁下说：“阁下应该去看一看‘伦敦官报’<sup>330</sup>，——这方面的消息那里全有”。对于一个想得到这方面消息的英国商人说来，根据“伦敦官报”自然要比根据俄皇的指令更为适当。贝尔先生在“伦敦官报”上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承认这种封锁或其

他任何贸易限制的报道，于是他就把他的船派了出去。结果是：他自己很快就上了“伦敦官报”。

“我介绍贝尔先生去看‘官报’——帕麦斯顿勋爵说——“是想让他看了报纸以后确信，关于封锁一事，俄国政府对我国没有发过任何通知和声明。因此也就根本谈不到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帕麦斯顿勋爵介绍贝尔先生去看“官报”，他这样做不仅否认大不列颠承认俄国的封锁，而且同时还肯定了：在他看来，切尔克西亚沿海地区**并不是**俄国的一部分领土，因为“官报”**并不发表**关于外国为了例如平定国内叛乱而对本国的一部分领土实行封锁的消息。既然切尔克西亚不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那末在切尔克西亚就不可能实行俄国的关税规章。可见，按照帕麦斯顿勋爵自己所说的来看，他在给贝尔先生的信中并不承认俄国有权封锁切尔克西亚沿海或者使它受到任何贸易限制。诚然，从他的整个演说里可以看出他是想叫议院做出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他也公开声称：

“俄国在多瑙河口地区、南高加索及黑海沿岸进行疆界扩张，无疑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爆发前向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不符合的。”

当他在演说完毕坐下来之前，郑重地保证他要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保持它的荣誉”的时候，看他的样子是已经不堪负荷他过去的政策所招致的种种不幸，不像是又在策划未来的叛卖性阴谋了。在这一天，他不得不恭听如下一段严厉的责备：

“勋爵阁下在维护国家荣誉方面表现不够积极和热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过去还不曾有一个大臣在不列颠臣民受到欺侮的时候像他这样前后不一、顾虑重重、迟疑不决、畏首畏尾。勋爵阁下还要让俄国欺侮大不列颠和损害英国贸易多久呢？勋爵阁下**侮辱**了英国，使英国扮演了一个好吹嘘的

寻小事争吵的角色，对弱者傲慢无情，对强者卑躬屈膝。”

是谁把“真正的英国”大臣这样狠狠地直骂了一顿呢？不是别人，而是达德利·斯图亚特。

“雌狐号”是在 1836 年 11 月 25 日被劫走的。我们刚才所引的下院的激烈辩论是在 1837 年 3 月 17 日进行的。但是 1837 年 4 月 19 日勋爵阁下才向俄国政府提出质问，要它

“指明它根据什么理由在和平时期扣留不列颠臣民的商船”。

1837 年 5 月 17 日勋爵阁下收到驻圣彼得堡的不列颠大使德勒穆伯爵的如下的一封急电：

“阁下！关于对苏茹克-卡列是否 de facto（事实上）存在着军事占领的问题，我应该向阁下禀报：海湾有一座以女皇之名命名的炮台（亚历山得拉），并且由俄国的常备军驻防。

永远忠实于您的

德勒穆”

亚历山得拉炮台的实在性，连波将金在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到克里木去巡游时请她参观的纸扎的村落都不如，这一点看来是用不着再说了。帕麦斯顿勋爵在收到这封急电的 5 天以后回电圣彼得堡如下：

“王国政府考虑到，苏茹克-卡列虽经俄国根据 1783 年的条约承认属于土耳其，而现在，正如涅谢尔罗迭伯爵所肯定的那样，由于阿德里安堡条约而属于俄国，所以王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充分根据对俄国扣留和没收‘雌狐号’的权利提出异议。”

关于这次交涉，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情况。帕麦斯顿勋爵用了整整 6 个月的时间去为交涉做准备，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把交涉结束了。他上面那一封 1837 年 5 月 23 日的急电把交涉突然

打断了。这封急电在提到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签订日期时不是用格里历，而是用儒略历。

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所指出的：

“在4月19日到5月23日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转变：以正式抗议开始，但却以表示满意告终。看去，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断言已经说服了政府，使它相信土耳其已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我们所说的那个海岸割让给俄国了。为什么政府对这种诏令没有提出抗议呢？”（下院，1838年6月21日）

发生上述这一切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啊？原因很简单。国王威廉四世背地里指使贝尔先生把“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当勋爵阁下迟迟不开始就这一事件进行谈判的时候，国王还健康如常。而他突然打断谈判，却正是国王快死的时候，勋爵阁下对外交部已经独断独行，好像已成了大不列颠的专制君主了。本来国王把这艘莽撞的“雌狐号”派去是有他一定的打算的，即想刺一下沙皇，表示对阿德里安堡条约不屑一顾并确认切尔克西亚的独立，而勋爵阁下则在国王快死的时候，大笔轻轻地一挥就以国王的名义正式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承认了俄国领有切尔克西亚和没收“雌狐号”的权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这一着玩得真够俏皮！

贝尔先生我们已经说过是上了“官报”了，而当时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一等秘书的乌尔卡尔特先生也被召回，因为“他曾劝诱贝尔先生让‘雌狐号’作这次冒险”。

在国王威廉四世还活着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是不敢公开反对这次冒险的。因此在“文件集”上才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随后才出现了经勋爵阁下审查过的那幅切尔克西亚的地图，接着才有他给贝尔先生写的模棱两可的回信以及他在议院所作的含

糊其词的声明，最后，在“雌狐号”上经管货物的贝尔先生的弟弟在启航时才接到外交部委托转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紧急公文，而驻土耳其政府的不列颠大使庞森比勋爵也才直接鼓动他去做他的这趟生意。

到女王维多利亚即位之初，辉格党的优势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保证了，所以豪侠仗义的子爵的调子也就突然改变。恭顺奉承一变而为傲慢不逊。1837年12月14日托·阿特伍德先生就“雌狐号”和切尔克西亚问题质询勋爵阁下，他回答说：

“说到‘雌狐号’，俄国对自己的行动已作了解释，英国政府对这些解释是可以感到满意的。船被扣留并不是由于违犯了封锁令。该船所以被捉走是因为它的主人违犯了俄国的地方管理法和关税规章。”

勋爵阁下针对阿特伍德先生担心俄国侵略这点说道：

“我认为俄国也像英国一样地向人类提供了维护和平的保证。”（帕麦斯顿勋爵 1837年12月14日在下院的演说）

在议会会议快要结束时，勋爵阁下就向下院提交了他同俄国政府的往来公函，其中两封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引用过了。

1838年，各党派的位置有了新的变化，托利党人又得势了。6月21日他们对帕麦斯顿勋爵发动了突然的攻击。现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当时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乔治·贝尔先生对勋爵阁下提起的控诉，并且处理贝尔先生的赔偿损失的要求。最初勋爵阁下表示极为惊异，说他没有想到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的提议是“这样的琐事”。

罗伯特·皮尔爵士对此大声喊道：“阁下是第一名敢把保护不列颠的财产和贸易说成是琐事的英国大臣。”

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就说：

“关于俄国是否有权统辖切尔克西亚或者是否有权实行它以武力强迫俄国遵守的关税规章和卫生条例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一个商人没有权利要求王国政府表示意见。”

休谟先生问道：

“如果外交部不办这类事情，那末要外交部做什么？”

勋爵阁下继续说道：

“据说，贝尔先生，这位无辜的贝尔先生，是由于我所给他的回答而上了我所设下的圈套。谈到圈套，则这个圈套不是别人给贝尔先生设下的，而是贝尔先生给别人设下的。”

这里指的是贝尔先生向“无辜的”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那些问题。

在这次辩论的过程中（1838年6月21日），一个很大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即使勋爵阁下在1836年有心要去反对俄国的野心，他也不能去做，道理很简单：早在1831年他刚一上台就首先承认了俄国侵占高加索，这样也就偷偷地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正如斯坦利勋爵（现在的得比勋爵）所指出的，俄国当局于1831年8月8日曾通知它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说俄国想要

“对高加索和相邻的土耳其各省的居民之间的自由交往规定卫生检查条例”，还说，大使必须“把上述条例通知驻君士坦丁堡的各外国使团以及奥斯曼政府。”

允许俄国在切尔克西亚沿岸实行除在上述文件中提到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所谓卫生条例及关税规章，就等于承认俄国对高加索的权利，这样也就等于认可这种权利所依据的阿德里安堡条约。

斯坦利勋爵说道：“这些通知通过最正式的手续交给了驻君士坦丁堡的

孟德维尔先生（大使馆秘书），特意要他通知英国商人，而且这些通知也送给了帕麦斯顿勋爵阁下。”

而帕麦斯顿勋爵则“一反历届政府的常规”，没有让也不敢让“劳埃德委员会<sup>331</sup>知道已经发出这种通知的事实”。罗伯特·皮尔爵士惊呼：勋爵阁下犯下了“隐匿六年”之罪。

当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仅以 16 票的多数——184 票反对，200 票赞成——而幸免于罪。但是这 16 票压不住历史的声音，也不能使高加索的山民们静默下去；他们的枪声正在向世界证明：高加索决不“正如涅谢尔罗迭伯爵所断言”而帕麦斯顿勋爵加以附和的那样“属于俄国”！

卡·马克思  
战争问题。——金融状况。  
——罢工<sup>332</sup>

1853年10月7日星期五于伦敦

“纪事晨报”在上星期五的第四号上刊登了一则电讯，报道苏丹<sup>①</sup>已对俄国宣战。而巴黎“祖国报”在昨晚的一则半官方消息中报道，根据来自东方的消息，“纪事晨报”的这个报道尚不能证实。另一家政府报纸“立宪主义者报”报道，由于奥地利使臣德·布鲁克先生屡次提出通知，御前会议于9月25日开会讨论了维也纳照会，会后声明土耳其将坚持列施德—帕沙最近照会<sup>333</sup>中的意见。第二天又召开了参政会。这个由各大臣、顾问、帕沙和最上层僧侣等120名显贵组成的参政会决定：

“如果签署这份没有包括御前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的维也纳照会，对苏丹的主权来说，就是一种耻辱，而且极为有害。既然沙皇声称完全不能接受这些修改意见，并且拒绝撤回他要奥斯曼帝国承担有损帝国独立的义务的要求，参政会只有建议苏丹立即采取保全帝国的必要措施，并从侵略者手里解放自己的属地。”

至于是否已经正式宣战，目前还没有得到任何可靠消息。这

---

① 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

次至少是土耳其政府害苦了西方的外交官。本来，英法两国政府不敢撤回它们的舰队，但同时又觉得再在贝捷克湾保持自己那种可笑的立场已不可能，又不愿以公开向沙皇挑战的姿态通过海峡，所以它们就要土耳其政府以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在拜兰节时有危险为理由请求把贝捷克湾的舰队派来。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指出这种危险并不存在，即使有这种危险，它不靠外国援助也能保护基督徒；土耳其政府声明，在节日结束以前它绝不请求来军舰。可是当联合舰队的前卫刚刚驶过海峡，土耳其政府看到它这时已经把动摇不定和不守信义的盟国置于窘境，于是就表示要战。谈到战的问题，实际上3个月以前俄军越过普鲁特河时就已经开始了。俄军到达多瑙河岸实际上是第一个战局结束。现在可能发生的唯一变化，就是战争将不再是单方面的了。

尽管俄国进行了阴谋活动，但突尼斯的贝伊<sup>①</sup>以及波斯的沙赫<sup>②</sup>仍从他们的优秀部队中抽出6万人给苏丹。因此，可以肯定，土耳其军队已包括欧洲、非洲和西亚的伊斯兰教徒现有的全部军事力量。两个早就在争夺东方霸权的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军队现在对峙着，一个是受个人专制意志的支配，另一个则受环境的宿命力量的支配，这与他们各自的信仰相符，因为正教教会排斥先定论的教义，而伊斯兰教的核心正是宿命论。

今天在伦敦要举行两个会议：一个是在唐宁街，另一个是在“伦敦饭店”；一个是大臣们举行的会议，另一个则是反对他们的会议；一个替沙皇说话，另一个则替苏丹说话。

如果有谁对于联合内阁的意图仍然有些认识不清，那末看了

① 阿罕默德。——编者注

② 纳斯尔-埃德-丁。——编者注

“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社论就会很清楚：联合内阁将用尽最后一分力量来防止战争，恢复谈判，消磨时间，拖垮苏丹的军队，使沙皇继续占据多瑙河各公国。

“泰晤士报”根据可靠的材料兴高采烈地报道：“沙皇主张和平”。沙皇在奥里缪茨<sup>334</sup>“亲口表示了爱好和平的心愿”。不错，沙皇不会接受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意见，他要坚持维也纳照会的最初条文，但他会允许维也纳会议用照会中完全没有的意思来解释这个照会，尽管这个意思与他的大臣涅谢尔罗迭所解释的正好相反。他会允许西方列强专心举行会议，如果西方列强同时允许他继续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话。

“泰晤士报”在爱和平的感情冲动之下，竟把俄皇和奥皇同非洲内地野蛮人的首领相提并论，以便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俄皇由于自己政治上失策而要发动战争，这与世界有什么关系呢？”

都灵、巴黎、柏林和华沙的银行，都提高了自己的贴现率。根据上周发表的银行报告，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又减少 189615 英镑，目前总共只有 15680783 英镑。有效流通的银行券总额约减少 50 万英镑，而期票贴现却增多 40 万英镑，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证实了我在一篇谈皮尔法令的文章中所申述的意见，即流通中的银行券减少或增加并不与银行业务做成多少成正比<sup>①</sup>。

多恩贝克先生在他的商业月报最后说了这么一段话：

“上周发生的政治事件，大大地助长了由于小麦歉收、马铃薯病害流行、轮船吨位不足的消息频传而引起的粮食投机活动。在贴现率的提高已经接近 5% 的情况下，城市的面粉价格每 280 磅上涨为 70 先令，新小麦的价格则上

<sup>①</sup> 见本卷第 334—340 页。——编者注

涨到 80 先令。现在粮食买卖极为紧张。东方可能爆发战争，埃及禁止谷物出口，英国小麦连年歉收，马铃薯病害流行，从国外（特别是从南欧）来的输入量减少，法、比、荷等国的需求量不断增长——所有这些，是使小麦价格再度上涨、使几个主要省份市场的小麦价格于上周每夸特从 1 先令涨到 6 先令的主要原因…… 往年从收割后直到圣诞节，价格总是看跌的，今年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最近几个月以来价格一直在上涨。目前，我国任何地方都还不是粮食真正不够。许多谷仓、仓库和干燥房都已经装不下了，某些海港的堆栈也不够用。所以，近来粮价上涨并不是由于现在粮食不够，而是由于人们怕歉收造成将来的粮食不够，人们都认为时候一到，歉收的后果就要开始显示出来。即将来临的冬天很可能是一个最难熬最困苦的冬天…… 大多数意见仍认为粮价还要继续上涨，而且因为大多数投机商继续搞‘收购和囤积’，所以粮价看样子在明春以前仍然要保持上涨的趋势…… 预料中的高价看来将延续今年一冬。这种高价在明春大概会大大地吸引那些往常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而和英国不相接触的远方国家加紧向英国输出粮食。可以预料，明春世界各地，只要通行无阻，都会增加对英国的粮食出口，所以，同一个原因会引起两种结果，现在是人们存粮不售，以致粮价上涨，而一旦粮价开始回跌，粮商就要极力抛出存粮，粮食的身价就要随之下降。现在的守则是买进，将来的口号就是要卖出。来年会像 1847 年那样，是一个危险的灾难年。”

曼彻斯特市场上的普遍萧条仍在继续。来自奥地利和中国的消息以及关于东方纠纷的消息越来越坏，棉纺厂主、工厂主和商人也越来越心慌。同两个月以前的最高价格相比，普通棉纱的价格每磅下跌 $\frac{7}{8}$ —1 辨士，比同等皮棉的跌价多出约一倍，后者的跌价并未超过 $\frac{1}{2}$  或 $\frac{5}{8}$  辨士。但是，即使是打一个最大的折扣，减价 1 辨士，仍然感到很难卖出去。存货——我们敏感的经济学家用来吓人的东西——正继续增多。自然，不能认为存货的增加会非常迅速。现在，尽管许多市场都已过分膨胀，但商人和厂主仍然有可能以托卖的方式，把自己的商品运到其他市场上推销掉，而且

他们恰好是现在正在最广泛地利用着这种可能性。但适合出口的不列颠工业品数量很大，经过几段时间就能充斥全世界，如果把这些产品全都抛到几个容量有一定限制的市场上去，必然会使那些目前尚称健全的市场发生同样的过分膨胀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动荡。例如，那些报道印度情况有某些好转的消息，仍旧没有说向印度输入可以获利，只不过使人可以指望向印度出口亏蚀要少些，——即使这样的消息，就已经使向印度的出口业务增加得相当多。这些业务，有些是那些素日与印度有贸易来往的公司做的，有些是曼彻斯特的棉纺厂主和工厂主直接做的，这些厂主连一点点向印度做投机性出口生意而得到比较有利的推销机会都不放过，怎么也不愿意承担在日益缩小的市场上销售货物而招致的损失。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句：曼彻斯特的棉纺厂主和工厂主从1847年起就经常把大宗商品自家运到印度和其他国家，用卖来的钱在那里购买各种殖民地货物，然后再自家出卖，或者在北美洲的不列颠属地上出卖，或者在欧洲各港口出卖。当然，这一类投机生意不属于厂主的合法经营范围，从事这种投机的厂主对市场情况的了解自然还不及港口商人的一半；但这种投机生意却很受不列颠棉纺厂主们的欢迎，他们在远方的国家里做这些生意，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实现自己主宰世界工商业命运的宿愿。假如这种投机活动不把相当大的一笔工业游资抽走一年到一年半，那末近五年来英国工厂的数目的增加无疑会快得多。

本国产品在纺织品市场上最不景气。虽然大量织布机已停止转动，但存货仍然继续增加。当然，也不能说其他商品的处境就好一些。

在里子和布莱得弗德，在莱斯特和诺定昂，也都出现了这种

停滞局面。在诺定昂，花边生产的劳动时间已减为 10 小时，甚至 8 小时。针织品的生产早在去年 6 月间就已发生萧条，那时，诺定昂的产量一下子就减少了三分之一。看起来还在不断繁荣的唯一部门是北明翰及其郊区的金属制品的生产。

伦敦小店主破产的事情开始越来越多。

我在 8 月 12 日那篇文章中曾指出，纺纱场场主和工厂主们成立了“制止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骚动厂方合作协会”，该协会由各地方的协会组成，统一由一个中央委员会领导，它要“抵制工厂工人的**有组织的集团**的一切要求，用组织集团的垄断权来巩固资本的垄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迫使工人接受自己的条件。”<sup>①</sup>

这个计划，大约在两个月以前我就向诸位作了报道，而且在这个时期内已经悄悄地实现，在普雷斯顿、波尔顿和曼彻斯特现在正在实施，但是直到现在，伦敦的报纸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这个计划，这不是很稀奇吗？显然，伦敦报界是在竭力向大家隐瞒这样的事实，即工厂巨头们正在有步骤地组织本阶级进行反对工人阶级的战争，他们系统采取的那些措施并不是偶然情况自发产生的后果，而是事先周密策划的，是有组织的反工人联盟暗地里阴谋追求的目的。法国的天主教联盟曾经碰到他们的历史学家——十六世纪末“麦尼普的讽刺”<sup>335</sup>的作者，十九世纪英国的资本家联盟也会碰到自己的历史学家的。

工人们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自然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即当一部分工人罢工的时候，另一部分工人工作，直到罢工工人取得胜利。在工人采取这种行动方式的地方，厂主们便共同约定关闭他

<sup>①</sup> 见本卷第 283—284 页。——编者注

们的所有企业，用这种办法使工人陷于极端贫困。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首先这样做的是普雷斯顿的厂主们<sup>①</sup>。现在有 13 个工厂已经关闭，到下周末所有工厂都将停工，因此就要有 24000 多工人会被抛到街头。织工向老板们递交了请愿书，请求举行谈判，或者把这种争执交由仲裁法庭解决，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拒绝。普雷斯顿的织工得到了周围各区——斯泰里布雷芝、奥尔丹、斯托克波尔特、柏立、惠特奈尔、布莱克本、切尔奇—帕里什、阿克顿、艾尔威尔—魏尔、恩菲耳德、贝恩利、柯恩、贝凯普等地——工人每人捐一辨士的援助，所以工人们确信，抵抗资本专权的唯一手段就是联合他们自己的队伍。普雷斯顿的工厂巨头们于是就对外派出密使，其任务是去破坏对罢工者的援助并鼓动贝恩利、柯恩、贝凯普等地的工厂主关闭他们的企业，用这种办法造成总停工。在某些地方，例如在恩菲耳德，已经命令监工们向老板报告谁是互助运动的发起人，结果有许多从事募捐的工人被解雇了。一方面，普雷斯顿周围各区的工人们号召普雷斯顿的工人保持坚定和团结，另一方面，其他地方的厂主为普雷斯顿的厂主大鼓其掌，称赞他们是时代的真正英雄。

柏立的情况和普雷斯顿一样。波尔顿的纺被工人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先罢工。该行业的老板们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关闭了他们的企业。

厂主们除了同时关闭工厂以外，还采取其他一些协同的步骤。例如在基特利，伦德先生厂子里的织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促使他们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厂主付给他们的工资少于宾格利的安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358 页。——编者注

德顿先生厂子里的织工所得的工资。织工代表团请求伦德先生接见，可是当代表们到他家见他的时候，却吃了一个有礼貌的闭门羹。过了一个星期，安德顿先生厂子里就贴出布告，通知工人要降低他们的工资——织工每匹布工资降低3辨士，羊毛刷梳工每磅工资降低1法寻。伦德先生和安德顿先生这时签订了一个攻守同盟，其目的是用降低那一家织工工资的办法来对付这一家织工。因此，或者是伦德先生的厂子里的织工被迫屈服，或者是安德顿先生的厂子里的织工被迫也举行罢工，而后者罢工之后，负担更重，这样就使罢工者得不到任何支援，于是两家工人都将不得不接受工资的普遍降低。

还有些厂主竭力拉拢小店主来对付工人。例如，得比的主要煤矿的矿主，燃炭大王霍斯福耳先生，当他的工人由于工资降低而罢工的时候，便去找附近各个矿工常去买东西的肉铺、面包铺和食品杂货铺的店主，劝他们不要赊给工人们任何东西。

在设有“制止工人骚动”协会的地方，加入了组织的厂主们议定，这个组织的成员如违犯了他们的联盟章程，或向“干活的人”的要求让步，就课以高额罚金。例如，在曼彻斯特这种罚金高达5000英镑，在普雷斯顿达3000英镑，在波尔顿达2000英镑，等等。

目前的冲突具有一个和过去历次冲突不同的最大特点。在以前各个时期，例如在1832、1839、1840和1842年，所谓**全体过节** [general holiday] 即在**整个王国普遍同时停工**的主张，是很受工人欢迎的主张，也是他们力求达到的一个伟大目标。而现在却是资本家用**全体解雇**来威胁工人。目前是厂主们企图普遍关闭工厂。大家是否认为达到这种目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试验**呢？他们是不是想叫英国人民来一个六月起义<sup>336</sup>，以便把人民日益增长

的愤慨镇压下去，使人民在多年内无力行动呢？

不过，我们还是有可能去更细密地观察英国日益显著的内战征兆，特别是因为，伦敦报界有意装作看不见这些重大的事实，用一些琐碎事情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例如，报道约克郡的一个工业大王泰特斯·索耳特先生在他的工厂宫开幕的时候举行宴会，像皇家那样招待了当地的贵族，同时还招待了他的工人。首都的报纸向读者报道，这位工业大王曾举杯祝“工人阶级的兴旺、健康和幸福”。但报纸却没有报道几天之后他厂子里的织半毛织品的工人们就接到再度降低工资的通知，工资从2先令3辨士减为2先令1辨士。他的一个受害者在“人民报”上说：“如果这就意味着织工们的健康或兴旺，那末至少我个人是不要的。”

大概诸位都从“泰晤士报”上看到，有一位麦克唐奈太太由诺依达尔特去格连加里，她仿效萨特伦德公爵夫人的做法，着手“清扫”自己的领地，用绵羊来代替那里的人。“人民报”根据当地的一位采访员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对这种马尔萨斯式的办法作了如下一段鲜明的描写：

“在这位太太的领地上住着一些贫苦的佃农；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交不起地租；有人告诉我们，某些人还欠下了很多地租账。因此，这位太太便命令他们统统滚蛋，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到山洞和树林里去安身，从那时起他们就住在那里，或者确切点说，一批批死在那里，而麦克唐奈太太的马却在温暖舒适的房屋里享福。同时，她要给被赶走的佃农们去加拿大的路费，——路费比救济穷人的乐捐还少，并且允许他们卖掉他们‘不大的家当’，但是他们除了随身穿的衣服、破旧的桌子和患风湿症的猫以外，就没有什么家当可卖。最后，她慷慨免除了他们所欠的地租账——这笔账她反正是不能收到手了。这就是所谓‘高尚的慷慨’。”

看来，这种赶走居民的事情又在苏格兰山区开始干起来了。例

如，苏格兰的一个土地占有者查理·福尔布斯爵士就曾在“泰晤士报”上写文章这样告诉我们：

“现在养羊是这样有利，以致我们英国饲养羊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现，繁殖羊群，出钱把那些妨碍他们这样做的人赶走，是很合算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0 月 7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10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4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 土耳其宣言。——法国经济状况<sup>337</sup>

1853年10月18日星期二于伦敦

10月1日交给四大国的土耳其宣言，是一个为苏丹对沙皇宣战作辩护的文件，从各个方面来看，它的价值要高于1853年5月以来充斥欧洲的大堆大堆的官方文件。

宣言说：苏丹并没有造成引起纠纷的任何口实。在圣地问题解决以后，就不再有纠纷的借口了。俄国方面破坏了一切条约，而土耳其方面则用尽了一切和解手段。各强国自己都认为，苏丹不应当同意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那末，怎么能够期望苏丹会赞同内容大致同缅施科夫的照会没有什么差别的维也纳照会呢？维也纳会议的解释信根本不可能改变形势。既然俄国甚至对凯纳吉条约的明确条文都作了曲解，难道还可以去冒风险，“把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条文交到它的手里，让它有要求宗教保护权的严重借口吗？”此外，苏丹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已完全被后来公布的涅谢尔罗迭的解释证明是合理的。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本身就构成了 *casus belli*。（宣战的理由），所以土耳其政府现在决定承认这是 *casus belli*。因此，要求哥尔查科夫公爵撤出多瑙河各省。如果哥尔查科夫公爵在接到上述警告后的15天内给以否定的答复，那末奥美尔—帕沙就应开始军事行动，俄国代表就应离开奥斯曼帝国国境，两

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就应停止。但是，对俄国商船将不扣留，而只是命令它们离开土耳其港口。海峡将对各友邦的商船开放。

苏丹宣言的要点就是如此。

土耳其的最后通牒是本月9日通知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所以，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期限是到本月25日为止。不过，对于开始军事行动的威胁，仍然不应当从字面上去理解，因为奥美尔-帕沙决不会离开他的强大阵地去进攻俄军。

昨天的“先驱晨报”证实了我对俄军向西运动和这种运动所证明的它同奥地利有秘密协定<sup>①</sup>的说法。

忠于一套旧的亚洲式的欺骗和小阴谋的俄国，又利用西方世界的轻信散布诺言，说什么沙皇“已经火急地向维也纳派出信使送去声明，表示愿意完全接受调停国提出的一切条件了”，可是很遗憾，他忽然“获悉土耳其政府宣战的消息”。于是，俄国人的圣主自然就收回了他以前曾经做过的一切让步，并且叫嚷说：“现在除作殊死战 [guerre à l'outrance] 而外已别无他法”。这样一来，结果就是苏丹迫使沙皇进行战争。

奥地利使臣冯·布鲁克先生似乎质问过土耳其政府，它是否想建议政治流亡者组织一个外籍军团。列施德-帕沙回答说，尽管有人不断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建议，他还没有采取任何决定；不过，如果土耳其被它的同盟国抛弃，它将认为自己完全有权为了自卫而采取一切手段，并且吸收分散在欧洲各国的政治流亡者服役。

我们在“立宪主义者报”上读到：

“我们有理由认为，目前巴黎和伦敦已经接到土耳其政府请求英法方面

<sup>①</sup> 见本卷第384—385页。——编者注

给予援助的正式呼吁。”

报纸上有消息说，奥皇<sup>①</sup>将自己的军队缩减了将近 10 万人。然而，只有这个数目的人放了假这一点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他们随时都可以应召重新入伍。维也纳当局采取这个步骤，一方面是由于财政困难，另一方面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争取借债的人。

下面是一份伦敦商业通报关于法国粮食贸易的文章摘录，在我们看来，读者会感到兴趣：

“根据各地的广泛通讯所报告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法国小麦的平均收成将减少三分之一，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将有所不同，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将是法国南部。诚然，受政府影响的各家报纸，企图使公众相信事情并不是这样，但是，政府本身所采取的措施，同报界的这种保证却是相当矛盾的。政府先减轻了航海法令的效力以有利于英国，后来就把这些法令彻底取消了；其次，政府规定了减低关税（税额由调节制调整）；现在它规定了最低税率（不顾法国划分地区实行不同税率的作法），而且为外国轮船开放了港口，免交吨税。这以后，政府又允许载运粮食的外国轮船在一切内河和运河自由航行，并且建议各铁路公司按照降低了的税率托运粮食。它开放了自由进入阿尔及利亚的通路，并且允许任何吨位的阿尔及利亚轮船驶入法国境内；政府禁止了马铃薯和蔬菜的出口，而且不惜对许多市场上的买卖双方的关系任意干涉。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不是收成不佳，就是这些预防措施完全多余。法国贸易最近处于惊惶不安的状态。问题不在于整个帝国的商人对收成有所怀疑，而在于政府规定了固定的粮价，这种错误的措施在商人中间引起恐惧，使他们害怕签订合同。大家知道，相应的法令刚一公布，取消粮食合同的电报就如雪片飞去。不可能预测政府的这一措施最终会对价格产生怎样的影响。据初步估计，法国小麦的平均总收获量将是 8000 万百升（约 2800 万夸特）。最近 25 年中产量最高的一年是 1847 年，总量是 9700 万百升，而最低的一年是 1830 年，总量是 5200 万百升。小麦的产量特别在最近几年增长了，它的增

---

①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长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但是小麦储备目前仍然完全用光，这证明，居民的饭食大有改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

下面是最近 25 年内人口增长和小麦产量增加的统计表：

年份	人 口	小麦在 5 年期间的平均年产量 (单位：百升)
1831	32569223	从 1827 年到 1831 年 57821336
1836	33540910	从 1832 年到 1836 年 68684919
1841	34240078	从 1837 年到 1841 年 71512258
1846	35400486	从 1842 年到 1846 年 72015564
1851	35781821	从 1847 年到 1851 年 86124123

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消费增加，将使歉收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本来可以动用的那部分旧的小麦储备没有了，不言而喻，进口小麦的储备也没有了。”

从布莱特先生和科布顿先生在爱丁堡的鼓吹中，从格莱斯顿在曼彻斯特的演说中，以及从若干报纸所做的一旦俄土开战阿伯丁勋爵将由帕麦斯顿勋爵这位豪侠仗义的俄国对头来代替的暗示中，可以看出英国统治阶级对土耳其心怀叵测。

关于监狱情况的调查报告在报刊上一直不停地刊登着。已经揭发出来的材料表明，北明翰的现行监狱制度规定使用颈枷和锁在墙上拷打，莱斯特郡规定使用铁镣，而汉普郡则规定使用饥饿这种比较不那么狠的折磨办法，“这就叫自由的国度！”

我在前一篇文章里说过，同缅甸签订的所谓和约只是一种休战；不列颠侵略者这次所取得的将是一个新的纠纷的无尽的泉源<sup>①</sup>。果然，最近一批陆上邮件带来消息说：缅甸的主战派加强了；新领土上简直到处都有为数众多的土匪队伍，它们受阿瓦政府的

<sup>①</sup> 见本卷第 228—229 页。——编者注

唆使，要求大大加强卑劣的武装力量；“在不列颠军队中，疾病流行，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兵营找不到一处合乎卫生的地方”。

印度的不列颠统治者对有关水利工程的一切事情抱着可耻的漠不关心态度，这就在巴特那地区又引起了该区常见的霍乱和饥荒（这是长期干旱的后果）。

我从报刊上刚刚披露的报告里摘录一份关于不列颠和外国的输船在联合王国海岸附近遇险的统计资料如下：

年 份	遇险船舶	因漏水或 相撞而沉 没的船舶	触岸搁浅 船 舶	人员死亡	遇险船舶 总 数
1850	277	84	304	784	681
1851	358	—	343	750	701
1852	—	—	—	约 900	1100
3 年间遇险船舶总数 .....					2482
人员死亡 .....				2434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0 月 18 日

载于 1853 年 10 月 31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912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 德勒克吕兹被捕。——丹麦。  
——奥地利。——“泰晤士报”谈  
对俄战争的前景

1853年10月21日星期五于伦敦

赖德律-洛兰先生的私人秘书德勒克吕兹先生被捕，是最近在巴黎的逮捕声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他是被派到巴黎来执行秘密使命的，据报道，在他身上发现了于他不利的文件。不能理解的是，赖德律-洛兰先生怎么能够信任一个直到现在还没有洗清在1848年轰动一时的里斯康士事件<sup>338</sup>中出卖过比利时军团的嫌疑的人。

看来，哥本哈根的 coup d'état (政变) 不可避免要做出最后一步了，因为内阁不肯让步，而议会又反对在政府向它提交整个丹麦王国的宪法草案以前取消现行宪法。出现了为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制定的两个单独草案。这两个草案是对旧普鲁士省议会组织法的拙劣模仿：代表名额在几个“等级”之间分配，选举权以占有土地多少而定，选举权的运用受相应选举区的“固定住所”的条件限制。这些宪法草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条：一条规定，废除法院旧有的取消行政决定的权利；另一条规定，凡是由于参加1848—1850年革命斗争而破坏了自己名誉的人，不管

后来是否被赦免，一律剥夺其投票权。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奥地利的裁军法令只是为了引诱借债的人而编造的；现在，当取得贷款的任何希望已消失的时候，当政府宣称它本来就不打算举借任何贷款并且采取了再次发行纸币的办法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执行奥皇关于裁军的法令，相反，指挥驻伦巴第、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部队的将军们，由于这些国家里存在的某种情绪，都毫无例外地要求增加兵员。”

“晨邮报”驻巴黎通讯员就俄皇最近访问奥里缪茨和柏林期间的行动报道如下：

“沙皇的主要目的是在北方列强之间缔结一个新的联盟…… 俄皇为了克服普鲁士的抗拒，采取了种种论据，我要说的是提出了种种贿赂，因为他曾经表示，一旦他被允许进入土耳其领土并且把它保持在自己掌握之中，他愿意给普鲁士一些好处，即放弃占领华沙和对波兰的军事统治。”

至于俄军战胜沙米尔的消息，据巴黎得到的报道，这些消息不过是臆造的产物，因为从5月份起，在高加索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战斗，那时，沙米尔在门多赫附近告捷，企图在马尔卡河进攻的俄军被击退。

“我们完全理解，为了波兰人或匈牙利人的利益对俄作战将多么受人欢迎，——即使我们的干涉除了政治同情以外没有别的原因…… 但是，我们不理解为了土耳其人的利益去进行战争。”

10月12日的“泰晤士报”就是这样写的。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又在这家报纸上读到：

“英俄两国军队的第一次交锋就会成为整个大陆革命的信号。我国的贵族的、财阀的、专制的（随便怎么说，绝不是民主的）领袖们有时是能够考

考虑到这一点的，我们决不认为他们考虑到这一点是不可能，而且也不认为这样的考虑有什么不体面……在为了维护土耳其对某些实际上独立的省份的**有名无实**的主权而对俄作战以前，我们应当作周密的通盘考虑，因为我们那样做会引起奥地利帝国中的起义。”

总之，它一会儿说，英国不应当对俄作战是因为，这样做就是去保护土耳其人，而不是保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一会儿又说，英国不应当对俄作战是因为，为了土耳其而进行任何战争同时也是有利于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战争！

维也纳“新闻报”说，苏丹建议阿布德—艾尔—喀德在一旦发生对俄战争时出任土军司令之职。谈判是通过伊斯兰教总教长进行的；这位艾米尔声明，如果事先对此能得到波拿巴的批准，他同意赴土耳其就职。预定给他的职位是亚洲的土军司令。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0 月 21 日

载于 1853 年 11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17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弗·恩格斯 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

近来在土耳其战场上有几次重要的军队调动，因而有可能更清楚地判断双方的阵地和计划。俄军——我们首先谈谈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是进攻的一方，所以必须认为主动权是属于他们的，——继续向西延伸作战线。整旅整旅的部队相继派往多瑙河上游的维丁方向；现在可以说，俄军的战线是从维丁对面的卡拉法特延伸到希尔索瓦对面的奥腊什，它不仅威胁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而且也同样威胁着通往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道路。俄军第一次向卡拉法特运动后就已非常明显：他们无疑地要侵入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居住地区的中心。同时这种调动还使我们可以预测，俄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直达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采取防御和单纯的佯攻，而在通往索非亚以及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道路上采取坚决的进攻。然而，当俄军这样调动时，土耳其人还没有宣战。宣战是在以后；看来沙皇对宣战一举极为愤怒，所以很可能促使军队采取比原来所预期的远为坚决的行动。不仅帕斯凯维奇公爵被任命为俄军统帅，而且据说还从驻波兰的俄军即从俄国仅次于近卫军和掷弹兵的精锐部队中抽调 4 万人由他率领。这些援军可以保证俄军取得优势，使他们能够在多瑙河上游和下游都采取攻势。同时，这些援军也可以看做是用来对抗据说可能

前来援助土耳其的英法军队的。但是俄国的这些援军无论如何不可能迅速开到多瑙河，在今年就参加作战。从华沙经杜布诺、霍亨和雅西到布加勒斯特，约有 800 英里，而部队的每日行程却不能超过 8—10 英里。因此，这些生力军最早也要过 3 个月后，即在明年 1 月初才能占领自己的阵地；如果考虑到季节的影响，这些部队行军的时间很可能还要长。因而，在明年春季的战局开始以前，这些部队将完全位于作战地区以外。

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军现在约有 13—15 万人。俄军即使由于疾病和逃跑减少 2—3 万人，总数仍将超过与它对抗的土军。关于俄军兵力的真实数字，我们只能根据它派往土耳其的师和旅的数量以及这些部队的编制定额进行判断，而关于多瑙河土军的数字却可以从英、法和皮蒙特三国政府派往该地的军官的报道中知道得非常清楚。所有这些报道都一致认为，甚至在埃及部队到达后，奥美尔—帕沙指挥的土耳其作战部队也不会超过 11 万人，其中只有 8 万人是正规军。在土耳其军队的后方，阿德里安堡有一支由 8 万列季弗（重新应召服役的老兵）组成的预备队，不过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这支预备队的情况的可靠情报。因此，情况仍将是：在打响第一枪时，奥美尔—帕沙指挥的部队在数量上仍将少于自己的敌人，除非敌人严重失策，或者他自己在军事指挥上无懈可击，否则奥美尔—帕沙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于失败。

关于土耳其军队的配置和防御准备的情况，我们也得到了同样确凿的情报。土军修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多瑙河，用以阻止敌人强渡；第二道防线从瓦尔那到苏姆拉；第三道防线在第二道防线的后方，相距约数英里的卡姆契克河畔，那里有一个要塞，可防守巴尔干山脉的山口。据外国军官的记述，这些工事

非常坚固，敌人攻占它们的任何企图几乎注定都要遭到失败。虽然我们非常尊重有重要意义的野战筑城法和这些军官的见解，但是我们认为，接受这一类意见时必须非常谨慎。曾有多少被认为是攻不破的野战工事，结果经过几次霰弹的齐射后，就在第一次强攻时被夺取了！谁不知道，过去最有名的野战工事——托列斯—维德拉斯防线<sup>339</sup>之所以坚固，并不是因为它可供消极抵抗，而是因为它有威灵顿的10万人防守，可是进攻它的马森纳却只有3万人！各个孤立的野战工事，例如山口的野战工事，往往是很有有效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还不曾有过依靠野战工事的消极抵抗在决战中击溃有才能的统帅所指挥的优势敌军的事例。此外，几乎一切都决定于防守野战工事的方法；如果军队缺乏训练或者完全没有训练，那末当敌人以霰弹进行猛烈的射击时，即使有工事的胸墙可以掩蔽，也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土军所设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沿多瑙河建立的。沿多瑙河构筑这道防线的全部意图，就是阻止俄军强渡。从希尔索瓦到黑海的一段多瑙河约长600英里。要在这样宽阔的正面构筑有效的工事并保证这些工事都有守军，就需要有一支超过土军司令官现有兵力5倍的军队；即使土军司令官拥有这样的兵力，如果这样使用，他也会犯极大的错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道防线——这只不过是从鲁舒克到希尔索瓦之间的几处防御工事，顶多只能增加强渡多瑙河的困难，但是不能真正阻止强渡。

第二道防线是从苏姆拉到瓦尔那，也就是土军1829年在那里被击溃过的一道防线。如果土军在这里进行决战，无疑又要被歼灭。看来，这道防线在防御方面有很大的优点，并且容易用人工

来大大加强。在瓦尔那和苏姆拉后方的卡姆契克河防线可能更为坚固，同时还具有迫使敌人必须留下部分兵力封锁上述要塞的优点。但是这两道防线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在后方只有一个狭窄的山口，这是唯一的退路。对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这个缺点就压倒了所有的优点。所以，兵力较弱的军队，如果不能像英军在滑铁卢会战时那样坚信友军会在决定关头对攻击之敌的翼侧进行突击<sup>340</sup>，而决定在这里会战，那就会是不可容许的错误。

我们不能断定，奥美尔—帕沙究竟想怎样利用这些工事。毫无疑问，他很明白他在这次战争中所担任的角色基本上是取守势的一方，所以他用尽筑城学中所能采用的一切方法来加强防线，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企图用这些工事使俄军望而生畏，从而迫使他们不敢在最能直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地点渡过多瑙河呢，还是打算就在这里进行决战。据说，他的部队是这样配置的：不论俄军在苏姆拉方向的任何一点渡河，都能随时痛击其主要一路的先头部队，并在其援军到达前将它击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斗失利，第二道防线就可保证土军安全退却。但是，老实说，在这三道防线的任何一道防线上进行大规模的防御战都是错误的，因为当俄军集中全部兵力进攻时，奥美尔—帕沙就很少有机会获得胜利，俄军如果分兵数路进攻，他将不得不离开自己的防线以攻击其中的一路。对他来说，利用这些工事的最好方法——符合现代战术的唯一方法，就是趁俄军横渡多瑙河的时候利用这些工事作为攻其一路的临时基地，利用每道防线的比较顽强的防御阻滞俄军前进，以及凭借第三道防线尽一切可能扼守巴尔干山脉最主要的出口，而不进行决战。同时也不能否认，任何军队，尤其是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战而放弃这些工事，必然会士气沮丧。因为，他们有要塞围墙

和护城壕还不能据守，那在平地战中怎么能击溃俄军呢？普通兵士，尤其是当他还未经过严格训练时，往往正是这样推论的。所以，如果这些工事果真是起土军要它们起的作用，那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些工事对土军本身的威胁要比对俄军更大。

但是，俄军在瓦拉几亚不是也设防了吗？当然是设防了，不过这里所谈的是另一回事。俄军是进攻的一方；他们的工事只是用于失利时掩护军队退却和阻滞追击的敌军；而且他们的退路连续被形成四道防线的四条河流所横断。这四道防线是多瑙河、阿尔哲什河、布泽乌河和塞勒特河。这里有构筑中间防线的良好条件。这几条天然防线对欧洲军队来说并不是退却时的障碍，而且，只要稍加修筑就可成为追击部队的严重障碍。而主要的是，俄军由于在后方只有一条退却路线，所以无意于在这里进行决战。就我们所能判断的，俄军的工事无疑是符合欧洲战术的，土耳其的工事则大多具有亚洲的特点。这种考虑不周之处，也是土军总的部署的主要特点。土军为了防守君士坦丁堡，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通往该城的最近的道路附近，看来俄军并不打算将首次攻击指向该城，而是指向巴尔干半岛的中部，因为土耳其在那里的统治最弱，而且归根到底在那里有一条俄军通往土耳其首都最近的道路。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不应当忘记。俄军的调动不论现在和过去向来是缓慢的、谨慎的，在冬季他们大概不会采取行动。由于一方企图夺取对方在多瑙河上的某个沙洲而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是可能的。但是只要沙皇不下令采取特别积极的行动，——这种命令很可能因将军们的消极和谨小慎微而不能执行，——就很少有可能在春季以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诚然，强渡多瑙河是可能的，但翻越巴尔干山脉却不会成功，这样，俄军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

之间的阵地可能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

同时土耳其已向瓦尔那派造了自己的舰队。指挥该舰队的斯雷德将军(英国人)看来是非常乐观的。但这也是非常冒险的步骤。的确,俄国舰队除数量而外,很可能在各方面都不如土耳其舰队,但是,当俄军的火炮和战列舰还比土军多一倍的时候,土军就不敢在自己岸防炮台的射程以外进行会战。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舰队就应当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占领较好较安全的阵地,俄国舰队大概不会在那里进行封锁。在瓦尔那,土耳其舰队要冒完全丧失活动能力的危险,但是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就可以保持行动的自由,就可以用于向特拉比曾德和高加索沿岸出征,就可以用于进攻个别的俄国海军基地。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俄军在各方面都比土军占优势。至于奥美尔-帕沙这位公认的能干的土军统帅能不能靠他个人的才能来改变兵力对比,还有待于证实。然而帕斯凯维奇这位老将军,虽然动作迟缓,但是经验丰富,要捉弄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费·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0 月 21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1 月 8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919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弗·恩格斯 神圣的战争

战争终于在多瑙河上开始了,对于双方来说,这是宗教狂信的战争,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战争。果然不出所料,奥美尔-帕沙首先开始了真正的军事行动。按职责来说,他应当采取某种行动,以表明自己决心用武力把入侵的敌人驱逐出奥斯曼帝国。但是,像维也纳的谣传那样,他已把3—5万人派过多瑙河,这个消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可靠的;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那就有理由担心他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他所放弃的这个河岸能保证他有一道很好的防线和多种多样的防御手段;而在他所要占领的那个河岸上,他所拥有的进攻的兵力将少于敌人,而且战败时没有退路。因此,关于他率领这样的兵力渡过多瑙河的报道,在没有接到更确实的消息以前,是值得怀疑的。

在欧洲,战争是在对土耳其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在亚洲情况就不同了。在亚洲,从军事观点来看,土耳其和俄国的交界地区分成了两个完全隔离的战区。山脊,更确切些说,山脉把高加索同中央阿尔明尼亚高原连接起来,并且在流入黑海的各条河流和流入里海的阿腊克斯河以及流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之间形成一道分水岭。这条以前把阿尔明尼亚同欧克辛海隔开的山脉,现在成了将

在其中进行战争的两个独立地区的分界线。山脉到处是悬崖绝壁，几乎寸草不生，只有很少几条道路可以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特拉比曾德和巴士姆到埃尔斯伦的两条道路。因此，这些高山差不多是任何军事行动所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就使敌对双方都不得不在山脉的两面各有一支比较能够独立行动的独立部队。

黑海沿岸地区横贯着许多河流和山溪，形成一道一道的防线。俄军和土军在最重要的地点都设有据点。在这个主要是起伏地的地形上（只有里昂河流域近乎平原）进行防御战，只要敌军没有相应的舰队协同作战，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战果，挡住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因为是山地，只有很少几道防线可以从陆地上迂回）。如果舰队开近沿海地区，必要时运送部队在敌人翼侧登陆，而陆军则进行正面攻击，那末舰队就可以逐个迂回所有这些坚固的阵地，孤立或摧毁国境线任何一面的威力不大的要塞。因此，谁掌握制海权，谁便占有黑海沿岸；换句话说，如果联军舰队不积极协同土军作战，黑海沿岸便很可能为俄军占领。

山脉背面的远离海岸的地区，是幼发拉底河、阿腊克斯河和库拉河的发源地。土耳其的阿尔明尼亚省位于国境线的这一面，俄国的格鲁吉亚省位于那一面。这个地区也是山岭交错，一般说来，军队是通不过的。土耳其方面的埃尔斯伦和俄国方面的梯弗里斯可以算做两个直接的作战基地，基地丧失就不可避免地使整个邻近区域丧失。因此，俄军曾由于强攻埃尔斯伦获胜，决定了1829年的亚洲战局<sup>341</sup>。

但是，某一地点，对于一方是直接的作战基地，对于他方便是直接的作战目标。因此，连结梯弗里斯和埃尔斯伦的道路将成为敌对双方的作战线。道路有三条：一条沿库拉河上游通过阿哈尔齐

赫，一条沿阿腊克斯河上游通过埃里温，一条在前两者之间翻山到卡尔斯。这三条道路双方都有设防城市和据点防卫，因而很难断定哪一条对土军最有利，哪一条对俄军最有利。只要指出这个情况就够了：通过阿哈尔齐赫的道路，是土耳其军队直趋高加索起义地区的捷径，而俄军如果从巴士姆经过乔罗赫流域由沃耳特向埃尔斯伦前进，就可能迂回向前推进了的土军。来自巴士姆的道路与来自梯弗里斯的道路在距埃尔斯伦仅 15 英里的地方会合，因此在上述方向前进的俄军，就有可能截断土军的交通线，如果兵力充足，甚至可以占领埃尔斯伦，因为这个城市的工事是纯粹亚洲式的，不可能成为严重的障碍。

因此，巴士姆是控制山脉两侧的亚洲战区的锁钥阵地。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并考虑到巴士姆在通商方面的意义，那就不必奇怪，沙皇为什么总想侵占它了。不仅如此，巴士姆还是土耳其整个亚洲部分的战区的锁钥，因为它控制着沿海地区通往内地的唯一孔道，这条路可以迂回土军在埃尔斯伦前面的一切阵地。黑海的两国舰队，谁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回海港，谁就能控制巴士姆。

俄军十分明了这个据点的重要性。他们分水陆两路增援南高加索沿海地区。不久前我们就已相信，土军在欧洲虽然比较弱小，但在亚洲却占很大优势。据报道，亚洲土军司令官阿勃迪—帕沙拥有 6—8 万人，有的甚至说有 12 万人，并且每天还有数以千计的贝都英人、库尔得人和其他好战的非正规部队投到他的麾下。据说，已为高加索起义者储备了武器装备，一旦宣战，土军就将向这个反俄基地的中心突进。在这方面，必须指出，阿勃迪—帕沙未必能有 3 万以上的正规部队；他在到达高加索之前，必须用这支兵力——也只能用这支兵力——同顽抗的俄军部队作战。骑马的贝都英人

和库尔得人可以出色地用于山地作战，以迫使俄军大大地分散兵力，从而削弱其主力；他们还可以使俄国境内的格鲁吉亚人的村落和俄罗斯族移民的村落遭受许多损害，甚至可以和高加索的山民建立某种秘密联系。但是，如果阿勃迪—帕沙的正规部队不能封锁住从巴士姆到埃尔斯伦的道路并击溃俄国人可以集中的作战部队的主力，那末非正规部队的战果仍然是保不住的。在我们今天，要胜利地进行任何起义或非正规的军事行动以对抗强大的正规军，就必须有正规军的支援。土军在这个边境上所处的地位颇似威灵顿在西班牙所处的地位；我们将看到，阿勃迪—帕沙是否善于用兵，就像英国将军一样，善于对付在正规作战和必需物资方面都大占优势的敌人。1829年集结在埃尔斯伦前面的俄军共18000人；考虑到自那时起土军已进行了改革（虽然在亚洲的那部分土军改革最少），我们认为，如果俄军现在能在这个地点集中3万人成为一支突击力量，他们便有很大把握获胜。

现在，有关亚洲俄军的可靠材料比欧洲俄军的少，而谣传却比较多，在这种时候，谁能预言他们是否做得到这一点呢？高加索俄军按满额数字名义上是20万人；21000名黑海哥萨克已派往土耳其边境；据说，有几个师已由敖德萨乘船前往高加索南部海岸的列杜特—卡列。但是大家知道，高加索俄军尚不及正式编制人数的一半，派往高加索山脉以南的援军显然不可能达到俄国报纸所报道的那个数字。根据我们收到的一些互有出入的消息，根本不能够哪怕是大概估计出亚洲边境上俄军的兵力。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双方的兵力很可能大致相等（高加索人立即普遍起义的情况不算在内），也可能土军稍多于俄军，因此，完全有理由在这个战区采取攻势。

土军在亚洲成功的希望的确要比在欧洲大。他们在亚洲只需守住一个重要的据点——巴士姆。向高加索山脉北面的进军，无论从巴士姆出发或是从埃尔斯伦出发，如果成功，便可以和他的同盟者——山民取得直接的联系，还可以至少由陆上一举截断南高加索俄军与俄国的联络，这样就可以全歼这一支军队。另一方面，土军如果失败，顶多只会失去巴士姆、特拉比曾德和埃尔斯伦，即使是这样，俄军仍然没有足够的兵力继续前进。土军的得将大大超过失败时可能的失，因此，根据这些明智的和正确的看法，土军看来已经决定在这个地区打进攻战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0 月 27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1 月 15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925 号

## 卡·马克思 战争。——罢工。—— 生活费用上涨

1853年11月1日星期二于伦敦

伊萨克查炮战<sup>342</sup>的消息刚传到伦敦,就有一则电讯从维也纳传到巴黎和伦敦,这则电讯说,土耳其政府按照四个强国的代表的要求,已经下了命令:如果军事行动尚未开始,就推迟到11月1日。双方在伊萨克查打炮是否应看做是军事行动的开始呢?这就是证券交易所和报界极为关切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不管情况怎样,休战期到今天就满了。

据传土耳其军队已在维丁和曼成,即在保加利亚东南和西北边境,越过多瑙河。这个消息是非常靠不住的。据今天巴黎的“新闻报”报道,塞拉斯基拉特<sup>343</sup>在10月15日16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作了决定,一旦得知哥尔查科夫公爵正式拒绝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的消息,就在亚洲的两个不同地点开始军事行动:从黑海和格鲁吉亚边境攻打波提要塞。这家报纸还报道,刚被任命为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已经带了一个由工程部队和炮兵部队的军官组成的参谋部动身到土耳其去了。巴拉盖先生是以蹩脚的将军和高明的阴谋家而出名的。诸君可以回想一下他在著名的普瓦提埃街俱乐部<sup>344</sup>中的丰功伟绩。

在俄国对欧洲战争响起第一阵炮声的同时，目前在工业区中猛烈展开的资本对劳动的战争也发生了第一次流血。星期五晚上，威根发生了风潮，风潮是由煤矿工人和煤炭大王之间的冲突引起的。据报道，星期六城里完全平静，但是，今天电报给我们带来的消息是：在克罗弗德勋爵或巴卡勒斯伯爵的矿上，煤矿工人进行了袭击，结果招来了军队，士兵开了枪，打死了一个工人。由于我要从出事地点的私人那里得到情报，所以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我要迟发一些，只希望读者对于“每日新闻”和“泰晤士报”的报道多加检点，因为这两家报纸头一家直接受曼彻斯特学派津贴，而后一家正如“先驱晨报”公正地指出的，是“工人阶级的疯狂的、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敌人”。

在1842年，曼彻斯特学派打着贸易自由的旗帜把工业无产阶级吸引到武装反抗运动中来，并且在危险的时刻出卖了它<sup>345</sup>，关于这一点，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也曾向科布顿派的先生们公开地谈过。在这个时期，曼彻斯特派的口号是：“**廉价食品和高额工资。**”但是谷物法刚一废除，曼彻斯特派所理解的那种贸易自由刚一实现，他们的战斗号召就变了：“**低额工资和高价食品。**”由于政府采取了曼彻斯特派的贸易制度，工业巨头就在自己的肩上担起了一项在他们统治下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任务，即保证工业不停的发展和商业不停的繁荣。这样一来，曼彻斯特派就把自己遇到灾难时的一切退路都截断了。现在已经不能像在1831年时那样用议会改革来愚弄群众了；议会改革运动为资产阶级赢得的对立法的影响已经完全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同时，工人阶级也造成了自己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现在已经不能把工业制度中发生的一切反常现象和这个制度内部产生的那些可怕冲突都归咎

于贵族保护关税派了，因为贸易自由几乎已经存在了 8 年，实行贸易自由的条件非常有利，而且还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仿佛是被现代造物主的灵感突然创造出来的藏着金子的世界。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逐渐地、一步一步地、亲手毁灭了它精心培育出来的一切幻想，而在过去，它却可以在危急的时候利用这些幻想把激愤的工人阶级诱开，使他们不去反对自己的真正的敌人，并且把工人阶级的激愤情绪转移到工业巨头自己的敌人身上，即转移到土地贵族身上。在 1853 年，厂主所采取的虚伪的欺骗办法行不通了，工人所抱有的天真幻想被打消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具有了尖锐的形式，它成为公开的、官方承认的和所有人都很清楚的事了。厂主们在自己最近的一个宣言中大叫：“现在已经不是**工资问题**，而是**应当由谁来统治**的问题了。”曼彻斯特自由派终于从自己身上剥下了狮皮。他们现在只力求做到：让资本来统治，让劳动受奴役。

**同盟歇业对罢工**——这就是目前在工业区进行的大诉讼，这场诉讼大概要由刺刀来作判决了。一整批工业大军，7 万多名工人被解雇，流落街头。除了普雷斯顿和威根的歇业的工厂以外，在贝凯普区，其中包括贝凯普、纽切尔奇、罗坦斯塔尔、沙恩弗德、斯坦福等地的工厂也都歇业了。贝恩利的工厂已在上星期五停工，帕迪罕的工厂在上星期六停工；在阿克林顿，厂主们正在计划宣布同盟歇业；在柏立，已有 1000 人不去做工，厂主们对工人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停止为本城和普雷斯顿的罢工者募捐，就要宣布同盟歇业”；在金德利，星期六下午已经歇业了 3 个大工厂，这样一来又有 1000 多人失去了工作。

伪善的、巧言粉饰的、凶恶的曼彻斯特派骗子集团一方面在爱

丁堡大谈和沙皇讲和<sup>346</sup>，另一方面却在曼彻斯特对自己的同胞进行战争。它一方面鼓吹在俄国和欧洲之间进行仲裁，另一方面却高傲地拒绝自己同胞提出的一切举行仲裁的建议。普雷斯顿的工人曾在一次露天群众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工厂工人的代表建议市长召集厂主和工人的公开会议来和平解决目前的争端”。但是厂主们不要仲裁。他们只要独裁。正当欧洲的战火烧起来的时候，这些亲俄的宣传家大叫裁减军队，同时则为内战扩充军队，——在郎卡郡和约克郡扩充警察力量。如果我们要对工人说话，那我们只能赞同“人民报”的意见：

“如果他们要使郎卡郡的工厂全都歇业，那末就派代表到约克郡去，去向西莱丁的英勇工人求援。如果西莱丁的工厂也要歇业，那末就到诺定昂和得比去，到北明翰和莱斯特去，到布利斯托尔和诺里奇去，到格拉斯哥和基台尔明斯特去，到爱丁堡和伊普斯维奇去！让你们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出去吧！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劳动部门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如果企业主存心拿出他们这个阶级的全部力量来对付你们，那末就号召你们的整个阶级组成战斗队伍去对付他们。如果他们想要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那末就让他们如愿以偿，且看这场大搏斗会有怎样的结局吧。”<sup>347</sup>

一方面，厂主和工人之间正在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贸易正在同市场商品过剩的现象进行斗争，而人的爱好劳动的要求也正在同自然带来的灾难进行斗争。

在中国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读者注意中国革命对大不列颠的社会状况所可能发生的那种破坏性的影响<sup>①</sup>。

现在“观察家”报道：“中国发生的起义正在产茶地区不可抑制地扩展；结果，伦敦市场上茶叶的价格上涨，而上海市场上的细竹布的价格下跌。

① 见本卷第109—116页。——编者注

在利物浦巴什比股份公司的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上海的茶叶市场的开市价格比前季要高 40—50%。存货不多，而新货到得很慢。”

根据广州最近的消息，

“起义运动渐渐蔓延全国，**贸易有完全被破坏的危险**；工业产品几乎全都跌价，有时跌得很厉害。存货数量很大，而且越积越多，所以我们担心将来情况也未必能够好转。在厦门，除了几箱鸦片以外，进口贸易目前显然已经停顿下来”。

关于上海市场的情况，是这样报道的：

“红茶和生丝都是自由售卖的，但是物主提出的条件却大大地限制了业务；**没有人愿意换取工业品**，因此，成交主要是靠价格很低的鸦片和从广州带来的银锭。从广州已运出大量金银，储存很快就会用完，所以我们不得不到别处设法筹借银锭和银币，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很快就无法采购产品，除非在进口贸易中情况发生显著的好转。进口贸易的业务极受限制，现在主要是用拍卖的方式销售次品。”

10月21日曼彻斯特基卜生公司的贸易通报指出，当前萧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

“不仅在目前从我们巨大的中国市场上不断传来坏消息，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得到这类消息，因为人们对钱财交易抱着不信任心理，这种情况在长时期内那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在这个大帝国的管理和制度方面看来将要实行的普遍的和根本的变革的结果。”

关于澳洲市场，“墨尔本商业通报”作了如下的报道：

“一个月以前采购的并且当时就如约到手的货物，卖出后获利至少有 100—150%，而现在卖货的款项连开支都不够。”

上星期接到从菲力浦港来的私人信件，也带来了关于市场状况十分不好的消息。大批商品继续从世界各地运来，但是这些商品的售价极低，以致弄了大批船舶充当仓库，免得当时就亏本。

因此，各家贸易通报继续报道工业区市场停滞和价格下跌的情况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例如，从10月21日曼彻斯特弗烈伊捷尔父子公司的通报上，我们看到：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业务范围都大受限制，价格或多或少地普遍下跌。目下可以肯定，以下几种货物价格已继续下跌：7号印花布每匹下跌8辨士，印度白棉布每匹下跌 $1\frac{1}{2}$ —3辨士；长50—66里德<sup>①</sup>宽34—36英寸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 $4\frac{1}{2}$ —6辨士；36—72里德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3辨士； $5\frac{1}{4}$ —6磅的39英寸的低级衬衫料子每匹下跌约 $4\frac{1}{2}$ 辨士；宽39英寸和长60—64里德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3辨士；45—54英寸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 $4\frac{1}{2}$ — $7\frac{1}{2}$ 辨士；5—8号的低级薄棉布每匹下跌 $1\frac{1}{2}$ 辨士，而14—16号的方格薄棉布每匹则下跌3辨士；《T》字布每匹下跌 $1\frac{1}{2}$ 辨士，长布每匹下跌3辨士，而各种家庭手工织的料子每码则下跌约1—16辨士。纱线落价的有波纹纱，主要是低级和中级的波纹纱，看来比上个月的单价要低 $\frac{1}{4}$ — $\frac{1}{2}$ 辨士。40号细纱价格跌得特别多，售价比今年最高价格每磅足足减价1辨士。其他各种纱，价值在20先令到60先令以内的，也都落了价。”

关于粮食市场的情况，伦敦“每周快讯”<sup>348</sup>作了如下的报道：

“至于小麦，据已经打场和计算产量的农场主说，收成将比他们预计的更低。他们甚至把它称为半个收成。”

此外，一连约有两星期，天气阴冷潮湿，这对于小麦的播种和已经播种了的小麦极为不利，使人们极为担心1854年的收成。

来自牛津郡的消息说：

---

<sup>①</sup> 1里德约等于3米。——编者注

“总的来说，小麦收成特别差；往常每英亩产 40—44 蒲式耳的农场，今年只产 15—20 蒲式耳，而某些耕种得很好的小麦田和豆田每英亩总共只产 8—10 蒲式耳。马铃薯由于遭受严重的马铃薯病害而收成很低。”

来自约克郡的消息说：

“由于阴雨连绵，一切农活都完全停止了，而目前还未收割的庄稼——真可惜，其中包括全部豆子、大部分春麦和一部分燕麦——由于对坏天气没有很好防备，受潮很厉害，即使经过干燥的春风吹过以后，能不能打谷还成问题。同时，这些谷子有很多都发了芽，无疑的，这些最后的物资将损失很大一部分。至于这里所说的损失究竟多大，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从提斯一直到卡帖里克，到斯托克斯利，然后到克利夫兰的整个低地，再到从条尔斯克起到沿海的东部，到从哈罗格塔、哈姆贝尔起到沿海的西部，大量禾谷受到雨淋，并由于潮湿而腐坏了；至少有 50% 的马铃薯得了病，收成无望；不仅如此，还需要增补种子，可是旧种子储存不多。十分明显，国内所有产麦区遭到了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未有过的灾荒和歉收。”

来自哈特福郡的消息说：

“今年我们这地方到这个时候庄稼还没有收割完，这种情况是完全反常的。然而这是事实；许多田里的燕麦还没有运走。相当大一部分春播豆子也没有运走，而有的地方甚至连大麦也还没有运走；还有一些田甚至连早春麦也还没有收割。”

上星期六，在“经济学家”上刊登了下面一张表格，表明在 1853 年 1 月 5 日—10 月 10 日期间联合王国输入的小麦和其他各种谷物以及各种粗磨粉和精磨粉的数量。

输 出 国	小 麦 (单位: 夸特)	小 麦 面 粉 或 上 等 面 粉 (单位: 公担)	各 种 杂 粮 (单位: 夸特)	各 种 粗 磨 粉 的 和 精 磨 粉 的 总 数 (单位: 公担)
俄国经过北方的港口·····	69101	64	307976	65
俄国经过黑海港口·····	704406	—	1029168	—
瑞典·····	3386	13	8809	13
挪威·····	—	1	561	1
丹麦·····	220728	5291	733801	5291
普鲁士·····	872170	3521	899900	3521
梅克伦堡—息维林·····	114200	—	123022	—
汉诺威·····	19187	—	146601	—
奥登堡·····	2056	—	19461	—
汉撒城市·····	176614	53037	231287	53066
荷兰·····	58034	306	132255	308
比利时·····	15155	353	20829	353
诺曼底群岛(外国产品)·····	526	4034	629	4034
法国·····	96652	857916	470281	858053
葡萄牙·····	4217	4	21657	4
亚速尔群岛·····	630	—	14053	1
西班牙·····	13939	177963	48763	177985
直布罗陀·····	—	9	4368	9
意大利:				
撒丁领地·····	7155	2263	8355	2263
托斯卡纳·····	48174	67598	45597	67598
教皇国·····	39988	—	41488	—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	8618	2	11977	2
奥地利领地·····	44164	370	106796	370
马尔他·····	28569	—	56281	—
伊奥尼亚群岛·····	82	—	16220	—
希腊·····	1417	—	10221	—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	209048	—	601481	—

输 出 国	小 麦 (单位: 夸特)	小 麦 面 粉 或 上 等 面 粉 (单位: 公担)	各 种 杂 粮 (单位: 夸特)	各 种 粗 磨 粉 和 精 磨 粉 的 总 数 (单位: 公担)
叙利亚·····	21043	—	24686	—
埃及·····	297980	—	543936	—
其他的土耳其领地·····	218407	7370	689703	7370
阿尔及利亚·····	—	—	21661	—
摩洛哥·····	3	3	13451	—
英属东印度·····	—	205	—	205
英属北美·····	45587	232216	62626	232493
美利坚合众国·····	434684	2388056	630324	2389283
巴西·····	—	3	237	320
其他国家·····	1	148	8	148
总计·····	3770921	3800746	7093458	3802743
3800746 公担小麦面粉 的等价物·····	1085927			
全部小麦(麦子和面粉)·· 3802743 公担的粗磨粉 精磨粉的等价物·····	4856848		1086522	
麦子和精磨粉和粗磨粉 的总额·····			8179980	

“规济学家”为了消除西蒂的商人的忧虑,就从上面的表格作出以下的结论:

“在 1847 年,尽管实行高价输入这种特殊的刺激办法,我们在全年内输入的小麦(麦子和面粉)只有 4464000 夸特。在今年的 9 个月内,我们没有用这种刺激办法,而且不把上两个月计算在内,就已输入了 4856848 夸特。因此,关于这样大量的输入对我们国内供应的影响,完全可以从下面两点中肯定一点:或者是把大部分输入的小麦用于消费,从而在相等程度上把我们本国的产品保存下来,或者是把它存在仓库里,以备后用。”

然而,这种二者择一的情况是不存在的。由于大陆各国已经实行或即将实行禁止输出粮食的措施,粮商认为,目前在英国把自己的储备粮放在仓库里是恰当的,以备英国的粮价上涨到比大陆粮价更高的时候再用。此外,与1847年的情况相反,在那些可能受到俄土战争影响的国家中的储备粮达2438139夸特谷物和43727公担面粉。11月30日以后埃及也将禁止输出。最后,英国在今年只能指望得到其他国家的通常的**每年**余粮,而在谷物法快要废除的时候,它可以在缺粮时期手里有外国在丰收时期积存的粮食。

“泰晤士周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情况作了以下的估计:

“4磅重的大圆面包的价钱是1先令,天气一直是这么坏,像目前这样坏的天气是50年内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都卷入了罢工的热潮,亚洲霍乱又在我国流行起来,战争狂热又支配着我们。我们只是欠缺军事税和饥饿这两项,不然的话,英国的灾难就算齐备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1月1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3年11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25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 波斯进军阿富汗和俄国进军中亚。  
—— 丹麦。—— 多瑙河和亚洲的  
军事行动。—— 威根的矿工<sup>349</sup>

1853年11月4日星期五于伦敦

波斯驻圣詹姆斯宫廷大使沙菲汗突然被沙赫从英国召回。这次召回同波斯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sup>350</sup>巧合在一起(据说,波斯在阿富汗占领了赫拉特),而且也同俄国进军希瓦汗国的首都希瓦这事件<sup>351</sup>巧合在一起。波斯和俄国的进军可以看成是一路从西一路从北向旁遮普(英国东方领地的北部前哨)的两路进军。俄国的进军由彼罗夫斯基将军指挥,他就是那位在1839—1840年进军希瓦时曾遭到失败的将军。近几年来,俄国在咸海建立了一支区舰队,现在能够溯阿姆河而上了。

俄国的一支很大的分舰队正在波罗的海巡逻,不久以前,它在这里曾经有机会侦察过瑞典哥特兰岛的斯利特工事和港口;俄国渴望像占领阿兰群岛(阿兰群岛位于瑞典沿海,1836年俄国在此构筑了强大的工事)那样占领哥特兰岛。俄国舰队离开哥特兰以后接着就开赴卡特加特和松德,目的是支持丹麦国王策划的 coup d'état(政变),因为哥本哈根的议会很有可能会拒绝驯服地接受宽大的沙皇钦定的所谓全国宪法(Gesamt- Staats- Verfas-

sung)。哥本哈根的局面是这样的：丹麦政府由于得到农民联盟的  
成员的支持，废除了 Lex Regia (王位法)，实行了新的王位继  
承法。农民联盟是以切尔宁上校为首的政党，它主要是力求变  
Feste Gut (一种封建性的农民掌管的地产) 为自由财产，力求颁  
布有利于农民和改善他们状况的市政法。民族—自由派的政党 (丹  
麦的叫法是埃德尔丹麦人党，它在 1848 年曾组成“卡集诺”内阁  
352，迫使国王接受了 1849 年的宪法，并且进行了反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战争) 主要由一些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的人组成，它同  
大陆上其他一切自由派政党一样，忽视考虑基本人民群众利益的  
必要性，而丹麦的基本人民群众就是农民。因此，它失去了自己对  
人民的影响，政府几乎完全不让它参加本届下院的事也做成了，现  
在该党在下院里的代表不过寥寥十来个人。然而，统治集团借农民  
联盟的成员的帮助摆脱了它所仇视的埃德尔丹麦人党这个反对派  
以后，便撕下了假面具，任命了厄斯特德先生这位两党都不欢迎的  
人物当首相；他们不仅不再巴结农民政党，而且还利用国王的否决  
权禁止公布政府自己当年提出来诱骗农民的新市政法。受政府欺  
骗和侮辱的农民联盟的成员，便同埃德尔丹麦人党组成了联盟，并  
且任命蒙腊德 (牧师、埃德尔丹麦人党的领袖之一) 为宪法委员会  
副主席。随着这个联盟的成立，一切想用宪法废除宪法的希望都没  
有了，于是——既然整个计划都是俄国人制定的，并且是为了他们  
的利益——在危急关头，俄国的分舰队就出现在丹麦的领水上。

维也纳和柏林的所有报纸都证实了关于土军用大量兵力强渡  
了多瑙河的消息。据“奥地利通讯”报道，俄军在小瓦拉几亚击退了  
土军。电讯中有一条消息说，10 月 21 日两军在亚洲进行了一场重  
大的会战。在得到比较详细可靠的消息以前，我们对于是什么情况

促使土军统帅在维丁附近渡过多瑙河暂不发表意见；乍看起来，这种机动似乎是一个大错误。“科伦日报”说，哥尔查科夫公爵在瓦拉几亚查封了所有的金库（没有指明哪些金库，官家的还是其他的）；另一家德文报纸说，这位将军命令把集中在多瑙河准备出口的全部粮食储备运往腹地。

今天的各家法文报纸证实了沙米尔在同沃龙佐夫公爵部队的战斗中获得胜利的消息。据“阿格拉姆报”报道，丹尼洛公爵接到俄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他读了信以后，就命令把集中在门的内哥罗境内的全部粮食都运到扎勃利亚克。在门的内哥罗，正在准备弹筒和铸造弹头。据说，俄国通知了门的内哥罗统治者，俄土两军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将是爱国的圣战，门的内哥罗人有责任警觉地保卫自己的疆界，使邻省不可能帮助土耳其政府。

维也纳报纸“漫游者”在10月27日说：据圣彼得堡来信，俄皇尼古拉颁布了建立后备军的命令，其司令部将设于沃伦。

上星期二在布莱克本，由于圣彼得区教会管理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发生了骚动；并且调来士兵进行干预。

普雷斯顿的工人领袖考威尔先生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就威根发生的骚动宣称：

“他对威根发生的事件深表遗憾。他很惋惜，威根的工人觉悟不到不应当到平均主义体系里找出路。工人们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制造的财产加以毁坏，这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财产本身根本不会给他们带来损害；占有这种财产的人才是掠夺者。希望工人们尊重财产和人的生命。行动温和，遵守秩序和保持安宁，才能有把握取得有利于他们的斗争结局。”

我决不认为威根矿工付出了七个人的鲜血的代价的盲目暴力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明白，特别是对于工人阶级的

下层(矿工无疑是工人阶级的下层)来说,当极端的贫困和老板的无以复加的横蛮逼得他们作绝望的挣扎的时候,要行动“温和”,“遵守秩序和保持安宁”该是多么困难呵。老板们常常特意挑起骚动,以便有可能调来武装力量,并且根据地方当局的指令驱散一切工人集会,像他们在威根所做的那样。星期五白天在威根城发生的骚动,就是煤炭大王们制造的,他们大批人集合在怀特塞德皇家旅馆开全区大会,讨论矿工的要求,并且通过了拒绝同工人作任何妥协的决定。星期一在威根附近的海格发生捣毁锯木厂事件,其目的在于反对外来的矿工,他们是拜尔凯利斯伯爵的代理人皮斯先生从威尔士运来代替正在罢工的煤矿工人的。

矿工对自己的工人兄弟使用暴力来阻止他们干矿工已放下不干的的工作,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老板们互相约定彼此大量罚款迫使所有的人都参加**同盟歇业**的时候,再看到工人们以更加赤裸裸但是并不虚伪的方式使用强力来进行自己的**罢工**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约瑟夫·休谟先生本人在他写给普雷斯顿工人的一封信中说:

“在那些主张用仲裁而不是用战争来解决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人当中,我看到有许多是现在同自己的工人开战的工厂主。”

普雷斯顿企业主协会公布了一个为普遍同盟歇业作辩护的宣言。写这个宣言的人是不是真诚,可以根据下面的事实来判断,这就是:宣言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工厂主的秘密联盟(联盟的纲领我在两个月以前已经向读者诸君介绍过了<sup>①</sup>),因此,蓄意造成的密谋,结果就被涂上了一层老板们似乎不能逃避的必然性的色彩。他们

<sup>①</sup> 见本卷第 283—284 页。——编者注

责难工人硬要增加 10% 的工资，少一点儿都不干。但是他们却不告诉公众，老板们在 1847 年缩减工资 10% 时曾答应一旦复苏时期到来就恢复原来的工资；他们也不谈工人们从布莱特先生、科布顿先生之流所描绘的五彩缤纷的图景中，从整个资产阶级报界的一片颂扬声中，从议会开幕式上的国王敕语中，已经不止一次地了解到，实业是复苏了。老板们也不提从那时起粮食上涨了 40% 以上，煤炭上涨了 15—20%，肉类、蜡烛、马铃薯以及工人阶级的一切其他日用品约上涨了 20% 左右，也不提工厂主们在“**廉价粮食和高额工资**”的口号下已经取得了对自己的敌人的胜利！企业主们非难工人们，说他们继续坚持同一个城市的同类企业的工资要平等。难道他们的老板们的全部学说，即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学说，不就是从全国存在着这种平等的假设出发的吗？企业主们硬说，工人们是按照某某委员会的命令行事的。工人们好像在受“异乡人”、“自封的领袖”、“以鼓动为职业的人”的煽动。在反谷物法同盟 353 时期，保护关税派也是这样说的，那时他们责难这些工厂主服从布莱特先生和科布顿先生“这两个以鼓动为职业的人”的领导，责难他们按照曼彻斯特革命委员会的指令盲目行事，这个委员会征收会费，指挥讲演人和传教士大军，使大大小小的出版物在全国泛滥，形成一个国中之国。最有趣的是，老板们自己在责备工人们“按照某某委员会的命令行事”的时候，却给自己取了一个“厂主联合会”的名字，以委员会的名义公布自己的宣言，同曼彻斯特、波尔顿、柏立等等地方的“异乡人”暗中勾结。其实，老板们的宣言中谈到的“异乡人”，只不过是邻近工业区的工人罢了。

同时我也不认为工人们会达到他们罢工的直接目的。相反，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过，不久的将来，工人们罢工将不是为了

提高工资,而是反对降低工资<sup>①</sup>。现在降低工资的事件日益频繁,正在引起同样多的罢工。正像我以前指出的那样,这整个运动的真正结果将是“工人阶级的活动将迅速转入政治领域,而在罢工过程中争得的新的组织——工联,对他们将有重大的意义”。厄内斯特·琼斯以及宪章派的其他领袖重新展开了斗争;上星期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群众大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企业主阶级对我国各行各业的工人采取联合进攻,抗拒合理的劳动日付给合理的工资的原则,大会认为,只有企业主阶级的垄断消灭了,劳动者阶级通过人民宪章的实行在议会下院的代表名额争得了,工人现在的斗争方能以胜利告终。只有那时,这个阶级才能颁布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只有那时,它才能废除不公正的法律,掌握劳动资料,获得高额的工资、廉价的食物、稳定的商业,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4 日  
载于 1853 年 11 月 18 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 3928 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377 页。——编者注

##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多瑙河上业已开始军事行动,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丝毫疑问了。奥美尔—帕沙在维丁附近渡过了多瑙河,占领了卡拉法特(对岸的一个市镇),并向克拉约瓦派出了前卫;在另一个地方,土军正在从鲁舒克向对岸的茹尔日沃城进攻。据说,土军还在第三和第四个方向上,向布来络夫和都诺进攻。同时,在沃耳特尼察附近也发生了会战,不过俄军是进攻的一方。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报道之一来看,这次会战持续了3小时之久,结果俄军被击退;但是11月8日晚上收到的维也纳的另一个报道又说,会战持续了28小时之久,还是不分胜负。看来,前一个报道比较属实。

关于其他战斗的结果,也是传说纷纭。从各个报道来看,茹尔日沃的战斗是没有结果的。布来洛夫和都诺战斗的结果,我们毫无所知。至于从卡拉法特发动的进攻,有的电讯说,土军取得了某些成功,并迫使俄军退却了;有的电讯却说,土军在进攻之初即受阻,并被击退到卡拉法特。前一种说法比较可靠。

实际上只有一点是可靠的:根据下面我们分析的原因,奥美尔—帕沙放弃了原来我们认为土耳其在这一边境上理当采取的战术即防御战术<sup>①</sup>。他采取了进攻行动,并且趁俄军自小瓦拉几亚退却

<sup>①</sup> 见本卷第380、483页。——编者注

的时机，于 10 月 28 日在自己防线最左翼的维丁附近渡过了多瑙河，但是兵力有多少，我们完全不能断定。然而，在此以后，据我们所知，土军在其他地点只进行佯攻或局部攻击，同时，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以少量兵力渡过多瑙河这样的大河又极不明智，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奥美尔—帕沙率领的部队按道理自然是作战兵力的大部分。除非绝对可靠的情报才能使我们相信：他像某些报道所说的，只带 7000 人冒险渡过了多瑙河，除远在 150 英里以外的索非亚有 8000 人外，再也没有援军和预备队。但是，由于不久前土军主力还集结在瓦尔那、苏姆拉和鲁舒克，所以我们也很难说明，奥美尔—帕沙是用什么方法把军队的基本兵力这样突然地集结到远离上述三地平均为 250 英里的维丁地区的。

这个问题最可能的答案是：奥美尔—帕沙考虑到俄军向维丁方向推进，因而改变自己军队的防线，把它稍向左移。他责成鲁舒克、锡利斯特里亚、瓦尔那和苏姆拉等地的守军防守直通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后，就选择鲁舒克作为右翼的据点，选择维丁作为支援左翼的据点，以尼科波尔为中路军队的集结地点。这道从鲁舒克到维丁的防线长约 200 英里。他在这道防线的左翼集结了所能集结的全部军队，并率领他们渡过了多瑙河，这样显然是迂回俄军的右翼。他企图袭击俄军的先头部队，并把他们击退到席尔河对岸；这一道河，他可以从正面强渡，也可以派遣另一支部队在拉素瓦附近渡过多瑙河来绕过去。至于横断维丁到布加勒斯特通路的多瑙河第二支流阿留塔河，土军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渡过，即以中路军队的另一部分在阿留塔河口下方的尼科波尔和都诺附近渡过多瑙河。最后，沿多瑙河而下，在茹尔日沃和布来洛夫附近进行佯攻，迷惑俄军，使它无法判断土军实际进攻的地点。

如果暂时撇开政治原因不谈，几乎可以不必怀疑，奥美尔—帕沙的计划就是这样。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土军在茹尔日沃附近“渡过了河”，这显然是一个假消息。在已集中兵力的强敌面前，分兵两路在相距 250 英里的两个地点强渡欧洲最大的河流，而且是在最宽最难渡的地方强渡，这样的错误是任何一支稍经训练的军队中的准尉也不会犯的。

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奥美尔—帕沙所采取的机动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企图从翼侧迂回敌人，并从翼侧和正面同时攻击，打乱敌人的整个战斗队形。如果能以主力突然攻击敌人翼侧，如果不受到敌人正面攻击的威胁，如果在失利的情况下能够退却，如果在整个正面的所有阵地上击溃敌人后能够切断这些阵地与作战基地的交通线，那末，这样的机动是完全正确的。目前，这些都是不能实现的。奥美尔—帕沙一旦退却，在瓦拉几亚的右翼军队就有被敌人迂回的危险，他同卡拉法特的联系也就有可能被切断（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向奥地利退却）；而土军自卡拉法特向布加勒斯特的进攻，相反地，却无论如何威胁不到俄军退却的道路。读者可能还记得，不久前我们曾据此断言：对土军说来，唯一适当的进攻方向，是沿着贝萨拉比亚和奥地利边界之间的狭窄地带从多瑙河到塞勒特河的这一方向<sup>①</sup>。土军本应采取一种使俄军的交通线马上受到威胁甚至会被切断的机动，但是他们却在战线的另一端发动了进攻，在这里他们即使获胜，也不能指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土军不致遭到正面攻击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主要的战斗行动是在维丁和克拉约瓦或斯拉廷纳之间进行的，而俄军也因

<sup>①</sup> 见本卷第 380—381 页。——编者注

此未必会在多瑙河下游渡河，——除非他们的战略比我们想像的更要大胆。但是同时在维丁到鲁舒克正面的地段上，土军的行动也因有一条大河与敌相隔而受到限制，所以在这个地区行动一定也是比较消极的。

在目前情况下，土军这次行动的主要条件无论如何是不具备的。

耶拿会战<sup>354</sup>可以作为这种机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卓越范例。拿破仑以其主力突然猛扑普军左翼，8小时内就打乱了普军的队伍，切断了它退却的道路，并消灭了它，从此这支普军就不再存在了。但是这次会战是在20平方英里的地区内进行的，会战持续的时间为20小时。而现在作战的地区却长达200英里，宽达50英里，又没有道路，所以军队每次移动就相应地需要更多的时间。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中，由于出敌不意，兵力强大，行动迅速，所以大获全胜。现在土军的进攻，即使经过一些努力，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挫败。所有这些情况看看地图就更清楚了。土军必须从卡拉法特前往克拉约瓦。在这里阻碍土军前进的是从特兰西瓦尼亚的阿尔卑斯出流向多瑙河的数条河流中的第一条河流，这些河流由北而南穿过瓦拉几亚，形成好几道进攻军队必须通过的防线。在这方面地形很像伦巴第，这里所说的席尔河和阿留塔河也与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相似。明乔河和阿迪杰河的军事意义一向是受到重视的。

假定土军强渡席尔河，并且可能已经成功，那末他们在斯拉廷纳附近的阿留塔河上将遇到首次严重的抵抗。阿留塔河又宽又深，是一个严重得多的障碍；此外，俄军只要稍微发挥运动性，就可以在那里集中一支军队，不仅能够击退土军的一切攻击，而且

能够立即扩大战果。实际上，俄军在克拉约瓦取得胜利——只要不是很大的胜利——并不会有很大意义，因为土军强行军 3 天就可以到达卡拉法特和多瑙河，从而摆脱追击。如果土军在斯拉廷纳失败，则不仅是比较惨重的失败（因为俄军调集到那里的兵力较多），而且在失败后还会遭到俄军 5—6 天的追击。谁都知道，战果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追击时获得的，追击能使战败的军队全军复没。因此，只要哥尔查科夫愿意在阿留塔河上进行抵抗，奥美尔—帕沙恐怕什么时候也渡不过这条河，因为甚至在对土军最有利的时机，奥美尔—帕沙也无法向河岸调集 25000 人以上的兵力，而哥尔查科夫毫不费力就可在那里及时集中 35000 人。至于土军自多瑙河南岸进行翼侧攻击，如果没有大量的舟桥和其他器材（在土军中这些器材很少见到）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土军强渡了阿留塔河，甚至渡过了阿尔哲什河（更东面的一条大河），谁又能设想，奥美尔—帕沙能够夺取俄军在布加勒斯特的防御工事，并在决战后击溃兵力无疑将比土军约大三分之一的俄军呢？

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俄军只要稍能遵循军事原则，奥美尔—帕沙就输定了。然而，如果战争不是按照军事原则进行，而是按照外交原则进行，结局就可能两样。

俄军在向卡拉法特附近的军事重地派出足以威胁塞尔维亚的部队之后，又主动撤离了这一军事重地；奥美尔—帕沙没有阻碍地渡过了多瑙河；他的部队在小瓦拉几亚（阿留塔河以西地区）比较自由而且非常缓慢地移动；土军在其他各地的攻击，就我们所能判断的，都无关紧要；最后，从维丁进攻在战略上是个破绽，大家确认奥美尔—帕沙不会看不到这一点，——这些事实似乎给某些权威人士所作的结论提供了某种根据，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

结论与真相是相距很远的。他们的结论是：敌对双方的司令官之间似乎有一个秘密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俄军应该把小瓦拉几亚让给土军。支持这种说法的人说，阿留塔河是一道非常合式的天然屏障，在外交家们重新寻求出路以摆脱现状之前，双方军队在整个漫长的冬季可以隔河相望。俄国人采取这种让步，据他们说，不仅可以显示一下他们宽宏大量和爱好和平，而且还可以为占领所掠夺的地区获得某种法律根据，因为俄国和土耳其共同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是完全符合各项现行条约的精神的。俄国人如果在欧洲作出这种宽宏大量的样子，就可以摆脱在亚洲的真正危险，看来，他们现在在亚洲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坏，而主要的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有足够力量随时把土耳其人从多瑙河北岸地带赶走，夺回这块让给了土耳其人的地盘。得到宫廷信任的维也纳各报公开阐述这种论调，这一事实可以看做这种论调的论据，这个论据很能引人注意，但决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过不几天就可以看出，是这种论调正确，还是应当预期有一场真正的大战。如果情况有另一种变化，那末我们就预期不到什么了。

现在已开始明显地看出，双方在亚洲的兵力比原来推断的少得多。据“君士坦丁堡报”报道，10月9日，土军在埃尔斯伦有1万人的预备队；在巴士姆有4000人的正规部队和2万人的非正规部队，看来这是用来组成作战军队的；在靠近波斯边境的巴雅泽特有3000人；在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个靠近俄国边境的仅次于巴士姆的重要据点——有总数约16000人的前卫部队。这些部队几天之内应得到叙利亚10000—12000生力军的补充。这些数字比原来我们听说的要小得多：总共不是10万人，而是65000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相信通过君士坦丁堡得到的报道，那末，把梯弗里斯、

格鲁吉亚同俄国连结起来的高加索山脉的主要出口，现在正被山民控制着；俄军在沙米尔的猛攻下退却了，现距梯弗里斯差不多有 9 英里，而驻格鲁吉亚的俄军司令官沃龙佐夫将军宣称，一旦与土耳其交战，如果得不到 5 万人的援军，他是不能守住这个地区的。这些报道是否可靠，我们无法判断，但是俄军从海上向杰尔库姆—卡列、列杜特—卡列和南高加索黑海沿岸的其他地点的仓促增援表明，俄军在这里的处境并不很妙。关于这些援军的数量传说不一。开始有人说，俄军已经派出了 24000 人，但是他们哪里有船运这样多的军队呢？现在已经弄清楚，俄军派去的是第十三师——利迭尔斯将军第五军的第一师；该师共有 14000 人，这是非常可能的。另外又有人说，似乎有 24000 名（这大概是俄国人爱用的数字）黑海哥萨克从陆路绕过了高加索西部边境，在这个又陡又仄的海岸地带没有遇到抵抗就顺利地到达了列杜特—卡列。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越想越觉得不真实。黑海哥萨克防守库班河到捷列克河一线已够繁忙，而要派出这样多的骑兵，既无任何支援，也不遭到任何袭击，就在敌对的居民区内通过了长达 150 英里的隘路（在这里，很少的人就可以阻止一个纵队前进，或者将它截成两段），——这样的事只有在俄国才可以听到，直到今天，俄国还有人硬说马森纳在苏黎世会战中曾被苏沃洛夫击败<sup>355</sup>。

由此可见，这就是土军行动最有利的地区。假使土耳其能集中正规部队的兵力向通往梯弗里斯的唯一交通干线进行猛烈迅速的攻击（如果能打海战，可沿海岸进攻，如果不能，可在卡尔斯或阿尔达汉的内陆地区进攻），同时非正规部队按照自己特有的战法采取顽强、坚决、突然的行动，那就可能很快使沃龙佐夫陷入绝境，就可能与沙米尔建立联系，并使整个高加索普遍起义。但

---

是在这里，比在多瑙河更需要大胆、迅速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个地区的土军司令官是否具备所有这些素质，有待将来证明。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1 月 8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1 月 25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93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弗·恩格斯 俄军的失败<sup>356</sup>

为了尽可能搜集有关俄军和土军在瓦拉几亚的军事行动的消息，我们仔细研究了由“加拿大号”轮船带来的各种欧洲报纸。现在可以对上星期五我们评论过的由“华盛顿号”轮船带来的消息<sup>①</sup>补充若干重要事实。据我们所知，会战已经进行几次，但是会战的详情，我们现在知道得很少。我们掌握的材料仍然是片片段段、互有出入、极不充分的。在没有得到土耳其将军们的官方报告以前，这种情况可能继续存在。然而我们至少已经知道，土军的作战指挥相当巧妙，士气一直旺盛，没有辜负热烈推崇他们的人的赞扬——大多数比较冷静而客观的观察家们曾经认为这种赞扬是夸大的结果。因此大家普遍感到惊奇。人们对奥美尔—帕沙这位统帅的才能都相信会得到有力的证实，但是，对于他的军队的长处，西方的新闻界人士和国家活动家们却估计不足。他的军队固然都是土耳其人，但是这些人已经完全不是 1829 年为吉比奇击溃的那些兵士了。尽管土军条件不利，俄军在数量上又大占优势，土军还是打败了俄军。可以认为，这只是土军获得更有决定性的胜利的预兆和开端。

现在我们第一次听说，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会议曾经在索非亚集中了约 25000 人的部队，以备必要时在塞尔维亚作战。不论这有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507—514 页。——编者注

多么奇怪,但是关于这支部队及其任务的任何消息以前似乎都没有传到西欧,只知道奥美尔—帕沙正在十分妥善地使用着他们。在索非亚集中这些部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塞尔维亚人不发动起义(在现在的公爵<sup>①</sup>执政时期,他们未必会起义),不倒向俄国,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军队留在这个地区;如果塞尔维亚人起义,土军要么开进这个国家镇压起义,为此,在瓦拉几亚驻有俄军的情况下,25000人将不够用;要么占领边境出口,不让塞尔维亚人出国门一步,为此,有上述四分之一的兵力即绰绰有余。在这个问题上,奥美尔—帕沙所持的显然正是这种观点,因为他把这支部队直接调到了维丁地区,并与那里原有的部队合并。这些援军对奥美尔—帕沙不久前战胜丹年别尔格将军指挥的俄军右翼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次胜利,除了俄军被击毙和被俘的军官数目而外,详情我们一无所知。但是,这次胜利想来一定是很全面的,它在精神上给土军带来的好处,甚至将比在物质上带来的好处还要大。

现在我们还知道,在土尔图凯(位于鲁舒克和锡利斯特里亚之间)渡河并占领了沃耳特尼察的这支土耳其部队,是由**伊斯马伊耳—帕沙**指挥的。伊斯马伊耳—帕沙就是盖昂将军(他虽在苏丹军队中担任要职,但并未脱离基督教),由于在匈牙利战争中勇敢善战,博得了大胆、坚决和机智的指挥官的声誉。他没有卓越的战略才能,但是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次以白刃格斗击退了进攻的敌人那样成功地执行命令。巴甫洛夫将军在沃耳特尼察的失败,会大大有利于土军进入阿留塔河东岸地区,并且为土军开辟向布加勒斯特推进的道路,因为有消息说,哥尔查科夫公爵并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

---

<sup>①</sup> 亚历山大·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编者注

斯拉廷纳进军,他很谨慎地不顾分散兵力,因此现在仍然呆在多瑙河各公国的首都<sup>①</sup>。这一情况又一次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十分保险。大概不久便在该地区发生了决战。如果哥尔查科夫不是光说大话的人,如果他能在这里集中7—8万人(从官方宣布的俄军数字中作了有理由的各种扣除之后,他仍然拥有这么多兵力),那末优势无疑在他这方面。但是,考虑到俄军报告中的数字材料往往有些虚假和夸大,考虑到奥美尔—帕沙的军队的实力和战斗力比原来想像的要强得多和善战得多,应该承认,双方的作战条件比原来想像的就更加相近了,哥尔查科夫也就完全有失败的可能。当然,如果土军总司令能集中受到胜利的鼓舞的5—6万人来进行决战(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妨碍他这样做),那末他成功的机会无疑很大。我们在评论中肯定这一点时力求慎重,因为虽然我们同情土耳其人,但是也没有理由把土耳其的处境说得比实际情况更好。

在研究瓦拉几亚的地理形势,特别是从军事观点进行研究时,不能不想到伦巴第。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及其支流和伦巴第的波河及其支流,各自形成南面和西面的边界。土军采取的作战计划也颇似1849年在诺瓦拉会战<sup>357</sup>中遭到毁灭的皮蒙特军队采取的计划。如果土军取得胜利,他们就更有理由博得我们的称赞,而俄国人的完全无能也就更加明显。无论如何,哥尔查科夫并不是拉德茨基,而奥美尔—帕沙也不是拉莫里诺。

弗·恩格斯写于1853年11月11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11月28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3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sup>①</sup> 布加勒斯特。——译者注

## 卡·马克思 工人问题

1853年11月11日星期五于伦敦

内容丰富而思想深邃的“经济学家”杂志在“黄金般的机会与这些机会是怎样被利用的”这个标题下发挥了它的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之一<sup>358</sup>。不言而喻，“黄金般的机会”是贸易自由造成的，而“利用”这个机会，或者确切些说，“滥用”这个机会，当然就和工人阶级有关系了。

“工人阶级破天荒第一次把自己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联合王国的人口的确是减少了，人口外流超过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额。而工人们是怎样利用了他们的机会呢？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所做的就是他们往常在每一次生活状况得到暂时改善时所做的事情：他们纷纷结婚并尽可能快地生育。如果保持这样的人口增长率，人口外流很快就会完全被抵销，而黄金般的机会就会错过。”

黄金般的不结婚和不生育的机会——这完全符合马尔萨斯和他的门徒们所规定的正统标准！这就是黄金道德！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据“经济学家”承认，人口还是在减少，人口外流却仍然没有被抵销。可见，现在种种不幸的原因不是人口过剩。

“劳动阶级应该从为它们提供的难得机会中取得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多事积蓄，成为资本家。可是，他们中间有谁上升到或者开始上升到资本

家的行列中呢？这种情况大概连一个也没有。他们错过了提供给他们机会。”

成为资本家的机会！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又向工人们指出，即使他们最终争取到使他们原先的工资增加10%，每星期他们也只不过得到16先令6辨士以代替15先令罢了。这里它把每星期的平均工资算作15先令，已经偏高很多了。然而问题还不在这里。每星期拿15先令怎样才能成为资本家呢？这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据说，工人们想法不正确，认为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应当设法增加自己的收入。“经济学家”写道，“他们罢工了，想用这种办法争到比从事任何工作都要多的收入”。他们每星期挣15先令时，有成为资本家的现实机会，而挣16先令6辨士时，这种机会倒会消失！一方面，工人们应当力求使干活的人少，而使资本尽可能增多，以便有可能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但是，如果资本过多，而干活的人少，那末工人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利用这种机会，因为为了这种机会他们就应该不结婚、不生育！“他们过起更奢侈的生活来了”。在实行谷物法的时期，正像同一个“经济学家”向我们报道的，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差不多没有死掉。只要他们想活下去，那末他们怎么能敢过比那时更不“奢侈”的生活呢？“经济学家”常常登载有关进口的资料统计表，以证明人民的福利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状况的日趋繁荣。当时称之为贸易自由带来的空前福利的标志，现在却斥之为工人阶级不合理的浪费的表现。可是，我们照样无法理解：如果人口减少和消费缩减，进口怎么能够继续增加；进口减少，出口怎么能够继续增加；进口和出口都缩减，工业和商业又怎么能够扩大？

“第三，工人们必须利用这个黄金般的机会以便使他们自己及其子女都

受到他们可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从而使自己变得与他们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更为相称,并且学会从这种改善中取得最大的好处。不幸,我们不得不承认,入学的情况非常糟糕,缴学费的情况也非常糟糕。”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随着商业复苏而来的是企业扩大,机器采用增加,成年工人日益为妇女和儿童所代替,以及工作日延长。在工厂里做工的母亲和儿童愈多,入学人数就愈少。而且,你们到底给父母及其子女提供了受哪一种教育的机会呢?“经济学家”回答说,是受这样一种教育的机会:学会把人口增长保持在马尔萨斯所规定的水平上。科布顿先生说,教育会向工人们表明,又挤又脏,空气又不流通的住宅不是保护健康和精力的最好手段。同样,只要你们向人说清楚,自然规律要求人的机体经常依靠营养来维持,大概你们也就能使人不致饿死了。“每日新闻”宣称,教育能使我们的工人阶级学会怎样从干骨头中提取营养物,怎样用淀粉烤制点心,怎样用扔掉的菜根熬汤。

总之,归纳起来,被工人阶级错过的黄金般的机会就是黄金般的不结婚的机会,就是更少奢侈,不要求提高工资,每星期挣15先令就成为资本家,学会以更加粗糙的食物为生并以马尔萨斯的害人理论摧残心灵的机会。

上星期五,厄内斯特·琼斯来到普雷斯顿城,向遭到同盟歇业的工厂工人发表有关工人问题的演说。在预定的时间内举行了不下15000人(“普雷斯顿舵手”<sup>359</sup>报道的数字是12000人)的露天集会,前来参加大会的琼斯先生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我从他的演说中摘引几段如下:

“为什么过去进行这种斗争?为什么现在仍在进行这种斗争?为什么将来还要重新出现这种斗争呢?因为你们生命的源泉被资本一手堵住了,资本把

它的金杯吸干，给你们剩下的只是一些渣滓。为什么工厂向你们宣布了同盟歇业就等于威胁你们的生命呢？因为再没有别的工厂可以让你们去做工了，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挣钱糊口了。是什么东西给资本家这样大的力量呢？是因为他掌握了雇用劳动的一切手段……可见，劳动手段是人民的未来赖以建立的基石……只有各行各业的工人的群众运动，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的全国性运动，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如果你们把自己的力量分散在各行各业，分散到单个地区去进行斗争，你们就可能遭到失败；如果你们进行全国规模的斗争，你们就一定取得胜利。”<sup>360</sup>

接着，乔治·考威尔先生以十分赞许的措词拟出了一个受到约翰·马修斯先生支持的建议，建议对厄内斯特·琼斯来访普雷斯顿以及他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工厂主们花了很大力气阻挠厄内斯特·琼斯访问普雷斯顿；有他参加的群众大会找不到会场，因此不得不在曼彻斯特登广告，通知群众大会在露天举行。一些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拚命散布谣言，说琼斯先生反对罢工并在工人中间制造不和；此外，还四处寄恐吓信，说琼斯的普雷斯顿之行对他本人可能不大安全。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11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11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36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卡·马克思 繁荣。——工人问题

1853年11月15日星期二于伦敦

“经济学家”以“商业报告和金融市场”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力求证明存在着普遍繁荣和商业发展的有利前景<sup>361</sup>，虽然同一期还报道，“粮食储备量大，而粮价仍然上涨”，“小麦每夸特的价格快达到80先令”，“棉花贸易的情况并不能激起工厂主们任何复工之意”。至于进口资料统计表，“经济学家”写道：

“在这一大串数字中有许多有教益的东西，有许多能证实作为激烈政治斗争的对象伟大原则的东西，有许多能解释不久前金融市场发生的事件并阐明未来前景的东西；有许多对国家活动家、金融家、银行家和商人极有教益的东西，他们从这些数字中将有可能准确地认清目前形势并正确地判断自己的未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帮助就是让大家注意这些报告列举出来的某些基本事实和探讨它们同当前其他最重要的特点的联系。”

让我们坐到这位预言家跟前来领教领教他那噜哩噜索的预言吧。这次引用进口资料统计表要证明的不是工人阶级的浪费行为，而是这个阶级由于贸易自由而得到的空前福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统计表吧。

统计表一  
1月5日至10月10日的消费量

	1852年	1853年
可可 .....	2668822 磅	3162233 磅
咖啡 .....	25123946 磅	28607613 磅
茶叶 .....	42746198 磅	45496957 磅
糖 .....	5358967 公担	5683228 公担
烟草 .....	21312459 磅	22296398 磅
酒 .....	4986242 加仑	5569560 加仑

只要浏览一下这个统计表，马上就可以看出，“经济学家”的论断是虚假的。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上列商品的全部情况并不是像统计表所指出的，它们**已被消费掉**，而是说这些商品已经上市供应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大概不会有这样无知的店主，连运进他店里的商品储备量与那些已经真正卖给了居民并被居民消费掉的商品量之间的差别都不了解吧。

“经济学家”写道，“这份一览表可以看做工人阶级消费的主要奢侈品的清单。”

下面“经济学家”还把这些奢侈品进口的增长也算在工人阶级的帐上。其实，像咖啡这种东西，在英国工人中的消费量小到了极点，而酒他们根本就不消费。也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工人阶级的老板们1853年比1852年消费了更多的酒和咖啡，工人阶级的状况就得到改善了吧？至于茶叶，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国革命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混乱，出现了投机性的需求。这种需求的产生，是由于对未来感到忧虑，而不是由于现在的日常需要。至于糖，截至1852年10月的进口量与截至1853年10月的进口量之间的总差额只不过是324261公担；这里我不打算和无所不知

的“经济学家”杂志较量知识的渊博，这家杂志当然晓得，这324261公担中没有1公担滞留在店主的地下室中或用于上等阶级的糖果点心，这些糖一定全部都叫工人沏茶了。既然面包贵，工人们当然让他们的孩子多吃了一些糖，——玛丽—安东尼达在1788年饥荒时期还曾建议法国人民吃杏仁点心哩。至于烟草的进口增加，那末，随着工人失业和他们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他们对烟草的需求量确实是在不断增长着。

此外，我们不应该忘记，决定了1853年10月进口的商品量的，并不是这个月的实际需求量，而是根据国内市场上完全不同的情况估算出来的需求量。第一个统计表及其“同当前其他最重要的特点的联系”，情况就是这样。

统计表二

1月5日至10月10日输入

	1852年	1853年
熏肉·····	62506 公担	173729 公担
腌牛肉·····	101531 公担	160371 公担
咸猪肉·····	77788 公担	130142 公担
火腿·····	6766 公担	14123 公担
脂油·····	14511 公担	102612 公担
共 计 ···	263102 公担	580977 公担
大 米·····	633814 公担	1027910 公担
马铃薯·····	238739 公担	820524 公担
谷物和面粉·····	5583082 夸特	8179956 夸特
干 酪·····	218846 公担	294053 公担
奶 油·····	205209 公担	296342 公担
蛋 类·····	89433728 个	103074129 个

无疑是“经济学家”杂志才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即

在旱灾和必不可免的饥荒年份食品输入比常年有相对的增长，与其说是证明这些产品特别减产，倒不如说是证明消费量突然增加。某些物品出乎意料的涨价，无疑是进口奖励金。但是，难道谁曾断言过，消费品愈贵，就愈能找到热心的消费者吗？现在我们看看第三类进口商品——工厂原料：

统计表三

1月5日至10月10日输入

	1852年	1853年
亚麻 .....	971738 公担	1245384 公担
大麻 .....	798057 公担	788911 公担
生丝 .....	3797757 磅	4355865 磅
拈丝 .....	267884 磅	577884 磅
棉花 .....	6486873 公担	7091999 公担
羊毛 .....	63390956 磅	83863475 磅

既然 1853 年的生产大大超过了 1852 年的生产，所以需要的原料也就更多，输入和加工的原料也就更多。

可是，“经济学家”没有断言，1853 年剩余的工业产品都供国内消费了。它把这些剩余产品归之于出口：

“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出口有巨大增长。截至 10 月 10 日止，只不过一个月，出口价值增长额就不下 1446708 英镑；在 9 个月中这一价值的增长额总共达 12596291 英镑；今年的出口总值是 66987729 英镑，而在 1852 年相应的月份中是 54391438 英镑……单以不列颠生产的商品出口计算，我们这一年的增长不少于 23%。”

但是，这些价值 12596291 英镑的增多的出口商品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这些出口商品中相当大一部分尚在运往市场的途中”，而这些商品到达那里，正好使这些市场彻底混乱。“这些增多的出口商品的相当大一部分正在运往澳大利亚”，那里本来就已商品充

斥了；“运往合众国”，那里现在就已商品过剩了；“运往印度”，那里正处于萧条状态；“运往南美洲”，那里根本就吞不下什么在别的市场上找不到销路的增多的进口商品。

“经济学家”写道，“大量输入并消费掉的增多的商品，英国已经付过了款，或者在最近的将来就要按购买这些商品的到期票付款……但究竟什么时候把出口商品的钱付给我们呢？过6个月，过9个月，过12个月，某些商品要过一年半或两年。”

“经济学家”声称，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多么荒谬！

如果你们把这一大堆剩余工业品投入已经为你们的出口商品所充斥的市场，那末你们所期待的时刻就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你们统计表上列举的一大串假想财富的清单，可能成为一大串实际损失的清单，成为世界范围的破产的清单。统计表三和成为这种吹牛对象的出口统计资料究竟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们每个人早就意识到的情况，即大不列颠的工业产值在1853年大大增长，它的增长超过了常规，它的扩大的趋势正是在市场紧缩的时候日益加强。

当然，“经济学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

它对我们说：“金融市场的困难和利率的提高，只不过是大宗进口商品要马上付款、而大量剩余出口商品赊销所产生的暂时性的后果。”

在“经济学家”看来，金融市场的紧张状态只不过是增多的商品出口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可以同样有权利说，最近这几个月来出口的增加只不过是金融市场困难的必然结果。这些困难发生的同时，还出现黄金流入和外汇行市不利的情况；但是，难道不利的外汇行市不是国外期票奖励金吗，换句话说，不是出口奖励金吗？正是由于这个规律，英国在它的金融市场发生困难的时期就使世界所有别的市场混乱起来，并且周期性地破坏别国的工业，

用低价出售的英国工业品去袭击别的国家。

“经济学家”好容易找到了工人们根本不对、根本应该受到指责和根本愚蠢的“两点”。

“第一，他们投身于争论的起因在绝大多数场合只不过是出于可怜的几文钱。”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让“经济学家”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争论的性质改变了：争论由关于合同的问题变成了争取政权的斗争……”

第二，工人们不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而是根据那些不负责任的，甚至可能完全是自封的领袖们的指示行动……他们利用组织起来的蛮不讲理的俱乐部统一行动……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信念不会引起我们的不安，但是，有些人，工人阶级让他们把自己诱入圈套并让他们代表自己讲话，这些人的信念的确引起我们的不安和抗议。”

工人们建立他们自己的阶级组织，用以回敬他们的老板们的阶级组织的建立。而“经济学家”却向工人们说，如果他们要自己的将领和军官们辞职并采取匹马单枪进行斗争的决定，它就不再“感到不安”了。在法国革命最初几次搏斗时期，北方的联合起来的专制君主的喉舌有时就与此一模一样，也想使全世界相信使他们“感到不安”的不是法国人民本身，而是残暴的 Comité du Salut Public（社会拯救委员会<sup>362</sup>）、蛮横无理的俱乐部和不守本分的将领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行动。

在我的前一篇文章中，我曾对“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工人阶级不利用繁荣时期来受教育并使他们的子女受教育是毫不足怪的。现在我可以告诉诸君下面的事实（在我所得到的消息中这些事实的人名和细节都有，并且这些事实很快就将提交议会）。在1852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离……4英里的……城，在一个

叫做……的为……先生所有的布匹漂白和最后加工的企业中，我们提到的这些人一连干了 60 个小时，而休息一共只有 3 小时！

姑娘和女孩	年龄
姆·斯·	22 岁
阿·布·	20 岁
姆·布·	20 岁
阿·赫·	18 岁
克·恩·	18 岁
布·斯·	16 岁
特·特·	16 岁
阿·特·	15 岁
姆·赫·	15 岁
赫·欧·	15 岁
姆·耳·	13 岁
布·布·	13 岁
姆·欧·	13 岁
阿·特·	12 岁
克·欧·	12 岁
斯·布·	10 岁！
安·布·	9 岁！
男 孩	
伍·赫·	9 岁
季·克·	10 岁

9 岁和 10 岁的小孩一连工作 60 个小时，一共只休息 3 小时！让老板们再不要提工人轻视教育吧！上面提到的安·布·，是一个只有 9 岁的女孩，在 60 个小时的工作中由于疲劳过度摔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当别人把她叫醒的时候，她哭了，但还是强迫她继续干活！

看来，工厂的工人们决定要从曼彻斯特骗子们的手中把争取教育的运动夺过来。据称，在市公园举行的普雷斯顿失业者群

众大会上发生了下面的情况：

“玛格丽特·弗列特切尔太太提醒与会者注意：已婚妇女们丢下自己的子女和不管家务而到工厂做工是不正常的。每个工人都有权利得到合理工作日的合理工资，而这一点，她以为，就意味着工人应该得到这样的劳动报酬，这种报酬使他有可能很好地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让妻子留在家中履行家庭主妇的责任并教育子女（鼓掌）。发言人结束了她的讲话，并提议通过下列决议：

**会议决定：**城内所有已婚妇女打算不上工，直到她们的丈夫得到合理的、全部的劳动报酬为止。

艾恩·弗列特切尔太太（前一个发言人的姐妹）赞成这一决议，于是决议被一致通过。

大会主席宣布，在工资增加10%的问题解决以后，关于工厂使用已婚妇女的劳动问题将展开我国工厂主们未必意料得到的鼓动工作。”

现在在各工业区访问的厄内斯特·琼斯正进行争取成立“工人议会”的鼓动工作<sup>363</sup>。他提出一个建议，希望

“各行各业的工人代表都到运动的中心即卡郡的曼彻斯特去开会，直到取得胜利为止。工人阶级的观点十分有权威和通俗易懂的表达，全世界都会听见，而在圣斯蒂凡召开的会议<sup>364</sup>也将不得不与这个议会共同占有报纸的篇幅……在现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全世界都将比倾听最高傲的议会中尊贵议员的话更加注意地倾听这些代表中最谦逊的代表的话”。

帕麦斯顿勋爵的机关报却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晨邮报”叫嚷：“说句私下的话，被人大吹大擂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发展，并且在4月10日惨败以后，再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尝试来使工人们成为立法者或使裁缝们成为护民官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1月15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3年11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38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

“洪堡号”轮船带来的战场消息证实了早些时候从“欧罗巴号”轮船得到的报道：在沃耳特尼察附近长时间扼守阵地、艰苦奋战、对抗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土军，终于在 11 月 14 日左右退过了多瑙河，占领了自己在土尔图凯附近原先的筑垒阵地。这一事件，等报纸和信件到来之后就会明朗化，目前我们对这一机动的意图还不十分清楚。官方消息说，这次机动没有遇到阻碍，因而，如果俄军司令官已集结比第一次多一倍的兵力再次攻击这个据点的说法得不到证实，那末土军进行这次机动似乎是由于哥尔查科夫爵获得了什么决定性胜利的假设就不能成立。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就可以看出，哥尔查科夫实际上没有 45000 人的兵力来实现这个目的。还有人说，土军重新退回土尔图凯，是为了避免冬季在沃耳特尼察受到突然袭击的危险，因为冬季要退过河会遇到很大困难。但是，这种说法与土军一直采取攻势，未遭失败，而且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事实有矛盾。此外，土军的左翼仍在维丁附近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甚至还不断得到援军，这种情况证明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证明土军实行总退却。即使考虑到土军可能企图以强大兵力在布来洛夫或加拉兹渡过多瑙河（这一假设看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仍然不明白，奥美尔—帕沙仅仅由于准备采取坚决的机动以另一支部队来对付

俄军左翼，是否需要把自己的军队撤出沃耳特尼察附近的坚固阵地。不过，只要我们把这次战局开始以来的各种事件加以剖析，这些扑朔迷离的现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首先大家都知道，土军得以在维丁和土尔图凯两地渡河，而且未遇到严重抵抗。这毫不足怪，因为战争经验证明：要阻止积极行动的敌人过河，甚至很宽的河，是不可能的；此外，趁敌军部分兵力已经过河时对它攻击，即当敌军只有一条拥挤不堪的退却道路时以优势兵力对它袭击，总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土军在多瑙河北岸巩固下来了，他们在各次小规模战斗中都占上风，他们守住了离布加勒斯特不到 40 英里的沃耳特尼察达 10 天之久，而俄军不能把他们逐出这一重要阵地，最后土军毫无阻碍地主动放弃了这一阵地，——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对俄土两军在该地区对峙的兵力对比的判断有重大的差误。

土军拥有多少兵力，我们知道得相当准确，而俄军的人数一直是凭猜测。消息说，俄军有两个军渡过了普鲁特河，紧接着又有一个军的部分兵力渡河。如果是这样，俄军在多瑙河各公国的兵力大概不下 15 万人。然而，现在，当事实也表明俄军在瓦拉几亚没有这样多军队的时候，我们终于从维也纳得到了有关俄军在瓦拉几亚的实有兵力的可靠情报。俄军的兵力如下：

1. 由丹年别尔格将军指挥的第四军包括以下 3 个步兵师：
    - (1) 第十师（由索伊蒙诺夫将军指挥） ..... 16000 人
    - (2) 第十一师（由巴甫洛夫将军指挥） ..... 16000 人
    - (3) 第十二师（由利普兰迪将军指挥） ..... 16000 人
    - (4) 1 个猎兵营 ..... 1000 人
  2. 第五军第十四师由恩格尔加尔特将军指挥的 1 个旅 ..... 8000 人
- 
- 步兵共计 ..... 57000 人

- |                            |             |
|----------------------------|-------------|
| 3. 由尼罗德将军和费希巴赫将军           |             |
| 分别指挥的 2 个轻骑兵师 .....        | 8000 人      |
| 10 个哥萨克团 .....             | 6000 人      |
| 共 计 .....                  | 14000 人     |
| 4. 1 个炮兵师 (大致按 1 个步兵团有 1 个 |             |
| 炮兵连, 每连有炮 12 门) 共计 .....   | 170—180 门炮。 |

还弄清楚了：利迭尔斯将军指挥的第五军甚至还没有在敖德萨集中，而是一部分在塞瓦斯托波尔，一部分在高加索；奥斯坦—萨肯将军指挥的第三军还在沃伦，至多也不过刚刚渡过普鲁特河，最早要在三四个星期后才能到达战区；而俄军的预备队骑兵（大部分是重骑兵）还在德涅泊河以东，要五六个星期才能把他们调到需要的地方。这些消息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我们在 6 个星期以前得到这些消息，我们会断言，奥美尔—帕沙应当渡过多瑙河，在哪儿渡和怎样渡无关紧要，只是越快越好。

可是对俄军的轻率冒险行为，的确不可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把约 8 万人的军队带到瓦拉几亚这样的 *cul de sac* (死胡同)，并留在那里好几个月，同时，正如俄国人自己承认的，还有 15000 个病员在医院里，又由于得不到补充，只有靠碰运气，——这样的行动方法是史无前例的，以前谁也没有理由料想到一向谨慎、从不冒险的俄军会采取这样的行动。要知道，在瓦拉几亚的俄军除了独立行动的一些部队以外，适于作战的部队总共不过 46000 人，何况许多不同的地点都需要他们呢！

但是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只能解释，这是由于俄国人绝对相信他们在英国政府内的朋友们的外交阴谋得逞，由于他们毫无根据地轻视自己的敌人，由于他们企图在距离帝国中心这样远的地

区集中重兵和储备大量物资时显然遇到了种种困难。

另一方面，土军在小瓦拉几亚的卡拉法特现有 25000 人，而且还在继续向那里增援。关于这些部队最近调动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看来，他们甚至还没有推进到克拉约瓦，直到现在，全部行动仍限于占领附近村庄。什么原因，也不清楚。我们只能假设，奥美尔—帕沙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军事会议的限制，该会议起初曾把这 25000 人集中在索非亚。不管那里的情况如何，根据我们在这样远的地方所能作的判断，这些部队只要还在卡拉法特，就完全无用，而且在那里驻守就是个错误，因为，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即使打算用他们对付塞尔维亚（很少可能），他们驻在那里的人数不是太多，就是太少<sup>①</sup>。我们认为，把他们调往多瑙河下游会合适得多，因为他们于 10 月 28 日渡河，到 11 月 15 日还很少前进，根本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本来这 15 天的时间可以更好地利用：可以把这些部队向多瑙河下游调 150 英里到西斯托夫，在那里与土军主力的左翼建立直接联系，再由此经过几日行程到达土军左翼司令部的所在地鲁舒克。如果能使这 24000 人与主力会合，他们的作用要比在卡拉法特大一倍，这是无疑的。事件本身就证实了这一意见的正确性，正如前述，我们不知道这些部队在渡过多瑙河后的 19 天内对奥美尔—帕沙有什么积极的支援。

土军在尼科波尔和鲁舒克附近进行的攻击只不过是佯动。看来，这些攻击进行得不坏，不仅使用了为这一目的所绝对必需的兵力，而且有迷惑敌人使其无法判明进攻者的真正意图的坚决精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515—516 页。——编者注

神。主要的攻击是在沃耳特尼察进行的。调往该地的兵力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知道。有消息说，早在 11 日那天，土军在沃耳特尼察就有 24000 人，而与其对抗的俄军则有 35000 人。但是，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果俄军真比土军多三分之一，他们就会立刻迫使土军退过多瑙河，事实上 11 日是俄军失败的日子。

看来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以设想，只有异常拙劣的军事指挥才会妨碍土军把哥尔查科夫逐出瓦拉几亚。但是双方都显示了极为独特的军事指挥。土军于 11 月 2 日在沃耳特尼察这个显然是主要的渡河地点渡过了多瑙河，并于 3 日、4 日、5 日顺利地击退了俄军的攻击，从而巩固了在多瑙河北岸的优势。在这三天中，他们的援军应当开到，以便使他们有可能立即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拿破仑就这样做过，而且此后每个军事长官都知道，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因为这样可以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以前就进行袭击。正如在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但是在瓦拉几亚，这个道理却被忽视了。土军平静地扼守沃耳特尼察达 9 天之久（从 6 日到 15 日），除小规模战斗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因而俄军有足够的时间来集中兵力，进行部署，尽可能周密地考虑一切问题，而且在退路受到威胁时采取消除威胁和保障这些退路的措施。不过，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来推测：奥美尔—帕沙只是想把俄军拖在沃耳特尼察，一直到他的主力在多瑙河下游渡河，并且完全切断俄军的退路。这样做是可能的，尽管采取这样的行动，除在卡拉法特的 24000 人和在沃耳特尼察的 24000 人外，还需要在多瑙河下游希尔索瓦地区有 5 万人左右的兵力。但是，如果奥美尔—帕沙在那里有这么多军队（这完全可能），这支军队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时

间，而不把时间消耗在所有这些故作巧妙的机动上。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使7—8万人马上在布来洛夫附近渡过多瑙河，并一举截断俄军在瓦拉几亚的交通线呢？如前所述，看来他现在打算实现这一机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一机动拖延这样久，而且还要在事先进行这样复杂的准备？在拥有了已在作战线上作好充分准备的这样的优势兵力以后，迷惑哥尔查科夫公爵的行动就未必有什么意义了。应当马上切断他的退路，消灭他的军队。

至于土耳其兵士，他们在到目前为止所参加的几次小规模战斗中都表现得很好。炮兵处处表明，沙皇尼古拉把他们列为欧洲劲旅之一并非过誉。一个在军事行动开始前10个星期才组成、并以刚从法国得到的米涅式步枪装备起来的猎兵营，在这一短时间内已能十分熟练地在散开队形中进行射击，并培养出善于掌握这种威力很大的武器的第一流射手；他们在沃耳特尼察得到了以实际行动显示本领的机会，几乎击毙了俄军的全部高级军官。土耳其步兵看来大体上都很好地掌握了成横队和成纵队运动的一般方法，此外，在沃耳特尼察的多次攻击中都表现了高度坚定和勇敢的精神；要知道，在沃耳特尼察的3天战斗中，至少有一天是由土耳其步兵的攻击来决定战斗结局的，而且是以白刃格斗来决定的；而当一用上刺刀时，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俄国步兵就是不可轻视的对手。

根据最近的报道来看，亚洲的情况对土耳其人来说比在欧洲更见好转。有消息说，切尔克斯各部族发动了反对俄国人的普遍起义，他们联合行动，不仅控制了高加索的大门，而且切断了沃龙佐夫伯爵后方的交通线，而此时土军则从正面向沃龙佐夫进逼。于是，沙皇从战争一开始就处处失败。我们期望这种情况就这样

---

继续下去，让战争教会俄国人和他们的政府收敛一下自己的野心和骄横，并促使他们从今以后只管自己的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1 月 18 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2 月 7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44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 · 马 克 思

---

高尚意识的骑士<sup>365</sup>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21—28 日左右  
1854 年 1 月于纽约以单行本刊印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单行本

卡·马克思

# Der Ritter

von

edelmüthigen Bewußtsein,

von

Karl Marg.

卡·马克思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  
第一版的扉页

小型战争（见德克尔“**小型战争论**”<sup>366</sup>）的英雄可能没有高尚身分，但他倒是有高尚意识。按黑格尔的说法，高尚意识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卑鄙意识<sup>367</sup>。为了说明这个转化，我举一身兼扮隐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两个角色的维利希先生的吐露为例。我只谈谈 cavaliere della ventura（冒险骑士，雇佣军首领）；至于拥戴他的 cavalieri del dente（寄食骑士），我就让他们听自己的命运摆布了。

为了从刚开始就使人感觉到高尚意识的特色是用“普通的”谎言表达“高超的”真理，维利希先生对我的“揭露”<sup>368</sup>的答复是用下面的话开始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在‘新英格兰报’和‘刑法报’上刊载了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告。”

我从来没有在“刑法报”上刊载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报告。大家知道，我在“新英格兰报”<sup>369</sup>上刊载过“揭露”，而维利希先生在“刑法报”上刊载过希尔施的自供<sup>①</sup>。

在“揭露”第11页上谈到：“从在维利希—法佩尔派那里偷走的文件的清单和这些文件的日期上可以看出，维利希—沙佩尔派对罗伊特的破门行窃的行径虽然有所防备，但后来还是让别人偷走了文件，并让文件落到普鲁士警察当局手里。”这一段在第64页也简要地重复过<sup>370</sup>。

---

① 此处可参看本卷第44—48页。——编者注

维利希先生回答说：“马克思先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文件大部分是伪造的，而部分是凭空虚构的。”

大部分是伪造的，就是说，不完全是伪造的。部分是凭空虚构的，就是说，不全部是凭空虚构的。可见，维利希先生承认，在罗伊特行窃之后，以及在此之前，属于他的集团的文件，已通过某种途径落入警察当局之手。我要肯定的正是这一点。

总之，维利希先生之所以高尚，就是因为能在可靠事实后面嗅出虚假意识。“马克思先生知道”。维利希先生从哪里知道马克思先生所知道的事情呢？上述文件中有一些我知道是真的。但是，我却不知道其中哪一个文件在庭审时被认为是伪造的或是凭空虚构的。我照理应该知道得“较多”，因为，据说“维利希近旁的友人中有一个勃鲁姆”是“马克思的情报员”。总之，勃鲁姆<sup>①</sup>是在维利希近旁开放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同我更远了。我与勃鲁姆从未谈过话，甚至这方面的暗示都没有<sup>②</sup>。我只知道勃鲁姆的出身是俄国人，职业是皮鞋匠；他还以莫里逊的身分出现，大力推销维利希的莫里逊氏丸，现在大概在澳大利亚<sup>371</sup>。关于维利希—金克尔派传教士的活动，我是从马格德堡得知的，而不是在伦敦。因此，高尚意识本来是可以免除一次非常疼痛的手术，不必仅仅根据有嫌疑这一点而当众侮辱自己的一个忏悔者的。

高尚意识先是自欺欺人地硬说我有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情报员；然后它又同样自欺欺人地否认我所引用的一封真信。它引用了“‘揭露’第69页注A<sup>372</sup>，贝克尔的一封假信中的一段”。

① 双关语：Blum——姓；《blume》——“花”。——编者注

② 原文是翻译不出的双关语：《durch die Blume sprechen》——用暗示、譬喻说话。——编者注

维利希先生太高尚了，竟然不能设想像贝克尔这种“具有如此高超精神和性格的人”会认不清像维利希这种人身上的高超精神和性格。因此，他把贝克尔的信变成假信，而把我变成伪造者。不言而喻，这是出于高尚。但是，假信总还在律师施奈德尔第二手中。在审判时我把它寄给了科伦的辩护人，因为它驳斥了贝克尔参予维利希的蠢举的说法。除了信是贝克尔亲手所写之外，科伦邮局和伦敦邮局的邮戳表明了发信和收信的日期。

“但是，在此之前金克尔夫人写给我（维利希）一封详细的、订正了所有事实的信；贝克尔在科伦担任了转寄工作。他告诉她信已转寄，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谁隐藏了这封信：马克思先生，贝克尔，还是邮局？”

维利希证明这与邮局无关。可能是贝克尔？但是当贝克尔处于自由状态时，维利希却不想去向他质问。因此，剩下的就是“马克思先生”。维利希先生又玩弄他所固有的背后搞鬼的伎俩，把事情说成这样：我公开了贝克尔不是写给我的信件，隐藏了他托我转寄的信件。但是，遗憾得很，贝克尔是最客气的，从来不耐烦我转寄信件，无论是转寄约翰娜太太的信还是转寄约翰·哥特弗利德先生<sup>①</sup>的信。不管是狱官，或是暗检室<sup>373</sup>，都无碍于就这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去问贝克尔。维利希先生说谎说糊涂了：他捏造这种卑鄙的诽谤，竟是出于一种纯洁动机，即鼓励美德，表明善人之间、金克尔派和维利希派之间的同心同德胜过了恶人散布故意的任何方术。

“……无产阶级内部各党派之间，马克思派和维利希—沙佩尔派——根据马克思先生而不是我所给予的名称——之间的关系。”

<sup>①</sup> 戏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他的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高尚意识要用别人的倨傲来证明自己的谦虚。所以，它把“科伦起诉书所给予的名称”（见“揭露”第6页<sup>374</sup>）变为“马克思先生所给予的名称”。由于同样的谦虚，它把我谈过的（见1. c. <sup>①</sup>）某一个秘密的德国团体<sup>375</sup>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变为“无产阶级本身内部各党派之间的关系”。

“当1850年秋天泰霍夫来到伦敦时，马克思委托德朗克写信给他自己，即马克思，说什么泰霍夫对我做了极端鄙视的评论，这封信宣读了。泰霍夫来到了；我们作为男子汉大丈夫，彼此开诚布公地谈了一下；原来信中的传言是臆造的！！”

当泰霍夫来到伦敦时，我委托德朗克写信给我，我收到信，宣读了它，然后泰霍夫来到了。consecutio temporum（时间顺序）的不对头反映了高尚意识的张皇失措，因为他企图在我、德朗克的信和泰霍夫来到之间建立虚假的因果联系。在德朗克的信中——顺便提一下，这信是寄给恩格斯而不是寄给我的——被指控的地方原话是这样的：

“今天我使泰霍夫有点折服，尽管这一次我还是头一遭和他以及和席利——席利当时在伦敦——发生激烈的争论；后来，泰霍夫不止一次地声明，对济格尔的攻击是维利希个人的花招，此外，他否认维利希有任何军事才能。”

可见，德朗克所说的不是泰霍夫做了一般的极端鄙视的评论，而是他对维利希先生的军事才能做了极端鄙视的评论。因此，泰霍夫即使说某某东西是臆造的，这也决不是指德朗克信中的传言，而是高尚意识关于德朗克传言的传言。泰霍夫在伦敦并没有改变他在瑞士所发表的关于维利希先生的军事才能的意见，虽然他可

---

<sup>①</sup> loco citato——上述引证之处。——编者注

能改变了他对这位伪修道者的其他看法。由此可见，德朗克的信和泰霍夫的到来同我的关系仅限于我宣读了德朗克的信；我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我应该宣读所有信件。例如，宣读过卡尔·布龙的信，他在信中也嘲笑了维利希的军事才能。那时维利希先生已经深信：这封信是我委托布龙写的。但由于布龙与泰霍夫不同，他还没有到澳大利亚去，所以，维利希先生就很有预见地不提“我的策略的这一范例”。再例如，我曾经不得不宣读罗特哈克尔的信，信中写道：

“我愿意属于其他任何支部，但是我决不愿属于这个支部（即维利希的支部）。”

他讲到：仅仅是由于反对维利希关于“引人注意的普鲁士武装”的观点，就给他带来了多么不幸的后果。维利希的一个帮手

“要求立即把他开除出盟，而另一个帮手则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个罗特哈克尔是怎样入盟的，说这事很可疑”。

维利希先生已经深信：这封信是我委托罗特哈克尔写的。但由于罗特哈克尔不是在墨尔本附近寻找黄金，而是在辛辛那提办报纸，所以维利希先生又认为这另一个“我的策略范例”也是不宜公诸于世的。

高尚意识的本性是一向自我陶醉，并且到处认为自己已得到公认。因此，如果它碰到有人对它的自我欣赏不表同意，如果泰霍夫否认它的军事才能，罗特哈克尔否认他的政治才能，或贝克尔称它简直是“蠢材”，那末，它就要武断地说诸如此类的反自然的事实是由于阿利曼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奥尔穆兹德即维利希之间存在着策略矛盾，据此，高尚意识就醉心于最卑鄙的勾当，企图苦思出，引伸出，臆想出这种虚构的策略的秘密。我们看到了，

正如黑格尔所说，这种意识是如何不在崇高的东西上下工夫，而在最卑鄙的东西，即自己身上工夫。

维利希先生胜利地高呼：“这就是马克思先生的策略的几个范例。”

“当居于伦敦的、当年曾起过相当显著作用的革命活动家送来请贴邀请我们参加会议时，马克思、恩格斯与我之间的第一个矛盾便暴露出来了。我想赴会；我要求：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党的立场和组织，但是，关于流亡者中间的内部争执的 éclat（消息）不应超出这些人的范围。我居于少数派；邀请被拒绝了，于是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伦敦流亡者内部的令人讨厌的内讧，内讧的后果至今还存在，尽管这些内讧在公论中已经显然地失去任何意义。”

维利希先生作为一个战时的“游击队员”，认为他在和平时期的使命也是从一个党派转到另一个党派<sup>①</sup>。他怀抱着高尚的联合愿望而居于少数派，这完全符合真情。但是这种招认听起来令人感到特别幼稚，因为维利希先生后来竭力散布流言，似乎流亡者从自己的帮会中把我们开除了。而在这里，他就承认了我们从我们中间开除了这帮流亡者。这就是事实。而事实还有自己的变容哩。高尚意识需要证明，只是阿利曼妨碍了他去完成高尚的事业，妨碍了他去预防流亡者遭到的种种不幸事件。因此，它又得造谣，纯粹像福音书编者那样地去歪曲世俗的编年史（见布鲁诺·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sup>376</sup>）。阿利曼——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大磨坊街工人协会，并在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声明与维利希决裂<sup>377</sup>。从这一天起，他们就避免参加任何公开组织、游行和示威。总之，是从1850年9月15日起的。1851年7月14

① 双关语：《partei-gänger》有“游击队员”之意，也有“任何一个党派的信徒”之意。——编者注

日，“各派有名望的活动家”被邀请到菲克勒尔公民那里去开会，1851年7月20日建立“鼓动者协会”，而在1851年7月27日成立“德国流亡者俱乐部”。正是从这一天起，即从高尚意识的秘密愿望得到满足时起，才开始了“伦敦流亡者”内部的令人讨厌的内讧，正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洋两岸展开，这是伟大的老鼠与青蛙之战<sup>378</sup>。

谁使这架小小的竖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吸取振奋人心的

词汇的泉源，

为的是我能够用鲜明的色彩，

来描画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议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拔剑相斗。

(博雅多, Orlando innamorato, canto 27

(恋爱中的罗兰, 第二十七首歌))

这些“令人讨厌的内讧在公论中”从来没有“意义”，它们只是在老鼠与青蛙的私见中才有意义。但是，“内讧的后果至今还存在”。维利希先生之居留美国，就是这些后果之一。从美国汇到欧洲的贷款<sup>379</sup>变成维利希，从欧洲又回到了美国。他在那里初建的功勋之一就是在……成立了某秘密委员会，以便为布尔昂的哥特弗利德和隐士彼得<sup>①</sup>保障圣杯<sup>380</sup>，保障民主黄金，保存它，不让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sup>381</sup>和梅兰希通-隆格夺去。

尽管“高尚人物们”已经各得其所，而且用爱德华·梅因的话

① 戏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奥古斯特·维利希。——编者注

来说,所有的人,“直到布赫尔”,已构成一个统一联盟,但是,不仅在主力军中,而且在每一个兵营内部,瓦解过程进行得如此迅速,以致鼓动者协会不久便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北斗星,而流亡者俱乐部虽有高尚意识的联合力量,但也变成了维利希、金克尔和饭馆老板谢特奈尔的三位一体了。甚至三位一体对贷款的统辖权——高尚意识具有如此的吸引力——也归属了某种甚至不能称之为二元论的东西,即归属了金克尔—维利希。赖辛巴赫先生是一个过分受到尊敬的人,以致不能继续作为第三者呆在这个同盟内。他曾在实践中领教高尚意识的“个人性格”。

高尚意识的与恩格斯有关的一些经历,也是它所引用的“马克思的策略”的范例。我在这里引用恩格斯本人的一封信。

“曼彻斯特,1853年11月23日。在奥古斯特·维利希先生为了自我辩护而发表于‘纽约刑法报’(10月28日和11月4日)的小说中,我很荣幸地被提到。因此,我不得不就这个与我有关的问题正式地讲几句。

朋友维利希把纯粹的自扰与纯粹的活动混为一谈,因而忙来忙去只是为了朋友维利希。他对于有关他个人的一切具有极好的记忆,他简直有一套卡片,把别人谈论他的话,甚至别人在把酒闲谈时说过的话全都编了进去,——这一事实对于任何有缘和他认识的人来说,早就不是秘密了。但是,朋友维利希一向都是善于使自己的记忆和自己的一套卡片得到最充分的应用的。随便什么细小的曲解,随便什么看起来属于无意的遗漏,每次——当人们重新提起这类小事的时候——都把他变为一场戏剧的主人公,变为某一幅人物图、某一幅生动图画的中心人物。在维利希的小说中,无论是就细节或就整个而言,斗争每时每地都是围绕着白璧无瑕的

并因此遭到迫害的维利希。在每一个单独插曲中，我们在收场时都可看到：威武的维利希发表演说，而他的有罪的敌人则由于感到自己渺小而垂头丧气，痛不欲生。Et cependant on vous connaît, o chevaliers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但是我们仍然看透了你们，无畏又无瑕的骑士们!)

因此，在维利希的小说中，高尚人物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不信上帝的人的过失而受难的时期，同时也是凯旋时期，因为每一次他都胜利地惩治了自己的敌人，而且每一次新的凯旋都胜过一切以往的凯旋。朋友维利希一方面把自己描绘为受苦受难的基督，以身承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伴的罪孽，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描绘为到此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基督。朋友维利希能够同时一人充当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谁能同时演出这两个阶段，谁当然就该被人信仰。

这些自我陶醉的幻想充塞了这个上年纪的单身汉的不眠之夜，对于这些幻想我们早就熟知了；但我们感到奇怪的只是，这些特异反应现在仍然通过 1850 年那样的形式流露出来，没有变化。但是，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细节吧。

朋友维利希除了把施梯伯先生及其一伙变为从很久以前迫害蛊惑者<sup>382</sup>时代起就已不存在的某个德国‘中央联邦警察局’的爪牙，并且叙述了一大堆同样神奇的‘事实’之外，还以他惯有的准确性硬说我写著作的一部分，即其中谈到他的那一部分，因此，他清楚地知道，我从未出版过这种‘小册子’。实际上，我只是在‘新莱茵报。1850 年汉堡和纽约版’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谈到从我在普法尔茨—巴登运动时期

的个人经验中得出的观感<sup>383</sup>。在这篇文章中当然也提到朋友维利希,并且正如他所说的,给予他‘非常赞许的评价’,但是,这马上使他与他通常所固有的谦虚发生了冲突,因为这篇文章好像把他变成了‘为数如此之多的其他伟大的国家活动家、独裁者和统帅的匹敌者’。

从我这方面说,现在使维利希的高尚心灵乐不可支的这种很高的‘评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的‘评价’是:维利希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很不坏的营长,因为他曾任普鲁士尉官20年,掌握了这方面必要的知识,他不是没有能力领导小型的战争,特别是游击战争,最后,他还有一个优点,即担任一个600—700人的志愿队队长完全能够胜任,而在那个时期,大多数的高级军官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任何一般的军事素养,即使有一些军事素养,也与他们所居的职位完全不相称。说维利希先生比不管什么大学生、军士、学校教师或皮鞋匠能够较好地指挥700人,这对于一个在这方面有20年素养的普鲁士尉官来说,当然是‘非常赞许的评价’! Dans le royaume des aveugles le borgne est roi (盲人国里独眼称王)。不言而喻,他担任从属的职位,负责较少,因而就能比指挥几个师的或担任高级将领之职的‘他的匹敌者’少犯错误。谁敢否认,当了‘总司令’而完全没有能够胜任的济格尔,要当起营长来不也是一个不坏的营长吗?

而谦虚的维利希——大概是由于我的过失,某些美国报纸因他服役多年而称之为‘将军’——伤心地埋怨,似乎是我的‘评价’使他也有成为 in partibus<sup>①</sup>的将军的危险,不仅成为将军,而且

① 非现实的,海外的;直译是:“在不信教的国家”——天主教的主教在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头衔上都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有成为统帅、国家活动家、甚至独裁者的危险！朋友维利希想必有非常独特的想法，认为共产党对他这个靠拢它的大致过得去的营长和志愿队队长是 *in petto*（暗地）给予这样出色的嘉奖的。

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我只是把维利希当作一个军人来谈的，因为他只有作为军人才能使公众感兴趣，而在此之后他就成为‘国家活动家’了。如果我对他有仇恨，——在他看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对他充满仇恨，——如果我有兴趣给他作个人鉴定，那末讲出的插曲就无奇不有了！如果我只谈可笑的方面，难道我能放过苹果树事件吗？在苹果树下，他和他的伯桑松人<sup>384</sup>曾宁愿高歌而死，不愿重离德国国土，并且在那里庄严宣誓。难道我能不谈边界上所演的滑稽剧吗？当时，朋友维利希装腔作势地想真个准备实现这一意图；当时，有一些好心人到我这里来，十分认真地要我去劝说威武的维利希放弃他的决定；最后，维利希集合了队伍向大家提出问题，他们是不是愿意死在德国土地上而不愿出去流亡，在长久的共同沉默之后，一个唯一的视死如归的伯桑松人高呼：‘留在这里！’在此之后，令大家心满意足的是，大伙儿归根到底还是携带着全部武器和辎重转移到瑞士境内。最后在辎重上发生的事又是多么引人入胜的插曲。这件事到目前还是饶有兴味的，因为维利希本人正号召半个世界就他的‘性格’发表意见。顺便提一下，谁愿意知道这方面的详情细节和其他趣事，只消问问他的300名在当时没有能为自己找到温泉关的斯巴达人<sup>385</sup>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随时都愿意背着有性格的那个人叙述极其丢丑的事。在这方面我有很多的见证人。

关于我的‘勇敢’的事，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令我惊讶的是，那时我在巴登发现，勇敢是一种不值得一谈的最普通的品质，仅仅一

种单纯的勇敢并不比单纯的**善良意志**有价值。因此，常有这样的事，每个单独的人是英雄和勇士，而整整的一营却像一个人一样，逃之夭夭。维利希的队伍向卡尔斯多尔夫的进军就是一例，这次进军在我论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时已作了详细的说明<sup>386</sup>。

维利希硬说，他似乎因此向我宣读过不可违抗的道德训条，并且正是在 1850 年的新年之夜。我没有这样写日记的习惯，即标上几句我如何从这一年跨到那一年，所以我不能担保这个日期。无论如何，维利希决没有宣读像他在报刊上所阐述的那种副条。

维利希想使人相信，在流亡者委员会<sup>387</sup>，我和其他的一些人对伟大的人物行为‘不恭’。Shocking (真可怕呀)！但是，当维利希这位惩罚罪人的雷公突然对普通的‘不恭行为’束手无策时，这些不可违抗的道德训条到哪里去了呢？让我认真地去谈这些蠢事，大概是没有必要了。

在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闹到要求决斗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sup>388</sup>上，我似乎犯了罪，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一齐‘离开房间’，因而这就是通盘策划了这件事。

以前，似乎是马克思‘唆使’施拉姆，而现在为了多样化，我又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老练的用手枪有经验的普鲁士尉官同一个可能从来没有摸过手枪的商人之间的决斗，确实是一个把尉官‘扫掉’的顶好办法。朋友维利希不顾这一点，还到处诉说——口头上和书面上——似乎我们想枪杀他。

我和施拉姆同时离开房间，这十分可能(某种需要使我离开房间，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写入日记)；但是也未必如此，因为我从我所保存的当时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中看到，那天晚上施拉姆和我是轮流做记录的。施拉姆仅仅是被维利希的蛮横行为所激怒。他提

出同维利希决斗，使我们都大吃一惊。在几分钟之前，大概施拉姆本人也不会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很难想像有比这更不由自主的行动。维利希在这里又说，似乎他曾经声称：‘施拉姆，给我出去！’事实上是维利希要求中央委员会赶走施拉姆。中央委员会则认为没有必要满足他的要求。施拉姆只是应马克思的个人请求才离开的，因为马克思希望不要再继续胡闹。在我这一边有记录，在维利希先生一边有他的个人性格。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维利希先生又说，他在工人教育协会上叙述了流亡者委员会的“不恭行为”并为此而提出建议。

高尚意识叙述说：“当反对马克思及其一伙的怒潮达到最高峰时，我投票赞成中央委员会对问题进行审查。这件事就做了。”

做了什么事？是维利希投票呢？还是中央委员会对问题进行审查？多么醇厚啊！他的命令式的一票把他的敌人从达到最高峰的人民怒潮中挽救了出来。维利希先生只是忘了：中央委员会是秘密团体的秘密委员会，而工人协会却是公开的大众的团体。他忘了，中央委员会对事件进行审查的问题由于上述原因是不可能由工人协会中提付表决的，也不可能出现一个慈悲人排难解纷的场景，由他充当这个场景中的英雄。朋友沙佩尔会帮助他恢复自己的记忆。

维利希先生把我们从公开的工人协会引到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又从中央委员会引到安特卫普的一场决斗，即他和施拉姆的决斗：

“施拉姆在一个前俄国军官陪同下来到奥斯坦德，这位军官，据他说，是

在匈牙利革命期间转到匈牙利人这边的，在决斗结束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位“前俄国军官”不是别人，而是亨利克·路德维希·米斯科夫斯基。

我们在发给这位前俄国军官的证件中看到：《This is to testify, that the bearer Henri Lewis Miskowsky, a Polish gentleman, has served during the late Hungarian war 1848—1849 as officer in the 46th. bataillon of the Hungarian Honveds, and that he behaved as such praiseworthy and gallantly.

London, Nov. 12, 1853. L. Kossuth, late governor of Hungary》<sup>①</sup>。

说谎成性的高尚意识！但目的是高尚的。善与恶之间的对立要用鲜明对照的手法来描绘，让它像一幅生动的图画。多么艺术的一幅人物画呵！一边是这位高尚人物，身旁围绕着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泰霍夫，那时在流亡中而现在坐在阿尔及尔监狱中的法国骠骑兵上尉维迪尔，以及法国报纸所宣扬的一位最坚决的革命者巴特尔米。”

简言之，一边是维利希本人，身旁围绕着两个革命的精华；另一边是施拉姆，他是罪恶的化身，为一切人所不齿；和他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前俄国军官”，这位军官不是真正参加过而是“据他说”参加过匈牙利革命，并且在决斗之后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即归根到底原来是一个魔鬼。接着是艺术性的描绘：美德下

---

① “本证件持有人亨利克·路德维希·米斯科夫斯基，波兰贵族，在1848—1849年匈牙利战争期间曾任匈牙利护国军第四十六营军官，为人忠勇可嘉，特此证明。

匈牙利前执政者拉·科苏特，1853年11月12日于伦敦”。——编者注

榻在奥斯坦德的一个“头等旅馆”内，那里曾住过一位“普鲁士亲王”，而罪恶和俄国军官则“住在私人房子里”。不过，俄国军官看起来又不完全是“在决斗结束后消失”的，因为根据维利希先生的继续叙述，“施拉姆和俄国军官留在小河边”。但是，俄国军官并没有像我们高尚的骑士所希望的那样在大地上消失。这从下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来：

“在12月28日‘刑法报’上刊载着维利希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还专门记述了他于1850年在安特卫普与施拉姆的决斗。遗憾的是，这篇记述并没有在所有各点上都真实地向公众报道。那里谈到：‘决斗已经约定，云云，施拉姆在一个前俄国军官陪同下来到，云云，他如何如何消失。’这是不真实的。我从来没有为俄国效过力；如果用同样的理由，就可以像叫我一样，把参加匈牙利解放战争的所有波兰军官都叫做俄国人。从1848年战争开始到1849年战争在维拉戈什全部结束，我一直在匈牙利任职。我也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施拉姆从发射地点只挪了半步，就向维利希射击，但没有命中，于是维利希从自己的位置向施拉姆射击，他的子弹擦伤了施拉姆的头部。在此之后，我就留在施拉姆身边，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医生（决斗是维利希先生组织的）；我洗净了施拉姆的伤口并把它包扎起来，因而我也不去注意到有7个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面收割干草，一面注视着决斗，而他们对我来说可能是危险的。维利希和他的同伴们急急忙忙跑了，施拉姆则和我从容地留在原地看着他们离去。他们不久就在我们的眼帘中消失。我还应该指出，当我们到达决斗地点时，维利希和他的同伴早就在那里了，他们为决斗量好了距离，而且维利希还为自己选择了一块背光的地方。我叫施拉姆注意这一点，但是他说：‘就让他这样吧！’施拉姆表现得勇敢无畏，十分冷静。我被迫留在比利时的时的事实，对于参加这件事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的。关于形式如此独特的这次决斗的更细情节，我不想谈了。”

亨利克·路德维希·米斯科夫斯基

1853年11月24日于伦敦”

高尚意识的机器开动了。他发明了某个俄国军官，马上又使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我又一定要代替这个军官，像萨米尔那样在战场上出现了，尽管不是以实体出现。

“次日清晨（在维利希先生到奥斯坦德之后），他（一个平日非常熟的法国公民）把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报’给我们看，上面登载着一篇私人通讯，其中有如下这一段：‘有许多德国流亡者来到布莱顿。从那个城市给我们来信：赖德律—洛兰和来自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准备于日内在奥斯坦德与比利时的民主派举行代表会议。’谁能追求称这个思想为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荣誉呢？它不是出自法国人，不然，它就太 *a propos*（凑巧）了。这个荣誉完全属于马克思先生，因为如果他的一个朋友有可能把那个东西执行，那末，思想还是由头脑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创造出来的。”

“一个平日非常熟的法国公民”把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报”给维利希先生及其一伙看。他给他们看的是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只有安特卫普的“先驱者报”<sup>389</sup>。在地形学和年代学领域内系统地歪曲和捏造，是高尚意识的重要职能。只有这样的背景，即理想的时间和理想的空间，才适合于他的理想的作品。

为了证明这个思想，即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报”中的文章“出自”马克思，维利希先生想使人相信：“它不是出自法国人”。这个思想本来就不会出自某某！“不然，它就太 *a propos*（凑巧）了”。*Mon dieu*（我的上帝），为什么维利希先生本人用法语才能够表达的思想就不可能出自法国人呢，我的高尚意识？这里又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法国人呢？维利希、施拉姆、前俄国军官和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报”跟法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高尚意识的思想的传播器开始高叫得很不是时候，泄露了高尚意识曾 *a propos*（凑巧）认为必须抛弃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让我们把这个环节再安装上来吧。

还在施拉姆惹起维利希先生的决斗之前，法国人巴特米已

约定与法国人桑让决斗；而后者应该在比利时进行。巴特米选择了维利希和维迪尔作助手。桑让启程赴比利时。这时候发生了与施拉姆的冲突。于是，两个决斗定在同一天进行。桑让没有到决斗地点。巴特米在回到伦敦后公开断定，安特卫普的“先驱者报”上的文章出于桑让之手。

在高尚意识把巴特米的思想转移给自己，而把桑让的思想转移给我之前，它是长久地犹豫了一阵的。正如泰霍夫夫人返回伦敦后向我和恩格斯所说的，最初，它坚决地肯定，我意欲假施拉姆之手打发高尚人物回阴曹地府，并且它还用书面向全世界披露了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三思之后，它确定了，惯于运用鬼一般滑的策略的我，不会考虑通过与施拉姆的决斗来收拾维利希先生。因此，它便抓住了“不是出自法国人的”思想。

**命题：**“这个荣誉完全属于马克思先生”。**证明：**“因为如果他的一个朋友有可能把那个东西（不言而喻，“思想”在我们的无瑕的骑士那里是中性而不是阴性<sup>①</sup>）执行（执行思想！）那末，思想总还是由头脑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创造出来的”。**因为如果！**好一个**因为如果！**维利希先生为了证明马克思臆造出“那个东西”，便假定马克思的一个朋友执行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有可能执行“那个东西”。Quod erat demonstrandum（如此就得到所需要的证明）。

高尚意识说：“如果确走，马克思的朋友瑟美列把匈牙利王国出卖给了奥地利政府，那末，这就是可靠的证明，云云。”

假定说，确定的适得其反。但是这与本题无关。假如瑟美列有了出卖行为，那末，这对维利希先生来说就是“可靠的”证明，

---

① 在原文中，“那个东西”是中性，“思想”是阴性。——译者注

即证明马克思是布鲁塞尔的“先驱者报”上一文的作者。但是如果连前提也不确定，那还是得坚决确定结论，换言之，就是坚决确定：如果瑟美列出卖了圣者斯蒂凡的王国，那末，马克思就出卖了圣者斯蒂凡本人。

在俄国军官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维利希先生又出现在伦敦的“工人协会”上，在那里，

“工人们一致谴责马克思先生”，这位先生“在他退出协会后第二天，伦敦区部全体会议就一致把他开除出盟”。

但是，还在此之前

“马克思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一起做出了关于中央委员会迁出伦敦的决定”，

并且不顾沙佩尔的善意警告，成立了自己的特别区部。根据秘密团体的章程，多数人是有权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并暂时开除整个维利希区部的，而这个区部则无权作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惹人瞩目的是：高尚意识一向偏爱小小的戏剧场面，在这样的场面里，维利希先生担任大雄辩家角色，而这次却连惨剧、爆发的场面都没有利用。诱惑力是很大的，但可惜，白纸黑字的记录摆在那里，它表明：一贯得胜的基督一连几个小时如坐针毡，哑然无声地听取恶鬼的指控，然后，突然溜走，让朋友沙佩尔去听天由命，只是在正统的“区部”中才重新获得了说话的能力。En passant (顺便提一下)，当维利希先生在美国一本正经地谈论“由于尊重和信任而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工人协会”是如何美妙时，甚至连沙佩尔先生也认为有必要暂时退出维利希先生的协会。

高尚意识从如此娴熟的“策略”行为的领域向理论领域上升了一小会儿。但这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实际上，他是继续提供

“马克思先生的策略范例”。我们在“揭露”第8页上看到：“沙佩尔—维利希派（维利希先生引证的是：维利希—沙佩尔派）从来不追求具有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荣誉。他们只有别出心裁地曲解别人的思想的本领”<sup>390</sup>。维利希先生为了在公众面前摆出他自己的思想储备，于是便述说小资产阶级如果掌握政权就会“创立”“哪些机构”，并把它当作自己的最新发现以及对恩格斯和我的观点的反驳。恩格斯和我所写的、被萨克森警察局从毕尔格尔斯那里查获的通告<sup>391</sup>——它曾刊载于最流行的德国报纸，并构成科伦起诉书的根据——非常群尽地叙述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善良愿望。维利希的布道词就是从那里弄来的。让读者去比较原稿和抄本吧！美德做事是多么淳厚啊！竟在罪恶那里从事抄写工作，尽管也有“别出心裁的曲解”。恶化的风格被从善的愿望弥补了。

在“揭露”第64页上谈到，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自己的目的”<sup>392</sup>。维利希先生由于高尚而抛掉了句子的前一段：“不是未来的执政党”，而抓住后一段：“未来的反对党”。他在如此巧妙地把这个句子劈开之后，就证明说，真正的革命政党，这就是追逐地位的人的政党。

维利希先生出产的另一个“自己的”思想是：高尚意识和它的敌人之间的实际矛盾也可以从理论上表达为“人类之分为两类”，即分为维利希派和反维利希派，分为高尚的一类和不高尚的一类。关于高尚的一类，他使我们知道，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彼此器重”。当高尚意识不再用它的策略范例来使我们开心时，令人感到乏味就是它的特权。

我们看到：高尚意识是如何歪曲或颠倒事实，或用滑稽的假

设冒充严肃的命题——这一切都是为了**实际上**宣布与他相矛盾的一切都是不高尚的，卑鄙的。因此，我们看到，他的整个活动完全可归结为发明卑鄙的东西。这一活动的另一面是，高尚意识把他和世人之间发生的一些实际误会——不管它们如何有损名誉——变为确证自己高尚的实际证明。对于纯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纯洁的，而敌人如果用高尚意识的所作所为来评价高尚意识，恰好证明了自己是不纯洁的。因此，高尚意识用不着**自我辩白**，它要做的只是对迫使它自我辩白的敌人表示道义上的愤怒和惊讶。因此，维利希先生的似乎是**自我辩白**的插曲本来就可以不做，不做也是一样，每一个把我的“揭露”、希尔施的自供和维利希先生的答复比较一下的人，都会深信这一点。因此我只举几个例子来表明高尚意识的人物们是些什么货色。

尽管希尔施的自供的最初目的是歌颂维利希先生，把他捧作从自己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救星，但是，这个自供比我的“揭露”更甚地有损他的名誉。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接触希尔施的自供。如所周知，希尔施是普鲁士警察当局反对我所属的党的工具。维利希先生不顾这一事实，却假设希尔施**本来**是我为了“毁掉”维利希的党而委派的。

“很快他（希尔施）就和马克思的某些拥护者，特别是和某某罗赫纳一起，开始阴谋活动，企图毁掉协会。因此大家开始注意他。他被揭发了，云云。根据我的建议，把他开除了；罗赫纳袒护他，也被开除了…… 希尔施现在又开始了反对奥·迪茨的阴谋活动…… 阴谋又被迅速地揭穿。”

根据维利希先生建议把被当做密探的希尔施逐出大磨坊街工人协会一事，是我在“揭露”第 63 页<sup>393</sup>上谈的。这种驱逐在我心目中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知道，驱逐的原因并不是确凿的事实，而

是猜疑希尔施和我搞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阴谋活动。现在这一点连维利希先生本人也已承认。我知道希尔施是没有犯这个罪的。至于谈到罗赫纳，他曾要求拿出希尔施的罪证。维利希先生回答说，不知道希尔施是靠什么生活的。罗赫纳问道，维利希先生是靠什么生活的呢？由于这个“不恭的”责问，罗赫纳受到了公意审判，并且因为他不听所有的告诫，不想低头认罪，所以被“开除”。在希尔施被开除以及罗赫纳接着他被开除后，希尔施的阴谋活动

“现在主要是反对奥·迪茨，并且串通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前萨克森警探，后者对迪茨提出了指责。”

施泰翰逃出汉诺威的一个监狱到达伦敦后，参加了维利希的工人协会并对奥·迪茨提出指责。施泰翰既非“可疑的”，也非“前萨克森警探”。促使施泰翰对奥·迪茨提出指责的原因是，法院侦查员在汉诺威曾经向他出示了许多他私人的信件，而这些信件是他寄给伦敦的维利希委员会<sup>394</sup>书记迪茨的。与施泰翰几乎同时出现的有：罗赫纳，刚从汉诺威监狱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的埃卡留斯第二，根据参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一案的逮捕令被到处搜捕的吉姆佩尔，以及1848年由于一首革命小诗而曾在汉堡被拘并假装又受到警察当局迫害的希尔施。他们和施泰翰一起组成了某种反对派，并由于在协会的公开辩论会上反对维利希先生的教义而犯了亵渎圣灵罪。使他们大家感到惊讶的是，对施泰翰指责迪茨的答复是维利希开除希尔施。不久他们都退出工人协会并和施泰翰组成一个单独的协会，这个协会也存在了一些时候。他们和我建立联系只是在他们退出维利希先生的协会之后。高尚意识颠倒了年代顺序，完全无视施泰翰，抛弃这个必要的、但不怎么令人舒服的中间环节，从而暴露了自己说谎的习性。

我在“揭露”第 66 页上谈到：“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前不久，维利希和金克尔委派了一个裁缝的帮工<sup>①</sup>充当特派员前往德国”，<sup>395</sup> 云云。

高尚意识愤怒地叫道：“为什么马克思先生强调这是裁缝的帮工呢？”

我决没有“强调”这是裁缝的帮工，没有像高尚人物所做的那样，例如，他强调皮佩尔是“路特希尔德家里的家庭教师”，虽然皮佩尔已由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而失掉在路特希尔德那里的工作去做英国宪章派机关报<sup>②</sup>的编委。我只不过是把裁缝的帮工叫做裁缝的帮工。为什么？因为我应该不提他的名字，同时应该向金克尔先生和维利希先生表明，我完全了解他们的特使的人格。因此，高尚意识指责我对所有裁缝的帮工犯了叛国大罪，并对裁缝的帮工高唱品得式的颂歌，以此来争取他们的选票。高尚意识为了顾全裁缝的帮工的善良名声，宽宏大量地不提埃卡留斯——他谈到埃卡留斯时就像谈到一只被驱逐的大山羊——是裁缝的帮工，其实，这个职业至今丝毫也没有妨碍埃卡留斯是一位德国无产阶级的大思想家，丝毫也没有妨碍他用自己载在“红色共和党人”、“寄语人民”<sup>396</sup>和“人民报”上的论文博得甚至在宪章派中的威望。维利希先生反驳我对他和金克尔派往德国的裁缝的帮工的活动的揭露，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现在我谈谈亨策的事情。高尚意识企图对我冲刺一下来掩护自己的阵地。

“顺便提一下，他（亨策）曾借给马克思 300 塔勒。”

① 奥·格贝尔特。——编者注

② “人民报”。——编者注

1849年5月，我告诉雷姆佩尔先生，“新莱茵报”的财政困难随着订户的增加而增加了，因为开支一定要用现金支付，而订费总是迟迟来到；除此之外，由于发表了维护巴黎六月武装起义者的文章以及抨击法兰克福议员、柏林妥协派和三月同盟的文章<sup>397</sup>，几乎所有股东都逃开了报纸，因而造成了巨大赤字。雷姆佩尔先生让我去找亨策，他以我的借条为据借给了“新莱茵报”300塔勒。那时亨策本人正被警察当局追捕，所以他认为有必要离开哈姆，于是他就和我一同到科伦去；到了科伦，我就得到关于我被驱逐出普鲁士国境的消息。我向亨策借来的300塔勒，我通过普鲁士邮局收到的订户寄来的1500塔勒，我的一部高速平板印刷机，等等——这一切都用来抵偿了“新莱茵报”对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纸商、办事员、通讯员、编辑部人员等等所欠的债务。没有谁比亨策先生更清楚地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本人曾借给我的妻子旅行包，用来装她的银器，送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以便我们能够弄到私人所需的费用。“新莱茵报”的账册保存在科伦的商人斯蒂凡·瑙特那里，我可以授权给高尚意识到那里取得这些账册的经过正式核对的抄本。

在谈了一些离题的话之后，现在言归正题。

“揭露”丝毫不认为维利希先生是亨策的朋友以及从亨策那里得到资助是不可解的。它认为不可解的是（第65页<sup>398</sup>），在科伦案件接近尾声时，在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警惕性达到顶点并对德国和英国每个稍有可疑的德国人严密注视时，亨策竟得到当局的许可，前往伦敦，并在那里毫无阻碍地同维利希会晤，然后又回到科伦来提供反对贝克尔的“假证词”，要知道，亨策家里曾被搜查并有文件被查获，他曾被查出在柏林窝藏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的席

梅尔普芬尼希,并且“自认”曾参与同盟的活动。一定的时期使亨策先生和维利希先生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性质;上述的情况理应使维利希先生本人也感到奇怪,尽管他不知道亨策从伦敦用电报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联络。这里谈的是一定的时期。维利希先生正确地感到这一点,因此他用自己的高尚方式声明:

“他(亨策)在审判之前来到伦敦(这一点我也肯定),他不是到我这里来,而是来参观工业博览会的。”

高尚意识像有自己私人的布鲁塞尔“先驱者报”一样,也有自己私人的工业博览会。真正的伦敦工业博览会是在1851年10月闭幕的,而维利希先生说亨策在1852年8月来“参观它”。席利、海泽和金克尔—维利希贷款的其他担保人都可证实这一情况,亨策先生曾低声下气地请求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同意把美国的款项从伦敦转移到柏林。

还在亨策先生住到维利希先生那里之前很久,他就接到了出庭科伦案件的传票,但他不是作辩护人一方,而是作为起诉人一方的见证人被传的。一当我们知道维利希先生指示亨策如何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作证反对贝克尔(“揭露”第68页<sup>399</sup>)——“具有如此高超精神和性格的人”,我们立即就把相应的情报寄给贝克尔的辩护人,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信恰好在讯问见证人亨策这一天到达。他的证词的性质不出我们所料。因此,贝克尔和施奈德尔就公开质问他与维利希先生的关系。信保存在科伦的辩护人的文件中,讯问亨策的报告发表于“科伦日报”。

我不作这样的推论:假如确定亨策先生如何如何,那末这就是维利希先生的活动的可靠证明;因为如果朋友亨策有可能执行那个东西,那末,思想总还是由头脑创造出来,而不是由手创造出来

的。这种辩证法我情愿让给高尚意识。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维利希先生的本題上来吧：

“为了充分评价这个（马克思所采取的）策略，这里还有几个范例。”

在黑森消极抵抗、普鲁士招募后备军以及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表面上冲突<sup>400</sup>时，高尚意识恰好准备在德国掀起军事暴动，方法就是寄送“成立后备军委员会的简要方案给在普鲁士的某些人”和维利希先生准备“亲赴普鲁士”。

“正是马克思先生从自己人那里得知此事后，把我意图前往的消息告知了别人，并且后来夸耀说，他用来自德国的假信件戏弄了我。”

Indeed! (确实如此!) 贝克尔寄给我一些维利希的狂妄信件以及他对这些信件的有趣评论，这些信件贝克尔已在科伦公开了。如果我剥夺自己的朋友阅读这些信件的乐趣，那我就太残忍了。施拉姆和皮佩尔为了逗趣，曾回信戏弄维利希先生，但回信不是“来自德国”，而是通过伦敦市邮局寄的。我们的高尚人物加意小心，不把邮戳给人看。他硬说“收到一封用伪造的笔迹写的信，并认出它是假的”。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信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维利希先生“夸耀说”，他发现了据说是伪造的笔迹，并从封封皆真的信件中认出有一封是假的，同时他过分高尚了，竟认不出用亚洲式的夸张手法对他个人的颂扬、对他固执思想的非常滑稽的称赞、对他个人奢望的小说式的夸张，都是戏弄。即使维利希先生的出行是经过认真考虑而决定的，那末，阻碍他成行的也不是我“把消息告知了第三者”，而是别人告知了维利希先生本人一个消息。原来，他所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揭掉了本来就是透明的外皮。他为自己的虚荣心所驱使，至今还认为那封使他陷于失望的信是假的，而那些愚弄他

的信是真的。高尚意识不是认为，由于自己是有美德的，所以世界上尚能存在的大概是 sect and cakes (爱情和吃喝)，但不应当有幽默呢？我们高尚的骑士不让公众享受阅读这些信件的愉快是不高尚的。

“至于谈到马克思所提到的和贝克尔的通信，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

至于谈到这种捏造的通信、维利希先生大驾亲赴普鲁士的意图和我把这消息告知第三者，那末，我认为寄一份“刑法报”给前尉官施特芬是适宜的。施特芬是为贝克尔辩护方面的见证人，贝克尔曾把自己的所有文件交他保管。警察当局迫使施特芬离开科伦，他现在住在切斯特，在那里教书，因为他属于不高尚一类的人，甚至在流亡中还挣钱谋生。高尚意识是超凡的人，他不靠资本生活，因为它没有资本，也不靠工作生活，因为它不工作，它是靠社会舆论这种天降食物生活的，靠别人对他的尊敬生活的。因此它才像为自己唯一的资本而搏斗一样为此而搏斗。

施特芬写给我这样一封信：

“维利希非常恼恨您引用了贝克尔信中的片断。他把这封信从而也把那段引文叫做捏造。我现在用事实来驳斥这种荒谬的论断，以便用确凿的证据证实贝克尔对维利希的看法。有一天晚上，贝克尔笑逐颜开地递给我两封信，并且建议我在情绪不佳的时候阅读；他说它们的内容定会使我解闷，说由于以往的地位可以从军事观点予以评判。我反复阅读了奥古斯特·维利希写给贝克尔的这些信，果然找到了非常滑稽可笑的庄严命令（用相称的普鲁士王国的术语来说），在这些命令中大元帅和社会的救世主从英国发出指示：占领科伦，没收私有财产，建立巧妙地组织起来的军事独裁，实施军事社会法典，除一种每日公布应当怎样思想和怎样做事的命令的报纸之外，其他报纸一律禁止，还有许多其他的细节。维利希非常体谅下情，竟答应，如果在科伦和普鲁士莱茵省完成了这部分工作，他一定亲自莅监，以便区分母羊和公羊，审判活人和死人。维利希断言，他的‘简要方案容易实现，只要某些人

表现出主动精神’，并且说‘它具有**极其严重的后果**’（对谁？）。为了扩大视野，我很想知道有哪些深谋远虑的‘后备军军官’‘后来’向维利希先生‘表示’这样的态度，也很想知道，在普鲁士后备军集中期间，这些**据说是**相信‘简要方案的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先生们都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英国，还是在预定的婴儿出世的地方即普鲁士。维利希非常亲切地把婴儿诞生的喜报寄给了‘某些’人，并且做了描述；但是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贝克尔、‘具有高超智慧和性格的人’之外，看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成为教父。有一次维利希派来一位名叫……<sup>①</sup>的副官。这位副官给我很大荣誉，邀我到他那里去，并且坚决地相信，他有十分把握能够一眼看去就对整个形势作出估计，比任何其他天天直接注视事实的人估计得更好。因此，当我告诉他，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们决不会认为在他和维利希的旗帜下战斗是一种幸福，他们根本无意于 *citissime*（匆忙地）宣布成立维利希式的共和国的时候，他对我就很不看起来了。使他更为恼怒的是，没有物色到一个那么没有头脑的人同意翻印他随身带来的告军官书，告军官书号召军官们马上公开表示拥护他称之为民主制的‘那个东西’。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被马克思奴役的科伦’（对我这样写的），但是，他在其他某处翻印了这篇废话并散发给许多军官。因此，‘十字报’的‘观察家’得以揭穿这种变普鲁士军官为共和派的巧妙方式的童贞般的秘密。

维利希声称，他决不相信，具有‘贝克尔式的高超性格和精神’的人们会嘲笑他的方案。因此，他把说出了这一事实的话叫做荒谬的捏造。如果他读过关于科伦案件的报告，——当然，他是理当一读的，——那末，他就会发现，贝克尔就像我一样，已经**公开地**对他的方案表示了您所发表的那封信中的意见。如果维利希愿意得到一个**从军事观点**对那时情况的正确的描写，而不是根据幻想的灵感对那时情况的描写，那末，我能够在这方面为他效劳。

应该遗憾地指出，在维利希的以往的伙伴中，拒绝按照他的需要对他的军事天才和他对事物的实际了解五体投地的人，还不仅是魏德迈和霍夫夫。

维·施特芬

1853年11月22日于切斯特”

<sup>①</sup> 在“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中引用这封信时指出这人是席梅尔普芬尼希，而不是用省略号。——编者注

最后，还是“马克思的策略的范例”。

维利希先生离奇地记述了1851年2月路易·勃朗举行的一次宴会，这个宴会是在赖德律-洛兰的宴会的对台戏，同时又是为了抵御布朗基的影响而举行的反示威。

“不言而喻，马克思先生没有被邀请。”

不言而喻，没有。每个人花两先令就可拿到“请帖”，并且过了没有几天，路易·勃朗就不厌其烦地问马克思为什么不到。

“随后（随在什么之后，随在宴会之后吗？）就有传单在德国工人中间散发了，传单上刊印了未经宣读的布朗基献词，还附有嘲笑纪念会的按语，把沙佩尔和维利希叫做瞞哄人民的骗子。”

“未经宣读的布朗基献词”<sup>401</sup>构成了高尚意识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尚意识充分相信他的话具有最高意义，通常都是断然声明：“我从来也不说谎！”

在宴会后过了没有几天，巴黎的“祖国报”就刊登了布朗基应纪念会组织者的请求从贝耳岛监狱寄来的献词全文。在献词中，布朗基用他所固有的清晰的形式痛斥了1848年临时政府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宴会的组织者路易·勃朗先生。“祖国报”故作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这篇献词没有在宴会上宣读。路易·勃朗立刻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声明，布朗基是卑鄙的阴谋家，他根本没有给纪念会筹备委员会寄来这样的献词。路易·勃朗、朗道夫、巴特米、维迪尔、沙佩尔等先生和维利希本人，以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给“祖国报”送去一项声明：他们从来没有收到上述的献词。但是，“祖国报”在公布这个声明之前，曾问过把献词全文转寄给它发表的布朗基的妹夫安都昂先生。它把安都昂的回信发表在上述先生们的声明全文下面，安都昂在回信中说，他确实把献词寄给了巴特米

米，并且收到了他的关于献词已收到的通知。随后，巴特米先生就声明，虽然他收到献词，但是，他认为这篇献词不妥，所以把它压了下来，没有把这件事通知委员会。但是不幸，还在此之前，声明签署人之一，前上尉维迪尔在“祖国报”上写道，军人的荣誉感和对追求真理的心情迫使他承认，他和路易·勃朗、维利希以及其他在委员会的第一个声明上签了名的人都撒了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上述6个而是13个。他们都看到了布朗基的献词，大家讨论了这篇献词，经过长久的辩论之后，以7票对6票的多数决定不宣读这个献词。他，维迪尔是投票赞成宣读的6个委员之一。

“祖国报”收到了维迪尔的信之后又收到巴特米先生的声明，它的得意可想而知。它发表了这一声明，并且给它写了下面的“前言”：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在蛊惑民心者的身上什么东西更发达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我们收到的从伦敦来的第四封信，使我们更难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可怜虫在那里有多少呵！他们是这样迫切地渴望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心蒙受无穷的耻辱和自轻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何相干——只要‘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将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到这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由于对写作的同情心，我们刊载了公民巴特米的下面这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新的、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它证明从今以后出了名的布朗基献词是真实的。他们起初全都否认这个献词的存在，而现在却为了争着确认这个献词的存在，而互相辱骂以至厮打起来了。”

这就是布朗基献词的历史。Société des proscrits démocrates et socialistes（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由于“未经宣读的布朗基献词”而撕毁了与维利希先生的组织的协议。

与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同时，Sociétés des proscrits démocrates et socialistes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也分了家。它的一部分表现了可疑的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即赖德律—洛兰主义的趋向的会员们声明退出，并且事后被开除。或许高尚意识告诉了**这个协会**，像它现在告诉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是恩格斯和马克思阻挠这个协会的会员投入资产阶级民主的怀抱，阻挠他们和“**所有由同情的纽带联结起来的革命参加者**”留在**一起吧**?或许高尚意识对他们说，“革命发展观的不同在分裂时没有**任何作用吧**”?不，高尚意识所说的恰好**相反**，它说两个协会中发生分裂是由于**同样的原则性的分歧**，恩格斯、马克思和其他一些人代表上述德国协会中的**资产阶级成分**，就像马迪耶及其一伙代表法国协会中的资产阶级成分一样。我们高尚的人物甚至害怕，只要同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稍一接触，就可能损害“真正的教义”，因此，他以肃穆伟大的气概提出建议禁止资产阶级分子“甚至作为**访问者**”出现在 proscrits (流亡者)协会中。

捏造! 撒谎! ——高尚意识发出了它充满伟大道义的短促喊声。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策略的范例**”! Voyons! (让我们看一看吧!)

《Présidence du citoyen Adam. Séance de 30 sept. 1850.

Trois délégués de la société démocratique allemande de Windmill—Street sont introduits. Ils donnent connaissance de leur mission qui consiste dans la communication d’une lettre dont il est fait lecture. (大概，在这封信中叙述的是分裂的原因。) Le citoyen Adam fait remarquer l’analogie qui existe entre les événements qui viennent de s’accomplir dans les deux sociétés: de chaque côté l’élément bourgeois et le parti prolétaire ont

fait scission dans les circonstances identiques etc. etc. Le citoyen W illich demande que les membres, démissionnaires de la société allemande (正如记录所指出的,他后来改正说:《expulsés》ne puissent être re us meme comme visiteurs dans la société fran aise). (Extraits conformes au texte original des procès verbaux.)

L'archiviste de la société des proscrits démocrates et socialistes

J.Clédat<sup>①</sup>

动听的、神奇的、夸张的,前所未闻的、真正的和充满冒险情节的关于举世闻名的高尚意识的骑士的故事就此结束。

An honest mind and plain,—he must speak truth,  
And they will take it, so; if not, he's plan.  
These kind of knaves I know.<sup>②</sup>

卡尔·马克思

1853年11月28日于伦敦

① “公民亚当任主席。1850年9月30日开会。

会上介绍磨坊街的德意志民主协会三个代表。他们声称,受委托递交一封信,信宣读了。(大概,在这封信中叙述的是分裂的原因。)公民亚当指出两个协会中刚刚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共同点:两个协会在同样的情况下发生了资产阶级成分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裂,云云。公民维利希要求,退出德国协会的会员(正如记录所指出的,他后来改正说:“被开除的会员”)不准甚至作为访问者进入法国协会。(摘录与原记录相符)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档案室保管员

约·克列达”。——编者注

② 坦率而正派的人说话句句是真,

相信了,他兼有二者;不相信,他总还坦率。

我知道这样的无赖。

(莎士比亚“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 曼托伊费尔的演说。——普鲁士  
的宗教运动。——马志尼的宣言。  
——伦敦市政厅。——罗素的改革。  
——工人议会

1853年11月29日星期二于伦敦

昨天早晨普鲁士议会会议开幕，首相曼托伊费尔先生发表了演说。根据电讯判断，演说中谈到东方纠纷那部分所用的措词，显然是有意要消除人们对圣彼得堡、柏林和维也纳各宫廷之间存在密谋的怀疑。这一点特别突出，还因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曾根据各种理由，通过同一个曼托伊费尔向他忠实的人民郑重宣布，议会并不负有干预对外政策问题的使命，因为国家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像国王的私人领地一样，是专门由王室管理的。演说中的这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某种对人民的呼吁，这表明普鲁士政府的处境极端困难；一方面俄国和法国威胁着它，另一方面它自己的臣民也威胁着它，而且恰好是在它被昂贵的粮价、极度的商业停滞所困扰，并且回想起可怕的背誓行为<sup>402</sup>将遭到报复而无法安宁的时候。但是，普鲁士政府自己使自己失去了通过议会诉诸舆论来寻求避难所的可能性，议会是国王有意作为一个

简单的虚设机构建立起来的，大臣们自觉地把它们当作一个简单的虚设机构，人民也非常肯定地把它们看成是一个简单的虚设机构。时至今日，已不能使人民相信这些虚有其表的机关应该毫无来由地被看做是“祖国”的支柱了。

今天的“泰晤士报”写道：“决不能说，普鲁士人表现了头脑清醒和卓有见识的品质（这些品质一度曾经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因为他们以不应该的鄙视态度对待议会，让根据现行宪法选举出来的议会垮台。”

相反，普鲁士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是头脑清醒的，因为他们甚至拒绝承认那些背叛了革命、希图篡夺革命果实的人们**表面上的权势**，他们叫政府知道，他们是不会受政府的骗术愚弄的，他们认为，如果议会还算个什么东西的话，那也无非是加在国家的旧官僚机构上面的新官僚机构。

在其他方面平静无事的德国社会生活面上，一再被宗教争论掀起风波，这种情况会使任何一个不太熟悉德国过去历史的人大惑不解。时而是所谓德国教会<sup>403</sup>的残余分子遭到现政府疯狂的、像1847年那样的迫害。时而是天主教派和新教派通婚的问题使天主教教士像1847年那样同普鲁士政府争吵起来。时而是夫赖堡大主教同巴登大公之间爆发激烈的斗争，成为最重要的事件，前者把巴登政府开除出教，并且下令在传道坛上宣读把巴登政府驱逐出教的信件，后者则下令封闭不听话的教堂，逮捕教区牧师，结果使农民纷纷集合，武装起来保卫他们的牧师，赶走宪兵，像比硕夫斯海姆、科尼斯霍芬、格律恩斯菲尔德、格尔拉赫斯海姆（这些地方村长则不得不逃跑）以及其他许多村庄发生的事情那样。如果把巴登的宗教冲突看做纯粹是地方性的冲突，那就错了。巴登只不过是天主教会特意选来进攻新教徒君主的斗争舞台。在这个

冲突中，夫赖堡大主教代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教士，巴登大公则代表所有大大小小的新教徒君主。但是，一个一方面以它对一切宗教传统抱彻底、大胆和无比的批判精神而著名的国家，另一方面又不时重新爆发十七世纪的宗教纠纷而使整个欧洲吃惊，这样的国家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的秘密不过是，政府使任何一个刚刚产生但暂时还在暗中活动的人民反对派起初都不得不采取一种神秘的、几乎不受任何监督的宗教运动形式。而僧侣们也甘心用这种幌子来欺骗自己，他们还以为自己利用人民的热情去反对政府只对自己的团体有利，然而实际上却是事与愿违，不自觉地起着革命工具的作用。

伦敦的日报对马志尼起草的宣言用尽平生之力摆出一副惊恐万状和义愤填膺的样子。这个宣言是在被派到路易吉安那——这个地区包括了摩地那、帕尔马和皮蒙特王国一部分领土——去发动起义的第二民族支队的领导人费利切·奥尔西尼那里查获的。宣言号召人民“采取突然行动，就像米兰人过去做过并且现在还要再做的那样”。宣言又说：“短剑如果用来作突然的狙击，它就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并代替枪杆。”伦敦报刊把这一点说成是公开号召“进行卑怯的暗杀”。我只希望知道，在意大利这个不存在任何公开反抗手段和到处都是密探的国家里，革命运动不利用突然性怎能指望得到什么成就呢？我希望知道，如果真的战斗起来，意大利人民除了使用还没有被奥地利夺走的唯一武器——短剑以外，还能用什么武器去同奥地利军队战斗呢？马志尼远不是想建议意大利人用短剑去对手无寸铁的敌人进行卑怯的刺杀活动，——他是号召他们用短剑行动起来，诚然，是“突然”行动，但却是公开地行动，是效法米兰的榜样，在米兰，手里只有刀子的一小群爱国者曾

经袭击了全副武装的奥地利卫戍部队的守卫所。

“泰晤士报”写道：“但是，立宪制的皮蒙特将遭到罗马、那不勒斯、伦巴第的命运！”

为什么不呢？难道 1848 年和 1849 年的意大利革命不是撒丁国王<sup>①</sup>出卖的吗？难道皮蒙特国王阻碍意大利成为共和国比不上普鲁士国王阻碍德国成为共和国吗？马志尼宣言从道义方面来看，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它的政治价值，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我看来，马志尼无论在他对皮蒙特人民的看法上，还是在他对意大利革命的理想上都犯了错误。他认为，意大利革命的实现无须凭借欧洲的纠纷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只要依靠突然行动的意大利密谋家们的单独发动就可实现革命。

诸君从各家伦敦报纸上已经知道，英国政府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最受尊敬的大名鼎鼎的伦敦市政厅这个机关的贪污事件，同时也考察这个机关的全部组织。委员会的工作还远未结束。下面就是委员会的报告所举出几个事实。

伦敦市政厅的收入，即使有几项除掉不算，总数共达 40 万英镑，官员的薪俸总额非常可观——共 107000 英镑，即占总收入的 25% 以上。法官薪俸的支出规定为 14700 英镑，其中市首席法官得 3000 英镑，法庭顾问得 1500 英镑，郡法院的法官得 1200 英镑。总务官得 1892 英镑，秘书得 1249 英镑，代表伦敦市政厅出席各议会委员会的官员得 1765 英镑。市长官邸和市政厅的高级官员每年各得 1250 英镑。执权杖侍从官得 550 英镑，执剑侍从官得 550 英镑；典礼官得 450 或 500 英镑，典礼次官得 200

<sup>①</sup> 查理·阿尔伯特。——编者注

或 300 英镑。此外，这些要人们还领 70 英镑的服装补助费，14 英镑的靴子补助费，20 英镑的三角礼帽补助费。本诺克先生在他的证词中说：

“伦敦市政厅所属各机关的支出总额大大超过合众国联邦政府的支出总额；也许更惊人的事实是：伦敦市政厅本身的经费和它的财政管理费用超过了它所得到的租金、赋税和经纪人缴纳的款项的收入总额。”

约翰·罗素打算开给英国人吃的改革药丸的伟大秘密终于揭晓了。他建议：一、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这种限制早就名存实亡了）；二、重新划分选区，办法是废除城市若干小选区，另成立较大的选区；三、在农村选区把财产资格限制由 20 英镑降低到 10 英镑，即降低到城市选区现行限制的水平。但是他拒绝提出第四条关于把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 5 英镑的建议，因为，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这样做的结果，

“现在的选民们实际上就会被剥夺投票的权利，因为被准许参加投票的那个阶级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所有其他阶级的总和，这个阶级只要团结一致就足以占上风了”。

换句话说，甚至赋予小业主和商人阶级的大多数人选举权就会把少数人的选举权剥夺掉。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理由。可是，目前只模糊地显出一些轮廓的新的改革法案，其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这一条，甚至也不是他提出的所有各条的总和。最重要的是，关于这个法案的消息传出以后所遇到的普遍的十分冷淡的反应。警察局的每一个报告都比这个“伟大的措施”、这个新改革法案、这个“群贤内阁”的集体创作更吸引公众的注意。

厄内斯特·琼斯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只要宣布建立人民的群众性运动、宣布建立以工人议会为首的全国组织的第一

句话一传开，就会在有产阶级中间引起惊慌，就会迫使伦敦的资产阶级报纸把注意力投向这一句话。“泰晤士报”马上就懂得了这个新运动的重要性，并且首先登载了有关宪章派群众大会在曼彻斯特人民学院召开的报道。“泰晤士报”的所有同行也开始不断发表社论，评述工人运动和早被认为已经没落的宪章派所提出的工人议会。“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写了不下四篇文章。可是，报上关于这个具有极大意义的曼彻斯特群众大会的报道，根本没有正确说明它的性质和会上讨论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我提出自己的报道是合适的。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提出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1. 大会深信，各个单独的工人团体分散地争取保持合理的工资水平和争取劳动解放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大会认为，只有依靠一个全国组织并受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领导的工人阶级联合的群众运动，才能保证给予那些现在正遭到同盟解雇或正在举行罢工的工人们以应有的帮助，才会使工人们有可能在将来把劳动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现在，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人民的群众性运动和全国组织的建立并不要求，也不应该要求干预现存的工联和工人团体的事务；这个组织的活动，目的应该是把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集中起来，集聚起来，联合起来。

2. 为了实现上述决议，亟需尽快召开工人议会；这个议会应该由每个城市的工人在专门召集的公开会议上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这个议会的义务应该包括下面几点：组织一个机构，通过在全国最广泛地征求签名的方式，来帮助现在正在举行罢工或遭到工厂主同盟解雇的工人；制定一个领导工人阶级对企业主进行斗争的专门的行动计划；提出各种措施，使工人能够从资本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独立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不必非举行罢工才能得到应得的劳动报酬。

3. 大会选出一个委员会，本着上述目的与各城市和各区进行联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召开工人议会，起草并公布代表们开会所必需的各种文件，同时拟定提交代表讨论的各项问题。”

在所有发言中最精彩的是琼斯先生的发言。现在我摘引其中

的几段：

“企业主通过伦敦‘泰晤士报’的嘴声称，他的利润不干你们的事。说什么你们应该只数一数你们的人头，而不是数他的利润。人头一多，即使想多得也是少得。他把这称之为供求规律。他说，调节你们的工资的只是这个规律。是这样吗？不！既然在他的利润很高的时候你们不应该要求提高工资，那末在他的利润下降的时候他们也不应该降低你们的工资。然而，即使工人的数目一个也没有减少，他也会对你们说：‘生意不好，日子难过，我的利润减少了，我不能照数给你们发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劳动并不是受供求规律的调节，而是受高棉价和低利润规律的调节。供给的规律可能有道理，但生活的规律更有道理。需求的规律很厉害，但饥饿的规律更厉害！我们说，如果资本的一种形式——货币——有权获得利润，那末资本的另一种形式——劳动——也有权获得它；而且劳动有更大的权利，因为劳动创造货币，而不是相反。什么是利润呢？这就是扣除了全部生产费用以后剩下的资本。你们到现在为止所领取的工资，只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这一份勉强维持活命的工资根本不是劳动的报酬。它只不过是维持活人这架机器处在适于工作的状态所必需的费用。可是除了维持这部由肉和血做成的机器的费用以外，你们总该有一点剩余。你们需要有精神和脑子的食粮，就像你们需要有口和胃的食粮一样。企业主害怕你们得到较高的工资；这倒不是因为他付不起工资，最近7年来资本增加了100%以上，而你们只不过要求从你们劳动所得的100%中拿出10%来增加你们的工资。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给你们开辟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给你们开辟走向受教育的道路；他害怕这个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民不会再当奴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他知道，那时你们会不同意干这许多个小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那时你们再也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到工厂地狱去挑那奴隶劳动的重担；他害怕这个是因为那时你们会送自己的孩子上学校，而不是上工厂；他害怕这个是因为他知道，要是你们的妻子都呆在家里，而孩子们又上学，只有很短的时间在工厂，那末现在促使工资水平下降的那些过剩劳动力就会摆脱他的控制，劳动就会成为镶嵌在人类自由的王冠上的无价之宝。可是现在问题不同了。现在问题已经不只是要在企业主的利润中得到多少份额或者增加10%的工资，现在问题是不许把工资降低20%。生意是好是坏，形势不会因此有

多大变化，生意好，企业主们要掠夺外国人民，生意坏，他们就要掠夺本国人民。对你们说来，问题很快就具有另一种意义：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饿死还是活下去的问题，是在工厂地狱里活还是在工厂大门口死的问题。资本家们，这些西方的哥萨克，首先越过了工人权利的多瑙河疆界；他们实施了受黄金支配的战时法律，他们从他们那些叫做垄断组织的炮垒里向我们的队伍发射饿死的炮火。各城市相继宣布戒严。失业现象挖着战壕，而饥饿把云梯架到劳动的城堡上去了，贫困的大炮猛烈地射击着劳动的战线。资本家的大联合一天比一天扩大，他们的运动一天比一天更加具有全国的规模。你们准备抵抗这个运动吗？你们的运动却是混乱不堪。既然同盟解雇工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你们还在继续分散行动，那末很快就会发现，你们将开始冲进彼此的禁区：一个地方的募捐者将在同一个地点碰上另一个地方的募捐者；在本来应该作为同盟者握手言欢的地方，你们将像仇人相逢；在本来应该彼此帮助克服各自的弱点的时候，你们将互相削弱预定为其一方面而作的帮助。威根的采煤工人们离普雷斯顿、斯托克波特、曼彻斯特、奥尔丹不远，但是，他们由于没有得到任何支援而遭到了失败。威根的工厂工人也罢工了。他们对他们的兄弟，煤矿工人的失败是怎样看的呢？他们认为，那些人很幸运地脱身了。如果互相挡道，那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们把自己的运动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区，某一种利益的小圈子里了。你们的雇主们的运动正在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你们的反抗也应该成为这种全国性的反抗。在现在的情况下，等待着你们的是无政府状态和死亡。你们不要以为我对工联的明智有异议，不要以为我在攻击它们的行为和不可侵犯性。

但是，引着小孩学步的带子，对大人来说，会成为绊绳。在工人运动的幼年期起过作用的各自单独行动的做法，到了工人运动的成年期便成为致命伤了。让各行各业都来参加吧，我们需要它们的帮助。不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委托给某一个工厂，某一个城市，甚至某一个地区，应该把它委托给工人的议会。”<sup>404</sup>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12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48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弗·恩格斯 多瑙河战争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土军自沃耳特尼察的退却，看来标志着俄土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sup>405</sup>。这次退却，看来至少是从卡拉法特附近渡河开始的、显然成为一个阶段的初期战斗行动的结束；此后，双方不是平静地留在冬季营地，就是执行新的尚未定案的计划。因此，评论到目前为止的战局的适当时机似乎已经来到了，尤其是因为刚刚获得了关于多瑙河上唯一的一次大会战——俄军对土军沃耳特尼察 tete-de-pont（桥头堡）的攻击——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报告。

10月28日，部署在维丁的土军渡过多瑙河，攻占了卡拉法特。土军在攻占这一地点时，除了与兵力不大的侦察队的小战斗以外，大概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为正当俄军准备在克拉约瓦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卡拉法特时，传来了使他们不安的消息：土军在另一方向作更有威胁性的推进，11月2日在沃耳特尼察附近渡过多瑙河，严重地威胁着俄军的交通线。同时，土军还在维丁至沃耳特尼察沿多瑙河一线进行了一连串佯攻和次要攻击，不过这些攻击有的因俄军预有防范而未能得手，有的则因兵力过少而未能迷惑俄军，使其行动发生严重错误。

因此，卡拉法特的土军没有受到任何惊扰，他们陆续得到了

援军的补充，据报道兵力已增加到将近 24000 人。这些土军既没有向前推进，也没有受到袭击，所以我们可以暂时不去注意他们。

根据奥美尔—帕沙的报告，土军在沃耳特尼察渡河的情况如下。沃耳特尼察是阿尔哲什河与多瑙河汇合点附近的一个村庄。在多瑙河上与阿尔哲什河口相对的地方有一个沙洲，在高达 600—700 英尺的陡峭的多瑙河南岸，是土尔图凯村和要塞，这个要塞就建筑在这个高耸的河岸的顶端。因此设在土尔图凯的火炮可以最有效地支援在该外渡河的任何部队。11 月 1 日，土军渡到多瑙河中的那个沙洲上，并于一夜之间修起了坚固的战壕。11 月 2 日，土军又从沙洲渡到阿尔哲什河以东，登上了瓦拉几亚的河岸。乘船渡到瓦拉几亚的有 2 个营，配有 100 名骑兵和 2 门火炮。土军在土尔图凯的火炮进行了几次齐射，迫使俄军前哨放弃了离河岸不远的医院建筑物，于是土军马上攻占了这个以后给他们带来很大好处的建筑物。这个有拱形墙的厚实的建筑物几乎不要什么加修就具备了内堡（最常用的野战筑城工事）的一切优点。土军立即开始在阿尔哲什河和多瑙河之间挖掘战壕。经常约有 400 人参加这一作业，束柴和篮筐都是预先准备好的。根据我们得到的全部报道，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这些战壕已形成一道绵亘的防线，完全切断了俄军从阵地通往土军登陆地点的所有通路。虽然形成绵亘的战壕线的工事早被人们否定，被认为没有用处，但是，由于这些战壕具有桥头堡那样的特殊作用，由于土军找到了现成的坚固的内堡，由于土军工兵不足以及与土军特点有关的其他情况，所以采用这种过时的工事体系可能仍然是适当的。土军在阿尔哲什河找到了一些船只，马上用来同原有的船只一起在多瑙河上架桥。这些作业于 11 月 4 日拂晓几乎全部结束。

可见，土军在沃耳特尼察就有多瑙河北岸的一个桥头堡。土军没有过河，而且直到目前也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在多瑙河北岸已有了一个可靠的登陆场，一俟在土尔图凯集中了足够的兵力就马上可以加以利用。此外，土军有可能占领阿尔哲什河的西岸或东岸，而且他们在该河附近的一切行动，都可得到配置在土尔图凯高地的 10 门重要塞炮的掩护。由于火炮阵地很高，这里的河面又狭窄，所以它们的射击范围至少可达到桥头堡半英里之外的地方。

桥头堡内的兵力为 3 个基干营（2400 人）、2 个近卫连（160 人）、2 个猎兵连（200 人）、100 名骑兵和配置在医院建筑物内的 12 门重炮的炮手。战壕线的右翼可得到土尔图凯的火炮纵射和侧射火力的掩护，此外，土尔图凯的火炮还可对桥头堡正前方的整个平地射击。与阿尔哲什河相接的左翼由设在沙洲上的一个炮队从翼侧掩护。不过这里有些地方灌木林密布，可以作俄军向前移动时的绝好掩蔽物。

根据奥美尔—帕沙的报告，俄军于 11 月 4 日向土军战壕线攻击时，有 20 个步兵营、4 个骑兵团和 32 门火炮，共计约有 24000 人。俄军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12 个步兵营和 14 门火炮对付桥头堡的中央部分；2 个步兵营和 2 门火炮配置在阿尔哲什河左边（从俄军方面看是右边）的森林里；en échelon（梯次配置的）6 个步兵营连同 4 门火炮对付土军右翼；俄军战线向多瑙河方向延伸并由骑兵从翼侧支援。俄军在火炮进行了一定时间的射击后，先在中央组成了强攻纵队，而两翼则随后跟进；然后，原来在距土军工事的胸墙几乎达 1200 码的阵地上射击的炮兵转移到霰弹的有效射程（600—700 码）内，而强攻纵队则急速前进。正如可以预

见的一样，距多瑙河最近的俄军左翼纵队，被土军在土尔图凯的火炮打散了；中路纵队也马上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靠阿尔哲什河的右翼纵队被沙洲上的火力消灭了，而且，看来，这个纵队的兵力本来就太弱，无法取得什么战果。攻击重复了两三次，但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奋勇齐心了，这以后，俄军停止了进攻。他们曾经勇敢地冲到土军战壕的最边缘（当然不应过于按字面理解这一点），但是土军火力猛烈，致使俄军无法转入白刃格斗。

在战斗中，奥美尔—帕沙将正规军 1 个营派过了河，作为预备队。这就可以算出，土军投入战斗的共有 3600 名步兵和 44 门重炮。

俄军的兵力比较难以肯定。奥美尔—帕沙说俄军参加战斗的兵力为 20 个营，而在奥美尔—帕沙军队中的两个英国军官则一致认为真正参加战斗的只有 8000 人。然而这两种说法并不是完全矛盾的。俄军可能在战场上有 20 个营的兵力，但是由于地形关系或轻敌的缘故，每次攻击时，强攻纵队的实有兵力可能都不超过 8 个营。有一个情况两位英国军官没有提到，但奥美尔—帕沙谈到了，这一情况是，俄军拥有庞大的预备队。所以俄军每次攻击时都有从预备队调来的 1 营生力军走在前面。此外，在两位“女王陛下近卫军军官”的报道里，字里行间都表现出愚昧无知和盲目自信，这正是—切军队中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的下级军官所固有的特色。

所以，总的说来，我们认为奥美尔—帕沙的报道是可信的。在整个作战期间俄军在该地的兵力可能有 18—20 个营，其中可能有 10—12 个营相继投入了战斗，因而，在每次攻击时向土军战壕同时推进而未获得成功的部队可能是 6000—8000 人。俄军的损失至少应为 1500—2000 人，这也说明俄军可能投入战斗的兵力。俄军

终于被击退了，500支枪、大量弹药和大批军用物资落入土军之手，伤亡800人，而且有些部队退却时秩序紊乱。

如果研究一下双方在这次战斗中的战术，我们可以看出，令人惊讶的是俄军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不得不罪有应得地付出惨败的代价。他们轻敌的程度是罕见的。他们所要攻击的是设有巨大内堡的相当坚固的阵地，这个内堡不仅可以得到沙洲上10门重炮从翼侧的支援，而且处在土尔图凯的22门火炮的射程以内（这些火炮还可控制阵地前面的地段）。土军共有44门（至少38门）火炮，而且全部或者几乎全部都是重炮。现代每个军官都知道，当向敌人野战工事进攻时，首先，必须以自己的炮兵压制敌人可能用来支援野战工事的火炮和炮队；然后，应当根据可能，破坏敌人的土堤、围栅和其他障碍物；再后，应当将自己的炮队调到离所要攻击的工事更近的地点，以霰弹猛击敌人胸墙；最后，只有这时，才能决定派出强攻纵队向半遭破坏的野战工事和士气沮丧的守军进攻。为了做到这一点，火炮的数量和口径必须占决定性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俄军企图怎样做呢？他们用12门12磅炮和20门6磅炮进行了短时间的射击以后，就向在数量上和口径上占优势、技术上更占优势的炮兵掩护的桥头堡进行强攻了！俄军的这次射击可以说简直是形式，好像是对土军表示的一种礼节，因为这次射击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目的。此外，如果像所有报告一致所说的，俄军的炮队果真曾接近到距桥头堡650码的地方，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被击毁的火炮的数字一点也没有提到。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俄军的勇敢精神，他们在被敌人优势火力的猛烈射击击溃以前，虽然是在敌人火力下，而且可能还是第一次处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却仍然能够接近到距土军战壕线50码的地方。

至于土军,我们也不能特别称赞他们的战术。当俄军强攻时,奥美尔—帕沙在桥头堡集中了不超过防守所需的兵力,这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在土尔图凯所在的桥这头和沙洲上配置任何预备队,特别是骑兵预备队呢?为什么当俄军的败局已定,他没有立刻用骑兵攻击被击溃的敌人呢?最后,为什么他满足于精神上的战果,而忽视夺取全部战果从而决定整个战局的可能性呢?我们只能找出两个原因:第一、野战筑城中的绵亘防线体系使防御者在击退敌人的攻击后不容易实现坚决的进攻,因为绵亘的防线没有留下比较大的余地供大批军队突然猛烈出击之用;第二、奥美尔—帕沙不是不相信自己军队在平地作战的能力,就是没有掌握足以扩大战果的兵力。

这使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与这一行动有关的战略问题。如果奥美尔—帕沙把在卡拉法特无所事事的那些部队调到沃耳特尼察,那末他的行动不是会更坚决些吗?为什么要把一支 12000 人的部队连同人数与此相等的预备队派往卡拉法特,去威胁从俄军观点看来正是他们阵线中迎击敌人攻击的最合适的地方呢?为什么这 24000 人没有被调到土军能够获得决定性优势的地方呢?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现在丝毫不必怀疑,俄军在 10 月底以前不可能在瓦拉几亚集中 50000—55000 人以上的兵力。如果考虑到道路缺少和地形起伏的情况(这种情况必然使兵力分散),再考虑到每支作战部队通常可能遭受的损失,那末俄军在任何一个地点都绝对不可能一下子集中 3 万人以上的兵力。毫无疑问,土军如果能在瓦拉几亚任何一地集中 4 万人的兵力,都可能击溃俄军。可以肯定地说,土军如果想取得这样的结果,并且能够适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那末就可能比较容易地集中这样多的兵力,

甚至比这多一倍的兵力。但是，欧洲外交的干涉，土耳其御前会议的犹豫不决，土耳其对塞尔维亚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其他类似的各种情况，看来使土耳其采取了一系列不彻底的措施，把奥美尔—帕沙在军事行动开始前置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境地。他知道俄军的弱点，他自己掌握有在数量上大占优势的军队，而且他们求战心切。但是他的军队被分散在长 350 英里、宽 50—100 英里的地区内。他在 11 月初的行动所受到的约束，是这种情况产生的必然后果。因此，在卡拉法特渡河，虽然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个错误，但这时却有特殊必要了，因为维丁必然是集中了将近 2 万人的地点，如果不在卡拉法特渡河，这将近 2 万人的部队便可能因距主力太远而毫无作用。土军的这次渡河，至少可箝制俄军的部分兵力，而且还可鼓舞土军的士气。

在沃耳特尼察附近的渡河，显然是打算作为一次主要突击，通过这次突击攻占布加勒斯特，并切断被卡拉法特战斗引向西面的俄军的退路，但是这次渡河毫无成果，看来，这是因为没有能够调集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所必需的兵力。沃耳特尼察会战对士气的鼓舞作用，自然是一个大收获，但是土军获胜后 9 天之久毫无行动，又因雨季开始而主动退过多瑙河，这就起了另一种作用。这种毫无行动的表现和这一退却，虽然可能不会削弱胜利对土军士气的鼓舞作用，但是会损害土耳其统帅的威望，而且可能远远超过其应受损害的程度。不过，即令造成这种情况的祸首是土耳其御前会议，奥美尔—帕沙也仍然不能辞其咎。在多瑙河北岸呆了 12 天，占有桥梁和足以抗击俄军集中的兵力的桥头堡，拥有大批求战心切的部队，但是没有找出调动 3—4 万人的办法，——的确，如果统帅没有一定的过失，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俄军可以庆幸自己得

了救。俄军还从来没有只遭受这样少的物质损失就摆脱了严重程度甚至比这轻一半的窘境。俄军本来可能全军复没,但是他们却安然无恙。俄军是否还会让这种对他们不利的情况重演就很成问题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2 月 2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2 月 16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52 号

## 卡·马克思 土耳其战争。——工业的灾难

1853年12月2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我写上一篇文章以来，在土耳其没有再发生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俄国的外交——比它的军事学术还要危险的外交，又开始活动了起来；拉芒什海峡两岸的政府报纸已相当明确地透露，著名的1840年和1841年的伦敦会议即将复活，而当年的这种会议的结果就是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稍加修改而加以批准。“泰晤士报”甚至暗示，会采取“坚决的绥靖措施”，换句话说，即自命保护土耳其的国家要采取某种武力的绥靖手段来反对土耳其。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重大的、其含意不可能曲解的外交行动，即英国内阁最近把一项照会送往君士坦丁堡由英国大使送交土耳其政府，但被11月14日的土耳其御前会议认为不能接受而拒绝。这项照会，干脆就是列施德—帕沙对5月间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的答复的翻版。帕麦斯顿之流和阿伯丁之流就是用这种方式向苏丹示意：在他们看来，局势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土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变化都没有的；在西方外交界看来，从5月以来土耳其什么都没有赢到，而俄国也什么都没有输掉。

由于塞尔维亚公爵亚历山大不许土耳其军队通过他的领土，要求俄国总领事回到塞尔维亚，而且在他致苏丹的声明中把土耳

其和俄国说成是两个对塞尔维亚公国具有同等权利的保护国，所以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之间很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如果放在其他任何时候都很可能对土耳其有致命的危险，但现在却可能成为土耳其使自己免遭西方外交毒手的唯一手段。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只要能够加剧目前的纠纷，迫使破产的奥地利放弃它那危险的中立，增大欧洲战争的可能性并迫使土耳其去同革命派结盟，那末这种事件必然会有利于土耳其，至少有利于它同俄国的冲突。当然，如果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不加根本改变，以抵销那些使土耳其衰落的内部因素，那末这些因素还是要继续起作用的。

现在让我们放下在多瑙河各公国内进行的土俄战争，来谈谈在英国各工业区厂主和工人之间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争。诸位还记得，厂主曾经疯狂地反对工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运动，百般诽谤这种运动。而现在情况却改变了。正如我当时曾经预言的那样，厂主自己正在把劳动时间缩短的制度强加在工人身上<sup>①</sup>。同盟歇业的真正意义已暴露出来，它是厂主所采取的**财政措施**，是医治“价格史”<sup>406</sup>上从未有过的工业生产过剩病症的办法。罗契得尔区（贝恩利、贝凯普、纽切尔奇），柏立区和埃士顿区（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格洛索普、海德、牛顿）的工厂从上星期一起都已恢复工作，但是每周只开工4天。波尔顿很快也会走上这条道路。曼彻斯特正在讨论**什么时候**这样做，而不是**要不要**这样做。再过两三个星期，除了少数拥有有利条件的工业部门以外，就将普遍实行这种劳动时间缩短的制度了。当然，对继续反抗的普雷斯顿工人的援助此后就会停止。但即使在这种每周4个工作日（即每周4天）的情况下，商品的产量仍

<sup>①</sup> 见本卷第466—467页。——编者注

然要超过需求量。不妨回忆一下：3个星期以前普雷斯顿的企业主们就已经有了相当于20个星期的产量的存货，而且这批存货几乎无法销售。其实，工业危机已经谈不到是否开始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是工业危机了。

“泰晤士报”写道：“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工人的工资已降低到最近工资增加以前的水平。”

“经济学家”杂志一时过于坦率，竟声称：

“叫化子是不能提出条件的，他应该接受人家向他提出来的要求。”

正如我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工人的罢工开始得过迟了；在空前繁荣所造成的有利条件消逝之后，从经济方面或者从达到罢工的直接目的方面来看，罢工都已不能成功。但是，罢工仍然起了自己的作用。它使工业无产阶级革命化；它同粮价高昂和劳动报酬低微这些刺激因素一起，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些政治后果到适当的时候就会显示出来。即使现在，关于工人议会的主张（这一主张实际上是意味着号召所有的工人在宪章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就已经引起了资产阶级报刊的恐惧。

“经济学家”杂志说：“‘人民报’的编辑厄内斯特·琼斯先生被看做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后继者，正像奥康瑙尔先生曾是汉特先生的后继者一样……工人们追随汉特和奥康瑙尔的结果，除了严重的失败和巨大的损失外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对这些大王的后继者仍然同样信任，他们现在把琼斯看做自己的救星。”

诸位可以从以下两段引文中看出，受党派动机驱使的英国统治阶级报纸，如“先驱晨报”，以及受帕麦斯顿这个厚颜无耻但颇有眼力的观察家指导的报纸，如“晨邮报”，都能正确判断目前的情况，并能适当地对待繁荣的罗宾逊<sup>407</sup>所说的那些粗鄙无聊

的话。

“如果现在听一听厂主们的话，就会觉得，他们简直被赋予了上帝一般的权威，帝国的安危全看是否让他们享有比法皇逊色不多的权力…… 郎卡郡 6 万名左右的工人现在饮食之差几乎不能活命，不过他们没有抢劫或使用暴力的念头，尽管他们是生活在节俭的厂主不设警察保护的城市中。不管他们对不对，这些人们总都是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忠于他们的领袖的；像这样和平而又成效的运动，还很难找出第二个来。”

这是“先驱晨报”的话。

“我们的经济学家曾一再吹嘘什么贸易自由将带来巨大的、我们梦想不到的福利；但是冬季已经来了，来年一回春瘟疫就要流行，现在正是我们的贫民迫切需要比平常好一点的食物和暖一点的衣服的时候，这样才能维持健康，更能抵御疾病；但是恰好在这个时候，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异寻常地高昂，简直是在要他们的命。那种要使全国人幸福的人间天堂根本谈不到，而那种种预言物价永远低廉和产品永远丰富的说法看来也应当同那些在人民中散布的无数幻想归在一起，某些人正是用这些幻想，才使我们的社会走入迷途…… 英国社会是一个腐化的、害人的、不道德的、无知的、残酷的、充满错觉的、愤愤不平而生活非常困苦的社会。”

帕麦斯顿阁下的沙龙报纸，他的官方机关报“晨邮报”就是这样说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2 月 2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12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52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卡·马克思 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

1853年12月9日星期五于伦敦

贵报读者对于联合内阁所耍的各种外交手腕一直是密切注视的，因此帕麦斯顿之流和阿伯丁之流借口保护土耳其和保障欧洲和平而支持沙皇的任何新尝试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甚至维也纳会议或伦敦会议复活也完全不会使他们感到突然的。上星期五，首都的证券交易所首先从“纪事晨报”上获悉，英国已成功地说服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西方列强强调停交战双方的新尝试。随后，“晨报”发表了关于“这一尝试”的消息，并且宽慰人心地宣称：

“这次尝试是力求取得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合作，这种合作已经取得了，四国签订了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四国无条件地承担义务保持**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对交战国则通过召开欧洲会议的办法邀请它们来友好地解决他们的争端。按照这个四国协定将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判明土耳其的观点，弄清楚它在哪些基本条件下同意进行解决东方冲突的谈判。在弄清楚土耳其的立场以后，四国将请俄国表示它对于所建议的进行解决的基本条件的意见，然后就建议这两国派全权代表出席大国会议，会议的期限和地点待以后另行确定……沙皇的尊严将予以保全，土耳其的利益也将得到完全的保障，办法是：第一，**土耳其和俄国签订友好、和平和通商条约**，规定两国在对方领土上的臣民应当受到的保护；第二，苏丹和五大国签订一项条约——类似1841年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的条约，这项条约规定苏丹必须尊重多瑙河各公国和塞

尔维亚的现行宪法和特权，而且还承担保护属地上的基督教的特殊义务，就像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所规定的那样，不过这次是对欧洲承担义务，而不是对俄国。”

最后，印刷所广场的雷神<sup>①</sup>说话了，他在第一期上宣布，四大国已经最后缔结了联盟，并且已经拟定了在必要时“强迫”俄国和土耳其政府“接受”的条件。有价证券马上上涨。但是，交易所投机商的好景不常，因为，同一家“泰晤士报”在第二期上却报道，虽然四大国起草了议定书，制定了联合照会草案，但是，它们丝毫没有承担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个照会的义务。有价证券又下跌了。“惊人的消息”最后变成了关于维也纳会议的死尸——谈它的精神是荒谬的——复活的老话，同时，有一封电报也证实了下面的消息：

“12月6日维也纳四国会议已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了以新草案为基础的另一个关于解决争端的建议；即使军事行动不停止，关于议和的谈判也要继续进行。”

在战争就要爆发的前夕，维也纳会议——这位事后做预言的皮蒂娅<sup>408</sup>——恰好是建议土耳其接受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在俄国一战失败以后，英国和法国回到了列施德—帕沙给缅施科夫公爵最后通牒的答复中的立场上。现在他们的倒退运动将达到先前交涉中的什么阶段——无法预言。“奥格斯堡报”宣称，会议的新建议反映了四大国“防止战争”的愿望。这确实是惊人的消息！

不管这一切外交清谈在 *status quo*（现状）已经发展成

<sup>①</sup> “泰晤士报”。——编者注

statusbelli (战争状态) 的时刻显得多么空洞, 都不应该忘记, 这些召开各种会议的幻想的草案, 透露了英国政府的心思; 与内阁有联系的报纸正在试探内阁能够走出多远; 今天甚嚣尘上的无根据的谣传已经不止一次地预料到明天发生的事件。有一点是无疑的: 英国曾经提出四国联盟, 目的是要强迫土耳其接受四大国行将做出的决定, 即使奥地利拒绝参加联盟也要这样做。如果说联盟没有缔结, 那末, 四大国至少也签订了“议定书”, 规定了进行谈判的原则。同样明显的是, 曾经阻碍土耳其行动, 让俄国军队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并开到保加利亚边境的维也纳会议复会了, 并且已给苏丹发出了新的照会。从维也纳会议到伦敦的欧洲会议仅有一步之隔, 这一点在 1839 年穆罕默德—阿利起义时期就已经证明了。如果在俄国继续进行反土战争时却召开从事“绥靖”的会议, 那末这种会议只能是 1827—1829 年伦敦会议的重复, 而那次次会议的结果是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附近被消灭以及由于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而使土耳其丧失独立。与内阁有联系的报纸已明白地指出了英国内阁提出、其他大国同意的进行谈判的基础是什么。它们建议保持“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如果把这个建议看做是简单地回到维也纳和约的条款上去, 那就大错了。波兰王国消失, 多瑙河河口落入俄国之手, 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版图, 匈牙利成为奥地利的一个省——所有这些“领土调整”从来没有经一个欧洲会议批准过。因此, 批准“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并不单纯是让土耳其参加维也纳条约, 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而更主要的是批准俄国和奥地利从 1830 年起对这个条约所做的种种破坏。“俄国和土耳其友好、和平和通商条约”——我们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序言中能

找到与此完全相同的词句。帕麦斯顿的报纸<sup>①</sup>宣布，“这是一个类似 1841 年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的条约”。的确如此。这是一个类似曾经对欧洲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并把黑海变成一个俄国内湖的协定的条约。然而，“泰晤士报”说，为什么我们不把军舰自由出入达达尼尔海峡和多瑙河航行自由作为条件提出来呢？但是读一读帕麦斯顿勋爵 1839 年 9 月间给当时的驻巴黎大使布尔韦尔先生的信吧，你们就会看出，他们那时也抱有类似的希望。

“苏丹必须尊重各公国和塞尔维亚的现行宪法”。但是，要知道，根据现行宪法，这些省份的最高权力是由沙皇和苏丹分掌的，而这些宪法直到现在从来未被一个欧洲会议承认。所以，这次新的会议会使欧洲批准俄国对土耳其各省的实际保护权。在这种情况下，苏丹将不是对沙皇，而是对欧洲承担保护“自己属地上的基督教”的义务。这就是说，外国列强干预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权利将成为欧洲国际法的一部分，并且，一旦发生任何新的冲突，根据条约欧洲就必须支持俄国的无理要求，因为俄国作为这个条约的参加国，将获得权利，可以随意解释苏丹属地上的基督徒关于要求保护的申请。由此可见，联合内阁拟定并经它的各机关报加以阐述的新条约，乃是欧洲对俄国的一个最广泛的投降计划，乃是一举而批准 1830 年以后历次反革命所造成的一切变化。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奥地利政策上的改变，即“晨邮报”装腔作势地呼之为“最近 10 天来出人意料地发生的”改变而欣喜若狂和表示惊讶。至于波拿巴，那末，不管他的心思是什么，反正能利用土耳其作阶梯爬到老的正统王朝的行列中，对

<sup>①</sup> “晨邮报”。——编者注

于这个暴发户皇帝就是一件很如意的事情。

联合内阁的观点在内阁的机关报之一，周报“卫报”<sup>409</sup>上清楚地表述出来了：

“以为俄军在沃耳特尼察战壕附近被击退，在黑海又有几个堡垒被拿下，就把俄国当作一个被打败了的对手来看待，就认为我们卡住了它的脖子，——这简直是可笑的。这些不大的损失本身只能触伤俄国的自尊心，只能使它不争到更好的条件就不进行谈判而已。然而，君主们也同其他的人们一样，也受各种不同的意念支配。沙皇是个骄傲、激烈的人，但是他也很谨慎。他卷进了一场他只能输，不能赢的争端中。他的政策就是他的先辈们的政策，而他的先辈们到处用战争威胁的办法，获得了比进行战争更多的好处，同时，他们所坚定不移地奉行的侵略体系也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这使他们能够避免大的失败，甚至能够从小的挫折中取得直接的好处。四大国预先决定欧洲的领土分配不应该作出或不应该容许任何改变，看来，就是以对沙皇的立场及其政策的特点的**这一明智的看法**为根据的。认为沙皇已经被踩在英国脚下的人，或者使自己受了**保护关税派**的报纸的胡说八道的骗而走入迷途的人，将会因此而大失所望。但是，问题**不在于使俄国屈辱**，而在于**绥靖欧洲**（当然是根据俄国所说的意思），在于尽可能确立法国士兵大使<sup>①</sup>以他主子的名誉向苏丹担保法国十分关心的持久和平。**即将签订的条约**——这是可以确信不疑的——将不是简单地恢复现状，而是退一步试图在某种固定的基础上来调整土耳其同欧洲的关系和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基督教臣民的关系。这将只是一种尝试，因为任何**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的协定，不管它如何牢靠，从基础上来说，总是**暂时的**。可是，这种**暂时的**协定现在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必要的。”

可见，各大国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沙皇“从小的挫折中取得直接的好处”和不容许“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不言而喻，既然暂时的协定一般说来“现在是可以实现的”，它就将有助

<sup>①</sup> 巴拉盖·狄利埃。——编者注

于实现这个最终目的。

可是，某些情况出人意料地打乱了联合内阁的政治家们的算盘。土耳其在黑海沿岸和格鲁吉亚边境获得了新胜利的消息传来了。另一方面，有人又言之凿凿地说，波兰境内的全部军队都接到了开往普鲁特河的命令，而发自波兰边境的消息只说是：“上月 23 日深夜宣布了‘布朗卡’（即征兵），那些以前只征一两名的地方，现在征了八——十名。”这至少证明沙皇不太相信四大国和事佬的天才。奥地利正式声明，“四国宫廷之间没有缔结任何联盟”，这证明，奥地利方面虽然很想把条件强加于土耳其，但是甚至做一做样子，表示要强迫沙皇服从为他的利益着想而拟定出来的条件都不敢。最后，苏丹给法国大使的复照宣称，“如果俄国不完全放弃它所提出的无理要求，如果不立即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现在签订友好协定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使那些靠会议为生的政治家们大吃一惊，而老奸巨滑、饱经世故的帕麦斯顿的机关报现在就毫不掩饰地向其他的同伙报道了下面一点儿真相：

“俄国不可能同意立即撤出各公国和完全放弃一切要求而又无损于自己的尊严和威望，所以，如果认为如此堂堂大国不经决死之争就同意这样做，是愚蠢的。因此，很遗憾，我们只能预言目前这种举行谈判的试图会归于失败。”

败了一仗的俄国是根本不可能接受谈判的提议的，因而就要使战争的天平垂向俄国这一方面。但是不让俄国赢得时间又怎样实现这一点呢？俄国唯一的需要是拖延，是时间，它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募集新的军队，在全国部署好，集中军队，在止住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以后先来收拾高加索的山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成功的希望就能增加，于是举行谈判的试图就“能得到成功的结局，因为俄国成了胜利者，而不是战败者”。因此，据维也纳“东德意志邮

报”<sup>410</sup>和内阁机关报“纪事晨报”报道,英国才一再向土耳其指出应当同意停战3个月。雷德克利夫勋爵同苏丹进行了5小时的会谈,目的是取得苏丹陛下对停战的同意(苏丹的大臣们曾反对停战),结果是召开紧急的大臣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土耳其政府最终拒绝了同意停战,要同意也不可能,除非它公开背叛了土耳其人民。

今天的“泰晤士报”指出:“在目前的情势下,要使土耳其政府的要求适可而止是不容易的。”

据说土耳其政府太过分了,不懂得沙皇吃败仗是同他的尊严根本不相容的,因此,土耳其政府应该让沙皇有3个月的停战,以便将自己的胜利化为乌有,帮助沙皇重新成为胜利者和“宽宏大量的人”。然而签订3个月停战的希望还没有完全被放弃。

“泰晤士报”写道:“假如停战的建议是由四大国提出的,结果可能比较顺利些。”

好心肠的“晨报”断言:

“很难设想关于这些建议的报道是准确的”,因为“即使是最大胆设想的人,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试图把土耳其的事业出卖给沙皇的事情,或者说,会有这样合乎这个目的尝试。”

激进派的“晨报”对帕麦斯顿“知荣誉和守信用”的信心和它对英国外交史的无知,看来都达于极点。既然这家报纸为有权出售酒类的小酒店主的联合会所有,我怀疑这些小酒店主本人是不是常常为它写社论。

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和维也纳就这样扮演着俄国前卫的角色,我们且来看一看俄国方面是怎样在英国安排自己的事情的。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向贵报读者报道,正当联合政府装出

一副在黑海威胁着俄国的样子的时候，俄国军舰的两艘巡航舰——“曙光号”和“纳瓦林号”却在朴次茅斯皇家造船厂得到一切必需品的供应。上星期六我们从“先驱晨报”和“每日新闻”上获悉：有6名水兵从俄国“曙光号”巡航舰上逃跑了，他们好容易到达了吉耳弗德，但是被俄国巡航舰“曙光号”的一名军官和英国警局督察员扣住，送回朴次茅斯，交到了“胜利号”船上，这是一艘英国船，“曙光号”的全体船员在该舰进行装备期间就是被安置在这艘船上的。他们在这里遭到残酷的体罚，并且戴上了镣铐。当这件事在伦敦传开时，某些先生们通过律师查·罗诺兹先生的帮助得到了一份发给海军少将马丁和其他几位英国海军军官以及俄国舰长即“曙光号”巡航舰舰长的关于引渡被捕者的指令。按照这个指令，他们应该将6名水兵送交英国的大法官。英国港口当局拒绝执行这个指令，而且英国舰长找海军中将，海军中将找海军上将，而海军上将认为有必要请示一下海军部部务委员，有名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此人10年前由于邦迪埃拉事件使邮政主管部门为梅特涅效劳<sup>411</sup>）。至于俄国船长，尽管女王署名的指令在“胜利号”英国船上递交给了他，指令内容也由翻译准确告诉了他，他却轻蔑地把这张纸扔到船外，而当这张纸又从舷孔塞进来时，又被扔掉了。俄国船长声明：“假使指令的确是女王陛下下发的，那就应该送交我国大使或领事。”由于领事不在，副领事拒绝过问此事。12月6日，又将一份女王署名的新指令下达朴次茅斯海军当局，新指令命令朴次茅斯海军当局向大法官不仅要交出上述6名水兵，而且也要交出俄国船长。海军部不但没有执行指令，反而尽一切努力使军舰出港，第二天“曙光号”在众目共睹之下不顾引渡被捕者的命令，由伊斯拉马托夫船长指挥驶往太平洋去了。与此同时，我们从昨天的

“每日新闻”获悉：

“俄国‘纳瓦林号’轻巡航舰仍然停在船坞上仔细检修。许多港口工人都在干这件事情。”

现在，请注意内阁的一些机关报是怎样报道这件“令人发指的”事情的。

皮尔派的机关报“纪事晨报”完全保持缄默，因为皮尔派的首领格莱安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是最丢脸的一个人物。第一个打破缄默的是帕麦斯顿的“晨邮报”，因为勋爵阁下是不会错过机会来显示自己把最伤脑筋的事情形容成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技能的。该报说：整个这件事情夸得太厉害，吹得太厉害了。它根据曾命令无情鞭打逃兵并给他们戴上镣铐的俄国船长的说法指出：“据6名逃兵本人的口供，他们开小差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受了在大街上结伙他们的人的引诱。”这些居然违背自己的意志和不顾俄国船长的命令在朴次茅斯离船上岸的水兵们“被灌得酩酊大醉，并被一辆轿式马车送到内地去了”；在那里，这些人“告诉逃兵们怎样到伦敦，并且给他们留下了几个人的地址，好让他们到后去找”，然后就离开了逃兵们<sup>①</sup>。帕麦斯顿的报纸捏造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目的是要使公众相信，“逃兵们是自己投到警察当局手里来的”，然而这个故事假得太粗暴了，连“泰晤士报”也没有加以重复。最后，“邮报”散布了如下的诽谤，同时大大地表示了一番义愤，它说，整个事件是一些波兰流亡者暗地里搞出来的，他们大概是想刺伤一下他们的慷慨的东道主帕麦斯顿勋爵的感情。

内阁另一家机关报“地球报”承认：

---

<sup>①</sup> 俏皮话：《deserted》——“离开了”，《deserters》——“逃兵们”。——编者注

“外国人只应执行本国代表发出的指示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否则英国港口的任何外国人都可以违反我们的法律，而且没有大使过问就不能追究他们的责任了。”

因此“地球报”在它的结论中就要持重一些了，它指出：俄国船长向转去引渡逃兵的指令的官员所作的答复，“决不能认为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是，在人类事务中寻找尽善尽美的东西是枉然的。

“泰晤士报”大叫：“假如俄国船长第二天早晨把他们（既被抓住的水兵）统统在自己巡航舰的桅端上吊死，他对英国的法律也完全没有责任。”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1840 年俄国和（在帕麦斯顿领导下的）大不列颠签订的航海条约里面有一条规定了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缔约双方的领事、副领事和商务代办在驻在国捉拿本国军舰或商船上的逃犯时，应得到地方当局的法律许可的帮助。”

然而，可爱的“泰晤士报”，问题正是在于，英国当局按照法律应当给予俄国船长什么样的帮助。谈到“在政治危机时期把自己的船开到英国修理”的俄国当局本身，“泰晤士报”认为它这样做是“最不客气和最无风度的表现”，因此，“这些船上的军官在这里都被列在间谍一类”。但是，“泰晤士报”声称，“不列颠政府不能对这种政策表示更厉害的鄙视”，它只能像它所做的那样，就是：“尽管公众有些看不顺眼”，它还是让俄国间谍上皇家船坞，把英国军舰交给他们支配，用英国人民的钱为他们雇码头工人，并且，在他们践踏了英国法律后溜走的时候，给他们鸣礼炮欢送。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2 月 9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3 年 12 月 2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60 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卡·马克思 俄国的胜利。——英国和 法国的地位

1853年12月13日星期二于伦敦

“使土耳其苏丹吃惊的是，尽管黑海驻有法国和英国舰队，一艘土耳其军舰还是被俄国军舰劫走而未受惩罚。春天将给苏丹带来更甚的意外。”

这是“新闻报”在上星期六写的。但是，预料只有明年春天才会带来的“更甚的意外”在这个星期一就已经来了。12月5日俄国发自敖德萨的消息说，俄国舰队在黑海的西诺普附近击毁了土耳其的分舰队<sup>412</sup>。这个消息随即为法国的“通报”所证实。虽然我们还不了解这一事件的详情细节，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俄国的报道把事情极端地夸大了；只不过是一批土耳其的巡航舰和载有军队、粮秣、弹药和武器到巴土姆去的若干运输船只遭到了突然袭击；俄国的兵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土耳其的兵力；虽然如此，土耳其人也只是在持续了一个钟头的殊死战斗以后才屈服的。

“一个英国人”<sup>①</sup>写道，“我们的舰队驻在那里无论如何不是为了阻碍俄国人去袭击土耳其。舰队驻在那里不是为了妨碍俄军和他们的武器运往高加索。舰队在那里不是为了防止使黑海变成一个俄国的内湖。舰队在那里不是

---

① 阿·理查兹。——编者注

为了帮助我们的盟国或是把它从危亡中拯救出来。舰队在那里不是为了预防著名的纳瓦林事件的重演……我们认为，俄国的海军军官们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大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演习，而英国的各种压力手段将像阿伯丁勋爵本人的第一个压力手段一样，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人民会长久地让这种代价高昂的滑稽剧演下去吗？”

联合内阁感到恼火的是，沙皇在海面上而不是在 terra firma (陆地) 上打败了土耳其人。内阁希望俄国人在陆上取胜。俄国在海上的胜利则使内阁的地位有动摇的危险，而且这恰好是发生在布奥尔伯爵要苏丹相信沙皇只要防御以及雷德克利夫勋爵竭力强迫苏丹休战 3 个月的时候。看一看联合内阁的各种出版物怎样分担安定愤激的舆论的义务，是十分有趣的。

“泰晤士报”作为整个内阁的代表，表达了内阁对于沙皇的忘恩负义行为的一致愤慨，甚至敢于提出某些威胁来。

不言而喻，“晨邮报”更是气势汹汹；它还向读者暗示，要是帕麦斯顿勋爵当首相，或者哪怕是当外交大臣，那末西诺普的“不利”事件是任何时候也不会发生的。

“邮报”宣称：“无论如何很明显，派往土耳其海岸作战的俄国海军是能够给土耳其政府的本钱以突然的沉重打击的，而且恰恰是在御前会议有一切理由期待盟国曾公开答应（如果的确意味着某种实际的东西，而不是吹牛）给它提供的帮助将被证明有价值有效力的地方。在多瑙河各公国已经演出了被称为‘物质保证’<sup>413</sup>的外交喜剧，如果以为黑海是演出新的一幕的合适舞台，那末我们觉得，这样说恐怕没有根据。总之，可以认为，俄国人已经不再把他们的立场虚伪地描绘成防御性的了。使人不得不深以为憾的是，我们〈应读作阿伯丁〉在绥靖政策上做得太过分了，使我们的盟国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因而引起了对我们的理所当然的责难。如果由于我们那些专门派去进行援助的军事裁判力量没有及时进行援助而再次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我们便会成为经常被谴责的对象，就会耻辱不堪。”

喜欢高谈阔论的“纪事晨报”，皮尔派的主要机关报，并不排斥“一个破坏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大国现在有可能表现出同意停战的意愿。”

尼古拉皇帝借口“他不愿意违抗”吉卡和施梯尔贝两位国君要放弃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管理权这种“自动表示出来的愿望”，11月8日下诏把他们的职权转交给冯·布德贝尔格将军，可是布德贝尔格将军要受哥尔查科夫公爵的最高监督。

英国竭力强迫土耳其停火，是在停火只会有助于沙皇赢得时间来集结军队和试图瓦解英法之间的正式同盟的时候进行的；与此同时，尼古拉又正在进行反对波拿巴的阴谋，想把他推翻，代之以亨利五世；最后，列奥波特国王、阿尔伯特亲王和奥尔良亲王们正在一起谈判波旁王朝两系的“合并”，关于这种“合并”，吹得十分厉害——这些情况迫使公众又把自己的视线投向温莎城堡<sup>①</sup>，并且怀疑它暗中同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宫廷有勾结。

贵族报纸“先驱晨报”写道：“现在这一代英国人应当注意使他们国家的政策不为奥尔良派的复辟幻想、比利时对于被兼并的恐惧和德国的微小利益所左右。”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写道：“有一些内务部不加以监视的密谋家，这些密谋家的姓名在‘泰晤士报’的‘宫廷新闻’栏上像寒夜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他们不是住在圣约翰伍德，也不是住在切尔西。不，他们是在克勒蒙特<sup>414</sup>的大厅里过着不知道要舒服多少的生活。在这些密谋家中，有一位被尊为奈穆尔公爵的女王陛下的常客，刚刚从他的英国私邸动身到弗罗斯多夫去修建一座桥——一座深渊上的桥，好让波旁王朝能够从这座桥上回到法国去。毫无疑问，他回来以后又会到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去吃鹿肉的”。

<sup>①</sup> 英王的夏宫。——译者注

“先驱”周刊驻巴黎通讯员写道：“你们的大臣们是根据维多利亚的命令行事的。维多利亚女王所要的只是列奥波特国王所要的东西。列奥波特国王所想的又只是尼古拉皇帝所想的的东西。所以，尼古拉 de facto（实际上是英国现在的国王。”

波拿巴现在所处的地位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危险，虽然乍看起来他成功的机会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好。他已经钻进欧洲国王的圈子里去了。尼古拉丧失了多少威望，他也就赢得了多少威望。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可敬的”人物。曾经和俄国一起把他的叔父从宏伟的宝座上推倒了的大国——英国——也不得不去和他公开结成反俄联盟。环境使他差一点没有成为欧洲的仲裁人。欧洲大战的前景，会造成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起义，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几乎只关心他们民族独立的恢复，他们不会计较他们得到的援助从何而来。看来，所有这些可能性将使十二月二日的英雄能够随意指挥这些国家的人民，如果他扮演国王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遭到失败的话。他的前辈们犯了大错误，因此他的政策在表面上看来甚至表现了民族力量，因为，他至少还能使一些大国害怕，而他的前辈们——从临时政府起到立法会议的城官们<sup>415</sup>止——却只会在一件事情和一切人面前发抖。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情的反面吧。波旁王朝两系的合并，不管这种合并实质上有多少价值，它还是在伦敦和维也纳宫廷的庇护下，根据尼古拉皇帝的指示完成了。因此，这应当看做是神圣同盟反对波拿巴的第一个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合并使法国资产阶级各个政党暂时和解了，而正是这些政党的内讧妨碍了它们在1848—1851年去反对斯特拉斯堡和布伦的英雄<sup>416</sup>所完成的篡位阴谋。在卡诺先生家中开会的蓝色共和党人几乎一致决定，他们将支持正

统主义者推翻波拿巴的任何尝试。看来,这些先生们断然决定了再走一下传统式的循环路线,即由复辟经过资产阶级君主政体再到共和国。对他们说来,共和国从来就只不过是意味着 *ote- toi de là, que je m'y mette* (滚开吧,好让我占据你的位置);所以,如果他们不能占据自己对手的位置,那末至少他们也要使对手遭到在他们看来是最严厉的惩罚——失去位置。谁将扮演什么角色,都已排定。将军、大臣、一切高级官吏都已任命。从这方面看,波拿巴面临着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武装暴乱即使不会导致波旁王朝的复辟,也可能成为总爆发的导火线。但是,总的说来,这个依靠着哥萨克支持的马莱密谋<sup>417</sup>并不比依靠着土耳其人支持的赖德律-洛兰密谋更危险。En passant (顺便)我要指出,如果伦敦和泽稷岛的所有法国流亡者举行集会的话,赖德律未必敢露面。属于社会主义政党各个不同派别的绝大多数法国流亡者已团结在 *Société des proscrits démocrates et socialistes*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中,这是一个毫不掩饰地同赖德律的野心敌对的组织。据说,赖德律在法国农民中间还有一些威望,但是,政权只能在巴黎夺取,不能在各个省里夺取,而在巴黎,他将遇到他无法战胜的反抗。

波拿巴应该害怕的严重危险,是从完全不同的一个方面威胁着他的,那就是食品价格昂贵,商业停滞,皇帝的国库极度混乱和枯竭。盲目地相信“拿破仑”这个名字的魔力和斯特拉斯堡的英雄的诱人诺言的农民,正是首先把波拿巴加强给法国的势力。由于复辟王朝粗暴地蹂躏了农民的权利,七月王朝使他们成了投机的对象,而第二共和国又强迫他们交付二月革命的花销,所以在农民心目中,恢复波拿巴王朝就等于恢复农民自己的最高权力。现在,政

府的讨伐特别是饥饿使农民恍然大悟了。纵火的行动此刻正以空前的速度在法国蔓延。至于资产阶级，它曾经十分愚蠢地猜疑国民议会，认为国民议会由于各种派别倾轧和争吵，由于这些派别对执行机关一致采取反对立场，因而引起了 1851 年暂时的商业停滞。资产阶级不仅抛弃了它自己的代表，而且有意促成了 *coup d'état* (政变)，以恢复它所说的“强化的政府”，首先是“正常的实业生活”。现在它才发现，工业危机既不能用军事专制制度来防止，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制度过分挥霍而使社会信贷极度紧张而缓和下来，也不能因军事专制并且使金融危机成为商业危机的必然伴侣，而得到缓和。因此，资产阶级渴望着重新换一个能给它以“强化的政府”和“正常的实业生活”的政权。至于无产者，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把波拿巴看做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看做是 *république cosaque* (哥萨克式的共和国) 的破坏者和一种替他们向秩序党<sup>418</sup>报了仇的报复工具。由于他们在 12 月 2 日以前被一系列的失败所削弱，而在 1852 年利 1853 年又整个地忙于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就需要时间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到来，那时，共同性质的原因和其他一切阶级的普遍不满将使他们有可能重新从事他们的革命事业。

下面这个来自巴黎的商业报告透露了法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某些真相：

“最近一个星期巴黎的商业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不算商店老板们定购的新年礼物的生产，另外再加上成衣的缝制，商业的完全停滞似乎已经到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省的粮价昂贵，使基本居民群众无法像往常一样购买东西。小麦、栗子和葡萄在法国中部各省都歉收，所以为了得到粮食已经不得不作了许多牺牲的农民，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都不愿买别的东西。外省的来信证实，运到近日的市集上售卖的绝大部分棉纺织品都找不到主顾，卢昂的商业停滞从这里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了。现在

全部出口货物都只运往南美各国。有消息说,在纽约和新奥尔良市场上法国货物也过剩。因此预计那些地方将不再定货。往常以产品供应比利时和德国的商行几乎已全部歇业,因为它们的外国主顾完全不向它们定货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法兰西银行一发现前来贴现的商业期票的数量大为缩减,那就是意味着巴黎生意萧条,而现在正好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粮食市场上,10天以来交易情况一直不好,粮价下跌,现在又显得活跃起来了,拥有小麦的人对自己的存货有了更大的信心。面包店主们表现了买进面粉的极大兴趣,而东部几个省份的一些买主的出现。就最终制止了价格的下跌。由于巴黎的粮食经纪人无法完成他们在上星期三接到的定货,所以买主都到哈佛尔去了,因为那里早先曾经宣布每巴勒降价2法郎。在买主们到了那里以后,面粉价格马上从每巴勒44法郎上涨到47法郎,而每200公斤小麦由83法郎上涨到86法郎。类似的价格上涨情形在诺尔省的所有市场都发生了。在斯特拉斯堡粮食市场上有大量的粮食,小麦每百升的降低1法郎;在里昂,市场不活跃,但价格没有下跌。巴黎黑麦又涨价了,曾有12000公石的燕麦按每100公斤22法郎9苏的价格售出。12月2日马赛的一封来信称,11月1日至30日期间有341艘轮船载着804270百升小麦到达马赛港。连这些船在内,在近4个月中一共有714艘船向马赛运来了2102476百升的小麦。”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2月13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3年12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61号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辞职

“阿非利加号”轮船带来的最有趣而重要的新闻，就是关于参加阿伯丁勋爵联合内阁的帕麦斯顿勋爵辞职的消息<sup>419</sup>。这位不拘礼数、圆滑灵巧的策略专家使出了最巧妙的一招。那些作为内阁喉舌的伦敦报纸拚命设法使公众相信，这件事不是由东方问题上的困难引起的，而是因为做事一丝不苟的勋爵阁下作为不列颠宪制的忠实捍卫者不能同意实行议会改革，哪怕是在极其细小的程度上（细小是约翰·罗素勋爵之类的辉格党人的特点）实行议会改革他都不能同意，所以只好辞去自己的职务。这正是帕麦斯顿向他的联合内阁同僚们所讲的正式的辞职理由。但是同时他又用尽一切办法，使公众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所以不管官方报纸发表多少声明，人们仍然普遍认为议会改革法案只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内阁对俄国的政策。从某一个时候起，特别是最近这次议会会议闭幕以来，所有亲帕麦斯顿的报纸就都这样讲。它们以各种各样的调门和形形色色的变奏演奏着同一个旋律，把帕麦斯顿勋爵描绘成一个反对首相的影响、反对硬要他在东方悲剧中担任不体面角色而不得结果的好汉。关于内阁分裂为两大营垒的传说没有断过；什么办法都使了出来，想叫英国公众做好准备，等着看仗义的子爵显示他那独特毅力的好戏。总之，戏是早

已排练好的，一切场面都设计好了，于是在后台等候的勋爵阁下就以他那惊人的敏感选择了最适当的时机，以便一出台就能产生轰动全场的效果。

帕麦斯顿勋爵与他的联合内阁的朋友决裂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刻：奥地利热切地抓住了关于举行新谈判的建议；沙皇把他那阴谋的罗网撒得愈来愈广，同时，他正在挑起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并且威胁塞尔维亚的执政的公爵：如果在这场冲突中仍然坚守中立，他就要把他推下王座，用这种办法来把新的力量拖入战争；土耳其人白白等了一场英法舰队，结果是自己的一支区舰队被力量3倍于它的俄国舰队消灭了，而且还损失了5000名水兵；俄国船长们被允许在英国港湾和英国船舶上践踏英国法律；“无可指摘的女王”和她的“德国亲王丈夫”所策划的王室阴谋已经尽人皆知；最后，素来懒得动的英国人民由于在国外民族自尊心遭到伤害，在国内经受了罢工、饥饿和商业停滞的残酷考验而变得愤恨异常，他们的行动愈来愈带有威胁性，而他们仇恨的第一个对象恐怕就是本国可怜政府。帕麦斯顿勋爵在这样的时候辞去自己的职务，就可以把全部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卸给他以前的同僚们去承担。这一步骤成了一件全国性的大事。帕麦斯顿马上就变成了代表着人民反对政府——他已同政府决裂——的人物了。他不仅挽救了自己的名声，而且使他的同僚们声名扫地以尽。既然现内阁不可避免的垮台看来是他一手造成的，那末他必然要成为任何一个新内阁的成员。他不仅把命运已定的内阁抛开不管，而且还使这一内阁的继承者非接受自己不可。

帕麦斯顿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辞职，除了挽救自己的名声并且在新政府中稳占一个突出的地位以外，还是直接为俄国效劳。俄

国外交界早就在嘲笑联合内阁笨拙，波拿巴一直猜忌联合内阁对科堡家族和奥尔良王室所表示的同情，甚至君士坦丁堡方面也开始认识到联合政府叛卖盟友、懦弱怕事的弱点了；而现在，就连它在国际领导集团中暂时可能还有的一些不大的影响也要消失了。一个丧失了统一和名誉，不被朋友信任，不被敌人尊重的政府，一个被人看做处于瓦解前夜的纯粹暂时性的东西，甚至存在本身也开始被人怀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根本无力使大不列颠在欧洲列强中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将使联合政府的作用以及英国本身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等于零；而对那位专制君主来说，英国的退出政治舞台哪怕是一两个星期所带来的好处，是比任何时候都大的。在大不列颠的统治集团中爱好和平的分子对主战分子占了上风。柏林的、巴黎的和维也纳的宫廷都必然会这样来解释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而土耳其御前会议也将不得不接受这种解释，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本来就已经因俄国最近的胜利而动摇了，它现在是在联合舰队的大炮保护下开会哩。

不要忘记，自从帕麦斯顿勋爵成了联合内阁的成员以来，他的国务活动与国际政治的联系只限于以下几点：他插手制造轰动一时的火药阴谋案件<sup>①</sup>，插手于公开利用英国警察跟踪监视政治流亡者的勾当；他发表演说，开玩笑似地把俄国给多瑙河的航行设下的障碍描绘成不值得注意的问题；最后，他在议会会议闭幕时所作的庄重的演说里要下院相信，政府在东方危机中的活动是无可指摘的，议员们可以安心地散会，因为大臣们仍然各守职位；同时他还担保“俄国皇帝知荣誉和守信用”。

<sup>①</sup> 见本卷第 96—99 页。——编者注

除了上面列举的一般原因以外，帕麦斯顿勋爵所以要用这种爱国的自我牺牲行为使世人震惊，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已经开始被人识破了。他身上的光彩已开始黯淡下去，他以前所做的事情已被公众知道。如果说，在帕麦斯顿公开参预推翻法兰西共和国的12月2日阴谋的时候，在他表演火药阴谋剧的时候，英国人民的错误认识都仍然没有动摇的话，那末，对勋爵阁下作过认真的研究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所进行的揭露就成了一付清醒剂。这位先生不久以前发表的著作“俄国的进展”，他在英国刊物上登载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他在反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传遍整个王国的演说，都打击了帕麦斯顿的政治威信，这种打击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将显示出更大的力量。我们对恢复历史真实的事业所作的贡献，对于英国人重新评价这位诡诈狡猾的国家活动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我们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我们完全出乎意料地从伦敦得到消息说，塔克尔先生把两个月以前我们揭露了勋爵阁下的真面目并撕下了他那国务活动的假面具的那篇详尽的文章<sup>420</sup>翻印了5万份并且免费地散发了。社会舆论已经变得对勋爵阁下不利，所以他显然是想用现在这个 coup (手腕) 来躲开即将落到他头上的种种谴责，或者挡开这些谴责。我们可以预言，他将遭到失败，他那拖延不止的国家活动家的生涯不久就要得到一个可耻的、倒霉的结局。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2 月 16 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3 年 12 月 31 日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65 号

## 弗·恩格斯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sup>421</sup>

耽搁很久之后，我们终于收到了关于俄国正在大肆吹嘘并且已经得到慷慨奖赏的两次胜利的官方文件。当然，我们指的是俄军在亚洲的西诺普消灭土军舰队的海战和在阿哈尔齐赫的战斗<sup>422</sup>。这些文件都是俄国的官方报告，但是土耳其的官方报纸对此保持缄默（如果有报道的话，那就应当比圣彼得堡的报道早到我们这里），这一情况使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土耳其政府没有任何好消息可以报道。因此，我们想根据我们现有的情报来分析一下上述事件，使读者了解真实情况。

西诺普会战是土耳其犯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的结果，所以会这样，只能说完全是由西方外交的恶意干涉或君士坦丁堡某些同法英大使馆有联系的集团暗中勾结俄国而造成的。11月，土耳其和埃及的全部舰队都开到了黑海，想借此转移俄国海军将领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开往高加索沿岸给起义的山民转送武器弹药的远征队。但是，舰队在大海里呆了18天连一艘俄国军舰也没有遇到。有一种说法是，俄国军舰在这期间一直没有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因而土耳其派往高加索的远征队得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种说法是，俄军摸清了土军的计划，向东派出了一支舰队，对土军的运输船只进行一般的监视，结果土军的这些船只没

有到达高加索沿岸便折回西诺普，同时海军主力则回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去了。西诺普舰队的军舰上装有大量火药，其中有几艘在战斗开始阶段就因火药爆炸而被焚，看来，这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土耳其的 7 艘巡航舰、2 艘蒸汽舰、3 艘轻巡航舰、1—2 只小型舰船和几只运输船就这样留在西诺普港湾听天由命了。西诺普港湾仅比普通的暴露的停泊场稍微多一点掩护，它是一个敞开的港口，有几个管理不善和修得不好的炮台。最好的炮台位于早在希腊皇帝时代欧洲可能还没有炮兵的时候修建的城堡内。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怎么会让装备有约 300 门大部分是小口径炮的分舰队听凭兵力和火炮比它多两倍的舰队摆布，并且是在距塞瓦斯托波尔很近而最易遭受俄军攻击的土耳其沿岸的这样一个地点听其摆布。而土耳其舰队的主力却安静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荡。但是我们知道，土耳其大本营对这一分舰队的危险处境非常了解并就这一点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也知道，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将领们曾在军事会议上大喊大叫地发表过各种互不相同的意见，到处奔忙的大使们也曾干预这一问题的讨论；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同时有消息说，一艘奥地利轮船曾向塞瓦斯托波尔报告了土军这一分舰队的位置。相反地，俄国的官方消息却说，是纳希莫夫在亚洲沿岸巡航时发现了这支分舰队，并且立即做好了攻击的准备。但是，如果俄军发现了西诺普的土军，那末土军必然会从城塔和清真寺高塔上更早地发现俄军。为什么土耳其的炮台把本来用几天工夫便可以大致部署就绪的战斗准备工作搞得这样糟呢？为什么土耳其的船只恰恰停泊在妨碍炮台射击的地方，而不把停泊

场改在更安全的地方呢？当时要这样做的话，时间是足够的，因为正如纳希莫夫海军上将所说，他在决定攻击前曾向塞瓦斯托波尔要过 3 艘三层甲板舰。显然，土军决不会从 11 月 24 日到 30 日不采取任何措施而白白错过 6 天的时间。逃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塔伊夫号”蒸汽舰的报道相当肯定地指明，土军遭到了突袭。因此，在这方面决不能认为俄国的报道是确实的。

在纳希莫夫指挥下有 3 艘战列舰（其中 1 艘是三层甲板舰）、6 艘巡航舰、几艘蒸汽舰和 6—8 只小型舰船。换句话说，这是一支在火炮数量上至少比土耳其分舰队多一倍的舰队。但是，纳希莫夫只是在得到 3 艘三层甲板舰的增援时才决定向土军发起攻击的，实际上仅仅这 3 艘三层甲板舰就够用了。他只是在兵力上占这样无比的优势后才发动攻击。他利用浓雾，有的还说，他用了英国旗子才无阻地接近到距土军舰队 500 码的地方。于是战斗开始了。俄军舰船为避免一扬帆就被风吹到岸边，便抛下了锚。接着在双方停泊下来的舰队中间进行了 4 小时的炮战，没有进行任何海上机动，很像一场陆上炮战。由于俄军黑海舰队的水兵几乎都是“陆地水兵”【land lubbers】，特别是其中波兰犹太人占绝大多数，在大海上与拥有优秀水兵的土耳其舰队作战很少有可能获胜，所以这次能够不采取海上战术，不进行任何机动，对俄军是非常有利的。然而，俄军仍然用了 4 个小时才压制住占劣势的敌军舰队。此外，俄军还占有一种优势，就是他们每发未命中目标的炮弹都可能使岸防炮台或城市受到损失。城市在敌人的舰队被完全压制住前差不多全部受到破坏，这个事实就说明未命中的炮弹比命中的炮弹多得多。根据俄国的报道，只是土耳其人的住区受到破坏，而希腊人的住区则像奇迹似的没有受到破坏。但是与这个报道相反，另一

份比较可靠的消息证明，全城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战斗进程中，土军有 3 艘巡航舰被烧毁，有 4 艘搁浅后也与 1 艘蒸汽舰和几只小型舰船一起被烧毁；而“塔伊夫号”蒸汽舰则割断了锚链，大胆地突破俄军封锁线，不顾科尔尼洛夫海军上将指挥的 3 艘蒸汽舰的追击，逃到了君士坦丁堡。考虑到俄军舰队的海上机动不够灵活，土军舰船停泊在自己炮台前面的火线圈内而位置不利，特别是考虑到**失败绝对不可避免**，因此只要风向许可，土耳其分舰队也许最好是起锚并倾全力向俄军攻击。这样做，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几艘舰船，但是至少可以保存部分舰船。当然，是否能进行这样的机动，决定的条件是风向；但是奥斯曼—帕沙是否考虑到了这一步骤，这还是疑问。

西诺普的胜利没有使俄军得到荣誉。而土军作战则空前骁勇，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没有一艘军舰投降。土耳其海军损失很大，俄军暂时控制了黑海，这种事件使土耳其人民和陆海军在精神上受到打击，——这一切，土耳其应当完全归功于西方外交的“善意帮助”，因为西方外交阻止了土耳其舰队出海保卫或护送西诺普分舰队返航。而俄国的攻击之所以能够这样准和这样稳，应当完全归功于秘密的情报。

俄国人所吹嘘的第二个胜利，是在阿尔明尼亚的阿哈尔齐赫战斗中获得的。不久前土军在格鲁吉亚边境的进攻受阻。土军自占领舍夫卡捷尔即圣尼古拉码头之后，就没有攻占过任何一个有什么意义的地点，也没有取得过任何一次即便是微不足道的胜利。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这样的地区里：在这里，俄军不得不在难以想像的最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在这里，通往俄国的陆上交通线只有陷于起义的切尔克斯人的包围圈中的两条，而海上变通线则很容易

被切断或受到威胁；俄军所占有的以梯弗里斯为中心的整个南高加索边区，与其说是强大的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如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末土军停止进攻又当作何解释呢？土耳其人把这一情况归罪于被召回的阿勃迪—帕沙的叛变。可是非常奇怪的是，阿勃迪—帕沙是土耳其在亚洲唯一对俄军取得过几次地方性的局部胜利的将领。但是可以指出土军的两个错误，来说明土军在战局开始时为什么战果不大和随后便遭到事实上的失败。土军把兵力分散展开在从巴士姆到巴雅泽特这条长长的战线上。没有一个地方有足够的兵力可以用来集中进攻梯弗里斯，尽管部分土军当时占领了埃里温城，但它是一座谁也不要并且要了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城市。在一个贫瘠的多山的地区，要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困难的，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不让军队挨饿，这就是迅速转移和尽快集中全部物资。本来两个军就足够了：一个军掩护巴士姆和向沿岸地区攻击；另一个军通过库拉河谷直取梯弗里斯。但是土军一直在分散兵力，而且分散得毫无必要，以致每个独立的部队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另一方面，土耳其舰队由于外交的干涉而没有采取行动，以致使俄国的两个步兵师（属第五军）得以在明格列里亚登陆，从而使沃龙佐夫公爵的高加索军队几乎增加了 2 万人。沃龙佐夫由于得到了这些援军，不仅能在沿岸地区挡住土军，而且还能愉快地以安德朗尼科夫将军的部队解救被围困的阿哈尔齐赫要塞。安德朗尼科夫将军的部队是在该城附近的平地战斗中击败土军的。俄国人报道说，他们在那里只用了约 1 万人，就把 18000 人的土耳其军队击溃了。这样的消息当然不能作为凭据，但是应当承认，在安那托利亚的土军中大部分是非正规部队，而且差不多都没有欧洲人担

任军官，特别是担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军官，所以就使得土军在双方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仍弱于俄军。俄国人说，他们缴获了 10—12 门火炮。这大概符合真实情况，因为在这一难以通行的地带，战败者不可避免地要丢掉大部分火炮。但是俄国人又承认，他们一共抓到了 120 名俘虏。这等于承认，他们在战场上几乎杀害了土军被迫丢下的全部伤员。此外，俄国的报道还证明，俄军对追击措施，即便是局部拦截退却的敌人的措施，都考虑得很差。俄军当时骑兵很多，如果大胆攻击逃敌，就可能截断整营整营的敌人的退路。然而至少根据现有的报告可以看出，这次会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重大的意义。

俄军在多瑙河上除了重复战局开始时的那些行动，即在曼成要塞（确切些说，是布来洛夫对面的一个突出的峭壁）的行动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看来，他们在那里收获很少。现在我们根据可靠的材料，还可对土耳其集中在维丁的兵力进行更精确的计算，土军有 34000 名步兵，4000 名骑兵，2000 名炮兵和 66 门野炮，这里不包括维丁工事中的和卡拉法特多面堡中的重炮。因此，土军的 4 万兵力被用于占领由布加勒斯特直达塞尔维亚的道路。被箝制在他们所要防守的这样长的战线上的 4 万军队，如果用来抵抗大部队的进攻则嫌太少，而用来对付小部队的袭击却又过多。如果这 4 万人和已集结在苏姆拉的部队一起用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起双倍的作用。由于在需要的地方没有这些部队，再加上外交的干涉，土军在沃耳特尼察的行动便遭到了失败。不能设想奥美尔—帕沙会不知道，如果他能带 10 万人驻守在锡利斯特里亚和鲁舒克之间，俄国人决不会试图派出足以重创土军的兵力在他面前通过和向塞尔维亚山区挺进。现在奥美尔—帕沙军队的部署不可能符合

---

他的想法,因此他一定对那些迫使他这样部署的有害势力感到非常愤怒和恼火。

弗·恩格斯写于 1853 年 12 月 22 日  
左右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作为社论载于 1854 年 1 月 9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71 号

## 注 释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 注 释

## 注 释

- 1 从本文起，马克思和恩格斯联系着 1853 年俄国和西欧列强在近东和巴尔干半岛上的矛盾尖锐化和后来爆发的克里木战争，开始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东方问题作系统的阐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大多数文章和通讯一样，本文在作者生前没有翻印过。“土耳其”这一节曾同其他一些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一起，收入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艾威林编辑的文集——卡尔·马克思“东方问题。1853—1856 年关于克里木战争事件的论文翻印本” 1897 年伦敦版 (Karl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897)。由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这些文章有时署名马克思，有时没有署名，所以这本文集以马克思为所有文章的作者。只是到 1913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发表后才知道，马克思寄到“论坛报”去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恩格斯写的，有的是整篇，有的是部分。

本文中“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几节是马克思写的，“土耳其”这一节是恩格斯写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本文不全，缺第一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 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于 1851 年 8 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 1862 年 3 月，继

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马克思不得不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第3页。

- 2 1853年3月，自1848年起担任托利党下院领袖的迪斯累里去职，帕麦斯顿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个变化是主张在财政和贸易政策上对自由贸易派的工业资产阶级作一定让步的迪斯累里和保护关税派的托利党人之间长期的党内摩擦的结果。尽管后者暂时获胜，可是迪斯累里的路线后来仍然占了上风，这个路线反映着把旧的贵族托利党变成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派政党的趋势。——第3页。
- 3 1853年3月1日帕麦斯顿在下院会议上诡称，如果大陆上的强国要求把政治流亡者逐出不列颠群岛，英国是不答应的。但是，不久阿伯丁却在上院的演讲中允诺在流亡者问题上可以向大陆上各强国政府作让步。马克思在以前一些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里曾谈到这个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1、627页）。——第4页。
- 4 “奥地利通讯”（《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是奥地利政府石印的半官方机关报；1850—1863年在维也纳出版。——第4页。
- 5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是法国的日报，政府的官

方机关报；178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5页。

- 6 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在提尔西特，亚历山大一世答应在法国的调停下开始同自1808年起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举行和平谈判。1807年8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和约没有谈成；1809年军事行动恢复，1812年土耳其战败。——第5页。
- 7 指神圣同盟（1815年由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建立的欧洲君主的反动联盟）的反革命势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对那不勒斯、皮蒙特和西班牙的武装干涉。1820年10月在特劳波（奥帕瓦）开幕，1821年5月在来巴赫（柳布梁纳）闭幕的一次神圣同盟会议，公开宣布了神圣同盟强国为了支持其他国家的封建君主制度可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的原则。据此，来巴赫会议通过了关于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去的决定，而维罗那会议（1822年）则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的决定，结果，这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便被镇压下去。——第5页。
- 8 四十年代初，由于1839—1841年土埃战争和因土埃战争各大国间的矛盾加剧，东方问题尖锐化了。土耳其苏丹的军队于1839年开进了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在1831—1833年占领的叙利亚，但被击溃。西方各强国深恐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坚决向苏丹提出一个联合照会（1839年7月27日），声称所有各大国将帮助土耳其政府。但是，英法之间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的势力范围问题上有争执，结果只有英、俄、奥、普四国签署了关于各强国对苏丹军事援助办法的伦敦公约（1840年7月15日），法国没有参加。法国虽然已打定主意利用穆罕默德—阿利，但

不久就不得不让步，抛开穆罕默德—阿利不管了。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利不得不放弃埃及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服从土耳其苏丹的最高权力。——第6页。

- 9 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来自拉丁字《legitimus》，即“合法的”）是达来朗所代表的法国外交界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上提出来的。这个原则的内容，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和君主制度。所有维也纳条约都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同时，战胜拿破仑法国的各国统治者违反各国人民的意志，重新划定欧洲的政治地图，他们所根据的与其说是复辟的“正统”君主的要求，倒不如说是他们本身的、往往互相冲突的利益。——第6页。
- 10 贝朗热在“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Les mirmidons ou les funérailles d' Achille》）这首歌曲中，以隐喻的方式描绘了猥琐低能的复辟时期的法国君主和欧洲的其他一些正统主义的拥护者。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个双关语：les mirmidons——米尔米东人，是传说中在南特萨利亚的一个部落，该部落的战士曾在特洛伊战争中在阿基里斯统率下作战；mirmidon 也有矮胖、侏儒之意，借用指猥琐、无能的人。——第6页。
- 11 土耳其军队曾两次围攻维也纳，一次在1529年，一次在1683年，这两次都没有成功。1683年波兰国王杨·萨比斯基的军队打退了入侵的土耳其军队，解救了奥地利的京城。  
库列夫查会战（保加利亚）发生于1829年5月30日，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进行的时候。结果是土耳其军队被击溃。——第7页。
- 12 “种族”（《race》）一词在这里是根据当时一般人对这个词的理解而用的，当时一般人都把“第二级种族”（基本种族内的集团）同人类的各个语言上和人种上的分支混为一谈。——第7页。
- 13 阿尔纳乌特人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7页。

- 14 加利埃哥人是加利西亚的山民,自古以来就住在比利牛斯半岛的这个地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许多城市中,加利埃哥人形成了自己的居民点。——第9页。
- 15 指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848—1849年利用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运动反对革命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在革命前夕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王国的版图。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匈牙利革命政府拒绝承认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民族独立权。奥地利的反革命利用了这种情况,把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起义军拉过来同匈牙利人的革命军作战。但是,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却使特兰西瓦尼亚居民受害无穷,因为在那里又恢复了匈牙利大地主的统治。——第10页。
- 16 卢西人是资产阶级民族志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柯维纳的乌克兰人的称呼,流行于十九世纪。这些地方的居民那时被强迫同乌克兰人民的基本部分分割开来。

1846年2月,当波兰试图举行起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克拉科夫的起义者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的时候,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了被压迫的乌克兰农民仇视波兰贵族的心理,往往很成功地唆使起义的农民去反对波兰的起义部队。在克拉科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第10页。
- 17 指1848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这两个公国的人民群众开展了广泛的运动,力争完全脱离土耳其帝国,消灭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这次革命被国内反动派勾结苏丹土耳其和沙皇俄国进行武装干涉镇压了下去。——第10页。
- 18 指克罗地亚和捷克民族运动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这些人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反对用革命民主的方法解决民族问题,主张被压迫的各斯拉夫民族联合在反动的哈布斯堡帝国范围内。在1848年于阿格拉姆(萨格勒布)召开的克罗地亚沙布尔的决议中,在1848年6月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温和自由派(帕拉茨基、沙法里克)维护和

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立场中，都反映出这样的态度。与此相反，这个代表大会的民主左派（萨宾纳、弗利契、李别尔特等等）则力争与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共同行动。——第 12 页。

- 19 指 1806—1812 年的俄土战争，土耳其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于 1812 年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和约规定贝萨拉比亚割给俄国。和约还规定给予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为塞尔维亚后来的独立尊定了基础。——第 12 页。
- 20 加腊沙宁所领导的塞尔维亚反俄的党派的立场，是指望西方各强国的援助。1853 年初，塞尔维亚公爵亚历山大根据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特使缅施科夫公爵的要求，革去了加腊沙宁政府首脑和外交大臣的职务。立场不同的各党派的斗争，导致了 1853 年塞尔维亚国内政治局势的尖锐化。——第 13 页。
- 21 1838—1842 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是英国人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这次战争以英国殖民者的侵略计划破产而告终。

1843 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同阿富汗接壤的信德省。在英国阿富汗战争期间，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暴力的手段使信德的封建统治者同意英国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地。英国人利用这个机会，于 1843 年要求当地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并在摧残了起义的俾路支各部落（信德的土著居民）后宣布整个信德地区并入英属印度。

英国和锡克教徒战争（1845—1846 年、1848—1849 年）的结果占领了旁遮普（北印度）。锡克教是十六世纪旁遮普的一个教派，它的平等教义成了十七世纪末起来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侵略者的农民的指导思想。以后锡克教徒本身分化出封建上层分子，其代表人物领导了十九世纪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邻近一些地区的锡克教徒国家。1845 年英国殖民者利用锡克教显贵中的叛变分子，挑起了和锡克教徒的冲突，于 1846 年使锡克教徒国家变成了一个藩属。1848 年锡克教徒举行起义，可是于 1849 年被完全征服。旁遮普被占领后，整个印度就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第 15 页。

- 22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刊，1843

- 年于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 16 页。
- 23 指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 1853 年 2 月 6 日在米兰发动并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是建立在密谋策略的基础上，又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所以很快就失败了。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93—594、599—603、624—625 页）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第 18 页。
- 24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本文不全，缺头两段。——第 20 页。
- 25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80—1869 年于伦敦出版。——第 20 页。
- 26 指铸有埃及“圣”牛（阿皮斯）的钱币；在古希腊，类似的铸有动物的钱币主要是在公元前五世纪流通。——第 21 页。
- 27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 年于伦敦创办。——第 21 页。
- 28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72—1937 年于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 22 页。
- 29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6—1930 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 22 页。
- 30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70—1862 年于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派的机关报。——第 22 页。
- 31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 年于伦敦创办，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 22 页。
- 32 “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是表于 1830 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和

英国之间的和好的一种用语。尽管是《entente cordiale》，但是在三十年代和以后的时期，英法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却一再尖锐化。——第 22 页。

- 33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 到 1870 年于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在 1848 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梯也尔为核心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 年 12 月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22 页。
- 34 “国家报”（《Le Pays》）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 年于巴黎创办；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 年）是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该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Journal de l' Empire》）。——第 23 页。
- 35 指 1821 年春天开始的希腊起义。起义是由希腊爱国者的秘密组织——赫特里准备的。1821 年 3 月，亚历山大·伊普西朗蒂（在俄国服务的希腊军官，在敖德萨领导一个赫特里）的部队过普鲁特河到达多瑙河各公国，以便打进希腊，是这次起义的信号。伊普西朗蒂部队的进军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推动了很快就席卷全国的群众性起义。1822 年 1 月，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无力对付起义的希腊人，便召令自己的藩臣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相助，穆罕默德—阿利的军队在伊布拉希姆—帕沙的指挥下侵入摩里亚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残害希腊居民。在起义之初，神圣同盟各国，特别是沙皇俄国，对起义抱根本否定的态度。但是，由于希腊人的斗争到处引起巨大的同情，而主要的是，由于有可能利用这种斗争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就使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承认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给予军事援助。俄国在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的胜利，对希腊获得独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结果，土耳其不得不承认希腊为独立国。按照欧洲列强统治集团的决定，反动的君主制度被强加到了希腊人民身上。——第 24 页。
- 36 法纳尔人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法纳尔区有钱有势的希腊人，他们大部分是拜占庭贵族世系的后裔，他们依仗钱财和政治联系，在奥斯曼（奥托曼）帝国的行政机关中高居要职。——第 24 页。

- 37 1804年的塞尔维亚起义，是塞尔维亚人民世代反对土耳其封建主统治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土耳其的近卫军对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1804年2月，塞尔维亚人民在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做过海杜克的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格奥尔基·车尔尼）的领导下群起投入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在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时期，俄国军队在巴尔干的顺利挺进给塞尔维亚人的运动以重大支持。在这次战争期间，塞尔维亚人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之后，于1811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管理机构。按照1812年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土耳其应该让塞尔维亚享有内政自治权，但是，苏丹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际撕毁和约，于1813年征讨塞尔维亚，并在那里暂时恢复了自己的统治。由于1815年塞尔维亚人又一次实行了胜利的起义，以及俄国在外交上的援助，土耳其的枷锁终被打碎。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后，土耳其在1830年苏丹的特别赖令中被迫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事实上的独立）。——第25页。
- 38 纳瓦林会战（纳瓦林，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1827年10月20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下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后者是欧洲列强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而开进希腊领海的。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的迫害后而开始的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复没，并加速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俄国在这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纳瓦林会战中起了突出的作用的是俄国分舰队，特别是在米·彼·拉扎列夫指挥下的“阿速夫号”旗舰。——第26页。
- 39 Magna Charta——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是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英王“无地约翰”提出的一个文件。这个大宪章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的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利，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作了某些让步，但宪章没有给基本居民群众即农奴以任何权利。——第27页。
- 40 指西方列强对俄国和奥地利政府向土耳其提出的引渡匈牙利流亡者（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的要求所持的立场。土耳其政府急于利用流亡者来

改组和巩固军队，拒绝了这一要求。西方列强担心俄国的影响在近东和中欧扩大，决定对俄国加以反击，它们的干涉使冲突尖锐起来。英国政府向达达尼尔海峡派出了自己的舰队。尼古拉一世不得不让步，放弃关于引渡流亡者的要求，让土耳其政府将流亡者驱逐出境了事。——第 27 页。

- 41 “彼得大帝遗嘱”——是西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用来进行反俄宣传的一个假文件。有此“遗嘱”的说法，早在 1797 年就在西方传开了；1812 年，法国人列久尔的“论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发展”一书叙述了这份假遗嘱的内容；1836 年，盖亚尔德的“勋章获得者德奥的回忆录”一书，又使这份伪造的东西具有文件的形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在西欧普遍都相信真有这份文件。——第 27 页。
- 42 指奥地利警察当局由于 1853 年 2 月米兰起义和亚诺什·李伯尼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事件所采取的行动。奥地利当局以这两个事件为借口，对有参加反政府密谋和参加匈牙利和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嫌疑的人进行了多次逮捕和疯狂的司法迫害。——第 31 页。
- 43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 年 10 月 4 日—11 月 12 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 年）的 11 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警察局根据伪造的文件和假证据判处 7 名被告 3 年至 6 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49—456、457—536 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 32 页。
- 44 马克思指路易·波拿巴对莱茵河东岸的要求。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从十七世纪起就把莱茵河东岸划为法国在东方的“天然边界”。——第 32 页。

- 45 阿德里安堡条约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缔结的和约。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须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赋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令把这种自治法定下来。——第36页。
- 46 指1806—1812年和1828—1829年的两次俄土战争，这两次战争的结果一次是布加勒斯特和约（1812年），一次是阿德里安堡和约（1829年）。关于这两次战争和这两个条约对确立塞尔维亚的独立的意义见注37和45。——第36页。
- 47 亚尼纳帕沙德佩林的阿利，是巴尔干半岛西南广大地区事实上的独立的统治者（他的属地包括伊皮罗斯、阿尔巴尼亚、南马其顿等及其他地区，以亚尼纳城为中心），从1820年起，他同苏丹处于公开交战状态。他对土耳其军队的作战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希腊起义的胜利，但他的斗争与希腊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同，带有封建分立主义的性质，终于1822年失败。

纳瓦林会战，见注38。

由于1828年春俄土之间开始了军事行动，同年8月法国军队在梅桑将军率领下开到希腊南方，开进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几乎没有遇到土耳其埃及军队的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半岛。这次以援助希腊人为名的出征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和加强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

英、俄、法三国代表的伦敦会议于1827—1829年举行。这次谈判的内容是希腊问题。1827年7月6日，三大强国在伦敦缔结了一个公约，确认英俄1826年4月4日（3月23日）在彼得堡签订的议定书，并承认希腊的自治权。像议定书一样，在公约中三强协议在外交上承认希腊和武力调停希土冲突。根据这个协议，三强向希腊领海派去了联合舰队，参加了纳瓦林会战。在伦敦会议上还签署了其他许多有关希腊的文

件，其中包括 1829 年 3 月 22 日的议定书，这份议定书确定了希腊的国界，并规定在希腊建立君主政体。但是，这些协议以及英法两国的外交行动（英法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免土耳其在俄土战争中被击溃），并没有动摇土耳其政府在希腊问题上的不妥协的立场，只是俄军在 1829 年战局中的胜利才迫使土耳其政府让步。——第 36 页。

- 48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的原文中，编辑部曾在文章的最后加了如下一段话：“现在，想对欧洲的人民事业有所帮助的人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促进土耳其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尊重法律，发扬向往自由和独立的本能。世界和平和进步的前途都有赖于此。要想丰收，在耕耘和播种上所花费的任何劳力都不能认为是多余的。”——第 40 页。
- 49 “普鲁士周刊”（《Preuß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国保守派的周报，1851—1861 年在柏林出版。——第 41 页。
- 50 “时代报”（《Die Zeit》）是德国保守派报纸，从 1851 年至 1858 年在柏林出版。——第 41 页。
- 51 “新闻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 1848 年至 1894 年在维也纳出版；在 1861—1862 年，当该报采取了反波拿巴立场时，发表过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第 42 页。
- 52 “解放”（《L' Emancipation》）是比利时日报，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机关报；1830 年在布鲁塞尔创刊。——第 42 页。
- 53 见卡·马克思“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00 页）。——第 43 页。
- 54 马克思指的是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该文发表于“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1853 年 4 月第 1、8、15 和 22 期。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于 1852 年在

纽约创办的周报。从 1853 年 3 月 18 日起到 1854 年 3 月 10 日用这个名称出版。——第 44 页。

- 55 维多克“回忆录”1828—1829 年巴黎版第 I—IV 卷 (Vidocq. 《Mémoires》. T. I—IV, Paris, 1828—1829)。该书是否即为维多克所作,尚属疑问。

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 年巴黎版 (A. Chenu. *Ex-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ussidière. Les conspirat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 francs*). Paris, 1850)。

律·德拉奥德的“1848 年 2 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 年巴黎版 (L. De la Hodde.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is, 1850)。

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写了一篇书评来分析批判谢努和德拉奥德写的书,这篇书评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 1850 年第 4 期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313—329 页)。——第 44 页。

- 56 菲·库伯的长篇小说“密探”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由于信仰和爱国心的驱使而作了间谍工作。——第 44 页。
- 57 即希尔施和其他警探根据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指示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这个伪造的会议记录在科伦案件中曾被用来作为控告材料,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对这个伪造材料作了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88—517 页)。——第 45 页。
- 58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59—380 页)。这一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一直没有发表。1930 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保存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文学遗产中的手稿译成俄文第一次发表。——第 45 页。
- 59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

— ö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在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底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45页。

- 60 “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一文,是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论述阿伯丁联合内阁的预算的文章,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关于同一问题的文章。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是无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革命的宪章派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同时对编辑工作也给予帮助。除了专为“人民报”写的文章外,“人民报”还转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是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由于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暂时和琼斯断绝关系。1858年6月该报转到资产阶级投机商人手里。——第49页。

- 61 本表中的统计资料,马克思主要取自威·科贝特的著作“纸币对黄金”1828年伦敦版第21—25页(W. Cobbett. 《Paper against Gold》. London, 1828, pp. 21—25)。

科贝特根据英国1752年前通行的历法(按这种历法,新年是从3月

- 25日算起)确定女王王安即王位的日期在1701年(按新历是1702年)。在“人民报”发表的文章中,本表的第二部分即“国家支出”有误,即把1809年的国家支出总额(82027288英镑)误为1801年。本版根据科贝特订正。——第49页。
- 62 摘自1853年4月8日下院讨论格莱斯顿的预算时迪斯累里的发言。——第51页。
- 63 南海公司是在对南美和太平洋诸岛贸易的名义下于1712年前后在英国成立的,它的真正目的是从事国家证券的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系列的特权和垄断权,其中包括发行国家有价证券的权利,展开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这种活动在1720年以公司破产告终。该公司的活动使英国国债进一步增加。——第51页。
- 64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同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原文相同的那一部分被略去(见本卷第60—63页,从“1. 每100英镑……”起至“将丧失任何改善自己财政状况的机会”止)。——第56页。
- 65 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某些重要问题时,下院即宣布作为全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whole House)开会,由下院议长在主席名单中指定一人担任全院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s)主持会议。——第56页。
- 66 指1853年2—3月下院讨论梅努特(爱尔兰)神学院的教育制度问题。这个学院于1848年创办,它的目的是把爱尔兰天主教僧侣吸引到英国统治阶级方面来,以此削弱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第63页。
- 67 马克思引自1853年4月16日发表在“人民报”上的厄内斯特·琼斯的文章“人民之友”。——第66页。
- 68 爱尔兰派是大不列颠议会中的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派的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翼和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着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在

托利党和辉格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爱尔兰旅同曼彻斯特派一起，能够动摇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影响议会内部斗争的进程，有时还决定政府的命运。——第 66 页。

- 69 曼彻斯特学派 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 1838 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 66 页。
- 70 英国的“知识税”（《Taxes on Knowledge》）包括报纸广告税、报纸印花税和纸张税。——第 66 页。
- 71 1851 年 12 月 2 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后，当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与法国驻伦敦大使会谈，赞成路易·波拿巴的篡位（马克思称路易·波拿巴为萨托里广场的英雄，是指 1850 年秋天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广场的军事检阅，路易·波拿巴想把这次检阅变成拥戴波拿巴的游行）。帕麦斯顿这样做没有商得辉格党内阁其他阁员的同意，结果使他于 1851 年 12 月提出辞职，而在原则上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顿的观点是没有分歧的，它在欧洲首先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权。1852 年 12 月阿伯丁联合内阁成立，帕麦斯顿任内务大臣，他对居住在英国的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政治流亡者发起了司法迫害和警察迫害，并在报刊上进行反对他们的诽谤宣传。流亡者的往来信件遭到暗中检查；英国内务部向奥地利及其他反动的大陆国家的警察当局提供有关流亡者的活动和计划的情报，帮助外国探踪追踪监视流亡者。帕麦斯顿用忠于宪法原则和民主原则的伪善词句来掩饰这些反革命行为。——第 67 页。
- 72 法国国王弗朗斯瓦一世 1525 年在帕维亚同西班牙国王和德国皇帝查理五世交战失败被俘后曾写信给母亲说：“除了名誉以外，一切都丢了。”——第 67 页
- 73 指 1818 年德国学者约·赛·埃尔希和约·哥·格鲁伯在莱比锡开始出

版的“科艺全书”（《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1890年完成，共167卷。——第67页。

- 74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本文时，于同号（1853年5月6日）报纸上就该文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本报读者在今日早晨的一期‘论坛报’上发表的本报伦敦通讯员马克思博士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对格莱斯顿先生预算的巧妙说明以及英国现有各党派对这个预算的态度。我们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碰到更为一针见血的对这个预算及其编制者的批评，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文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缺少“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两节。——第77页。

- 75 指1852年5月8日由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的代表会同丹麦的代表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王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该条约是以1850年7月4日伦敦会议的上述参加国（普鲁士除外）所通过的确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的议定书为基础的。伦敦议定书指出俄皇是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者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的名义在俄国称帝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彼得—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继承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把权利让给被宣布作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继承人的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后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断的情况下觊觎丹麦王位造成了先例。——第77页。
- 76 指1850年罗马教皇试图为英国指派天主教主教，此事激起了英国国教会和英国政府的反对。在1851年颁布了一项法律，宣布教皇的指派无效。——第77页。
- 77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十七世纪至1903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77页。
- 78 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德国广泛迷信招魂术。——第77页。
- 79 马克思稍加改动援引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出版的艾·约·西哀士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Qu'est-ce que le tiers-

- état?》)里下面一段话中的第一句。这段话是：“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得到什么？——一个地位。”——第 81 页。
- 80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编辑部所在地。——第 82 页。
- 81 梅费尔派或梅费尔激进派 是假激进派(摩耳斯沃思、贝尔纳·奥斯本等人)集团的绰号，他们实际上代表向民主派献媚的那一部分英国贵族。“梅费尔派”一词从伦敦豪华区之一的名称梅费尔而来，这个区是贵族的私邸区。——第 85 页。
- 82 指阿伯丁联合内阁，特别是这个内阁的内务大臣帕麦斯顿对侨居在英国的政治流亡者所持的反动立场，以及这个政府为奥地利及其他各国的警察当局效劳，帮助它们反对革命民主运动的行为(见注 71)。——第 86 页
- 83 根据英国议会通常的程序，在讨论有关弥补国家开支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下院即宣布作为筹款委员会(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开会。这是下院作为全院委员会开全体会议的一种场合(见注 65)。——第 88 页。
- 84 “瑞士的暴动”一节本来是恩格斯写的、由马克思寄往纽约的另一篇文章的一部分，“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发表马克思本文时，把这一部分也加了上去，本版按当时在“论坛报”刊载的形式刊印。恩格斯写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见本卷第 101—108 页)，由马克思署名发表在“论坛报”上。——第 96 页。
- 85 指“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49—456 页)。这篇文章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当时正忙于写“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一抨击性著作)，发表在“论坛报”上，由马克思署名，因为恩格斯不是该报的正式通讯员。——第 96 页。
- 86 马克思大概是指另一篇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下落。——第 98 页。

- 87 宗得崩德 是由瑞士 7 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 1843 年为了抗拒瑞士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而组成的分离派联盟。瑞士联邦议会 1847 年 7 月通过的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是宗得崩德在同年 11 月初对其他州发起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 年 11 月 23 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军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贵族上层当中领导过宗得崩德的反动分离派分子，在宗得崩德被击溃后仍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第 99 页。
- 88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这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之后接着又略加删节以“瑞士”为标题用德文刊载于 1853 年 6 月 1 日和 4 日的纽约“改革报”。从此以后，“改革报”就常常刊登马克思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的译文或摘要。在“改革报”上转载马克思载于“论坛报”的文章的，主要是前共产主义同盟的盟员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
- “改革报”（《Die Reform》）是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该同盟的多数成员是德国的流亡工人。该报从 1853 年 3 月 5 日至 1854 年 4 月 26 日在纽约用德文出版，起初每周出一期，后来每周出两次，从 1853 年 10 月 15 日改为日刊。该报的编辑之一是马克思的朋友和战友约瑟夫·魏德迈，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保持着激进的性质。该报时常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也约请自己的同志（埃卡留斯、皮佩尔、德朗克）为该报撰稿。这家报纸也受到编辑部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末期占了上风。——第 101 页。
- 89 指维也纳会议（1814 年 9 月—1815 年 6 月）。1815 年 3 月 20 日，几个大国，即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签署了一项关于保证瑞士“永久中立”的宣言。——第 101 页。
- 90 法国和瑞士的冲突发生在 1851 年 12 月—1852 年 1 月间，这次冲突是由于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驱逐法国的共和主义流亡者、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反对者而起的。在 1836 年，瑞士政府曾受到法国七月王朝的带有军事行动的威胁，因为当时瑞士政府让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路易

·波拿巴本人，在瑞士避难；这次，瑞士政府又像 1836 年一样，被迫作了重大的让步。

纽沙特尔（德文名是诺恩堡）是瑞士的一个州，这个州同时又是普鲁士君主国的藩属。由于 1848 年 2 月资产阶级革命，纽沙特尔州宣布脱离普鲁士，成立共和国。因此在普鲁士和瑞士共和国之间便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次冲突一直继续到 1857 年，只是由于其他大国特别是法国进行了外交干涉，普鲁士国王才被迫放弃了对纽沙特尔的要求。

奥地利与瑞士在 1853 年发生了冲突，原因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在 1853 年 2 月 6 日米兰起义失败后从奥地利统治下的那些意大利州，特别是从伦巴第州，流亡到瑞士的德森州居住。——第 102 页。

- 91 见恩格斯的“瑞士的内战”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 1847 年 11 月 14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上，该报从 1847 年秋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385—393 页）。——第 102 页。
- 92 1851 年在中国爆发了一个强大的农民战争性质的反封建的解放运动。这个运动从南方的广西省开始，后来扩展到华中各省，几乎席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起义者在战争过程中建立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于是整个运动就叫做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杀死统治中国的满族封建主，取消捐税，消灭大封建主所有制。这个起义也带有农民运动特别是东方的农民运动所常有的宗教色彩，打击支持满清王朝的佛教僧侣和寺院。太平天国革命给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外国侵略者的广泛斗争开了一个头，但它并没有消灭中国封建的生产方式。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了一个封建上层，他们与统治阶级妥协，这就成了运动衰落的原因之一。革命遭到的主要打击是英美法三国的公开干涉（最初这几个强国是打着“中立”的幌子援助满清王朝），它们的武装力量协同中国封建主们的军队，于 1864 年把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了。——第 109 页。
- 93 指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 年）。这是一次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从

这次战争开始，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战争的导火线是中国当局在广州焚毁了外国商人的鸦片。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封建落后的中国战败的机会，强迫中国签订掠夺性的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开放五个海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把香港岛割给英国作“永久的属地”，给英国巨额赔款。1843年又补充规定，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第111页。

- 94 指的是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影响。——第112页。
- 95 十七世纪初中国开始受到联合起来的满族各部落的威胁（它们同突厥—蒙古部族一起又叫鞑靼人，这个名称来自成吉思汗帝国形成时期居住在蒙古和满洲东北部的一个部落）。满族入关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满清王朝（1644—1912年）。由于明朝末年封建的国家发生危机，以及一部分中国封建主害怕农民起义而投到侵略者方面去，就使满族人得到有利的条件征服了中国。但是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在1683年以前一直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性质的。——第115页。
- 96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不全，缺少“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条款变更”这一部分。——第117页。
- 97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天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弗·沃尔弗，恩·德朗克，斐·莱里格拉特和格·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的革命的、重要问题的立场的那些社论，通常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来执笔的。

“新莱茵报”的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这一切使它在创刊

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特别是在普鲁士1848年10—12月的反革命政变之后,这种攻击和迫害更加厉害了。

尽管有这些迫害和警察局的百般刁难,“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取得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成了报纸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红色油墨印刷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编辑们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第118页。

98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是英国保守派的周报,从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19页。

99 印度三管区 是根据英属印度的行政区划,由东印度公司任命的省督管辖的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个地区的名称。根据1773年的印度管理法令,孟加拉省督升为印度境内所有英国领地的总督。

唐宁街 是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政府所在地。——第120页。

100 指自由贸易论者约翰·狄金逊于1853年3月创立的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第120页。

101 这是希腊正教教会和罗马教会之间一个多年的纠纷,即关于所谓“圣地”即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巴勒斯坦)的基督圣地的管辖权问题。这个纠纷在1850年又被路易·波拿巴挑起,不久就扩大成为沙皇俄国和法国之间的激烈的外交冲突,俄国保护正教教会的特权,法国支持天主教徒。双方都利用这一纠纷争夺近东霸权。摇摆不定的土耳其政府起初对法国的要求让步,但在1853年5月4日,在缅甸科夫到土耳其的时候,土耳其政府又被迫同意特别保障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相应的苏丹敕令是一个月以后颁布的)。与此同时,苏丹在英法两国大使的支持下,拒绝了尼古拉一世关于要求承认他是奥斯曼帝国正教居民的保护者的要求。——第121页。

- 102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的资产阶级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它是政府的报纸，是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它反映着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它是温和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马克思在本文中引用该报的一段话，对于缅施科夫递交最后通牒的日期报道得不确实，确实日期应该是1853年5月5日，而不是5月7日。——第121页。
- 103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俄国战胜后，两国于1774年7月21日（10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得到了阿速夫、刻赤和叶尼卡列，并且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合并克里木造成了方便的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苏丹应给予希腊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第十四款关于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正教教堂的规定。——第122页。
- 104 指1853年奥地利同皮蒙特（撒丁）断绝外交关系一事，断绝外交关系的原因，是由于皮蒙特当局给予从伦巴第（受奥地利管辖）流亡到撒丁的那些参加过1848—1849年民族解放运动和1853年2月6日米兰起义的人以保护。——第125页。
- 105 “巴黎革命”（《Révolutions de Paris》）是法国革命民主派的周报，该报从1789年7月到1794年2月在巴黎出版。——第125页。
- 106 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宣布自己是法国皇帝以后，尼古拉一世根据同奥地利宫廷和普鲁士宫廷的约定，对路易·波拿巴没有使用“正统”君主间通常的称呼“国王陛下和亲爱的兄弟”，而使用了“国王陛下和善良的朋友”这个称呼，并且没有称他为“皇帝拿破仑三世”，而称之为“皇帝路易·拿破仑”。奥地利宫廷和普鲁士宫廷则违反约定，对法国皇帝使用了通常的称呼，但它们也都强调必须遵守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此暗示路易·波拿巴政权不合法，因为维也纳会议决定不许波

- 拿巴王朝占据法国王位。——第 126 页。
- 107 “祖国报”（《La Patri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创办于 1841 年；该报 1850 年代表着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 126 页。
- 108 “新闻报”（《La Presse》）是一家资产阶级日报，从 1836 年起在巴黎出版；1848—1849 年它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报纸，后来又成为反波拿巴的报纸；该报的编辑是艾米尔·德·日拉丹。——第 126 页。
- 109 比尤克德利 是位于君士坦丁堡附近博斯普鲁斯海岸的一个别墅区，俄国驻土耳其使馆的避暑官邸就在那里。——第 126 页。
- 110 “世纪报”（《Le Siècle》）是从 1836—1839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日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反映一部分只限于要求温和宪制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在五十年代，它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 127 页。
- 111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这篇文章的前两段缺。——第 132 页。
- 112 这里所说的那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发现。——第 132 页。
- 113 指“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它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798 年创刊，从 1810 到 1882 年底在奥格斯堡出版。——第 133 页。
- 114 指 1853 年出版的爱·斐·波蒙—瓦西著作的第 6 卷，这部著作的名称是“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各国历史”，1843—1853 年巴黎版，共 6 卷（《Histoire des États européens depuis le Congrès de Vienne》，t. 1—6, Paris, 1843—1853）。第 6 卷的标题是“俄罗斯帝国”（《Empire Russe》）。马克思在下面引用的是该卷第 346—347 页。——第 134 页。
- 115 指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这本小册子中的“北方”

《The North》)篇第二部分《The Danish succession》)。马克思写的这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出现。——第 135 页。

- 116 威斯利派或美以美教派，是约翰·威斯利于十八世纪在英国创立的一个教派；十八世纪末脱离英国国教会，并作为新教的一个变种在美国和加拿大得到广泛的传播。威斯利教派的特点是要求严格地、系统地履行宗教仪式和教会的其他规定。——第 137 页。
- 117 马克思在撰写本文时用了恩格斯 1853 年 6 月 6 日写给他的信中所叙述的某些见解。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本文缺少前两段。——第 143 页。
- 118 林加崇拜 即对湿婆神的崇拜，盛行于南印度的林加崇奉者教派中（“林加”是湿婆的象征）。这一印度教派不承认种姓的划分，反对斋戒、祭祀和朝圣。

札格纳特 是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第 144 页。

- 119 莫卧儿 是十六世纪初叶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 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卧儿帝国（大莫卧儿是这个帝国的王朝的名称）。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莫卧儿帝国的势力扩张得很大，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大莫卧儿帝国便衰落下去，到十八世纪的上半世纪实际上已完全瓦解。

七国争雄 是英国史编纂学中用以表示英国在中世纪初期的政治体制的术语，当时英国分为七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六至八世纪）。马克思在这里借用这个名词来表示德干（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穆斯林侵入以前的封建割据状态。——第 114 页。

- 120 位于孟买北部的萨尔赛达岛，以 109 座佛教石窟而闻名。——第 144 页。
- 121 “听之任之”（《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主张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第 146 页。
- 122 马克思所引用的是 1812 年发表的下院委员会的报告。引文摘自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 年伦敦版，第 84—85 页（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84—85）。——第 148 页。
- 123 “地球报”（《The Globe》）是英国的一家每天出版的晚报“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 年起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报纸；1866 年起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 152 页。
- 124 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律，是 1847 年 6 月 8 日英国议会通过的。禁止以实物作工人的劳动报酬的法律是 1831 年通过的。但在实际上许多工厂主都不遵守这些法律。——第 152 页。
- 125 指 1825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结社法或工人联合法。这项法律重申废除议会在 1824 年禁止工人团体（工联）的决定，但严格限制工人的活动。例如，仅仅宣传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就被看做“强制”和“暴力”，给以刑事惩罚。——第 152 页。
- 126 指 1846 年 8 月 2 日在黑石山脊宪章派组织的群众大会。琼斯当时要去参加的群众大会是 1853 年 6 月 19 日举行的。——第 152 页。
- 127 “新闻报”（《The Press》）是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机关报，1853 年至 1866 年在伦敦出版。——第 155 页。
- 128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本文不全，缺少“预算。——报纸附刊税。——议会的舞弊”这几节。——第 160 页。
- 129 指 1853 年 5 月 4 日“圣地”问题（见注 101）解决以后缅甸科夫以最

后通牒的形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俄土条约草案。草案规定，不仅要保证土耳其帝国的正教居民的宗教自由，而且还要实际承认俄国沙皇对他们的保护权。这一草案被苏丹拒绝。——第 161 页。

- 130 1812 年俄国和土耳其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确认两国过去关于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权所达成的协议，确认早在 1774 年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所规定的俄国保护多瑙河各公国的正教居民利益的权利。根据 1829 年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内政管理的一切事务中都有自治权，并且实际建立了俄国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俄国还得到了占领这两个公国、干预它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君人选的权利。——第 162 页。
- 131 巴尔塔利曼尼条约 是俄国和土耳其在派军队进驻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镇压革命运动以后，于 1849 年 5 月 1 日（4 月 19 日）签订的协议。根据这一条约，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危机完全消除的时候（外国军队直到 1851 年才撤出这些公国），并且暂时地实行了由苏丹征得沙皇同意后任命国君的原则；条约还规定，如革命重起，俄国和土耳其应采取包括再一次进行军事占领的许多措施。马克思在下文中引用的是条约第四条的内容，文字是经过马克思通俗化的。——第 162 页。
- 132 1841 年公约 是 1841 年 7 月 13 日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在伦敦签订的关于黑海海峡的公约。公约规定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期间对外国军舰封锁。公约没有涉及战时的海峡制度，因而土耳其有理由在战时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军舰通过。——第 163 页。
- 133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 年到 1857 年在巴黎出版。——第 164 页。
- 134 指涅谢尔罗迭总理大臣 1853 年 5 月 31 日（19 日）给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的一封信。这封信把缅甸科夫使团的失败归罪于土耳其政府，并且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接受缅甸科夫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以前所提出的关于保证苏丹的希腊正教臣民的特权的要求，既要求实际建立沙皇对他们的保护权。涅谢尔罗迭以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威胁，暗示

在最后通牒遭到拒绝时将出兵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列施德—帕沙 1853 年 6 月 16 日（4 日）的回信中，土耳其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拒绝了沙皇政府的要求。——第 165 页。

- 135 “马赛信号报”（《Le Sémaphore de Marseille》）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27 年到 1945 起年在马赛出版。——第 165 页。
- 136 七年战争（1756—1763）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国和法国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的竞争。两国之间的军事行动，除海战外，首先是在这两国的美洲和亚洲殖民地的领土上进行的。在东方的主要战区是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里对法国人及其走卒——印度王公作战，大大增加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利用战争侵占了许多印度领土。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丧失了几乎所有在印度的领地（只剩下五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的工事都必须毁掉）；英国的殖民势力大大加强了。——第 168 页。
- 137 詹姆斯·穆勒“英属印度史”（J. Mill.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dia》），1812 年出第 1 版。在 1858 年的版本中，马克思所引用的地方见第 5 卷第 6 册第 60 页和第 65 页；上面关于督察委员会的权限的引文，也是引自穆勒的这本书（1858 年版第 4 卷第 5 册第 395 页）。——第 170 页。
- 138 指 1832 年 6 月英国议会进行的对选举权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反对土地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这次改革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开辟了道路。这一斗争中的主力即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欺骗，没有得到选举权。——第 170 页。
- 139 马克思列举的这几次侵略战争，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侵占印度领土和实行殖民奴役而在印度进行的战争，这几次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打倒主要的殖民地竞争者——法国东印度公司。

卡尔纳梯克（印度东南部的一个王国）战争从 1746 年起，停停打打，直到 1763 年。交战双方——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法国殖民主义者都以支持在这个王国中争权夺势的地方人物为名，进行着征服卡尔纳梯

克的斗争。最后英国人取得了胜利，他们早在 1761 年 1 月就占领了法国在印度南部的主要据点庞迪契里。

1756 年，孟加拉的纳瓦布为了防止英国人入侵他的领地，对英国人开战，夺取了英国人在印度东北部的根据地加尔各答。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克莱夫的指挥下，很快又重新占领了加尔各答，摧毁了支持纳瓦布的法国人在孟加拉的工事设施，并于 1757 年 6 月 23 日在普拉西打败了纳瓦布的军队。1763 年，在沦为公司附属领地的孟加拉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被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下去。英国人在占领孟加拉的同时又占领了属孟加拉纳瓦布管辖的恒河中游省份比哈尔，1803 年征服了孟加拉以南的奥里萨，这片领土上的几个封建王国都落到了公司手中。

在 1790—1792 和 1799 年，东印度公司同南印度的一个独立的封建王国迈索尔进行战争。这个王国的首脑是提普·萨希布，他在过去就曾参加过迈索尔同英国人的战争，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死敌。第一次战争的结果，迈索尔的一半领土被公司和与公司结盟的封建王公侵占。第二次战争迈索尔彻底失败，提普死，迈索尔沦为藩属王国。

军费补助金制度，或称军费补助合同制度，是东印度公司把印度各王国的统治者变成它的藩臣的形式之一。有的合同规定王公必须供养（补助）驻扎在他们领土上的公司的军队；还有些合同硬把一些附有盘剥条件的贷款强贷给王公，不履行这些条件就没收领地。上述这些合同是最常见的合同。——第 171 页。

140 关于征服信德和旁遮普，见注 21。——第 171 页。

141 托·曼·“英印贸易论：兼答通常反对贸易的各种异议”，1621 年伦敦版（T. M [un]. 《A Discourse of Trade, from England into the East-Indies: Answering to diverse Objections which are usually made against the same》. London, 1621）。——第 172 页。

142 [J. Child]. 《A Treatise Wherein is Demonstrated I. That the East-India Trade is the most National of all

- Foreign Trades》. London, 1681. 用 φῶν ἀτρίς (爱国者) 笔名发表。——第 172 页。
- 143 约翰·波累克斯芬] “英印工业生产不相容, 兼答 ‘东印度贸易概论’ 一书”。1697 年伦敦版 ( [J. Pollexfen]. 《England and East-India Inconsistent in their Manufactures. Being an answer to a treatise, intituled, an Essay on the East-India Trade》. London, 1697)。——第 172 页。
- 144 十九世纪初, 英国殖民主义者就着手征服缅甸, 第一次缅甸战争 (1824—1826) 的结果, 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占领了与孟加拉交界的阿萨姆省和沿海的阿拉干、典那沙冷。第二次缅甸战争 (1852) 使英国人占领了勃固省。由于第二次缅甸战争结束之后没有签订和约以及于 1853 年 2 月即位的新的缅甸国王不承认勃固被占, 所以在 1853 年人们估计会对缅甸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第 175 页。
- 145 约翰·狄金森: “官僚当局对印度的管理”。1853 年伦敦—曼彻斯特版, 第 50 页 (J. Dickinso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a Bureaucracy》. London—Manchester, 1853, p. 50)。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 (India Reform) 出的第 6 册书。——第 176 页。
- 146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缺少有关“印度问题”这一节即本文第一段。——第 177 页。
- 147 马克思批评的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在 1853 年 6 月 25 日“泰晤士报”上。——第 178 页。
- 148 F.W. Newman.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1, p. 137, 141。——第 182 页。
- 149 赫·斯宾塞“社会静力学, 或论人类幸福的重要条件及对这些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的详细分析”, 1851 年伦敦版第 114—116、122、123、125 页 (H. Spencer. 《Social Statics: or The Conditions Essential to Human Happiness Specified, and the First of Them Developed》. London, 1851, pp. 114—116, 122, 123, 125)。——第

- 183 页。
- 150 本文的第二个标题（“英国的工人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加。——第 184 页。
- 151 “绥靖希腊”是欧洲列强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希腊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时期干涉土希冲突时在外交文件中的用语。——第 185 页。
- 152 引自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资料汇编《Portfolio》中 1826 年 12 月 22 日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一份报告。这一套名为“文件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的丛刊于 1835—1837 年出版；另一套名为“文件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丛刊于 1843—1845 年出版。马克思援引的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信发表于“文件集”1836 年伦敦版第 1 卷第 7、8、9 期，第 2 卷第 13 期及“文件集”1843 年伦敦版第 2 卷第 2 期。——第 185 页。
- 153 关于 1827 年 7 月 6 日的伦敦条约（公约）见注 47。——第 185 页。
- 154 涅谢尔罗迭 1853 年 6 月 11 日（5 月 30 日）的照会是发给俄国驻外使节的一份周知照会，它表述了沙皇政府鉴于缅施科夫使团所得的结果而采取的立场。涅谢尔罗迭在严厉抨击土耳其政府的行动的同时，申述了俄国向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沙皇为苏丹的正教臣民的保护者的理由。照会还威胁说，如果土耳其拒绝这一要求，俄国将采取“坚决措施”。——第 187 页。
- 155 指 1840 年 7 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年代会员达到 4 万人。协会的活动表明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领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1848 年宪章派失败后，革命宪章运动的先进的、倾向于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厄·琼斯，试图在五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组宪章运动。这一点在 1851 年的宪章派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有所反映。在五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暂时得势和宪章运动走向低潮，协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第 192 页。

- 156 盖米季于 1853 年 6 月 19 日在黑石山脊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引自 1853 年 6 月 25 日的“人民报”。——第 193 页。
- 157 琼斯于 1853 年 6 月 19 日在黑石山脊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引自 1853 年 6 月 25 日的“人民报”。——第 195 页。
- 158 见注 126。——第 195 页。
- 159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不全，缺少“土耳其战争问题”这一节。——第 197 页。
- 160 引自“文件集”1836 年伦敦版第 4 卷第 27 号第 10—12 页。——第 198 页。
- 161 “维也纳劳埃德氏报”(Wiener Lloyd)是奥地利保守派报纸，1848 年 9 月起在维也纳刊行，一直出版到 1854 年。——第 198 页。
- 162 布莱特指 1853 年 5 月 6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及这一号上刊载的马克思的文章“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见本卷第 77—86 页)。——第 199 页。
- 163 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 年伦敦版第 263—264 页(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263—264)。——第 205 页。
- 164 撒提 是印度过去的一种风俗，即把寡妇同丈夫的遗体一起烧掉。——第 206 页。
- 165 印度大厦(或东印度大厦)是伦敦东印度公司管理机关的所在地，在莱登霍尔街。——第 207 页。
- 166 G. Campbell. 《A Scheme for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London, 1853. ——第 207 页。
- 167 这里指参加英国内阁的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印度事务大臣一职是东印度公司 1858 年撤销后设置的。——第 208 页。
- 168 J. Dickinso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a bureau-

- cracy》. *India Reform* № VI, London—Manchester, 1853, p. 15—16. — 第 208 页。
- 169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215. — 第 208 页。
- 170 引自 J. Dickinso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a bureaucracy》. *India Reform* № VI, London—Manchester, 1853, p. 15. — 第 209 页。
- 171 指 1845—1851 年英国考古学家累亚德所进行的古亚述的首都——尼尼微的发掘工作。—— 第 210 页。
- 172 指马克思的“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09—615 页）。—— 第 213 页。
- 173 见马克思的“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69—576 页）。—— 第 214 页。
- 174 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马克沃姆”（*muckworm*）这个英国词的意思是粪蛆，这里讽刺性地用了它的转义——“守财奴”、“吝啬鬼”。—— 第 214 页。
- 175 济贫法是 1834 年通过的法律，它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帮助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从事苦役的牢狱中的制度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 第 214 页。
- 176 1850 年 8 月 5 日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为十小时半，并确定了工作日的起止时间。这项法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工人们抗议高等控诉院所作的关于工厂主违反 1847 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律一案的决定，这项决定事实上是准许了这种犯法行为。1850 年的法令禁止工厂主采用轮班工作制规避 1847 年法律，但同时却使延长工作日半小时成为合法的东西。—— 第 216 页。

- 177 见注 80。——第 217 页。
- 178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教派于 1816 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了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第 218 页。
- 179 暗示帕麦斯顿对 1847 年英希冲突所采取的立场。这次冲突是由于英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而引起的。英国政府以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被焚毁为借口，把自己的舰队派往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帕麦斯顿在议会上发表侵略性的演说，为英国的行动辩解，认为必须维护英国臣民的声望并把英国的臣民同古罗马的公民相比。帕麦斯顿所使用的“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一语意味着种种特权和罗马公民身分所给予的尊贵地位。——第 219 页。
- 180 指所谓的“士麦那事件”，它是 1853 年夏季由于奥地利驻士麦那领事命令逮捕美籍匈牙利流亡者科斯塔而发生的。科斯塔被捕后，即被押往奥地利的“骠骑兵号”军舰。因此，流亡者同某些奥地利的海军军官在士麦那发生了一场武装冲突。美国的“圣路易号”军舰的舰长英格拉哈姆干涉了这个事件，他依照美国驻君士坦丁堡临时代办布朗的意见，用最后通牒方式要求奥地利军舰的舰长释放科斯塔。由于其他强国的领事进行干涉，武装冲突被及时制止。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科斯塔获释，回到美国。——第 220 页。
- 181 见注 103。——第 221 页。
- 182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 1833 年 7 月 8 日（6 月 26 日）缔结的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登陆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埃及起义军首领穆罕默德-阿利的军队。1833 年 5 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利缔结了和约，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利。尽管苏丹的直接危险已经过去，但沙皇的外交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

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并且在从法律上固定这个同盟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文:土耳其必须禁止任何外国军舰通过海峡,而俄国军舰除外。这项条文一直生效到 1839—1841 年新的埃及危机(见注 8)发生的时候,这时尼古拉一世同英国以及其他强国商讨对付穆罕默德—阿利的共同行动,由于列强的坚持,尼古拉一世才承认在和平期间禁止一切国家的军舰通过海峡的原则。——第 222 页。

- 183 卡夫丁峡谷 (Furcae Caudinae) 在卡夫丁城 (古罗马) 附近。公元前 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那里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第 222 页。
- 184 1872 年以前在英国,在候选人提名日,表决是用举手方式进行的,没有选举权的人也能参加表决。但是在选举日,被举手否决了的候选人还能当选,参加表决的只有极少数符合巨额财产资格、居住时间资格等等条件的“合法”选民。——第 223 页。
- 185 见注 100。——第 224 页。
- 186 交易所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南海公司管理机关所在地。它是各种金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重要场所之一。——第 224 页。
- 187 纳瓦布和拉甲是印度王公的称号。札吉达尔是大莫卧儿帝国的伊斯兰教封建贵族的代表,他们曾得到暂时使用的巨大的领地(札吉),因此,他们必须服兵役和提供一定名额的军队。在大莫卧儿帝国瓦解时期,札吉达尔变成了世袭的封建领主。——第 225 页。
- 188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64. ——第 226 页。
- 189 大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巴卑尔 (1483—1530) 认为自己是帖木儿的后裔,而后者则以成吉思汗的子孙自命。在十八世纪帝国瓦解以后,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们是个别省督、阿富汗侵略者和印度大封建主的傀儡。在

- 1803年英国人占领德里以后，他们就充当东印度公司的傀儡，领取该公司的赡养费。1858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印度是不列颠王国的领地之后，莫卧儿王朝在名义上的一点权力便彻底消灭了。——第227页。
- 190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缺少“缅甸战争”这一节即本文前两段，另外还缺少从“接着就进行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起这一段（见本卷第229—230页）。——第228页。
- 191 见注144。——第228页。
- 192 汉普敦宫是伦敦附近太晤士河畔的一座宫殿，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是英国国王的王宫。——第228页。
- 193 见注179。——第229页。
- 194 指1853年6月11日（5月30日）涅谢尔罗迭的周知照会（见注154）和1853年6月25日德鲁安·德·路易斯的周知照会，后者论述了法国在东方问题上反对沙皇政府的做法的理由。——第230页。
- 195 指1841年7月13日以保证土耳其领地不受侵犯为名而缔结的关于在和平期间禁止外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的伦敦公约（见注132）。公约废除了对俄国有利的1833年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这项条约规定向俄国军舰开放黑海海峡。然而沙皇政府由于从1840年起就承担义务参加四大国（俄、英、奥、普）反对法国支持的穆罕默德—阿利的集体行动，就不能不承认西方列强提出的黑海海峡“中立化”的原则，并在1841年的公约上签字。法国深恐形成反法同盟，被迫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也参加了公约。——第230页。
- 196 在1839年土埃冲突（见注8）时，沙皇俄国政府想利用英法矛盾的尖锐化，于1839年9月通过俄国外交官布隆诺夫建议帕麦斯顿签订一项协议，名义上是共同援助苏丹，实际上是划分俄英两国在近东的势力范围。而英国政府力图独占在土耳其的霸权，借口东方问题必须达成全欧协议，拒绝了 this 建议。——第232页。
- 197 指国外交大臣德鲁安·德·路易斯于1853年7月15日对1853年7月2日（6月20日）涅谢尔罗迭发给俄国驻外使节的周知照会的复照。

在这些文件中,俄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在挑起冲突上相互指责。涅谢尔罗迭在其照会中断言,英国和法国首先举行含有敌意的示威,它们还在俄军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之前就已把舰队派往海峡。德鲁安·德·路易斯在复照中则认为,冲突的责任应由俄国承担。——第 237 页。

- 198 “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是“国家报”(《Le Pays》,见注 34)的小标题。——第 238 页。
- 199 指改革政策的反对者所策划的反对阿卜杜-麦吉德苏丹的阴谋。改革政策的基础是阿卜杜-麦吉德于 1839 年颁布的诏书。诏书中答应实行某些改革,调整税收制度,保障臣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等等。新政策的目的是采取与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妥协的办法,巩固君主制度。虽然上述的改革极为有限,但在试图实行这些改革时,却遭到以苏丹的弟弟阿卜杜-阿吉兹为核心的反动派的拚命反抗。——第 239 页。
- 200 指驻多瑙河俄军司令哥尔查科夫对英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居民的告示。告示是 1853 年夏占领公国时发表的。告示说:俄军进入多瑙河各公国,其目的不是更改过去条约中已对公国作了保证的政治机构和制度。——第 239 页。
- 201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从 1802 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动期间,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第 240 页。
- 202 收税官是英国在印度的官员,他行使地方官、地方首席法官和主管收税人的职权。——第 243 页。
- 203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359. ——第 243 页。
- 204 马克思引自阿耳比马尔 1853 年 7 月 1 日在上院就 1853 年 7 月 2 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报告所作的发言。——第 245 页。
- 205 马拉提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这个部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异族统治,他

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十七世纪末，马拉提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十八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提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提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马拉提封建主的内部纠纷而弄得精疲力尽的诸马拉提王国，在1803—1805年英国—马拉提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第246页。

- 206 约·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及其与大不列颠的利害关系，兼评孟买管区的铁道交通”1851年伦敦版第91页(J. Chapman. 《The Cotton and Commerce of India,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Great Britain; with remarks on railway communication in the Bombay presidency》. London, 1851, p. 91)。——第249页。
- 207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59—60. ——第250页。
- 208 马克思引自阿·德·萨尔梯柯夫的著作“关于印度的通信集”1848年巴黎版第61页(《Lettres sur l'Inde》. Paris, 1848, p. 61)。俄文本于1851年在莫斯科出版。——第251页。
- 209 札提是北印度的一个种姓集团；它的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封建等级的代表。在十七世纪，农民—札提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外来的莫卧儿封建主的统治。
- 婆罗门是印度四个古代种姓之一，最初基本上是享有特权的僧侣等级；后来，像其他印度种姓一样，除僧侣之外，还包括各行各业和有社会地位的人，但不包括贫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第251页。
- 210 奥里萨(东印度)的札格纳特庙是崇拜印度教大神之一毗湿奴—札格纳特(见注118)的中心。庙里的僧侣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从群众的朝山以及从举行豪华的祭祀中取得很大的收入。在群众朝山时，他们鼓励靠庙生活的女人卖淫，而在举行祭祀时，则有一些宗教狂热者自杀

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十七世纪末，马拉提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十八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提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提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马拉提封建主的内部纠纷而弄得精疲力尽的诸马拉提王国，在1803—1805年英国—马拉提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第246页。

- 206 约·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及其与大不列颠的利害关系，兼评孟买管区的铁道交通”1851年伦敦版第91页(J. Chapman. 《The Cotton and Commerce of India,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Great Britain; with remarks on railway communication in the Bombay presidency》. London, 1851, p. 91)。——第249页。
- 207 G.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p. 59—60. ——第250页。
- 208 马克思引自阿·德·萨尔梯柯夫的著作“关于印度的通信集”1848年巴黎版第61页(《Lettres sur l'Inde》. Paris, 1848, p. 61)。俄文本于1851年在莫斯科出版。——第251页。
- 209 札提是北印度的一个种姓集团；它的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封建等级的代表。在十七世纪，农民—札提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外来的莫卧儿封建主的统治。
- 婆罗门是印度四个古代种姓之一，最初基本上是享有特权的僧侣等级；后来，像其他印度种姓一样，除僧侣之外，还包括各行各业和有社会地位的人，但不包括贫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第251页。
- 210 奥里萨(东印度)的札格纳特庙是崇拜印度教大神之一毗湿奴—札格纳特(见注118)的中心。庙里的僧侣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从群众的朝山以及从举行豪华的祭祀中取得很大的收入。在群众朝山时，他们鼓励靠庙生活的女人卖淫，而在举行祭祀时，则有一些宗教狂热者自杀

认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提安公爵作继承人。新法律间接确认了沙皇王朝的代表即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彼得三世)的男系后裔有继承丹麦王位的权利。——第 258 页。

218 见注 41。——第 261 页。

219 黎塞留在自己的“政治遗教”(1633)中阐述了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内外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则,竭力为他扩张法国疆界和夺取欧洲霸权的野心找根据。

查理大帝敕令是作为法兰克王国的主要立法文献之一的国王训旨。——第 262 页。

220 十一世纪末,在小亚细亚的东部,由于土耳其奥古兹人占领了该地区,出现了以伊康尼城(古称科尼亚城)为中心的土耳其封建国家。在塞尔柱王朝领导下的伊康尼苏丹王国进行了反对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斗争。到十三世纪后半叶,由于蒙古的入侵使苏丹王国受到了打击,又由于封建割据日益增长,它实际上已解体,分成了许多单个的独立公国。和拜占庭接壤的诸公国中,有一个公国位于安那托里亚的西北区,由部落领袖奥斯曼领导,成了后来新的土耳其国家——奥斯曼(奥托曼)帝国的核心。在十四世纪,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不仅有伊康尼苏丹原来的领地,而且还有被土耳其人夺取来的邻国的领土。在 1453 年,即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土耳其奥斯曼人占领了拜占庭皇帝的最后一个堡垒——君士坦丁堡,并把它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京都。——第 262 页。

221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论文,载于 1851—1852 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115 页)。这一组论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之约而写的,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些文章在“论坛报”上发表时是用的马克思的署名。——第 263 页。

222 理·科布顿“印度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缅甸战争的起因”1853 年伦敦版(R.Cobden.《How Wars are Got Up in India.The Origin of the Burmese War》.London, 1853)。——第 265 页。

- 223 由于俄土关系的尖锐化, 1853年7月24日由奥地利政府发起, 在维也纳召开了一个有奥地利代表和英、法、普三国大使参加的会议, 以便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实行调停。会议制定了一个和解性的致俄国沙皇和土耳其苏丹的照会(所谓的维也纳照会)。照会规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 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 照会首先应该递交沙皇, 然后在沙皇对照会表示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内容, 同时保留了自己可以随意解释照会的权利; 但是阿布杜—麦吉德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沙皇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保留条件, 作为他同意签署照会的先决条件。——第266页。
- 224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848—1915年在柏林出版。该报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第266页。
- 225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是德国的一家日报, 1792年在汉堡创办。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它反映了争取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 在十九世纪末叶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第267页。
- 226 独立农是俄罗斯帝国的一类特殊的国家农民, 他们是过去保卫莫斯科王国边疆的低级军职人员, 在边疆分成单户定居, 既是军人又是农民。——第268页。
- 227 埃德尔党或埃德尔丹麦人党是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丹麦的自由主义党派, 它坚持什列斯维希公国(埃德尔河以北)同丹麦完全合并。同时这个党派又力图把主要为德国人居住的霍尔施坦公国与丹麦隔绝, 这反映了丹麦资产阶级害怕霍尔施坦工业的竞争。因此, 这个自由主义的党派便反对实行对丹麦王国各部分都适用的王位继承法。——第269页。
- 228 指“农民之友协会”, 这是丹麦的一个党派, 创建于1846年。协会的目的是: 把农民依据封建租佃权所使用的土地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 颁布一些有利于富裕农民的市政法。——第269页。

- 223 由于俄土关系的尖锐化, 1853年7月24日由奥地利政府发起, 在维也纳召开了一个有奥地利代表和英、法、普三国大使参加的会议, 以便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实行调停。会议制定了一个和解性的致俄国沙皇和土耳其苏丹的照会(所谓的维也纳照会)。照会规定苏丹有义务遵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和阿德里安堡条约, 保障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腊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不受侵犯。根据会议的决定, 照会首先应该递交沙皇, 然后在沙皇对照会表示首肯的情况下再递交苏丹。尼古拉一世同意了照会的内容, 同时保留了自己可以随意解释照会的权利; 但是阿布杜—麦吉德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沙皇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保留条件, 作为他同意签署照会的先决条件。——第266页。
- 224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848—1915年在柏林出版。该报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第266页。
- 225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是德国的一家日报, 1792年在汉堡创办。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它反映了争取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 在十九世纪末叶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第267页。
- 226 独立农是俄罗斯帝国的一类特殊的国家农民, 他们是过去保卫莫斯科王国边疆的低级军职人员, 在边疆分成单户定居, 既是军人又是农民。——第268页。
- 227 埃德尔党或埃德尔丹麦人党是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丹麦的自由主义党派, 它坚持什列斯维希公国(埃德尔河以北)同丹麦完全合并。同时这个党派又力图把主要为德国人居住的霍尔施坦公国与丹麦隔绝, 这反映了丹麦资产阶级害怕霍尔施坦工业的竞争。因此, 这个自由主义的党派便反对实行对丹麦王国各部分都适用的王位继承法。——第269页。
- 228 指“农民之友协会”, 这是丹麦的一个党派, 创建于1846年。协会的目的是: 把农民依据封建租佃权所使用的土地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 颁布一些有利于富裕农民的市政法。——第269页。

- 241 上院议员根据中世纪的传统必须向王室宣读庄严的誓言（效忠誓）。同时，中世纪的1215年自由大宪章授权英国封建主在他们的封建特权遭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第285页。
- 242 指英国于1846—1847年葡萄牙人民起义反对国内反动制度期间，支持在葡萄牙统治的科堡王朝的支系。这次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第288页。
- 243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是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于1848—185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289页。
- 244 “先驱”（《The Lead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50年创办于伦敦。——第289页。
- 245 “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289页。
- 246 指戴·乌尔卡尔特1853年8月11、12、15和16日在“晨报”上发表的文章。——第291页。
- 247 马克思答应写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没有看到。——第291页。
- 248 “圣彼得堡消息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іе вѣдомости》）是俄国的日报，政府的机关报；1728—191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14—1917年改称“彼得格勒消息报”。——第292页。
- 249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联合构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9月30日）和布伦（1840年8月6日）曾试图举行叛乱以及在1851年十二月二日在巴黎举行了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294页。
- 250 1852年土耳其和门的内哥罗发生武装冲突，门的内哥罗在名义上一直是苏丹的藩属，它力求脱离苏丹而获得完全的独立。俄国要调停这次冲

突，但被土耳其政府拒绝。1853年初，土耳其军队在奥美尔—帕沙率领下侵入门的内哥罗境内。奥地利政府担心门的内哥罗的战事和俄国保护门的内哥罗的举动会引起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地区的骚乱，急忙派遣莱宁根伯爵率领一个特派使团到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军队从门的内哥罗撤退并恢复冲突前的状态。当时奥地利军队集结在门的内哥罗边境，于是土耳其政府就被迫让步，同意接受莱宁根提出的条件，停止军事行动。——第 294 页。

- 251 见注 250。——第 296 页。
- 252 除了俄土条约的草案（这项条约的条款使沙皇成为苏丹的正教臣民的保护者）以外，缅施科夫公爵还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单独签订一个共同防御同盟的秘密条约。这一条约的草案规定：一旦某强国企图用武力阻挠实现上述关于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特权的协定，俄皇将给予苏丹武装援助。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德国的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支持下，拒绝了条约的草案，也拒绝了秘密防御条约的草案。——第 300 页。
- 253 指 1853 年 6 月 16 日（4 日）土耳其外交大臣列施德—帕沙对俄国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 1853 年 5 月 31 日（19 日）的信（参看注 134）的答复。列施德—帕沙在他的答复中拒绝了涅谢尔罗迭信中所提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和指责。同时他通知俄国，苏丹准备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到彼得堡解决冲突，商定一个不削弱苏丹主权而又确认土耳其的希腊正教教会权利的办法。——第 301 页。
- 254 航运法（Navigation laws）是 1651 年和以后几年中通过的禁止用外国船只运输英国商品的法令；这些法令于 1849 年废除。——第 310 页。
- 255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只刊载了本文的后半部，即从“1853 年的议会会议已于上星期六结束……”起（见本卷第 316 页）的一部分。——第 313 页。
- 256 “君士坦丁堡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是一家土耳其报纸，从 1846 年起用法文出版，由土耳其政府给予津贴，是一个半官方报纸，同时也是法国影响在土耳其的传导者。每月出版 6 次。——第 315 页。

- 257 “圣彼得堡报”（《St. — Petersburger Zeitung》）是 1727—1914 年用德文出版的日报。——第 315 页。
- 258 指波兰流亡者的右翼保皇派，其中心是亚当·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在巴黎的私邸——“拉姆倍尔寓所”。波兰的流亡贵族也居住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第 316 页。
- 259 指帕麦斯顿在波兰爱国者 1846 年 2 月企图在波兰发动起义以实现波兰的民族解放未能成功以后对克拉科夫的地位安排问题所采取的立场。起义的主要发起者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小贵族分子的叛卖行为以及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了起义的领导者，未能实现普遍起义，只是发生了零星的小的革命暴动。只有在克拉科夫（根据维也纳条约，该城于 1815 年被宣布为受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保护的自由城市），起义者于 2 月 22 日获得了胜利并且建立了民族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 1846 年 3 月初被镇压了下去。1846 年 11 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在维也纳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从 1846 年 7 月起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拒绝了法国关于联合抗议这项条约的建议，并且在 1846 年 11 月 23 日的信中向维也纳当局示意，英国不打算保护克拉科夫共和国，同时又伪善地呼吁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放弃它们对克拉科夫的野心。——第 316 页。
- 260 指皮尔派、辉格党人和所谓的梅费尔激进派（关于梅费尔激进派见注 81）于 1852 年春在伦敦切舍姆街的约翰·罗素私邸达成的协议。协议规定了对得比的托利党内阁实行共同的反对派的路线，并且规定了一旦得比内阁垮台组织联合内阁的条件。1852 年 12 月成立阿伯丁联合内阁时，在切舍姆街缔结的同盟仍然是有效的，因此辉格党和皮尔派的首领占据了内阁中最重要的职位，而梅费尔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也分到了一些职位。——第 318 页。
- 261 “泰晤士周报”（《Weekly Times》）是英国自由派的一家周报，1847 年至 1885 年在伦敦用这个名称出版。——第 320 页。
- 262 1853 年 8 月 23 日“晨报”发表了署名为“弗·马·”（反动政论家、乌

尔卡尔特的拥护者弗兰西斯·马尔克斯)的短评“俄国间谍巴枯宁”,短评给巴枯宁加上了与沙皇政府有联系的罪名。次日,8月24日,该报刊登了戈洛文(他曾在8月14日在“晨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短评,这篇短评成了“弗·马·”发动攻击的导火线)、赫尔岑和波兰流亡者沃尔策耳反驳“弗·马·”的信。“弗·马·”在8月27日发表声明作答,他在声明中把欧洲发生革命同沙皇间谍的活动联系起来。8月29日,戈洛文和赫尔岑发表了另一封题为“弗·马·是什么人?”的信。后来戈洛文继续进行有关巴枯宁的论战,赫尔岑没有参加。

在上面所说的8月24日的信中提到的“一家德国报纸”,暗指“新莱茵报”,信中说对巴枯宁的指控发端于这家报纸。因此马克思才决定把现在的这封信寄给“晨报”的编辑。——第321页。

- 263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是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的一家德文日报。从1846年至1849年3月该报叫做“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是天主教反对派集团的机关报。从1849年3月起该报改变了方针和名称,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一直出版到1855年底。马克思在1855年曾经做该报的驻伦敦通讯员。——第321页。
- 264 马克思引证的是恩格斯的文章“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3页),这篇文章批判了巴枯宁的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著”1848年,克顿版(《Auffruf an die Slaven. Von einem russischen Patrioten Michael Bakunin. Mitglied des Slavenkongress in Prag》. Koethen, 1848)。——第322页。
- 265 指的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第XVIII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05—109页),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而写的,于1851—1852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以马克思的名字发表。——第322页。
- 266 1853年9月17日纽约的德文报纸“改革报”曾加以删节后转载本文。——第324页。

- 267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是1820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创办的一家德文日报，该报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具有保守的倾向。——第324页。
- 268 马克思所引的“海员联谊会”宣言的全文后来在“人民报”上发表（见1853年11月12日第80号）。——第326页。
- 269 马克思给“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起因于1853年9月3日“晨报”发表了戈洛文的匿名短评“应该怎样写历史”，这篇短评是为回答1853年8月30日马克思给“晨报”编辑的信（见本卷第321—323页）而写的，文中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进行了新的攻击。在发表这篇短评以前，8月31日的“晨报”刊登了阿·卢格的信，公开把有意散布侮辱巴枯宁的谣言的罪名加之于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回击了戈洛文，这样也就揭穿了卢格的诽谤性捏造。同这篇声明有关的情况，马克思在1853年9月3日（原信误写为9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作了叙述。另外，这封信还附有为回答“应该怎样写历史”的作者而拟的初稿。——第327页。
- 270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马克思1853年8月30日所写的文章（见本卷第324—326页）中，没有本文所提到的报道。可能是该报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删掉了这一部分。——第330页。
- 271 指的是要俄国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的要求。——第330页。
- 272 “漫游者”（《Der Wanderer》）是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日报，1809至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331页。
- 273 指1853年8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部文章“和平还是战争”。这篇文章表示赞同美国“圣路易号”巡航舰舰长英格拉哈姆在士麦那对于匈牙利流亡者科斯塔被逮捕一事（见注180）所采取的行动。——第331页。
- 274 “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34页。

- 275 “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98年起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334页。
- 276 “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22年起在伦敦出版，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辉格党人的机关报。——第341页。
- 277 指1852年秋瑞士德森州当局封闭设在洛迦诺的卡普勒教团的天主教堂并把22名意大利的卡普勒教士遣回伦巴第的事件。卡普勒教士是受奥地利保护的，而瑞士和奥地利的关系由于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在瑞士居留的问题已经很紧张，所以瑞士当局反对卡普勒教团的这些做法使瑞奥关系更加尖锐起来。——第342页。
- 278 见注23。——第342页。
- 279 托马斯·卡莱尔“现代评论。（二）模范监狱”（Th. Carlyle. 《Latter-day Pamphlets. No. 2. Model Prisons》. London, 185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1850年第4期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对该书作过分6析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0—342页）。——第343页。
- 280 马克思指他所写的“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和“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事件”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16—423、559—568页）。——第347页。
- 281 “粮食交易所快报”（《Mark-Lane Express》）是“粮食交易所快报，农业报”（《Mark-Lane Express, Agricultural Journal》）这个周刊的简称；是商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32年到1924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第347页。
- 282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缺少本文的第二部分——关于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和印度的铁路建设，从“9月15日，英格兰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见本卷第356页）起以下全缺。——第350页。
- 283 马克思引用的是戴·乌尔卡尔特发表在1853年9月20日“晨报”上的论文“政治罪人”。——第351页。

- 284 指 1840 年 7 月 15 日由英、俄、奥、普四国签订的关于帮助土耳其苏丹对付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伦敦条约，以及 1841 年的伦敦条约（见注 132）和 1849 年的巴尔塔利曼尼条约（见注 131）。1840 年的伦敦条约是在没有法国（它支持穆罕默德—阿利）参加的情况下签订的，所以法国面临着一个反法同盟的威胁，结果不得不放弃了对埃及统治者的支持，参加了 1841 年的伦敦条约。在 1840 年的条约中，除了关于对土埃冲突进行军事干涉的条款和要求穆罕默德—阿利为了苏丹的利益放弃埃及以外的全部领地的最后通牒外，还有关于集体保护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条款。1841 年的条约后来就根据这一条宣布两个海峡对所有国家的军舰实行封锁。——第 353 页。
- 285 列季弗是奥斯曼帝国的后备兵员。——第 355 页。
- 286 马克街即粮食交易所。——第 366 页。
- 287 乌列玛是近东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的最高等级：神学家和法学家；乌列玛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有巨大的影响。——第 368 页。
- 288 指 1851 年 12 月底开始并席卷了英国东南部和中部许多城市的机器制造厂工人的罢工。罢工是机械工人联合会组织的，其目的是取消加班点和改善劳动条件。企业主们对罢工的答复是宣布同盟歇业。持续 3 个月之久的斗争，以企业主的胜利而结束。工人们不得不在原有的条件下复工。但是企业主也由于罢工和同盟歇业而遭到巨大的物质损失。——第 370 页。
- 289 这篇文章加加以删节转载于 1853 年 10 月 19 日的纽约德文报纸“改革报”，标题为“英国的工人运动状况”。——第 372 页。
- 290 明辛街是伦敦的一条街，批发殖民地货物的中心。——第 375 页。
- 29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后时期的著作中用更为确切的“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格”的概念代替了“劳动价值”、“劳动价格”的概念，因为马克思确定，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并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力（见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 1891 年版所写的序言）。——第 376 页。

- 292 指 1853 年 9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俄军在土耳其的计划”。对这篇社论的援引，可能是该报编辑部插入本文的。——第 380 页。
- 293 指 1846 年土耳其军队在奥美尔—帕沙指挥下出征库尔德斯坦，镇压那里爆发起来的反苏丹的起义。关于奥美尔—帕沙出征门的内哥罗，见注 250。——第 380 页。
- 294 亚·瓦·苏沃洛夫曾参加围攻奥查科夫的战斗，但是由于他在围攻要塞时负伤，以及和俄军司令官波将金公爵在围攻方法上意见分歧，而没有参加 1788 年 12 月 17 日（6 日）占领奥查科夫的战斗。俄国军队在苏沃洛夫指挥下用强攻占领土耳其的伊兹马伊尔要塞，是在 1790 年 12 月 22 日（11 日），这对俄国在 1787—1791 年的俄土战争中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 383 页。
- 295 “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抨击文，是马克思为揭露以帕麦斯顿为最著名代表的英国寡头政治而写的，原先计划作为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续发表。1853 年 10 月初马克思动手写这组抨击文之后，又同意把它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发表。宪章派机关报是把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表的，并且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马克思博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作，兼寄本报”这一句编者按语，而“论坛报”编辑部则从第一篇文章就不署作者姓名把它作为社论刊登出来，于是接着刊登的文章也就成了表面上互不关联的形式。“人民报”在 1853 年 10 月 22 日—12 月 24 日这段时间内共刊载了 8 篇。最后一篇也和前几篇一样，结尾都附有“待续”字样。从马克思在 1853 年 12 月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本想再写几篇文章来谈帕麦斯顿在 1840—1841 年伦敦公约签订期间的政策以及帕麦斯顿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的立场。但这种想法没有实现。

“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文章全部发表，并且往后拖到 1854 年初，尽管马克思早在 1853 年 12 月 6 日就把最后一篇寄往纽约了。该报共发表了 4 篇，一律是社论形式，标题也各不相同。1853 年 10 月 19 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

载的第一、二两篇；1853年11月4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相当于第三篇；1853年11月21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五两篇；1854年1月11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第六、八两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两家报纸所发表的原文也不尽相同。显然，马克思在给“论坛报”和“人民报”寄原稿时，估计到这两家报纸发表这篇抨击文的形式不同，对文章稍微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但除此以外，“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则带有报纸编辑改动作者原文的痕迹。

这组抨击帕麦斯顿的文章传播很广。1853年11月26日“格拉斯哥哨兵”（《Glasgow Sentinel》）转载了“论坛报”的“帕麦斯顿与俄国”一文（“人民报”上的第三篇）。1853年12月伦敦的出版者塔克尔以同一标题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1854年初，这个单行本再版，这次再版有马克思参与，他根据“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对这个单行本作了修改和补充。不久，塔克尔又出版了另一个单行本“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扉页上的标题是：“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这个单行本是翻印“人民报”发表的第四篇（缺前四段）及第五篇，改动不大。这两种单行本作为第一、二两号被编入塔克尔出版的“政治评论集”（《Political Fly-Sheets》），并于1855年和其他作者的抨击文一起重版。塔克尔在这一版他自己写的序言中提到了抨击文第一、二两号的作者——马克思的名字（在目录中，抨击文第一号“帕麦斯顿与俄国”的标题改为“帕麦斯顿与波兰”）。其他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马克思就不愿刊载在塔克尔的出版物中了，因为他不愿让他的作品同“政治评论集”所收进的乌尔卡尔特的著作混杂在一起。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我不愿与这位先生为伍，我们同他只是在一点上，即在评价帕麦斯顿上有共同处；其他一切问题我都持有正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855年11月17日和1856年1月5日，与帕麦斯顿对立的乌尔卡尔特派的报纸“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Sheffield Free Press》）刊载了“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中的两篇（即“人民报”发表的第三、六两篇）。其中的前一篇还单独重印，编为设菲尔德出版的“‘自由新

闻’小丛书”(《Free Press Serials》)第4A号。差不多就在同时,所有8篇还刊载于乌尔卡尔特派的伦敦机关报“自由新闻”(《Free Press》)的五号上(1855年12月29日、1856年1月5日和12日、2月9日和16日),并由“‘自由新闻’小丛书”单独印行,标题“帕麦斯顿勋爵传”,作为该丛书的第5号出版。单行本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马克思的这组抨击文早在1853年11月2日就在纽约的“改革报”上用德文发表,译文是由阿·克路斯从“论坛报”上节译的。在编辑部的前言中说道:“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所以我们决定从‘论坛报’上节译这些文字。这篇评论表明作者对于英国情况的了解非同一般,所以尽管没有署名,也不难猜出是谁写的。”11月2、3、4、8和9日刊载在“改革报”上的“帕麦斯顿”一文,相当于“人民报”发表的第一、二两篇。1855年2月,马克思把题为“帕麦斯顿勋爵”的两篇文章寄给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的“新奥得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是“人民报”和“论坛报”发表的文章的摘要。马克思的抨击文的摘要(有作者的署名)还曾经由德国政论家爱·费舍在他于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第1、2两卷(《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中发表。

1893年,马克思逝世后,第三篇曾用波兰文刊载在同恩格斯有联系的波兰社会党人在伦敦出版的杂志“黎明”(《Przed świt》)第7期上。第七篇曾在1897年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根据“论坛报”原文并以同一标题(“英国与俄国”)收进她和爱·艾威林共同出版的马克思论东方问题的文集(K.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1899年在伦敦又出版了由爱琳娜·马克思编的8篇文章的汇编:卡尔·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传记”(Karl Marx. 《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马克思的这组抨击文第一次用俄文刊行是在1924年。

马克思在写这组抨击文时广泛地查考了史料,首先是查考了所谓的“蓝皮书”(Blue Books)——定期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英国议会资料及外交部文件。此外,他还利用了关于议会会议的报告,主要是汉萨德出版的“议会辩论”(《Parliamentary Debates》),以及各种国际条约和外交文件汇集、评论集和大量报刊材料。——第387页。

- 296 英国议会于 1850 年 6 月讨论与所谓“帕西非科事件”（见注 179）有关的英希冲突问题时，政府（帕麦斯顿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对外政策得到下院的赞同；相反，上院却以 37 票的多数表示反对政府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和俄国对这一立场也表示不同意，并通过它们驻伦敦的大使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法国大使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伦敦，俄国大使不出席帕麦斯顿举行的宴会。——第 392 页。
- 297 1815 年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当谷物价格在英国本土低于 80 先令 1 夸特时进口谷物。1822 年这项法律稍作改变，1828 年实行调节制：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降低就提高谷物进口税，谷物价格上涨就降低进口税。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内阁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口号下反对谷物法，1846 年终于废除了它。——第 393 页。
- 298 马克思指外国雇佣兵驻在英国一事。这些雇佣兵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主要在德国各小邦，特别是在汉诺威——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国王的世袭领地——募集到英国军队里来的。——第 393 页。
- 299 指英国人于 1807 年 9 月炮轰哥本哈根，以防止丹麦加入拿破仑宣布的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大陆封锁。——第 393 页。
- 300 惩治叛乱法案（Mutiny Act）是议会从 1689 年至 1881 年每年通过一次的法律；这项法律授权国王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和海军，在陆海军中实行各种军事条令和制度，实行军法审判，并制定惩治参加 变、违抗命令、违犯纪律等等行为的制度。颁布第一个这样的法律是由于英国的兵变。——第 394 页。
- 301 市镇机关法（Corporation Act）是英国议会于 1661 年通过的，它要求担任各选职（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的人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条。
- 宣誓法（Test Act）（1673 年）同样要求一切公职人员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条。
- 这些法令本来是用来对付天主教反动派的，但后来却变成了对付官方的英国国教教会的任何反对派的武器和维护英国国教教会的特权的工具。——第 395 页。

- 302 非国教徒 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官方的英国国教教会信条的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 395 页。
- 303 天主教徒的解放 是指 1829 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 4 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 395 页。
- 304 指争取议会改革的广泛运动（见注 138），这次运动在 1832 年实行议会改革之前曾广泛开展了好几年之久。——第 398 页。
- 305 法国和沙皇俄国利用“圣地”之争（见注 101）来争夺近东霸权，这次争执的问题之一是耶路撒冷“圣墓”所在寺院的钥匙以及保护该寺院的圆顶的权利应属于天主教徒还是正教徒的问题。——第 402 页。
- 306 指 1827 年 7 月 6 日伦敦条约（公约），见注 47。——第 402 页。
- 307 阿克尔曼条约 是俄国与土耳其于 1826 年 10 月 7 日（9 月 25 日）签订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土耳其政府应严格遵守以前同俄国缔结的各项条约，给予俄国商船在土耳其领海航行的自由，并放弃领有 1806—1812 年俄土战争后归俄国所有的黑海高加索沿岸地区的权利。这项条约重申苏丹承认塞尔维亚自治，并规定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要由当地大贵族中选出。阿克尔曼条约没有提希腊问题。土耳其统治集团根据这一点在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前夕违反这个条约而说什么俄国已根据这个条约放弃了对希腊事务的干预，俄国帮助希腊人就是违背这个规定。但实际上“对希腊事务不感兴趣”的话沙皇政府并不是在签订阿克尔曼条约时，而是在这以前几个月说的。——第 402 页。
- 308 约·麦克尼耳“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现状”1836 年伦敦版第 105—107 页（J. McNeill.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 1836, pp. 105—107）。——第 403 页。
- 309 在 1853 年 10 月 19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以下面一段话结尾，这段话看样子是报纸编辑部加的：“这句话使人清楚地看到，帕麦

斯顿勋爵决不代表自由、荣誉和英国所固有的一切优点。勋爵阁下在那个时候以及在我们所描写的他的活动的最早期是怎样一个人，那末他今天仍然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凡是知道他的人在今天这样严重的关头除了看到他对正义和人权采取假热心的态度外，别的什么也不用想从他那里得到。我们尚未谈到的他那政治生涯部分留在下一次谈；遗憾的是这一部分并不是最精彩的。”——第 404 页。

- 310 米兰人由于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企图取消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的市政自由并使之受制于己而于 1159 年拒绝服从这个皇帝。随之而来的长期斗争使米兰于 1162 年遭到破坏，但最终胜利的仍是这些城市。——第 406 页。
- 311 指 1840 年 7 月 15 日伦敦公约，见注 284。——第 412 页。
- 312 克拉科夫起义，见注 259；以下提到的加里西亚事件，见注 16。——第 414 页。
- 313 看来是指“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1780—1931 年以同名出版的官方政府报纸。——第 414 页。
- 314 1846 年基佐政府为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小儿子蒙潘西埃公爵订下了同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婚约，破坏了英国所策划的亲王列奥波特·科堡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婚盟。英法两国政府之间为这些婚约而进行的斗争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法国外交在这个问题上获胜以后，帕麦斯顿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报复。——第 415 页。
- 315 1713 年乌特烈赫特条约 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签订的结束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长期战争（1701 年开始）的一个和约。根据条约，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皇太子——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波旁，但法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

国。

帕麦斯顿于 1846 年谴责法国破坏乌特烈赫特条约指的是路易—菲力浦又想通过他的小儿子同西班牙公主的婚姻而合并两个王国。——第 415 页。

- 316 下面引的帕麦斯顿在下院就法国舰队于 1836—1839 年封锁墨西哥港口一事的讲话是在 1839 年 3 月 19 日发表的。

英法舰队于 1845 年开始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封锁，目的是想迫使阿根廷政府为外国船只开放巴拉那河及其他河流。英法于 1852 年达到了这一目的，迫使阿根廷签订了相应的条约。——第 415 页。

- 317 指 1830 年比利时的资产阶级革命。——第 416 页。

- 318 英法于七月革命后建立的名之为“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的同盟关系，由于 1834 年 4 月间签订了所谓四国同盟（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有了条约的形式。但是在签订这个条约时英法之间暴露了利害矛盾，这些矛盾后来逐渐尖锐化。条约表面上是反对专制的“北方强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实际上是使英国得以借口给予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以军事援助来反对觊觎王位的唐·米格尔（葡萄牙）和唐·卡洛斯（西班牙）而加强它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地位。——第 419 页。

- 319 指 1832 年 7 月底贝兰（叙利亚）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埃及军队在伊布拉希姆—帕沙的率领下击溃了苏丹的军队并迫使它完全撤出叙利亚。随后埃及军队开进小亚细亚，并于 1832 年 12 月在科尼亚打败了土耳其军队，这就决定了埃及在 1831—1833 年的埃土战争中的胜利。1833 年 4 月，根据在居塔希亚签订的和约，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里实际上被承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的独立的统治者。——第 423 页。

- 320 马克思引的是激进派议员安斯提于 1848 年 2 月 8 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第 430 页。

- 321 指 1834 年 1 月 29 日（17 日）的俄土条约，这项条约订正了 1829 年阿德里安堡条约的某些条款。条约减少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规定的土耳其

每年所应交付赔款的数目，并把赔款总数减少 200 万杜卡特。——第 430 页。

- 322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是每日出版的外交部官方机关报；1825—1914 年以同名用法文出版。——第 433 页。
- 323 《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见注 179。——第 433 页。
- 324 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 年伦敦版第 406 页（D. Urquhart, 《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 North, and South》. London, 1853, p. 406）。这一著作在 1853 年曾出过好几版；此处页码根据第 2 版。——第 441 页。
- 325 在 1854 年 1 月 11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开头是以下这段话：“看来，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已经在英国产生了他所能预期的全部奇迹般的效果。公众对他所舍去的内阁越来越表示不满，但是这个内阁的政策却是帕麦斯顿直到他在职的最后一分钟始终最坚决地予以支持的。同时那些痛斥联合内阁的党派也竞相颂扬帕麦斯顿。它们一方面号召给予俄国的侵犯以有力的和应有的回击，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似乎极其渴望它们所热爱的这位国家活动家回到领导者的职位上来。这样一来，这个最灵巧而不知疲倦的演员就愚弄了全世界。如果这里不是涉及十分重大的事，那末这就是一个很引人入胜的场景。关于误解是如何根深蒂固我们业已指出过了，现在我们只想在下面再提供一些证据，来说明帕麦斯顿一贯出于某种原因来协助俄国进展并为此而利用英国的真相。凡是想看一看时事的舞台的幕后情形，并给这些事件和人物作出与它们的实际价值相符的评价的人，我们认为，都会从我们的叙述中获得某种教益。”

这些话不可能是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原文，因为“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后几篇，马克思寄给“论坛报”编辑部不迟于 1853 年 12 月 6 日，即至少是在帕麦斯顿短期辞职（1853 年 12 月 16 日）的前 10 天。报纸编辑部拖延很久，即到 1854 年 1 月 11 日才发表这篇文章，所以在发表时作了补充。补充的东西可能是从马克思的另一篇后来写的文章中借用来的。根据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上的记载，这篇文章于 1853

年 12 月 20 日寄往纽约,谈的是英国报刊对帕麦斯顿辞职的反应。1853 年 12 月 20 日的这篇文章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手稿至今没有找到。——第 443 页。

326 引的是库普费尔“1829 年奉旨在高加索厄尔布鲁士山附近旅行记。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所作的报告”一书 1830 年圣彼得堡版第 4 页 (Kupfer, 《Voyage dans les environs du Mont Elbrouz dans le Caucase, entrepris par ordre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 en 1829. Rapport fait à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 — Pétersbourg》. St. — Pétersbourg, 1830, p. 4)。——第 444 页。

327 指 1826 年 4 月 4 日彼得堡议定书和 1827 年 7 月 6 日伦敦条约 (公约), 见注 47。

在 1826 年 4 月 4 日的议定书中, 签订这个议定书的沙俄和英国力图掩饰它们站在希腊方面干涉希土冲突的真正目的, 声明它们既不是要损害土耳其来扩大自己的领土, 也不是追求无上的势力和在苏丹属地上的贸易特权。英、俄、法在缔结 1827 年 7 月 6 日伦敦条约时又重复了这样的声明。——第 444 页。

328 马克思引的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于 1836 年 4 月 20 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第 446 页。

329 这里所答应的文章并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 而在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中可以看到, 这篇文章马克思在 1853 年 12 月 6 日就已经寄往纽约了。“人民报”于 1853 年 12 月 24 日刊载了这篇文章, 作为“帕麦斯顿勋爵”一文的第八篇。——第 450 页。

330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是英国政府机关报; 1666 年起以本名每周出版两次。——第 455 页。

331 劳埃德委员会是伦敦的一个办理海上保险及登记的团体。——第 461 页。

332 这篇文章曾在 1853 年 10 月 24 日和 25 日纽约的德文报纸“改革报”上以“英国状况”为题加以删节转载。——第 462 页。

- 333 指列施德—帕沙 1853 年 8 月 19 日给奥、英、法、普四国使节的照会。照会中说，土耳其政府只有在对维也纳照会作出一系列修改和保留条件下才能接受这个照会（维也纳照会见注 223）。列施德—帕沙特别坚持要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第 462 页。
- 334 1853 年 9 月，尼古拉一世和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奥里缪茨（奥洛摩茨）举行一次会谈，会谈后，奥地利政府试图促使西方列强采取新的步骤，在苏丹无条件接受维也纳照会的基础上调解俄土冲突。尼古拉一世在同弗兰茨—约瑟夫会谈的过程中企图使后者相信，在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军，不会强渡多瑙河，俄军只在多瑙河北岸采取防御行动。——第 464 页。
- 335 “麦尼普的讽刺”是 1594 年在法国发表的一篇匿名的政治性抨击文，抨击的对象是天主教联盟（1576 年在胡格诺教徒战争时期创立），这个联盟的封建贵族首领力图削弱国王权力，确立天主教上层的无限特权。这一作品的篇名是从罗马作家瓦龙（纪元前一世纪）那里借用的，瓦龙曾摹仿古希腊哲学家麦尼普写成了他的“麦尼普的讽刺”。——第 467 页。
- 336 指被法国资产阶级非常残酷地镇压下去的 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的英勇起义。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第 469 页。
- 337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里发表的这篇文章，缺少关于法国经济状况的部分（见本卷第 474—475 页）。——第 472 页。
- 338 指 1848 年 3 月 29 日比利时共和派军团从法国回国时在法国国境附近的里斯康土村同比利时士兵发生的冲突。比皇列奥波特一世政府利用这个事件制造了安特卫普案件（所谓里斯康土案件）来迫害民主派。德勒克吕兹当时是法国与比利时接壤的诺尔省的政府专员，比利时共和派军团就是从该省通过的。——第 477 页。
- 339 指托列斯—维德拉城（现在的托列治—维德拉什城，在葡萄牙）附近的营垒，它是 1810 年根据威灵顿的命令为掩护里斯本防备法军侵犯而

修建的。——第 482 页。

- 340 拿破仑于 1815 年在比利时作战期间，于 6 月 16 日在利尼附近击败普军，企图把普军从威灵顿的英荷军队中分割出来并把盟军各个击溃。但是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决定性的滑铁卢会战中，当法军攻击威灵顿军队并企图包围其翼侧的时候，布鲁赫尔指挥的普军巧妙地摆脱了追击，及时赶到战场，并且决定了盟军获胜的会战结局。——第 483 页。
- 341 攻占埃尔斯伦——埃尔斯伦是土耳其在高加索的重要要塞，1829 年 6 月被帕斯凯维奇指挥的俄军攻占。这一事件对于俄军在 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中最后战胜起了巨大的作用。——第 487 页。
- 342 在多瑙河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俄军司令官哥尔查科夫就命令把多瑙河区舰队的一部分从伊兹马伊尔调到布莱洛夫（布莱拉）和加拉兹地区。1853 年 10 月 23 日（11 日），两艘俄国蒸汽舰和八艘炮艇在土军占据的伊萨克查要塞旁边通过时发生炮战。由于俄国舰炮和岸上火炮的轰击，土耳其守卫部队遭到相当大的损失。——第 491 页。
- 343 塞拉斯基拉特 即土耳其的陆军部。——第 491 页。
- 344 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的领导机关。秩序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组织。这个产生于 1848 年的保守派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从 1849 年到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期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了该党反人民政策的破产来达到波拿巴的目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在共和国存在的年代里曾支持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而在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前夕倒向波拿巴派。——第 491 页。
- 345 1842 年 8 月初，在英国的许多工业区特别是在郎卡郡，爆发了罢工和工人骚动。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由于力图利用工人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废除谷物法，在许多情况下曾经鼓动工人采取行动。但是，资产阶级被大规模的罢工和骚动吓倒，又看到工人是在追求自己的目的，于是便转而支持对工人的血腥镇压。在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

级状况”和“英国谷物法史”两文中对这些事件作了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9—522页和第4卷第563—568页）。——第492页。

346 指布莱特和科布顿在自由贸易论者和平协会爱丁堡组织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会议的总结报告载于1853年10月14日的“泰晤士报”。——第494页。

347 马克思引自1853年10月29日“人民报”上发表的“什么贱和什么贵”一文。——第494页。

348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01—1928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第496页。

349 本文一部分曾以“波斯、俄国和丹麦”为标题在1853年11月19日的纽约德文报纸“改革报”上转载。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发表的这篇文章，缺少有关波斯和俄国的进军、丹麦事件以及多瑙河和亚洲的军事行动的部分（见本卷第501—503页）。——第501页。

350 指伊朗军队为并吞赫拉特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赫拉特是一个商路枢纽，阿富汗和伊朗曾为它进行过多次争夺战。英国殖民者利用1856年10月伊朗军队攻占赫拉特一事对伊朗发动战争，战争的结果，沙赫应从赫拉特撤兵。1863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艾米尔的领地。——第501页。

351 1853年沙皇政府组织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征伐。这次征伐溯锡尔河而上，由奥连堡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指挥，目的是反对侵占了哈萨克土地的科坎德汗国（马克思本文中指希瓦不确），结果使俄军建立了锡尔河战线，后来沙皇俄国进攻中亚的科坎德、布哈拉和希瓦等汗国时就以此战线为前进基地之一。——第501页。

352 指1848年3月22日在全国革命高潮中成立的丹麦政府，这个高潮的表现，就是在哥本哈根“卡集诺”剧院举行的群众大会。新政府的成员

除保守党人以外，还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党“埃德尔党”（或“埃德尔丹麦人党”）的代表。这个党主张丹麦和什列斯维希公国（埃德尔河以北）有一个共同的宪法而把霍尔施坦公国划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区。丹麦三月资产阶级政府对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并且反对这些德语区和德国合并。——第 502 页。

- 353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关于谷物法见注 297），其目的是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 1846 年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第 505 页。

- 354 拿破仑指挥的法军和普军之间的耶拿会战发生在 1806 年 10 月 14 日。会战以普军被击溃而告终。普军战败后，普鲁士投降了拿破仑法国。——第 510 页。

- 355 1799 年 9 月 25—26 日（14—15 日）在苏黎世附近，马森纳指挥的法军击败了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将军的俄国军团。这次失败使已从北意大利出发与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军团会合的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军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尽管敌军兵力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苏沃洛夫部队却给法军一系列打击并冲到莱茵河上游地区。恩格斯于 1859 年在自己的著作“波河和莱茵河”里对俄军的进军瑞士作了很高的评价，在文章中称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是“现今各次越过阿尔卑斯山当中最卓越的一次”。——第 513 页。

- 356 从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上可以看到，恩格斯的文章“俄军的失败”是和马克思的文章“工人问题”（见本卷第 518—521 页）作为一篇完整的通讯，一同送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但是该报编辑部把这篇通讯分成两部分发表在该报的同一号上（11 月 28 日）。恩格斯的文章是作为社论发表的，而马克思的文章是作为由他署名的单独文章发表

的。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中有些不确切之处,其原因是他用了不正确的消息。在上述的卡拉法特和沃耳特尼察战斗当中,对多瑙河交战双方兵力的对比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在沃耳特尼察附近俄军总司令是丹年别尔格,而不是巴甫洛夫;盖昂和伊斯马伊耳—帕沙是两个人,而不像文章指出的是一个人。稍后,恩格斯根据比本文更确切的消息,不仅估计了交战双方兵力的对比,而且估计了土军的指挥素质以及卡拉法特和沃耳特尼察等战斗的结果(见本卷第530—536页和第580—587页“土耳其战争的进程”和“多瑙河战争”两篇文章)。——第515页。

- 357 在1849年3月23日北意大利诺瓦拉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军使皮蒙特军队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由于这次失败,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恢复起来。在这次战争进程中奥地利司令官巧妙地利用了皮蒙特将军拉莫里诺分散兵力的弱点。——第517页。
- 358 马克思所批判的文章刊登在1853年11月5日“经济学家”上。——第518页。
- 359 “普雷斯顿舵手”(《Preston Pilot》)是一家英国周报,1825—1888年在普雷斯顿出版。——第520页。
- 360 马克思引的是琼斯在1853年11月4日普雷斯顿工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其详细报道发表在1853年11月12日“人民报”上。  
马克思大概还在“人民报”的这一号出版以前就看到这篇演说了,因为他在11月11日写的文章中引用了它。——第521页。
- 361 马克思所批判的文章刊登在1853年11月12日“经济学家”上。——第522页。
- 362 社会拯救委员会是雅各宾党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第527页。
- 363 由于1853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集团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主张,这种组织应该把各个工联与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联合起来,其目的首先是使全国各

个不同地区的罢工能统一行动。这一组织应该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而工人议会则由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大会和参加了“群众运动”的各工联大会选出的代表组成。工人议会于1854年3月6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一直开到3月18日。工人议会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5个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名誉代表的马克思寄去了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信中他指出建立独立的群众性政党的任务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马克思认为工人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认为这是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狭隘圈子的尝试，是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步骤。

可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都对政治斗争抱否定态度，不支持建立统一的工人群众性组织的主张。1854年夏天罢工运动的低落对广大群众参加运动也起了不好的影响。1854年3月以后，工人议会就再也没有召开了。——第529页。

- 364 指英国议会：从1547年起下院会议是在圣斯蒂凡教堂（韦斯明斯特宫）举行的。——第529页。
- 365 卡·马克思的“高尚意识的骑士”这篇抨击文章写于1853年11月，并在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的协助下于1854年1月在纽约以单行本出版。这篇文章是对刊载在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奥·维利希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的回击。马克思的这篇抨击文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工人运动中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马克思在该文中驳斥了维利希的诽谤（维利希力图使别人怀疑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活动所作的批判的公正性）。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时，揭露了这个集团的冒险主义、宗派主义的策略。为了写这篇抨击文，马克思从他和恩格斯于1852年5—6月合写的一部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借用了个别章句，这部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第537页。
- 366 卡·冯·德克尔“从现代作战观点来看小型战争。或：论小型战争中所三个兵种的运用和使用”1822年柏林和波兹南版（C. v. Decker.

《Der kleine Krieg, im Geiste der neueren Kriegführung. Oder: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wendung und den Gebrauch aller drei Waffen im kleinen Kriege》. Berlin und Posen, 1822)。——第 541 页。

- 367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Bamberg und Würzburg, 1807)。参看“教育及其现实性的王国”章第435—474页(《Die Bildung und ihr Reich der Wirklichkeit》, S. 435—474)。——第 541 页。
- 368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一文,马克思写于1852年10月底—12月初。这是一篇战斗性的抨击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痛斥了普鲁士警察国家迫害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的卑鄙手段。这篇抨击文于1853年1月在瑞士巴塞利以单行本刊印。在美国,这部著作最初连载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上,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以单行本发表。马克思在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引自“揭露”的各处引文,都是根据波士顿版的小册子。——第 541 页。
- 369 “新英格兰报”(《Neu England-Zeitung》)是德国流亡者在波士顿(美国)用德文出版的民主主义报纸,创办于1852年。约·魏德迈曾为该报撰稿。——第 541 页。
- 37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0、525页。——第 541 页。
- 371 在1854年纽约版中,出版者在该处加了如下的一个脚注:“勃鲁姆先生不是在澳大利亚,而是在费拉得尔菲亚,当美国工人同盟成立时,他是同盟理事会中维利希的代理人。”——第 542 页。
- 37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9页脚注。——第 542 页。
- 373 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 543 页。

- 37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4页。——第544页。
- 375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1846年年初，他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顽强斗争中，以及在反对对正义者同盟（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阴谋组织，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员特别有影响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了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密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在许多天的论战中捍卫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

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于1848年4月初返抵德国，他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侧翼。他们加入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并介绍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97）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1848年年底，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试图恢复中断的联系，派约瑟夫·莫尔为特使，去德国整顿同盟组织。伦敦中央委员会修改了1847年的盟章，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意义。譬如，不提推翻资产阶级，不提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宣布同盟的宗旨是建立社会共和国。莫尔从1848年到1849年冬在德国的使命并没有完成。

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了民主协会。工人群众已经有了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大失所望，这一切使当时已经有可能在实践上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不久，德国西南部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成为德国革命的终结。

革命的进程表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同盟是革命活动的一所很好的学校：它的成员坚决果断地参加了各地的运动，他们在报刊上、在街垒里和在战场上坚守着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阵地。

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许多盟员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逃亡国外，地址丢掉了，联系中断了，各地支部的活动停顿了。

德国国外的同盟组织也遭到巨大的损失。

1849年秋天，同盟的多数领导人聚集在伦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努力，到1850年春天，以往的组织已经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到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1850年3月，宣传共产主义的新的机关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了。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发生的原则性分歧达到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派所提出的无视客观规律和欧洲的现实政治形势而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强调，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1850年9月中旬，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分裂活动终于引起了与该派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德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一致拥护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在科伦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马克思加了标记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以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544页。

- 376 布·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B. Bauer.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Bd. 1—2, Leipzig, 1841; Bd. 3, Braunschweig, 1842)。在宗教史的著述中，把前三篇福音的编者称为复类福音作者。马克思指鲍威尔书中对福音书上的说法和真实历史事件之间的明显矛盾所作的批判。——第 546 页。

- 377 1850 年 9 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内部发生分裂）记录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635—641 页。1850 年 9 月 17 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在大磨坊街）的声明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84 页。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在 1840 年 2 月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后，同盟的地方支部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间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与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的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 1850 年 9 月 17 日退出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又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被英国政府查封。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问过协会。——第 546 页。

- 378 暗指古希腊的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这是一部对荷马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第 547 页。
- 379 指金克尔和流亡者俱乐部的其他领导人筹办所谓“德美革命贷款”的试图。为了在出身于德国的美国人中间举借贷款，金克尔于 1851 年 9 月来到美国。贷款拟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与流亡者俱乐部相竞争的、由卢格领导的鼓动者协会，也派代表到美国募集革命基金。举借“革命贷款”的试图落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无成果的、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尝试。——第 547 页。
- 380 圣杯，按照中世纪的传说，是一只有奇异力量的宝杯。——第 547 页。

- 381 马克思把阿尔诺德·卢格戏比为阿尔诺德·文克里特。文克里特是半传说的瑞士战士，曾参加反对奥地利压迫的解放战争，相传在 1386 年 6 月 9 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属琉森州）城下作战的时候，文克里特以舍身的行动决定了瑞士人的胜利。——第 547 页。
- 382 指与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对参加反政府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迫害。早在与拿破仑斗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学生会的许多会员，在维也纳会议后反对德国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示威，在示威中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 年大学生桑得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的代理人科采布，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蛊惑者”是 1819 年 8 月德国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决定中对参加这一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第 549 页。
- 383 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一本论述 1849 年莱茵普鲁士、普法尔茨在巴登起义史的著作。这一著作在 1850 年分章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 1—3 期。恩格斯所指的是这一著作的第四章“为共和国捐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90—235 页）。——第 550 页。
- 384 指 1848 年 11 月维利希从德国流亡者——在伯桑松（法国）做工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中组织起来的队伍。队伍的成员从法国政府领取津贴。1849 年初，津贴停发。稍后，队伍加入了志愿分队，这一分队在维利希的命令下参加了 1849 年 5—6 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行动。——第 551 页。
- 385 马克思指的是：公元前 480 年希腊—波斯战争期间，由 300 名斯巴达人组成的队伍在国王勒奥尼达斯指挥下英勇保卫温泉关，抗击波斯的全部军队。在温泉关会战中，勒奥尼达斯及其队伍全都战死。——第 551 页。
- 38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207—208 页。——第 552 页。
- 387 1849 年 9 月，马克思被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是

在地方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之下成立的。为了制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想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影响下的企图，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的建议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这一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850年9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因为大多数委员都被维利希—沙佩尔派影响了。——第552页。

- 388 正文中所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850年8月的最后几天内举行的。——第552页。
- 389 “先驱者报”（《Le Précurseur》）是比利时资产阶级的日报；从1836年起在安特卫普出版。——第556页。
- 39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66页。——第559页。
- 391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559页。
- 39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2页。——第559页。
- 39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8页。——第560页。
- 394 马克思指1850年9月15日以后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另成一个独立组织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中央委员会。根据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一些反动的天主教州的单独联盟的相似之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戏称这个组织为宗得崩德（特别联盟）。——第561页。
- 39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6页。——第562页。
- 396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是1850年7—11月由乔·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在这个周刊上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次英译文。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是英国的周刊，宪章派的机关刊物；1851—1852年在伦敦由厄·琼斯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该杂志以支持，并参加了它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从1851年6月

到 1852 年 4 月底，他们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許多文章。——第 562 页。

- 397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 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英勇起义的文章，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的懦怯政策、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妥协政策和三月同盟的活动家的一些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5 卷在第 6 卷）。

三月同盟（以法兰克福中央三月同盟为首）是 1848 年 11 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在德国各城市组织的。这些三月同盟宣布其目的是捍卫 1848 年德国三月革命的成果。它们的领导者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8 年 12 月起就开始在“新莱茵报”上抨击领导这些同盟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和不坚决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是为革命敌人帮了忙。——第 563 页。

- 39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26 页。——第 563 页。
- 39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529 页。——第 564 页。
- 400 指普鲁士和奥地利于 1850 年秋由于争夺德国领导权而发生的冲突。冲突的借口是黑森的革命发动。普鲁士和奥地利彼此争夺干预黑森内政的权利，其目的是镇压骚动。普鲁士政府为了回答奥地利军队之开入黑森，便宣布动员，同时也把军队派往黑森。但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普鲁士对奥地利作了让步，没有给以严重的反抗。——第 565 页。
- 401 指在监狱中的奥古斯特·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的献词。“平等者宴会”是 1851 年 2 月 24 日为纪念 1848 年二月革命一周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宴会的组织者是：路易·勃朗领导下的一部分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布朗基流亡者协会的首领——巴特米、亚当等人，还有维利希-沙佩尔派。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获得情报，派自己的拥护者康·施拉姆和威·皮佩尔去参加宴会，但是，他们被逐出会场，并遭到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拥护者的毒打。宴会的组织者故意不让与会者知道的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7卷第630—632页)。德译文曾大量印发,流传在德国和英国。——第568页。

- 402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违背了他在普鲁士1848年三月革命时期对人民的呼吁中所许下的关于建立宪制的庄严诺言。——第572页。
- 403 在1848—1849年革命发生以前的时期,德国各宗教反对派——所谓“德国天主教”和新教的“自由公理会”——的代表们企图建立全德国的国教。1844年在德意志各邦建立的“德国天主教”,其宗旨是反对天主教中极端的神秘主义和伪善。“德国天主教徒”否认罗马教皇的领导,反对天主教的许多教义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它反对在天主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伪善的和神秘主义的派别——虔诚主义)的影响下,于1846年从官方新教会中分离出来的。这两个宗教反对派的形式,反映了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和它要求全国政治统一的愿望。“自由公理会”与“德国天主教徒”的公理会在1859年合并。——第573页。
- 404 马克思所引的1853年11月20日曼彻斯特宪章派群众大会的决议及琼斯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全文都发表在1853年11月26日“人民报”上。——第579页。
- 405 恩格斯可能指他在1853年12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见本卷第530—536页),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论点还没有作为定论提出。有同样见解的文章在这一时期的“论坛报”上没有出现过。——第580页。
- 406 暗指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图克所写的一些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的历史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总称为“价格史”,它们是:“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793—1837年”1838年伦敦版第1—2卷(《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I—II, London, 1838),“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838年、1839年”1840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8 and 1839》. Lon-

don, 1840) 以及“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 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第589页。

407 繁荣的罗宾逊 是弗·约·罗宾逊, 葛德里奇子爵的绰号。1825年经济危机前夕他以英国财政大臣的身分预言英国经济会长期繁荣下去。——第590页。

408 皮蒂娅 是德尔斐城内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第593页。

409 “卫报”(《The Guardian》)是英国国教会的机关报, 周报, 1846年创办于伦敦。——第596页。

410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是奥地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 1848至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598页。

411 詹姆斯·格莱安任大不列颠内务大臣时, 为讨好奥地利政府, 于1844年命令英国邮政主管部门让警察局暗中检查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

马克思所说的“邦迪埃拉事件”, 是指以密谋组织的成员邦迪埃拉兄弟为首的意大利爱国者的一个小支队于1844年6月在卡拉布利亚海岸登陆一事。邦迪埃拉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举行起义, 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由于支队中一个队员的背叛, 当局俘获了远征队的参加者; 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599页。

412 西诺普会战发生在1853年11月30日(18日)。在巴·斯·纳希莫夫海军中将的俄国黑海分舰队查明土耳其司令部准备派一个区舰队把军队和装备运往高加索沿岸并在西诺普海湾发现这个区舰队以后, 便对这个区舰队发动攻击并把它消灭了。有6艘俄国战列舰和2艘巡航舰参加会战; 海岸炮垒炮火支援下的土军兵力共有16艘军舰(其中有2艘蒸汽舰)。可是, 在大炮装备上俄国分舰队比土耳其强。会战进程中土耳其舰队损失惨重: 15艘军舰被击毁, 区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奥斯曼·帕沙被俘。西诺普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地位, 同时

也促使英法两国更快地参加反俄战争。——第 602 页。

- 413 尼古拉一世 1853 年 6 月 26 日 (14 日) 就沙皇政府决定把军队开进多瑙河各公国所颁发的宣言, 以及沙皇俄国的一系列外交文件都宣布, 占领各公国的目的, 是建立“物质保证”来保障希腊正教教会在土耳其的权利和特权并使苏丹履行其对俄国的义务。——第 603 页。
- 414 圣约翰伍德和切尔西是伦敦两个人口稠密区的名称; 克勒蒙特宫 (在伦敦市郊) 供 1848 年 2 月流亡英国的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全家居住。——第 604 页。
- 415 指 1849 年参加立法议会的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 17 个奥尔良分子和正统主义者的首领, 由于他们贪图权力和抱有反动意图, 人们把他们称为城官。这个绰号是从维克多·雨果根据中世纪德国生活而写的同名历史剧中借用的。在德国, 城官是被皇帝指派的城和区的统治者。——第 605 页。
- 416 斯特拉斯堡和布伦的英雄, 见注 249。——第 605 页。
- 417 嘲讽地暗指 1812 年 10 月马莱将军反对拿破仑第一没有成功的密谋。有右翼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参加的这一密谋的策划者指望拿破仑的军队在俄国遭到失败, 并企图利用他们所散布的拿破仑已在远征俄国时阵亡的说法。——第 606 页。
- 418 秩序党, 见注 344。——第 607 页。
- 419 1853 年 12 月 16 日帕麦斯顿宣布退出阿伯丁联合内阁。可是他的辞职没有被接受, 很快又回到他原来的内务大臣的职位上来。——第 609 页。
- 420 指伦敦出版人塔克尔把 1853 年 11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帕麦斯顿与俄国”一文印成单行本出版,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那组文章中的第三篇 (见注 295)。——第 612 页。
- 421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中“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是用“西诺普和阿哈尔齐赫”的标题刊载的。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根据英国报刊的材料写成的。当时英国报刊没有客观地阐述克里木战争时期军事行动的进程，而且别有用心地解说了俄军的官方情报。这首先说明了，为什么文章中对 1853 年 11 月 30 日（18 日）西诺普会战的评述、对交战双方兵力的对比、俄国黑海舰队的战斗素质和行动的估计等方面有些不确切之处。例如，恩格斯从英国报纸上袭用了关于黑海舰队有战略弱点、关于该舰队中大半是“陆地水兵”和非俄罗斯民族人员等不正确的说法。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的政论性质（这篇文章是紧接着事件发生后写成的）和该文反对作为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的俄国沙皇政府的政治倾向，对于低估西诺普会战的意义起了一定的作用。——第 613 页。

- 422 恩格斯在下面描述的阿哈尔齐赫战斗发生于 1853 年 11 月 26 日（14 日）。——第 613 页。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53年3月—12月)

1 8 5 3

3月—4月初

由于西方强国和沙皇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盾尖锐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问题交换了意见。

应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对东方问题的实质作了分析,并主张以革命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在巴尔干建立民主的斯拉夫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一文及恩格斯的“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和“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等文发表于4月7日、12日、19日和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后三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

约3月下半月—4月

马克思认为制定自己的经济学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继续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阅读英国经济方面的书籍,并摘录斯宾塞、纽曼、奥普戴克、班菲尔德和其他作者的著作,以及“经济学家”杂志。他特别注意货币流通、土地和地租、人口以及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

马克思把他在探讨经济问题过程中所获得的材料广泛应用于他的政论作品。

- 4月 恩格斯重又着手研究军事科学,对匈牙利革命战争史及1848—1849年意大利战争史极为注意,并制定了革命军队在反沙俄战争中的策略。
- 恩格斯认为俄国革命运动的前途问题很重要,他阅读了赫尔岑1851年法文版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
- 恩格斯继续学习俄语,同时研究南方斯拉夫的各种语言。
- 4月—5月 马克思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历史和发展前途很有兴趣,他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的著作,并作了摘录。由于英国议会要讨论印度的管理问题,马克思研究了议会的蓝皮书和东印度公司的历史。
- 4月—1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和阿·克路斯保持经常联系,并对他们在美国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给以很大帮助。由于魏德迈和克路斯给旅美德国工人的团体(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改革报”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介绍埃卡留斯、皮佩尔、德朗克及其他一些支持他们的人参加报社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为“改革报”所转载。
- 4月1日和8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揭露柏林警察当局捏造的、英国政府用来加强对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的警察监视的所谓“革命密谋”。“柏林密谋”和“柏林密谋。——伦敦警察局。——马志尼。——拉德茨基”两文发表于4月18日和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4月9日左右—5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设法找出版者来出版他们合写的、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的“流亡中的大人

物”一书的手稿，但未能成功。

- 4月9日 马克思从克路斯那里知道希尔施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威·希尔施的辩护书”这本诽谤性文集即将在美国发表，写了“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希尔施同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派头目——维利希的狼狈为奸，同时也驳斥了希尔施所散布的马克思将“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的手稿交给普鲁士警察当局的谎言。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载于5月5日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 4月12日 恩格斯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在分析欧洲的经济和政治情况的基础上表述了他对大陆上新的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给政党在德国未来的革命战斗中的策略等问题的一系列看法。这封信的一部分由魏德迈以匿名文章的形式发表于5月4日的“改革报”。
- 为了继续给厄·琼斯出版和编辑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的工作以经常不断的帮助，马克思为该报写了“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一文。马克思的一系列揭露联合内阁的预算的反人民性的文章，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该文发表于4月16日的“人民报”。马克思把一篇内容与这篇文章相仿的题为“内阁的成就”的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于4月27日发表。
- 4月中旬 马克思接到克路斯的通知，克路斯告诉他，他在1853年2月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于3月28日为德国民主派在美国办的报纸“警钟”（《Der Wecker》）所摘要转载，其他许多美国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 4月19日—25日左右 马克思继续写评论格莱斯顿的预算的文章。他的“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

和“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两文于4月23日和30日载于宪章派的“人民报”。另外两篇文章“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和“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载于5月3日和6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4月24日左右 在波士顿(美国)出版了马克思的抨击文“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单人本。
- 4月26日—29日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瑞士的政治地位的文章。马克思为这篇文章增添了关于英国政府迫害流亡者一节，并于4月29日将文章寄出。报纸编辑部把这篇文章分为两篇，先后于5月14日和17日发表，一篇题为“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另一篇题为“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 4月26日 马克思接到一份关于柏林警察局头子施梯伯和普鲁士警官戈德海姆到达伦敦以及威·希尔施继续同他们保持联系的匿名通知。他审查了这份材料的可靠性并把它寄给魏德迈和克路斯在美国工人报刊上发表。这件事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一文中也作了报道。
-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引用了许多说明英国和法国工商业萎缩及表明资本主义繁荣的不稳定性的材料。
- 4月底 由于马克思的著作难于推销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不按时付给稿费，马克思一家陷于困境。恩格斯给马克思及其家庭以物质援助。
- 4月30日—5月19日 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 5月—6月 为了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恩格斯学习波斯语，从原文阅读诗人哈菲兹及历史学家米尔洪德的作品。

- 5月20日 马克思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太平军起义的原因和性质,并指出中国事变对欧洲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影响。该文于6月14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 恩格斯把魏德迈寄来的钱转寄马克思,请他转交弗莱里格拉特(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及其家属救济金收款人)。这些钱是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及他们的拥护者的呼吁而在美国捐募的。
- 5月24日 马克思着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一些有关印度的文章,因为这时议会即将讨论延长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期限问题。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条款变更。——印度。——土耳其和俄国”于6月9日在报上刊登。
- 5月25日左右 恩格斯阅读福斯特的“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一书。
- 5月26日左右—6月1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各国的历史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谈到东方的社会经济关系时,马克思指出那里没有土地私有制。
- 恩格斯依照马克思的建议阅读了贝尔尼埃论述印度大莫卧儿国家的著作。
- 5月27日—6月7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些有关欧洲政治的根本问题的文章,他特别注意俄土冲突的发展及西欧外交界在这一冲突中所持的立场。马克思的“马志尼。——瑞士和奥地利。——土耳其问题”、“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的东印度改革”等文于6月10日、14日和22日在报上发表。
- 5月31日左右 恩格斯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在波士顿刊印的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440份。他留下了一些准备在曼彻斯特散发,其余的寄给了马克思。

- 5月底—6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收到魏德迈和克路斯从美国寄去的关于他们在美国出版的德文报刊上同维利希展开论战的消息。由于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发表，维利希对马克思进行了一系列攻击。
- 6月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进行工作，为他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稿搜集资料。他特别注意查普曼、狄金逊、穆勒、坎伯尔、默里及其他等人有关印度的著作，并将其中有关英国的殖民制度、印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等问题作了摘录。  
马克思研究许多有关丹麦历史的著作，如德罗森、札姆韦尔、奥尔斯豪森的作品，并作了摘录。他在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稿中，在阐述丹麦的事件时利用了这些研究成果。
- 6月—8月 马克思和拉萨尔通信商谈在德国秘密转送和散发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问题。恩格斯建议把小册子夹在纱包里转送，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 6月初—7月中旬 马克思得到许多报道，这些报道都证明美国读者对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评价很高。
- 6月2日 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未经作者同意就擅自将马克思在恩格斯的某些极为重要的文章作为社论发表表示不满。马克思表示要给报社编辑德纳写信抗议这样对待他的文章。
- 6月2日—9日 为了继续给自己的战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给威·沃尔弗和威·皮佩尔安置工作。
- 6月10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揭露英国人在印度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发挥了恩格斯6月6日的信中所说的印度农业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

- 而衰落的思想。该文章于 6 月 25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6 月 14 日 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了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我国和外国的奴隶制”一书和他的其他一些鼓吹阶级利益调和及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著作。
- 6 月中旬 马克思在给克路斯的信中建议魏德迈和克路斯继续为“改革报”撰稿,尽管报社编辑部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增加。马克思强调指出魏德迈和克路斯在无产阶级革命者在美国尚未掌握其他刊物的情况下参加该报工作的重要性。
- 马克思把他对凯里的经济观点的批评意见寄给克路斯。克路斯在一篇于 9 月份发表在“改革报”上的文章里采用了这些意见。
- 6 月 17 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一方面评论了英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同时把在英国已经展开罢工运动和宪章派试图在国内恢复他们的鼓动等消息向读者作了报道。马克思从这篇文章开始在他的通讯稿中系统地阐述英国工人运动的问题。“英国的繁荣。—— 罢工。—— 土耳其问题。—— 印度”一文载于 7 月 1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6 月 20 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克路斯的通知说,在美国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改革报”的方针问题多数人赞成魏德迈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策略原则的精神所采取的路线。
- 6 月 24 日 马克思写“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一文,阐述英国统治阶级对印度进行殖民主义奴役和掠夺的历史。文章载于 7 月 11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6 月 28 日 马克思写了论述爱尔兰的租佃权的文章,揭露英国

- 大地主对爱尔兰农民进行剥削时所使用的凶恶的方法。“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载于7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不早于7月初 恩格斯阅读亚·伊·赫尔岑所写的、由伦敦自由俄国印刷所出版的反农奴制宣言“尤利耶日！尤利耶日！给俄国贵族”。
- 约7月—11月 马克思研究1807—1850年这一时期的议会报告、外交文献和资料，对英国外交史特别注意。
- 7月1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俄土冲突和英国罢工运动的通讯稿，于7月14日在报上发表。
- 7月9日 德国流亡者、科伦案件中受审的共产党人之一雅科比特马克思的介绍信来找恩格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为雅科比安排工作。
- 7月12日 针对俄国侵占多瑙河各公国，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反对沙皇俄国的扩张政策及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的文章。马克思的“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迭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一文于7月25日在报上刊登。
- 7月19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继续阐述俄土冲突及西欧外交界的干涉尝试的文章。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论证了他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在巴尔干建立斯拉夫民主国家的思想。他的“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一文于8月5日在报上发表。
- 7月22日 马克思写“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总结了他关于印度的著述，得出了不列颠在这个国家中的殖民统治必将崩溃的结论。该文载于8月8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7月29日—8月12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系列综合评论，阐述欧洲政治的基本问题。马克思的“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广告税。——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等文自8月12日至24日在报上刊登。
- 7月底—8月初 恩格斯去伦敦同从德国到此地逗留的母亲相会。
- 8月16日和19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谈英国议会关于土耳其问题的辩论的文章，分析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这两篇文章载于9月2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标题为“乌尔卡尔特。——贝姆。——土耳其问题在上院”、“土耳其问题在下院”。
- 8月19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弗莱里格拉特转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克莱因的来信，信中建议在前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前佐林根、爱北斐特及杜塞尔多夫等地同盟支部之间建立联系。马克思在给克莱因的回信中建议保持工厂工人的独立组织，防止小资产阶级分子钻入。考虑到要保守秘密，马克思建议只通过个人接触同伦敦保持联系。
- 8月23日 马克思写“大陆和英国的情况”一文。文中在阐述东方问题的同时，对业已结束的英国议会会议作了总结，揭露联合内阁和英国议会的反动政策。该文载于9月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8月30日 在“晨报”上围绕着巴枯宁展开了论战，在论战过程中有人攻击“新莱茵报”，因此马克思给“晨报”编辑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明“新莱茵报”对巴枯宁的态度。马克思的信载于9月2日的“晨报”。

- 8月30日—9月27日 马克思写了一些谈欧洲经济状况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主要欧洲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济中有经济危机日益迫近的迹象。“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政治动态。——欧洲缺粮”等文从9月15日至10月17日刊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
- 9月3日—4日 “晨报”上又出现了攻击“新莱茵报”的论战短评，因此马克思给该报编辑部写了第二封信。因为编辑部拒绝刊登这封信，马克思于9月10日把他的回信发表在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上。
- 9月9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谈1844年皮尔的银行法令的文章，于9月24日作为社论在报上发表。
- 9月29日 恩格斯针对俄土的备战写了“俄军在土耳其”一文，分析多瑙河上武装力量的对比。从这篇文章开始，恩格斯在克里木战争过程中有系统地写了军事评论。该文于10月17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 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把一些有关英国某些经济部门状况的具体材料告知马克思。
- 10月4日—12月6日 马克思深入分析蓝皮书、议会报告、外交文献和报刊材料，并在这一基础上写了一系列揭露帕麦斯顿的文章，描述帕麦斯顿是当权的政治寡头的代表，并对整个英国政府制度给予评价。这些文章以“帕麦斯顿勋爵”为总标题自10月22日至12月24日在“人民报”上连载。其中大部分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个别文章在“改革报”上用德文转载。
- 10月7日 马克思继续系统阐述英国罢工运动的进程，写了“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一文。该文发表于10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 |              |   |
|--------------|---|
| 10月12日       | 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分析了法国的局势并建议恩格斯写一篇关于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可能给波拿巴政府带来的后果的文章。   |
| 10月21日—27日左右 | 恩格斯写了两篇文章谈土耳其政府对俄国宣战后巴尔干和高加索的战局。“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神圣的战争”两文先后于11月8日和15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                                     |
| 约11月         | 马克思询问德纳能否在美国刊印德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   |
| 11月5日        | “人民报”编辑部继续发表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一文,并在一篇专门短评中提起读者注意该文对揭露英国统治阶级政策的重要性。  |
| 11月8日左右      | 恩格斯写“土耳其战争的进程”一文,分析了俄土两国军队之间在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该文于11月25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刊登。  |
| 11月11日       | 马克思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一篇通讯稿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报编辑部于11月28日把其中恩格斯所写部分作为社论发表,标题为“俄军的失败”。马克思所写部分驳斥了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英国工人状况改善的荒谬论断,于同日单独发表,标题为“工人问题”。 |
| 11月15日       | 马克思写“繁荣。——工人问题”一文,驳斥英国资产阶级杂志“经济学家”所说的英国经济繁荣具有稳定性的说法。这篇文章还报道了宪章派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鼓动召开工人议会的消息。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1月30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 11月18日左右     | 恩格斯继续密切注视俄土之间的战争动态,又写了一篇谈土耳其战争进程的文章,于12月7日在“纽   |

约每日论坛报”作为社论刊登。

- 11月20日左右 在给阿·克路斯的信中,马克思对乌尔卡尔特的历史观和他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克路斯在他的“戴维·乌尔卡尔特”一文中采用了马克思的这些意见,该文发表于12月19日的“改革报”。
- 11月21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克路斯寄来几期载有维利希反对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文章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 11月21日—28日左右 马克思写了一篇抨击“高尚意识的骑士”反对维利希,揭露了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宗派活动和冒险主义策略。
- 11月22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马克思寄来的维利希反对马克思的文章原文。应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写了一篇驳斥维利希的诽谤的声明,并寄给马克思,供他在写“高尚意识的骑士”时使用。马克思把恩格斯的这份声明收进了他的文章。
- 11月25日 魏德迈、克路斯和雅科比在“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发表声明,驳斥维利希对马克思进行的诽谤性攻击。在这一声明中他们使用了马克思寄给他们的材料。
- 11月29日 马克思把他的抨击文“高尚意识的骑士”寄给克路斯在美国刊行。该文于1854年1月中在纽约发表。
- 马克思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琼斯和宪章派的其他领袖们所进行的争取召开工人议会的鼓动。“曼托伊费尔的演说。——普鲁士的宗教运动。——马志尼的宣言。——伦敦市政厅。——罗素的改革。——工人议会”一文于12月12日在报上刊登。

- 
- 12月2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军事评论“多瑙河战争”。该文于12月16日作为社论在报上发表。
- 12月2日—9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文章，分析西欧列强在俄土战争中的立场。“土耳其战争。——工业的灾难”和“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两文于12月16日和26日在报上刊登。
- 12月13日 马克思写“俄国的胜利。——英国和法国的地位”一文，指出拿破仑第三的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增长表明了波拿巴政权的不稳固性。该文载于12月2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12月14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他的亲戚约·卡·尤塔要他给在开普敦出版的日报“南非人报”（《Zuid-Afrikaan》）撰稿的来信。
- 12月中旬 恩格斯力求辞掉“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员的工作，想做伦敦一家报纸的军事记者，以便能有更多闲暇时间写他已经构思好的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史的著作，并能在伦敦与马克思生活在一起。这个试图没有成功。
- 12月下半月 古·勒维以前莱茵省共产主义者同盟某些支部的代表资格由杜塞尔多夫来见马克思。他试图向马克思证明发动伊塞隆、佐林根和莱茵省其他城市的工厂工人起义的必要性。马克思向他说明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是不适时的，也是徒劳无益的。
- 12月16日左右 “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马克思的一篇谈帕麦斯顿的文章“帕麦斯顿和俄国”由伦敦塔克尔出版社出单行本。整个一版书在几星期内就脱销了。
- 12月16日 马克思写“帕麦斯顿辞职”一文。该文发表于12月3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 
- 12月20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寄去一篇谈报刊对帕麦斯顿辞职的评论的文章。该文没有在报上发表。
- 12月23日左右 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军事评论“土耳其战争的进程”。这篇文章以英国报刊的消息为根据对西诺普会战和阿哈尔齐赫战役作了评述,于1854年1月9日作为社论发表。
- 12月底 马克思收到德纳对他愿意写德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的答复。德纳要求这些文章不得对美国人的宗教情感有任何损害,以此作为在美国一家杂志发表这些文章的条件。马克思写这方面文章的打算始终未能实现。
- 1853年12月底— 恩格斯在伦敦马克思家作客。  
1854年1月1日

## 人名索引

## 三 画

小皮特, 威廉 (Pitt The Younger, William 175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 (1783—1801 和 1804—1806)。——第 84、169、170、203 页。

## 四 画

巴特, 伊萨克 (Butt, Isaac 1813—1879)——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在七十年代是爱尔兰自治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第 66 页。

巴拉盖·狄利埃, 阿希尔 (Baraguay d' 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法国将军, 1854 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1853—1854); 1854 年为波罗的海法国远征军指挥官。——第 491 页。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民主主义者, 政论家,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 后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 他在第一国际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他进行分裂活动, 在 1872 年的海牙会议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 321—323、328 页。

巴甫洛夫, 普罗科菲·雅科夫列维奇

(Павлов, Прокофий Яковлевич 1796—1868)——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时期为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第 516、531 页。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 (Bahadur Shah II 1767—1862)——印度大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个 帝沙赫 (1837—1858)。——第 227 页。

巴特米, 艾曼纽尔 (Barthélemy, Emmanuel 约 1820—1855)——法国工人, 布朗基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和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 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5 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第 556、568、569 页。

巴克豪斯, 约翰 (Backhouse, John 1772—1845)——英国官员, 1827—1842 年任外交副大臣。——第 438 页。

巴登伯爵——见弗里德里希一世。

比彻—斯托, 哈里埃特·伊丽莎白 (Beecher—Stowe, Harriet Elizabeth 1811—1896)——美国女作家, 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第 93 页。

比诺, 让·马提阿尔 (Bineau, Jean Martial 1805—1855)——法国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 公共工程大臣 (1849—1851), 财政大臣 (1852—1855), 波拿巴

- 主义者。——第 358 页。
- 比顿, 约翰·埃利奥特·德林瓦特 (Bethune, John Elliot Drinkwater 1801—1851)——英国法学家和大官; 1848 至 1851 年是印度总督所辖的参事会参事。——第 140 页。
- 比埃特里, 比埃尔·玛丽 (Pietri, Pierre Marie 1809—1864)——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巴黎警察局长 (1852—1858)。——第 31 页。
- 丹东, 若尔日·雅克 (Danton, Georges Jacques 1759—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雅各宾党人右翼领袖。——第 329 页。
- 丹麦国王——见弗雷德里克七世。
- 丹尼洛·涅哥什 (Данило Негош 1826—1860)——门的内哥罗的大公 (1852—1860)。——第 503 页。
- 丹年别尔格, 彼得·安得列也维奇 (Данненберг,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792—1872)——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第 516、531 页。
- 韦克, 路易 (W eck, Louis)——1853 年反动的弗里布尔 (瑞士) 暴动的参加者。——第 100 页。
- 韦克贝克尔 (W eckbecker)——1853 年奥地利驻土麦那总领事。——第 219、239 页。
- 戈洛文, 伊万·加甫利洛维奇 (Голов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16—1886)——俄国自由派地主, 侨居英国, 政论家, 四十至五十年代同赫尔岑和巴枯宁很接近。——第 321、327、328 页。
- 戈德海姆 (G oldheim)——普鲁士警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伦敦普鲁士谍报机关的领导人之一。——第 96 页。
- 牛顿, 伊萨克 (M ewton, Isaac 1642—1727)——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力学科学的创始人。——第 109 页。
- 尤尔, 安得鲁 (U 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 庸俗的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论者。——第 96 页。
- 切尔宁, 安东·弗雷德里克 (Tscherning, Anton Frederick 1795—1874)——丹麦军官, 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1848 年为陆军大臣。——第 502 页。
-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 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断断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 126 页。
- 邓达斯, 詹姆斯·威特利·迪恩斯 (Dundas, James Whitley Deans 1785—1862)——英国海军上将, 1852 年至 1855 年 1 月为参加克里木战争的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第 5、129、135 页。
- 无地约翰 (约 1167—1216)——英国国王 (1199—1216)。——第 27 页。
- 厄斯特德, 安德斯·桑戴 ( rsted, Anders Sandwe 1778—1860)——丹麦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53—1854 年任首相。——第 502 页。
- 扎莫伊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Zamojski, Wladislaw)——伯爵, 波兰大地主, 曾参加 1830—1831 年起义, 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之一。——第 437 页。
- 夫赖堡大主教——见维卡里。

## 五 画

布龙, 卡尔 (Bruhn, Karl 生于 1803

- 年)——德国记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被开除出盟;后为拉萨尔的拥护者。——第545页。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员,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拥护俾斯麦。——第548页。
- 布奥尔-绍恩施坦,卡尔·斐迪南(Buol-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1797—1865)——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后为驻伦敦公使(1851—1852),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第219、266、291、301、363、603页。
- 布鲁姆,亨利·彼得(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男爵,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著名活动家,大法官(1830—1834);五十年代他在政治生活中不起多大作用。——第211页。
- 布鲁克,卡尔·路德维希(Bruck, Karl Ludwig 1798—1860)——男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大企业家;曾任工商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1851),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53—1855),财政大臣(1855—1860)。——第219、314、462、473页。
- 布罗顿——见霍布豪斯,约翰·凯姆。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自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之一;历任自由党内阁各部大臣。——第66、141、154、198、206、218、223、229、475、505页。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848年革命时期站在法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极左翼的立场,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568、569页。
- 布尔克奈,弗朗斯瓦·阿道夫(Bourquene, Francois Adolphe 1799—1869)——法国外交家,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41—1844),后为大使(1844—1848);驻维也纳公使(1853—1856),后为大使(1856—1859)。——第266页。
- 布尔韦尔,威廉·亨利·利顿·厄尔(Bulwer, William Henry Lytton Earl 1801—1872)——英国外交家,议会议员(1830—1837),辉格党人;1839年和1840年是英国驻巴黎的代办,后为驻马德里(1843—1848)、华盛顿(1849—1852)和佛罗伦萨(1852—1855)公使;1858—1865年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第440、459页。
- 布鲁图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约85—42)——罗马政治活动家,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贵族共和派阴谋的发起人之一。——第33页。
- 布萨诺夫,菲力浦·伊万诺维奇(Брус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1797—1875)——男爵,俄国外交家,驻伦敦公使(1840—1854、1858—1860),后为大使(1860—1874)。——第155、160、161、198、293页。
- 布里格斯,约翰(Briggs, John 1785—1875)——英国将军;1801—1835年在东印度公司供职;1853年为东印度公

- 司股东会成员。——第 225 页。
- 布莱克特, 约翰·芬威克·伯戈因 (Blackett, John Fauweek Burgoyne 1821—1856)——英国议会议员。——第 143、308 页。
-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 布德贝尔格,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Будберг,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98—1876)——俄国将军; 1853—1854 年为驻多瑙河各公国的特派专员。——第 604 页。
- 布尔昂的哥特弗利德 (约 1060—1100)——下洛林公爵 (1089—1100),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 (1096—1099) 的首领之一。——第 547 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 (1848—1916)。——第 126、474 页。
- 弗略里, 查理 (Fleury, Charles) (真名为: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译 Carl Friedrich August Krause 生于 1824 年)——伦敦商人, 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第 44、96 页。
- 弗朗斯瓦一世 (Francois I 1494—1547)——法国国王 (1515—1547)。——第 67 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 (Friedrich I 1826—1907)——1852 年起是巴登的实际上的统治者, 1856 年起是巴登大公。——第 573、574 页。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 (Friedrich I Barbarossa 约 1123—1190)——1152 年起是德国国王, 后为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1155—1190)。——第 121、406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第 32、33、125、237、355、572、575 页。
- 弗雷德里克七世 (Frederik VII 1808—1863)——丹麦国王 (1848—1863)。——第 257、273、274、502 页。
- 卡诺, 拉查尔·伊波利特 (Carnot, Lazare 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1851 年以后成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第 605 页。
- 卡拉-格奥尔基 (кара-Георгии) (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 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1752—1817)——1804—1813 年塞尔维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斗争的领导者, 独立的塞尔维亚执政者 (1811—1813), 卡拉格奥尔基王朝的奠基者; 1813 年失败后逃出塞尔维亚, 1817 年秘密回到祖国; 按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的命令被杀害。——第 39 页。
- 卡索拉, 卡洛 (Cassola, Carlo 生于 1814 年)——意大利爱国者, 革命者, 马志尼的拥护者。——第 342 页。
- 卡拉德, 尼古拉 (Carrard, Nicolas 死于 1853 年)——反对瑞士资产阶级政府的教权反对派领袖之一, 1850、1851 和 1853 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领导人。——第 99 页。
- 卡莱尔, 托马斯 (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 历史学家, 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的资产阶级, 倾向托利党, 1848 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 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 343 页。

- 卡德威尔, 爱德华 (Cardwell, Edward 1813—1886)——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领袖之一, 后成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 (1852—1855), 爱尔兰事务大臣 (1859—1861), 殖民大臣 (1864—1866) 和陆军大臣 (1868—1874)。——第 218 页。
- 卡尔尼茨基, 弗拉基斯拉夫 (Karnicki, Wladislaw)——伯爵, 奥地利外交家, 1853 年任驻伯尔尼代办。——第 124 页。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 (人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 的领袖, 首任内务大臣 (1822—1827 和 1828—1830)、首相 (1834—1835 和 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1846)。——第 69、82、205、288、330、334、335、337—340、356、404、413、417、420、423、432、434、458、459、461、464、492 页。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822—189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 议会议员; 前者的儿子。——第 154 页。
- 皮斯 (Peace)——英国煤矿企业家克罗斯德伯爵的职员。——第 504 页。
- 皮佩尔, 威廉 (Pieper, Wilhelm 约生于 1826 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记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侨居伦敦; 1850—1854 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第 562、565 页。
- 汉特, 亨利 (Hunt, Henry 1773—1835)——著名的英国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第 405 页。
- 汉普敦, 约翰 (Hampden, John 1594—1643)——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贵族的利益。——第 255 页。
- 汉密尔顿——见西摩尔, 乔治·汉密尔顿。
- 圣马尔克-日拉丹 (Saint-Marc-Girardin 1801—1873)——法国新闻记者和文艺学家, 奥尔良党人。——第 134、135 页。
- 圣莱昂纳兹——见萨格登, 爱德华。
- “圣者”斯蒂凡一世 (Stephan I 约 975—1038)——匈牙利公爵 (997 年起), 1001—1038 年为匈牙利国王。——第 558 页。
- 瓦尔德克, 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Waldeck, Benedictus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派领导人之一; 后为进步党人。——第 33 页。
- 瓦列夫斯基伯爵, 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伦纳 (Walewski, Alexander-Florian-Joseph Colonna 1810—1868)——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儿子; 曾参加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 曾任外交大臣 (1855—1860); 主持巴黎大会 (1856)。——第 408 页。
- 尼罗德 (Ниндрот)——俄国将军, 1853 年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第 532 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 (1825—1855)。——第 5、19、23、40、126、130、131、133—135、155、161、164、184—186、197、198、215、219—222、237、238、240、258、261、262、266—268、271—274、292—296、298、300—302、306、316、330、350—355、

- 365—369、384、392、401—403、406—408、421、435、436、437、442、455、458、463、464、472、473、478、480、484、501、503、535、592、595—597、603—605、610、611页。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547页。
- 本诺克,弗兰西斯(Bennoch, Francis)——美国商人,1853年伦敦市政厅委员。——第576页。
-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一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ey—Fitzmaurice 1780—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1806—1807年任财政大臣,后任枢密院院长(1830—1841),不管部大臣(1852—1863)。——第286页。
- 加腊沙宁,伊里亚(Гарашанин, Илья 1812—1874)——塞尔维亚国家活动家,自由主义者;曾任内政大臣(1843—1852、1858—1859),内阁会议主席和外交大臣(1852—1853、1861—1867);五十年代采取反俄方针,后来又促使塞尔维亚同俄国亲近。——第13、259、303页。
-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36、130、457页。
- 六 画**
- 伊索(A isopos 公元前六世纪)——半传说的古希腊寓言作家。——第60页。
- 伊文思,乔治·德·雷希(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军官,1846年起升为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自由派的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409、432页。
- 伊万迪斯(Yvandis)——1853年瓦拉几亚内政部官员。——第314页。
- 伊斯马伊耳—帕沙(Ismail Pasha 1805—1861)——土耳其将军,切尔克斯人;1853年任多瑙河土军指挥官。——第516页。
- 伊布拉希姆—帕沙(Ibrahim Pasha 1789—1848)——埃及的统帅,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嗣子;1824—1828年曾率领土军镇压希腊起义者;在埃及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任埃军总司令(1831—1833和1839—1841);1844年起是埃及的共同摄政者。——第420、424、426页。
- 伊斯拉马托夫,伊万·尼古拉也维奇(Исламатов, 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俄国海军军官,“曙光号”巡航舰舰长。——第599页。
-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第167、172页。
- 安德森(Anderson)——苏格兰银行行长。——第339页。
- 安德顿,威廉(Anderton, William)——英国约克郡的厂主。——第219、239页。
- 安斯提,托马斯·契泽姆(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7—1852年为议会议员。——第409、435、438—441、453页。
- 安都昂,古斯塔夫(Antoine, Gustav)——

-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奥古斯特·布朗基之妹夫。——第 568 页。
- 安赫斯特，威廉·皮特 (Amherst, William Pitt 1773—1857)——伯爵，英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印度总督(1823—1828)。——第 228 页。
- 安德朗尼科夫，伊万·马耳哈左维奇 (Андронников, Иван Малхазович 1798—1868)——公爵，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期间在高加索作战；格鲁吉亚人。——第 617 页。
-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 (Minie, Claude E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 535 页。
- 米尔纳·基卜生 (Milner Gibson)——见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
- 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 (Милош Обренович 1780—1860)——塞尔维亚的大公(1817—1839 和 1858—1860)，奥布廉诺维奇王朝的奠基者。——第 40 页。
- 米耳恩斯，理查·蒙克顿 (Milnes, Richard Monckton 1809—1885)——英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人，国会议员。——第 307、316 页。
- 米哈伊尔·奥布廉诺维奇 (Михаил Обренович 1823—1868)——塞尔维亚的大公(1839—1842 和 1860—1868)。——第 259、303 页。
- 米斯科夫斯基，亨利克·路德维希 (Miskowsky, Henrik Ludvic 死于 1854 年)——波兰军官，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被镇压后流亡土耳其，后迁伦敦。——第 554 页。
- 乔治·桑 (George Sand) (真名为：奥罗拉·杜班 Aurore Dupin 1804—1876)——法国著名的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第 321、322 页。
- 乔斯林，罗伯特 (Jocelyn, Robert 1816—1854)——子爵，英国军官，国会议员，1845—1846 年在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任职。——第 223、224 页。
- 乔治一世 (George I 1660—1727)——英国国王 (1714—1727)。——第 173 页。
- 乔治二世 (George II 1683—1760)——英国国王 (1727—1760)。——第 173 页。
-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 (1760—1820)。——第 169、173 页。
- 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 (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1880)——英国外交家，1851—1854 年任驻彼得堡公使。——第 341 页。
- 西哀士，艾曼纽尔·约瑟夫 (Sieyès, Emmanuel Joseph 1748—1836)——法国天主教神甫，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 81 页。
-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阿丁顿 (Sidmouth, Henry Addington 1757—1844)——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 (1801—1804)；任内务大臣时 (1812—1821) 对工人运动实施镇压措施。——第 393 页。
- 西尔莫伊 (Szirmay)——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匈牙利流亡者，科苏特在巴黎的密使。——第 47 页。
- 西班牙公主——见玛丽-路易莎·费南达。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

- 322)——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表现为奴隶占有制国家的理论家。——第202页。
- 亚述巴尼拔 (Assurbanipal) 古代作家著作中称萨尔达尼拔)——亚述国王(公元前668—约626)。——第279页。
-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5、367、410、416页。
- 亚历山大·卡拉格奥尔斯基耶维奇 (Александр царевич 1806—1885)——塞尔维亚的大公(1842—1858)。——第259、314、315、516、588、610页。
- 列施德—帕沙 (Reshit Pasha 1802—1858)——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多次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1853年(5月13日起)为外交大臣。——第122、197、259、260、291、295、301、314、330、355、368、462、473、588、593页。
- 列奥波特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第125、289、605页。
- 吉卡,格里哥里·亚历山大 (Ghika, Gregor Alexander 1807—1857)——莫尔达维亚的国君(1849—1853和1854—1856)。——第267、313、355、604页。
- 吉比奇,伊万·伊万诺维奇 (Г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伯爵,俄国元帅,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军队的总司令。——第7、36、515页。
- 吉姆佩尔 (Gimpel)——德国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流亡伦敦。——第516页。
-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著名的法国外交家,外交部长(1797—1799、1799—1807、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1814—1815),其特点是在政治上毫无原则和唯利是图;1830—1834年任驻伦敦大使。——第408、455页。
- 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安德鲁·拉姆西 (Dalhousie, James Andrew Ramsay 1812—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曾任印度总督(1848—1856),执行殖民地掠夺政策。——第138、140、226页。
-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耳曼 (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脱盟。——第321页。
- 艾曼努埃尔,格奥尔基·阿尔先也维奇 (Эммануэль, Георгий Арсеньевич 1775—1837)——俄国将军,匈牙利人,高加索驻军司令(1826—1831);1829年曾对厄尔布鲁士山进行考察。——第444页。
- 伍德,查理 (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第89、119、120、132、138—141、143、144、157、200、201、204、209、211、253、294、299页。
- 休谟,约瑟夫 (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之一,议会议员。——第57、80、89、143、223、405、415、417、455、460、504页。
- 考威尔,乔治 (Cowell, George)——英国

- 工人, 宪章运动活动家, 1853—1854 年普雷斯顿罢工领导者之一。——第 503、521 页。
- 多尔哥鲁科夫, 瓦西里·安得列也维奇 (Долгоруков, 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1803—1868)——公爵, 78 俄国国家活动家, 陆军大臣 (1853—1856); 宪兵头子和第三厅厅长 (1856—1866)。——第 273 页。
- 华姆斯莱, 乔舒阿 (W almsley, Joshua 1794—1871)——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第 239 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 (1842—1843), 1848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判处 6 年徒刑, 后为进步党人。——第 559 页。
- ### 七 画
- 克奥, 威廉·尼古拉斯 (Keogh, William Nicolas 1817—187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属于皮尔派, 议会中爱尔兰派的领袖之一; 在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多次担任最高司法职务。——第 137 页。
- 克罗茨, 阿那卡西斯 (Cloots, Anacharsis 1755—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曾同左派雅各宾党人接近; 革命前是普鲁士男爵。——第 329 页。
- 克莱夫, 罗伯特 (Clive, Robert 1725—1774)——孟加拉省督 (1757—1760 和 1765—1767), 不列颠在印度广泛采用强盗手段进行殖民统治的肇始人。——第 170、251 页。
- 克莱门蒂, 鲁伊治 (Clementi, Luigi)——意大利爱国者, 革命者, 马志尼的拥护者。——第 342 页。
-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首任爱尔兰总督 (1847—1852), 残酷镇压 1848 年爱尔兰起义; 外交大臣 (1853—1858、1865—1866 和 1868—1870)。——第 22、37、155、160、161、211、212、218、239、266、269、271、272、292、296、297、341、353、354、367、368 页。
- 克伦威尔, 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领袖, 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167 页。
- 克罗弗德伯爵, 詹姆斯·林齐·拜尔凯利 (Crawford, James Lindsay Balcarras 1783—1869)——英国大地主和煤矿主。——第 374、492、504 页。
- 克罗弗德, 爱德华·亨利·约翰 (Craufurd, Edward Henry John 生于 1816 年)——英国法官; 1852—1853 年为议会议员。——第 200 页。
- 克列美尔, 格奥尔基 (Кремль, Георгий)——1853 年俄国驻伦敦总领事。——第 96 页。
- 克罗斯利, 弗兰西斯 (Crossley, Francis 1817—1872)——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第 222 页。
- 克兰里卡德侯爵, 乌利克·约翰·德·巴

- 勒 (Clanricarde, Ulick John de Burgh 1802—1874)——英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1838—1841)。——第 211、285、298 页。
- 贝尔,詹姆斯 (Bell, James 死于 1842 年)——英国商人,三十年代是英国在高加索的间谍。——第 459 页。
- 贝尔,乔治 (Bell, George)——英国商人,詹姆斯·贝尔的哥哥和同伙。——第 451、455—460 页。
- 贝坦,路易·玛丽·阿尔芒 (Bertin, Louis Marie-Armand 1801—1854)——法国新闻记者,奥尔良党人,1841—1854 年是“辩论日报”的出版者。——第 135 页。
- 贝姆,约瑟夫 (Bem, Joseph 1795—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 年起义的参加者;1848 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匈牙利革命军领导者之一;后在土耳其军队服务。——第 291 页。
- 贝林,亚历山大 (Baring, Alexander 1774—1848)——伦敦的一家银行经理,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 339 页。
- 贝朗热,比埃尔·让 (Beranger, Pierre Jean 1780—1857)——法国最杰出的民主主义诗人,写有许多政治讽刺诗。——第 6 页。
-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报告之一,被判 5 年徒刑;后来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543、545、563—566 页。
- 贝伦兹,尤利乌斯 (Berends, Julius 生于 1817 年)——柏林印刷厂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第 33 页。
- 贝克莱,弗兰西斯·亨利·菲茨哈丁 (Berkeley, Francis Henry Fitzhardinge 1794—1870)——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 154 页。
- 贝特曼-霍尔威克,摩里茨·奥古斯特 (Bethmann-Hollweg, Moritz August 1795—1877)——普鲁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之一,普鲁士议会第一议院议员,后为第二议院议员 (1849—1855)。——第 32、41 页。
- 利文,威廉·卡尔洛维奇 (Ливен, Вильгельм Карлович 1800—1880)——男爵,俄国将军,曾多次完成外交使命。——第 355 页。
- 利文,达丽娅(多罗苔娅)·赫里斯托弗罗夫娜 (Ливен, Дарья (Дорогея) Христофоровна 1785—1857)——公爵夫人,俄国外交家赫·安·利文之妻;她在欧洲外交生活中,作为伦敦和巴黎的政治沙龙的女主人起着显著的作用。——第 23 页。
- 利文,赫里斯托弗尔·安得列也维奇 (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1774—1839)——公爵,俄国外交家,驻柏林公使 (1810—1812),驻伦敦大使 (1812—1834)。——第 186、188、262、400 页。
- 利德耳,亨利·乔治 (Liddell, Henry George 1821—1903)——英国议会活动家。——第 212 页。
- 利齐乌斯 (Lizius)——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图书出版人。——第 47 页。

- 利普兰迪,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 (Липранди,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1796—1864)——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第 531 页。
- 利迭尔斯,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Лиде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90—1874)——俄国将军, 曾任多瑙河俄军军长 (1853—1854), 南方军司令 (1855), 1856 年初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第 513、532 页。
- 利物浦伯爵, 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 (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son 1770—182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历任内阁各部大臣, 曾任首相 (1812—1827)。——第 392 页。
- 狄金逊 (Dickinson)——布莱克本 (英国郎卡郡) 铸铁厂厂主。——第 374 页。
- 狄金逊, 约翰 (Dickinson, John 1815—1876)——英国政论家, 自由贸易论者; 他著有许多有关印度的著作, 是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第 208 页。
- 狄更斯, 查理 (Dickens, Charles 1812—1870)——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 92 页。
-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Δημοσθένης) 公元前 384—322)——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 雅典的反马其顿党的领袖, 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第 22 页。
- 沙尔, 雅克·尤贝尔 (Charles, Jacques-Hubert 1793—1882)——瑞士反动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1853 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参加者。——第 99 页。
- 沙米尔 (Шамиль, 约 1798—1871)——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达格斯坦和彻岑的山民反对沙皇殖民主义者斗争的领导人, 苏丹土耳其用来进行侵略的反动狂信派的思想家之一。——第 165、478、503、513 页。
- 沙菲汗——伊朗外交家, 1853 年任驻伦敦公使。——第 501 页。
-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约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首领之一; 1856 年又重新与马克思接近;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 541、553、558、568 页。
- 麦克唐奈 (MacDonnell)——苏格兰女地主。——第 470 页。
- 麦克尼耳, 约翰 (McNeill, John 1795—1883)——英国外交家, 1836—1842 年任驻德黑兰公使。——第 402 页。
- 麦克格雷哥尔, 詹姆斯 (MacGregor, James)——1852—1853 年英国议会议员。——第 66 页。
- 亨策, 阿·(Hentze, A.)——德国军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原告证人。——第 562—564 页。
- 亨利, 托马斯 (Henry, Thomas 1807—1876)——英国法官。——第 96、98 页。
- 亨利五世 (Henri V)——见尚博尔, 昂利·沙尔。
- 沃伦, 查理 (Warren, Charles 1798—1866)——英国军官, 1858 年起为将军, 1816—1819 和 1830—1838 年在印度任职; 克里木战争参加者。——第

- 249页。
- 沃龙佐夫, 米哈伊尔·谢明诺维奇 (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ёнович 1782—1856)——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将军, 1844—1854年为高加索驻军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503、513、535、617页。
- 沃依诺维奇, 马尔柯·伊万诺维奇 (Войнович, Марко Иванович 死于1807年)——伯爵, 俄国海军军官, 达尔马威亚人, 1801年起为海军上将; 1781年曾率领一支远征队想在里海海岸一个岛上修筑防御工事, 但没有成功。——第130页。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第181、505页。
- 李伯尼, 亚诺什 (Libényi, János 约1832—1853)——匈牙利裁缝学徒, 曾于1853年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第33页。
- 里德, 托马斯·梅恩 (Reid, Thomas Mayne 1818—1883)——著名的英国作家, 惊险小说作者。——第98页。
- 里夫, 亨利 (Reeve, Henry 1813—1895)——英国新闻记者和国家官员, 1853年为枢密院秘书。——第351、360页。
- 里子公爵——见奥斯本, 托马斯。
- 苏路克, 法斯廷 (Souloouque, Faustin 约1782—1867)——黑人的海地共和国总统, 1849年称帝, 号法斯廷一世。——第295页。
- 苏沃洛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伟大的俄国统帅。——第383、513页。
- 坎宁, 乔治 (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07—1809、1822—1827), 内阁首相 (1827)。——第391、392、395、436页。
- 坎伯尔, 乔治 (Campbell, George 1824—1892)——1843—1874年任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 (断续地), 著有关于印度的著作多种; 后为议会议员 (1875—1892), 自由党人。——第205—207、208、226、243、245、250页。
- 伯克, 艾德蒙 (Burke, Edmund 1729—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早期倾向自由主义, 后来成为反动派,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凶恶敌人之一。——第208页。
- 伯利克里 (Perikles 公元前约490—429)——雅典国家活动家, 曾促进奴隶民主制制的巩固。——第419页。
- 希尔, 理查·莱洛尔 (Sheil, Richard Lalor 1791—1851)——爱尔兰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辉格党人。——第431、432、441页。
- 希尔施, 威廉 (Hirsch, Wilhelm)——汉堡的店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第44、45、47、96、541、560、561页。
- 肖雷, 约瑟夫 (Chollet, Joseph)——1853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参加者。——第99页。
- 杜普拉, 古斯塔乌斯·查理 (DuPlat 或 Du Plat, Gustavus Charles)——英国外交家, 1841—1854年为驻华沙领事。——第413页。
- 辛凯尔迪, 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 (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

- rich 1805—1856)——普鲁士政府官员, 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 1853年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第31—33页。
- 穷汉瓦尔特(或穷汉高蒂耶)(Gautier, Sans Avoir 死于1096年)——法国骑士,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中法国农民支队的统率者之一。——第541页。
- 邦迪埃拉兄弟, 阿提利奥(1810—1844)和埃米利奥(1819—1844)(Bandiera, Attilio and Emilio)——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奥地利舰队的军官, “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 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被处死(1844)。——第599页。
- 菲尔茨, 托马斯(Childs, Thomas)——英国商船“雌狐号”的船长。——第451页。
- ## 八 画
- 阿利—帕沙(Ali Pasha 1741—1822)——巴尔干半岛西南部一个国家的奠基者和执政者, 定都在亚尼纳城(1788—1822); 他在跟土耳其苏丹军队激战两年(1820—1822)之后投降, 被背信弃义地杀害。——第36页。
- 阿加—穆罕默德(Agha Muhammad 1742—1797)——伊朗的沙赫(1794—1797), 卡查尔王朝的奠基者。——第130页。
- 阿勃迪—帕沙(Abdi Pasha 生于1801年)——土耳其将军, 1853年任高加索土军司令。——第488, 489, 617页。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Aberdeen, George Gordon 1784—186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 1841—1846)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第4, 22, 35, 37, 93, 119, 135, 138, 155, 160—165, 188, 198, 201, 212, 218, 223, 229, 262, 266, 286, 288, 298, 302, 303, 307, 341, 352, 354, 368, 400, 436, 444, 445, 452, 475, 588, 592, 609页。
- 阿盖尔公爵, 乔治·道格拉斯·坎贝尔(Argyll, George Douglas Campbell 1823—1900)——英国国家活动家, 皮尔派, 后为自由党人; 掌玺大臣(1853—1855, 1859—1866, 1880—1881), 印度事务大臣(1868—1874)。——第218页。
- 阿布德—艾尔—喀德(Abd el Kader 1808—1883)——1832—1847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 1847年被法国人所俘, 1852年得到拿破仑第三的许可, 移居土耳其。——第479页。
- 阿卜杜—麦吉德(Abdul-Mejit 1823—1861)——土耳其苏丹(1839—1861)。——第122, 184, 186, 220, 221, 237—241, 259, 260, 267, 278, 295—297, 301—304, 306, 313, 314, 350—355, 364—368, 462, 463, 472, 473, 479, 516, 588, 594, 595, 597, 603页。
- 阿卜杜—阿吉兹(Abdul-Aziz 1830—1876)——土耳其苏丹阿卜杜—麦吉德的弟弟, 1861—1876年为土耳其苏丹。——第239页。
- 阿尔宁, 亨利希·弗里德里希(Arnim, Heinrich Friedrich 1791—1859)——伯爵, 普鲁士外交家, 勃兰登堡反动内阁外交大臣, 驻维也纳公使(1845—1848, 1851—1858)。——第266页。

- 阿罕默德 (Ahmet 死于 1855 年)——突尼斯的贝伊 (1837—1855)。——第 463 页。
- 阿尔伯特 (Albert 1819—1861)——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第 289 页。
- 阿耳巴诺 (Albano)——英国建筑师。——第 290 页。
- 阿特伍德, 托马斯 (Attwood, Thomas 1783—1856)——英国银行家, 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属于宪章运动改良主义右翼, 于 1839 年与之决裂。——第 435、440、459 页。
- 阿耳比马尔伯爵, 乔治·托马斯·克佩耳 (Albemarle, George Thomas Keppel 1799—1891)——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二十年代初历任英国驻印度殖民军指挥官; 后来成为将军。——第 244 页。
- 阿黛拉伊德 (A délaide, Engénie Louise 1777—1847)——奥尔良女公爵, 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妹妹。——第 231 页。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 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 389 页。
- 罗斯, 休·亨利 (Rose, Hugh Henry 1801—1885)——英国军官, 后为元帅; 驻君士坦丁堡代办 (1852—1853); 克里木战争时期任驻克里木法军司令部代表,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1857—1859) 的镇压者之一。——第 5、164、295、300 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 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第 56—58、63、91、119、137、138、154、155、157、161、200、211、213、220、229、239、253、266、272、299—302、306、307、354、368、395、576、609 页。
- 罗素, 亨利 (Russell, Henry 1751—1836)——英国法学家, 1798—1813 年在印度当法官。——第 225 页。
- 罗登伯爵, 罗伯特·乔斯林 (Rodén, Robert Jocelyn 1788—1870)——英国贵族, 保守党人。——第 285 页。
- 罗诺兹, 查理 (Ronalds, Charles)——英国法学家。——第 599 页。
- 罗巴克, 约翰·阿瑟 (Roebuck, John Arthur 1801—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第 442、454 页。
- 罗伊特, 麦克斯 (Reuter, Max)——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第 541、542 页。
- 罗赫纳, 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约生于 1824 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职业是细木工;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拥护者。——第 561 页。
- 罗宾逊, 弗雷德里克·约翰·葛德里奇子爵 (Robinson, Frederick John Viscount Goderich 1782—185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23—1827 年任财政大臣, 首相 (1827—1828)。——第 392、590 页。
- 罗特哈克尔, 威廉 (Rothacker, Wilhelm)——德国民主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美国。——第 545 页。

- 波蒙—瓦西子爵, 爱德华·斐迪南·德·拉·蓬尼尼埃尔 (Beaumont—Vassy, Edouard—Ferdinand de la Bonnière 1816—1876)——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 保皇派。——第 134 页。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波特兰公爵, 威廉·亨利·本廷克 (Port—land, William Henry Bentinck 1738—1809)——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之一; 曾任内务大臣 (1794—1801), 内阁首相 (1783 和 1807—1809)。——第 392 页。
- 波茨措—迪—博尔哥, 卡尔·奥西波维奇 (Потс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伯爵, 俄国外交家, 科西嘉人, 1814 至 1821 年是驻巴黎公使, 1821—1835 年为大使, 后来是驻伦敦大使 (1835—1839)。——第 185—189、230、258、262、400 页。
- 波门特男爵, 迈尔斯·托马斯·斯特普尔顿 (Beaumont, Miles Thomas Steypltone 1805—1854)——英国地主, 上院议员, 自由党人。——第 239、298 页。
- 波将金, 格里哥里·亚历山大罗维奇 (Потемкин, 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739—1791)——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元帅 (1784 年起); 曾领导俄罗斯南方边区的垦殖。——第 457 页。
- 波旁王朝——法国的王朝 (1589—1792、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604 页。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的皇朝 (1804—1814、1815 和 1852—1870)。——第 606 页。
- 波累克斯芬, 约翰 (Pollexfen, John 约生于 1638 年)——英国商人和经济问题的作家, 主张取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第 172 页。
- 拉·格隆尼埃尔, 路易·埃蒂耶纳·阿尔图尔·杜布罗伊—埃尔昂 (La Guéronnière, Louis—Étienne—Arthur Dubreuil—Héliou 1816—1875)——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在五十年代是波拿巴主义者。——第 238 页。
- 拉布谢尔, 亨利 (Labouchere, Henry 1798—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贸易大臣 (1839—1841 和 1847—1852), 殖民大臣 (1855—1858)。——第 213 页。
- 拉瓦累特, 沙尔·让·玛丽·费里克斯 (Lavalette 或 La Valette, Charles—Jean—Marie—Félix 1806—1881)——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1853 年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曾任内政大臣 (1865—1867), 外交大臣 (1868—1869)。——第 303 页。
- 拉德茨基, 约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 奥地利元帅, 1831 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指挥官, 1848—1849 年残酷地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1850—1856 年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 41、43、517 页。
- 拉莫里诺, 吉罗拉莫 (Ramorino, Gerolamo 1792—1849)——意大利将军, 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为皮蒙特军队指挥官, 由于采取叛变的策略, 使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利。——第 517 页。
- 拉格兰奈, 德奥多斯·玛丽·美尔基奥·约瑟夫 (Lagrené, Théodose—Marie—Melchior—Joseph 1800—1862)——

- 法国外交家；1831—1834年在彼得堡时期是大使馆一等秘书，并做了一个时期的代办。——第433页。
- 拉札列夫，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Лазарев,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788—1851)——俄国杰出的海军统帅，海军上将，两极地带的考察家；1833年起为黑海舰队总司令。——第451页。
- 彼得一世 (Петр I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27、130、131、261页。
- 彼得鲁一世 (Pedro I 1798—1834)——巴西皇帝 (1822—1831)，葡萄牙国王彼得鲁四世 (1826)，后把葡萄牙王位让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第419页。
- 彼罗夫斯基，瓦西里·阿列克谢也维奇 (Пер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795—1857)——俄国将军，奥连堡军事总督 (1833—1842)，奥连堡及萨马拉两省总督 (1851—1857)；1839—1840年为希瓦远征军指挥官。——第501页。
- 帕金顿，约翰·索美塞特 (Pakington, John Somerset 1799—1880)——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 (1852)，海军大臣 (1858—1859和1866—1867)和陆军大臣 (1867—1868)。——第3、66、85、253、299、306页。
-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的右翼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 (1852—1855)和首相 (1855—1858和1859—1865)。——第3、22、29、35、37、67、78、162、164、212、213、218、219、256、266、279、288、290、311、312、316、333、341、352、354、368、387、389—438、439—442、445、447—452、454—461、475、529、588、590—592、595、597—600、603、609—612页。
- 帕斯卡维奇，伊万·费多罗维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公爵，俄国元帅，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的总督，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1854年为多瑙河俄军总司令。——第480、485页。
- 佩里埃，斐迪南 (Perrier, Ferdinand 1812—1882)——瑞士军官和文学家，弗里布尔州国民自卫军司令 (1849—1852)；1853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领导人之一。——第99页。
- 佩拉特，阿普斯利 (Pellatt, Apsley 1791—1863)——英国企业主，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第192页。
- 佩尔采尔，摩里茨 (Per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将军，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迁居英国。——第47页。
-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逃出监狱后流亡英国，是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47、543、548、562、564页。

金克尔, 约翰娜 (Kinkel, Johanna 1810—1858) (父姓为莫克尔 M ockel)——德国女作家,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妻。——第 543 页。

门登——缅甸国王 (1853—1878)。——第 319 页。

门茨, 乔治·弗雷德里克 (Muntz, George Frederick 1794—1857)——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议会议员; 1832 年争取议会改革斗争时期, 曾组织一系列群众集会维护改革。——第 308 页。

奈特, 亨利·加利 (Knight, Henty Gally 1786—1846)——英国旅行家和作家, 议会议员。——第 409 页。

居莱, 费伦茨 (Gyulay, Ferenc 1798—1868)——伯爵, 奥地利元帅, 陆军大臣 (1849—1850),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奥军总司令。——第 197 页。

刻卜勒, 约翰 (Kepler, Johann 1571—1630)——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第 109 页。

尚博尔, 昂利·沙尔 (Chambord, Henri Charles 1820—1883)——伯爵, 波旁王朝长系的最后代表, 查理十世的孙子, 法国亨利五世王位的追求者。——第 604 页。

图古特男爵, 约翰·亚马多·弗兰茨·德·帕马拉 (Thugut, Johann A ma— deus Franz de Paula 1736—1818)——奥地利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驻君士坦丁堡公使 (1771—1776), 外交大臣 (1794—1800)。——第 260 页。

帖木儿 (塔梅尔兰) (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 东方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奠基者。——第 227 页。

## 九 画

科堡——见阿尔伯特。

科里, 阿默尔·劳里 (Corry, Armar Lowry 1792—1855)——英国海军上将。——第 129 页。

科斯塔, 马丁 (Kosztla, Martin 死于 1858 年)——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后迁美国, 入美国国籍; 所谓的“土麦那事件” (1853) 的参与者。——第 219、239、291、331 页。

科布顿,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人之一; 议会议员。——第 66、154、200、265、308、312、316、475、492、505、520 页。

科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 168、214、215 页。

科贝特, 约翰·摩尔根 (Cobbett, John Morgan 1800—1877)——英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 威廉·科贝特的儿子。——第 213、214、215、257 页。

科苏特, 拉约什 (路德维希) (Kossuth, Louis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 是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脑; 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 47、66、78、98、442 页。

科堡家族 (Coburg)——德国的一个公爵家族, 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王朝或属于这个家族, 或和这个家族有关系。——第 288、349、418、419、

- 611页。
- 科德林顿, 爱德华 (Codrington, Edward 1770—1851)——英国海军上将, 在纳瓦林会战中为俄、英、法联合舰队指挥官。——第400、425页。
- 科尔尼洛夫,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也维奇 (Корнил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06—1854)——杰出的俄国海军活动家, 海军上将, 黑海舰队参谋长 (1849—1853), 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鼓舞者和组织者之一。——第5、616页。
- 科斯策尔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Kościelski, Władysław 生于1820年)——波兰民主主义者, 流亡者, 后为土耳其军队的将军。——第322页。
- 威廉斯, 威廉 (Williams, William)——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1853年为议会议员。——第57、79页。
- 威灵顿公爵, 阿瑟·威尔斯里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 (1828—1830)。——第225、392、395、417、425、436、444、452、482、489页。
- 威尔逊, 詹姆斯 (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论者, “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 1853—1858年任财政部秘书长。——第182页。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 普鲁士国王 (1861—1888), 德国皇帝 (1871—1888)。——第32页。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72—1843)——荷兰国王 (1813—1840); 1815—1830年又是比利时国王。——第416页。
- 威廉四世 (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 (1830—1837)。——第437—441、458页。
- 威斯特摩兰伯爵, 约翰·范恩 (Westmorland, John Fane 1784—1859)——英国外交家, 驻柏林公使 (1841—1851) 和驻维也纳公使 (1851—1855)。——第266、279页。
-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冯 (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内务大臣 (1850—1858), 反动派, 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的异母哥哥。——第31、32页。
- 施特芬, 威·(Steffen, W.)——前普鲁士军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告证人, 1853年流亡英国, 后迁美国; 在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第566页。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 (1852) 的组织者之一, 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后为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第31—33、41、96、549页。
- 施拉姆, 康拉德 (Schramm, Conrad 约1822—1858)——德国工人运动著名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年起流亡伦敦,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552—557、565页。
- 施泰翰, 哥特利勃·路德维希 (Stechan, Gottlieb Ludwig 约生于1814年)——汉诺威的细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 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51 年 12 月起又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1852 年 1 月起领导伦敦工人协会。——第 561 页。
- 施梯尔贝公爵, 巴尔布·德米特利·比布斯库 (Stirbei, Barbo Demetrius Bibesco 1801—1869)——瓦拉几亚的国君 (1849—1853 和 1854—1856)。——第 267、313、355、604 页。
- 施瓦尔岑堡, 弗里德里希 (Schwarzenberg, Friedrich 1800—1870)——公爵, 奥地利军官, 后为将军, 镇压加里西亚农民起义 (1846 年) 的组织者之一, 1849 年参加镇压匈牙利的革命。——第 414 页。
- 施奈德尔第二, 卡尔 (Schneider II, Karl)——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辩护人。——第 543、564 页。
- 查普曼, 约翰 (Chapman, John 1801—1854)——英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拥护在印度实行改革。——第 249 页。
- 查理—阿尔伯特 (Charles—Albert 1798—1849)——撒丁国王 (1831—1849)。——第 575 页。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 (1625—1649),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167 页。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 (1824—1830)。——第 187、262 页。
- 查理大帝 (Charlemange 或 Charles I<sup>er</sup> le Grand 约 742—814)——法国国王 (768—800) 和皇帝 (800—814)。——第 262 页。
- 查尔托雷斯基, 亚当·埃日伊 (Czartoryski, Adam Jerzy 1770—1861)——公爵, 波兰大地主, 十九世纪初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 曾任俄国外交大臣 (1804—1806);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 起义被镇压后流亡巴黎, 在那里领导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第 316、437 页。
- 哈麦尔—普格施塔尔, 约瑟夫 (Hammer—Purgstall, Joseph 1774—1856)——奥地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 著有许多关于土耳其历史的著作; 1796—1835 年做近东的外交工作。——第 24 页。
- 哈利戴,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 (Halliday, Frederick James 1806—1901)——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员, 孟加拉省督 (1854—1859)。——第 201 页。
- 哈德威克伯爵, 查理·菲力浦·约克 (Hardwicke, Charles Philip Yorke 1799—1873)——英国海军军官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4 年起为海军上将。——第 298 页。
- 哈布斯堡王朝 (Hababurg)——自 1273 年起至 1806 年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王朝 (中有间断), 奥地利帝国王朝 (1804 年起) 和奥匈帝国王朝 (1867—1918)。——第 18 页。
- 哈森克莱维尔, 约翰·彼得 (Hasenclever, Johann Peter 1810—1853)——德国生活写实画家。——第 264 页。
- 柯尔曼 (Kollmann)——德国的书商和出版者。——第 46 页。
- 柯波克, 詹姆斯 (Coppock, James 1798—1857)——英国法学家, 议会选举事务

- 经纪人。——第 344 页。
- 柯立尔, 罗伯特·波雷特 (Collier, Robert Porrett 1817—1886)——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第 57 页。
- 柯尔培尔, 让·巴蒂斯特 (Colbert, Jean Baptiste 1619—1683)——法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总监 (财政部长) (1665—1683), 实际上是法国外交和内政的领导者; 曾实行有利于巩固君主专制政体的重商主义政策。——第 80 页。
-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 是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 568、569 页。
- 勃鲁姆, 汉斯 (Blum, Hans)——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后流亡美国, 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542 页。
- 勃罗克, 彼得·费多罗维奇 (Брок, ПетръФедорович 1805—1875)——俄国国家活动家, 财政大臣 (1852—1858)。——第 273 页。
- 胡桑, 爱德华 (Hooson, Edward)——英国工人, 宪章运动活动家。——第 192、195 页。
- 胡尔施德—帕沙 (Churchid Pasha) (理查·德博弗尔·盖昂 Richard Debauffre Guyon 1803—1856)——土耳其将军, 英国人,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1853 年为高加索土耳其军队指挥官。——第 516 页。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1871 年受封)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后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 内阁首相 (1868 和 1874—1880)。——第 3、53、59、62、66、68、69、72、80—82、84、85、87、88、93—95、155、200、201、211、229、272、287、299、333 页。
- 迪茨, 奥斯渥特 (Dietz, Oswald 1824—1864)——维斯巴登的德国建筑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50 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是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后来参加美国内战。——第 561 页。
- 娄, 罗伯特 (Lowe, Robert 1811—189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财政大臣 (1868—1873), 内务大臣 (1873—1874)。——第 253 页。
- 咸丰 (1831—1961)——中国皇帝 (1850—1861)。——第 111、115 页。
- 品得 (Pindaros 公元前约 522—约 442)——古希腊抒情诗人; 曾写了许多庄严的颂诗。——第 393、562 页。
- 济格尔, 弗兰茨 (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曾任总司令,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副总司令, 后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2 年迁居美国, 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550 页。
- 派西沃, 斯宾塞 (Perceval, Spencer 1762

- 181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7—1809年任财政大臣,后任内阁首相(1809—1812)。——第392页。
- 柳里克王朝(Люриковичи)——罗斯公爵,后为俄国沙皇的王朝(912—1598),即基辅大公伊戈尔的后裔的王朝;据编年史的记述,伊戈尔是半传说的瓦利亚基军队统率者柳里克儿子的儿子。——第261页。
- 英格利斯,罗伯特·哈利(Ingliš, Robert Harry 1786—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201、429页。
- 英格拉哈姆,邓肯·纳萨涅尔(Ingraham, Duncan Nathaniel 1802—1891)——美国海军军官,1853年为“圣路易号”军舰舰长;所谓的“土麦那事件”的参与者。——第204、331页。
- 美延多尔夫,彼得·卡季米罗维奇(Мейендорф, Петр Казимирович 1796—1863)——男爵,俄国外交家,1850—1854年任驻维也纳公使。——第219、301、355、365页。
- 拜尔凯利斯——见克罗弗德,詹姆斯。
- ## 十 画
- 马丁,威廉·范绍(Martin, William Fanshaw 1801—1895)——英国海军将军,1853年任朴次茅斯造船厂厂长。——第599页。
- 马森纳,安得列(Masséna, André 1756—1817)——法国元帅,拿破仑各次战争参加者之一。——第482、513页。
- 马莱,克劳德·弗朗斯瓦(Malet, Claude François 1754—1812)——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1812年反波拿巴密谋的领导者,密谋失败后被枪毙。——第606页。
- 马洪子爵,菲利浦·亨利·斯坦霍普(Mahon, Philip Henry Stanhope 1805—187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皮尔派,议会议员;1834—1835年为外交副大臣。——第426、444、445页。
- 马克思,卡尔(Mark,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第3、31、32、41、43、44—47、96、98、126、132—135、158、160、177、191、199、206、212、230、257、263、268、271、272、283、291、321—323、325、327、330、342、347、350、356、358、467、475、478、492、494、504、505、527、541—549、552、556—571、589、590、598、612页。
- 马克思,燕妮(父姓是冯·威斯特华伦)(Marx, Jenny 1814—1881)——卡尔·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46页。
- 马迪耶(Madier)——法国机械工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英国工人,宪章主义者。——第521页。
- 马考莱,托马斯(Macaulay, Thomas 1800—1859)——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在任印度总督所辖的参事会参事期间(1833—1838)曾编有印度刑法典,该刑法典于1860年被批准为法律。——第140、206页。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

- 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第3、4、41、43、107、124、574、575页。
- 马多克, 托马斯·赫伯特 (Maddock, Thomas Herbert 1792—1870)——英国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第253页。
- 马尔科姆, 约翰 (Malcolm, John 1769—1833)——英国外交家和东印发公司的官员, 著有关于印度的著作多种; 曾任驻德黑兰公使 (1799—1801、1808—1809 和 1810); 1826—1830 年为孟买省督。——第 225 页。
-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教士, 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人,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280、369、505、518、520 页。
- 马尔克斯, 弗兰西斯·约瑟夫·彼得 (Marx, Francis Joseph Peter 1816—1876)——英国保守派政论家, 地主; 戴·乌尔卡尔特的朋友和支持者。——第 321、323 页。
- 马茂德二世 (Mahmoud II 1785—1839)——土耳其苏丹 (1808—1839)。——第 185、186、402、420—426、438、595 页。
- 马夫罗格尼 (Maurogeni)——土耳其外交家,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任驻维也纳代办。——第 422 页。
- 马姆兹伯里伯爵, 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1807—188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著名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52、1858—1859), 掌玺大臣 (1866—1868、1874—1876)。——第 212、239、286、292—296 页。
- 格雷, 查理 (Grey, Charles 1764—1845)——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 (1830—1834)。——第 424、445 页。
- 格雷, 乔治 (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 (1846—1852、1855—1858 和 1861—1866) 和 殖民大臣 (1854—1855)。——第 213 页。
- 格雷, 亨利·乔治 (Grey, Henry George 1802—1894)——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军务大臣 (1835—1839) 和 殖民大臣 (1846—1852); 查理·格雷的儿子。——第 212 页。
- 格莱夫 (Greif)——普鲁士警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士在伦敦的谍报机关领导人之一。——第 44 页。
- 格鲁伯, 约翰·哥特弗利德 (Gruber, Johann Gottfried 1774—1851)——德国学者, 文学史家。——第 67 页。
- 格里利, 霍拉斯 (Greeley, Horace 1811—1872)——美国资产阶级记者和政治活动家, 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 后来放弃了激进主义。——第 200 页。
- 格莱安, 詹姆斯·罗伯特·乔治 (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期是辉格党人, 后为皮尔派, 曾任内务大臣 (1841—1846), 海军首席大臣 (1830—1834、1852—1855)。——第 294、599、600 页。
- 格兰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阿道夫 (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记者, 无原则的政客, 1848 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的代表, 站在极右翼立场; “立宪主义者报”的撰稿人。——第 22 页。

- 格拉赫, 威廉 (Gerlach, Wilhelm)——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伦敦郊区威·黑耳火箭工厂的工人。——第 98 页。
- 格伯克斯, 沙尔 (Gerbex, Charler 1816—1879)——瑞士军官, 1852 年起为弗里布尔州国民自卫军司令, 镇压 1853 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组织者。——第 99 页。
- 格兰维耳伯爵, 乔治·鲁森-高尔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1815—1891)——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的领袖之一; 曾任外交大臣 (1851—1852, 1870—1874 和 1880—1885), 殖民大臣 (1868—1870, 1886); 1852—1854 年任枢密院院长。——第 218 页。
- 格拉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派,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 1880—1885, 1886, 1892—1894)。——第 49—55、59—63、66、67—76、78—84、87—94、118、119、132、135—137、138、165、166、198、200、211、253、317、345、373、475 页。
- 格娄弗诺, 罗伯特 (Grosvenor, Robert 1801—1893)——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第 70、71 页。
- 格贝尔特, 奥古斯特 (Gebert, August)——梅克伦堡的工人, 在瑞士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迁居伦敦,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第 562 页。
- 格里伦佐尼, 卓万尼 (Grillenzoni, Giovanni 1796—1868)——意大利爱国者, 革命者, 马志尼的拥护者。——第 342 页。
- 格隆德威格, 尼古拉·弗雷德里克·赛韦林 (Grundtvig, Nicolai Frederik Severin 1783—1872)——丹麦神学家和诗人, 下院议员, 反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复归德国。——第 117 页。
- 纳梅克-帕沙 (Namyk Pasha)——土耳其政治活动家, 1832 年 10 月被派往伦敦执行外交使命。——第 422 页。
- 纳迪尔-沙赫 (库利汗) (Nadir Shah 1688—1747)——伊朗沙赫 (1736—1747); 1738—1739 年对印度进行了抢劫性的远征。——第 140、144 页。
- 纳皮尔, 约瑟夫 (Napier, Joseph 1804—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2 年以爱尔兰首席检察官身分进入得比内阁, 1858—1859 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第 286 页。
- 纳斯尔-埃德-丁 (Nasr ed-din 1831—1896)——伊朗沙赫 (1848—1896)。——第 463 页。
- 纳希莫夫, 巴维尔·斯切潘诺维奇 (Нахимов, 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1802—1855)——卓越的俄国海军统帅, 海军上将, 在西诺普会战中为俄国分舰队指挥官; 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 (1854—1855) 的领导和组织者之一。——第 614、615 页。
- 埃尔希, 约翰·赛米尔 (Ersch, Johann Samuel 1768—1828)——德国图书学家, 哈雷的地理学和统计学教授。——第 67 页。
-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

- 裁缝工人,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为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第562页。
- 埃卡留斯,约翰·弗里德里希(Eccarius, Johann Friedrich)——德国裁缝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1年起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是前者的兄弟。——第561页。
-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1790—1871)——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印度总督(1842—1844),海军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第205、212、225、298页。
- 埃耳芬斯顿,蒙特斯图亚特(Elphinstone, Mountstuart 1779—1859)——孟买省督(1819—1827),“印度史”一书的作者。——第226页。
- 乌伊勒,路易(Wuilleret, Louis 1815—1898)——瑞士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弗里布州保守党的领导人之一,教权派;曾因参加1853年反动的弗里布尔暴动的嫌疑而被捕。——第99页。
- 乌茨奈尔,奥古斯特(Uzner, August 生于1818年)——普鲁士军官,德国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在威·黑耳工厂工作。——第97、98页。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1847—1852年为议会议员,托利党人。——第28、29、135、291、315、350、354、368、369、437—441、448、458、612页。
-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Newman, Francis William 1805—1897)——英国语文学教授和作家,著有许多有关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著作,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182页。
- 纽尔纳(Nörner)——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普鲁士法官。——第96页。
-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费恩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1811—1864)——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陆军大臣(1854—1855)和殖民大臣(1859—1864)。——第286页。
- 索耳特,泰特斯(Salt, Titus 1803—1876)——英国厂主。——第371、470页。
-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公元前约497—约40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的作者。——第419页。
- 索伊蒙诺夫,费多尔·伊万诺维奇(Соймон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00—1854)——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为多瑙河和克里木俄军指挥官,在因克尔芒战斗中阵亡。——第531页。
- 库伯,菲尼莫尔(Cooper, Fenimore 1789—1851)——美国著名的长篇小说作家。——第44页。
- 库利汗——见纳迪尔—沙赫。
- 库普费尔,阿多尔夫·雅柯夫列维奇(Купфер, Адольф, Яковлевич 1799—1865)——俄国物理学家、矿物学家,结晶学家和气象学家;1829年担任厄尔布鲁士峰科学考察队队长。——第444页。

- 涅谢尔罗迭, 卡尔·瓦西里也维奇 (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总理大臣 (1816—1856)。——第 185、186、188、218、221、222、230、231、237、238、258、269、274、296、341、355、364—367、433、450、461、464、472 页。
- 涅谢尔罗迭, 德米特利·卡尔洛维奇 (Нессельроде, Дмитрий Карлович)——伯爵, 俄国外交家, 卡尔·瓦西里也维奇·涅谢尔罗迭的儿子。——第 5 页。
- 涅波科伊契茨基, 阿尔土尔·阿达莫维奇 (Непокойчицкий, Артур Адамович 1813—1881)——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参加者。——第 5 页。
- 席利, 维克多 (Schily, Viktor 1810—1875)——德国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律师,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第一国际的成员。——第 564 页。
- 席梅尔普芬尼希, 亚历山大 (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为流亡者, 加入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564 页。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传记材料)。——第 45、46、96、102、263、322、507—509、515、533、544—553、557、559、570、580 页。
- 恩格尔加尔特 (Энгельгардт)——俄国将军, 1853 年为多瑙河俄军指挥官。——第 531 页。
- 泰勒, 赫伯特 (Taylor, Herbert 1775—1839)——英国将军, 1830—1837 年任国王威廉四世的私人秘书。——第 437、441 页。
-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 (Ts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柏林革命事变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2 年转赴澳大利亚。——第 544、545、557 页。
- 桑让 (Songeon)——法国民主主义者, 1848 年革命时巴黎工人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曾流亡伦敦; 后为巴黎市政委员会主席。——第 557 页。
- 桑德斯, 约翰 (Saunders, John)——伦敦刑事调查局的职员。——第 97 页。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5、6、399、410、416、510、534 页。
-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第 20、23、31、32、67、102、126、161、187、224、237、239、259、265、278、289、293—295、297、349、479、595、604—607、611 页。
- 海泽, 海尔曼 (Heise, Hermann 死于 1860 年)——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第 564 页。
- 朗道夫 (Landolphe)——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侨居伦敦, 属于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 568 页。
- 班迪亚, 亚诺什 (Bangya, Ja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 匈

- 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第 44—47 页。
- 翁格恩—施特恩堡，恩斯特·威廉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 Эрнст Вильгельм) ——男爵，俄国外交家，五十年代任驻哥本哈根公使。——第 269 页。
- 热那亚公爵——见斐迪南多—阿尔伯特—阿梅迪奥。
- 爱德华四世 (Edward IV 1442—1483) ——英国国王 (1461—1483)。——第 285 页。
-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利也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93—1861) ——公爵，俄国将军，多瑙河俄军司令 (1853—1854)，克里木驻军总司令 (1855 年 2—12 月)，波兰王国的总督 (1856—1861)。——第 197、239、266、272、351、365、380、472、473、491、503、511、517、530、534、535、604 页。
- 伦德 (Lund) ——英国约克郡的厂主。——第 468、469 页。
- 柴尔德，约瑟亚 (Child, Josiah 1630—1699) ——英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商人；重商主义者；1681—1683 年和 1686—1688 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第 172 页。
- ### 十一画
- 曼，托马斯 (Mun, Thomas 1571—1641) ——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1615 年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之一。——第 172 页。
- 曼努，扬库 (Manu, Johann) ——瓦拉几亚外交大臣 (1850—1854)。——第 313 页。
- 曼罗，托马斯 (Munro, Thomas 1761—1827) ——英国将军，马德拉斯省督 (1819—1827)。——第 226 页。
-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 (1848—1850)，首相兼外交大臣 (1850—1858)。——第 32、33、41、572 页。
- 曼托伊费尔，卡尔 (Manteuffel, Karl 1806—1879) ——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内务副大臣 (1851—1853)，农业大臣 (1854—1858)；奥托·泰奥多尔·曼托伊费尔的弟弟。——第 32、33 页。
- 梅恩·里德——见里德，托马斯·梅恩。
- 梅恩，理查 (Mayne, Richard 1796—1868) ——伦敦警察局局长 (1850 年起)。——第 325 页。
- 梅因，爱德华 (Mein, Eduard 1812—1870) ——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547 页。
- 梅特涅，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派；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35、102、105、400、436、599 页。
- 梅兰希通，菲利浦 (Melancthon, Philipp 1497—1560) ——德国神学家，路德最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合诸侯的利益。——第 547 页。
- 理查兹，阿尔弗勒德·倍特 (Richards, Alfred Bate 1820—1876) ——英国剧作家和新闻记者，他反对科布顿和曼彻

- 斯特派的和平主义。——第 78、240、272 页。
- 理查一世(狮心理查)(Richard I Lion-Hearted 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第 121 页。
- 理查三世(Richard III 1452—1485)——英国国王(1483—1485)。——第 120 页。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40 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22、35、102、105、230 页。
- 基卜生, 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国家活动家, 自由贸易论者, 后成为自由党人; 曾任贸易大臣(1859—1865 和 1865—1866)。——第 66、71、80、198 页。
- 基谢廖夫, 尼古拉·德米特利也维奇(Киселе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00—1869)——俄国外交家, 1851—1854 年任驻巴黎公使。——第 132 页。
- 盖昂——见胡尔施德-帕沙。
- 盖扎(较正确的译名是哥伊沙)(约 949—997)——匈牙利执政者(972—997), 曾促进基督教在匈牙利传播。——第 64 页。
- 盖米季, 罗伯特·乔治(Gammage, Robert George 1815—1888)——宪章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鞍匠和皮鞋匠; “宪章运动史”一书的作者。——第 192、193 页。
- 悉尼——见赫伯特, 悉尼。
- 悉尼, 菲力浦(Sidney, Philip 1554—158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 内侍官和外交官。——第 312 页。
- 清朝——1644 至 1912 年统治中国的皇朝。——第 110、114 页。
- 荷马(Homerus)——半传说的古希腊叙事诗人,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 127 页。
- 密勒, 约瑟夫(约)(Miller, Joseph (Jo) 1684—1738)——英国著名的喜剧演员。——第 78 页。
- 得比伯爵(1851 年受封),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ery Smith Stanley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 后成为保守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第 3、212、286、317、425、460 页。
- 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约 1050—1115)——法国修士和传教士,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中为农民支队的统率者之一。——第 541、547 页。
- 莎士比亚, 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307、312、370、389、422、435、571 页。
-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公, 1814 年起任波兰军总司令, 实际上是波兰总督(1814—1831)。——第 130、131、437 页。
- 累亚德, 奥斯坦·亨利(Layard, Austin Henry 1817—1894)——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第 210、211、218、229、300、302—306 页。

## 十二画

- 斯坦利——见得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
-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得比伯爵(1869年受封)(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和1874—1878),殖民大臣(1882—1885),爱德华·得比之子。——第156、158、167、177、196页。
- 斯宾塞,赫伯特(Spencer, Herbert 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者,实证论者,资本主义辩护者。——第182、183页。
- 斯雷德,阿道夫(Slade, Adolphus 1804—1877)——英国海军军官,后为海军上将;1849—1866年在土耳其任职,克里木战争前夕获土耳其舰队海军少将衔。——第485页。
- 斯卡利,弗兰西斯(Scully, Francis 生于1820年)——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47—1857)。——第287页。
- 斯图亚特,达德利·库茨(Stewart, Dudley Coultts 1803—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有联系。——第98、272、306、309、317、405、412、442、444、457页。
- 斯图亚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英国政治活动家,1835—1836年为议会议员,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411、446、447、451页。
-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坎宁(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1786—1880)——英国外交家,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10—1812、1825—1828、1814—1858)。——第23、126、259、300、351、426、442、459、598、603页。
- 斯特拉索尔多—格拉芬堡,米哈埃尔(Strassoldo—Grafenberg, Michael 1800—1873)——伯爵,奥地利政府官员,1850—1853年米兰城的总督。——第348页。
- 斯维亚托斯拉夫·伊哥列维奇(Святослав Игоревич 约942—972)——基辅大公(约945—972)。——第261页。
- 菲茨罗伊,亨利(Fitzroy, Henry 1807—1859)——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1852—1855年是内务副大臣。——第254、255页。
- 菲利莫尔,约翰·乔治(Phillimore, John George 1808—1865)——英国法学家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第154页。
- 菲茨威廉,查理·威廉(Fitzwilliam, Charles William 1786—1857)——伯爵,英国议会活动家,辉格党人。——第212、333页。
- 菲克勒尔,约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49年巴登临时政府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英国。——第547页。
- 莫帕,沙尔勒曼·艾米尔(Maupassant, Charles Emile 1818—1888)——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

- 织者之一, 警察总长 (1852—1853)。——第 31、37 页。
- 莫里逊, 詹姆斯 (Morison, James 1770—1840)——英国商人, 曾出售所谓“莫里逊氏丸”而大发横财。——第 542 页。
- 莫扎特, 沃尔夫干格·亚马多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 420 页。
- 斐迪南-奥古斯特-弗兰茨-安东 (Ferdinand-August-Franz-Anton 1816—1885)——萨克森-科堡-萨尔菲耳德-科哈里亲王, 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的丈夫, 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二世 (1837—1853), 1853 至 1855 年为王国摄政者。——第 418 页。
- 斐迪南多-阿尔伯特-阿梅德奥 (Ferdinando-Alberto-Amedeo 1822—1855)——热那亚公爵, 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兄弟。——第 125 页。
- 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 (1808 和 1814—1833)。——第 399 页。
- 博德金, 威廉·亨利 (Bodkin, William Henry 1791—1874)——英国法学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1841—1847), 1853 年任检察长。——第 97 页。
- 博伊林, 詹姆斯 (Boylin, James)——伦敦郊区威·黑耳火箭工厂的职员。——第 97 页。
- 博雅多, 马提奥·马利阿 (Boiardo, Matteo Maria 1434—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 长诗“恋爱中的罗兰”的作者。——第 547 页。
- 塔克尔 (Tucker)——伦敦出版商。——第 612 页。
- 塔提舍夫, 德米特利·巴甫洛维奇 (Татищев, 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 1767—1845)——俄国外交家, 1826—1841 年任驻维也纳大使。——第 220 页。
- 莱宁根-威斯特堡, 克利斯提安·弗兰茨 (Leinigen-Westerburg, Christian Franz 1812—1856)——伯爵, 奥地利将军, 1853 年率领特派使团赴君士坦丁堡。——第 296 页。
- 莱佛尔斯, 托马斯·斯坦弗德 (Raffles, Thomas Stan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地官员, 1811—1816 年任爪哇的总督, “爪哇史”一书的作者。——第 144 页。
- 提普·萨希布 (Tippu Sahib 约 1749—1799)——迈索尔的执政者 (1782—1799); 十八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曾多次进行反对英国在印度的扩张的战争。——第 171 页。
-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编辑之一, “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65、152、191—195、223、257、506、520、521、529、576、577 页。
- 隆格, 约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神甫, “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利用天主教来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 547 页。
- 贺雷西 (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Horatius, Quintus Flaccus 公元前 65—8)——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101 页。

- 黑耳, 威廉 (Hale, William)——伦敦郊区火箭工厂的厂主。——第 96—98、124 页。
- 黑耳, 罗伯特 (Hale, Robert)——威廉·黑耳的儿子和同伙。——第 96—98、124 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探讨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第 109、541、545 页。
- 腊斯顿, 本杰明 (Ruston, Benjamin 死于 1853 年)——英国工人, 宪章主义者。——第 195 页。
- 傅阿德—埃芬蒂 (Fuad—E fendî 1814—1869)——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五十至六十年代屡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第 56、122 页。
- 费希巴赫 (Филлбах)——俄国将军, 1853 年为多瑙河俄军指挥官。——第 532 页。
-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 ### 十三画
- 奥斯丁 (Austin)——1853 年北明翰监狱副狱长。——第 343 页。
- 奥斯曼—帕沙 (Osman Pasha 约 1785—1860)——土耳其海军上将, 西诺普会战中为土耳其分舰队指挥官。——第 616 页。
- 奥美尔—帕沙 (米哈伊尔·拉塔斯) (Omer Pasha 1806—1871)——土耳其将军, 克罗地亚人, 克里木战争中土军总司令。——第 351、355、380、472、481—483、485、486、507—509、511、515—517、530—534、581—583、585、586、618 页。
- 奥斯本, 托马斯, 1689 年起受封为卡马登侯爵, 1694 年起受封为里子公爵 (Osborne, Thomas 1631—1712)——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首相 (1674—1679 和 1690—1695); 1695 年议会控告他有贪污罪行。——第 168 页。
- 奥斯坦—萨肯, 德米特利·叶罗费也维奇 (Остен-Сакен, Дмитрий Ерофеевич 1789—1881)——俄国将军, 克里木战争时期为俄国南部军队军长 (1853—1854), 塞瓦斯托波尔卫戍司令 (1854 年底—1855 年)。——第 532 页。
-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 (1672—1702), 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167、168、173、394 页。
- 奥托一世 (Otto I 1815—1867)——巴伐利亚王子, 后为希腊国王 (1832—1862)。——第 419 页。
- 奥朗则布 (Aurangzib, Alamgir, 1618—1707)——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 谡沙赫 (1658—1707)。——第 144 页。
- 奥康奈尔, 丹尼尔 (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 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的领袖。——第 455 页。
- 奥康瑙尔, 菲格斯 (O' Connor, Fea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8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 65—66 页。
- 奥尔西尼, 费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共和主义者, 民族解放和意大利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因行刺拿破仑第三未遂而被处死。——第 574 页。
- 奥勃莱恩, 威廉·斯密斯 (O'Brien, William Smith 1803—1864)——爱尔兰

- 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青年爱尔兰”社右翼领袖,议会议员(1828—1831和1835—1849);1848年被英国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而以终身放逐代替,1856年被赦免。——第415页。
-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786—1861)——伯爵,1856年后受封为公爵;俄国军事及国家活动家,外交家;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1856)。——第421页。
- 奥尔良王朝(Orléans)——法国的王朝(1830—1848)。——第611页。
-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父姓为梅克伦堡—施维林)(Orléans, Hélène, duchesse d' 1814—1858)——法王路易—菲力浦之长子斐迪南的孀妇,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第289页。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4、167、168、188、231、289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80页。
- 路斯达洛,埃利塞(Loustalot, Elysée 1762—1790)——法国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第125页。
- 雷姆佩尔,鲁道夫(Rempel, Rudolf 1815—1868)——德国企业家,在四十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563页。
- 雷德克利夫——见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腊特弗德。
- 葛德文,亨利·托马斯(Godwin, Henry Thomas 1784—1853)——英国将军,第二次英缅战争(1852)中的总司令。——第228页。
- 葛德里奇——见罗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
-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89、393页。
- 塞巴斯提昂尼,奥拉斯(Sébastieni, Horace 1772—1851)——伯爵,法国元帅,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2),驻伦敦大使(1835—1840)。——第231页。
- 绥夫特,卓纳森(Swift, Jonathan 1667—1745)——著名的英国讽刺作家;爱尔兰人。——第257页。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1848)和革命政府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47、557页。
- 狮子座——见鲁西扬,列汪。
- 瑙特,斯蒂凡·阿道夫(Naut, Stephan Adolf)——科伦商人,“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第563页。

#### 十四画

- 维莱尔,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Villèle, 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 1773—1854)——伯爵,复辟时期的法国国家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任首相(1822—1828)。——第185、230、436页。
- 维迪尔,茹尔(Vidil, Jules)——法国军官,

- 社会主义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曾同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第568、569页。
- 维卡里,海爾曼(Vicari, Hermann 1773—1868)——德国天主教高级僧侣,1842年起为夫赖堡(巴登)大主教。——第574页。
-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6页。
- 维克多克,弗朗斯瓦·欧仁(Vidocq, François Eugène 1775—1857)——法国的刑事犯,秘密警探,一般认为“维克多克回忆录”出于他的手笔;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手的代名词。——第44、393页。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是1850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流亡美国,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44、47、541—571页。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203、222、288、289、316、319、459、599、610页。
- 玛丽—路易莎—费南达(Maria Louisa Fernanda 1832—1897)——蒙潘西埃公爵之妻,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妹妹,公主。——第415页。
- 玛丽—安东尼达(Marie—Antoinette 1755—1793)——法国王后(1774—1793),路易十六之妻,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524页。
-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 Christina 1806—1878)——西班牙女王(1829—1833),斐迪南七世的妻子,王国的摄政女王(1833—1840)。——第419页。
- 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Maria II da Glorin 1819—1853)——葡萄牙女王(1826—1828和1834—1853)。——第418页。
- 赫伯特,悉尼(Herbert, Sidney 1810—1861)——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军务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0)。——第66、218页。
- 赫里斯,约翰·查理(Herries, John Charles 1778—1855)——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第201、416页。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第321页。
- 蒙塞耳,威廉(Monsell, William 1812—1894)——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1852—1857年为军械局秘书。——第137、138页。
- 蒙潘西埃,安都昂·玛丽·菲利浦·路易(Montpensier, Antoine Marie Philippe Louis 1824—1890)——公爵,法王路易—菲利浦的儿子,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丈夫,1868—1869年为西班牙王位的追求者。——第416页。
- 蒙腊德,迪特列夫·哥特哈德(Monrad, Ditlev Gothard 1811—1887)——丹麦主教和政治活动家,曾任首相兼财政

- 大臣(1863—1864),教育和宗教大臣(1848和1859—1863);在五十年代为民族自由党领袖。——第502页。
- 福尔布斯,查理(Forbes, Charles)——苏格兰地主。——第471页。
- 福克斯,查理·詹姆斯(Fox, Charles James 1749—1806)——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1783年任波特兰联合内阁(福克斯—诺思内阁)的外交大臣。——第138、169页。
- 歌德,约翰·沃尔夫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150、418页。
- ### 十五画
- 德鲁安·德·路易斯,爱德华(Drouyn de Lhuys, Edouard 1805—1881)——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四十年代是温和的奥尔良保皇派,1851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外交部长(1848—1849、1851、1852—1855、1862—1866)。——第230、237、239、292、300、341、363页。
- 德律埃,昂利(Druey, Henri 1799—1855)——瑞士国家活动家,激进主义者,联邦委员会委员(1848—1854),1850年是瑞士联邦主席。——第107页。
- 德克尔,卡尔(Decker, Carl 1784—1844)——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第541页。
- 德勒穆伯爵,约翰·乔治·兰顿(Durham, John George Lambton 1792—1840)——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驻彼得堡大使(1835—1837)。——第446、457页。
-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在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期间,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45、46、544页。
- 德穆兰,卡米尔(Desmoulin, Camille 1760—1794)——法国政论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第329页。
- 德利乌斯(Delius)。——普鲁士官员,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议员(1852—1853)。——第33页。
- 德利乌斯,卡尔(Delius, Karl)——马格德堡的商人。——第33页。
- 德拉修斯,阿伦·路易·弗雷德里克(Delasusse 或 de la Susse, Aron Louis Frédéric 1788—1860)——法国海军上将。——第126页。
- 德拉奥德,律西安(Delahodde 或 de la Hodde, Lucien 1808—1865)——法国政论家,复辟时期及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警探。——第44页。
- 德勒克吕兹,路易·沙尔(Delescluze, Louis Charles 1809—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革命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由于遭受迫害而流亡国外;1871年是巴黎公社著名的活动家,属于布朗基—雅各宾多数派;在街垒中牺牲。——第477页。
- 鲁西扬,列汪(Лусинян, Левон)——阿尔明尼亚大公,政治冒险主义者,流亡者;1853年住在英国。——第156页。
- 鲁散男爵,阿尔卜·廉(Roussin, Albin—

- Reine 1781—1854)——法国海军上将,海军大臣(1840、1843);1832—1834年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第420页。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Richelieu, Armand Jean du Plessis 1585—1642)——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第262页。
-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87—1869)——公爵,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1853—1855)。——第4、5、43、121、122、126、127、129、133、134、155、161、162、164、219、293、295—297、300、301、303、304、355、364、366、472、588、593页。
- 摩耳斯沃思,威廉(Molesworth, William 1810—1855)——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公共工程部长官(1853)和殖民大臣。——第56、219、290页。
- ## 十六画
- 穆勒,詹姆斯(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第169—170页。
- 穆斯塔法—帕沙(Mustafa Pasha 约生于1796年)——土耳其国家活动家,1853年5月至1854年5月任总理大臣。——第355、368页。
- 穆罕默德—阿利(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1831—1833年和1839—1840年曾进行过反土耳其苏丹的战争,其目的是要使埃及成为不依赖于土耳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第222、231、408、420—424、426、594页。
- 穆罕默德—阿利—帕沙(Mechmed Ali Pasha 1807—1868)——土耳其军事和国家活动家,1852年至1853年5月13日任总理大臣,后任陆军大臣(1853—1854)。——第368页。
- 霍格,詹姆斯·威尔(Hogg, James Weir 1790—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议会议员;1846—1847和1852—1853年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第141、143、253页。
- 霍布豪斯,约翰·凯姆,布罗顿男爵(Hobhouse, John Cam, Baron Broughton 1786—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35—1841和1846—1852)。——第157页。
- 霍斯福耳,托马斯·贝里(Horsfall, Thomas Berry 生于1805年)——英国煤矿主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托利党人。——第469页。
- 诺思,弗雷德里克(North, Frederick 1733—179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财政大臣(1767),首相(1770—1782);1783年任波特兰联合内阁(福克斯—诺思内阁)的内务大臣。——第138、169页。
- 诺曼比侯爵,康斯坦丁·亨利·菲普斯(Normanby, Constantin Henry Phipps 1797—1863)——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爱尔兰总督(1835—1839),陆军和殖民大臣(1839),内务大臣(1839—1841);1846—1852年任驻

- 巴黎大使。——第415页。
- 鲍威尔,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46、546页。
- 赖辛巴赫,奥斯卡尔 (Reichenbach, Oskar 生于1815年)——伯爵,西里西亚的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1850年起侨居英国,后迁美洲。——第548页。
- 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477、568、606页。

## 十七画

- 谢努,阿道夫 (Chenu, Adolphe 约生于1817年)——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奸细和暗探。——第44页。
-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 (Schärttner, August)——海瑙的制桶匠,1848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饭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常在那里聚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第548页。
- 缪尔纳,阿道夫 (Müller, Adolf 1774—

- 1829)——德国作家和评论家。——第48页。
- 戴拉库拉,艾德门 (Delacour 或 de la Cour, Edmond 1805—1873)——法国外交家,1853年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第23、126、293页。

## 十八画

- 萨德勒,约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任财政副大臣。——第138页。
- 萨格登,爱德华,圣莱昂兹男爵 (Sugden, Edward, Baron St. Leonards 1781—1875)——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52年为大法官。——第285、417页。
- 萨尔达尼拔——见亚述巴尼拔。
- 萨尔梯柯夫,阿列克塞·德米特利也维奇 (Салт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06—1859)——公爵,俄国旅行家,作家和艺术家,1841—1843和1845—1846年曾游历印度。——第251页。
- 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伊丽莎白·鲁森—高尔,斯泰福侯爵夫人 (Sutherland, Elizabeth Leveson—Gower 1765—1839)——苏格兰大地主。——第213、470页。
- 魏兹,约翰·埃什弗德 (Wise, John Ayshford)——1853年英国议会议员。——第290页。
- 魏德迈,约瑟夫 (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并站在北军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567 页。

### 十九画

庞森比, 约翰 (Ponsonby, John 约 1770—

1855)——子爵, 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那不勒斯公使 (1832), 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1832—1841) 和驻维也纳大使 (1846—1850)。——第 426、459 页。

##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 三画

山鲁亚尔——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东方的君主。——第 225 页。

### 四画

比尔奇, 哈尔威——菲·库伯小说“间谍”中的主要人物。——第 44 页。

文克里特, 阿尔诺德——半传说中的瑞士战士, 是为纪念 1386 年在森帕赫战斗中瑞士人战胜奥地利哈布斯堡人而作的史诗“森帕赫之歌”中的主人公。——第 547 页。

### 五画

瓦格纳——歌德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 崇尚空论、脱离生活的烦琐学者的典型。——第 418 页。

札格纳特——古印度神话中毗湿奴神的化身之一。——第 144、342 页。

### 七画

沙宰曼——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东方的君主。——第 225 页。

### 八画

阿拉丁——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神灯的所有者。——第 254 页。

阿利曼——体现世上万恶之源的古波斯神安赫腊曼纽的希腊名字。安赫腊曼纽同体现众善之源的阿胡腊玛士达 (希腊名字叫奥尔穆兹德) 有着永世不可调和的仇恨。——第 545、546 页。

阿耳契娜——阿里欧斯托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 凶恶的女巫。——第 389、441 页。

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 他同希腊人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 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第 128 页。

抹大拉的马利亚——根据福音书传说, 她是基督的继承者, 是一个悔过的罪人。——第 419 页。

### 九画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 1712 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约翰牛传”问

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 214、292 页。

柏克司尼弗——狄更斯小说“马丁·切斯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伪君子，假好人。——第 92 页。

### 十 画

埃林杜尔——缪尔纳戏剧“罪”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48 页。

埃披门尼底斯——据古希腊神话的说法，是克里特岛上酣睡了半个多世纪的祭司。——第 181 页。

唐·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第 89、228、393、399 页。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按小说中有一个情节：他被委任为一个虚构的岛屿巴拉塔利亚（西班牙文是《barato》，即“便宜的”之意，与俄文“便宜得来”之意接近）的总督。——第 89 页。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第 418 页。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他的十二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第 83 页。

### 十一 画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 549、558 页。

### 十二 画

汤姆——比彻·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

小屋”中的主要人物。——第 93 页。

### 十三 画

塞卜洛士——古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亡灵在此受苦）大门的三头犬。——第 83 页。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特维城志中的主人公，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主要人物。据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特维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第 202 页。

奥尔穆兹德——体现世上众善之源的古波斯神阿胡腊玛士达的希腊名字。——第 545 页。

### 十四 画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第 422、435 页。

### 十五 画

摩拏——传说中的古印度立法者；“摩拏法典”是婆罗门僧侣在一至五世纪内编纂的。——第 120、201 页。

鲁杰罗——阿里欧斯托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第 389 页。

### 十八 画

萨米尔（萨马伊尔）——据犹太神话说，是众魔之王，也是死神的化身。——第 556 页。

## 期 刊 索 引

### 二 画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伦敦出版。——第 49、55、65、76、95、327、329、387、470、494、562 页。

### 三 画

“卫报”（《The Guardian》）——伦敦出版。——第 596 页。

“卫星报”（《Satellite》）——特兰西瓦尼亚的喀琅施塔得出版。——第 331 页。

“土麦那公道报”（《L'Impartial de Smyrne》）——第 278、332 页。

### 四 画

“巴塞尔日报”（《Basler Zeitung》）——第 331 页。

“巴黎革命”（《Révolutions de Paris》）——第 125 页。

“日报”（《Gazette》）——见“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太阳报”（《The Sun》）——伦敦出版。——第 334 页。

“文件集”（《The Portfolio》）——伦敦出版。——第 185、437、453、458 页。

### 五 画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étersbourg》）——第 433 页。

“圣彼得堡报”（《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газета》）——第 315 页。

“圣彼得堡消息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第 292 页。

“世纪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 127、289 页。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布鲁塞尔出版。——第 289、331 页。

“石印通讯”（《Litographic Correspondence》）——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第 267 页。

“布勒斯劳报”（《Breslauer Zeitung》）——第 324 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巴黎出版。——第 22、23、128、314、332、462、473 页。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维也纳出版。——第 597 页。

### 六 画

“先驱”（《The Leader》）——伦敦出版。——第 289、341、346 页。

“先驱报”（《Herald》）——见“先驱晨报”。

“先驱者报”（《Le Précurseur》）——安特卫普出版。——第 556 页。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

——伦敦出版。——第 20、22、93、129、161、166、275、429、473、492、590、598 页。

“观察家”（《The Examiner》）——伦敦出版。——第 289 页。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伦敦出版。——第 119、163、346、358、372 页。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er》）——伦敦出版。——第 152、163、351、356、360、364、431、600 页。

## 七 画

“邮报”（《Post Zeitung》）——斯德哥尔摩出版。——第 268 页。

“邮报”（《Post》）——见“晨邮报”。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敦出版。——第 22、27—29、93、307、334、344、492、520、599、600 页。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伦敦出版。——第 496 页。

“时代报”（《Die Zeit》）——柏林出版。——第 41、365 页。

“劳埃德氏报”（《Lloyd》）——见“维也纳劳埃德氏报”。

“君士坦丁堡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第 315、512 页。

“利物浦信使报”（《The Liverpool Courier》）——第 363 页。

## 八 画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 266、316 页。

“国家报”（《Le Pays》）——巴黎出版。——第 23、126、238 页。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巴黎出版。——第 164、238、330、360 页。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第 77 页。

“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第 279 页。

“阿格拉姆报”（《Agramer Zeitung》）——阿格拉姆（今萨格勒布）出版。——第 503 页。

“官报”（《Cazette》）——见“伦敦官报”。

“的里雅斯特日报”（《Triester Zeitung》）——第 126 页。

## 九 画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出版。——第 133、452、593 页。

“总邮报”（《Ober-Postamts-Zeitung》）——见“法兰克福邮报”。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 5、23、125、278、358、360、602 页。

“纪事报”（《Chronicle》）——见“纪事晨报”。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伦敦出版。——第 22、51、59、93、158、163、268、330、347、351、357、462、464、592、598、600、604 页。

“帝国报”（《Journal de L'Empire》）——见“国家报”。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240、268、503、564 页。

“星期日报”（《Sunday Times》）——伦敦出版。——第 341、375 页。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伦敦出版。——第 562 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

黎出版。——第 121、134、351、360 页。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第 48、541、548、566 页。

## 十 画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第 21、22、27、71、78、82、83、87、93、121、127、129、130、133、135、151、155、158—162、163、165、178—181、183、210、215、216、253、255、273、345、346、352—353、356、358、360、369、438、450、464、470、478、492、509、576、588、593、595、600、603 页。

“泰晤士周报”（《Weekly Times》）——伦敦出版。——第 320、500 页。

“马赛信使报”（《Le Courrier de Marseille》）——第 20 页。

“马赛信号报”（《Le Sémaphore de Marseille》）——第 165 页。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 3、13、19、23、30、34、40、43、64、66、71、86、100、108、116、123、128、131、142、150、159、166、176、183、196、197、209、217、227、236、245、252、263、270、277、290、298、312、320、322、326、340、349、359、371、378、385、387、471、476、479、485、490、500、506、514、517、521、529、536、579、587、591、601、608、612、619 页。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第 126、219、267、272、462、568、569 页。

“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第 456、458 页。

## 十一 画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伦敦出版。——第 22、42、67、84、238、240、289、315、321、323、327、328、354、368、598 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伦敦出版。——第 22、67、93、126、163、220、238、256、266、279、351、357、360、364、373、478、590—592、595、600、603 页。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伦敦出版。——第 562 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257、371 页。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 334 页。

## 十二 画

“普鲁士周刊”（《Preußisches Wochenblatt》）——柏林出版。——第 41 页。

“普雷斯顿舵手”（《Preston Pilot》）——第 520 页。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ssische Lit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柏林出版。——第 331 页。

“联邦报”（《Der Bund》）——伯尔尼出版。——第 124 页。

## 十三 画

“新闻报”（《The Press》）——伦敦出版。——第 155、160、198、287、602 页。

“新闻报”（《Die Presse》）——维也纳出版。——第 42、275、355、479 页。

“新闻报”（《La Presse》）——巴黎出

- 版。——第 126、231、259、491 页。
- “新 奥 得 报” (《Neue Oder — Zeitung》)——见“奥得总汇报”。
- “新 英 格 兰 报” (《Neu — England — Zeitung》)——第 541 页。
- “新 普 鲁 士 报” (《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272 页。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 — ökonomische Revue》)——伦敦, 汉堡出版。——第 45、549 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第 117、321、322、563 页。
- “奥 格 斯 堡 报” (《Ауксбургская газета》)——见“总汇报”。
- “奥 格 斯 堡 报” (《Augsburger Zeitung》)——见“总汇报”。
- “奥得总汇报” (《Allgemeine Oder — Zeitung》)——布勒斯劳 (今弗罗茨拉夫) 出版。——第 321 页。
- “奥地利通讯” (《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维也纳出版。——第 4、502 页。
-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第 414 页。
- “瑞士” (《La Suisse》)——伯尔尼出版。——第 125 页。
- “经济学家” (《The Economist》)——伦敦出版。——第 16、29、113、114、182、238、268、346、497、499、518—520、522—527、577、590 页。
- “粮食交易所快报, 农业报” (《Market Lane Express, Agricultural Journal》)——伦敦出版。——第 347、373 页。
- “解放” (《L' Emancipation》)——布鲁塞尔出版。——第 42 页。

#### 十 四 画

- “漫游者” (《Der Wanderer》)——维也纳出版。——第 331、503 页。
- “维也纳劳埃德氏报” (《Wiener Lloyd》)——第 198 页。

#### 十 五 画

- “论坛报”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墨尔本商业通报” (《Melbourne Commercial Circular》)——澳大利亚出版。——第 495 页。

#### 二 十 画

- “议会报” (《Il Parlamento》)——都灵出版。——第 275、331 页。

## 地名索引

## 三 画

- 土伦——第 5、23 页。  
 土尔图凯(土特腊坎)——第 333、516、530、531、581—585 页。  
 土库曼彻——第 401 页。  
 土尔克斯坦——第 15 页。  
 大西洋——第 104、216 页。  
 大诺夫哥罗德——第 14、261 页。  
 小亚细亚——第 7、304 页。  
 小瓦拉几亚——第 502、507、511、533 页。  
 上海——第 112、114 页。  
 广州——第 16、115、495 页。  
 也门——第 146 页。  
 士麦那(伊斯密尔)——第 165、219、239、276、278、295、331、332、430 页。  
 凡迪门岛(塔斯马尼亚岛)——第 342 页。

## 四 画

- 巴黎——第 5、46、47、106、121、125、132、134、164、185、238、258、265、289、290、300、301、316、321、349、351、365、408、437、464、477、478、491、595、606—608 页。  
 巴登——第 551、573 页。  
 巴特那——第 358、476 页。  
 巴士姆(巴士米)——第 129、487—490、512、602、617 页。  
 巴罗达——第 359 页。

- 巴塞儿——第 104 页。  
 巴格达——第 15 页。  
 巴尔米拉——古代城市和古代国家。——第 146 页。  
 巴勒斯坦——第 7 页。  
 巴雅泽特(多古巴雅西特)——第 512、617 页。  
 巴尔干山脉——第 25、28、36、381—383、481、483、484 页。  
 巴尔干半岛——第 36 页。  
 巴尔塔利曼尼——第 162、271、304、353 页。  
 比哈尔——印度的省。——第 171 页。  
 比斯开湾——第 129 页。  
 比硕夫斯海姆——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73 页。  
 太平洋——第 599 页。  
 太恩河——在英国。——第 308 页。  
 太晤士河——第 255、325 页。  
 切斯特——第 566 页。  
 切尔奇-帕里什(切尔奇)——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68 页。  
 切尔克西亚——第 160、311、451—459 页。  
 日内瓦——第 104 页。  
 日德兰半岛——第 274 页。  
 牛顿——第 589 页。  
 牛津郡——英国的郡。——第 496 页。  
 爪哇——岛屿。——第 144 页。  
 夫赖堡——第 574 页。

中亚细亚——第 171 页。  
厄尔布鲁士山——第 444 页。  
什列斯维希——第 117、274、477、561 页。  
扎勃利亚克——第 503 页。

## 五 画

布伦——第 605 页。  
布达——匈牙利首都，今布达佩斯的西岸地区。——第 104 页。  
布拉格——第 12 页。  
布哈拉——第 15 页。  
布鲁萨(布尔萨)——第 259 页。  
布柯维纳——第 9 页。  
布泽乌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484 页。  
布鲁塞尔——第 121、289、556、558、604 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321、322 页。  
布来洛夫(布来拉)——第 446、507、508、530、535、618 页。  
布莱克本——第 189、374、468、503 页。  
布加勒斯特——第 20、38、162、220、267、272、273、355、481、508、509、511、516、531、534、586、618 页。  
布利斯托尔——第 173、189 页。  
布黎纪瓦特——第 374 页。  
布莱得弗德——第 371、466 页。  
布宜诺斯艾利斯——第 415 页。  
卡潘——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第 401 页。  
卡尔斯——第 129、488、512、513 页。  
卡利库特(柯日科德)——第 358 页。  
卡拉法特——第 480、507、509—511、533、534、580、585、586、618 页。  
卡尔纳梯克——印度的省。——第 170 页。  
卡尔斯多尔夫——第 552 页。  
卡姆契克河(卡姆契亚)——第 481、483 页。  
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城附近(古罗马)。——第 222 页。  
卡特加特海峡——第 501 页。  
汉阳——中国湖北省的城市。——第 111 页。  
汉堡——第 39、324、561 页。  
汉诺威——第 561 页。  
汉普郡——英国的郡。——第 475 页。  
加拉兹——第 15、133、355、447、530 页。  
加尔各答——第 140、170、247、250、358、359 页。  
加里西亚——第 10、18、272 页。  
加利福尼亚——第 112、369、493 页。  
圣阿尔班——第 344 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12、16、38、132、133、162、197、221、259、266、267、272、278、279、300、305、310、311、313、357、365、420、421、430、444、457、503、572、604、613 页。  
圣让得阿克(阿卡)——第 232 页。  
圣尼古拉码头(舍夫卡捷尔)——第 444、616 页。  
尼萨——巴尔干的一个居民点。——第 315 页。  
尼尼微——古代城市。——第 210 页。  
尼科波尔——第 384、508、533 页。  
北京——第 111、115 页。  
北明翰——第 308、343、374、398、467、475 页。  
北明翰区——第 189 页。  
古里亚——第 443 页。  
古巴岛——第 175 页。  
古扎拉特——印度的省。——第 171 页。  
弗兰德斯——第 145 页。  
弗里布尔——瑞士的州。——第 99、100、

124、132页。  
 瓦尔那——第382、481、483、485、508页。  
 瓦拉几亚——第8、9、12、27、36、164、185、220、267、272、303、313、324、355、380、384、443、444、447、484、502、509、510、515—517、530—532、534、581、585、604页。  
 印度河——第15、16、141页。  
 印度斯坦——第115、143—147、149、246、253、359页。  
 东吁——在缅甸。——第319页。  
 生河——在印度。——第358页。  
 皮蒙特——第481、574、575页。  
 平德列克利(埃列格利)——第313页。  
 幼发拉底河——在近东。——第15、486、487页。

## 六 画

达卡——第147页。  
 达尔温——英国的盆地。——第189页。  
 达普——在恒河和朱木拿河两河流域。——第358页。  
 达尔马威亚——第11页。  
 达尔雅尔峡谷——在高加索山脉。——第443页。  
 达达尼尔海峡——第5、14、16、17、126、135、162、163、298、302、350、353、372、430—432、443、449、595页。  
 伊萨克查——第491页。  
 伊皮罗斯——第10页。  
 伊斯坦布尔——见君士坦丁堡。  
 伊兹马伊尔——第383页。  
 伊赫吉曼山隘——第381页。  
 伊奥尼亚群岛——第18页。  
 安特卫普——第324、553、556页。  
 安提瓦利(巴尔)——第18页。  
 安提奥克(安塔基雅)——第122页。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第221、421、426—435、441、588、594页。  
 安那托里亚——第617页。  
 亚尼纳——第36页。  
 亚得利亚海——第9、18页。  
 亚平宁山脉——第143页。  
 亚历山大里亚——第122、424、426页。  
 亚历山得拉炮台——在高加索。——第457页。  
 西莱丁——英国的郡。——第195页。  
 西诺普——第602、603、613、614、616页。  
 西西里岛——第143页。  
 西斯托夫(斯维施托夫)——第533页。  
 多瑙河——第7、9、11、14、17、21、133、160、212、237、279、318、365、366、379—384、443—451、463、480—486、491、502、503、507—514、517、530—534、580—583、586、594、595、611、618页。  
 多尔尼—勒—格朗——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99页。  
 多勃拉尔——巴尔干山脉的一个山隘。——第381页。  
 艾尔威尔—魏尔——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468页。  
 艾纳德什克(伊涅杰克)——第382页。  
 艾尔斯贝里——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333页。  
 托列斯—维德拉斯(托列治—维德拉什)——第482页。  
 托伦蒂诺——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348页。  
 托罗斯山脉——在土耳其。——第420页。  
 米德——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99页。  
 米兰——第18、32、106、574页。  
 匈牙利——第11、15、18、261、272、305、

- 373、442、443 页。  
 华沙——第 38、383、407、408、413、464、481 页。  
 华盛顿——第 331 页。  
 地中海——第 16、18、28、121、240、275 页。  
 色雷斯——第 12、38 页。  
 吉耳弗德——第 599 页。  
 朴次茅斯——第 121、599、600 页。  
 乔罗赫河——在高加索。——第 488 页。  
 伏尔加河——第 14 页。  
 百蒙得锡郊区——现为伦敦的一个区。——第 342 页。  
 列杜特—卡列——高加索海岸要塞。——第 489、513 页。  
 好望角——第 416 页。
- ## 七 画
- 贝恩利——第 468、493、589 页。  
 贝拉里——第 359 页。  
 贝耳岛——在比斯开湾。——第 568 页。  
 贝鲁特——第 262 页。  
 贝凯普——第 468、493、589 页。  
 贝凯普区——第 493 页。  
 贝拿勒斯——第 358 页。  
 贝捷克(贝希克)湾——在爱琴海。——第 221、278、295、302、309、352、463 页。  
 贝尔比斯郡——英属圭亚那的郡。——第 416 页。  
 贝尔格莱德——第 11、39、315、381 页。  
 贝萨拉比亚——第 9、258、305、509 页。  
 里子——第 398、466 页。  
 里海——第 14、132、402、443、486 页。  
 里斯本——第 418 页。  
 里昂河(里奥尼)——在高加索。——第 487 页。  
 里斯康士——比利时的一个居民点。——第 477 页。  
 苏格兰——第 70、75、92、336、370、470 页。  
 苏黎世——第 104、513 页。  
 苏姆拉(科拉罗夫格勒)——第 332、333、381—384、481、483、508、618 页。  
 苏茹克—卡列——高加索海岸要塞。——第 451、453 页。  
 苏利纳支流——在多瑙河三角洲上。——第 318、448—450 页。  
 沃伦——第 503、532 页。  
 沃伦省——第 268 页。  
 沃耳特(沃耳土)——第 488 页。  
 沃耳特尼察——第 507、516、530、531、534—535、580—582、585、586、596、618 页。  
 克里木——第 131、258、457 页。  
 克拉约瓦——355、384、507、509、533、580 页。  
 克拉科夫——第 316、410、414、417、445、449、594 页。  
 克罗地亚——第 11 页。  
 杜布诺——第 481 页。  
 杜罗河——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第 424 页。  
 杜塞尔多夫——第 263 页。  
 沙瓦河——多瑙河流域。——第 7 页。  
 沙恩弗德——第 493 页。  
 希瓦——第 15、501 页。  
 希尔索瓦(希尔朔瓦)——第 380、480、482、534 页。  
 希鲁兹布里——第 343 页。  
 运河——在中国。——第 114 页。  
 但泽(格但斯克)——第 18、324 页。  
 利物浦——第 151、152、173、189、344、448 页。  
 伯尔尼——第 124、132 页。

来巴赫(柳布梁纳)——第 5、123 页。  
 坎特布里——第 344 页。  
 那不勒斯——第 103、106、348、426 页。  
 辛辛那提——第 545 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 5、9、10、12、14—19、27—30、35、38、39、40、77、122、126、127、130、131、155、161、162、164、219—222、241、258—263、266、271、278、291、293—296、300、301、303—305、311、313—315、319、331—333、350、351、354、382—385、419—421、425—427、431、438、442、443、451、458—460、463、480、483、484、491、508、512、515、533、588、598、611、613、615、616 页。

## 八 画

阿瓦——在缅甸。——第 319、475 页。  
 阿尔塔——第 18 页。  
 阿拉伯——第 145 页。  
 阿纳帕——第 160、453 页。  
 阿姆河——第 501 页。  
 阿留塔(奥尔特)河——第 508、510、511、516 页。  
 阿勒颇(哈勒布)——第 315 页。  
 阿克顿——第 468 页。  
 阿达纳——第 426 页。  
 阿格拉——第 242、358、359 页。  
 阿尔达汉——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第 512、513 页。  
 阿克林顿——第 493 页。  
 阿克尔曼(德涅斯特河上的别尔哥罗德)——第 402、403 页。  
 阿速夫海——第 316 页。  
 阿迪杰河——在意大利。——第 510 页。  
 阿迪斯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05 页。

阿格拉姆(萨格勒布)——第 11 页。  
 阿哈尔齐赫——第 487、613、616、617 页。  
 阿尔明尼亚——第 7、8、27、129、156、486、487、616 页。  
 阿尔哲什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484、511、581、583 页。  
 阿腊克斯河——第 401、486—488 页。  
 阿姆斯特丹——第 416 页。  
 阿拉哈巴德——第 358 页。  
 阿尔巴尼亚——第 17、260、385 页。  
 阿德里安堡(爱德尔纳)——第 36、122、129、160、162、221、278、381、382—385、402、421、430、431、438、444—449、452、454、457、460、481、594 页。  
 阿巴萨德——第 401 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 143 页。  
 阿斯特拉巴德——第 130、132 页。  
 阿希佩拉哥群岛——在爱琴海。——第 5、260 页。  
 波提——第 160、491 页。  
 波焦——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99 页。  
 波河——第 517 页。  
 波茨坦——第 237 页。  
 波斯湾——第 486 页。  
 波士顿——第 189 页。  
 波尔顿——第 189、374、467—469、505、589 页。  
 波斯尼亚——第 8、12、38、220、260、314、315、384 页。  
 波希米亚——见捷克。  
 波罗的海——第 135、261、501 页。  
 波多尔斯克(赫梅里尼茨克)省——第 268 页。  
 罗马——第 261—263 页。  
 罗蒙——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99 页。

- 罗陀斯岛——在爱琴海。——第 60 页。  
 罗瑟海特——伦敦郊区。——第 96、97 页。  
 罗斯托克——第 324 页。  
 罗坦斯塔尔——第 493 页。  
 罗契得尔区——第 589 页。  
 拉合尔——第 358 页。  
 拉索瓦——第 508 页。  
 拉多加湖——第 17 页。  
 拉吉马哈尔——第 358 页。  
 明乔河——在意大利。——第 510 页。  
 明斯克省——第 268 页。  
 明格列里亚——第 131、443、617 页。  
 金角——港湾。——第 126 页。  
 金德利——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93 页。  
 图兰(土尔克斯坦)低地——第 14 页。  
 图诺拿(朱木拿)河——在印度。——第 358 页。  
 孟买——印度的城市和管区。——第 170、242、244、251、358、359 页。  
 孟加拉——印度的管区。——第 141、143、148、170—171、228、229、242—243、251 页。  
 彼特拉——古代城市。——第 146 页。  
 彼得瓦尔登(彼得罗瓦拉丁)——第 220 页。  
 帕迪罕——第 493 页。  
 帕尔马——第 574 页。  
 武昌——中国湖北省的城市。——第 111 页。  
 卑谬——缅甸的一个居民点。——第 476 页。  
 佩斯——匈牙利首都,今布达佩斯东岸地区。——第 39 页。  
 坦比哥——第 453 页。  
 直布罗陀——第 17 页。  
 居塔希亚——第 425、426 页。  
 林格伍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189 页。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第 17、135、501 页。  
 杰尔库姆-卡列——高加索的海岸要塞。——第 513 页。  
 法尔瓦尼区——在瑞士。——第 99 页。  
 的里雅斯特——第 18、319 页。  
 底格里斯河——在近东。——第 15 页。  
 迭麦拉拉郡——英属圭亚那的郡。——第 416 页。  
 依麦列梯亚——第 443 页。  
 拉芒什海峡——第 163、588 页。  
 些耳德河——第 424 页。  
 门的内哥罗——第 13、21、380、384、503 页。
- ## 九 画
- 南京——第 114 页。  
 南威克——第 192 页。  
 南安普顿——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42 页。  
 南高加索——第 488、617 页。  
 南卡罗来纳——美国的一个州。——第 216 页。  
 哈姆——第 563 页。  
 哈佛尔——第 39 页。  
 哈特福郡——英国的郡。——第 497 页。  
 哈里法克斯——第 195、222 页。  
 哈尔德伐尔——第 250 页。  
 科伦——第 32、33、44、45、324、545、558、562—565 页。  
 科尼亚——第 420、423 页。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 324、348 页。  
 科尼斯霍芬——第 573 页。

- 威根——第 374、492、493、503、504 页。
- 威尼斯——第 207 页。
- 威尔士——第 319、325、466 页。
- 柯恩——第 468 页。
- 柯夫诺(考纳斯)省——第 268 页。
- 美索不达米亚——第 145、304 页。
-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47、563 页。
- 耶拿——第 510 页。
- 耶路撒冷——第 122 页。
- 柏立——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74、468 页。
- 柏林——第 31—33、45、46、96、106、131、265、266、322、324、464、478、502、563、564、572 页。
- 洛桑——第 99 页。
- 咸海——第 501 页。
- 恒河——在印度。——第 358 页。
- 勃固——缅甸的省。——第 228、229、319 页。
-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 104、148、152、191、256、343、371、375、494 页。
- 施特廷(兹杰辛)——第 18、324 页。
- 约克郡——英国的郡。——第 152、191、343、470、494、497 页。
- 叙利亚——第 304、512 页。
- 信德省——在巴基斯坦。——第 15、171、204 页。
- 保加利亚——第 38、261、304、384、491、594 页。
- 品都斯山脉——在巴尔干半岛。——第 28 页。
- 十 画**
- 马赛——第 358 页。
- 马其顿——第 12、17、38、384、480 页。
- 马六甲——第 228 页。
- 马德拉斯——印度的城市和管区。——第 170、242—244、251、358 页。
- 马格德堡——第 33、542 页。
- 马里乍河——第 36 页。
- 马尔他岛——第 5、18、129、164、430 页。
- 马尔卡河——在高加索。——第 478 页。
- 库尔——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342 页。
- 库尔兰(库尔泽姆)——第 131 页。
- 库楚克-凯纳吉(凯纳吉)——第 122、221、260、458、472、594 页。
- 库班河——第 443、455、513 页。
- 库拉河——第 487、617 页。
- 库尔德斯坦——第 380 页。
- 库列夫查(居列夫查)——巴尔干的一个居民点。——第 7、382 页。
- 特尔尼——意大利的一个居民点。——第 348 页。
- 特萨利亚——第 10、17 页。
- 特林泰姆——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74 页。
- 特拉比曾德(特拉布松)——第 10、15—17、129、420、443、485、487、490 页。
- 特兰西瓦尼亚——第 9、10、272 页。
- 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第 510 页。
- 埃内兹——第 275 页。
- 埃里温(耶列温)——第 401、488、617 页。
- 埃士顿——第 589 页。
- 埃士顿区——第 589 页。
- 埃塞基博——在荷属圭亚那。——第 416 页。
- 埃尔斯伦(埃尔祖鲁姆)——第 421、487—490、512 页。
- 海牙——第 77 页。
- 海德——第 589 页。
- 海格——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04

- 页。  
海利贝里——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05 页。  
乌尔未汉普顿——第 374 页。  
格拉斯哥——第 374、445 页。  
格连加里——苏格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470 页。  
格洛索普——第 589 页。  
格拉赫斯海姆——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73 页。  
格鲁吉亚——第 131、316、443、444、487、491、513、597、616 页。  
格罗德诺省——第 268 页。  
格律恩斯菲尔德——德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573 页。  
纽约——第 16、263 页。  
纽切尔奇——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93、589 页。  
纽沙特尔——瑞士的州。——第 102、125 页。  
纳瓦林(皮洛斯)——第 26、36、221、400、425、594 页。  
纳希切万——第 401 页。  
爱尔兰——第 69、73、75、82、84、92、137、143、180、182、253、256、257、265、285、286、324、397、421 页。  
爱丁堡——第 475、493 页。  
高加索——第 443—445、460、461、478、485、486、532、488—490、513、535、613、614 页。  
高止山脉——在印度。——第 248、358 页。  
伦敦——第 4、5、20、32、42、43、45、96、113、121、156、161、172、173、182、231、254、255、258、264、269、289、299、316、324、351、360、365、369、372、402、422、437、444、445、448、451、463、467、491、542、544、557、561、563、564、575、594、599、600 页。  
伦巴第——第 43、108、143、348、373、510、517 页。  
哥特兰岛——波罗的海的岛屿。——第 501 页。  
哥本哈根——第 77、269、393、477、501 页。  
宾格利——第 468 页。  
班斯里——第 189 页。  
旁遮普——第 15、171、242、359、501 页。  
敖德萨——第 15、126、213、300、305、324、331、366、445、447、489、532、602 页。  
索非亚——第 381、384、480、508、515、533 页。  
席尔河(日伊岛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508、510 页。  
泰尔诺夫——第 414 页。  
乌特烈赫特——第 415 页。  
恩菲耳德——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68 页。  
柴郡——英国的郡。——第 375 页。  
茹尔日沃(朱尔朱)——第 403、507—509 页。
- ### 十 一 画
- 基础——第 261 页。  
基辅省——第 268 页。  
基利亚——第 5 页。  
基特利——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468 页。  
基尔梅赫姆——爱尔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66 页。  
基耳马尔诺克——第 374 页。  
基台尔姆斯特——第 189 页。  
莫甘——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第

402 页。  
 莫斯科——第 11、133 页。  
 莫兹多克——第 443 页。  
 莫尔达维亚(莫尔多瓦)——第 8—10、27、36、160、162—164、185、220、267、272、303、313、315、355、380、381、384、443、444、447、604 页。  
 设刺子——第 15 页。  
 设菲尔德——第 333、368 页。  
 捷克——第 118、261 页。  
 捷列克河——第 513 页。  
 曼成——第 491、574 页。  
 曼彻斯特——第 46、76、141、152、189、284、356、357、374、398、465—467、469、475、493、505、521、548、577、589 页。  
 得比——第 469 页。  
 得比郡——英国的郡。——第 375 页。  
 悉尼——第 16、371 页。  
 教皇国——第 348 页。  
 密卡岱——在缅甸。——第 319 页。  
 鹿特丹——第 324 页。  
 梅德斯頓——第 97 页。

## 十二画

斯坦福——第 493 页。  
 斯泰福——第 368 页。  
 斯利特——哥特兰岛上的筑垒要点。——第 501 页。  
 斯拉廷纳——第 509、517 页。  
 斯凯尔斯—奥尔查德(斯凯尔斯)——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374 页。  
 斯拉窝尼亚——第 11 页。  
 斯德哥尔摩——第 131、268 页。  
 斯泰里布雷芝——第 468、589 页。  
 斯特拉斯堡——第 605、606 页。  
 斯托克波特——第 151、189、190、468 页。

斯比脱菲尔兹——第 189 页。  
 斯比特海德海峡——第 121 页。  
 黑森——第 565 页。  
 黑海——第 11、14—16、21、28、29、129、135、160、165、221、259、298、313、366、381、382、432、443、445、450、451、454、455、486—488、491、595、597、599、602、613、616 页。  
 黑林山脉——第 14 页。  
 黑石山脊——英国地名，为一小丘。——第 191、195 页。  
 黑塞哥维那——第 8 页。  
 塔霍河——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第 424 页。  
 塔纳——第 358 页。  
 塔雷什——高加索的一个居民点。——第 401 页。  
 塔干罗格——第 15 页。  
 普纳——第 359 页。  
 普雷兹——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99 页。  
 普勒夫那(普累文)——第 333 页。  
 普雷斯顿——第 374、467—469、493、504、520、521、528、590 页。  
 普鲁特河——第 197、237、238、279、295、305、363、379、463、531、532、597 页。  
 莱蒂(莱佳)岛——位于多瑙河三角洲。——第 448 页。  
 莱斯特——第 466 页。  
 莱斯特郡——英国的郡。——第 475 页。  
 菲利浦港——在澳大利亚。——第 496 页。  
 菲利浦堡(普罗夫迪夫)——第 381 页。  
 都诺——第 507、508 页。  
 都拉索(都勒斯)——第 18 页。  
 厦门——第 495 页。  
 雅西——第 133、267、272、273、481 页。

腊万纳——第 348 页。  
 温泉关——希腊山隘。——第 551 页。  
 梯弗里斯(梯比里斯)——第 443、487、488、512、513、617 页。  
 惠特奈尔——第 468 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第 5、123 页。  
 喀琅施塔得——在特兰西瓦尼亚。——第 331 页。  
 喜马拉雅山脉——第 143、253 页。  
 博斯普鲁斯海峡——第 14、16、17、26、27、37、420、485、614 页。

### 十三画

奥尔丹——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13、374、468 页。  
 奥腊什——第 480 页。  
 奥里萨——印度的省。——第 171、252 页。  
 奥查科夫——第 383 页。  
 奥提尼伊——瑞士的一个居民点。——第 99 页。  
 奥斯坦德——第 39、554 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 355、464、478 页。  
 塞凡湖——在高加索。——第 401 页。  
 塞尔维亚——第 8、12、27、38、39、259、260、303、314、384、480、511、515、533、586、589、595、618 页。  
 塞勒特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484、509 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 4、350、420、451、452、532、614、615 页。  
 新堡——第 308、368 页。  
 新加坡——第 228 页。  
 顿河——第 14 页。  
 滑铁卢——第 483 页。

雷佐温——第 325 页。  
 路易吉安那——第 574 页。

### 十四画

维丁——第 384、480、491、503、508—511、516、530、531、580、586、618 页。  
 维也纳——第 4、6、7、11、42、106、124、125、131、134、143、240、258、265、266、268、272、279、292、301、302、313、352、355、364、365、406、410、411、412、415—417、437、446—450、462、464、472、473、486、491、502、507、531、572、592、594、598、604 页。  
 维罗那——第 5、123、399、402 页。  
 维尔纳(维尔纽斯)省——第 268 页。  
 赫尔(哈尔)——第 255、344 页。  
 赫拉特——第 501 页。  
 赫尔辛格——第 17 页。

### 十五画

德里——第 140、227、358 页。  
 德森(提契诺)州——在瑞士。——第 342 页。  
 德黑兰——第 15、131 页。  
 德勒穆——第 223 页。  
 德勒斯顿——第 131 页。  
 德布勒森——第 38 页。  
 德干高原——在印度。——第 143 页。  
 德涅泊河——第 14、532 页。  
 德涅斯特河——第 9、14 页。  
 摩地那——第 574 页。  
 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半岛——第 11、36 页。  
 摩拉瓦河——在多瑙河流域。——第 12 页。  
 撒丁岛——第 106 页。  
 撒哈拉——第 145 页。

鲁舒克(鲁塞)——第 482、507、508、510、516、533、618 页。  
 鲁美利亚——第 275 页。  
 剑桥——第 344 页。  
 缅甸——第 175、204、228、229、319、475 页。  
 黎巴嫩——第 7 页。  
 墨尔本——第 371、545 页。

### 十六画

霍亨——第 481 页。  
 霍姆斯——第 420 页。  
 霍尔施坦——第 117、274、477、561 页。  
 霍耳博恩——英国的一个居民点。——第 255 页。  
 诺定昂——第 65、189、466、467 页。  
 诺瓦拉——第 517 页。

诺依达尔特——苏格兰的一个居民点。——第 470 页。  
 锡兰——第 143 页。  
 锡利斯特里亚(锡利斯特拉)——第 261、333、380—384、508、516、618 页。  
 泽稷岛——海峡群岛之一。——第 606 页。  
 泽姆林(泽蒙)——南斯拉夫城市。——第 165 页。

### 十八画

萨尔赛达岛——第 144 页。  
 萨拉密斯岛——在爱琴海。——第 161 页。  
 槟榔屿——在马六甲海峡。——第 228 页。